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六卷 · 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ISBN 978-7-5321-5160-8
9 787532 151608 >
定价：249.00元
（上下二册）



〔俄罗斯〕
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世界文学史

第六卷 · 下册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史. 第6卷/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撰；杜文娟等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12(2014.7 重印)
ISBN 978-7-5321-5160-8
Ⅰ.①世… Ⅱ.①俄…②杜… Ⅲ.①世界文学-文学史
Ⅳ.①I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99075 号

责任编辑：赵南荣 胡艳秋
封面设计：王志伟

世界文学史·第六卷
〔俄罗斯〕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 编撰
杜文娟等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文艺大一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74.25 插页 8 字数 1,326,000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160-8/I·4071 定价：249.00 元(上下二册)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021-57780459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ОМ ШЕСТОЙ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89

第三编　外高加索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史与前几个时期一样，具有许多共性和民族个性，其共性是在本地区的政治历史、地区行政、经济状况和文学过程的客观规律的影响下形成的。这一政治历史极具戏剧性。1795年梯弗里斯（现第比利斯）被波斯沙赫阿加-穆罕默德·卡贾拉的军队攻占并摧毁。整座城燃烧了八天。在这场大火中，不仅烧毁了大量的奇珍异宝，也烧毁了许多精神和文化珍品。由于各民族渴望摆脱伊朗沙赫王和土耳其苏丹王的侵略，渴望保护自身的生存，于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结成友好联盟，后来东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也发起运动加入了俄罗斯。这场运动在十九世纪前三十年内彻底完成。在这三十年间发生了俄罗斯—伊朗和俄罗斯—土耳其流血战争，俄罗斯在战争中取得了重要的军事—政治胜利。与伊朗签订的古里斯坦和约（1831）和土库曼恰伊和约（1829）以及后来与土耳其签订的亚得里亚堡和约（1829），巩固了外高加索（包括北阿塞拜疆在内）与俄罗斯的联合，而南阿塞拜疆和大不里士市的中心仍处于伊朗政权的统治之下，所以从那时起，南、北阿塞拜疆就按照各自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

加入俄罗斯给外高加索各民族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他们避免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和内讧，避免了野心勃勃的邻国的毁灭性侵袭，因为这些邻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受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者贪图所唆使，为了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而发动战争。

随着城市居民数量的不断增长，开始了有用矿物的加工工业。外高加索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逐渐加入到全俄民族解放运动中，并开始研究俄罗斯的先进文化。自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计划中这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它们伴随着农民、手工业者反对那些不愿丧失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地

方显贵、僧侣和贵族代表的反封建、反沙皇斗争。导致类似斗争发生的理由通常是由于沙皇行政当局对劳苦大众征收苛捐杂税，在许多情况下不愿考虑当地的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实施有损于民族文化和文学发展利益的俄罗斯化。

但是尽管存在各种客观历史矛盾和困难，在这一时期仍奠定了各民族相互接近和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基础，加强了与先进的俄罗斯文化的联系。十二月党人运动的思想成为外高加索文学新趋势发展的巨大促进因素。因为早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卫国战争时期，许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就在作战部队服役，他们不仅与俄罗斯士兵并肩作战，而且与俄罗斯军官也密切接触，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秘密解放组织的成员。十二月党人运动被镇压后，丘赫尔别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亚·奥多耶夫斯基都被流放到高加索。亚·格里鲍耶陀夫的命运、亚·普希金、米·莱蒙托夫、杰·达维多夫、Я. 波隆斯基等人的许多生活和创作篇章都与高加索联系在一起。

在各民族间的相互交往、外高加索与俄罗斯进步作家和文化活动家的结合中，定期刊物发挥了重要作用。1816 年在阿斯特拉罕出版了由 K·谢瓦尔疆主编的周报（亚美尼亚文）（《东方新闻》），这不仅是在俄罗斯的第一份亚美尼亚报纸，也是第一份亚美尼亚—俄语双语报纸。1828—1832 年在梯弗里斯出版了俄语和格鲁吉亚语双语版（从 1829 年开始还发行了法尔西语版，1832 年发行了阿塞拜疆语版）周报《梯弗里斯报》（亚美尼亚文）。

437·

亚·普希金在给 П·先科夫斯基的信中写道："《梯弗里斯报》是唯一的俄文报纸，该报有自己的特点并经常能看到许多有趣的文章。"在高加索，亚美尼亚的期刊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1846 年在梯弗里斯出版了亚美尼亚报纸《卡夫卡斯》，1850—1851 年出版了由加·帕特卡尼扬[①]主编的政治、商业和文学报纸《亚拉腊》。一些文化中心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梯弗里斯的涅尔谢相学校（1770—1857）和拉扎列夫斯基东方语言学院（1815 年在莫斯科成立），从这两所校园里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外高加索和俄罗斯文化与文学活动家。

与此同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文学在各自的民族传统基础上发展起来。它们带着各种思想—美学知识和艺术积累进入了各自历史的新阶段。民主化进程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遍布于精神生活、文化和文学的各个领域。这个进程并不是最后才触及民间歌唱诗人的创作，这些歌唱诗

① 拉法埃尔·加布里罗维奇·帕特卡尼扬（1830—1892），笔名加马尔·卡季帕，亚美尼亚作家，著有组诗《自由之歌》。——译注

人继续了诗人萨亚特-诺瓦[1]的传统。他曾用三种语言进行创作，并惨死在梯弗里斯教堂的台阶上。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民间歌唱诗人（沙姆奇·梅尔科、许库希、阿希克·佩里、纳巴季等）的长诗中体现了爱国主义英雄气概，诗歌的主题明显地拓宽，个人自我意识感和团结一心共同抗敌的感情也大大加强。文学手法、文学流派和创作风格都产生了交替，它们反映了新时代的社会需求和人民的强烈意向，也意味着中世纪文学的终结。例如，在亚美尼亚文学中，古典主义主要关注古代和中世纪，缅怀已逝去的昔日王朝（米纳相、A. 巴格拉图尼王朝），取而代之的是开始转向表现个人与落后的封建秩序、教会、古代（A. 阿拉姆达里扬、M. 达吉阿江等王朝）迷信之间冲突的文学。在旧的亚美尼亚格拉哥里语——一种用于古典主义、历史文献和历史作品的语言，与取而代之的迅速发展起来的新的人民语言——阿什哈拉巴尔语之间展开了斗争，而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就有几部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哈·阿博维扬的长篇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Г·阿利尚的长诗等）使用了新语言进行创作。应该记住的还有，亚美尼亚文学及其传统是在东、西（土耳其的）亚美尼亚和世界许多其他国家中（亚美尼亚文化的古发源地是在印度的两个城市——加尔各答和马德里、意大利的威尼斯和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形成的。

在格鲁吉亚人民的社会生活中新思潮也是与民族自我意识的突飞猛进增长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反映在一大批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的创作中，其中包括格鲁吉亚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亚·恰夫恰瓦泽、诗人格·奥尔别里安尼，稍后的所·拉兹马泽、米·图马尼什维里和瓦·奥尔别里安尼。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的创作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顶峰。

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文学中，历史题材（瓦·奥尔别里安尼的《举杯祝愿健康》、尼·巴拉塔什维里的《格鲁吉亚的命运》等）占有显著位置。

格鲁吉亚诗歌语言的大众化在很大程度上与摆脱东方风格和华丽辞藻密切相关，同时也与强烈地希望掌握俄罗斯和世界文学的经验密不可分。亚·格里鲍耶陀夫的岳父亚·恰夫恰瓦泽翻译了普希金、高乃依和拉辛的大量作品，亚美尼亚浪漫主义诗人 Г. 阿利尚大约与此同时翻译了席勒的《钟之歌》以及拜伦的长诗《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的一首诗。在三十

[1] 萨亚特-诺瓦（1712—1795），原名阿鲁琼·萨亚江，亚美尼亚诗人，亚美尼亚中世纪世俗诗歌的最杰出代表，以游方歌手著称。他用亚美尼亚文、格鲁吉亚文、阿塞拜疆文写作诗歌。长于写爱情抒情诗（《卡曼恰》、《我要这样生活》）。——译注

年代初，根据格·埃里斯塔维[1]和瓦·奥尔别里安尼的倡议，将格里鲍耶陀夫的《聪明误》译成了格鲁吉亚文。

在这三个民族的历史中，文学体裁的革新是与民族戏剧和剧院（格·埃里斯塔维、哈·阿博维扬、米·法·阿洪多夫）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三个民族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具有混合性特点，它吸收了其他艺术流派的各种成分。例如，哈恰图尔·阿博维扬就其精神实质、色彩表现手法、对自由理想的不懈追求来讲，是位浪漫主义作家，他为亚美尼亚三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思想的民主—启蒙方向奠定了基础。

启蒙运动的趋势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阿塞拜疆文学中也具有代表性。阿塞拜疆启蒙运动的特点是阶级无差别和泛民主主义，这两点既显示了其强有力的一面，也暴露了其较软弱的一面："……它既吸收了革命资产阶级的理想：反特权、个性觉醒、崇拜自由、世俗教育；也从革命民主政治（主要是俄国的民主政治）那里获得不少东西：例如，无神论、激进主义、武装暴动思想……通常是消极抵抗的。它的软弱性表现为问题的真正解决仍极端驳杂不统一……"（Я. 卡拉耶夫语）。

438·

艺术文化和社会思想的迅速发展导致一个阶段与另一个阶段的迅速更替，尽管前者还没有彻底展现或丧失其一切潜力。阿塞拜疆早期启蒙运动的首批代表有学者兼诗人的阿巴斯-库利·巴基哈诺夫、诗人米尔扎·沙菲·瓦泽赫、作家伊斯梅尔-贝克·库特卡申斯基。他们不仅将同宗教狂热分子、伊斯兰教社会中十分强大的封建君主专制、人民的经济文化落后和闭塞作斗争的思想带入文学中，而且也带入了新的体裁：通俗小说、情节长诗、喜剧，塑造了新的人物形象，表达了对"小人物"的同情。暴露性讽刺诗歌在卡苏姆-贝克·扎基尔的创作中达到了高峰。阿塞拜疆唯物主义哲学家、戏剧奠基人、喜剧家兼出版家米·法·阿洪多夫活动的开始和极盛，正处于这一时期。

在上面提到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诗人和作家的个人创作中（更不用说格鲁吉亚的作家了），梯弗里斯起着巨大作用，他们中的许多人曾长期居住在这里并进行创作。

外高加索各民族的文学逐渐克服了本民族的局限性，制定出新的文艺思想原则，掌握了新的体裁，创立了大众化语言。外高加索文学彼此间的联系及其与俄罗斯文学的联系得到了巩固。

---

① 格奥尔吉·达维多夫斯基·埃里斯塔维（1811—1864），格鲁吉亚作家、戏剧活动家、翻译家。作品有现实主义喜剧《瓜分》、《讼争》、《吝啬人》、《旧日场景》，对格鲁吉亚戏剧的发展有一定影响。——译注

第一章 格鲁吉亚文学

十九世纪初格鲁吉亚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具有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的历史事件：1801 年 9 月 12 日，根据亚历山大一世的诏书，东格鲁吉亚（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并入俄罗斯帝国。在此事件之前的一连串其他事件中，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就是 1783 年 7 月 24 日在格奥尔耶夫斯克签订的和约，根据此和约，东格鲁吉亚这个被土耳其和波斯不断侵略变得软弱无力的国家开始纳入俄罗斯的庇护之下，但仍保留其国家主权，而俄罗斯则承担起保护其免遭邻近伊斯兰教国家侵犯的责任。这个和约反映了当时格鲁吉亚进步阶层的政治愿望。

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的内部危机在波斯可汗阿加-穆罕默德·卡贾拉（1795 年）大军的毁灭性侵略后和希拉克利二世（1720—1798）去世后变得尤其尖锐。皇位继承人之间内讧四起，封建割据主义日趋白炽化，外部政治形势紧张激烈，这一切促使沙皇政府取消东格鲁吉亚的主权并将其并入俄罗斯版图，随后西格鲁吉亚的命运也如此，并入了俄罗斯。

并入俄罗斯给格鲁吉亚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和平，其成果很快变得有目共睹。关于这一点伊利亚·恰夫恰瓦泽[①]写道："好久未感受到安宁，被掠夺和破坏以及连绵不断的战争折磨得疲惫不堪的国家终于平静下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纪开始了，这是一个充满了宁静祥和的世纪。"

但是随着格鲁吉亚并入俄罗斯，格鲁吉亚人民开始承受超负荷的双重压制（民族压制和社会压制），这就引起了所有阶层居民的愤怒和抗议。十九世纪前十年在格鲁吉亚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具有巨大意义，它们唤醒了社会意识，并使民族进步力量在反专制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

向沙皇专制的殖民地制度发起抗议的还有著名的 1832 年爱国主义密谋，它是格鲁吉亚人民解放运动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这次密谋是在格鲁吉亚贵族知识分子界酝酿成熟的，其代表们汲取了十二月党人运动的经验和三十年代的欧洲民主主义思想，抱定目标不仅要使格鲁吉亚摆脱殖民地的依附地位，而且要彻底改变其社会—政治制度。密谋者的左翼以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所罗门·多达什维里（1805—1836）为首，他们拥护在格鲁吉亚实行共和体制。

正如 1825 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反映了先进的俄罗斯的社会要求一样， ·439

① 伊里亚·恰夫恰瓦泽（1837—1907），格鲁吉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著有长诗《幻影》、《强盗卡科》，小说《他是人吗》。——译注

1832年的格鲁吉亚密谋是格鲁吉亚社会先进分子进步愿望的表现，它深刻表达了格鲁吉亚的社会和民族利益。尽管密谋者失败了，但他们的追求和夙愿，正如伊利亚·恰夫恰瓦泽所中肯恰当的表述："在生活的垄沟里播下了种子。"

虽然格鲁吉亚的语言和文化遭到沙皇专制的迫害与压制，但是格鲁吉亚社会的先进代表们却成功地利用新的"和平条件"实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目的。1819年开始出版发行《格鲁吉亚报》，很快又改名为《格鲁吉亚人报》。为了便于通过书刊检查，这份周刊的所有资料都先用俄语编写，然后再译成格鲁吉亚语。1828年创办了《梯弗里斯公报》(用俄语和格鲁吉亚语出版)。1832年所·多达什维里出版了第一份格鲁吉亚文学杂志——《梯弗里斯公报文学版》，它在格鲁吉亚报章杂志和社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这一时期文化—教育工作也明显扩大了，许多著名的古格鲁吉亚文学文献开始被研究和推广，创作和翻译活动也活跃起来。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与西欧古典主义作品一起被紧锣密鼓地译成格鲁吉亚文，在格鲁吉亚，对俄罗斯作家作品的兴趣从十八世纪起就逐渐增强。对下列一些欧洲(优先是法国)及俄罗斯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尤其关注：孟德斯鸠、拉辛、高乃依、伏尔泰、罗蒙诺索夫、苏马罗科夫、杰尔查文、安季奥赫·康捷米尔、赫拉斯科夫[①]、特列季亚科夫斯基[②]，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大量被译成格鲁吉亚文(而后来是改编和模仿)，这本身就证明了格鲁吉亚翻译家们的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而这些审美趣味和文学倾向也清晰地表现在他们自身的文学创作中。

虽然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格鲁吉亚作家，其压倒多数的创作并没有达到很高的(全欧的)艺术水平，而且常常具有折中主义和模仿者的特点，但是他们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却促进了格鲁吉亚文学的欧化，这完全符合格鲁吉亚许多世纪以来的宗教文化传统，因为这种文化在其自身的发展中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和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是到了十八至十九世纪才被迫与其脱离关系。

在格鲁吉亚文学中，古典主义的影响极其强烈地被意识到是在十九世

① 米哈依尔·马特耶维奇·赫拉斯科夫，俄国作家，古典主义的代表人物。最著名的著作是叙事诗《罗斯记》(1779)，描写伊凡四世征服喀山。——译注

② 瓦西里·基利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斯基(1703—1769)，俄国诗人，语言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在《简明俄罗斯诗歌作法新编》一书中确立了俄国诗歌音强音节体原则。他是俄国古典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创立了新的诗歌题材，作有诗歌《季列马希达》。——译注

纪二十至三十年代，但是必须指出，早在十九世纪初，在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中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古典主义就明显像一个特殊的遗迹，像上个世纪的文学惰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克服这种惰性的迫切需要变得越来越明显。

十九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作家也十分重视感伤主义，他们不仅将那些深受格鲁吉亚读者喜爱的西欧和俄罗斯感伤主义的经典之作译成了格鲁吉亚文，而且在其影响下创作出许多独出心裁的感伤主义作品（例如，Д. И. 巴格拉季奥尼的长篇小说《新希赫》就是在卢梭的《新艾洛绮斯》的影响下创作的，并且表现出与萨·理查逊[①]和尼·米·卡拉姆津的作品[②]的相似性）。

虽然感伤主义和古典主义对格鲁吉亚的文学创作影响不大，并且最终也没有历史发展前途，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却在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格鲁吉亚文学的欧化发展进程。

浪漫主义成为在格鲁吉亚艺术语言发展中留下不可磨灭遗迹的进步运动。由于国家丧失民族独立而引发的浪漫主义情绪，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来。晚些时候，在1832年反君主主义专制密谋后（这次密谋是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分界线），浪漫主义逐渐成为格鲁吉亚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流派。在意识方面发生了深刻性的转变，它在唤起民族自我意识方面留下了决定命运的痕迹长达数十年。

1832年，由知识渊博的同胞们的先进思想培养起来的信仰彻底破灭了，对现存事物的合理性的信仰彻底破灭了，尽管后者曾激发起一整套实践观点、概念和纯理性主义理想，并且又都是长期探索，实事求是的行动结果。毫不奇怪，“理性”的这种破产导致了对推动世界前进的万能秩序的合理性的怀疑。人的个人命运、社会的发展、民族生活的前途和整个人类历史都变成了盲目必然性活动的场所，而盲目必然性活动的不可知性和非理性主义法则使现实具有致命的矛盾性特征。这就是那些浪漫主义情绪，那个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浪漫主义赖以产生的思想根基。

·440

这是一个充满怀疑、悲观，痛感生不逢时和强烈不满的时代，但是在这个绝望的大环境中，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的内部却酝酿成熟了一种新的武器——即根本改变现实的思想和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拟定了新的行动方案——即非折中的最高纲领主义，它必定对未来几代人的意识产生深远影响。

---

① 萨·理查逊，英国小说家，这里指他的小说《克拉丽莎》。——译注

② 此处指他的小说《苦命的丽莎》。——译注



列兹金卡舞 梯弗里斯近郊的一个花园
格・加加林画 1840 年

在格鲁吉亚浪漫主义史上，占最重要地位的诗人是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和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在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中，包含了浪漫主义在格鲁吉亚走过的全部发展历程，从中既可以找到浪漫主义潮流的思想倾向性在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文学中的鲜明反映，也可以找到浪漫主义潮流的类型学特点及其高超艺术方法的鲜明反映。

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1786—1846)不仅是格鲁吉亚文学生活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而且也是格鲁吉亚社会—政治生活中引人注目的人物。他是俄罗斯帝国宫廷附属的卡特利-卡赫齐亚王国的全权大使加尔谢万・恰夫恰瓦泽(他有幸签署了俄罗斯与格鲁吉亚之间的历史性友好条约——格奥尔吉耶夫斯克条约)的儿子，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教子。亚・恰夫恰瓦泽十七岁时参加了山民的反沙皇农奴制起义(1804)，因此被捕并被流放到坦波夫。但是由于顾及其父亲德高望重、功勋卓著，国王很快便赦免了这位年轻诗人，并将其编入贵胄军官学校。1813—1814 年亚・恰夫恰瓦泽 441・参加了抗击拿破仑的卫国战争。他当过巴克雷-德-托里将军—元帅的副官，由于在战斗中表现英勇被授予多枚勋章和一把金马刀。1827—1828 年亚・恰夫恰瓦泽参加了俄罗斯—伊朗战争和俄罗斯—土耳其战争，战斗中他又表现出军人的英勇无畏和作为统帅的卓越胆识。

1832 年密谋暴露后，亚・恰夫恰瓦泽重新被流放到坦波夫省，从流放地回来后，他开始官运亨通。

三十至四十年代，在亚·恰夫恰瓦泽的家里经常聚集着许多著名的格鲁吉亚活动家、诗人、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亚·伊·奥多耶夫斯基、弗·费·拉耶夫斯基、A. H. 雅库博维奇）。有充分证据表明，普希金和莱蒙托夫也经常光顾这里。由于恰夫恰瓦泽与格里鲍耶陀夫有亲属关系（后者娶了恰夫恰瓦泽的长女尼诺），这使他与俄罗斯社会的先进代表的关系变得尤为密切。

在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的家里诞生了新的格鲁吉亚戏剧思想。在他的领导下创立了戏剧社，继承了十八世纪格鲁吉亚戏剧特有的古典主义传统。亚·恰夫恰瓦泽将伏尔泰、拉辛、高乃依的一系列戏剧作品翻译成格鲁吉亚语；他还翻译过拉封丹的寓言以及雨果、杰尔查文、茹可夫斯基、普希金的诗歌。

作为思想家，亚·恰夫恰瓦泽的成就在许多方面应归功于法国启蒙主义，其中，他的哲学论文《从近处观察到的人》（1804）就是受到卢梭的天赋人权思想的启示，这篇论文很显然是从法语意译过来的。恰夫恰瓦泽的《格鲁吉亚 1801 年至 1832 年状况历史概要》证明了其渊博的历史知识，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大胆地批判了俄国专制政体的殖民地政策。

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是以格鲁吉亚丧失民族独立而引起的深深痛苦为基础的，这个主题不仅在诗人的那些爱国主义诗歌（重现祖国昔日辉煌景象并将其与残酷的现实进行对比）中响起，而且诗人还赋予它的那些隐秘感受以独特的色调。诗人的爱情抒情诗是“他内心的痛楚呻吟，这呻吟不是由单恋引起，而是由许多更深刻的原因引起，这些原因就是——格鲁吉亚的命运”。尽管由祖国失去昔日辉煌和自由所引起的忧愁在诗人的创作中并没有成为那些意义深远的思想探索和社会探索的动因，亚·恰夫恰瓦泽也没创作出什么典型形象（这些形象因其客观内容可能会成为指引新的历史道路的鼓舞性纲领），但是，根据伊利亚·恰夫恰瓦泽的公正评价，正是在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中奠定了爱国主义的公民主题，这个主题以后成为十九世纪整个格鲁吉亚文学的主要主题之一。

民族解放思想在亚·恰夫恰瓦泽的创作中与社会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上个世纪的格鲁吉亚诗歌中，他首次提出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并谴责了那些“靠掠夺大饱私囊的掠夺者和压迫者”（诗歌《悲伤这个世界……》）。恰夫恰瓦泽相信，被压迫者和赤贫者必将胜利，而奴役者必将灭亡。

亚·恰夫恰瓦泽的诗歌思维（除《戈克恰湖》外，还有其他几部主要是晚期的诗歌）就其本质来讲是传统的，尽管在诗人的抒情诗中已经感觉到有许多新的精神需求日渐成熟，但就其主要的诗学原则来看，他在很长时间

里仍是古格鲁吉亚诗歌大师们的忠实追随者，仍是“鲁斯达维里[①]时代”和格鲁吉亚“复兴”时期所建立的诗歌世界的忠实追随者。

亚·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最后一位“多神教”诗人，他创作的诗歌充满了享乐主义的情绪。“感知力”——这种尘世赋予的享受才能，诗人视它为“上天呈现”给人类的一切精神能力中最高强的能力。爱情——这种尘世幸福的最强烈、最完美的体现，亚·恰夫恰瓦泽将它与感性享受联系在一起，爱人那“赏心悦目的美貌”对诗人来说是取之不尽的赞美对象。

但是亚·恰夫恰瓦泽的享乐主义是消极的，因为它是由于人意识到自己在冷漠的大自然的可怕力量面前孤立无助而产生的。崇拜享乐对于诗人来说是唯一的可以从残酷的现实中拯救出来的办法。

诗歌《戈克恰湖》(1841)在诗人的创作演变中是一个明确的阶段。《戈克恰湖》贯穿着对现有世界秩序不完善的痛苦意识，贯穿着人的崇高追求与其生活的现实条件之间的悲剧性矛盾感。由于这首诗是对具体情感体验结果的总结，因此它明显有别于诗人之前的那些格鲁吉亚古典哲学抒情诗，这种差异与诗人亚·恰夫恰瓦泽本人早期的诗歌(《人类生命的季节》、《啊，这个世界》)相比尤为明显，在早期的诗歌中，作家的观念似乎早就形成了，并表现为完整的结论和格言形式。

442·

从形式上看，这首诗的显著之处在于，诗人在这里既剔除了传统的“东方”隐喻手法，也摆脱了合乎规范的诗歌格律，而转向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品最中意的十四音节交叉韵诗歌，这种新形式更适合于表达作者的诗歌联想、思想活动、内心感受和精神状况。作为《戈克恰湖》的作者，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是格鲁吉亚浪漫主义最具特色的代表之一。

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1804—1883)就出身来讲，也属于上层贵族显贵。十八岁时他就开始了军旅生涯，在俄罗斯—土耳其战争和俄罗斯—伊朗战争(1826—1829)中战功显赫。由于参加了1832年密谋，他被逮捕并被逐出格鲁吉亚。回到故乡后(1838年)，格·奥尔别里安尼在达吉斯坦生活了大约二十年，参加过反对沙米尔的军事行动。1862年获得了将军—副官称号。在其后的岁月里奥尔别里安尼在高加索担任过几个高级行政职务，还一度担任过沙皇总督的职务。

在奥尔别里安尼半个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格鲁吉亚浪漫主义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开始到全盛再到衰落——都有着独特的反映，正是这一点决

① 鲁斯达维里·绍塔，格鲁吉亚十二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诗人。著有天才诗篇《虎皮武士》，是格鲁吉亚封建文化的极峰，世界文学的优秀作品。他的诗篇对于以后整个格鲁吉亚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译注

定了他诗歌的独特性——多神教感觉主义与东正教神秘主义并存，穆哈姆巴济体诗与圣诗共处，爱情赞美诗与爱国主义哀诗同在。

奥尔别里安尼的创作，其抒情世界，各种情节主题，其独特艺术风格都是在古格鲁吉亚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但是，早在创作道路开始之初(1827)，格·奥尔别里安尼就不断克服格鲁吉亚古典诗体的惰性，并很快成为浪漫主义流派的诗人。

虽然奥尔别里安尼的成熟创作也具有某种内在的矛盾性，但是与此同时，作为世俗享乐的歌颂者和神秘主义悲歌的作者，委婉含蓄的抒情家和梯弗里斯手艺人日常生活的鲜明刻画者，浮华生活的宣传者和诗人崇高公民使命的倡导者，格·奥尔别里安尼在创作演化过程中却能够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没有内在折中主义的风格。

在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诗人中，格·奥尔别里安尼在《告别》(1832)中第一次用语言作为表达个人内心世界的不完善手段表现了浪漫主义的不满情绪。也是在这首诗歌中，在这首已经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迫切希望恢复古典主义诗歌词汇的作品中，爱情作为诗人非常独特的和无与伦比的心灵状态，即能够表达诗人的天性及其复杂丰富的精神世界的特殊性和异常性，以一种全新的、浪漫主义者所理解的特有诠释表现出来。

在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的意识中发生的深刻转变，对强烈推动浪漫主义主题和情绪产生的心灵上的特殊尖锐转变，都与1832年的戏剧性事件密切相关。密谋参加者的政治追求清晰地表现在他的诗歌《自白》中，这首诗是以雷列耶夫的长诗《纳利瓦伊科》中的一章为基础创作的。在调查"密谋事件"时，对奥尔别里安尼提出的最严厉指控就是他对待雷列耶夫被禁作品的态度。

在奥尔别里安尼的《自白》中，对祖国的热爱之情直接与自由思想结合在一起并充满了革命精神，因此它是格鲁吉亚民族解放运动中最杰出的诗歌作品之一，同时它也是一首新体诗，因为在其革命激情方面开创了十九世纪格鲁吉亚公民抒情诗的独特的艺术特性。

1832年事件不仅使格·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感觉更加敏锐，而且在诗人的内心世界里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监狱禁闭度过的日子和流放异乡的遭遇，不仅永远粉碎了年轻诗人的幻想，也使他的诗歌处世态度具有特殊的色调。诗歌《致我的姐姐叶菲利米娅》(1835)是一首独特的诗歌自白。灵魂孤独的主题，对尘世美景和快乐的"不信任态度"，使这首诗成为十九世纪格鲁吉亚浪漫主义诗歌中最杰出的典范之一。但是，格·奥尔别里安尼虽然对客观现实不满，却从来也没完全与之疏远，尽管有时他把现实的情况看作是疲惫灵魂的临时住所，但是作为诗人，他又陶醉于世俗住所那

甜蜜醉人、“多姿多彩”的美景。

443· 与格鲁吉亚古典抒情诗的代表们相比，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对周围物质世界的描写更直接、更生动、更突出。尽管大自然在浪漫主义诗人的诗歌中通常是精致的、高尚的(格·奥尔别里安尼对大自然的浪漫主义感情丰富了格鲁吉亚的诗歌，功劳卓著)，但它仍然以多姿多彩、富丽华美的面貌呈现在眼前，同时保持着自己的沁人芳香和鲜艳色调。诗人敏锐的色彩感和素有的诗歌领悟力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一组献给古老的第比利斯的诗歌中。这座城市像一个独特的世界，它有着奇异的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单纯但真诚的高超艺术，令人惊奇的勃勃生机，对诗人来说就如同是一座“救生岛”。

古老的伊维利亚主题、往事主题和为祖国无私奉献的主题，不仅在格·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中，在格鲁吉亚的所有浪漫主义诗人的创作中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诗《举杯祝愿健康》，1827—1870 年，《致亚拉利》，1832 年，等等)。在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作品中，往事被理解为是“第二现实”，是真实现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位杰出的格鲁吉亚浪漫主义作家的文学遗产，除了诗歌创作外，还包括散文日志(《我从梯弗里斯到彼得堡的旅行》，1831 年、大量画稿、一部书信集，这部书信集对评价他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学进程具有巨大意义。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是第一个将克雷洛夫的寓言翻译成格鲁吉亚语的诗人，他还翻译并模仿过茹可夫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德[①]等人的作品。

格·奥尔别里阿尼的抒情诗对十九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诗歌的复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不仅善于克服格鲁吉亚古典抒情诗的“惰性”，使格鲁吉亚诗歌摆脱了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形式规则的霸权地位，而且善于探索新的道路，探索新的诗歌手段和形式。

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1817—1845)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公爵家庭。梯弗里斯中学毕业后，他在判决及执行科担任普通官员。在纳希切万度过了半年，在甘贾[②]当过几个月的县长助理后便去世了。据官方消息，二十八岁的诗人死于恶性疟疾。

巴拉塔什维里的精神悲剧是人的悲剧，他生来为了享受丰富多彩的积

---

①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1744—1803)，德国思想家、作家。在十八世纪最先企图用历史来解释文化现象，但他基本上是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认识历史的。他对青年歌德和反封建的狂飙突进运动都起了很大的影响。——译注

② 甘贾，即基洛瓦巴德。——译注

极生活和活动，但实际上却被认定是无所作为。巴拉塔什维里的诗歌是建立在尖锐的矛盾冲突、无尽的惶恐不安和深深的内心慌乱基础之上的。思想和物质、理想和现实在这里一直处于无法调和的悲剧性矛盾之中。艺术家的主观世界与丑陋的现实格格不入。客观现实是一座拥挤不堪的监狱，骑士密兰尼奋不顾身、竭尽全力冲出它的重围。如果说在鲁斯达维里的长诗中古典主义诗歌思维找到了自己的完美体现，那么巴拉塔什维里的抒情诗则是浪漫主义世界观的完美表达。

巴拉塔什维里是格鲁吉亚诗歌形式的真正革命者，他不仅彻底摆脱了传统诗学的束缚，而且善于创造和确立一种全新的、独具特色的完美形式。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巴拉塔什维里为整个十九世纪的格鲁吉亚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不仅格鲁吉亚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与他的诗歌遗产有密切联系，而且格鲁吉亚诗歌在以后的继续发展过程中也如此。

巴拉塔什维里的创作生涯虽然相对较短（1833—1845），但在这段时间里诗人却走完了艺术和思想发展的最重要里程。

诗歌《姆塔茨明德的黄昏》（1833—1836）应看作是巴拉塔什维里诗歌天才的最初鲜明表现。在《黄昏》中主要表现的是浪漫主义的崇高性，摆脱世俗的累赘，对世界永恒神秘力量的神往。尽管暗藏着不满，但这首诗的情绪却是平静的，充满着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理想的忧愁之情。这里还没有他稍后的创作，其中包括《密兰尼》所具有的那种与命运抗争的主题。

《库尔河畔的沉思》（1837）是巴拉塔什维里第一首鲜明地表现出哲学特点的诗歌。诗人对人——“大地的儿子”（即公民）的看法，以及对公民的义务的看法都清晰地表达在诗的最后一节中：“但我们是作为大地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在大地上诚实劳作直到去世。/而那些只在大地记忆中的人是可悲的，/因为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形同走肉。”（鲍·帕斯捷尔纳克译）但这是《沉思》的最终结论。诗人认为，人的孜孜不倦的精神渴望，势不可挡的强烈激情，无穷无尽的美好愿望，是其各种活动、“劳动和操劳”的主要动因。

·444

为新生活而觉醒的人们，其崇高志向与当时客观条件注定其与面对的那个现实状况势不两立，这就是诗人与现实发生冲突，对现实产生不满，以及构成巴拉塔什维里一系列诗歌作品（《神秘的感召》，1836年，《孤独的心灵》，1839年，等等）主旨的“无家可归”和“内心孤独”的病态感的根源。

爱情在诗人看来不单是转眼即逝的尘世快乐瞬间，而且是美好心灵的永久结合。巴拉塔什维里就像但丁在其《新生》中一样，永久地寻找着“失

去的爱人”。只有相近的，像诗人一样高尚纯洁的心灵，他才能够与之相沟通，并体验到真正的“上帝赐福的永久幸福”（《我记得，你泪眼蒙蒙，我的爱人……》，1840 年；《我写诗，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在沙土中发现了一座庙宇……》，1841 年；《男人的觉醒——不是失节……》，1842 年；《我将在激情中擦干眼泪》，1843 年，等等）。

巴拉塔什维里抒情诗的主要内容是人的精神世界和作为美这一思想最完美崇高体现的内心隐秘生活。

《恶魔》（1843）是一首“以失掉信心的个性的智慧”表达悲剧的诗歌。理智是一种清醒思维的能力，在这里表现为恶的因素，因为它窃取了灵魂世界，毒害了诗人的纯洁志向，对心灵也无以回报。

巴拉塔什维里的恶魔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形象，这个诗歌象征被列入了世界文学众多不朽形象之列，浪漫主义作家们赋予这些形象特殊的涵义。新时代的欧洲文学将这个被逐出天庭的形象（像被奥林匹山诸神驱逐的悲剧形象普罗米修斯一样）作为反叛和愤怒的象征。

这个形象在拜伦的《该隐》中获得了独特的浪漫主义诠释，对理解巴拉塔什维里的恶魔尤其重要。不同于歌德的靡菲斯特[①]，拜伦的柳齐费认为自己是人民的忠实同盟者，他号召人民联合起来反抗“压迫势力”，并认为“伟大、善良的智慧天赋”是这场非凡斗争中的主要武器。拜伦的柳齐费是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理想追求的诗歌化身，他们把人类智慧的万能宣布为自己的信仰象征。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位英国诗人的神秘剧中，恶魔在“美貌和威力方面胜过诸司智天使”，但更重要的是，“巨大的忧愁”伴随着他的永垂不朽。

巴拉塔什维里的恶魔也是个悲伤的灵魂，他的迷惑力不断破坏、毁灭着那曾经创造安宁和内心和谐幻想的一切。他无力谋得幸福，而他预示着自己的牺牲必能换取的自由也仍然是一句空话。那个具有历史性的人类智慧的明确形式——上个世纪的纯理性主义理想、清醒的批判主义、对严密逻辑思维的崇拜，从拜伦开始，浪漫主义作家就将其纳入这个象征形象中，在巴拉塔什维里眼里它开始变成虚幻、徒然的人性特征。确实，在创作这首诗的那些具体条件下，启蒙主义者的怀疑主义、“兴奋不安、失掉信心的智慧”在彻底毁灭一切浪漫主义理想之后，能够实现的也只有否定使命。为了使人类的灵魂摆脱现实的噩梦，为争取新的理想而斗争，为积极的活动而重振，需要另一种特性的天赋，另一种思维方式。

---

① 靡菲斯特，歌德作品《浮士德》中的魔鬼。——译注

尼科洛兹·巴拉塔什维里经常与“世界悲伤派”[1]的诗人们遥相呼应，他总是提及人类历史的那些永恒的“老大难”问题。宇宙的凄惨场面使诗人的心灵充满了无法忍受的悲痛，但他内心悲剧的起因却依然在于民族的现实状况。长诗《格鲁吉亚的命运》(1839)是打开巴拉塔什维里世界观，探索复杂内容的一把特殊钥匙。长诗以现实事件为情节基础，即1795年伊朗阿迦-穆罕默德可汗攻克梯弗里斯的事件，它实际上预先注定了东格鲁吉亚的未来命运。但是作为浪漫主义长诗，《格鲁吉亚的命运》远离了历史主义的原则。《格鲁吉亚的命运》中涉及的各种民族问题具有明显的现代特点。长诗是在1832年爱国主义密谋的直接影响下写成的，而且诗中所提出的格鲁吉亚的历史命运问题考虑到了1801年和1832年两事件之间的逻辑因果。沙皇伊拉克利与其谋士所罗门·利奥尼泽之间关于格鲁吉亚未来命运的争论，就其内容而言，属于新的十九世纪的事件，但实际上这里所谈的是1832年密谋失败后如何选择切实可行、合理适宜的民族生活和活动道路的问题。

但是《格鲁吉亚的命运》的主题思想并不限于这个具体的观点，这里还对民族历史问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概括总结，并上升到哲学和全人类的观点；具体的历史必择其一问题上升为哲学上的两刀论法。长诗中所描述的各种具体情况在其深度方面包含着次要的象征意义。 ·445

希拉克利的形象，其观点和行动，其在长诗中的整个线索——是一种对清醒的有理性的客观必然性的象征性反映。沙皇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格鲁吉亚的未来——在于俄罗斯。”所罗门·利奥尼泽在自己的议论中主要呼吁人的天性，其中包括民族感情。人类天生的对自由的追求使其不可能与异族和平共处，因为对方的生活方式对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在巴拉塔什维里的长诗中有两个基本主题、两个主旨，两种敌对因素——命运和幸福、必然和自由的斗争就是通过这两个主题和主旨的对立和交叉表达出来的。

巴拉塔什维里写《格鲁吉亚的命运》时还是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那些对民族解放斗争的前途感到渺茫的格鲁吉亚贵族阶层，激进地改变政治方针，并认定自己的社会和阶级使命是效忠皇帝。这时巴拉塔什维里有感于过去，并以极其生动的笔调塑造出许多热爱自由、令人敬仰的先辈们的理想形象。自然，年轻诗人的主观同情是站在浪漫主

① 十八与十九世纪间欧洲一种悲观绝望的文艺流派。——译注

义自由理想的代表者一面的。但是在《格鲁吉亚的命运》中令人惊奇的并不是对这种理想的追求，也不是诗人表现出来的横溢才华，而是那种哲学深度以及诗人在解决时代最复杂问题时所展露出的那种不同寻常的成熟思维和感觉。巴拉塔什维里是一位具有深厚现实主义感情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指出，希拉克利的决定最终会取得客观胜利。

但是作家的评论还缺乏明确性（正是因此，才说在长诗的主题思想结论方面存在不同的争议）。两种敌对因素的斗争，两种对立自然力量的斗争，两种不可调和的生活观点的斗争，在这里被理解为是人类历史的永恒矛盾。巴拉塔什维里还没指出现实的出路，对十八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摆在格鲁吉亚面前的现实问题也没作出最终的回答。在《格鲁吉亚的命运》中提到的问题也是诗人全部创作中的主要哲学必择其一问题，它的答案只有在巴拉塔什维里的哲学抒情诗杰作《密兰尼》中才可以找到，在这首诗中祖国的未来问题是和一系列包罗万象的问题摆在一起的，正是因此，这个问题具有全人类的价值和意义。

《密兰尼》的主要思想——即创造精神和自由意志与盲目的必然性力量，诸如人类历史的合理性和真正意义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它对诗人在《格鲁吉亚的命运》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作了概括性的回答。在《密兰尼》中斗争和行动表现为对至高精神主动性的渴望，诗人的真正信仰在此表露无遗。《密兰尼》——这是对真理活动的向往，对命运无所畏惧的呼唤，对与贫困和现实世界秩序不合理性毫不妥协的非凡个性的叛逆行为的张扬。这是一种不灭的激情，一种对即将获得自由的人类精神信心百倍、欢欣鼓舞的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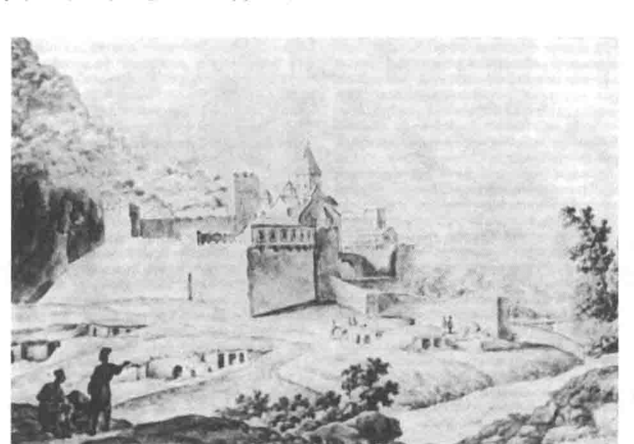
在《密兰尼》中乐观主义并不寄希望于理想的实现上，它的动力是一种号召人们为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忘我的英雄主义斗争的意识。

骑士密兰尼虽注定要失败，其理想也不可企及，但是："即使我将死去，但激情不灭，/你已踏出自己的足迹，我的飞马，/我的同志将轻装上阵，/随时跟着我继续前进"。《密兰尼》中的这种悲壮的乐观主义是"浪漫主义精神"——积极的、乐观的、充满革命志向的精神——的最鲜明的体现。

对"后继者"的胜利和成功充满信心，对革新、对人类光明未来的永恒追求充满信心——这是人道主义的宣言，是对人仁爱的宣言，《密兰尼》的作者就是这种宣言的预言者和宣传者。

不同于《恶魔》，在《密兰尼》中理性和智力活动具有另一种特点，它已经不是一种"失掉信心的理智"，而是一种万能的理智，它鼓舞人建立英雄功绩，唤起自我牺牲意识，树立必胜的希望，排除消极的怀疑主义。诗人全身心投入到与"注定要失败的心灵"的厄运进行较量上。《密兰尼》作者的天才正是表现在他善于从所处时代的深处洞察到人类未来的胜利和成功。

他善于把信念和理智联系在一起，并在其同盲目的必然性作自我牺牲斗争中看到人类存在的巨大意义和合理性。 ·446



格鲁吉亚的城堡——修道院
M. M. 伊万诺夫的水彩画 1804年
莫斯科国家特列季亚科夫绘画陈列馆

在世界文学中，从任何一部巨著中都能找到许多与此精神实质相近甚至形式都相近的东西。《密兰尼》在格鲁吉亚文学研究中经常被提到，它与亚·密茨凯维奇的《法里斯》颇为相似，后者是对东方叙事诗主题的反映；与普希金的《太阳熄灭了……》彼此呼应，而后者像是有意从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摘译的一个片段；与莱蒙托夫的《帆》也极其相似；它也令人想起拜伦的长诗《马泽帕》中的一个著名片段，诗中一匹发狂的野马和绑在其背上的马泽帕一起像飓风一样在无边无际的旷野上狂奔，它冲破重重障碍，终于累得倒下了。所有这些巧合都是世纪精神趋势的交会。

《密兰尼》无论从哲学—美学发展的角度审视，还是从格鲁吉亚浪漫主义艺术进化角度看都是一部顶尖巨著，它是格鲁吉亚人民卓越诗歌天才的表现，它也因此具有了不可超越的艺术影响力。

就像拜伦和雨果创作的预言性形象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鼓舞了那些奋起保卫街垒的第四阶层的革命先驱者们一样，就像莱蒙托夫的《帆》成为同专制进行不妥协斗争的象征一样，《密兰尼》不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英雄主义激情方面，都鼓舞了格鲁吉亚革命者的光荣一代，他们是格鲁吉亚的优秀儿子，为了崇高的人道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

《密兰尼》像一团人类精神永不熄灭的光芒，照耀至今，它以自己的直接影响力证实了它的巨大激情万古流芳，它的崇高浪漫主义理想永垂不朽。

亚历山大·恰夫恰瓦泽、格里戈尔·奥尔别里安尼、尼科洛兹·巴拉塔 ·447

什维里的诗歌创作是格鲁吉亚浪漫主义文学的巨大财富。继他们之后，追随浪漫主义潮流的还有所罗门·拉兹马泽(1797—1860)、亚历山大·奥尔别里安尼(1802—1869)、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1812—1890)、格奥尔吉·艾里斯塔维(他的早期创作，1813—1864 年)、达维德·马恰别里(1814—1876)、米哈伊尔·图马尼什维里(1818—1876)、格里戈尔·勒切乌利什维里(1820—1877)，等等，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他是晚期浪漫主义流派最鲜明和最典型的代表诗人。

瓦·奥尔别里安尼是格鲁吉亚倒数第二个国王希拉克利二世的孙子，他在格鲁吉亚饱含社会—政治和文化—文学的时代氛围中得到熏陶和教育。还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时他就积极参与了反对保皇党的 1832 年密谋，并因此被判处死刑(“分尸”)，后又改判流放到卡卢加。刑满释放回到家后，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参了军，由于具有军事长官才能而官运亨通。1855 年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被任命为格鲁吉亚陆军上尉，1860 年获得了少将军衔。1858—1863 年他在北高加索担任了一系列行政职务，先是库班州的行政长官，后又是捷列克州的行政长官。1881 年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退役。

诗人对于格鲁吉亚的国家独立仅仅属于历史问题的观点很难苟同。瓦·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充满了对丧失国家主权的无限悲哀和忧愁(《古老的德马尼西》，1866 年；《有地方》，1879 年；《两座楼房》，1881 年；《古代神庙中的长明灯》，1885 年，等等)。

在瓦赫坦格·奥尔别里安尼的诗歌中客观现实胜过各种历史往事，只是古代的遗址、昔日荣誉的纪念碑勾起诗人的想象。那个按照与过去的理想时代相似的方式构造出来的世界，那个充满回忆和神话的世界，比起现实世界来更令他百倍亲近和珍贵。

由于不愿意接受现实世界，诗人采取了极端行动。尽管有时在他的意识中会闪现出希望的火花(这方面受到广泛关注的是当时十分流行的诗作《希望》，作于 1859 年，伊利亚·恰夫恰瓦泽认为它是格鲁吉亚诗歌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但是从根本上讲，瓦·奥尔别里安尼还是具有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态度。

十九世纪下半叶，格鲁吉亚六十年代进步社会活动家领导了新的社会和文学进步运动，在此背景下奥尔别里安尼诗歌的消极情绪显得尤为明显，而且雄辩地证明，格鲁吉亚的浪漫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已丧失了生命力。

最后应该指出，格鲁吉亚人民的进步政治方针是以俄罗斯为基准的，格鲁吉亚人民同俄罗斯人民相互接近，并开始了解俄罗斯—欧洲文化和文学，

这一切促使格鲁吉亚文学摆脱了东方文化的影响，并加速了其欧化进程。

新的格鲁吉亚文学继承和发扬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也保持了自身独具一格和无与伦比的特色，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最终与全欧的文学区域衔接起来，在时代的艺术思想发展史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特别是十九世纪二十和三十年代）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流派同时存在于格鲁吉亚文学当中，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感伤主义，但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并没有充分萌发，它们逐渐（尽管相当缓慢和极不情愿）让位于浪漫主义，所以浪漫主义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格鲁吉亚最重要的文学流派。

格鲁吉亚浪漫主义的形成和确立，与格鲁吉亚人民的新的生活条件，与时代的新的精神需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在格鲁吉亚的艺术文化发展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并以其具有世界范围和意义的作品丰富了格鲁吉亚文学。

第二章　阿塞拜疆文学

· 448

十九世纪上半叶，阿塞拜疆文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由于北阿塞拜疆并入俄罗斯，其生活发生了实质性的历史转变，从而促进了这一阶段的发展。封建割据状态也因此被消灭，几个世纪的汗国内讧和外来侵略得以终结，同时也为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根植于几个世纪深处的阿塞拜疆文化和文学开始受到先进的俄罗斯及西欧文化和文学的良好影响。

三十至四十年代在阿塞拜疆的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世俗教育和培养中心，开设了县级专科学校和新型图书馆，出版发行了各类教科书和文学、语言读本。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的共同活动使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知识界彼此接近，关系密切，使精神和科学上的需求范围不断扩大，同时也使外高加索与俄罗斯各民族间的文化和艺术交流逐渐加强。阿塞拜疆人强烈要求了解自己祖国的历史，而这一要求最先是受到俄罗斯和欧洲的高加索问题学者的著作影响而激发起来的。许多作家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活生生的证据和物质文化古迹为基础，创作出一系列有关阿塞拜疆及其某些可汗国历史的作品，他们是阿·库·巴基哈诺夫（1794—1846）、米尔扎·阿季格扎尔贝克（卒于1848年）、米尔扎·加马尔（1773—1853）、克里马加（卒于1858年）以及其他同时代知识渊博的作家。

彼得堡大学和喀山大学在阿塞拜疆知识界的培养和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米尔扎·加法尔·托普奇巴舍夫（1784—1869）在俄罗斯东方学

中心成长起来并博得大学者的荣誉。

托普奇巴舍夫在首都的许多高校里教授波斯语和土耳其语长达五十多年,他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并翻译了许多作品。在颂诗《凯旋曲》中他歌颂了俄罗斯人民在1812年卫国战争期间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和英雄主义气概;他将密茨凯维奇的《克里米亚短诗》从俄文译成波斯文并作了序,于1827年在莫斯科出版。这篇序言以其独特的东方气息引起了普希金的注意。托普奇巴舍夫积极为《望远镜》杂志撰稿,他的文章涉及了东方文学和历史的各种问题,以及东方学在俄罗斯的发展方向问题。

1835年托普奇巴舍夫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一部书,里面收录了他用阿塞拜疆语和波斯语写的诗歌,并附有俄语译文。别林斯基热情洋溢地评价了这些诗。托普奇巴舍夫也是东方考古学和古币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他与许多文化和科学活动家建立了友好的联系。格里鲍耶陀夫就是他在彼得堡大学教过的众多学生之一。

阿塞拜疆科学家、"俄罗斯东方学元老"(伊·尼·别列津语)、著名学者亚·卡·卡泽姆-贝克(1802—1870)[①]在科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卡泽姆-贝克的创作活动是在喀山大学(1826—1849)和彼得堡大学(1849—1870)的校园里进行的。他是俄罗斯东方学喀山学派的创始人、彼得堡大学东方学系的创建者和首任系主任。卡泽姆-贝克同俄罗斯科学院合作密切,从1835年起就成为其通讯院士。他的科学兴趣范围极其广泛,包括语言学、文艺学、历史、宗教、文化、法学、民族志学、词源学和地理学。卡泽姆-贝克在俄罗斯大学历史上第一次开设了伊朗语文学课程。他留下了许多关于阿拉伯、土耳其和阿塞拜疆文学的珍贵著作,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突厥语科学语法。他把菲尔多西[②]的《王书》缩译成了俄文,并翻译了萨迪[③]的长诗《古利斯坦》及某些诗篇。他的科学著作,例如,《论东方文学在欧洲的出现和辉煌以及在亚洲的衰退》、《伊朗叙事诗》、《波斯文学》、《古波斯人的叙事诗故事——新波斯文学的开始》、《菲尔多西的波斯人神话》等,成为国内伊朗学研究的基础。卡泽姆-贝克对俄罗斯人民的历史、文化和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他赞扬和肯定了先进的俄罗斯对于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传播者的作用,他相信,"……强大的俄罗斯很快就会与相邻的文明强国相匹敌"。卡泽姆-贝克在俄罗斯宣传东方文化的同时,号召当时俄罗斯的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包括自己的同胞阿塞拜疆人在内,吸收俄罗斯的先进文化。

449·

---

①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卡泽姆-贝克,又名亚历山大·卡西莫维奇。——译注

② 菲尔多西(940—1020),波斯著名诗人。——译注

③ 萨迪(1208—1292),波斯诗人。——译注

他非常了解普希金、茹可夫斯基、罗巴切夫斯基[1]、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其他许多俄罗斯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杰出代表。

三十年代初著名的地理学家扎恩-阿尔-阿比金·希尔瓦尔(1780—1838)完成了自己沿近东、中东、印度、阿拉伯半岛和北非旅行的游记。他的作品《流浪花坛》和《流浪花园》叙述真实准确，观察细致入微，明显区别于中世纪那些地理学家们半神话般的描写。

阿·库·巴基哈诺夫的作品《发现奇怪的东西》、《天堂的秘密》和《公共地理》是阿塞拜疆新型历史—地理和宇宙志文学的巨大成就。其中第一部作品讲述的是美洲发现史，第二部阐述太阳中心说的概念，解释太阳系各天体的构成及其物理特性，第三部描述世界的物理、政治、经济地图。

巴基哈诺夫的《古利斯坦-伊列姆》(1841 年，俄语译本为《高加索东部地区史》)也有别于中世纪东方历史学家们的作品，它构思广泛，材料翔实，对伊斯兰教各族人民一视同仁，毫无成见。

由于依赖于中世纪穆斯林东方哲学概念的体系，十九世纪上半叶哲学思想更新得比较缓慢。但是国家发展出现的新的社会和精神需求却向阿塞拜疆的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即有关建立世俗培养教育体系，克服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束缚问题，以及宣传启蒙运动思想的问题。巴基哈诺夫的哲学—伦理学作品《改善性格》、《训导书》、《天秤的本质》回答了目前大众所关注的问题，在这些作品中道德意识和逻辑判断能力被看作是培养和教育的结果。

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俄罗斯的优秀作家与阿塞拜疆人之间也建立了牢固持久的创作联系。格里鲍耶陀夫、丘赫尔别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普希金、莱蒙托夫、波隆斯基等作家当年曾多次去过外高加索，对阿塞拜疆的现实、阿塞拜疆人民的民间创作和古典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促使阿塞拜疆文学走上了俄罗斯—欧洲文学的轨道。

高加索的第一份俄罗斯官方报纸是《梯弗里斯公报》，其副刊从 1829 年开始每周一次用波斯语出版，而从 1832 年起用阿塞拜疆语出版。从 1845 年 1 月起另一份俄罗斯官方报纸《外高加索导报》也开始用阿塞拜疆语出版。

社会的进步变革也促进了文学的民主化进程，出现了讽刺诗、叙事诗、故事和书信体，在这些作品中批判了封建父权习俗，抨击了落后和愚昧，普及了启蒙思想和社会进步思想。

---

[1]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罗巴切夫斯基(1792—1856)，俄国数学家，非欧几里德几何学(罗巴切夫斯基几何学)创始人。——译注

接近现实生活、深化社会内容的过程也体现在那些利用民间歌唱诗人的诗歌传统进行诗歌创作的诗人的作品中。卡苏姆-贝克·扎基尔、巴巴-贝克·沙基尔、穆罕默德-贝克·阿舒格、安达利布·卡拉贾达吉、卡齐姆·阿迦·萨利克、穆斯塔法·阿迦·阿里夫、阿卜杜拉赫曼·阿迦·沙伊尔等广泛利用民间口头诗歌的体裁和形式进行创作，例如，歌诗玛[①]、巴雅企[②]、格赖雷、穆沙伊拉等诗歌体裁和形式。深入了解古典诗歌，特别是富祖里[③]和瓦吉夫的抒情诗以及丰富的民间创作，帮助这些诗人找到了准确而简单的方法来表达由生活中的新趋势而引起的感情和思想。他们的抒情诗的诱人之处就是其乐观主义、关注劳动者、热爱大自然和爱国主义，而他们的诗歌特点则是具有生动活泼的口头语言和对人们日常生活习惯及体验的浓厚兴趣。

十九世纪上半叶，民间口头诗歌代表——民间歌唱诗人(即阿舒格)的创作得到了广泛发展。在多才多艺的民间歌唱诗人中出类拔萃的有阿舒格·阿雷(1817—1907)、阿舒格·穆萨(1755—1840)、阿舒格·阿列斯克尔(1821—1926)。他们的创作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反动的宗教神秘主义观点，认识和珍惜现实生活和大自然的美景。民间歌唱诗人创作了大量的讽刺作品，在其中批判了与其同时代的种种现实社会弊端，同时还创作了许多道德方面的作品。他们一方面创作新的深受人民喜爱的高加索四行诗，另一方面也对旧题材进行加工、完善和更新，使其具有时代特征。不论是民间歌唱诗人的诗歌，还是利用同一方法进行创作的其他诗人的诗歌，其基本特征都是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民族性，以及对人的深深尊敬。

450·

在文艺向现实主义方向(欧洲的)革新时，近东各民族的古典文学也继续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阿塞拜疆文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在新的条件下弘扬古典文学传统，其中最有名的人物就是阿巴斯-库利-阿迦·巴基哈诺夫。

巴基哈诺夫(文学笔名为古德西)出生于一个巴库可汗家庭。在巴库和库巴他学习过神学、波斯和阿拉伯语言及文学，后来，在梯弗里斯从事东方语言的翻译工作，并潜心研究俄语。与俄罗斯及欧洲诗人、作家和学者的密切交往促进了他的成长，也丰富了他的创作思维。1833 年秋他开始准备

① 歌诗玛，阿塞拜疆一种古老的音节诗体，有固定的音节数目(每行十一个音节)。民间诗人及歌手经常采用。远在十六至十七世纪已应用于阿塞拜疆的书面文学，至十八世纪便确定为阿塞拜疆格律诗的主要形式。阿塞拜疆现代诗歌中仍然沿用。——译注

② 巴雅企，阿塞拜疆民歌的一种形式。它是由四行七音节的诗构成，第一行、第二行、第四行要押韵。它的韵律响亮宏壮，用弦乐器演唱。——译注

③ 富祖里(1495—1556)，突厥诗人。著有著名长诗《莱伊丽和马季农》，劝诫诗《心之友》，小说《怨诉之书》。——译注

去华沙和彼得堡的旅行。巴基哈诺夫有充分理由认为这次旅行给自己提供了一次深入“了解欧洲文明的机会”。他在一部历史图解作品《古利斯坦-伊列姆》中写道：“我看到了许多令我心旷神怡的东西，我力求从中得到收益。”从1835年开始巴基哈诺夫就在故乡库宾斯科耶省定居下来，在那里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

巴基哈诺夫的个性和创作引起了许多曾在高加索旅行过的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诗人和作家们的极大兴趣，包括俄罗斯作家普希金、格里鲍耶陀夫、丘赫尔别凯、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画家 В. И. 莫什科夫和格·格·加加林[①]，德国诗人弗·博登施泰特[②]，波兰诗人塔杰乌什·拉达-扎布洛茨基、伊·尼·别列津[③]、K. 科赫，等等。

巴基哈诺夫留下了丰厚的文学、科学和哲学遗产。用阿塞拜疆语创作的长诗《神圣的花坛》是他第一部年鉴式的诗歌作品，这部长诗是在宗教—神秘主义诗歌的影响下创作的。他的早期创作还有唯一的一部短篇小说《关于阿斯克尔的故事》，书中描写了一对被狂热的感情所困扰的男女青年的爱情。

巴基哈诺夫的文学活动从二十年代起在梯弗里斯变得特别活跃。他对梯弗里斯的最初印象表现在诗歌《梯弗里斯》和《在格鲁吉亚人中间》里，这两首诗是对格鲁吉亚城市日常生活的现实速写。由于熟悉俄罗斯文学，巴基哈诺夫灵活自如地翻译了克雷洛夫的寓言《驴和夜莺》。在社会讽刺作品《致塔弗利兹的居民》（1826）中表现出巴基哈诺夫对落后的伊斯兰教环境的批判态度。

在巴基哈诺夫的诗歌遗产中劝诫长诗《烛龛》（1829）占有重要地位。这首诗由几个情节互不相关的部分组成，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之间借助于一则说明性的故事连接起来，而这则故事是由一种思想例证充当的。这些故事的情节主要来源于民间口头创作和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在长诗中援引了大量的训诫和教言、《古兰经》引文和先知者的言行录，以及许多不可靠的传说。长诗中事件的发展好像没有明确的时间和空间。巴基哈诺夫生动而准确地描写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细节和场景，从而使这些故事变得非常引人入胜。长诗《烛龛》的作者深受苏菲派[④]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在长诗的

---

① 格里戈里·格里戈里耶维奇·加加林（1810—1893），俄国写生、素描画家。——译注

② 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1819—1892），德国作家、翻译家，致力介绍俄国文学、东方诗歌。1852年出版了他自己翻译的莱蒙托夫诗选（二卷集）。——译注

③ 伊利亚·尼古拉耶维奇·别列津（1818—1896），俄国东方学家。——译注

④ 苏菲派，伊斯兰教中神秘主义流派。——译注

序言中他宣称，要写出神灵的“神秘”，写出“神的烛龛”，即人类的心灵。后来，按照苏菲派诗人的惯例，他“阐明”自己的内心状况由于离亲别友而变得不堪重负，进而歌颂柏拉图式的恋爱。为了符合苏菲派学说的精神，诗人颂扬那些诸如节制、忍耐、不慕虚荣、不贪图富贵、不争权夺利和不追求尘世享乐的美德。他发展了这样的思想，即沉湎于尘世功名利禄的人就如同疯子，不能认清自己缺少智慧。只有爱情（神秘主义的理解）才能把人从尘世的纷扰、痛苦和悲伤中解救出来，只有爱情才能消除人的贪婪欲望，才能使人处于现实与非现实、生与死之间的平衡状态。

在巴基哈诺夫的诗歌遗产中，嘎扎勒体诗[①]占相当大部分，它们是在东方文学古典作家的影响下创作的，其中包括富祖里——嘎扎勒体诗的大师。451· 这些诗的主要情节主题是对恋人忠贞不渝，渴望与她幽会，赞美她的美貌。



阿·巴基哈诺夫
照片来自一位佚名画家的肖像画
巴库 底版收藏在国立阿塞拜疆内扎米博物馆里

① 嘎扎勒体诗，东方许多民族采用的一种抒情诗歌形式。通常由五至十二拜特偶句组成，隔行押韵，一韵到底，最后一个拜特偶句点明主题并出现诗人的名字。——译注

巴基哈诺夫还留下了许多用阿塞拜疆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创作的克塔体诗、鲁拜体诗[①]、穆拉别体诗和五行押韵诗，在这些作品中反映了他思想和感情的复杂性和多面性。从中我们还能发现作者的伦理—哲学思索；对所处时代，对多舛命运的慨叹；号召人们像海亚姆[②]那样享受生活；歌颂大自然一年四季和谐更替，好像与人的内心世界的杂乱无章相对立。长诗《理想的升华》、《欧洲社会》是巴基哈诺夫在华沙时创作的，他还创作了许多有教导特点的诗体小说，它们与诗人萨迪的劝谕性抒情诗有异曲同工之效。在这些作品中作者谴责了专制制度，呼吁帝王公正严明、深明大义、善待臣民。这些小说中的统治者通常都是一些不学无术和任意妄为之徒，而人民总是聪明勇敢，并且经常用自己的机智伶俐使当权者政权陷入绝境。巴基哈诺夫的小说和寓言都是以道德—哲学格言结束。

巴基哈诺夫的创作不是千篇一律的。用中世纪东方文学传统创作的作品具有累赘的程式化形象、不可靠的传说和苏菲派的诗歌象征，而在描写当代生活和事件的作品中则贯穿着启蒙主义的思想。

巴基哈诺夫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作家，同时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作家，这就确定了他在阿塞拜疆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

巴基哈诺夫对文学—社会思想也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他第一个尝试描写阿塞拜疆从十二世纪至十九世纪的文学史和科学史。在关于东外高加索各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史的研究著作中，巴基哈诺夫提供了有关古代和中世纪的希尔凡国和达吉斯坦的诗人、学者和神学家们的生平与活动的宝贵资料。

许多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诗人在“新时代”成功地继承了阿塞拜疆和东方诗歌的古典传统，特别是海亚姆、哈菲兹、富祖里的诗歌传统，米尔扎·沙菲·瓦泽赫(1792—1852)就是其中之一。

米尔扎·沙菲·萨德赫·奥格雷(瓦泽赫为文学笔名)出生于甘贾(现基洛瓦巴德)的一位石匠家庭里，在甘贾中等宗教学校接受教育，学习了波斯和阿拉伯语言及文学。青年时期他就成为一名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他的反教会和反封建诗篇带给他自由思想家的荣誉。

在梯弗里斯他先在县专科学校担任阿塞拜疆语和波斯语教师，后来又

---

① 鲁拜体诗，东方各国诗歌中的一种四行诗，按aaбa，aaaa押韵，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译注

② 海亚姆(约1040—1123年)，塔吉克伟大的诗人和科学家，也是波斯文学的经典作家。用波斯文写作。他以数学和天文学的著作获得了世界声誉，并著有哲学四行诗。海亚姆的诗篇充满着哲学探索的气息，充满着对光明、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宗教尖锐的批判态度是他的诗歌特征。他的诗篇接近唯物主义世界观。——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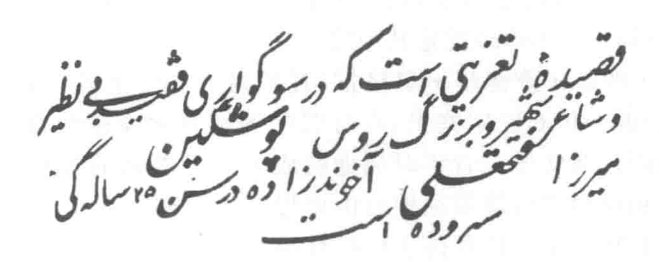
到中学任教。1844 年他创立了文学会(即文学小组)“季瓦尼-希克梅特”[1],其中的积极分子有巴基哈诺夫、阿博维扬和阿洪多夫,还有当时在梯弗里斯教法语的德国诗人兼翻译家弗里德里希·博登施泰特。后者将诗人沙菲的诗集译成德文在德国发表,题为《米尔扎·沙菲诗歌》(1851)。很快这些诗就被从德语译成了俄语、英语、法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和其他许多语言,并获得巨大成功。

瓦泽赫把为人民服务的真正诗人与那些喜欢重唱老生常谈的空乏题目,喜欢写“散发着清真寺”味儿的诗歌的诗人们相对比。瓦泽赫的诗歌主题多种多样,但他创作的主旨是揭露传教士的虚假和伪善,揭露社会的种种罪恶,揭露当权者及其走狗的任意妄为、懦弱胆怯和专横霸道。他不仅挖苦嘲笑他们,还为人民天真地相信他们是“上帝的使者”而深感悲哀。他认为诗人的天职就是揭露社会的症结和邪恶。在批判统治者的专横暴虐方面,他一马当先,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讽刺—教诲性诗体小说《沙赫王颁布了一次诏书》、《沙赫王阿巴斯》、《铁木儿》和《苦行僧》。为了表达对封建—教权主义反动派的反对态度,瓦泽赫采用了文学上的故弄玄虚和譬喻手法。

452 ·

诗人坚信,上苍创造人类是为了其获得幸福。痛苦应让位于快乐,仇恨应让位于友爱:“透过真相我了解了诗歌,/通过诗歌我发现了真理……”

瓦泽赫认为,如果人民能认清罪恶之源,就会明白自己的不幸所在,就能获得幸福的生活。只有教育才能把人民从宗教的奴役下拯救出来。诗人坚信,人类居住的世界才是唯一真实的世界。阴间世界、地狱、天堂都是宗教的谎言。



米·法·阿洪多夫的哀诗喀西达《悼念普希金逝世》

瓦泽赫的抒情诗继承和发扬了阿塞拜疆和东方古典诗歌传统中的阿那

① 阿拉伯语的音译。——译注

克来翁诗体①的特征。诗人对美好生活的赞美是与劳动和斗争联系在一起的："美好的东西不是白白给予我们的。/任何美好的事物中都充满着斗争和劳动。"人们应当过着丰富多彩、当之无愧的生活——这就是他的诗歌《苏萨尼》、《等待来信》、《摘掉恰得拉②》、《佐列哈》等的基本思想。

启蒙主义思想和主题的进一步发展是与第一部阿塞拜疆新体小说的作者伊斯梅尔-贝克·库特卡申斯基(1806—1869)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他生于库特卡申州的一个行政长官家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并在俄罗斯军队中供职长达三十五年之久，最后以少将军衔退休。由于军务需要他曾一度住在华沙，1835年在那里出版了法语小说《拉希德-贝克与萨杰特-哈奴姆》。小说描绘了十九世纪初阿塞拜疆社会的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日常生活画面、各种生活习惯、传统风俗和家庭关系。作品批判了守旧落后的宗法制度，对阿塞拜疆妇女的无权地位表示抗议。小说的主人公是年轻的贵族拉希德-贝克，他乐善好施，关心农民。

在周游近东诸国时，库特卡申斯基写了《旅行札记》，里面包括许多关于这些国家的地理和古文献的珍贵资料，对研究阿塞拜疆散文语言有很高的价值。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阿塞拜疆文学中确立了社会讽刺体裁，在其发展过程中诗人卡·扎基尔(1794—1857)、巴·沙基尔(1769—1844)和Б. М.纳季姆(1785—1880)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讽刺对象相当广泛。在批判沙皇官僚和地方行政长官、别伊③和地主以及僧侣的同时，他们还嘲笑不学无术的巫医和贪得无厌的村长。这些诗人揭露了大量值得揭露的事实，创作出一副时代画面，为以后民族文学中现实主义讽刺作品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在现实主义民族文学的讽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中，卡苏姆-贝克·扎基尔起着重要作用。他出身于名门贵族家庭，受教育于教会学校，在俄罗斯军队里服役多年。扎基尔的抒情作品接近于民间歌唱诗人的诗歌，他的讽刺书信、哈季夫体诗、寓言和神话故事以其对当权者的大胆和尖锐批判而与众不同，使诗人获得了人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爱戴和尊敬，同时也招致了当地别伊老爷和沙皇官僚们的仇恨。

诗人的讽刺作品客观上具有民主精神和对一切社会不公平现象毫不妥协的态度。扎基尔的笑是痛苦的笑，是含泪的笑。人民的悲伤和痛苦就是

---

① 阿那克来翁(纪元前约570—478年)，古希腊的抒情诗人。他的宴飨歌曲(歌咏酒、爱情等)有一部分一直流传到现在。西方把歌颂感情享受的诗称为阿那克来翁诗体。——译注

② 恰得拉或披纱，某些地方伊斯兰教妇女外出时用以由头至足围裹全身，只露两眼。——译注

③ 别伊，近东中各国小封建主和某些官员的尊号；加在人名之后，意为"老爷"、"先生"。——译注

他的悲伤和痛苦。当他遭受迫害的时候，当个人经验和个人感受提供给他丰富的素材用来概括总结时，这些悲伤和痛苦显得尤为强烈。他的讽刺作品的价值在于，具体明确地指向某些历史人物，与此同时又具有深刻的概括性特点（《驳斥侯赛因先生》、《集宛贝基》）。

453・

神职人员是扎基尔讽刺诗的固定讽刺对象（《舒申斯克的教士》、《乡里的状况》、《瞧》）。诗人注意到生活中一切值得嘲笑和社会谴责的东西，创作出整整一系列讽刺典型形象。在他的作品中既有愤怒、嘲笑，也有对被侮辱者和被欺凌者的深深同情，还有对贫苦人民的炽烈热爱。在这方面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作品有扎基尔致阿洪多夫的诗歌信函、《嘲讽巫医的短诗》、抨击性文章《关于舒申斯克的法官》、继承阿塞拜疆揭发性传统的诗歌故事和寓言，在这样的诗歌故事中，例如，《老夫少妻》、《最后一位妻子》等，扎基尔指出封建礼教的非人性，主张保护妇女，抗议买卖婚姻。

与此同时还应当指出，扎基尔也相信自己所属阶级的"崇高"传统能够恢复，所以他经常缅怀过去，力图从中找到"真理和公正"（《巴尔达古城遗址》、《时代的谴责》等），他创作立场的矛盾性正表现于此。

扎基尔是一位杰出的语言艺术家，他在完善文学语言方面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他的现实主义创作证明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的思想和社会世界观的日臻完善。阿洪多夫和其他民主主义代表不只一次研究过扎基尔的文学遗产。他的主要创作传统也被十九世纪下半叶二十世纪初的现实主义诗人诸如赛义德・阿济姆・希尔瓦尼、M. A. 萨比尔所继承。

第三章　亚美尼亚文学

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俄罗斯在外高加索的政治影响不断加强，亚美尼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俄罗斯的历史使命中看到了自己祖国解放的希望曙光，民族爱国主义意识和文化复兴时期开始了。在埃奇米阿津（苏）（1771）、马德拉斯（印）（1772）、的里雅斯特（意）（1775）、彼得堡（1780）、新纳希切万（苏）（1789）、加尔各答（印）（1796）、阿斯特拉罕（苏）（1796）建立了印刷厂，印刷了大量的历史、哲学和宗教—伦理书籍，出版了古亚美尼亚文字的遗留物。有关亚美尼亚的语言、历史及民族志的研究著作不断问世，在这方面米卡埃尔・恰姆强的著作三卷集《亚美尼亚史》（1784—1786）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它叙述了从远古时期到十八世纪的亚美尼亚历史。

定期出版物的创立促进了文学和文化运动的活跃。1794 年第一本亚美尼亚定期出版物——杂志《公报》在马德拉斯面世，随后在威尼斯、加尔各

答及俄罗斯的一些城市纷纷出版了各类报纸和杂志。在这些定期刊物上阐述了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提到了许多民族教育问题，刊登了大量的原著及文艺作品译著。

当时社会启蒙运动的最大功绩就是在印度的亚美尼亚殖民地创立了政治—政论体裁。在沙米尔·沙米良的作品《虚荣心的圈套》(1773)和莫夫谢斯·巴格拉米扬的作品《一本叫做训诫的新书》(1772)中批判了封建制度，提出了言论自由、良心、个性、建立宪法和共和国的必要性等思想。

社会思想领域中的新潮流也在文学艺术领域中得到一定反映。十八世纪末古典主义就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它标志着亚美尼亚文学艺术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作为一个文学派别，亚美尼亚古典文学是欧洲古典主义的回声，但就其内容而言，它又具有深厚的民族特点。如果说欧洲古典主义是以古希腊和罗马文明的历史神话来源为依据，那么，亚美尼亚古典主义就是以亚美尼亚古代文献为范本的。古典主义理论家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艺术思想体系，并提出认识美学范畴的理由。在斯捷潘诺斯·阿贡茨的《雄辩术》(1775)、萨尔吉斯·季格拉尼扬的《试论悲剧》(1834年拉辛的《戈福利亚》译文序)、爱德华·久尔缪疆的《诗体集》(1839)以及其他以亚里士多德、贺拉斯和布瓦洛[①]的美学理论为基础的作品中，探究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问题。古典主义时代翻译了荷马、索福克勒斯[②]、欧里庇得斯、维吉尔、贺拉斯、弥尔顿、塔索[③]、高乃依、拉辛、伏尔泰、阿尔菲耶里[④]及其他世界文学古典派作家的大量作品，从而创立了自己的翻译艺术流派。 ·454

亚美尼亚的古典主义作家留下了丰富的文学遗产，尤其是在诗歌、戏剧和叙事诗方面。古典主义诗歌收录在三卷本诗歌集《修道士—姆希塔尔教团[⑤]诗歌集》(威尼斯，1852—1854年)及一本叫做《亚拉腊的缪斯》(莫斯科，1829年)的书中。风景如画的大自然、宗教—伦理和历史—爱国主义——这就是古典主义作品的基本主题。

亚美尼亚的古典戏剧主要转向历史悲剧。从古希腊悲剧及欧洲古典主

---

① 布瓦洛(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著有《诗艺》。——译注

② 索福克勒斯(约公元前496—公元前406)，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之一。著名作品有悲剧《奥狄浦斯王》、《安提戈涅》、《埃勒克特拉》。——译注

③ 塔索(1544—1595)，意大利诗人，文艺复兴运动晚期的代表。著有叙事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文艺理论著作有《论诗的艺术》、《论英雄史诗》和二十六篇《对话》。——译注

④ 阿尔菲耶里(1749—1803)，意大利剧作家，意大利古典主义悲剧创始人。著有政治性悲剧《克莉奥佩特拉》，自传《阿尔菲耶里自叙的生平》。——译注

⑤ 姆希塔尔教团，亚美尼亚教士组成的宗教团体，修道士姆希塔尔·谢巴斯塔齐于1701年创建，自1717年起在威尼斯附近活动，曾促进亚美尼亚文学的发展。——译注

义戏剧的诗学原则出发，但是亚美尼亚作家放弃了对恋爱激情和家庭场面的描述，而更愿意描写历史爱国主义的情节。对祖国赋予责任感的个性人物成为古典主义戏剧的主人公，他们憎恨暴政和背信弃义，随时准备为崇高的理想——爱国主义奉献自己。这种思想贯穿于马努埃尔·贾赫贾希扬（1770—1835）、叶吉阿·托夫马强（1777—1848）、彼得罗斯·米纳相（1799—1867）的历史悲剧中。彼得罗斯·米纳相还从事戏剧理论问题的研究，他把拉辛的《戈福利亚》和伏尔泰的《恺撒之死》看作是古典主义的典范。彼·米纳相的《霍斯罗夫大帝》、《斯姆巴特一世》、《阿尔沙克二世》等剧本充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公民高尚品德的颂扬。

奥万·瓦南杰齐（1772—1841）、加布里埃尔·帕特卡尼扬（1802—1889）、阿尔森·巴格拉图尼（1790—1866）是著名的古典主义史诗作家。奥万·瓦南杰齐的长诗《亚美尼亚的黄金时代》和《盖克、阿拉姆及阿拉的会面》就本质上讲是对莫夫谢斯·霍列纳齐和阿加坦格霍斯所著的《亚美尼亚史》的诗歌改编形式。瓦南杰齐在哀悼现实的同时，号召人民以前辈为榜样恢复祖国的荣誉和强盛。瓦南杰齐的颂诗《致亚美尼亚》是最好的爱国主义诗歌典范，经作曲家科米塔斯谱曲后成为一首最优秀的亚美尼亚爱国主义歌曲。阿尔森·巴格拉图尼的史诗《勇士盖克》是亚美尼亚古典主义史诗的巅峰。三十年代完成的第一个版本被遗失，后来作者将其复原并于1858年出版。巴格拉图尼出生于君士坦丁堡，在威尼斯的牧师协会受过教育，并在那里从事教育、文学和科学活动直到去世。他有许多哲学、语文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著作。

在史诗《勇士盖克》中依据霍列纳齐的《亚美尼亚史》讲述了亚美尼亚人民种族形成时期的一个传奇故事。泰坦神的后裔贝尔和托尔戈姆族的盖克一直相互为敌，暴君贝尔想征服盖克，但盖克不愿意屈服于贝尔，于是离开故乡去了亚拉腊国。贝尔依靠凶恶的尘世力量追捕盖克，而盖克依靠善良的天神奋起反抗贝尔，于是，一场血战开始了。盖克用箭射中了贝尔，为自己的国家赢得了独立。邪恶灭亡了，因为理智证明它有罪。史诗《勇士盖克》贯穿着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在自然景色、战争场面和多神教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巴格拉图尼表现出卓越的艺术才能。

东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联合（1828）标志着在亚美尼亚人民的生活中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亚美尼亚在两个世纪里所追求的思想得以实现。屠杀人民的威胁消失了。团结一心显示出亚美尼亚人民的精神力量，从而促进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兴盛。

亚美尼亚社会生活的崭新发展阶段开始了：在俄罗斯建立了慈善团体、学校和教育基地——莫斯科的拉扎列夫斯科大学（1815）、第比利斯的

涅尔谢相学校(1824)、阿斯特拉罕的阿加巴比扬学校(1810),教会学校分别设在舒沙、埃里温、亚历山德罗—波列等地。在俄罗斯及欧洲的大学里出现了许多亚美尼亚大学生。图书出版活动的扩大标志着精神生活的高涨。

三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的猛烈攻击下,日趋崩溃瓦解的土耳其战时封建帝国其内部生活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宽容化"。在土耳其温和改良时期(1839),在土耳其占主要经济地位的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开始参与民族文化活动。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在亚美尼亚的社会思想中出现了启蒙主义的倾向,它也表现在艺术思维方面。古典主义观点限制了新文学运动——浪漫主义,但是,因为启蒙主义思想还没完全实现,所以亚美尼亚的浪漫主义也就具有了启蒙主义的特征,亚美尼亚的第一批浪漫主义作家通常都是启蒙主义者。 ·455

作为一个文学流派,亚美尼亚浪漫主义在发扬民族特色的同时,也在欧洲浪漫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亚美尼亚的文学—历史学家在当时正是在世界背景下对新文学运动的内容进行研究的。浪漫主义对亚美尼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浪漫主义史诗取代了古典史诗,浪漫主义戏剧取代了悲剧,诞生了文艺散文。关于创立统一的文学标准语的问题变得尖锐起来。古亚美尼亚语——格拉巴尔语,让位于新亚美尼亚语——阿什哈拉巴尔语。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世俗内容,民间创作被看作是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学源泉,善于思索、注重感情、具有公民忧患意识、自我价值观强烈的个性成为文学中的主角。

阿鲁琼·阿拉姆达里扬(1798—1834)是亚美尼亚第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出生于阿斯特拉罕,曾在当地的阿加巴比扬学校学习。十八岁时被聘到莫斯科的拉扎列夫斯科大学任教。俄罗斯文化中心对他的世界观和艺术爱好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作为莫斯科大学的旁听生经常去听历史课和哲学课。他阅读了拜伦和雪莱的作品,酷爱茹科夫斯基和卡拉姆津的作品。1824—1834年间阿拉姆达里扬担任梯弗里斯的涅尔谢相学校的校长。在俄罗斯—波斯战争期间他开展了积极的社会活动,为亚美尼亚与俄罗斯的联合而斗争。诗人结识了格里鲍耶陀夫和十二月党人伊·伊·普希钦。

阿鲁琼·阿拉姆达里扬的诗歌遗产并不多,他的诗歌集取名《诗歌集》,1884年在彼得堡出版。阿拉姆达里扬的诗歌是亚美尼亚抒情诗的一种新现象,因为它第一次揭示了人的内心世界。诗人在自己的诗中歌颂爱情,抒发个人的忧郁和痛苦(《我心爱人的脸庞——白里透红》、《跳舞的姑娘》、《幻想》、《被抛弃的夜莺》、《春天》)。随着爱人的死亡,生命便失去了所有

ՀԱՅԿ

ԴԻՒՑԱԶՆ

ՎԷՊ

Ի Հ. ԱՐՍԷՆԷ Ղ. ԲԱԳՐԱՏՈՒՆԵԱՑ

ՄԽԻԹԱՐԵԱՆՑ



Ի ՎԵՆԵՏԻԿ

Ի ՍՈՒՐԲ ՂԱԶԱՐ

1858

阿·巴格拉图尼《勇士盖克》扉页
威尼斯 1858 年

的美妙,剩下的只有不幸和痛苦。爱人的形象如同幻影铭刻在诗人的记忆中,幸福如过眼云烟,而痛苦却是实实在在的(《你最美丽……》、《悲痛》、《丧服》、《为父母哭泣……》等)。诗人企图在浪漫主义的幻想形象中重新找回失去的精神财富,但是,唉,幻想消失了,可他却独自一人留在不幸中,以期在"博爱"的抽象思想中寻找到平衡。

亚美尼亚早期浪漫主义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在麦斯罗普·塔吉阿季扬(1803—1858)的创作中得到鲜明的表达。他出生于埃里温,童年和青年在埃奇米阿津修道院中度过,后来开始了漂泊不定的流浪生活。形势环境驱使诗人来到了加尔各答,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亚美尼亚殖民地的文学启蒙活动。从那里他发出了《致埃里温人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欢迎俄罗斯军队解放自己的同胞。几年后他返回祖国,但是由于与埃奇米阿津教会确立的制度不容,他又去了印度。由于在这里也找不到和平的避难所,于是他决定返回亚美尼亚,但返回途中在设拉子(伊朗)不幸去世。

塔吉阿季扬是一位具有丰富内心世界、不断探索的人物。他是一位社

会活动家和教育家、记者和出版商，在时事评述和历史地理方面他的工作卓有成效，他写了大量的回忆录、诗歌和艺术散文，编写了各种教科书并翻译了许多作品。塔吉阿季扬的历史和语文学著作《亚美尼亚旅行记》、《神话学》、《印度史》、《基督教在印度》和《波斯史》等包含了丰富的关于亚美尼亚和近东各国历史的资料。塔吉阿季扬是一位启蒙主义者，他坚信，教育和科学是取得进步和自由的唯一途径，但是他无法摆脱各种矛盾的困扰，于是便试图调和启蒙运动与宗教哲学之间的矛盾。这种两面性不仅在他的世界观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也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留下了痕迹。英国浪漫主义作家（拜伦、雪莱、司各特）在塔吉阿季扬的文学观形成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在他的抒情诗中反映了现实的尖锐矛盾，它们动摇了诗人对人类美妙和谐的信仰。邪恶强于善良，人们不再崇拜旧的善良天神，而是开始顶礼膜拜新出现的天神——财神。由于充满了对社会毁灭的恐惧，浪漫主义诗人在谴责社会邪恶的同时，也在更新了的基督教学说中寻找慰藉。塔吉阿季扬在自己的长诗中融入了自传、日常生活描述和哲学思考的成分。例如，长诗《索斯与松季皮》（1847）中贯穿着解放人的各种自然感情的人道主义思想。这首诗取材于亚美尼亚青年索斯与印度姑娘松季皮的悲剧爱情故事。

塔吉阿季扬的《瓦尔德克斯的罗曼史》（1846）和《瓦尔谢尼克的罗曼史》（1847）在亚美尼亚长篇小说体裁的形成过程中占有特殊地位。《瓦尔谢尼克的罗曼史》是首批具有民族道德教育意义的长篇小说典范之一。塔吉阿季扬写道："现代欧洲作家几乎总是把各种传说引入自己的作品中，目的是让读者更容易理解'善'这一概念。"塔吉阿季扬仿效他们，将亚美尼亚的神话传说《阿奈特》引入长篇小说中。《瓦尔德克斯的罗曼史》是对瑞士作家茨绍克的德语作品《江洋大盗阿别利诺》的独特改编。塔吉阿季扬更换了主人公的名字和地理名称，转移了事件的发生地点，小说充满了民族历史内容。小说的事件发生在阿尔马维尔——古代亚美尼亚国家大亚美尼亚的首都（公元前四—三世纪）。小说的主人公瓦尔德克斯落入强盗手中，偶然知道了亚美尼亚的公爵们——布杰什赫人反对沙皇的密谋。作为一个爱国者和品德高尚的人，他揭穿了他们的阴谋，惩罚了叛逆者——布杰什赫人，并向沙皇献上了自己的宝剑。忠于祖国和民族团结——这就是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小说的思想也在于此。

哈恰图尔·阿博维扬（1809—1848）是位个性鲜明、独树一帜的作家、启蒙者和民主主义者，在他身上好像体现了本民族的精神和历史经验，他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十九世纪亚美尼亚社会思想的发展。阿博维扬出生在卡纳克尔村（离埃里温很近）的一个父权制家庭，他在埃奇米阿津修道院附

属学校接受了初级教育，后来在梯弗里斯的涅尔谢相学校学习，1828 年返回埃奇米阿津，成为最高主教的秘书兼翻译。

1829 年，由多尔帕特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帕罗特率领的探险队为了攀登亚拉腊山来到了埃奇米阿津。阿博维扬作为翻译参加了探险队，并成为第一批登上圣经山的人之一。这位求知欲极强且机智敏锐的青年，引起了帕罗特教授的关注，在其协助下 1830 年阿博维扬动身去了多尔帕特，为的是在当地的大学继续深造。启蒙时代的思想家—知识渊博者令他钦佩莫名，于是他研读了十八世纪俄罗斯和西欧思想家们的著作。在自然哲学方面阿博维扬发现了许多宇宙秘密，在社会领域中他一直寻找确立人类幸福的钥匙，在教育体系方面他不断探寻完善个性的教育方法，在历史学方面他始终预示着各民族的美好未来。学识渊博的阿博维扬其各种观点就这样形成了。在一次彼得堡亚美尼亚社会团体集会上阿博维扬发誓："为了祖国我承受了多年的流放生涯，而且现在我仍有一个愿望——为祖国鞠躬尽瘁。从走上这条路的第一步起就没有什么能吓倒我，尤其是现在，什么也阻挡不了我前进的步伐。为了实现我的目的，我下定决心甚至不惜牺牲生命。"

1836 年他回到故乡，开始了启蒙主义教育活动，起初在梯弗里斯(1837—1843)，而后在埃里温。1848 年 4 月 2 日清晨，阿博维扬离家出走并神秘失踪，直到现在也没弄清他死亡的情况。

阿博维扬在世时，只出版了一本教育参考书《学龄前课本》(1838)，但是他留下了多种体裁的丰厚文学遗产——包括短诗、长诗、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寓言、游记作品、民族志和历史地理学研究著作，还有大量的翻译作品。阿博维扬是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他的历史功绩在于，解决了文学民主化的审美难题，完成了亚美尼亚文艺思想在形式及其内容方面的转化。为了证明人民的公民权利，阿博维扬改变了文学题材，从历史转向现实，发现了文学的新主角——人民。

阿博维扬深刻意识到文学和艺术的社会意义。摆脱了东方专制国家压迫的民族，正在以经济、政治和精神生活组织为基础逐步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真正的民族，正是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前途中，阿博维扬认识到自己的审美理想的意义。他的主人公——新时代的个性，努力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公民，保持自身的价值和内心和谐。完美个性所具有的每一个特征都逃不过作家的视野：捍卫诚实与公正，憎恨谎言与欺骗，倾听善意的忠告，虚怀若谷、宽宏大量、不傲慢自大，热爱劳动，精明能干，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忘公众利益，热爱读书学习，摈弃无知与偏见——这就是阿博维扬在教诲性作品中所包含的道德戒律。在这方面寓言集《闲暇时的游戏》引起特殊的兴趣，

书中的教诲与对恶劣生活现象的批判结合在一起：颂扬善良——谴责邪恶，赞扬美德——批判卑鄙，肯定利他主义——否定利己主义，嘲笑目光短浅、平庸粗俗——崇尚、赞美知识渊博的个性。



哈·阿博维扬(1809—1848)
Л. 丰·迈德尔的画 1831 年

在诗歌和歌唱诗(巴雅企①)中作者揭示了人类内心世界的纷繁复杂，指出公民自我意识的觉醒。根据阿博维扬的思想，具有自我价值的个性，其内心和谐一旦与自然和宇宙的神秘力量碰撞，或与不公世道的种种偏见相抵触，就会被打破，进而产生悲剧性的处世态度。短篇小说《图尔昌卡》的主人公逃出日常的纷扰，扑向大自然的怀抱，以求在独处中找到解答使人痛苦的现实问题的答案。大自然隐藏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它在人的心灵里蕴藏着多么迷人的和谐与宁静，如果人类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阿博维扬企图用自然信仰的启示把孤独的世界联合起来，这种浪漫主义的泛神论源于卢梭和歌德。

阿博维扬文学创作的美学和哲学观念在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中得到完整的体现。这部小说写于 1840 年，1858 年首次出版。小说以 1826—1828 年俄罗斯—伊朗战争期间的历史事件和亚美尼亚并入俄罗斯的事件为基础，阿博维扬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眼光认识到并入俄罗斯这件事对亚美尼亚人民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他热情洋溢地赞扬了人民解放者。作者的思想和美学纲领在小说的《序言》中得到表述，他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民族文学的思想，以唤起广大民众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团结一致的民族精神。

小说的主人公们都热情洋溢、情绪激昂。作者与自己的主人公们形影相随、同甘共苦，并从哲学角度领悟到人类各种感情的美。不仅爱人、父母、子女、同志所赐予的各种感情是美好的，祖国也是值得热爱的，其创伤也需要抚平。世界是空幻虚无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意味着惟有美好的回忆才是真实的，只要为爱国主义事业而奋斗，就能名垂青史，阿博 ·458

① 巴雅企，阿塞拜疆民歌的一种形式。它是由四行七音节的诗构成，第一、第二、第四行要押韵。巴雅企的韵律响亮宏壮，用弦乐器伴奏演唱。——译注

维扬这样写到:“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你的事业,唯一的事业使你千古留名。只有热爱祖国,才能使你万古流芳,只有热爱人民,你的事业才会永葆青春,你才会与圣贤一样备受尊敬。”

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的主人公阿加西是阿博维扬美学思想的代言人。他出生农村,天资聪慧,洞察秋毫,敢于冲破农村宗法制的限制,善于理解把握时代的命脉。阿博维扬赋予自己的主人公以浪漫主义的个性特征,在其身上显示出民族英勇性格的自然力量。

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的灵感源于历史乐观主义和对与俄罗斯人民连在一起的亚美尼亚人民美好未来的信心。阿博维扬用这样的话语结束自己的小说:“露出你们的前额,尽情地欢呼吧;我甜蜜的姊妹伏尔加河从今以后永远关注着你们。我已将自己的满腔友情都呈现给了她——伏尔加河,而她定会将自己的所有仁慈奉献给你们,我的子孙们。我们之间的这种牢不可破的联系和至高无上的友爱定会源远流长、万古长青。加强壮大自己的力量吧,阿拉姆的子孙们!要团结友爱、和睦相处。友爱与和平会给所有的民族和部落带来幸福生活。”亚美尼亚人民生活中的各种变化以及向亚美尼亚人民介绍先进民族的重大成就使阿博维扬的启蒙民主主义世界观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在外高加索的历史条件下表现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形式。阿博维扬肯定地评价了东亚美尼亚并入俄罗斯的历史意义,并满腔热情地接受了俄罗斯的解放思想和十二月党人及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各种思想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首批主张外高加索解放运动与全俄罗斯解放运动相互接近,并为这一地区的革命民主主义潮流奠定基础的思想家之一。

就体裁而言《亚美尼亚的创伤》是一部历史性长篇小说,而从内容上来看,则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悲剧小说,因此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家都把阿博维扬视为自己的开山鼻祖。小说《亚美尼亚的创伤》的主角阿加西则被看作是下一阶段民族解放运动文学中浪漫主义反叛者的先驱者。《亚美尼亚的创伤》在亚美尼亚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五十至六十年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形成(米·纳尔班疆[①]的《死人的询问》、佩·普罗什扬[②]的《索斯与瓦尔季捷尔》、加·阿加扬[③]的《阿鲁琼与曼维尔》等)都是在这部作品的直接影响下创作出来的。

---

① 米卡艾尔·纳尔班疆(1829—1866),亚美尼亚作家、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译注

② 佩尔奇·普罗什扬(1837—1907),亚美尼亚作家。——译注

③ 加扎罗斯·阿加扬(1840—1911),亚美尼亚作家、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译注

在亚美尼亚新文学史上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完整的时期，文学过程从经验主义的自发状态进入到一个对艺术方法（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美学原则高度认识的阶段。在这一时期文学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体裁（叙事诗、戏剧、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长诗、哀诗、抒情诗），而且文学的描写范围作为对现实的艺术认识手段也扩大了，具有自我价值的个性，其内心世界在其精神存在的一切美中都被揭示出来，最后，世界文学的艺术经验也丰富充实了亚美尼亚的文学。

第四编　中亚与哈萨克斯坦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根据国内革命前和国外的某些研究所采用的术语则称为毛危兰纳赫尔或特兰索克萨尼）各民族既没有社会—经济共同性，更没有文化—历史共同性，尽管这种共同性在以后形成的某些前提条件和发展趋势已经具备。由内讧造成彼此隔绝、支离破碎的各封建领地和氏族部落组织由于逐渐向中央集权制的俄罗斯国家改变方针，各民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逐渐走向成熟。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接触中，联合各分散部落和民族的思想不断积蓄力量，反对封建—宗法压迫的斗争此起彼伏，对宗教调和学说和思想观点的批判不断加强，摒弃穆斯林正统观念的思想初步形成，启蒙主义意向也日渐成熟。号召中亚各民族投入民族解放运动，了解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加强与俄罗斯进步活动家在科学、文化和文学方面的接触，这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成为可能，而且也符合客观历史的需要。

许多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吉尔吉斯人、部分土库曼人、哈萨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不仅没有统一的哪怕是氏族部落的共同性，甚至连宗教意识也处于不同的水平。正如瓦·弗·巴托尔德所指出的，例如吉尔吉斯人“在十九世纪时还像在十六世纪时一样，几乎完全不了解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仪式”。

这样，在彼此隔绝和相互敌对的各个汗国中，封建—宗法关系的保守性加上宗教的不相容性就阻碍了与欧洲和前亚[1]的交往。十九世纪初为数极少的传教士、旅行家——地理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既有俄罗斯的，也有欧洲

---

[1] 前亚，包括波斯湾、红海、地中海、里海、黑海之间的亚洲部分。——译注

的)在突厥斯坦进行文化活动,他们对它的印象是:精神生活闭塞,与外部非穆斯林世界孤立,与历史—文化方面相接近的各民族间的联系薄弱。

十九世纪初俄罗斯在认识东方文化方面仅仅迈出了第一步。有充分理由指出,《古兰经》这部作为伊斯兰教的基本立法和宗教—哲学典籍,同时也是古代文学文献,其最初几个译本只是十八世纪末才在俄罗斯出现,其中之一是由 M. И. 韦廖夫金翻译的,它成为普希金的系列作品《仿古兰经》的创作源泉。沙皇专制的军事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一方面对政府派往东方的各种贸易和科学勘测考察活动有所帮助,另一方面,由于自己彰明昭著的殖民意图也阻碍了强烈需求的文化交流。

这一时期,西欧也刚刚发现东方各民族的诗歌财富,其中包括中亚,但对它的认识在当时表现得还不是特别积极,只有下面两个例子。歌德的《东西方抒情诗》(1819)向欧洲的读者介绍了菲尔多西、哈菲兹[①]、萨迪[②]、鲁米[③]、阿塔尔[④]、内扎米等这些中世纪东方古典巨匠的名字,其第一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还未售完。Э. 菲茨杰拉利德的作品《鲁拜亚特·欧玛尔·海亚姆》(1859),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正是由于这部作品,这位十一世纪的诗人的人道主义作品才征服了欧洲并在国内重新受到关注和产生兴趣,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多年来一直搁置在伦敦出版商和售书商的书架上,没有引起一位购书者的兴趣,只是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对这部作品的兴趣才开始像燎原之火迅速蔓延起来,征服了欧洲的其他国家和美国"(B. H. 扎伊采夫语)。

所以,不仅内部因素,就连外部环境也不利于精神上和艺术上的团结。

460 · 在中亚领土上从十八世纪末就有三个较大的封建专制国家——布哈拉酋长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由于长期的敌视而变得极其困难,也少有成效。塔吉克和乌兹别克以及部分土库曼文学都是在这些汗国统治者的宫廷里发展起来的,它们没有认清各自的文学都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同时又拥有许多共同特点(尽管时间跨度不一),拥有许多文学传统和民间创作源泉的文学。只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这些民族并入俄罗斯的进程完成后,民族自我意识的进程才开始蓬勃发展起来,它触及各民族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所有领域,其中也包括文学。作为这一

① 哈菲兹(1389 年卒),波斯苏菲派诗人,也是塔吉克文学的经典作家。——译注

② 萨迪(1208—1292),波斯作家、思想家。主要作品有《果园》和《蔷薇园》。——译注

③ 鲁米(1207—1273),波斯苏菲派诗人。——译注

④ 阿塔尔(1145—1229),波斯和塔吉克苏菲派诗人,著有长诗《百鸟朝凤》(约 1175 年),文集《长老传》。——译注

进程的另外一个方面，即对这些民族的文学的未来命运的共同点的认识也客观地形成了，因为这些共同点已经不仅在区域发展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具有重要意义，例如，认识到必须克服彼此孤立的局面，创造合理的条件以适应社会进步和丰富与俄罗斯文学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后者加强同其他民族文学和西方文学的相互关系。

在总结这些民族文学的特征时，应注意到它们发展的不均衡性和当时所处的不同思想和美学水平，克服这些差异只是在十月革命后，即一百年后才成为可能。众所周知，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各民族的文学拥有极其丰富的民间创作遗产。但是如果说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以及某些土库曼游牧部落的文艺—美学思想表现在民间创作上（而这些民间作品凭借高度发达的即兴创作技巧简直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就创作出来了），那么，居住在希瓦汗国和布哈拉酋长国中的塔吉克人、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则一直是以本民族的口头诗歌创作为基础，发展了具有许多世纪职业书面传统的文学。法尔西语曾作为高雅诗歌和文化的语言，所以塔吉克—波斯古典作品从鲁达基[①]开始到贾米[②]结束，不仅对于塔吉克民族而且对整个地区的传统和文艺思想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与此同时它也保持着自己的积极意义。关于乌兹别克文学同样可以说是开始于共同突厥语的古代文献——优素福·巴拉萨古斯基[③]的《天赐的知识》，这部作品是“第一部最古老的，且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用其中一种突厥语创作的作品，它是一部以伊斯兰教思想体系为基础并宣扬这一思想体系的作品”（A. H. 科诺诺夫语），结束于纳沃伊。在评价这些民族文学在发展前景方面的共同点的起源时，应注意到许多诗人和文学活动家都精通两种甚至三种语言。他们中许多人的文学遗产都成为乌兹别克、维吾尔、土库曼、塔吉克文学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十八世纪土库曼文学的古典作家马赫图姆库利的创作在十九世纪仍具有典范意义，不仅由于其卓越的艺术成就，也由于其诗歌充满了联合统一和热爱和平的思想，这对于当时来说是一种具有深刻革新和现实意义的思想，因此在所有的突厥文学中享有盛誉。

但“发展”这一概念本身对于所研究的这个时代的文学来说其含义是十分不确定的。对许多现代欧洲的东方学家来说，下面的观点是十分典型的，即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特点和内容与其说是处于日渐发展时期，不如

---

① 鲁达基（850—941），塔吉克和波斯诗人，波斯语诗歌的奠基人。——译注

② 贾米（1414—1492），波斯和塔吉克诗人、苏菲派哲学家。著有叙事组诗《七卷集》，寓言集《春园》。——译注

③ 优素福·巴拉萨古斯基（约1021—?），中亚诗人、思想家。——译注

说是进入了一个相对于中世纪来说是“新时代”的停滞和衰落时期。尽管停滞的因素确实显而易见，尤其是在布哈拉酋长国的艾米尔、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的可汗宫廷里，但是这种观点现在已变得不是十分客观和公正的了。近年来这种观点更加遭到积极的反驳，因为人们不仅以大量大范围进行的版本考订和实地勘察工作为基础重新评价了许多现象，而且也从新的方法角度分析和重新审视了各种文学现象。某些文学史概论的作者证实了这种情况，因为他们不仅引用了从苏联学者发现的手稿原件中或新的系统化了的民间创作手稿中获取的新材料，而且开始重新研究以前的那些概念。

克服社会—文化体制矛盾的客观先决条件和中亚各民族对各自精神、种族及文化历史渊源的认识，不只是语言渊源的认识，而是包含在许多相似的过程中，既有发生在文学领域中的，也有发生在口头诗歌创作中的。从中既可以看到对文学语言大众化的追求和对诗歌标准之条条框框的放弃，也可以看到对模仿宫廷赞美诗的社会价值的贬低，还可以看到对现实某些方面的尖锐批判，这就加强了社会讽刺作品的作用，并且出现了新的讽刺体裁。例如，对比乌兹别克诗人马赫穆尔和土库曼诗人凯米涅的揭露性作品可以确信，中亚各民族在诗歌方面的共同趋势是巩固的。爱国主义抒情诗也获得了许多新特点，在这些抒情诗中各民族的阶级自我意识、对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共同敌人的感受、对自相残杀和同室操戈使人民损失惨重的感受都开始出现并得到加强。就这一点来说，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哈萨克诗人马汉别特·乌捷米索夫与土库曼军旅诗人泽利利和谢伊季的创作中，也表现出不少共同特点。革新过程触及抒情诗的借喻体系，在这些诗中越来越经常出现对比和借喻手法，它们取自日常生活和民间作品，并且逐渐取代了传统的象征手法或用某个轰动一时的社会意义充当象征手法的创作方法。这样的抒情诗例子可以在诗人阿加希、纳季拉和乌瓦伊西的东方抒情诗集中遇到，在福利格·希索利、哈济克、马丹的嘎扎勒体诗、克塔体诗和鲁拜体诗中遇到，在谢伊季、泽利利和莫拉涅彼斯的抒情诗中遇到，还可以在哈萨克民间歌手的诗中遇到。

461·

概括上述趋势可以得出结论：在所有的中亚文学中都出现过这样的历史性进步现象，它们在中亚文学的下一个阶段将促进各民族相互作用的强烈进程，促进中亚各民族文学积极加入全俄罗斯文学和共同文化的进程。

第一章　哈萨克文学

在哈萨克民族许多世纪的文学语言艺术发展史中，十九世纪占有特殊的地位。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民间口头创作就经历了高涨时期，涌现出

大量出类拔萃、颇具个性的作家，书面文学也应运而生。

十九世纪上半叶，歌唱诗人创作的繁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最杰出的代表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新型天才作品，而且还保存了许多过去的口头诗歌传说，他们的伟大功绩在于把许多古代民族英雄史诗和社会日常生活史诗的范本传到了今天。

这一时期哈萨克的歌唱诗人们弘扬了即兴创作的传统。在诗歌比赛（对口吟）中，即兴创作、机智俏皮、随机应变——这是所有希望获得歌唱诗人荣誉称号的人都必须闯过的一关。随着歌唱诗人创作的繁荣，哈萨克文学中又丰富充实了新的诗歌体裁，例如，叙事故事、诗歌、哀歌、政治抒情诗、民歌，与此同时还完善了托尔加乌（即论文）体裁。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哈萨克人的生活中发生了重要的社会—经济变化，这是由于哈萨克斯坦自愿加入俄罗斯而引起的。可汗后代们昔日所拥有的养尊处优地位逐渐丧失殆尽，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分崩离析，沙皇殖民者和地方封建主的双重压迫的影响也日渐削弱，这一切不可能不反映在人民的精神生活中，也不可能不在歌唱诗人和日拉乌（歌手）的思想—艺术创作内容上引起变化。

有些歌唱诗人，例如，拜托克、扎努扎克、内桑拜、多斯霍扎，为可汗、苏丹歌功颂德，为他们的残酷行为开脱罪责，维护封建—世袭法制，美化宗法制国家。两位大歌唱诗人杜拉特·巴巴塔耶夫和绍尔坦拜·卡纳耶夫的创作充满了矛盾。杜拉特·巴巴塔耶夫（1802—1874）的诗歌只是在其死后才被记录下来，他唯一的诗集 1880 年由毛列克依在喀山出版，取名《遗书》。杜拉特比其同时代的某些人更清楚分明、鞭辟入里地看到和反映时代的各种矛盾。在抨击封建—宗法制度的同时，他也反对沙皇官吏和新型行政机关残酷对待当地的居民。但是在描绘生活的任何一个方面时，他都得出一成不变的结论：生活不是向美好的方面转变，大好的时光已一去不复返（《远离阿卡尔祖先的游牧地》）。甚至当杜拉特开始研究东方诗歌关于善与恶、友好与仇恨、慷慨与吝啬诸矛盾的抗争这样的传统主题时，他也痛悼往昔，并断言，年轻人不再尊敬父母，年幼者不再尊敬年长者。他把人的精神面貌的每况愈下归罪于时代。 ·462

绍尔坦拜·卡纳耶夫（1818—1881）的创作好像是对杜拉特诗歌遗产的补充。绍尔坦拜的唯一诗歌集《绍尔坦拜产儿的哭泣声》1888 年在喀山首次出版。这本诗集以诗歌《我们的神意代言人始祖亚当》作为开篇，以诗歌《唯一的真主知悉一切》作为终结，诗人分析研究了那些同样引起杜拉特关注的问题，但是却从正统的伊斯兰教的立场出发解决这些问题。根据诗人的深刻见解，各种不良社会—经济变化的发生，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伦

理范围的变化，都是由于信仰基础的不牢固，由于人们开始轻视伊斯兰教法典，即《古兰经》的教义。

但是由于绍尔坦拜是一个宗教信仰笃深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封建—宗法制道德的忠实拥护者，所以他在一些诗，例如《被上帝诅咒的巴依》和其他诗中，真实地描绘了穷苦人的悲惨生活。

歌唱诗人绍热·卡扎乌诺夫(1805—1891)、舍尔尼亚兹·扎雷尔加索夫、苏云拜·阿隆诺夫(1827—1896)是另一派的拥护者，他们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利益和需求，揭露了封建—巴依上层人物的专横暴虐。

最著名的军旅诗人、人民利益的斗士马汉别特·乌捷米索夫(1804—1846)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哈萨克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马汉别特是在农民同封建主、可汗、地方各派权力代表的冲突和斗争的条件下成长为一名诗人的。桀骜不驯的诗人从年轻时起就始终与巴依们势不两立，所以后来成为1836—1837年在布克什国[①]爆发的反抗占吉尔可汗的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马汉别特的文学遗产与这次起义密切相关，根据他的诗歌可以透彻考察斗争的各个阶段，从起义者迈出的最初几步到最后的悲剧性失败。

在起义爆发之前的几年里，马汉别特用激情洋溢的诗篇号召人民勇敢起来反对压迫者(《召唤人民》、《光荣的事业》、《我们的事业需要人民》等)。诗人没有向人民许诺胜利会轻而易举获得，而是坦率地告诉他们，战斗会是残酷的、复杂的，需要大量的流血牺牲，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他的诗充满着对抱定事业的正义性的信心，充满着对胜利的必胜信心。

马汉别特作为领导者之一，在战斗的日子里一直冲锋陷阵在起义者的先遣队中，直接参加了最激烈的战斗和拼杀，与此同时他还用自己热情洋溢的歌曲—诗歌鼓舞战士的斗志，在最艰苦的时刻给他们以支持。描写起义者的诗歌充满了友情、关怀和对战斗中死难英雄的深切同情。他的诗歌《告朋友书》、《不要悲伤，我的朋友们》、《英勇的儿子》、《幸福定会来到我们身边》富有激情和力量，大大鼓舞了起义者，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

在马汉别特的创作中对人民英勇斗争的艺术再现是和揭露导致武装起义的社会原因结合在一起的。这些社会原因就是封建主、可汗和巴依残酷剥削劳动者和弱小贫困者，强取豪夺土地，逼迫人民背井离乡，等等。诗人痛苦地讲述着人民的英勇儿子们如何"被打死"和"成群地死去"。描写地

---

① 十九世纪初布克汗在哈萨克斯坦西部所建立的封建游牧国家，1876年合并于俄罗斯。——译注

方统治者占吉尔和苏丹拜马加姆别特的诗歌充满了愤怒之声。勇敢高傲的诗人称他们为恶狼、毒蛇、胆小鬼和伪君子。马汉别特的诗具有热爱自由、斗志昂扬和乐观豁达的特点。

马汉别特在起义失败后被驱逐期间创作的作品，尽管有思乡念亲的悲伤音调，但也充满了希望。在这些诗中丝毫没有因参加人民起义而懊悔的心情，因为诗人相信，人民惩罚巴依的时刻一定会到来（《告苏丹拜马加姆别特书》）。马汉别特歌颂起义者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哈萨克文学史上第一次创造了人民英雄勇士的形象。诗人把农民运动的领袖伊萨泰·塔伊曼诺夫视为自己的理想人物。在伊萨泰的性格中，诗人特别强调他的不屈不挠、勇敢顽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意志坚强和沉着镇定，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为人民的幸福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马汉别特为伊萨泰写了一组诗歌，在这些诗中这位人民统帅集各种品德于一身：他既是一位忠实优秀的人民儿子，也是一位备受压迫的人民的可靠支柱和保护者；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领袖，也是一位韬略过人的谋士；既是一位战士的良师益友，也是一位最受爱戴的慈祥父亲。

在继承以前和与其同时代文学的诗歌传统的同时，马汉别特也丰富了文学的思想和主题，他将政治抒情诗带入哈萨克诗歌，加强了哈萨克诗歌的公民主题和爱国主义主题。他的诗歌反映了民族解放运动的暴风雨时代。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哈萨克文学中民主主义流派占主要地位，在马汉别特·乌捷米索夫的创作中它找到了自己最鲜明的体现，成为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思想、艺术基础，并预示着民主主义文学巨擘的出现，例如，伊布赖·阿尔滕萨林和阿拜·库南巴耶夫。

第二章 乌兹别克文学

十八世纪末在中亚形成了三个独立的汗国——科坎德（或称浩罕）汗国、希瓦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国。

穿越中亚的世界贸易之路逐渐走向衰落，汗国之间为争夺土地和牧场不断挑起内战，各汗国内部矛盾重重，统治者残酷剥削劳动人民，这一切加重了各汗国之间经济和文化的彼此隔绝，对文学的发展也造成不利影响，作家的命运也因此悲惨不幸。

当权的上层社会感兴趣的是让颂词诗人颂扬艾米尔及其庇护者的“威严强大”和“灿烂辉煌”，促进他们统治政权的巩固，提高他们在政治上的威

信，借此来美化汗国宫廷。宫廷诗人们除了作一些辞藻华丽的喀西达诗[①]外，还编写爱情—色情题材的诗歌（嘎扎勒体诗、五行押韵诗）。他们甚至迷恋于创作各种塔里赫体诗，在诗中利用阿拉伯字母表中字母的数字意义，把某个历史性日期译成密码。统治上层阶级，特别是宗教界，大肆宣扬并千方百计地扶持宗教神秘文学，因为它仍继续积极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引诱人们脱离日常的琐碎操劳，并利用各种阴曹地府的画面恐吓人们。

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进步文学是时代的天良，其优秀代表力求创造性地继承前辈们的创作传统。舍尔穆罕默德·穆尼斯（1778—1829）[②]、穆罕默德-里扎·阿加希（1809—1874）、沙夫基（1785—1871）、纳季拉（1792—1842）、乌瓦伊西（1781—1854）、穆吉里姆·阿比德（十八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等诗人继承了乌兹别克文学创始人阿利舍尔·纳沃伊的人道主义文学遗产，在他们的诗歌集里崇高的爱情被讴歌为仁爱的象征、道德的基础。诗人纳季拉写道："人没有爱情——就不成其为人，/如果你是人——就钟情于爱情吧。"

在这一时期的东方抒情诗歌中，最为流行的是嘎扎勒体诗、五行押韵诗、鲁拜体诗和克塔体诗。许多著名诗人的诗集通常都是由按照字母表的字母顺序排列的诗歌组成。关注民间创作的起源以及大量使用谚语和俗语被认为是一种革新。

在许多诗人的创作中，爱情主题不仅与传统的关于美酒、春天和欢乐的主题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与时代最敏感的各种问题密切联系在一起。通常对社会环境的尖锐批判是通过比喻方法传达出来的，并具有抒情男主人公—恋人的各种感受外形。几乎在所有诗人的诗集中除了爱情诗以外，就是具有教导、哲学和社会—政治特点的作品。诗人们在作品中都抱怨自己的社会地位卑下，诗人阿加希在抱怨社会不公和命运不济的同时，经常义愤填膺地揭露当时的社会秩序："让那个车轮毁坏吧，它的旋转就是谎言，/弯曲旋转的东西，在狂乱中就谎话连篇……"

虽然一些进步诗人不管怎样都与汗国宫廷有关系（例如，穆尼斯、阿加希曾是水利官吏——即水分配者，在花拉子模国这曾是一个相当高级的职位），但他们却深深同情人民的贫穷和苦难，诗人穆尼斯曾警告沙赫王，人民大众是坚不可摧的，他们随时会起来反抗他的暴政。

---

① 一种阿拉伯的颂扬或劝善诗。——译注

② 舍尔穆罕默德·穆尼斯，乌兹别克历史学家、诗人。著有九千五百首抒情两行诗和1812年前的希瓦汗国史。——译注

诗人马赫穆尔（卒于1844年）在一首广为流传的诗歌《哈法拉克村》中以尖刻的讽刺手法描写了哈法拉克村村民的艰难处境。饥饿的哈法拉克村民用石臼捣碎青草充饥，而统治者乌马尔汗仍向他们征税，而且要求用金币支付。诗人勇敢地站出来维护村民，请求可汗取消征税。在《库拉马边区的故事》一诗中诗人描写了库拉马山区，这里甚至泉水都“散发着毒气”，而热风“像熔化焦油一样会把人熔化掉”。马赫穆尔还创作了讽刺诗《讽刺霍贾·米尔·阿萨德》、《关于医生图拉布的品德》等。

· 464

纳沃伊、图尔季、马什拉勃的讽刺传统在这一时期由马赫穆尔、古利汉尼、加济、纳季尔·霍占季成功地继承下来。在他们的手抄诗集中，虚伪、愚蠢的谢赫[①]和扎希德遭到谴责和嘲笑。

在诗人阿季纳穆罕默德·马丹（1761—1838）的创作中讽刺作品占主要地位。他批判巴依和官僚们的贪婪、无知和腐败（《潘加兹》、《良心没了》、《关于一百三十个收税人的五行押韵诗》、《阿纳兹比》）。诗人加济（卒于1818年）同马赫穆尔和马丹的创作有许多相似之处，他除了创作多愁善感的嘎扎勒体诗外，还创作讽刺体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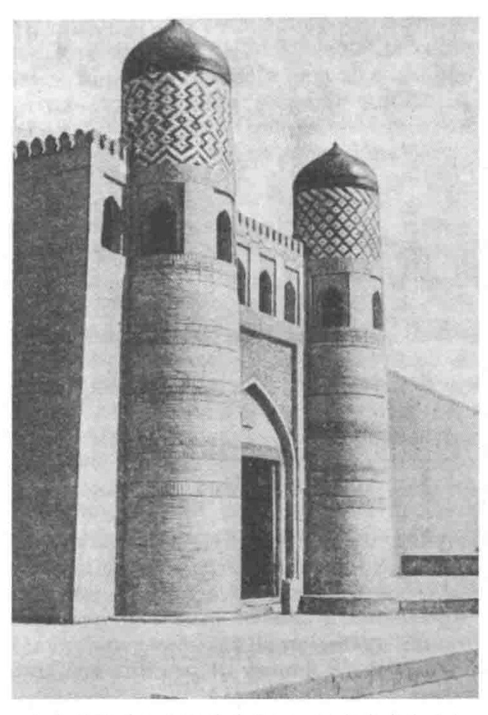
乌兹别克文学同塔吉克文学一样，其中一个特征就是用双语进行创作。许多乌兹别克诗人都是用两种语言——母语和塔吉克语进行创作。在所有诗人的诗歌作品集中都会遇到嘎扎勒体诗或鲁拜体诗，以及用法尔西语创作的法尔德体诗和塔里西体诗。双语创作尤其是费尔干纳省和布哈拉省的诗人们所特具的。在乌兹别克文学中双语创作传统是由于在许多山区和乡村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使用两种语言——乌兹别克语和塔吉克语。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诗人既有权载入塔吉克文学史，又有权载入乌兹别克文学史。

女诗人纳季拉、乌瓦伊希、马赫拉祖娜以及其他一些生活在科坎德汗国的女诗人，她们的作品都表现出新的艺术思想倾向。从她们富有天赋、饱含真情的抒情诗中可以听到无权地位的东方女性的呼唤。

纳季拉是安集延省执政者的女儿，科坎德汗国乌马尔可汗（奥马尔）的妻子，她的真名是马赫拉赖伊姆，笔名是纳季拉·卡米拉，法尔西语为马克努力娜，精通乌兹别克语和塔吉克语。丈夫去世后，纳季拉开始管理国家大事，她十分关注边区及其首都科坎德的公共事业，善待学者和文学活动家。但是很快布哈拉国的艾米尔纳斯鲁拉指控马里达汗王犯了破坏法典罪，而纳季拉也参与了此事，于是纳斯鲁拉开始攻打科坎德并擒获了马里达汗王。按照纳斯鲁拉的命令，1842年纳季拉和她的儿子们被处死。这位

---

① 谢赫，阿拉伯语，原意为“长者”，中东人民对村长的称谓。——译注



十七世纪希瓦汗国的库尼亚—阿尔克皇宫大门
根据十九世纪的照片修复

杰出的女诗人的一生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尽管纳季拉认为描写自己的喜悦和痛苦是不道德的，但是在她的抒情诗中仍然有时表现出自传性的主题。她的诗集是一部歌颂爱情、忠实和正直的颂歌。她号召尊重妇女，不仅珍视她们的美丽，更要保护她们的感情。纳季拉感觉自己首先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她的生活和作品充满了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对国民教育的关心。她把文学在社会精神生活方面的作用摆得很高。纳季拉的诗有机地融入了乌兹别克人道主义流派的诗歌之中，这一流派的奠基者是伟大的诗人纳沃伊。

女诗人乌瓦伊西出身于一个普通的家庭。她个性顽强，极具天赋，因为支持纳季拉而有机会进入了科坎德国的文学圈，并获得声誉。在她的诗中表现出对东方女性无权地位的强烈谴责，她呼唤高尚的感情，呼唤善良美好的事物。乌瓦伊西有几部叙事诗：《哈桑王子》、《侯赛因王子》、《与穆罕默德·阿利汗有关的事件》。

天资聪颖的女诗人马赫拉祖娜的创作命运形成得很不顺利。在她的文学遗产中保存下来的只有她同宫廷诗人法兹利·纳曼加尼进行诗歌比赛的其中一首诗的样本。但就是根据这些片段我们也可以判断出她伶牙俐齿、口才出众、思维敏捷、机智幽默，她对自己的前辈和导师们的诗歌作品驾轻就熟、了如指掌。

465·

十九世纪上半叶，乌兹别克抒情诗沿着一条内容和形式民主化的道路向前发展。由阿利舍尔·纳沃伊的作品《五诗集》奠定的叙事诗传统在其他诗人的创作中得到继续发展。其中引人注意的是诗人朱奈杜拉·哈济克的叙事诗《尤素福与佐列哈》，它是根据有关约瑟夫·普列克拉斯内的传统情节用塔吉克语创作出来的。叙事诗的作者赞美公正，歌颂真挚的爱情和忠诚，摒弃嫉妒和贪婪。运用象征和迂回手法，诗人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当权阶层的不法行为和横行霸道。

诗人朱奈杜拉·哈济克（根据某些资料判断）出生于赫拉特省，也属于

那些用双语创作的诗人之列，他们同样既载入塔吉克文学史又载入乌兹别克文学史。诗人在布哈拉、希瓦、科坎德都生活过，他曾亲眼目睹了纳季拉被处死。由于伟大的女诗人纳季拉被害，他创作了一首诅咒艾米尔纳斯鲁拉的即兴诗：“你为自己穿上了一件诅咒的外衣，/这件外衣你到被审判的那天也脱不掉。”因为这首诗，诗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被处死，头颅被运回了布哈拉国。这件事发生在 1843 年 1 月 14 日。

乌兹别克诗歌的另一个明显的现象就是为纪念纳季拉而创作的叙事诗《七座花坛》。它的作者纳季尔（1750—1848）把纳季拉描绘成一位英明的执政者、忠诚的妻子。她不知疲倦地操劳着国家的公共事业以及促进科学和文学的繁荣昌盛。出于对纳季拉本人的尊敬，诗人甚至借用她的笔名，把纳季拉这个名字男性化。纳季尔的叙事诗由七个主要故事组成，每个故事在情节上都是独立的。这些故事以日常生活为题材，充满了惊险和离奇。同纳沃伊的许多叙事诗一样，这些故事的主角也是沙皇和公爵，他们是追求社会公正、对人民实行仁政和热爱祖国的理想化身。诗人塑造了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信仰的英雄形象，以此强调指出，所有的民族和宗教都是平等的。

在乌瓦伊西的叙事诗《卡尔巴拉-纳梅》中讲述了一个预言家穆罕默德的一个战友哈里发阿里的一生及其儿子哈桑和侯赛因的故事。这个故事成为作者谴责宗教纠纷和封建内讧的理由。

在许多诗人的诗集中还可以遇到叙事诗结构的长诗，叫做“韵律对句”，用诗歌来描述某个历史事件。诗人法兹利·纳曼加尼的诗选《诗人文选》也属于叙事诗体裁，在这部诗选中提供了多位诗人的资料，他们曾从各地来到过科坎德国。这部诗选直到现在仍是研究乌兹别克和塔吉克文学史的珍贵文献资料。

诗歌技艺的高超水平对叙事体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许多文艺作品都是用韵律散文创作的，各种诗体的诗歌点缀其中——嘎扎勒体诗、鲁拜体诗、克塔体诗、法尔达米体诗等。

诗人穆罕默德·谢里夫·古利汉尼（生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死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也是一位用双语创作的诗人和寓言家。他的文学遗产不多，其中占特殊地位的是用韵律散文创作的《谚语和俗语集》。诗人在继承和发扬寓言创作传统、遵循寓意描写原则的同时，把各种鸟类和禽兽描写成具有社会统治阶层代表人物的性格特点。诗人笔下的主人公所居住的国家是纯粹的废墟。在这部作品中诗人延续了马赫穆尔的讽喻风格。

在诗人穆尼斯、阿加希的历史巨著中，在哈基姆汗·图拉、穆什里夫、阿布尔卡里姆·布哈里、沙姆斯·布哈里等人的作品中都可以遇到艺术散文

的各种成分：对历史事件绘声绘色的描述、对自然景色出神入化的描绘、对历史活动家的鲜明刻画。

语言大师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了时代的真理。古利汉尼喜欢用寓言手法，穆尼斯、阿加希、纳季拉和其他诗人钟情于传统形式。由于这些诗人的创作，特别是他们的讽刺体和自传体作品，新趋势在乌兹别克文学中的地位得以巩固和加强。

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生活的显著特点是作家们仍迷恋文艺翻译。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几乎所有的乌兹别克诗人都精通塔吉克语，而不少人还通晓阿拉伯语，许多作品就是用这几种语言创作的。译自这几种语言的大量文艺和历史作品丰富了乌兹别克的文化和文学。例如，诗人阿加希因把诗人内扎米、阿米尔·霍斯陆、萨迪、贾米、希拉利等人的诗歌翻译成乌兹别克语而闻名。在翻译领域，诗人阿加希是一位真正的创新者，他的翻译原则同现代的文艺翻译原则很相近。

翻译作品、双语创作传统——这是各国文学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乌兹别克文学由于同塔吉克、阿塞拜疆、土库曼文学密切接触而迅速发展起来。在普通百姓中高声朗读菲尔多西的《王书》，迷恋贝迪尔[①]的诗歌，大量模仿富祖里的嘎扎勒体诗，所有这一切构成了这一时期乌兹别克文学的显著特点。土库曼诗人马赫图姆库利、凯米涅和其他一些诗人在花剌子模绿洲地区备受欢迎。在布哈拉艾米尔国的环境下，乌兹别克和塔吉克的诗人和作家们并肩进行创作，因此，文学过程在一些主要特征上是共同的。

第三章　塔吉克文学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塔吉克文学与前一个世纪一样，主要在科坎德（或称浩罕）汗国和布哈拉艾米尔国境内得以发展。

文学创作中心附属于科坎德统治者乌马尔汗（奥马尔）（1809—1822）的宫廷。乌马尔汗是一位诗人，他用乌兹别克语和塔吉克语创作了一部诗歌集。在他圈子里的诗人们都想方设法创作“与艾米尔的诗歌相押韵的”诗歌，以“投艾米尔所好”，他们在诗歌中颂扬艾米尔的强大威力和高尚气度。关于可汗宫廷慷慨好施的传闻遍及整个中亚地区，于是许多语言大师——马赫尊·撒马尔罕季（卒于1845年）、诺季姆·伊斯特拉夫沙尼（卒

① 贝迪尔（1644—1721），印度波斯语诗人，主要作品有《神奇的护身符》（1669）与哲理醒世作品《唯人篇》，是故弄玄虚的所谓“印度风格”的创始人。——译注

于1845年)、纳季尔·霍占季(1790—1876)、法诺·乌罗捷帕季(卒于1850年)等纷纷慕名投奔到科坎德,希望自己的创作得到这位“可尊敬的鉴赏家”的垂青。

法兹利·纳曼加尼在其文选《诗人文选》(1821)中收录了一些与乌马尔汗文学界有联系的诗人的作品。但是塔吉克语和乌兹别克语文学也在宫廷文学界以外得到发展,表达了所处时代的进步倾向,其中杰出的代表是诗人马丹·潘戈济(1761—1838)。在宫廷诗人中,除了一些颂辞诗人外,也有许多人勇敢无畏地挺身出来批判统治者的不学无术,为自己人民的苦难命运而痛哭流涕。

在布哈拉艾米尔国里则是另一番景象。艾米尔海达尔(米尔·海达尔)(1800—1827)和艾米尔纳斯鲁拉(1827—1860)并不宠幸那些天才诗人,但是按照传统,在其宫廷里也笼络了一大帮学者和诗人,他们用赞歌和笑话供艾米尔及其侍从们开心解闷。

在艾米尔身旁效力的还有许多知识渊博的诗人,例如,米尔佐·索季克·蒙希(卒于1819年)、朱奈杜拉·哈济克(卒于1843年),他们担任蒙希(文牍员)和米尔佐(抄写员)的职务,但是,布哈拉艾米尔国的文学家们基本上互不往来,他们分别在艾米尔国的不同地区(吉萨尔、撒马尔罕、纳萨夫-卡尔希、乌拉秋别、卡塔库尔干、达尔瓦扎、卡拉杰金、巴达赫尚)生活和创作。

布哈拉的诗人们经常在一些诗歌爱好者家里和宗教学校里聚会,举行文学辩论,朗诵最新创作的诗歌和模仿前辈诗歌的作品。这样的聚会经常在阿明霍季·伊尚和拉赫马图洛·穆兹塔尔(卒于1850年)的家里以及戈夫库雄宗教学校里举行,而参加聚会的常客有索季克、哈济克、穆兹塔尔、安萨布、穆尼尔等。诗人吉萨尔、达尔瓦兹和卡拉捷金也联合起来组成这样的文学小组,关于他们的资料我们可以在阿卜杜拉济姆·索米的作品《想象力的镜子》中找到。

这一时期的塔吉克文学与十八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一样,占统治地位的是以下这些抒情体裁:嘎扎勒体诗、五行押韵诗、克塔体诗、鲁拜伊体诗、萨基-纳梅体诗和字谜诗(即穆阿莫)。在继承中世纪文学传统的同时,诗人们力求使这些体裁形式合乎所处时代的审美趣味。虽然在诗韵学、押韵法和列基夫[①]的运用方面看不出有多少明显的变化,但是诗歌的内容本身却发生了变化,例如,在嘎扎勒体诗中越来越多听到诗人们对统治者实施的不

① 列基夫,东方民族诗歌术语。以不变的形式反复出现于诗行末尾的单独的词(短列基夫)或一组词(长列基夫)。——译注

公正待遇所发出的抱怨声和抗议声。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抒情诗中得到越来越多的反映。在克塔体诗、鲁拜伊体诗和五行押韵诗中经常可以听到诗人们为不幸的人们申辩的声音。喀西达诗——作为一种颂诗结构的诗歌,正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意义,这是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文学已超越了宫廷需要的界限,而转向人民的生活。

467· 许多诗人并没住在艾米尔或可汗所属的宫廷里,而是住在彼此相隔很远的城市和乡村里,正是他们用描写农民、城里人和工匠日常生活的鲜艳诗歌画面丰富了塔吉克诗歌。

这一时期史诗体裁也得到很大发展,例如,创作这类史诗(即韵律对句)的有米尔佐·索季克·蒙希的《沙皇们的陵墓》、马先霍·博伊苏尼的《拉诺与泽博》、伊索·巴达赫希的《韵律对句—和玛夫尊》、阿赫卡尔·巴达赫绍尼的《莱伊丽与马季农》等。在这些史诗中运用不同程度的写实和艺术技巧刻画出历史和时代的各种特征。朱奈杜拉·哈济克的史诗《尤素福和佐列哈》对传奇题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和以前一样,文学仍沿着双语创作的方向向前发展。如果说在贾米和纳沃伊时代(十五世纪)突厥语诗人,其中包括纳沃伊本人、苏海利和哈约利,他们除了用母语创作外,还用塔吉克语进行创作,为丰富塔吉克文学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么,现在塔吉克诗人用双语编写自己的诗集,也为乌兹别克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的创作证明了塔吉克—乌兹别克的文学关系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而这种关系一直深深地延续了几个世纪。

大约从十八世纪中期开始,在塔吉克文学中所谓的“印度风格”成为诗歌中的重要流派之一,十九世纪以印度波斯语诗人贝迪尔(1694—1721)的名字命名为“贝迪尔主义”。这种风格的特点是具有异常细腻、复杂和独特的哲学概念。许多塔吉克诗人沿着贝迪尔开创的道路进行创作,但是一些诗人(亚克季尔、希季拉特和拉姆济)只是在形式上利用贝迪尔的修辞手法;而另一些诗人(沙夫基、哈斯拉特、阿夫贡、索季克和法诺)则模仿贝迪尔的创作技巧,像他那样反对暴政和专制。

但是,十九世纪的文学面临着许多新的难题,只依靠贝迪尔的创作原则是不可能解决的,所以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诗人们开始寻求新的艺术手法。为了创作出使广大读者和听众易于理解的诗歌,诗人们将哈菲兹的嘎扎勒体诗所具有的表意明白和内容充实的特点与贝迪尔的诗歌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比喻手法结合起来。古典作家们的经验在这些探索中也总是非常有益的,例如,贾米的思想“不应该忘记被压迫者的眼泪”就被索季克在自己的诗歌中发展成为一句严厉的警告:“你要永远牢记苦难者充满泪水的眼睛,因为这些眼泪能够汇成一条滔滔大河;一旦冲出堤岸,河水就会将整个世

界淹没。”哈菲兹梦想“击破旧的无忧无虑的苍穹，为新的天空奠定基础”，而索季克则把蓝色的天空比作一个翻倒的大高脚杯，“最好把这只翻倒的大高脚杯掷向坚石，摔得粉碎”。在诗歌中越来越强烈地响起同情人民的主题，涌现出许多反映“一贫如洗的流浪汉”的现实生活画面的诗歌，这样文学的民主化进程就明显地开始了。

布哈拉艾米尔国、科坎德汗国和花拉子模汗国之间劳民伤财的战争以及当地封建主之间无休止的内战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处境。出身于贫农的福利格・希索利这样写道：“国家毁灭了，荣誉和良心也随之消失，/人民衣不遮体，就像路灯罩着破灯罩一样……”

反映被压迫者的命运——这是福利格・希索利的重要创作主题。他的抒情主人公向上帝大声疾呼，希望那些像自己一样贫苦不幸的人永远也不要来到这个世界来。托什霍贾・伊尔西写道：“清晨我以露水代茶，/晚饭时我仍饥肠辘辘，/我幻想着有一锅手抓饭突然沸腾，/我屏住呼吸，努力使自己摆脱诱惑……”

在诺先赫・库利亚比（卒于1830年）的嘎扎勒体作品中描写了人的屈辱无权地位：“敢于向艾米尔抱怨自己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得到的只是一顿迎头棍击”。在另一位库利亚布诗人阿卜杜拉希姆的诗歌中生动地描写了一个负债累累的穷人形象：在他的庄稼地里“除了痛哭、侮辱和痛苦外”什么也长不出来。他的外貌也被鲜明地刻画出来：他耷拉着脑袋赤足站着，衣衫褴褛，而两只眼睛和整个外表都流露出一种俯首听命和无能为力的表情。

在塔吉克后期古典文学中，人的形象基本上是被抽象表现出来的，现在诗人们则尝试着把人的形象个性化和具体化。阿卜杜拉赫蒙・加尔米（1784—1853）、诺季姆・伊斯特拉夫沙尼就是两位描写穷人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诗人。愤世嫉俗的诗歌在其他诗人的诗集中也不少见，例如，把毕生精力献给山民的马杜姆・达尔沃济，其诗集里充满了关于“满含泪水的眼睛”、“极端衰弱的躯体”、“石头般硬的枕头和刺满荆棘的褥子”的哀伤诗歌。

诗歌语言的丰富也得益于方言，生动活泼的民间语言越来越常渗入到诗歌中。文学的这一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谜语体裁中，希季拉特・布哈里和法诺・乌罗捷帕季在谜语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谜语中可以使用一些农民和手艺人的语言和概念，而按照高雅诗歌的标准这是不能容忍的。 ・468

由于俄罗斯与中亚之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巩固和加强，在塔吉克文学中首次出现了俄罗斯主题，在许多史诗作品中可以发现对俄罗斯某些城市以及各族居民生活方式特点的描述，而在抒情诗中出现了一类新形象，即

具有欧洲人外貌的美人形象。

对俄罗斯各族人民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更为详尽的描写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文学中就已经较常见到，尤其是在杰出的塔吉克启蒙主义者艾哈迈德・多尼什[①]的创作中。

第四章 土库曼文学

十九世纪初土库曼人迁居到西至里海东到阿姆河右岸的地区，包括现在的土库曼斯坦全境，以及现在的伊朗和阿富汗的某些地区。部分土库曼部落居住在乌斯秋尔特和曼格什拉克，那里除了他们之外还居住着哈萨克人。十九世纪土库曼人还过着半定居式的生活，并且按照经营家务的方式分为定居人群(庄稼人)和游牧人群(放牧人)。这一时期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从而促使土库曼人的民族自我意识不断觉醒和提高。

邻国的封建统治者们不断进行掠夺和侵犯，并且使用暴力手段将土库曼人驱逐出家园，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时期极为常见的现象。例如，希瓦可汗穆罕默德・拉希姆对卡雷卡拉居民的侵犯就是土库曼民族历史上的悲剧性一页。在这次侵犯中死了许多和平居民，家园被洗劫，而大部分居民被俘虏到希瓦汗国。在俘虏中有伟大的诗人马赫图姆库利的外甥爱国诗人泽利利，他在许多诗中都真实地描述了民族的悲惨命运。

这一时期土库曼与俄罗斯的联系加强了。土库曼人民的进步思想代表们努力接近俄罗斯人，因为他们认定俄罗斯人是他们反抗强大封建军事统治者压迫的有力支柱和保护者，这种合乎规律的历史趋势具有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十九世纪下半叶土库曼斯坦并入俄罗斯，这是土库曼民族历史上极其重大的事件。1803 年里海沿岸的土库曼人第一批被接受加入俄罗斯国籍。由于这种举措，俄罗斯在里海地区获得了发展商业联系和巩固自己地位的必要战略基地，而沿岸的土库曼人则摆脱了波斯和希瓦汗国的侵略。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作家和旅行家的作品中就出现了土库曼人的形象，例如，1842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的《沿大陆和海洋漫游者》一书中，收录了伊・彼・科瓦列夫斯基(1809—1868)[②]的随笔《土库曼人拉赫曼・阿亚兹》，书中描述了土库曼青年与塔吉克姑娘的爱情悲剧。

---

① 艾哈迈德・多尼什(1827—1897)，塔吉克作家、启蒙哲学家，著有讽刺作品《贵族布哈拉曼格特埃米尔简史》。——译注

② 伊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俄国旅行家。1847—1948 年曾在非洲东北部进行考察。著有蒙古和中国游记。——译注

在尼·尼·穆拉维约夫(1794—1866)[①]的《1819—1820 年土库曼和希瓦汗国旅行记》一书中引用了作者听到的一则关于沙谢涅姆与加雷普的爱情故事,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土库曼民间高加索四行诗[②]《沙谢涅姆—加雷普》的最早记录。普希金通读了穆拉维约夫的这部书,并饶有兴趣地研究过中亚各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和文化。

这一时期,中亚、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突厥语文学之间的相互联系得到发展,在丰富突厥语文学的过程中,纳沃伊、富祖里、马赫图姆库利、莫拉涅彼斯和其他许多诗人起了重要作用。他们以东方诗歌优秀大师们的嘎扎勒体诗和高加索四行诗这两种流行的诗歌形式为基础,创作了大量的纳济列体诗和塔赫米斯体诗。马赫图姆库利、莫拉涅彼斯和凯米涅的诗歌受到普遍喜爱,它们常被作为民歌演唱,并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例如,十九世纪上半叶马赫图姆库利的诗歌在流传过程中,卡拉卡尔帕克歌手阿基别特起了重要作用,十九世纪卡拉卡尔帕克的诗人们继承了阿基别特的这一高尚传统。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一些土库曼民间口头作品和文学作品首次被翻译成多种欧洲语言。1842 年作家兼外交家 A. 霍济科-博列科(他曾是俄罗斯驻吉兰省的大使)将马赫图姆库利的三首诗译成英文并在伦敦出版,同时附上了关于诗人的简短资料,以及民间叙事诗《基奥尔格雷》的一个片断。这部英文版的叙事诗成为俄文译本的基础,由 C. C. 佩恩翻译并于 1856 年在梯弗里斯出版。 · 469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土库曼人文学是前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民间口头创作传统的合乎规律的继续,而且首先是伟大诗人—思想家马赫图姆库利创作传统的继续。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密切接近人民的现实生活,了解其各种渴望和斗争。日常生活和历史具体事件在谢伊季和泽利利的爱国主义抒情诗以及凯米涅的社会讽刺作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

土库曼文学的体裁在这个时期变化很小,但是在那些与深化生活内容有关的高加索四行诗中可以看到叙事诗因素的发展,例如,谢伊季就尝试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素材进行高加索四行诗创作。诗人在高加索四行诗《我的两位亲人》中叙述了自己的家庭悲剧和深深的痛苦,以及儿子们的英年早逝。谢伊季以精湛的技艺完成了这部诗作。诗人塔雷比的高加索四行

---

① 俄国步兵上将。十二月党人亚·尼·穆拉维约夫的弟弟。拥护废除农奴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1854—1856 年任高加索总督和高加索军团总司令,指挥攻克卡尔斯(1855)。——译注

② 高加索各族人民诗歌家所作的诗的流行形式,每几节四行,且有多种韵律,每四行用同一个结尾。内容通常为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件。——译注

诗《塔雷比与萨希普贾马尔》也是以作家自己的生活波折为基础创作的。如果说在浪漫主义高加索四行诗中虚构的人物是其主角，那么在这里诗人及其爱人则是主角。但是塔雷比的高加索四行诗与沙本德、马格鲁皮[1]和阿散蒂[2]的高加索四行诗相比，其情节丰富的结构以及对主人公在达到目标的道路上所发生的故事的描述，与后者对传奇主人公的各种奇遇和冒险的传统描写没多大区别。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中多种多样的抒情诗体裁占一定优势，其中占重要地位的是有关历史—爱国主义、爱情、训诫—教导的情节和主题。包含历史内容的爱国主义诗歌具有革新的特点，因为它善于展示各种战斗场面。爱情抒情诗、风景抒情诗和哀思抒情诗像以前一样继续向前发展，甚至出现了四行哀诗；讽刺体裁和对口吟体裁——一种相互对唱的诗歌体裁，也丰富起来。还产生了许多新体裁，例如讲述当前重大事件的诗歌书信体、与凯米涅名字有关的讽刺和幽默诗歌故事—笑话。与上一个时期相比，颂诗和纳济列体诗很少见。

书面文学语言与大众语言进一步接近。这个过程的基础是由马赫图姆库利奠定并由其同时代人——阿散蒂、马格鲁皮、舍伊达伊加以丰富的。书面文学语言摒弃了大量的古语和鲜为人知的阿拉伯—波斯语词汇，它们曾充斥了过去的整个诗歌领域。

马梅德维利·凯米涅(1770—1840)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土库曼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诗歌以及自传故事、笑话和传说的题材广泛而多样。他描写土库曼人民的生活，并站在其立场上对正在发生的各种事件作出评价。凯米涅的创作具有深刻的大众化特点。凯米涅及其抒情主人公在困难面前不灰心、不气馁、风趣幽默、笑口常开。他塑造了穷人、死刑犯、妇女、军人、伊斯兰教士和伊尚的鲜明生动形象。凯米涅是在具体的情节和活动中描写各种人物和事件的。诗人利用丰富生动的民间语言，并引用大量的谚语和俗语，痛斥部落的上层人物，谴责伊斯兰宗教和法庭的伪善、腐化、贪婪。

凯米涅本人的名字经常可以在各种笑话中遇到，其中许多笑话在东方家喻户晓、广为人知，凯米涅的名字可以与其他许多民族的哲人名字(例如

---

① 库尔班纳利·马格鲁皮，十八世纪土库曼诗人。他的英雄史诗《优素普和阿赫麦特》在整个中亚地区流传很广。另著有叙事诗《阿雷别克和巴雷别克》、《图卢姆·霍扎》、《多弗列季雅尔》等。——译注

② 穆罕默德-加里布·阿散蒂(约 1712—1780 年)，土库曼诗人，著有高加索四行爱情诗《莱伊丽和马季农》，歌颂阿塞拜疆诗人的长诗《涅西米》。——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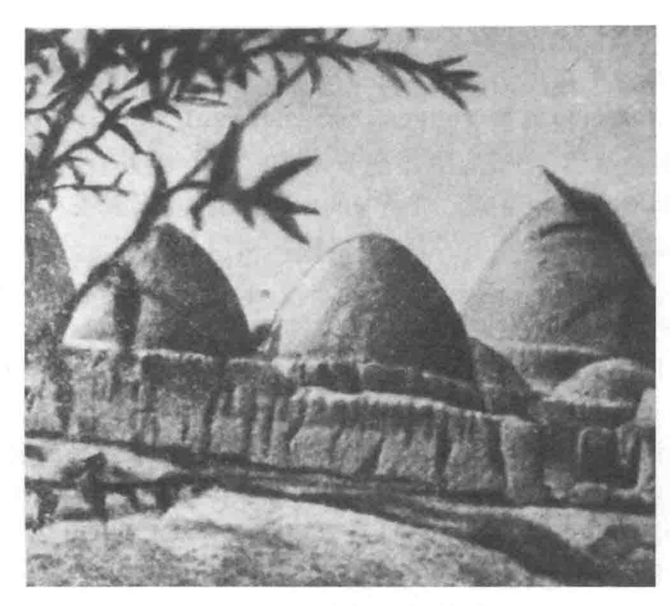
莫拉·纳斯列金的名字)相提并论。

凯米涅热衷于运用民间文学中十分流行的四行诗形式——穆拉巴,但在他的诗歌中也可以遇到五行诗——五行押韵诗。他的五行诗语言绘声绘色,借喻和明喻鲜明清晰,韵律丝毫不差,例如《大镰刀》、《少妇》、《奥古利比克》、《久利贾马尔》,等等。凯米涅的作品广为流传,大受称赞。

赛伊德纳扎尔·哈比卜-霍贾奥格拉·谢伊季(1775—1836)的生活之路是一条军人—诗人、爱国者—诗人之路。谢伊季曾担任土库曼特种骑兵首领,他们同布哈拉国的艾米尔海达尔(米尔·海达尔)的大军进行过殊死的搏斗。在同敌人进行激战时他表现出了英雄主义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反抗侵略者的正义斗争鼓舞诗人创作出许多充满英雄—爱国主义激情和崇高勇敢精神的诗歌。谢伊季在自己的诗歌中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利益,歌颂了他们的思想和期望。诗人在许多诗歌中都描绘了祖国的秀丽景色,对他来说,道路、沙漠和土地都是一样的,只要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就能将这片沙漠变成富饶肥沃、繁花似锦的土地(诗歌《沙漠》)。在谢伊季的抒情诗中社会—哲学主题和公民主题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他既是一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热情揭露者,又是一位描写真挚爱情的著名诗人。在他的创作中占相当重要位置的还有哀诗(用这种体裁创作了一系列关于诗人家庭悲剧的作品)、告别诗(同布哈拉国的艾米尔作战失败后背井离乡:《如今再见》、《列巴布》、《我们永远离开了》),以及一首遗言诗《永别了》。在哀诗方面谢伊季继承了马赫图姆利里以及十八世纪其他一些诗人的传统,他们曾创作了许多精湛的哀诗典范。 ·470

十九世纪,在多夫列特马梅德·阿扎季和马赫图姆库利父子俩的诗歌传统的继承者中库尔班杜尔德·泽利利(1780/85—1846)以其卓越的才能和英雄主义激情而显得出类拔萃。诗人与来自土库曼东部的移民谢伊季友好交往。他们出生于不同的土库曼部落,彼此相距数百公里,却心心相印。泽利利的抒情诗题材丰富、多种多样。与谢伊季一样,在泽利利的创作中占重要地位的是热爱祖国的主题以及土库曼各部落团结一致共同抗敌的主题。泽利利还写了许多抒情诗,赞美心上人的美丽和优雅。但是在他的创作中有不少社会揭露性的诗歌。由于追求公平、渴望土库曼各部落友好相处,促使诗人对落后的宗法封建制度以及可汗、艾米尔和沙赫的残暴行为进行批判和揭露。诗人相信社会压迫和不平等现象定会消灭,相信人类有权利生活在应有的社会条件下。

泽利利与谢伊季之间的诗歌信函别具特色。在写给谢伊季的诗歌信函中,泽利利讲述了被希瓦可汗俘去做俘虏的土库曼人的悲惨命运。在回信《我的泽利利》中,谢伊季因无力帮助自己的朋友及其同村人而深感悲伤。



马赫图姆中等宗教学校 南花剌子模 十九世纪

莫拉涅彼斯(1810—1862)在土库曼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作品思想明确,形象具体,语言淳朴富有诗意,被人们交相传诵,遍及土库曼的穷乡僻壤,也享誉整个中亚地区。

诗人不仅努力揭示自己男女主人公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而且也描述他们的外貌、衣着、周围环境等等,并强调他们热爱劳动,尽心尽责,忠于爱情。诗人说,为了心爱的人,他甚至不畏惧"地狱烈火",而爱人的美貌是任何东西都无法与之相比拟的。幽默诗《用拳头威吓》的形式独出心裁,它采用了一位年轻小伙子提问而一位妙龄美女作答的形式。两位恋人的对话迅速机敏,机智俏皮。

高加索四行诗《左赫烈与塔席尔》是莫拉涅波斯以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的有关青年塔席尔与少女左赫烈的爱情悲剧的同名民间传说和高加索四行诗为基础创作的。但是诗人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它们,而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重新加工,增加了新的形象和情节线索,并将作品的内容与当代现实、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以及土库曼文学和民间创作传统联系在一起。莫拉涅彼斯的这部四行诗是土库曼文学的经典之作。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诗人中应当提及的还有讽刺作家穆拉德·塔雷比(1766—1848)的名字。凯米涅和塔雷比是朋友,他们经常一起在土库曼旅行。所到之处他们亲眼目睹了劳苦大众的悲惨乞讨生活。两位诗人同心协力,对巴依、可汗和别依老爷这些统治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人民光

明未来的深深信念使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凯米涅写道:“你不要着急,我可怜的心儿,你要等一等,/我们摆脱贫穷的时刻定会到来。”他的同时代人塔雷比响应了他:“对巴依不要心存希望,/这种希望不会永久,相信吧,——贫穷定会离去!”

哈塔姆、巴赫雷、舒库里等诗人也以自己出色的作品丰富了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土库曼文学。

哈塔姆(1740—1824)是曼格什拉克州土库曼人的移民,他的文学遗产主要由诗歌一书信组成,在其中诗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作出了反应。他不止一次去过阿斯特拉罕,也参观过高加索的一些地区,所以在他的诗歌中贯穿着许多与其他民族生活密切相关的新题材。

奥韦兹穆罕默德·巴赫雷是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上半叶的土库曼诗人,他是居住在布哈拉周围的土库曼人的移民。从某一点上说他只创作了唯一的一部长诗《九幅风景画》,以及自传内容的高加索四行诗《苦行僧巴赫雷》。长诗《九幅风景画》是根据在东方广为流传的有关被母狮抚养大的沙尔扎杰王子的故事情节创作的一部讽刺作品。有一位大臣妄想使沙皇失去继承人,便居心险诈地杀死了王后。沙尔扎杰长大成人后,惩治了这位凶狠毒辣的大臣。这个传统情节的个别片段在俄罗斯民间作品中也可见到,其中在一则传说中讲述了母狮如何抚养沙皇的儿子。

阿布德舒库尔·舒库里生于十八世纪末期,他的作品主要是以爱情和社会为题材。他匠心独具地将与其同时代的社会比作一个旋转的圆环,在上面过得舒舒服服且坐得稳稳当当的只是那些本身就像圆环一样弯曲的人,即那些虚伪和可耻的人。舒库里十分了解宫廷的生活习气,因此在一系列韵律对句中他义正词严地揭露了弥漫在封建统治者中间的谎言和伪善。

十九世纪上半叶土库曼文学总的发展趋势表现在抒情诗和叙事诗内容和题材的大众化上,表现在艺术表现手法的明显革新上,也表现在对民间创作和古典作家传统的更广泛的关注上。

第五编　中欧和东南欧文学

本编序言

十八世纪末，在西欧各国（荷兰、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完成的同时，中欧和东南欧才刚刚开始积聚革命的力量，甚至还不见革命的先兆。诚然，早在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已经废除了农民的个人依附关系，虽然没有摧毁封建关系的整个基础（部分保留了沉重的徭役），可毕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些条件，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奥斯曼帝国实行的军事采邑制度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革，而各地反封建、反极权的运动却在增长。

中欧和东南欧矛盾的特点表现在民族关系上。该地区几乎所有民族都生活在外族的压迫之下。希腊、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下，阿尔巴尼亚、多瑙河流域的小公国（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则与其有依附关系。巴尔干半岛只有小小的、风雨飘摇的岛国黑山还保持着独立。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和其他民族组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一部分。其中大多数民族早在几个世纪前就丧失了独立。波兰于十八世纪末由于内部封建势力的纷争失去了独立，并被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瓜分。

一般来说，西欧民族的形成，在早些时候，或是由民族学意义上的同种组成（法国），或是在为独立而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在统一民族的基础之上（德国、意大利）。东欧则刚好相反，很早就存在着由不同民族组成、种族成分复杂的国家，这些民族又大多曾受强大邻国的奴役。同时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有时甚至只占人口的少数，比如奥地利帝国。外族对巴尔干半岛的压迫尤其残酷。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宗教信仰（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发生了矛盾。在这里封建统治阶级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民族代表组成。民族与社会的分化常常是吻合的：中欧的几个民族承受着双重压迫，比如生活在匈牙

利殖民地上的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而匈牙利人又被奥地利君主所统治。

封建制度随着被压迫民族的迅速觉醒而崩溃，在这个过程中，各民族迅速成型，解放运动不断发展，其中还有部分的反对民族和社会压迫的武装斗争。这些运动的热情具有那种在法国大革命及其随后年代中普遍笼罩着欧洲的气氛。一些外部事件也发挥了作用，例如奥斯曼帝国在与俄罗斯的战争中屡战屡败，拿破仑战争时期有的民族（斯洛文尼亚、波兰）产生了自治愿望，俄军又击溃了拿破仑军队，都促成了这个地区许多民族的觉醒。

十九世纪上半叶最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及标志性的解放斗争，是1804—1813年和1815年塞尔维亚起义，1821—1829年希腊起义（为这些民族的解放及其国家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以及多瑙河流域各公国起义，1830—1831年波兰起义，1848—1849年奥地利帝国革命。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叶，中欧和东南欧文学发展的主要特征，就是与解放斗争的密切联系，与民族自我认同过程的密切联系，文学发展最重要的内容是形成了民族文学，形成了民族文学语言，文学生活中新制度的形成（遍布全国的印刷厂、定期出版物、剧院等等），以及新时期文学体系的形成（在波兰较早）。

473 ·

然而，和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一起，由具体社会历史背景的特点，由个别民族以往命运而引起的差异范围，也相当之大。文学生活的社会基础并非到处一样。如果说在波兰、匈牙利（包括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存在过民族运动的贵族阶段，并给文学生活打上了深刻烙印的话，那么在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贵族阶层。由于外族的占领，它或者没有来得及形成，或者就是被消灭和被同化，转而使用别国语言、别国文化。在捷克有为数不少的小贵族登场，他们的爱国主义与其说是民族性的，不如说是地区性的，他们的观念几乎没有给文学生活留下什么影响，如果不将一些对文艺的无关紧要的庇护计算在内，影响甚至是负面的。多瑙河诸公国的贵族对文学生活的影响，则要强劲得多。

随着贵族阶级的退出，或是由于其作为民族运动基本力量的单薄，小资产阶级、僧侣和农民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这在精神生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特点，即从一开始，民族的中下层人民的世界观和民间文学就产生了深刻影响，虽然与此同时，也限制了与长期以来在文化方面取得广泛成就的贵族阶层所传播的世俗教育的接触。

第二个不同，表现为以往发展阶段的文化历史进程的特点。基本上可以分出文学发展的两种方案、两条道路，表现清晰的一条，是以波兰文学为代表，从某种程度上说匈牙利文学也是如此。第二种则以保加利亚文学为

代表。

波兰文学在十八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以前，在国家独立的条件下，经历了文化历史时期古典类型的完备形态。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运动交相出现。后者在波兰的土壤上表现为成熟的不同流派，从温和的到激进的，具有不同观念、不同形态和不同风格的各种倾向：古典主义、洛可可、感伤主义、现实主义风土记、前浪漫主义思潮。在十九世纪前十年，完成了向浪漫主义的转变，浪漫主义也是在这里成长为一个强劲的、鲜明的文学流派。

而那些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外族压迫，自己的文化历史发展受到压抑的民族，他们的文学生活却是另一番图景。其文学发展阶段似乎不够完整，或者说其发展趋向是以一种微弱的状态出现的。在文字语言几乎停止发展的前提下（保加利亚、捷克等等），主要以口头形式或只在为数不多的小册子中保存的本来就不丰富的语言便衰落了。随着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民族运动的兴起，文化生活也随之复兴。从此产生了"民族复兴"的概念，并被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卢日昌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用来作为整个爱国历史时期的标志，包括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在个别的巴尔干国家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

在这些条件下，文学进程具有自己的特色。有的学术著作称之为加速的文学发展。它最主要的特色之一，就是不同阶段的文学现象——文艺复兴、巴洛克、启蒙运动、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的特征同时或几乎同时出现。尤其是在最初阶段，古旧文体和现代形式共存并相互作用（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使古旧的书面语言符合现代需求的尝试，十九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文学中明显的圣徒行传的痕迹）。可以说，压缩的、断片的文学倾向，构成了一个完整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不同时代的不同类型的文学互相影响，互相催生。虽说在初期启蒙主义的因素及其相应的纯理性主义的思维类型表现得更强一些，稍晚些的是浪漫主义的世界观。它们的分野和对立较之很多其他文学而言表现得较弱，比方说，在保加利亚文学中，到现在关于是否存在过浪漫主义的争论还没有平息。民族复兴时代的文学不同类型，往往互相影响，互相交织，有时会产生具有自己特色的艺术价值；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常常能见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一些特征相融合的艺术形式。 ·474

在民族文学形成过程中似乎所有五光十色的倾向，都联合在一起了。在反抗外族压迫的前提下，这个过程的体现尤为明显。民族的自我认同表现在对民族群体的独立与统一不断增长的认识上，即在语言、文化民族学和历史关系方面。民族语言的财富，本民族的文献，历史传统，俗言俚语都

得到了向心式的综合发展，这种综合自然也包括有选择地接受外族的经验。在“他者”中意识到自己，是随着本国和外国的对比而产生的——无论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化和文学生活中一定形式的相似和掌握的意义上。

参加运动的各种不同社会力量，都力图赋予已提及到的综合以不同的社会基础。在波兰或匈牙利文学中，这种尺度分野从贵族的保守主义延伸到贵族的革命和革命民主思想。有时候，尤其是在最初阶段，神职人员以及在这一环境中曾经存在过的教育传统，起着重要作用。

建立民族文学语言，一般都是文学生活和民族自我认同的十分重要的问题，在这个时期，只有波兰人拥有成熟的和基本形成的文学语言，现在这种语言已经得到完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匈牙利人（不久前，即十八世纪初丧失了独立）与之较近似。其他被压迫民族还在为争取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权而奋斗，力图证明其文学的可能性，并建立文学规范。困难不仅在于必须对同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进行反抗，还在于制定自己民族文学语言的观念。众所周知，除了正式的国家语言之外，与之对立的有传统的教会语言或书面语言（哈布斯堡王朝的拉丁文、希腊文，以及巴尔干半岛不同样式的古斯拉夫文）。以什么作为民族语言规范的基础，还是一个尚未明确的问题。起初常常会选择独立时代的书面语言：在希腊是古希腊罗马语言，在捷克是人文主义时代（十六世纪）的语言，等等。拟古派与革新派展开了斗争。不过已经逐渐意识到以往书面语言的陈旧，而必须依靠更广阔的基础，首先是现代口语的重要性。有一个事实可以证实这个进程的复杂性，如果说奠定现代文学语言基础的观念，在捷克或匈牙利是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某个地方得以确定的话，那么在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现代语言规则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取得胜利。斯洛伐克人直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才完全实现了文学语言的独立。在希腊由于古希腊罗马的遗产非同寻常的崇高威望，向现代语言的过渡一直拖到二十世纪。如同在其他几种文学中一样，在这里的十年过程中，同时产生了运用不同语言标准的作品。

民族文学语言的形成被认为是时代最重要的任务，这给整个文学生活打上了印记。在这一地区的许多国家里，这一时期带有明显的语文学的色彩。很多大语文学家、大作家表现出同一面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如捷克的尤格曼、斯洛伐克的什图尔、塞尔维亚的卡拉吉奇、克罗地亚的盖伊。很多力量都花费在语言问题的讨论上。编纂民族语言词典、语法词典等等，已成为文学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在这一时期选择作品来翻译，也部分地成为试验和展示民族语言各种可能的愿望。

对民族历史继承性的认知，解放情绪的增长，伴随着对本国历史的兴趣

的增长，尤其是对于以往的独立性和国家性的时代的兴趣，对最重要的、抵抗外族侵略战争的历史事件的兴趣之增长。这一时期文学广泛注意自己人民以往历史上最光荣的篇章，这促进了旨在综合祖国历史的历史科学的显著发展。产生了为自由而斗争的英雄史诗作品。其中更早的一些作品，常常坚持住了古典主义的公民爱国主义标准，以及歌颂激情的基本情调。晚一些时候的作品，则表现为向浪漫主义诗学的过渡，而且拥有许多过渡的形式。英勇精神常常伴以多愁善感的基本情调，失去独立的悲伤，这被多瑙河诸公国称之为"遗址诗歌"。

把人民这个更为广泛的共同体——社会的、部族的、地区性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共同感，曾经是民族自我认同中一个重要的道德支柱。这样，巴尔干各民族人民在反抗奥斯曼帝国的斗争中就有了一定的团结。有时候甚至民族的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中心和发源地，就产生在邻国：保加利亚和希腊的文化中心就产生于布加勒斯特和俄罗斯南方（敖德萨），塞尔维亚的文化中心产生于佩斯，等等。斯拉夫各民族普遍接受了"斯拉夫相互关系"这一思想，亦即亲近的斯拉夫民族在发展自己的文化和抗击外来的压迫方面的团结一致。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诗人扬·克拉拉的诗作里，尤其充溢着这一思想。最具地区性的伊里利亚主义，则产生并流行于巴尔干半岛，主要是在克罗地亚。在这类不同的社会政治圈子中，观念和思想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从激进的到保守的。

中欧和东南欧各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民间文学表现出的极大兴趣。民间创作渐渐地被认为是真正的民族文学发展中无可替代的源头。人们从中看到了民族的独特艺术、道德理想、人民审美趣味的宝藏。在这方面，德国哲学家赫尔德及其思想享有巨大的声望，即人民的民族独特性表现在民间文学之中。这一时期的许多诗人，同时也是民间文学的作者，民间创作的收集者和出版者：在捷克有切拉科夫斯基和 K. Я. 爱尔本，在斯洛伐克有扬·克拉尔，塞尔维亚有卡拉吉奇，稍晚，在保加利亚有米拉季诺夫兄弟，以及其他国家的诗人等。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惊异地发现了塞尔维亚民族史诗这一瑰宝。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民间文学中的英雄史诗作品有着特别的意义，它歌颂了为自由而战——有巴尔干民族的约拿史诗[1]和卡尔杜克[2]史诗，希腊的解放斗争颂诗，斯洛伐克的斯波依尼茨颂歌，希腊的克列夫特颂歌。文学从民间诗歌中广泛汲取了众多主题、情节、形象，掌握了一些诗歌的形式和表现手段。民间文学作为真正的人民创作，

---

① 保加利亚中世纪英雄史诗。——译注

② 古时巴尔干反抗土耳其政权的游击队。——译注

作为民族风格和社会抗争的基本载体，在这一时期有时甚至得到比职业文学创作更高的评价。那个时期的有些诗作是在同民间诗歌的竞赛中，或是在其强烈影响下产生的，比如说，捷克的汉卡和林达的神秘主义文学，作为古代典籍而发表的王室手稿和绿山手稿都来源于民间文学。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对民间文学中的人民——社会诗歌，尤其有深刻的理解，他的诗歌从民间创作中汲取了很多养料。

包括那些文学潮流和文学进程的阶段都不是那么清晰的国家在内，文学发展的共同方向，如同在整个欧洲一样，表现于从启蒙主义—纯理性主义的思维转向浪漫主义思维。在东欧很自然地产生了对反改革的中世纪宗教神秘意识和精神压迫的反抗，从全欧洲，尤其是法国启蒙运动吸收了很多推动因素。从不同的特征中可以觉察到，在这里同道德哲学的说教相比，公民——英雄史诗常常处于第一位。在被压迫国家的文学中，启蒙主义理性和天赋权利的理想，成为要求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我认同的理由。那些过去由于外族压迫而使文化历史的发展受到削弱或受到限制的民族，如今特别重视实际活动，重视备受压迫民族的教育水平的提高。因此，比方说在保加利亚文学中，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才是启蒙主义的基础阶段，教诲的、“教导性”的原则得到特别强烈的表现。

东欧国家浪漫主义的现象，不仅表现在整个欧洲浪漫主义发展的共同倾向中，可找到它的许多变种的相似之处，有时还表现出重要的独特性，有的方面强一些，有的方面弱一些，在这里，浪漫主义的发展不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获得胜利或资产阶级革命气数已尽之后，不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出现了矛盾的前提下，而是在这场革命的基本问题还没有解决，在社会、大学的进步力量的意识中还存留着虽然已行将耗尽，却仍无法根除的封建准则的前提下产生的。生活在革命前的热情高涨和民族解放运动氛围下的东欧浪漫主义者，其创作中已经渗透了对封建制度和专制进行抗议和斗争的精神。众所周知，文学中所反映出的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关注，尤其是在初期，比西欧文学要弱得多。这里在一定程度上还感受不到启蒙主义者设想中的失望。浪漫主义对未来的追求经常体现为其富有表现力和反叛的发展（经常利用古典主义诗学的成分）。社会政治环境的特点，逐渐发展的解放运动的氛围，尚未明确显现的资本主义道路前景的模糊性，这使未来社会的矛盾问题被推到了次要地位，并且对避免这些矛盾的可能性抱有各种幻想，仿佛感到，随着民族压迫的消除，民主改造的进行，就能产生出一个完满、和谐的社会。

浪漫主义世界观在这些国家的文学中，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叛逆精神，一种对自由的热情，一种英勇的斗争，一种自我牺牲和失败的悲剧，一种对民

族口语诗歌创作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通过这些诗歌,使浪漫主义者的兴趣转向了人民日常生活中独特的、个性的东西)。浪漫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一般经常和解放运动的高潮联系在一起。这在波兰、匈牙利、希腊、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的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获得特别鲜明的发展,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例如亚当·密茨凯维奇、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弗勒斯马尔蒂、山陀尔·裴多菲、彼得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Ц. 马茹拉尼奇、索洛莫斯、卡尔沃斯等的诗歌。

中欧和东南欧的前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强烈表现出来的人民的集体主义原则。作为一个反抗和确立自我的客体,这里经常表现出的并不是个性,而是战斗人民的民族集体。在和人民命运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中,经常突现的是个体。关于民族生命力的主要保护者的问题,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上层与人民、启蒙英雄和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问题。同时,在斯沃瓦茨基和扬·克鲁尔的创作中,开始了“大众戏剧”的尝试——人民、社会下层同压迫者之间永久斗争的戏剧。

欧洲这一部分的浪漫主义文学,充满了失望、忧郁、悲剧性的主题,艰苦斗争的波折,起义的失败,以及对解放无法实现的绝望。在这一方面的某个点上,与拜伦类型的浪漫主义经常发生联系,虽然东欧浪漫主义者也未能完全避免西欧浪漫主义的主要内容——个性与社会的不和谐、人的异化。由资本主义金钱关系的自发势力所引发的这些现象,在封建专制制度压迫的氛围下,也找到了相似情况,甚至这些现象在东欧民族的生活中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尤其是在资产阶级发展道路上走得较远的奥地利帝国。拜伦式的浪漫主义尤其同捷克诗人玛哈的创作相似,在某些方面也同波兰的密茨凯维奇和斯沃瓦茨基、斯洛伐克的扬·克鲁尔、克罗地亚的玛茹拉尼奇的创作相似。

在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中,有时会明显地表现出民族乌托邦的特征。比方说,波兰浪漫主义者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关于波兰民族弥赛亚的使命,部分地还表现在对斯拉夫性格和斯拉夫历史的理想化,这一点在扬·克鲁尔关于斯拉夫人相互关系的构想中也不少见。

社会中的民族矛盾,同奴役者斗争的失败日益频繁,表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团结开始破裂,这有利于克服文学中的理想化倾向,从而使之转向人民生活,对社会现实作出更为客观的分析。这些现象在现实主义倾向形成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们到本世纪中叶在匈牙利、波兰、捷克文学(在其他文学中较少)中有所表现,在一段时间内还是浪漫主义占优势。

477 ·

第一章 波兰文学

波兰文学在进入十九世纪时具有许多世纪的传统,同其他欧洲国家的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在启蒙主义时代确立的思潮——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曾经很有影响,而且流传很广。文学语言进入了革新、调整和丰富的阶段,详细地制定了民族诗学体系。

波兰由于数次被瓜分(1772年,1793年,1795年),使其丧失了独立,文学也因而处于一个新的发展条件。波兰疆土的被分割,阻碍了文学过程的同步发展,文学活动被检查制度所束缚。相当一部分文学家流亡国外,他们在那里得到了发表政治言论的机会,但与此同时,却失去了同决定道德面貌和生活方式变化的社会进程进行直接接触的机会。文学运动的中心在发生变化:十九世纪初华沙发挥着更为积极的作用,它在二十年代继维尔诺之后成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策源地。三十年代侨民文学占优势,加里西亚的文学活动很活跃;四十年代又增加了大波兰和波兰王国的文学中心。

那个时期的波兰解放运动,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波兰浪漫主义的历史与1830—1831年、1846年、1848年、1863年的民族起义相连。文学起到了联合和团结的作用,促使民族觉醒和语言发展,并着重强调了民族的精神统一,在欧洲面前证明了它的文化发展与追求自由的连续性。浪漫主义所培育的关于文学的崇高任务、艺术家的特殊使命的观念,已经在社会意识中牢牢扎根。对以语言的力量改造世界的信念(有时是被高估了的"预言家诗人"),在几代人的精神生活中留下了印记。

1. 晚期启蒙主义 古典主义 弗雷德罗

波兰分裂后,在诗歌中便迅速响彻着爱国主义的悲痛声音,以及恢复独立的号召。"军团诗歌"(关于在法国一边作战的波兰新编军队)反映了那些在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下的社会情绪,肯定了爱国主义的乐观主义,以及关于国家的衰落并非民族灭亡的思想。比如著名的战士歌曲、民族颂歌,约·维比茨基的《杜勃罗夫斯基玛祖卡》("只要波兰还没灭亡",1797年)。就波兰的土地而言,那些废除了封建秩序的地方还存在着很重要的社会任务,启蒙思想将长期保持迫切的现实意义。启蒙主义者中有许多人认为和平工作,利用华沙公国(1807)和后来的波兰公国(1815)的教育机构是必须的。启蒙主义者诉诸揭露—讽刺体裁(C. K. 波多茨基反对僧侣的蒙昧主义、无知以及小贵族阶层故步自封习性的批判小说《黑暗城市之旅》,

1820年),是具有文学形式的科学——哲学理论。世纪初,扬·波多茨基(1761—1815)在幻想小说《在萨拉戈斯找到的幸福》中,塑造了最有意思的人物形象之一。小说用法语写成(完整的波兰文译本于1847年出版),作者生前没有完整发表(面世的几章得到了普希金的高度评价)。该书的缀段性框架结构,常被用来同《一千零一夜》的结构相比,它由众多的情节线索组成,这使得冒险因素和幻想得以结合在一起,展现出不同的国家、时代和文化(情节核心是游历者的历险,历险家出现在安达鲁西亚的山里,并和摩尔人后代的秘密行为展开冲突,后者致力于使西班牙回到伊斯兰教的政权之下)。小说的哲理性(作者依据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学说)排除了令人厌烦的教诲,预设的争论和意见,对真理的不息寻求,人和历史事件阐释的具体性(扬·波多茨基是个博学者、旅行家、民族学家)。 ·478

世纪之初,在诗歌和戏剧中,古典主义的拥护者成了准则的制定者。在追求语言的纯净、形式的完美,甚至在完成民族历史题材作品的过程中,他们看到了保存文化的最重要手段。古典主义者促进了文学批评(虽说它的初衷在于搜寻短处,以反对"启蒙主义趣味"和准则),他们在文艺翻译领域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们独特的创作则倾心于颂诗、历史叙事诗、诗体寄语、劝谕寓言等体裁。叙述和教诲的叙事诗(G.特列姆别茨基的《索菲耶芙卡》,1806年;K.科济明的《波兰农事》,1839年),为展现语言风格技巧开辟了自由空间。在悲剧体裁方面,A.费林斯基的《芭尔芭拉·拉特济维尔》(1817年上演)受到了人们的欢迎,该剧建立在传统的爱情与责任的冲突上,以诗的悦耳动听和舞台语言的生动而著称。可是,总体而言,古典主义拥护者的政治保守主义也好,他们的拒不接受艺术的新思潮也好,其原因都在于他们同走上为自由而斗争之路的那一代人的追求不一致。

从那些和古典主义传统有关的题材中,十九世纪的喜剧具有重大价值。亚历山大·弗雷德罗(1793—1876)的创作源头,和启蒙主义戏剧联系紧密,以丰富的观察著称,倾向于现实主义地描写风土人情,但没有脱离古典主义的舞台准则。弗雷德罗在加里西亚生活并创作。年轻时他当过军官,参加过拿破仑战争(1812年曾被俄国俘虏),回国(1815)和结婚(1828)后,经营农业(他是一个殷实地主、伯爵),远离起义和地下运动,同样也远离了文学活动的中心。弗雷德罗的早期创作和古典主义的联系尤为明显:情节—结构设置和舞台形象结构的紧凑(直到"有意义"的名字),对前人主题的开掘。暴发户以及其同贵族圈子的关系,成了他在《歌德哈布先生》(1821年上演)中描写的对象。他在《外国迷》(1824年上演)中,嘲笑了小贵族阶层对外国新鲜玩意的迷恋。剧作者将自己的角色放在新的现代条件下,展示了他们的心理风貌和社会状况。喜剧家还拒绝了对启蒙主义戏剧

具有代表意义的教条。还在二十年代,弗雷德罗就表现出了在建构错综复杂情节上的才能,善于从人所熟知的母题和情境中抽取出意想不到的潜能,表现出了卓越地掌握诗歌的技巧以及语言的丰富性。在喜剧《丈夫和妻子》(1822 年上演)中,性格的高超描绘和丰富的滑稽场景结合在一起,没有教育意义,以讽刺的表现力描绘了上层社会的自由风向。在《太太和骠骑兵》中(1825)采用了滑稽怪诞的结构(流行的、自命不凡的厌女者的受辱母题)。《姑娘的誓言或心灵的磁力》(1833 年上演)是他心理描写最为丰富的喜剧之一,爱情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角色鲜明的个性为情节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事件的外部轮廓对于"喜剧情节"而言是很典型的,矛盾冲突强化了人物的行动,巧妙地由主人公之一(古斯塔夫)穿针引线,证实了两个姑娘不出嫁誓言的不现实。但是矛盾的起因是主人公的性格特征所引起的,作者高超地利用了"性格喜剧"的可能性。

喜剧《复仇》(1834 年上演)的主人公们生活在旧式小贵族的环境中。这些旧时代的类型被描写得如此鲜明生动,以至于有时候让人们觉得似乎剧作者很喜爱他们。在他的喜剧中没有斥责之词,没有新潮与旧风的对立。然而作者对被描写的东西的幽默表明了他冷静的目光,防止了喜剧为旧事物的辩护。为了推进角色的行动(两个邻居小贵族的吵架妨碍了一对情侣计划的实现),弗雷德罗转向了对日常生活和产业利益的描写。在主人公的追求中,在错综复杂的情节发展中,粗俗的物质利益起了首要作用,这对于作者所描绘的世界来说是很自然的。使人物形象显得可信的那些特征,主要角色的行为(刚愎自用,死缠烂打,愚昧无知,妄自尊大等等)都来自于旧时小贵族日常生活的特点,具有了怪诞的性质,营造了剧情意想不到的转变,以及一连串的喜剧情势。

479 · 喜剧《终身收益》(1835 年上演)是戏剧家现实主义敏锐性的例证。弗雷德罗围绕守财奴——收购者这一典型并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方案:对积聚钱财的病态追求迫使主人公与自己的利益背道而驰。高利贷者用很少的现金从游手好闲的败家子那里得到了继承其年终收益的权利。这一切都取决于卖方还有多少年活头的收益,高利贷者需要去扮演一个操心的监护人的角色。当败家子以自杀来恐吓的时候,守财奴害怕会失去一切,只好将掠夺所获撒手放出。弗雷德罗作出了一个多义性的结论,强调指出金钱的力量达到了荒唐的地步:贪财者通过收益从客户那里买到他的生命,并将其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弗雷德罗道出了人际关系中的复杂和阴险,道出了充斥世界的敌意和自私贪婪。

戏剧家是浪漫主义胜利的同时代人。新思潮在他的创作中既反映了描写的对象(浪漫主义的散文和平淡无味的生活的冲突),也反映了个别的情

节主题。但总的说来，弗雷德罗那清醒的怀疑主义的世界观与浪漫主义是相悖的，民主主义批评界对弗雷德罗没有好感。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弗雷德罗不再出版新的喜剧。

2. 感伤主义 密茨凯维奇浪漫主义的形成

感伤主义在波兰涉及散文和诗歌。历史小说和爱情心理小说（日记体或书信体）因而得以流行。有不少人曾试图将欧洲的经验（卢梭的《新爱洛漪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斯特恩的讽刺散文等）移入波兰土壤，感伤主义常常和前浪漫主义倾向交织在一起（像尤西安主义、"哥特式小说"在产生后不久就进入了波兰文学）。

尤利安·威尔逊·涅姆采维奇（1757—1841）的作品好比两个世纪之间的桥梁。他诉诸不同体裁，其中既有古典主义诗学预先规定的作品，又有同新思潮有关的作品。涅姆采维奇是波兰第一批叙事谣曲（《沉思》）的作者之一。在他的《历史之歌》（1816 年发表）系列中展现了波兰几个世纪的历史，歌颂了驰名的英雄和统治者（在俄罗斯，《历史之歌》得到了 K. Ф. 雷列耶夫的高度赞扬）。在涅姆采维奇的散文中感伤主义的色彩同对社会变革的关注交织在一起，同公民性和启蒙主义理想的教诲结合在一起。小说《谢采赫的二地主》（1815）的结构建立在两个主人公祖父和孙子的日记交替的基础上，作者表现了启蒙主义时代给小贵族的生活带来的变化，以及新旧教育、过去与现代风尚之间的区别。涅姆采维奇也诉诸历史题材（《丹钦来的扬》，1824—1825 年发表）。

感伤主义在为未来"浪漫主义转向"准备中所起的作用，在卡济缅什·布罗特辛斯基（1791—1835）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他的田园诗《韦斯拉夫》（1820）标志着波兰诗歌走向现实的新的一步。农民的日常生活（诚然，是理想化了的），普通老百姓的操劳和习俗在这里被看作是一种值得诗化的客体。诗人还将普通人的内心世界、情感和习惯看作美学上的重大现象。作为批评家的布罗特辛斯基，在十年代末将旧的、已经形成为文学准则的东西与新思潮的关系问题提出来讨论。这为一场尖锐的、直到 1830 年还没有停息的、"古典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奠定了基础。浪漫主义的反对者——启蒙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在新的倾向中看到了错误的哲学—政治和美学理念的结果，看到了引起现有价值和生活基础的解释，以及时而与健全思想和高雅品味相悖的荒谬。新的事物起初无法走得很远。布罗特辛斯基在《论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以及波兰诗歌的精神》（1818）一文中，描述了欧洲文学最重要的倾向，审视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

义的长处与不足，同时提出了建立于利用现有的民族（民间文学和旧波兰）传统的“中间”道路。

二十年代，当波兰地下组织展开活动时，旧的文学教条被视为政治保守主义的同伴。关于浪漫主义能够作为积极促进文学发展的潮流，能够将其提高到与欧洲同一的水平，以及表现新的社会情绪的问题，都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浪漫主义的争论具有政治的潜台词。马乌里茨·莫赫纳茨基（1804—1835）是一位最热情捍卫新潮流的批评家，同时是秘密团体的一个成员。他援引了德国唯心主义美学家（首先是谢林）的一系列论点，说明民族文学是“民族自我本质认知”的手段，要求它反映运动着和变化着的现实，维护艺术家自由创作的准则，反对把安闲恬适和调和折中的文学当作抗争和激情的诗歌。莫赫纳茨基在自己的活动中已经能够依据祖国浪漫主义诗歌的经验，这一浪漫主义诗歌在二十年代为密茨凯维奇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所创建。

480·

亚当·密茨凯维奇（1798—1855）生于白俄罗斯，是诺沃戈鲁多克一个律师之子，在维尔诺大学受的教育，大学时代他就开始写诗（第一首诗发表于 1817 年），成为青年爱国组织“爱知社”和“爱德社”的创建者和积极分子之一。当这些秘密团体被沙皇政权发现时，密茨凯维奇（大学毕业后在科夫诺任教）被捕，并于 1824 年被驱逐出立陶宛。他在俄罗斯大约生活了四年（彼得堡、奥德萨、莫斯科，随后又在彼得堡），在那里与十二月党人接近，俄国文学家对他怀有亲切友好的态度，高度评价了他的诗歌创作和即席赋诗的天分。密茨凯维奇和普希金的友好关系在两位诗人的创作中都有反映。1829 年密茨凯维奇离开俄罗斯回到祖国，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对密茨凯维奇青少年时代的创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伏尔泰，这从他早期的几个翻译和仿作中能看出来。在和“爱知社”的活动相关联的抒情诗中，教导的主题占有重要位置，年轻的同志们为了未来的事业，为了启蒙运动和民族解放（以诗歌表达的公式是：“祖国、科学、美德”）而响应精神完善的号召。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作品，表现了爱国主义者在第一个十年与二十年代之交的追求。“按计划行事，不要意气用事”（《爱德社之歌》，1820 年）的口号，反映出了为民族革命而准备斗争的青年的情绪。《青春颂》（1820 年，以手抄本的形式广为流传）在形式风格上无疑同古典主义诗学有联系，甚至作者的敌人都承认《青年颂》“从诗歌的观点来看是优美的”（科济明）。可是，《青春颂》的内容，它的全部激情，则标志着新思想的胜利。诗人的同代人还在其中发现了它和雪莱创作主题的相同之处，这些主题曾经被浪漫主义者的革命情绪所接受（不仅在波兰）。就《青春颂》作者的世界观而言，其特

点是在急速的运动中，在光明和黑暗原则的斗争中理解现实，满怀激情地向往人类的明天，当整个“世界大厦”得以修复一新的时候，青年和老年的寓意形象体现了：前者是自我牺牲精神，青年爱国者的激情及其弟兄般的团结；后者是“孤芳自赏”的胆小自私。对旧的、被束缚的世界“发霉的表皮”的否定，对“以暴抗暴”，让地球“走上新路”的号召，对由爱情与青春所产生的“精神世界”的必胜信念，以及对在“自由的霞光”出现后会升起“解放的太阳”的信念——这就是《青春颂》带给波兰诗歌的新主题。

1822年密茨凯维奇出版的诗集(《诗集》)成为浪漫主义的宣言。在前言中作者谈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历史根源，说明了它的真正民族性是文学繁荣的条件，旨在以同胞大众为对象，而不是以精选出来的精英为对象。“叙事诗和罗曼诗”系列组成了这本书的基础，这是密茨凯维奇所捍卫的文学民主主义的实际体现，这种民主主义表现于对民间文学的浪漫主义的浓厚兴趣，由于俗言俚语而丰富了文学语言。密茨凯维奇混合并重构了民间创作的主题，而首先感兴趣的是民间艺术思维的道德方面，并在普通人民的原则中看到了道德基础，创造出了一个如此奇妙的世界，在其中无辜得到了保护，而过错则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浪漫主义所“看不见的”世界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这一概念，是对现代文明与诗人的矛盾的独特反应，使人脱离自然，歪曲自然的本性，对于波兰浪漫主义而言，这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对精神原则占有首要位置的信念，可以使精神生活被认为是解决民族存在或不存在这一问题的决定性因素。民间文学被用来解释相应的“两个世界”，而它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即不将迫切的政治现实作为重点，而是将道德文化传统的生命力，现今一代人与继续在精神领域存在的“祖先世界”的联系作为重点。

叙事诗的作者表现了对启蒙主义世界观和经验主义知识的不满，而宁愿将“情感”、“信念”、“心灵”置于“理智”之前。这种偏爱说明了密茨凯维奇转向普通人民信仰的理由，而这种信仰则被看作民族存在的基础，诗意地看待世界的源泉。浪漫主义的主观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以共同的名义来说话的责任，局限于承认人民的经验和本能(甚至带有迷信色彩)的权威。在纲领性的叙事诗《浪漫主义》中产生了世界观的辩论：作为怀疑主义的代表者和平淡无味的经验主义的代表者——有学问的“老人”和“毛头小子”的争论，但是一位因苦难而失去理性的农妇却以“心灵的眼睛”，看到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诗人同农妇是一致的。

叙事诗中所叙述的东西在诗剧《先人祭》中得到了深化。对白俄罗斯民间葬礼仪式的描绘(他给了作品一个名称)——这是关于道德和责任的结论，密茨凯维奇则以农民的合唱来表现，农民的合唱要求对死人的精神进

行评判，并对他们的行为作出自己的判决。道德标准不是建立在关于自然人的理性主义概念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民对于公正的理解之上的。

民间传统为体裁探索提供了依据。幻想戏剧的“自由”、“开放”的形式，暗示了一种对新的、不受古典主义教条限制的发展基础的追求。密茨凯维奇认为，重视历来的斯拉夫的仪式是戏剧独特性的保证（他举例说明，古希腊罗马悲剧就是从古希腊人的节庆和圣礼中产生的）。除了在戏剧中引进幻想的成分以外，诗人还利用了一些宗教神秘剧的手法，同时诉诸如引进合唱、歌曲、叙事诗等手法。体裁的界线被消除了，产生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综合体裁，兼有戏剧情节和抒情独白的成分。

戏剧的第四部分就是这类独白，一种新型主人公——恋人、受难者、反抗分子被引入波兰诗歌，这无疑和近期的传统有关（现代人在捍卫情爱权利的古斯塔夫身上，看到了“波兰的维特”），然而最富于浪漫主义激情的是对金钱和地位压迫的揭露，对生活方式和个性追求之间的不和谐的抗议，密茨凯维奇认为，传统的道德对于支持饱经苦难的人，对于使个性免遭崩溃和自毁是无能为力的。

《格拉席娜》为波兰浪漫主义中的悲怆英雄路线奠定了基础，从而成为浪漫主义叙事诗（诗体小说）的第一个范本。在这里，历史主义主要表现为，试图传达出时代的色彩。以往的岁月（立陶宛人同条顿骑士团斗争的时代）成为展示社会道德问题的缘由（统治者被认为有责任与人民共命运，不允许同外敌相勾结，等等）。叙事诗的激情表现为对自我牺牲功绩的那种积极影响的深信不疑。



482 •

亚・密茨凯维奇
奥・基普林斯基作 1824—1825 年

在俄罗斯出版的那些作品，证明了诗人既对欧洲浪漫主义问题感兴趣，又力图以自己的方式来诠释它们。在《克里米亚十四行诗》中（同一系列的爱情十四行诗于 1826 年问世，以其艺术的勇气，抒情语调的丰富和风格的技巧而令读者心醉神迷），密茨凯维奇对浪漫主义的东方风格做出了贡献，也强调了不同文明的独特性和在很多方面的对立性，以及由它们所制约的世界观的类型。诗歌创作形式的精致（诗人以古典意大利十四行诗为

范本，翻译了彼得拉克的一些十四行诗），在十四行诗中对南方大自然绚烂多彩的描写与统一的抒情情绪融合在一起，同主人公——漫游者的形象结合在一起，主人公不屈服于命运的打击，向往“美丽富饶的乐土”，担忧故乡和亲人，寻找与他那反叛的心情合拍的“风暴”。在主人公身上积极参与生活的渴望占了上风：它为宿命论的袖手旁观所否定，为妥协和人在大自然面前的微不足道以及时代的不可捉摸的思想所否定。这种对待世界的态度对于波兰浪漫主义者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希望说明人不仅是外部力量附属的客体，也是反作用于环境的主体。

叙事诗《康拉德·瓦连洛特》（1828年，情节取材于十字军战争年代）的主人公，是非同寻常的、具有悲剧浪漫主义性格的杰出一辈中的一个，与拜伦叙事诗的主人公一样站在前列。密茨凯维奇高度评价拜伦（他翻译过叙事诗《异教徒》和几首小诗），并谈到他的影响波及“广大欧洲群众”：“那根奏响的弦唤醒了至今还在沉默的那些弦的声音，然而在情绪的方式上却是一致的。”密茨凯维奇的瓦连洛特的确在很多方面与拜伦（及其模仿者）的主人公有相似之处：孤独，精神上的不和谐，神秘忧郁的外部特征，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是谜一般的性格和行为，除此之外主人公的个性还被刻画得独具匠心，是在他那时代的条件和问题影响下塑造的。诗中的浪漫主义悲剧并不是建立在个性与环境的矛盾冲突之上，而是和大众的苦难有关，综观个性与世界的总联系，波兰浪漫主义者强调其民族的制约性，共性重于个性。比那种追求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受到挫折的个人悲剧高明的是，其中加入了个人作为被压迫群体中的一分子的悲剧，密茨凯维奇的诗体小说——具有历史色彩的全部色调，急剧变化和神秘的情节，抒情诗和史诗原则相融合的形式——显得既现代又具有波兰特色。诗人不囿于写出任何一种抗击外来压迫的合法理由。人民的意愿和同时代人的意志最终成为对主人公的行为（被民歌和传说所挽救）进行最终评价的标准。作品的政治意图只有一个：让年轻的爱国者们将其看成起义的号召。然而诗歌的内容更为广阔，从诗中主人公的身上可以看到密茨凯维奇目睹的一代爱国者的特征。他们在痛苦和怀疑中，在合法手段和起义之间进行选择。为了祖国而献身，他明白如果祖国没有幸福，就不会有个人的幸福，然而，他所表现出来的并非像和谐的个性那样，他把自己战斗的道路用“可怕”一词来形容。他最终成为为民族而战的斗士，但他脱离了人民：他注定要成为一个牺牲品，他为未来的复仇铺平了道路，却看不到自己胜利的果实。

诗体小说这种体裁，在二十年代的浪漫主义中已成为主流。安托尼亚·马里切夫斯基（1793—1826）的叙事诗《玛丽亚》（1828），以其悲剧的调子吸引了读者（作者本人称之为“一幅忧郁的油画”），而且被认为是具有拜

伦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品（密茨凯维奇说："这里是沿着拜伦的足迹，并与之最相近的波兰诗人最新的话语，是绝望的呐喊"）。然而马里切夫斯基离拜伦的反叛，离浪漫主义辉煌壮丽的个性与激情还差得远。

诗人将《乌克兰故事》的场景置于十七世纪，将小贵族往日的世界描绘成一个欺骗和邪恶横行，单纯和无辜得不到同情的世界。悲伤结局中的期待渗透了整部叙事诗：在自然风景描写中阴郁的色调占了主要部分；主人公们为预感而痛苦；还有对独裁统治将灭亡的暗示（《面具之歌》）。顺应感伤主义的主题和古典主义的形象（例如，修辞的拟人化：骄傲，绝望，死亡等等），马里切夫斯基将书面的浪漫主义风格同民间文学的世界观结合起来。其结构对于浪漫主义叙事诗很有典型性：场景的替换，情节的断续，描写和插叙的交替；而未说完的话和神秘性是为创建富于感性氛围的构思服务的。在主人公情绪的表达中，与情节相伴的风景描写起了重要作用。

483·

谢维林·戈欣斯基（1801—1876）是革命秘密组织的成员，他的叙事诗《卡涅夫城堡》（1828）为波兰浪漫主义中关注乌克兰的历史过去，关注人民群众反抗地主压迫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倾向打下了基础。叙事诗的情节发生于1768年（《科利夫申》）。主人公涅巴巴不仅是一个受害人，同时是罪犯，又是不幸的复仇者，而且还是伟大的社会悲剧的主角。通过对于浪漫主义主人公具有代表性的阶段（爱情，失去爱人，内心空虚，急切地去复仇，悲剧性的死亡）而表现出来的哥萨克命运，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可诅咒的命运所致，而是由时代的特点、事件、风尚造成的。戈欣斯基运用浪漫主义诗学特有的手法（情节发展的神秘性，对可怕的、非同一般的犯罪与非理性的描述），试图解释他所描绘的事件。他看到人民起义的原因在于贵族的压迫。莫赫纳茨基写道："他想表明历史事件保存于当地居民的传说中……"在叙事诗的结尾，作者提醒道，恣意妄为和残酷至今还没有从它们完成的"那些罪行"的世界上消失。

3. 1831年后的浪漫主义　流放中的密茨凯维奇

1830—1831年的起义，最终决定浪漫主义的思想面貌及其在文学中的胜利。"民族文学"的口号被顽强地提出来了。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民主思想倾向于将民族性和人民性（革命性、社会性、通俗性）等同起来，致力于加速民族和通俗因素的结合，以便使"民族性"涵盖主题、内容和形式。文学的任务被认为是号召人民进行新的革命。诗人作为民族的精神领袖的概念得到了确立。"诗歌—事业"成为一种理想，其作者如密茨凯维奇在晚年所言应当是"神圣的"。刚好是在三十至四十年代，进步的思想家和艺术家提

出了与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口号。民族斗争的经验及其成功与失败，迫使人们力图阐明历史事件的意义，思考人民群众的地位和作用。1831年起义失败原因的思索，浪漫主义历史上的新阶段开始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吸引着一批对时代需求敏感的艺术家（作为政论家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四十年代国家的一些文学家）。

波兰的特殊状况，与先进国家相比的社会思想的不成熟，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考现实的方式，如具有特意表现出来的波兰中心主义性质的各种弥赛亚观念。波兰的弥赛亚思想将人民的苦难解释成为宿命，以及波兰的特殊作用，其意义在于像基督那样的受难，为人类赎罪，从而开创一个大同的、和平的和民族之间有新型兄弟关系的纪元。它的实现取决于艺术家的思想立场是号召大众希望和忍耐，还是号召大众参加同独裁的斗争。诗歌中的弥赛亚思想在世纪初已初露端倪，三十至四十年代它们已体现在最伟大的流亡诗人的创作中。

亚当·密茨凯维奇在国外度过了他的后半生（他于1855年在去康司坦丁诺波里的旅途中去世）。诗人没有参加1831年的起义（他当时从意大利前往大波兰，所以没能越境前往波兰王国）。1832年在法国定居后，他以记者的身份出现（任职于《波兰朝圣者》报社），于1840—1844年间在巴黎教授斯拉夫文学课。对神秘主义的迷恋（1841年诗人成为A. 托扬斯基创建的教派中的一员），使诗人有好几年时间离开了革命和文学活动，但是他积极参加1848—1849年的事件，并以波兰地区组织者的身份为意大利的自由而战斗，也成为法文国际民主主义报纸《民族论坛》的编辑。

在《波兰民族与朝圣者之书》（1832）中，在以《圣经》风格写成的韵文散文中，密茨凯维奇叙述了弥赛亚的历史概念。波兰的历史和国家的思想被作者在很大程度上理想化了，在这里波兰被看作是上帝选中的民族，向世界传布自由思想，因此而受到君主折磨的民族，又是在世上复活正义使命的民族。然后又关注有关波兰移民的寓言，依密茨凯维奇的说法，他们的使命是成为解放斗争、自我牺牲精神的使徒。“波兰人对人民说：那儿是灾难深重的祖国；无论在欧洲的任何地方，只要那里压迫自由，并且有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那也就是为祖国而战，大家都要投入这场战斗。”在自己激进的政治乌托邦中，密茨凯维奇不仅作为一个“嘴上说着自由，却在为独裁服务”的资产阶级政客的揭露者而存在。在《朝圣者之书》的最后部分《朝圣者启应祷文》中还有这样的话：“哦，上帝，我们为了各族人民的全民战争而向你祈祷！” ·484

这些思想的综合奠定了《先人祭》（1832）第三部的基础。戏剧的“开放”结构，幻想的重要作用（《先人祭》中的主人公是人、天使、魔鬼——他

们展现出两个世界：现实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以及1823年的问世的新作，使主人公的共性接近了起来，但其中的思想是在起义之后才产生的。构思的宏大（诗人想回答人民的未来和给他们的牺牲带来的意义问题），决定了形式的新颖，独特体裁的综合性。《先人祭》的场景与其说是由发展中的情节组成，不如说是由作者对事件的解释组成（奠定情节基础的是爱德社小组活动结果的片断）。这种结构的零乱和分散，不断更换的场景，打破了读者习惯的基本结构，但是从思想感情的一致方面得到了补偿。在现实世界和幻想世界之间来回交替的场景，明显地表现出了它的双线索。关于不久之前的历史事件的故事有时候达到了悲剧的顶峰，带有英雄—悲怆的和讽刺—怪诞的调子。人物性格是以角色在善与恶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划分的。在体裁方面，密茨凯维奇独特地熔历史剧和哲学伦理剧为一炉，运用风格迥异的体裁（歌剧、宗教神秘剧、讽刺喜剧的因素，等等），在文本中记入了叙事故事，抒情独白，宣传鼓动歌曲。在词汇结构上，广泛运用风格大相径庭的因素以造成多层次性（从《圣经》弥撒式的表述到在言语中夹杂外来词及俗语），“语调和韵律的变换”是为诗人丰富的情感需要服务的。

戏剧的中心形象是诗人和反抗上帝者康拉德，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自传性。（在《先人祭》的第四部分中古斯塔夫便转变为这样的形象）。康拉德感到自己的感情具有异乎寻常的力量，能够“为百万同胞”去爱、去受苦，并号召同统治全世界的恶势力进行战斗。在那段热情洋溢的即兴独白中，他指责上帝对人类的苦难漠不关心，向他索要“控制灵魂的力量”，以解救自己不幸的人民，最后以严厉的指责而结束：“你不是世界之父，而是沙皇。”

密茨凯维奇同《即兴独白》中反抗上帝这一思想的争论，对于波兰浪漫主义中人的观念是富有代表性的，波兰的浪漫主义将个人追求与民族和世界秩序的冲突加以比较，因为个性被它叙述为既像宇宙间善恶斗争的战场，又像这场斗争的武器。恶与善的精灵在争夺康拉德的灵魂。诗人指责他具有魔鬼似的骄傲，谴责他依靠主观主义理想去拯救人民，而未能深入到人民的内心深处，陷入了失望之中，不去相信历史的崇高意义。诗人同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展开争论。康拉德关于上帝的概念在争论，但上帝并没有去干预——按照自然神论者的历史哲学思想——人类的命运，历史的进程。密茨凯维奇认为，这种观点使同胞对未来失去了信念，这等于是投降。因此他开始解释康拉德的个人主义的缺点在于信仰不足，并塑造了一个天主教传教士彼得的形象，作为康拉德的反对者。彼得被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平民民主主义基督教的代言人，并被赋予了先知的才能（诗人用弥赛亚精神来解释不久前的过去和未来）。

密茨凯维奇以巨大的艺术技巧在塑造秘密团体成员的群像中，体现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概念。他使青年朋友处于执着的爱国主义光环的氛围之中，赋予他们以勇敢和谦逊，以及在解放事业重新开始的岁月里所需要的全部重要品质。在塑造维尔纽斯青年的同时，他着力描绘了参加起义的华沙人。在其中的一幕里，他将无名的俄罗斯军官，十二月党人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表现为波兰人的志同道合者。《先人祭》的作者还以政论、怪诞的精神表现了青年们的迫害者，沙皇的奴才，祖国的叛徒，使他们具有行径露骨和恬不知耻的特征。

这条讽刺揭露的线索是对史诗剧《断章》的承接。这是关于俄罗斯的组诗，是以辛辣抨击为主要特征的、独特的旅行日志体写成的。诗中描绘了广袤无垠、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原野，军队沿着它们行进着，装载了囚犯的带篷马车飞奔着；描绘了首都的大街，在那里沙皇、贵族和官员在散步。描绘了沙皇军队的检阅式，一幅与人民格格不入的独裁制度的阴暗图景。在谈到 1824 年彼得堡水灾的时候，诗人将它视为沙皇专制在不久将来必然崩溃的象征。政论体裁当然不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地叙述（正是普希金在《青铜骑士》中同密茨凯维奇进行了诗歌辩论）。在表明和预言未来的时候，《断章》作者力图在先进的俄罗斯和沙皇制度之间划开界限（《彼得大帝纪念碑》、《致俄国友人》），并以深深的崇敬之情回忆起雷列耶夫和别斯图热夫（马尔林斯基）这些俄国人民的"预言家"。由于在国外曾经写过俄罗斯，《断章》无疑成了革命者眼中的一幅图画。难怪俄国许多卓越的解放运动活动家都对它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赫尔岑、谢甫琴科、杜勃罗留波夫等）。

密茨凯维奇的另一部巨作《塔杜施先生》（1834）所代表的则是不同于《先人祭》的、1831 年后波兰浪漫主义发展的另一条路线：力图在日常生活细节描述中再现其真实性，力图使那些在民族生活中具有代表性的习俗和细节长存。在这里谴责和激情已经被幽默和抒情所替代。这首叙事诗是上个世纪头十年中波兰小贵族生活的全景图，用果戈理的话说，它是"奇妙的东西"，打破了古典主义通常题材的限制。它与二十年代的许多诗体小说截然不同，首先是它的构思规模宏大，反对将问题和场景都围绕在主要人物的周围。常用的"史诗"的概念表达了《塔杜施先生》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在韵文和散文的整体综合中多样的艺术发现与探索，都被密茨凯维奇这样或那样地注意到了，丰富了和发展了。不仅如此，作者的同时代人还试图界定叙事诗的特点，它已经超出当时人所共知的诗歌体裁范围。斯沃瓦茨基写道："绝妙的好诗，它如同诗歌中瓦尔特·司各特的小说。"克拉辛斯基将叙事诗评价为"同类作品中的独树一帜"，并指出"《堂·吉诃德》和《伊利亚特》在这里融为一体"。与叙事诗体裁的独特性相连的是，在这里现实在其体现的丰富性中得到了反映，在其情绪和

语调的不断变换中得到了反映。

《塔杜施先生》的作者力图将不久前的过去，长期受历史发展条件制约的、具有很长家族史的生活方式，表现于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在，接近新世纪所赋予的东西，力图在时代的对立中还不同时代以原貌。由此产生了叙事诗的独特的双线结构，好像存在两个世界，两种现实。一个是“乡村”的世界，服从并坚守传统和宗教仪式，和自然生活与农业劳作有关，人缘建立在人的亲戚、邻居、同乡之间的关系上，年轻人服从老年人，在不紧不慢地移动着的时间里，接近旧的或新的田园诗中的现实；另一个世界是有重大历史事件、转折、战争的世界，即一个经受不住同历史的冲突、注定一切都将消失的世界，一个能够将田园诗式的东西压倒和砸碎的世界。不过，在这里反映出了密茨凯维奇世界观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没有力量从“小”世界中抹去它那迷人的色彩，以及从正义的角度捍卫人所需要和所习惯了的那些道德准则。《塔杜施先生》的作者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传统制度，从而表现出了独一无二的社会敏感性，诗人看到了不可避免的变革，当这种变革变得越来越让人感到的时候，他承认旧的事物并没有失去其魅力。

在诗人所创造的波兰小贵族的生活全景中，可以找到爱情的冲突，两个波兰小贵族家庭因为一个半废的城堡而争吵的忧伤又好笑的故事，关于1812年的立陶宛的故事，以及对上个世纪末悲伤事件的回忆。许多细节不只是为了色调的鲜明，也是为了叙述人物，说明他们的性格及其表现所在。作者并非在摹写自然——一天中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天气——而自然也好像参与了行动，它伴随着主人公在美好和不好的时刻营造气氛，甚至参与到事件中来。情节发生的范围限定在庄园内或其近郊，这并没有妨碍对小贵族的生活进行多方位的展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既有财产法律关系，也有外部特征的方方面面，如服装、礼节、家庭摆设，还有日常生活和节日。在人物画廊中可以找到旧宗法制的地位和积极拥护者，也能看到喜好从大城市和国外舶来的新鲜玩意的人，既有大地主的子孙，又有带着贵族纹章的仆人，还有中层地主、独户小贵族，从前波兰行政机关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以及在新政权供职的官员。密茨凯维奇所塑造的旧阶层“群像”，使人们有理由来谈论诗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内在地从浪漫主义中发展出来，同浪漫主义特有的问题相关，并从属于占优势的浪漫主义情绪（在叙事诗的后两部表现得尤为突出）。

486·

按照作者的意图，完全用浪漫主义叙事手法塑造出来的最重要角色是雅采克·索普尼察（主人公的父亲）。他身上有种神秘的印迹，当他在床上濒临死亡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名字和命运，并叙述了那许久以前的罪孽和赎罪。

渗透于叙事诗的历史主义感，说明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倾向。这种历史主义感仍然不同于《先人祭》，它并非建立于历史哲学的框架和预言，而是对于不久前的过去的一种清醒认识。民主主义者、赫尔岑的朋友 C. 沃尔采利将这部作品称为“以天才之手为旧波兰安放的一块墓石”。密茨凯维奇认为，不仅年代的变易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新的概念取代过时的概念、民族面貌的变化都是不可避免的。叙事诗是波兰社会意识变化的一个佐证：旧贵族的，“萨尔马特的”关于祖国、自己的阶层以及人的行为准则，都将被新时代的概念，与关注整个民族命运相连的爱国主义所代替。

爱国主义的思想决定了诗人对待 1812 年历史事件的态度，他将这一年代描述为吸引波兰爱国者，充满欢乐、热情与希望的年代。这里既显出“拿破仑神话”的魅力（在波兰，关于拿破仑要给予波兰人以自由的信念具有很长的生命力），又显出密茨凯维奇力图写出一部鼓舞同时代人斗志、使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在热爱自由的激情中得以重生和团结的作品。

4. 斯沃瓦茨基

密茨凯维奇从三十年代中期起就不再写大型作品。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成功地解决了文学的新问题和新体裁，他就是尤利乌斯·斯沃瓦茨基（1809—1849），他也在流亡中度过了半生。他在沃雷尼（他的父亲是克热米耶尼茨贵族学校的教授）和立陶宛度过了童年。维尔诺大学毕业后，他在华沙供职，在起义的日子里他发表了爱国主义诗章，一举成名。1831 年，诗人带着起义组织的任务出国，并从此留在了异邦的土地上（在法国、瑞士生活，在意大利、希腊、近东游历过）。在缺乏同读者必要的接触和批评家的支持下，他工作勤奋而且多产，新书一本接一本出版，直到他由于肺结核病去世（在巴黎）之前，都没有中断过工作。

斯沃瓦茨基的创作未曾有过渡期，很快就成了一个坚定的浪漫主义者。他那些创作于国内而于 1832 年出版的诗体小说，在国外却没有获得成功（《胡果》、《修士》、《阿拉伯人》、《扬·别列茨基》、《蛇》）。那些“全浪漫主义”类型的主人公，都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并很神秘的人（从这里可以明显感到拜伦的“东方”叙事诗的影响）。他流亡时期的创作以叙事诗《兰弗洛》（1833）开始，这是对失败的起义的回应，对优柔寡断和意志薄弱的批判。叙事诗《沉思时分》是同诗歌上的不成熟、同自我深入反省的世界、同危害年轻的心灵的“时代幼稚病”的一次清算，并成为深入人的心理领域的一次尝试。对关注内心丰富生活的个体的“我”的同等重要和同等复杂的认识，使他同波兰浪漫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完全分开。

487·

斯沃瓦茨基后来明显地离开了诗体小说体裁的创作。叙事诗《在瑞士》(1839)具有独特的建立在深层诗性体验基础上的抒情风格。抒情诗的自然风景,使主客体融为一体,叙事者的宽阔内心世界的崇高化变为一首激动人心的爱情的诗歌交响曲。叙事诗《鼠疫患者的父亲》(1839)来自于开往东方的火车上的印象,然而其中并没有令同时代人迷醉的东方情调:对于作者来说重要的是简洁,心理的真实——他仅仅是将鼠疫时期一个失去了家庭的老阿拉伯人的悲惨故事表达了出来。

在谈论民族的命运时,斯沃瓦茨基使用了但丁的主题(《比亚特·但特舍克的长诗》,1839 年,失去了三个孩子的主人公去地狱游历的故事)。在但丁的传统上,斯沃瓦茨基构思了叙事诗《安赫利》(1838),将它写成一篇韵律散文。情节发生在西伯利亚,那儿有被流放的波兰人,但实际上故事讲的是流亡者中的政治斗争(斯沃瓦茨基在同密茨凯维奇争论时,并不认为它处于伟大历史使命的水平,并以批评的态度作了评价)。诗人在《安赫利》中描绘了流亡者,他试图超越各党派之上,认为保守主义者、宗教神秘主义信徒和民主主义者(虽然从他们的政治观点看,斯沃瓦茨基在很多方面都一致)远离了人民。诗人预言了将来的革命,在它的旗帜上将会写上"人"字,即人民大众。在预言中他没有为自己的主人公,一个青年"心灵骑士",一个沉重苦难的时代的牺牲品留下位置,他的使命仅仅在于用自己的命运同过去和未来联系在一起。

早在二十年代末,斯沃瓦茨基就关注戏剧创作,写出了悲剧(《明多维》,1829 年,《玛丽·斯图亚特》,1830 年),其中莎士比亚的影响显而易见,并充满了政治内容。起义之后,当戏剧成为波兰文学的主要体裁时,斯沃瓦茨基实际上成了波兰浪漫主义剧目的创建人(许多年后风靡舞台)。匿名出版的《科济安》(1834)(同密茨凯维奇《先人祭》的第三部一样)是结构自由的浪漫主义戏剧范例。《科济安》的作者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他的选材:拓宽了事件的容量和参与者的范围,情节好像发生在波兰又好像发生在别的欧洲国家;幻想的运用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事件或对人物的评价,而且为了展示主人公的内心世界。《科济安》是斯沃瓦茨基同密茨凯维奇之间多年的诗歌争论的开始:它的作者反对《先人祭》的作者的弥赛亚思想,认为参加人民解放斗争的波兰人没有理由需要神秘主义。

《科济安》处于浪漫主义者的世界观探索之中心,他们并不拒绝多样性,然而提出在个体与共体之间,前者的自由存在与后者的和谐统一之间具有巨大的复杂联系(如同理想的两个方面);他坚持民族共性不受拘束地发展的必要性,并被构想成为一个既可以实现个性的领域,又是全人类和谐相处的条件。戏剧的同名主人公是那个时代许多欧洲作家关注的"世纪之

子”中的一个，他浪漫主义式地对世界、人、爱情、文明、宗教都感到失望，意识到自己和同胞之间不可割裂的联系，并在爱国主义的自我牺牲的理想中找到了生活的意义。然而，诗人对待自己主人公的态度并不是单一的：诗人在赋予他崇高和昂扬，展现他优于意志薄弱、谨小慎微的同时，并没有给他实现大胆的意图（科济安准备只身一人地去行刺沙皇）所需的精神力量。在斯沃瓦茨基那里，浪漫主义个人主义的失败具有政治意义：起义的教训使现代诗人信服了贵族革命性中存在的悲剧矛盾。



尤·斯沃瓦茨基
奥列辛斯基奖章 1841 年

· 488

波兰浪漫主义的关键问题是同祖国的历史密切相连，解决的途径或是通过哲学思想，或是通过对祖国历史上关键时刻的艺术再现。浪漫主义几种类型的戏剧创建人斯沃瓦茨基将注意力转向了科斯秋什科起义的年代（《科尔什登斯基》，1835 年，未完成），又关注波兰丰富多彩的历史。正剧《马泽帕》（1840 年发表）以性格和激情的鲜明刻画著称，在体裁关系上以动感很强的情节而与法国浪漫主义戏剧接近。

浪漫主义艺术家力图弄清楚人民的历史，认为有必要突破历史事实所勾勒出的轮廓界限，在相同的原则上，把民间文学所唤起的对于往事的回忆，以及旨在民族生活中“创造”神话世纪风貌的诗歌幻想，同历史事实并列在一起。斯沃瓦茨基构想出一系列关于史前时代的神话剧和传奇剧。浪漫主义历史文献提出了关于贵族的外国起源论题，并将统治波兰早期生活中那些“历来就有的斯拉夫的”民权原则的交替时刻，归入神话剧和传奇剧，而这些民权原则仿佛来自于封建主义之外。

《里拉·维涅德》（1840）讲述了文德人部落被列希特侵略者征服的历史，而后者被看作封建主义世界恶势力的代表。同时作者又一次暗示了 1831 年事件：文德部落正是在丧失了斗志之后，在领导者无力鼓舞自己的人民的前提下灭亡的。

剧本《巴尔拉迪娜》（1834 年，1839 年出版）建立在民间文学母题（坏姐姐害死好妹妹）的基础上，并发展成为关于纯洁的爱情与罪过，为权力而斗争的故事。诗人将民间文学的幻想与记录了古老波兰编年史神话的母题，以及文学起源的母题交织在一起（莎士比亚）。关于生活的真正道德概念

相连的民间原则，同《巴尔拉迪娜》中封建领主的概念，是对立的。封建领主的概念可以取胜于一时，可以使无辜和高尚遭到毁灭，但是它本身却隐藏着不可避免的报应（天意完成了死亡判决：有罪的女主人公遭到了雷电袭击）。斯沃瓦茨基认为《巴尔拉迪娜》是一出悲剧，它“让人想起古老的叙事谣曲，其写作使人觉得仿佛出自普通人民之手”，作者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普通农民将阅读该剧。

斯沃瓦茨基抒情诗中的公民性与如此诚挚、如此炽烈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以至于使个人的苦难同全民的、规模宏大的主题汇合在一起。他的诗歌还表现了对新的全民起义的信念（《寂静》），表现了对民族热情高涨时刻之间那种背运的感觉，表现了客死他乡的流刑犯的痛苦（《马伊兹涅尔上尉之死》），表现了诗人对现代世界中人类生活的沉思（《颂歌》），表现了对他那一代人所肩负的任务之认识：给人民以“启蒙主义的光明”，为了祖国去斗争，去牺牲（《我的遗书》）。抒情诗中还反映出诗人的民主主义，谈到了人民“天使般的心灵”，并号召波兰以焕然一新的面貌扔掉小贵族阶级的“愚蠢的外壳”（《阿伽门农的棺材》）。

同时代人并没有友好地接受斯沃瓦茨基的诗。诗人在叙事诗《别涅夫斯基》（1841）中回答了他的文学论敌，展示了他的机敏和创造能力，诗的轻快和悦耳，以及全面利用诗歌语言的潜能。情节的基础（1768年的贵族联盟时代）在诗歌中并没有起到重要作用，与之同等重要的是另一个现实局面——不久前的起义和流亡。抒情插曲在文本中占有一个最重要的位置，作者捍卫自己作为一名艺术家具有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而不去迎合文学圈子里的欣赏趣味，不为流亡的计划而屈服，但他常常以人民的期望为对照。在叙事诗的内容中，同僧侣、贵族一方充满讥讽的辩论起到了显著作用，同样地也把讽刺性的抨击对准民主主义者，因为他觉得他们的观点不够激进。他同密茨凯维奇的辩论还在继续，在辩论中坚持自己道路的正确性（《人民会跟我走》）。在诗中可以感觉得到作者对简洁，对贴近现实的追求，对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的不满，一系列人物的非英雄化（包括以主人公名字作诗的主人公在内）。

流亡者所普遍沉迷的神秘主义在四十年代还没消散，斯沃瓦茨基也不例外，但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诗人，他与托扬斯基的小圈子只有过很短暂的联系，随后他试图修改自己的“精神哲学”，其中贯穿着他对世界发展的思考，强调其包罗万象性和不间断性（“精神”，既是破坏者又是建设者，通过许多更臻于完美的化身体现出来），旧形式的消亡和新形式的诞生是合乎规律的。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直到去世，斯沃瓦茨基都在创作一部历史——哲学叙事诗《灵魂国王》，这是波兰浪漫主义文学最具独特性的作品

489 ·

之一。在作品的游吟诗中，他试图综合一种新的世界观，叙述从起源开始，从先前斯拉夫传说关于古代波兰存在的不同时代，这些时代体现在统治者及其罪过和迷误之中，体现在他们的道德和政治思想的实现之中走向永恒光明（“充满阳光的耶路撒冷”）的人民之崇高——按照斯沃瓦茨基的史诗，这是所有种类的神灵“队伍”工作的结果，而其特殊的使命却落在了“神灵国王”、领袖人物、引路人、鼓舞人心的歌手的身上。历史主义同神话、幻想、宗教信仰熔铸在一起，抒情性的“我”同主人公们（每一个人都在他的后继者中复活），同时也和行吟诗人们融汇在一起，诗人创作了一部宇宙规模的、丰富多彩的、幻想的史诗，表达了自然与人类一往直前（时而缓慢，时而急速的运动）发展的思想。

斯沃瓦茨基在指出四十年代作品的神秘主义情绪时，谈到了社会冲突，人民对压迫者的仇恨（剧本《所罗门银色的梦》，1844 年）。不过作者的新观点一般都没有反映在艺术构思中：未完成的戏剧《幻想》（1845）就是如此，这是对已经变得矫揉造作的浪漫主义消极幻想的讽刺摹拟，也是对自私的、整天为物质生活而操劳的乌克兰小贵族的怪诞描述（作为他们的对立面出现的是起义者，是过去农民队伍中的指挥者，也是俄国少校，前十二月党人）。斯沃瓦茨基的抒情诗出现了新的品格（宇宙般的宏大规模，迷恋于一种先知的和梦幻的调子）。1845 年他完成了波兰革命民主主义诗歌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对“未来赞美诗”的回答》。诗人揭露了为贵族辩护的阶级盲目性及其在人民革命面前的恐惧，从而号召人们相信历史的意义，相信“永恒的革命者的灵魂”的复活，相信革命和流血的战争能够产生“新型的”生活。他以新的“强大的”和“年轻的”“革命一代”的名义，在论战中向自己的论敌宣布：“我们将踏上你那条装满尸体的卡戎独木舟。”

5. 克拉辛斯基

波兰浪漫主义者在现实的描写中广泛地确立了尖锐的冲突性：既适用于人，也适用于人际关系和整个人类。正是对立因素的存在成了一种保证，使存在不再是静止的，在衰落和痛苦中孕育着复兴，暂时的胜利隐含着毁灭。这不仅在对待具有革命情绪的艺术家方面是公正的。有时候社会保守主义并不妨碍尖锐问题的提出。西格蒙特·克拉辛斯基（1812—1859）的创作就是其中一例，在他的创作中，忠实于贵族的传统，使社会敏锐性按自己的方式变得更加尖锐。

就地位而言，克拉辛斯基并不是一个流亡者，但从青少年时代起他就住在国外，只是在旅行和匿名出版自己的作品时才回到波兰。他的父亲从拿

破仑那里得到了将军的军衔和伯爵的爵位，然后又成为沙皇君主的忠心奴仆。他专横地安排西格蒙特的命运，禁止他同爱国主义团体有任何接近，并决定了诗人的社会立场，害怕民族起义转变为社会革命。

克拉辛斯基最优秀的作品是具有历史哲学内容的戏剧。他的《神的喜剧》(1835)用散文体写成，具有"开放"的戏剧结构，作者采用了断章式结构，达到了在语言、形象上节省笔墨的目的，几乎完全不写日常生活的细节，不具体地描写地方琐事，拒绝角色个性化。剧本主人公亨利克伯爵，是一个贵族兼诗人，一个注定要遭受悲剧死亡的人，他有时却成为鄙俗的物质世界中一位诗歌和骑士的理想的代表者。在前两部分中，基本矛盾表现为诗意的个性与平淡无味的个人生活之间的冲突。在第三、四部分里，则为我们描绘了社会悲剧，即克拉辛斯基那个时代对粗俗的物质追求与封建骑士传统之间的冲突。克拉辛斯基描绘了贵族与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战斗，依他之见，这是不久将来必将发生的。他把贵族写得很迷人，但他也为旧世界的控诉人说话，谈到了封建贵族后代的意志薄弱和必遭灭亡。他极富倾向性地描写了未来社会的动荡，但不是作为一种咒文和一场盲目的哗变来描写，而是写成了一场从根本上改变社会面貌，具有道德依据，有组织有领导的革命，这并非逆历史潮流而动，但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克拉辛斯基看来，这些法律是与神的意志，"上帝的安排"相同的)。克拉辛斯基将革命描绘成受压迫的、贫苦的、无权的人与富有的、有权的、出身高贵的人的斗争。他使用的材料涉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文献，圣西门主义者的著作，可是他没有注意新时期的社会进展，例如1831年的里昂工人起义。在戏剧中起义的人群要求"面包、工作、过冬的木柴，夏天的休息"，宣布"让老爷们去死吧"的口号，并补充道"让商人也去死吧"。

民主思想使得克拉辛斯基得以战胜旧事物的捍卫者，但作者不能也不愿让作品以凯旋为结尾。在克拉辛斯基看来，冲突各方的每一种力量仅仅体现了一部分的真理。诗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的真理，只有在发展的最后阶段才会指示给全人类。戏剧结尾的基督现身，并没有使敌对双方和好，而是将他们从人间清除出去。诗人最终也未能解释基督现身的意义：或预言人类的灭绝，或对天意的无条件服从。克拉辛斯基迫使民主主义者的领袖拜倒在基督面前。

在戏剧《伊利昂》(1836)中，作家描绘了罗马帝国衰落的前夜。对社会的崩溃和必然灭亡的展现，揭示了克拉辛斯基思想中强有力的一面。这个社会饱受对抗性矛盾的折磨，从内部产生出推翻它的力量。作品标题的同名主人公强烈仇恨罗马，试图把敌人团结在自己一边。但由于他把物质力量也作为一股反对力量，致使他遭到了失败。作者认为，只有精神力量——

基督教，才能战胜异教的罗马。在幻想的结尾中，主人公从几个世纪的睡梦中醒来，受到上帝的吩咐，前去“坟墓和十字架的土地”游历。波兰的土地成为基督赎罪的土地。克拉辛斯基强调指出，历史的主观意图和目的与它真正的作用并不相符，他号召信仰、劳动、受苦，但不要破坏现存的制度。

四十年代，克拉辛斯基的保守主义变得更强烈。他试图在诗中阐述他制订的宗教——弥赛亚的思想体系（在其中几处庸俗化地运用了黑格尔的理论），提出了贵族和人民要刻不容缓地团结在一起的思想，用即将爆发的革命恐怖恐吓同胞（叙事诗《黎明之前》、《未来赞美诗》，因而招来斯沃瓦茨基等人的反驳）。

6. 三十至四十年代波兰本土文学

1831 年以后，波兰本土文学并没有出现像分散在各地的流亡天才那种水平的作家，但是，在浪漫主义大师（虽说对弥赛亚的兴趣绝不是它的根本特征），民主主义批评家，还有在波兰本土准备新的起义的、比流亡者更了解形势的革命者的思想影响下，它有了长足的发展。爱德华·唐波夫斯基（1822—1846）写了很多文学论文。他将民族性和人民性同“在理解与实现自由方面的水平越来越高”的民族成就结合起来，说文学起着“提高未来创作水平”的作用，在人民“为了完备大众的知识”的斗争中是一面“鼓舞人心的旗帜”。在评价传统时，他抨击一切“派别主义”，并且将它同一切他所认为的、与地主贵族圈子有联系的真正的民族发展现象区别开来。

国内的浪漫主义诗歌致力于支持和鼓动民族情感，以简洁和通俗易懂为宗旨，用读者容易理解的形象和象征来解释爱国主义口号，表达社会的情绪。在流行的诗歌中，歌颂了战士的英勇和起义的热情（B. 波尔），斥责了向“地主老爷”、起义的敌人叛卖的行为（Г. 爱伦伯格）。其纲领是以民族历史、民俗、民间文学为指南（Э. 瓦西列夫斯基，B. 沃尔斯基，年轻的 T. 列尔托维奇等），而且部分地从民间创作中汲取了反抗传统，歌颂了民间的保护人和领袖（Л. 谢缅斯基）。他们对其他斯拉夫文学和民间创作的兴趣也十分热烈（在加里西亚有文学家小组“泽沃尼亚”）。在抒情诗中响彻着对充满压迫的现实的诅咒，对另一种生活的幻想，对即将到来的风景的呼唤或是忧郁的预感（“华沙艺术家”小组诗人的诗歌）。革命情绪以其特殊的力量表现在 1846 年前夜之中。雷沙特·别尔文斯基（1819—1879）在国外发表的诗歌中，确立了农民的革命口号，即“通过血海”铺向一条通往“没有剥削、没有老爷的乐土”的道路（《未来进行曲》，1844 年）。

·491

国内的散文体裁比流亡文学更广阔，更多样化。历史散文以其鲜明的

表现力，力图绘影绘声地表现多彩的贵族古风，虽然出自保守派的作者之手（Г. 热沃斯基的系列小说《索普里察的回忆》，1839—1841 年，以及长篇小说《落叶》，1845—1846 年），它们流露出对过去封建制的赞扬。力图以民主主义的精神来诠释历史，已成为面向斯拉夫自由的神话时代之基础，具有民间文学精神的语言—形象风格，同斯拉夫自由是一致的（Р. 别尔文斯基的《大波兰故事集》，1840 年）。

现代生活使波兰散文与广阔的新的社会现象发生碰撞。时代终结了从前的生活方式和宗法制度的古风。金钱关系被提到了首位，并明显地成为在社会等级中决定情感、思想和地位的力量。对地主的衰落，暴发户的出现，社会和家庭关系的衰败，对民族事业的漠然等所有这一切，以及旧有的贵族的痼疾（官僚主义，对“卑贱的人”的蔑视等），散文并没有置之不顾，而是采取了一种刻薄讥讽的态度和浪漫主义的愤怒。波兰文学的任务在于把握农民题材，不把农民理想化，但要真实地表现他们的需要和贫穷。

散文中还出现了城市，其面貌形成于社交沙龙的画面、地主—官员的日常生活、不幸的城市贫民的画面。四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散文家 Ю. 杰日柯夫斯基曾声言：“在小说中已经不是仅仅描写沙龙和贵族庄园的时候，这些我们都太熟悉了，而应当把街道、郊区、庄稼汉的农舍都写进去。”在新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具有战斗启蒙主义传统的民主主义讽刺，将社会上层的假斯文和世界主义及其对民族事业的漠不关心，作为自己的对象，在它们当中看到了一切反爱国主义东西的集合（Л. 杜宁-波尔科夫斯基的小品特写集《偏僻地区》，1848—1849 年，里沃夫贵族沙龙全景图）。有时候波兰散文中的讽刺同乌托邦式的道德说教结合在一起（它的信仰基础在于相信贵族能够顺利地适应新时代的精神、实用主义和保持了旧美德的经济），并试图教诲贵族读者，将理想化的、完美无瑕的（然而是不可信的）主人公搬上舞台（尤·柯热涅夫斯基的小说《投机者》，1846 年；《分界线》，1847 年，以及其他小说）。尽管如此，四十年代的中、短篇小说和随笔还是提供了足够可信的画面，对发财的崇拜是怎样进入贵族生活的，怎样产生新的暴发户和冒险家的社会典型，财产分化程度是怎样加深的。属于那些年代的，还有散文中对人的心理矛盾进行艺术分析的尝试（Л. 施德梅尔）。

浪漫主义对散文的影响较小。它所关注的是如下问题，即个性自由与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艺术家的任务与命运，败坏的城市文明和宗法制农村之间道德上的矛盾，以及被欲望毁灭的人之天性中的矛盾（在 Н. 日米霍克斯卡娅小说《长舌妇》中，对“命中注定不祥”女人的爱情，1846 年）。

十九世纪中期最引人注目的散文家是尤谢夫·伊格纳济·克拉舍夫斯基（1812—1887）。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他作过各种尝试，要成为感伤主义

小说家，结果在做出了第一次历史题材小说的尝试后，他发觉自己根本达不到当时在波兰风靡一时的小说家瓦・司各特的程度。克拉舍夫斯基注意到了浪漫主义的问题（比方说，潜藏在长篇小说《诗人与世界》之中梦想和现实的冲突，1839 年出版），在某种程度上他采用了怪诞方法去描述晦暗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作家出版了一系列的风俗特写，随后又投入波兰社会生活广阔的全景描写中，它由社会画卷和生动的肖像描写所组成，有些地方对日常生活和心理的特征有细致入微的观察。

四十年代，克拉舍夫斯基转向农民题材（《萨夫卡正传》，1842 年；《乌里扬娜》，1849 年，及其他）。他小说中的现实主义背景（其实，其背景中主人公的某些理想化是显而易见的，关于人民性的浪漫主义观念的影响，也可以感觉得到），作者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倾向的明确性，使其作品成为文学中的新篇章，成为宗法制农村的典型关系，以及地主的无限权利和庄稼汉的无权地位的真实写照。作家笔下对男女农民形象所进行的心理描述，是波兰现实主义文学形成中迈出的一大步，也预示了晚期散文中那些富有代表性的倾向。 ・492

十九世纪上半叶波兰发生的重大事件，在文学中也引起了生动回响。既有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和加里西亚农民运动，又有 1848 年的革命运动。社会矛盾的爆发，全民统一希望的破灭使一部分人陷入了痛苦的惊慌之中（K. 韦尔斯基的《牢骚》等）；另一部分人受到恐吓，被迫向右转。欧洲革命时期流亡诗人的思想分野更加明显。斯沃瓦茨基至死都是一个民主主义诗人。密茨凯维奇在自己的文章中号召人民加强国际团结，以赞同的口气谈到社会主义思想。克拉辛斯基却以极端的敌意对待这一切。欧洲革命的失败和解放运动的衰落在文学中都有反映。

十九世纪上半叶艺术家的作品（首先是诗人和戏剧家的著作）为文学的丰富打下了基础，并为后人所引用，直到今天还在被积极地接受。波兰文学史上往后还未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即未能认识到注重浪漫主义文学遗产的必要性，就像重视权威或辩论的理由一样。

波兰土壤上的浪漫主义显得极富生命力，即使在很艰难的时刻也没有偏离全欧洲艺术发展的轨道。它提出并解决了文学上许多重要问题：关于创作和人民性的民族特色，关于历史主义，关于文学和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很多情况下，正是浪漫主义者们提出的解决方案都被他们的后继者们奉若圭臬。在波兰确立了一种文化类型，在这种文化类型中浪漫主义的世界观以及向它提示的艺术地反映现实的观点，已成为必不可少的成分。

十九世纪上半叶现实主义的倾向已经出现在一些艺术家的作品中，也

表现在心理分析领域，艺术典型化，对自己艺术经验的批判性重新评价中，但波兰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最终确立及其繁荣的时期较晚，在1863年以后。

第二章 捷克文学

十九世纪初，捷克启蒙运动越来越具有明显的民族色彩。文学的发展越来越取决于对一个民族的独特性和统一性的明确认识与肯定。民族的历史、种族和精神统一的思考进程在日益发展。对于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民族生活中向心倾向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这一时期诞生了大型的科学的爱国主义著作的构想，它们应该综合人民的历史和文化的经验。这些著作包括（它们是十年之后出现的）约瑟夫·尤格曼的五卷本《捷德词典》（1834—1839），在这部著作中他表现了捷克语言的丰富性，并肯定了它与占统治地位的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还有他的成为捷克文献的汇编《捷克文学史》（1825），Ф. 巴拉茨基的多卷本《捷克与摩拉维亚的捷克民族史》（1836—1876），П. Й. 沙法里克极富价值的人种学著作《古代斯拉夫》。

对民族传统进行综合的追求，也直接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因此，整个斯拉夫传统也得到了广泛把握，它们被理解为近亲的传统。在这个阶段上，将斯拉夫看作一个由不同的“部族”组成的民族的概念也已存在。尽管这种概念具有幻想性，但它在为民族自我认同的斗争中却是一种精神支持。同样，在思考欧洲其他民族的文学成就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独特性。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翻译作品，同时也促进和展现了捷克语言的可能性。在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在捷克文学生活中引人注目的是，力图恢复在国家失去独立以前就已形成的古代文献传统。现在，文学形式正在向现代生活接近。

493·

对于文学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是哲学家、诗人约瑟夫·尤格曼（1773—1847）的创作。他是农奴制下农民之子，直到二十六岁才获得“自由”。尤格曼宣称，民族的主要力量是普通人民、农民，他们同接受外国文化的上层是对立的。他在人民身上看到了民族独特性的主要代表者和民族文学壮大的主要消费者。尤格曼把民族语言的思想作为发展民族文化的基础，并尖锐地谴责那些用外语——拉丁语、德语来写作的同胞，为完善母语的文学规范做了许多工作。与人文主义时期（十六世纪）以捷克语言为方向的做法相反，这曾经是民族复兴初期阶段的特点，他提出了要全面地把握捷克文献的传统，而且要使用生动口语的丰富资源。尤格曼的名字同文学摆脱对古希腊罗马典范的片面模仿，以及对当代欧洲文学的兴趣联系在一起，这是建立民族文学的纲领性方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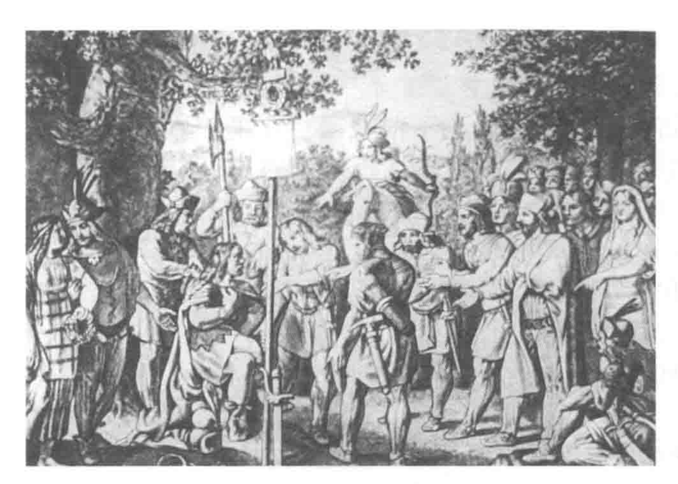
如果说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和十九世纪头十年，正在形成的文学中纯理性启蒙主义和古典主义倾向占优势，而在诗歌中却存在洛可可的余波，现在的诗歌则更多地充满了前浪漫主义的因素，尽管以前的艺术思维形式远未消失殆尽，仿佛是同新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同时，启蒙主义现在却越来越被理解成民族的启蒙，首先是民族的启蒙活动。艺术认识中的感觉原则、爱国主义感情和表现力的作用，都在增长。产生了对"民族精神"、民族语言、民族历史、斯拉夫民间文学的崇拜。文学视野中首先出现的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民族主题、民族观点和民族现象的联系。文学面向为祖国自由而斗争的事件，国内生活中民族学——人种学特征的浪漫化，都是十分典型的。

在还没有足够力量来对抗外来压迫的前提下，民族思想的确立具有一种幻想的性质，表现为这样一些历史的依据，如从前的独立，以其他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俄国人民的民族发展为榜样；在面对民间文学时，诗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人民的"不朽灵魂"，民族心理和美学观的独创性。这种文学的启蒙主义倾向，部分表现在天赋人权的自由理想、平等、社会的和谐之中，体现在对古斯拉夫风俗和人民生活的诗化描绘中（部分则根据民间文学的题材进行创作）。

对民族原则进行综合的努力，表现在这一时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类型中，这些作品经常在形式上倾向于大型英雄史诗、颂歌体裁或在民间文学基础上创作的诗歌系列。

在过去的一百年内，由于外来压迫，民族文学传统日益削弱的后果表现得显而易见。在这种条件下，对于民族文学的发展来说，把握民间创作则具有特别的意义。在前十至二十年里，文学经历了艺术思想民间文学化的整整一个时期。文学从许多民间创作中吸收了艺术形式、形象体系、民族色彩，掌握了塑造具体感性的艺术形象的技巧，克服了以前文献中结构上的一些逻辑理性的片面化。民间文学有助于建立主人公的民族形象和典型，以替代阿那克瑞翁体抒情诗的形象，后者在民族复兴的初期，曾对世俗诗歌的形成产生了显著影响。民间文学在这一时期常常高于个人的文学创作。这一切不仅催生了对自己国家的，而且是对全斯拉夫民族的民间创作的广泛兴趣，不仅积极参与收集和出版民间文学作品（汉卡，切拉科夫斯基，以及晚些时候的 K. Я. 爱尔本），而且有着一种与民间文学相竞赛的精神。这一现象的特点在捷克的土壤上（无此同类现象的如保加利亚文学），表现为此前还很少见到的依据民间文学主题的自发创作。作品往往是在对文献史料进行了仔细的语文学研究后才产生的，是作者意识中理性概念的间接体现。

· 494



"就把我们的土地叫作捷克吧。"石印画
A. 马赫克作 1820 年

在那些摒弃了阿那克瑞翁体和彼得马约尔体的民族文学重要作品中，存在一种被称作王室手稿和绿山手稿的作品，由瓦·汉卡(1791—1861)和伊·林达(1789—1834)分别在1817年和1828年所创作，表现为一种精妙的文学神秘主义。他们的作品模仿古老的诗歌传说，抄写在羊皮纸上，并虚构出它们被人发现的历史(这个秘密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被人发现)。手稿由几十首叙事诗和抒情诗组成，其中有几首在类型上接近于叙事诗体裁。依据于捷克的编年史，俄罗斯和塞尔维亚民间诗歌，十八世纪达尔马提亚诗人 A. 卡奇奇-米奥什奇的创作，赫拉斯科夫、卡拉姆津的创作，以及《奥西安之歌》(1792)的俄文译本，汉卡和林达在最优秀的手稿作品中都对之作出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在叙述捷克人同外族侵略者斗争的英雄史诗中，在英雄将领的形象上，在对带有成熟的、正统信仰准则的、古代捷克国家的浪漫主义化的描绘中，在智慧的女执政官里杜莎的形象里，都体现了民族自我认同的精神。

对整个斯拉夫各民族及其文化的亲缘关系和共同性，斯拉夫人的内在联系的思想——换句话说，斯拉夫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思想，在捷克民族复兴时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学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在不同作家那里具有不同思想体系的色调，从整体上来说，它是为民族自我认同而战斗的重要精神支柱。十九世纪的头十年，整个捷克文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特征是，斯拉夫人内在关联的思想，在扬·克拉尔(关于他参阅本书《斯洛伐克文学》一章)的创作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495·

克拉尔(1793—1852)是用捷克文进行创作的斯洛伐克人，他同时是两个兄弟国家的诗人。克拉尔早期的十四行诗、悲歌、诗体箴言，部分收入了

《诗选》(1821)中,部分流行于被传抄的诗歌里,它们热情地反对民族压迫,以至于达到了革命之声的高度(诗歌《爱国者》及其他)。克拉尔主要的作品是叙事诗《斯拉瓦的女儿》(大致在 1824 年和 1832 年出版),由几百首十四行诗组成。启蒙和理性的信念在作品中同浪漫主义的幻想熔为一炉。叙事诗的中心是诗人所钟爱的,逐渐发展成为概括性的斯拉夫人的形象,她是神话中的仙女,斯拉夫民族的保护神,斯拉瓦的女儿,引导着诗人在斯拉夫大地上进行想象的旅行,并深入到斯拉夫的历史之中,上至天堂和下至地狱。作者在叙事诗中仿佛在对斯拉夫的过去进行评点,并力图对未来有所洞见。作者在日耳曼化的压力下,为斯拉夫民族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哀悼时,歌颂祖先伟业的颂歌调子和悲歌的基本情调汇合在一起。叙事诗的内容在很多方面取决于以下这一点,诗人仿佛是同外国侵略者犯下的罪行和对待斯拉夫人的态度相对立,具有人道主义启蒙主义精神和自由的理想。对地狱和天堂的幻想描绘,是以自己的方式对历史的审判。诗人将贪得无厌的斯拉夫文化的侵略者和迫害者置于地狱,将斯拉夫历史上的英雄,文化事业的优秀代表,斯拉夫的朋友置于天堂。诗歌热情地号召斯拉夫民族弟兄般地团结在一起,作者认为应当将这种团结保持到自由和人类理想的实现。所谈的并非是政治,至少在起初是这样,而是文化的团结。克拉尔的民族感情并没有挡住全人类的理想。他写道:"把民族看作是与人性在同一条线上,让'斯拉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是'人'的同义词。"克拉尔关于斯拉夫内在联系的思想,在很多方面具有民族乌托邦的特色。他甚至都不回避斯拉夫国家之间的矛盾(如波兰的被"三只凶恶的老鹰"扯得粉碎的"小山羊"的形象);他在反抗封建压迫的同时,怀抱着一种理想,人性和民族兄弟情谊将会胜利。

1836 年,克拉尔发表了论文《论斯拉夫民族和方言之间的文学关系》,其中阐述了旨在使斯拉夫各族人民在文化上接近的具体措施的纲领。这个纲领拟在斯拉夫国家互相研究基本的斯拉夫语言、互换书籍、建立相应的图书馆、出版杂志等等。

弗兰迪什克·拉基斯拉夫·切拉科夫斯基(1799—1852)的创作,清晰地表现了捷克文学对斯拉夫民间文学财富的把握。他的三卷本文集《斯拉夫民歌》(1822—1827)是所有斯拉夫民族诗歌文化的独特汇编(外文歌曲用外文刊出并同时配以作者本人的译文)。切拉科夫斯基还著有系列组诗《俄罗斯歌曲的回声》(1829)和《捷克歌曲的回声》,它们由经受住了检验的形象风格手段,具有代表性的俄国和捷克民间诗歌,巴拉达体诗歌,抒情诗、强盗诗和诙谐诗等组成。作者力图创造同时能够表达出俄罗斯和捷克民间诗歌体裁风格及其特点的真正作品。在《俄罗斯歌曲的

回声》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是按俄罗斯壮士类型创作，并具有保卫祖国土地的思想的诗歌。浪漫主义化的俄罗斯形象以民间诗歌的形式表现得多姿多彩，并发展了不同形式的抒情诗。组诗《捷克歌曲的回声》的特点之一，是将幽默与抒情结合在一起，农民和老爷的感情世界充满激情的对立，也是捷克民歌的特色。切拉科夫斯基对文艺思想发展的主要贡献表现在教会了作家用民族的艺术形式去思维，以民族典型来思考。他诗歌的主人公是俄罗斯的勇士(其中有伊利亚·穆拉梅茨)、"剽悍的好汉"、"美丽的姑娘"、"多心眼的寡妇"、捷克的庄稼汉和捷克的乡下美人——都是民间文学的典型。捷克文学中民族情调的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切拉科夫斯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三十至四十年代捷克的民族运动开始具有更广泛的群众性，有时候表现为政治形式。随着大量带有文化启蒙特征的爱国主义小组和团体的出现(读者俱乐部、戏剧爱好者团体等等)，阶段性地产生了秘密的政治组织，其中包括有共和国目标的，反映了解放运动中激进的民主主义左翼的形成。496・

文学生活中的新现象，是从三十年代初出现了定期出版并存在了很长时间的杂志，它们代替了从前不定期的丛刊与通常只存在很短时间的阶段性出版物。新刊物中具有特别影响的有《捷克博物馆》(1827 年起发刊)、《捷克蜜蜂》(1834 年起发刊)，以及最受欢迎的左翼刊物《花》(1834 年起创刊)。

浪漫主义是捷克三十年代文坛最重大的现象，它的代表首先是诗人 K. Г. 玛哈鲜明而自成一格的抒情诗，随后是萨宾那的创作，稍晚有 B. 涅别斯基、弗里契、K. Я. 爱尔本。捷克浪漫主义的思想美学基础，是和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和革命情绪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变革的渴望，对现存社会制度的反抗，对革命斗争的同情，以及与 1830—1831 年波兰起义的团结，导致了"反抗文学"的产生，它充满了追求另一种和谐生活的振奋精神，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民族、社会政治压迫，以及现存的哲学、宗教、道德美学观念的反叛精神。

捷克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卡列尔·亨涅克·玛哈(1810—1836)的创作，是民族解放时代捷克文学的奇迹之一。诗人的生命很短暂，其创作生涯总共只有六年，然而他为捷克文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发展了新的艺术形式。他的诗歌以强有力的抒情著称，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它那令人激动的新鲜感。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后来的捷克抒情诗都源于玛哈的传统，其中包括举世闻名的二十世纪捷克诗人 B. 涅兹瓦尔。

由于出身和对城市底层贫民的生活印象，玛哈经常往来于当时最激进的青年学生团体之间。这个圈子热烈地欢迎 1830 年法国的革命事件，比

利时的独立，1830—1831年的波兰起义，这一切都被看作是近期欧洲独裁制度即将被颠覆的征兆。玛哈欣赏意大利烧炭党人，和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有私交并给他们以帮助。他和捷克激进民主运动领导人之一萨宾那一起参加了布拉格的爱国组织和革命团体，将希望寄托于对人民的革命教育。

玛哈的创作反映了艺术认识世界中的这样一个时刻，即重新审视旧的、封建社会的全部观念体系，其运动过程达到了高潮，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它们的名誉已经不可挽回地败坏了。诗人还认识到新兴资产阶级关系的矛盾，这些矛盾体现在奥地利帝国，尤其是在最后十年间——在废除农奴制后，而诗人在其他欧洲国家的生活氛围中也同样体会到了。玛哈的创作折射出从以往等级关系的束缚中冲出来的人的世界观，他们知道自由的滋味，感受得到世界的变化，可是他们被控制在一种新的、不知名的力量之下，这种力量束缚了个性，以一种宿命论干涉他的自由。心情的不和谐，"各个世界的不一致"（玛哈的个人表达方式），对真理和理想的热情，反复的求索，对他的创作都极具代表性。

在新时期的捷克文学中，玛哈第一个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认识主体。这语意不是"反映"，不是诸如通过民间文学的中介和生活的领悟来反映，而是个性通过心灵和智慧来把握世界，并成为其诗歌的基础。力图建立世界的完整概念，对存在的和谐的忧虑，都赋予他的诗歌以哲学特点。那个时候，作者新的思想体系刚刚开始形成。诗人的思想在紧张地求索无穷的宇宙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的答案，关于精神和物质，关于操纵着宇宙、人民、个人的力量的答案，关于世界和人心中的恶的答案，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敌意和冲突的缘由的答案，关于人的意志对生活的影响边界以及环境的力量的答案，等等。玛哈与上帝信仰决裂，甚至不会被泛神论所诱惑，他并不害怕承认永生只不过是"五月的幻想"，人的存在只受他周围世俗环境的制约。然而这个发现还饱含着不安和可怕的秘密。他几乎在被发现的宇宙之无穷和永恒面前陷入恐慌之中，并在寻找一种支撑，以便能够"粘住"人与自然，以及他们的大地世界，用情感的认识来补偿理性的各种限制。诗人的许多发现是以问题和怀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在其作品中表现为充满感情的反应和类比。

玛哈的诗歌充满了强烈的主观感受。他将诗歌的思想称作"从诗人的心上揪下来的小碎片"。他为捷克文学提供了无法重复的个性和作为认识手段的感受。他提出了如下问题：是否会出现如同借助形象创造那般明白的理性真实？玛哈的抒情诗——这是充满了灼热的梦想和痛苦的抒情诗。自由的、叛逆的激情，对革命行动的渴望和为反抗压迫的起义而做好准备的心情，都汇合在他的诗中，而同它们一起的，还有厄运、牺牲的主题。从

一个方面来说，它反映了奥地利梅特涅重压气氛下的感受，由波兰起义失败而引起的悲痛，对捷克革命力量之弱小的认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反映了许多困惑的哲学问题的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像苍穹一样展现在诗人的面前，显示着世界的无尽无边。

玛哈的创作中心之一是“他人的过错”这一主题，这是关于人的痛苦而不能归罪于他所处的环境的主题，这个主题部分地表现在中篇小说《茨冈人》中（1835），作者塑造了专制的伯爵和他自私的牺牲品的形象。小说展现了强烈的社会冲突，给人一种浓墨重彩的印象，好像作者故意把各种可怕的命运都糅合到一起。在这种情形下一部分人负罪，另一部分人在受苦并将死去。作品贯穿着象征性的主旨，直到安格莉娜的介入为止，她诅咒地喊道：“这不是我，这不是我，这是他，这是他。”

作品的中心思想，虽说表达得很抽象，但是却极为尖锐，这是关于人类关系中恶的起源问题。诗人似乎力图找出一条适用于各种条件的万能的法则，可以这样说，即“不公正”的痛苦，在寻找这一法则时，诗人关注一些极端的情势和冲突，并且认为在那里表现得更加充分。与此同时，小说表现了一个迫切的寓言：一位前奥地利军官、被意大利匕首刺死的专制者伯爵之死（匕首的形象在浪漫主义小说中常常被视为一种象征），暗示着意大利的解放运动。

玛哈的创作还包括沉思体的散文作品，它们接近于日记体随笔，在历史散文领域未完成的作品同力图展示英雄的胡斯党人时代也有部分关系（《克日沃克拉德城堡》，1834 年）。

玛哈创作的高峰是浪漫主义叙事诗《五月》（1836），奠定其基础的是作为对立面出现的自然中的迷人和谐与人际关系的悲剧性。在大自然一片欢腾和爱情与和平气息的五月背景下，作品表现了因为环境之过而造成的牺牲品与罪人之死。被囚禁在钟楼里等死的维兰的痛苦，主要由激动的内心独白表达出来。他的思想停留在那些折磨人的问题上，即决定结局的界限，人类命运的决定论和人类自由行为的边限，以及环境的威力与意志的自由。如果维兰不是在童年被逐出家门，他就不会去做强盗，他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有谁来承担这可恶的罪过/我命中注定——无法逃脱！……如果这是由于他人之意/我犯下了死罪/我的死亡又有何意义？”维兰在死的时候，未能揭示出这一世界矛盾的秘密。主人公内心独白的问题并没有找到答案。玛哈一般在公开的矛盾中“想象”，让思维过程自己展现出来，使读者随作者一起去思考和痛苦。“不和谐的辩证法”（Ф. K. 沙里特）在叙事诗的调子里，在互相渗透、互相冲突、反差鲜明的情感基调中得以表现出来。对立的两极常常在一种强有力的感叹中，在同一诗行中结合

在一起，好比“刀锋砍坏了监察官”（沙里特）：“无尽的爱呀！……爱情欺骗了我！”而并列在一起的是一连串隐喻的和弦，诗意的类比急流，好像它们掉入了感情的统一热潮之中。声音的回响和音调的旋律渗透了叙事诗的诗意独奏声部，并且每一次都形成了特殊联想的音阶。常常出现的不仅仅是旋律性的，而且具有一定思想感情分量等的声音主题。玛哈丰富了捷克的诗歌形式和手法的武库，并成为真正抒情诗的奠基人。

捷克浪漫主义的进一步演变，虽说没有出现像以前玛哈那样鲜明的艺术家，但是文学中的革命英雄因素却在加强。这反映在萨宾那和 П. 霍霍洛乌舍克的创作中，后者关注南部斯拉夫人民反抗奥斯曼帝国掠夺斗争的题材（散文体小说《黑山人》，1844 年；《游击队员》，1846 年；《游击队员之死》，1847 年；以及其他）。使作家感兴趣的是自我牺牲的浪漫主义主人公的形象，他们的心与普通人民中的社会失望情绪很贴近。民族起义的主题响彻在 В. Б. 涅别斯基的诗中（《垂死的战士》，1842 年）。 · 498

在三十年代的捷克文学中，同鲜明革命色彩并存的是另一条发展线索：对立的民主情绪的逐渐加强和反抗民族社会压迫的增长，诗学的逐渐变化与丰富。约瑟夫 · 狄尔（1808—1856）是一位日渐具有革命色彩和爱国热情的典型代表。他的创作从感伤的爱国主义到社会的风俗教诲小说和戏剧，发展到浪漫主义神话、民间故事剧和英雄历史剧，并且在其中已经表露出现实主义倾向。

约 · 狄不是最早创作现代生活题材中短篇小说的捷克作家。这些小说的情节通常是建立在爱情与爱国责任之间的矛盾上。这些故事的主人公（有教师、作曲家、演员、作家）都是孜孜不倦地传播民族思想的人，爱国的启蒙主义者。然而，这些主人公的形象以及冲突的愉快解决，使自身具有一种很强的田园诗情调。狄尔最好的作品是在戏剧领域，他是瓦 · 克 · 克里茨佩拉的继承人，后者早在十至二十年代就创作了带有早期斯拉夫爱国主义性质的嘲弄玩忽职守的喜剧，并力图引进童话—巴拉达诗体的因素以革新骑士戏剧。狄尔戏剧中普通的“小”人物和爱国者，同富有阶级的代表或通常以喜剧形式描绘的市侩，是相互对立的。作家常常从社会财产关系的角度，来思考爱国主义的问题和对祖国命运的漠不关心。后来狄尔的戏剧直接诉诸于社会冲突，并以道德的愤怒对抗压迫和非人道的立场来解决这些冲突。

狄尔的戏剧主要倾向于两种体裁：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并具有童话因素的诗剧和英雄的历史剧。童话—幻想的母题（森林中的别墅，童话中的活物，神奇的东西，等等），从一方面说，这有助于作者将人民的精神世界，健康的道德、精力、乐观主义诗意化；从另一方面说，以寓言和象征的方式强

调和说明了冲突的实质和基本的思想与道德。比如剧本《斯特拉柯尼茨来的吹风笛的人》(1847)中的魔笛，当它的主人公处在异乡而忘怀祖国时，风笛就失去了魔力。狄尔在剧中将幻想和童话抒情母题同对日常生活中的形象、场景的现实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狄尔的戏剧艺术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达到了极盛期。还在革命事件爆发的前夜，他便写了戏剧《库特纳山的矿工》(1848)——关于十五世纪的矿工起义，使人联想到1844年捷克工潮。在革命高潮期，剧作家创作了诗体英雄剧《扬·胡斯》，被称作是革命理想的诗歌宣言。在捷克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胡斯作为人、思想者和斗士的宏伟形象，他为自己的信念走向死亡，这里展示的是一个能够“撼动王权”并在公开战斗中获得自由的人民形象。

四十年代文学中第一次出现了现实主义倾向。在以前捷克社会曾被认为是一个整体，但它的社会和思想的差异得到了深化，并伴随着对生活和民族问题更加复杂和多面的艺术思考，部分地避免了理想化的倾向，更加敏锐地感受到了社会矛盾。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的文章(《最后一个捷克人》，1845年；《论批评》，1846年)直接提出了作家要真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要求，以及作家应具有生活的知识。具有代表性意义的是，作家转向近似于风俗特写的分析特写体裁，并对社会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波任娜·涅姆曹娃的特写《庄园附近的风景》(1845—1847)、《庄园内外》499· (1847)、《弗兰蒂什科威来信》(1846)以及女作家的一些好像是其续编的短篇小说(她的主要创作在随后十年便衰落了)，就是如此。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的作品集《俄罗斯风情录》非常接近风俗随笔，其中反映了四十年代初作者去俄罗斯的旅途见闻，以及对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观察。在随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民俗体裁具有社会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叙述的特征。

对于捷克文学的发展而言，1848—1849年革命具有重大意义，那时捷克人民的解放运动进入了同封建制度、专制统治与民族压迫公开斗争的时期。许多作家都是事件的直接参与者。运动中激进一翼的主要领导人是卡列尔·萨宾那，年轻诗人约瑟夫·弗里契。六月起义时，他们在街垒里战斗，约·狄尔也是如此。运动的积极分子中有讽刺家和政论家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他是自由主义的支持者，但他具有个人的英勇与坚毅的特点。

在革命时期，当社会生活中所有矛盾都极度地爆发出来的时候，它们便成为社会政治思想和艺术意识发展中重要的阶段。大约有一年的时间国内没有检查制度，可以公开地发表革命言论，其中包括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激进民主主义者按新的方式思考了斯拉夫问题。在他们的文章中第一次出现了关于未来与俄罗斯人民的革命同盟。到1848年，卡·萨宾那的文章

《民主主义文学》中力图形成文学发展的新纲领。萨宾那宣告了文学中“新时代”的开始，这是同欧洲革命运动相连的时代，并认为其特点在于同人民的利益与世界观相连的新文学，在取代贵族思想体系的那种“为了陛下”的文学。新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根除建立在阶级不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的途径，是要引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道路。

政治风暴使作家的目光变得更敏锐。在事件的过程中，以及在事件之后，捷克文学中产生了一些吸取解放斗争经验和思想并成为其武器的作品。政论和英雄戏剧（上面已提到的狄尔的作品）获得了特殊的发展。

革命和革命后的年代中最重大的现象是诗人兼政论家卡列尔·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1821—1856）的创作，他用自己尖锐的讽刺反对时代的主要反动势力，并直接反对专制统治及官僚宪兵的暴力和教会。1843—1844年，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生活在俄罗斯，在莫斯科斯拉夫派的C. П. 舍维廖夫的家里担任家庭教师。作家对俄罗斯人民及其民族独特性怀有深切的同情，同时目睹了这里的社会压迫，官僚制度的暴政，宪兵制度的恣意妄为。在俄罗斯的访问仿佛使作家的生活和政治经验成倍增长，使他更深入地理解君主制国家的本质。揭示君主专制和教会制度那外表虚饰体面的帷幔与内部寄生实质的矛盾，建构了他讽刺的基础：“专制政府建立的任何一种制度无不为宣传他们的言论之目的服务。每一种制度都直接在对立的方向上运行。”

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的政论写作，主要是在他勇敢地同政府以及专制统治集团进行辩论的过程中产生的。革命失败后，他还在单枪匹马地与它们战斗，特别突出的是他的政论文章《库特诺山的流放》（1851），它旨在反对君主制复辟和揭露“精神宪兵”——教会，在这里作者已接近于无神论的立场。

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最钟爱的体裁是讽刺短诗，它们大多带有政治性。诗人在揭露君主专制道德上的无根据性，教会势力的蒙昧主义和自私自利时，常常对《圣经》中的故事和箴言进行讽刺和戏拟性的重新解释，让宗教教诲的思想与教权主义者自私自利的行为发生碰撞。诗人的讽刺短诗创作的基本思想，在于简洁地表达出对著名福音书格言的阐释，他写道：“把上帝的归还上帝，恺撒的归还恺撒”；“在我的福音书里没有上帝，恺撒也算不了什么”。

他在捷克文学史上第一个掌握了讽刺叙事诗的体裁，并使其中充满了尖锐的政治声音。在流放中他出版了叙事诗《蒂罗尔的悲歌》（1852），叙述了诗人的被捕。作品通过对专制政权的恣意妄为，及其在消灭政敌时的软弱无力（正义和人民的同情在政敌一边）这一对比，进行了讽刺性揭示，这

• 500

决定了作品的思想氛围。在叙事诗《拉威尔的国王》(1854)中,作者利用了古老的"国王的驴耳朵"母题,这一母题的秘密已为全世界所知。叙事诗《圣弗拉基米尔的洗礼》(1848—1854)尤其突出,其中作为多层次概括的讽刺对象,已不仅仅是为虎作伥、欺压人民的教会,还有专制国家政治结构本身最为不同的各个方面,以及直接的奥地利统治集团的政策。作者在叙事诗中引用了和俄罗斯的洗礼有关的名字,可是他并没有描述俄罗斯历史上的著名时期,而是创造出了一个概括性的、假定幻想性的、不利于世俗政权的上帝的情节,并以其他情节来代替它。民间文学手法和主题的应用(作品是以乌克兰民歌的诗格写成的),以及布尔列斯克体的应用,使叙事诗具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的叙事诗很晚才得以印行,但在五十年代已被传抄。

卡夫里切克-波洛夫斯基的创作就其精神而言,近似于法国启蒙主义者和俄罗斯反专制统治讽刺的思想。作家翻译了伏尔泰和果戈理的许多作品,其中包括《死魂灵》,这是合乎情理的。在他的这一活动中,文学过程新阶段所产生的捷克文学对外联系的新倾向,得到了体现。

约瑟夫·弗里契(1829—1890)的浪漫主义诗歌,部分创作于狱中,而其面世却晚得多。它反映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文学发展中的典型倾向。革命失败所带来的悲剧性,以及公民的功勋主题和为了人民利益与自由的崇高牺牲,决定了诗歌的氛围。

第三章　斯洛伐克文学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斯洛伐克文学的发展沿着两条轨道进行:新教徒福音会会员中用捷克文创作;而在主教徒中则用别尔诺拉克的斯洛伐克语创作(由文学语言革新家A.别尔诺拉克而得名)。主教徒和新教徒主要的分歧之一是语言问题,但实际上是斯洛伐克文学发展道路的问题:是走向民族独立还是同捷克文化结合在一起。双方作家的思想和美学观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用别尔诺拉克语出版了宗教作品,科学启蒙主义的小说(主要是翻译)著作。它们的艺术水准均不高,不过尤·凡德里和扬·霍利创作不在此例。

尤拉依·凡德里(1750—1811)在生命最后岁月,为人民创作了几部家庭—风俗教诲书:《勤恳的家长和地主》(四卷本,1792—1810年)和《斯洛伐克养蜂业》(1802),其中除实用知识外,还提出了必须遵守的崇高道德的原则思想,作者力图培养读者的民族和人类品格的自豪感。凡德里努力使叙述风格接近口语,以便自己的著作通俗易懂,引人入胜。他的作品中很

少有诗歌的插入。凡德里的教诲诗歌旨在以古典主义准则为目标，充满了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

斯洛伐克文学中新教的一支，是在同相比较而言水平更高的捷克文学的密切合作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具有突出表现的是诗人尤·巴尔科维奇和波·塔普里兹。

尤拉依·巴尔科维奇(1769—1850)力图把握捷克文学的新体裁：有骑士浪漫主义情节的叙事诗，小市民滑稽剧(散文体)。他唯一的集子《捷克山上来的缪斯》(1801年，第一部单独出版的捷克诗集)中的诗歌，有着道德说教和阿那克瑞翁的主题，它的产生是对宗教禁欲的反应。但是最有意义的是巴尔科维奇的启蒙主义和文化出版活动。他的民间日历(1805—1847)、政治周刊《周刊》(1812—1818)，以介绍书籍为主要内容(在这里斯洛伐克第一次出现了关于俄罗斯文学的消息)，和教诲消遣娱乐的不定期刊物《塔特兰杂志》(1832—1847)，都获得了广泛流传。

波古斯拉夫·塔普里兹(1769—1832)在自己活动的初期从事文学史研究，曾建议在杜布罗夫斯基的《捷克语言文学史》中补充关于斯洛伐克文献的部分。他出版了斯洛伐克文的十八世纪斯洛伐克诗选《斯洛伐克诗人集》(1804)，随后出版了文学史性质的《捷克—斯洛伐克诗人文献》，收入了塔普里兹诗集(四卷本，1806—1812年)的绪论。在这部《文献》中收集了十八世纪以来用捷克语出版的斯洛伐克诗歌的资料。塔普里兹将斯洛伐克人看作“和马拉维人与捷克人同一民族”，将斯洛伐克的文献视为斯洛伐克人对共同文化的独特贡献。他在这里简要地描述了斯洛伐克人的民歌创作，并高度评价了其艺术价值。在《斯洛伐克诗人集》中，塔普里兹收入了两部关于高尚强盗苏拉维茨和雅诺什克的无名氏作品，其中雅诺什克被塑造成为一个自觉而坚定的反对老爷和维护农奴制农民利益的人。 ·501

塔普里兹的诗歌创作是十九世纪初斯洛伐克启蒙主义文学的高峰。塔普里兹的诗歌体裁有阿那克瑞翁体和教诲体——讽刺短诗、道德训诫颂歌和抒情叙事诗。他的诗具有十八世纪诗歌过于文雅的风格，但在思想内容与诗学上有着斯洛伐克民族的因素(力图使用民歌的调子和民间文学的艺术手法)。他的诗歌首次在斯洛伐克文学中从全斯拉夫统一的立场表现爱国主义主题。后来П. И. 沙法里克注意到了塔普里兹的爱国主义主题，并将其收入自己的诗集《拿着斯拉夫里拉琴的塔特兰的缪斯》(1814)中。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斯洛伐克思想生活中，团结民族爱国力量以反抗奥匈帝国压迫的必要性被提到了首位。斯洛伐克文学已成为社会舆论的唯一讲坛，因而在文学中公民—爱国主义主题成了首选目标。艺术思维运用了

两个概括性概念："人民"和"民族"，为富有古典主义精神的叙事体裁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文学和先前阶段不同，不仅注重国内读者，而且也注重其他民族的社会舆论。斯洛伐克民族复兴的拥护者关注全斯拉夫统一的思想。斯洛伐克和其他斯拉夫人民的亲近关系的意识，尤其是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联系的意识，提高了民族自豪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赫尔德关于斯拉夫民族体现了人文主义原则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为斯拉夫统一的思想提供了重大的精神支持。

这些年来，学术思想在寻找斯拉夫高度文化与文明的历史证据。卓越的捷克和斯洛伐克斯拉夫学者巴维尔·约瑟夫·沙法里克(1795—1861)，在其《斯拉夫语言文学史》(1826)和《古代斯拉夫》(1837)以及其他一些著作中科学地证实了斯拉夫民族发源地居民的思想，以及对建立欧洲文化的创造性参与。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在民族复兴思想的宣传中的作用有极大增强，而对其思想—艺术水准的要求也提高了。为了深入地思索和论证斯拉夫人的使命，需要有宏大情节和政论空间的叙事体裁。斯洛伐克文学针对民族传统的不足，力求运用全欧的经验，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斯拉夫民间创作——斯洛伐克作家重视卡蒙斯、弥尔顿、克罗普施托克、罗蒙诺索夫的创作，以至《伊戈尔王子远征记》、南斯拉夫史诗、古希腊罗马史诗，并非偶然。发展古典主义形式的文学崇高体裁的明确宗旨，在最著名的捷克和斯洛伐克诗人扬·克拉尔的创作中得到了表现，他将爱国颂歌与悲歌引入斯洛伐克文学，并用古典主义诗歌的手法表达了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对各种压迫和独裁进行强烈抗议，号召祖国人民为自由而战。斯洛伐克文学史上第一部有着民族史诗上述特征的作品，是扬·克拉尔的爱国—教诲叙事诗《斯拉瓦的女儿》(1824年，思想上更为成熟的版本——1832年)。这部作品充满了英雄主义激情，是以自己方式对斯拉夫的颂扬(叙事诗的思想被克拉尔加工后，作为文化政治概念而收入散文体论文《论斯拉夫文学的相互关系》，1836年)。

《斯拉瓦的女儿》是对斯拉夫民族苦难和复兴的隐喻，是对外来压迫的控诉，它号召兄弟民族团结一致，并注入了斯拉夫人关于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密切合作的理想。叙事诗的艺术特点取决于不同倾向的综合，它原则上倾向于古典主义，首先表现为纯理性主义结构，强调道德教诲，并赋予诗歌论文的特点。同时在对爱国主义思想的主观感情的诠释中，清晰地流露了正在日益形成的浪漫主义倾向。

扬·霍利(1785—1849)的创作也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用别尔诺拉克斯洛伐克语创作，他的颂歌、悲剧、田园诗和叙事诗同《斯拉夫的女儿》相

比，是另一类型的民族英雄史诗。扬·霍利从二十年代开始翻译古希腊罗马经典(荷马、维吉尔、贺拉斯)；三十年代在他的诗歌中，斯洛伐克人民民族自决权的追求得到了发展。他所有作品的出发点都源于斯洛伐克文献，这是对斯洛伐克民族独特性的认同。在他的史诗中爱国主义概念得到了广阔展现。他为此而关注自己民族的历史，古代的传说(《斯拉夫》，1839 年)，以及大莫拉夫斯基公国的时代(《圣普鲁克》，1833 年；《基里尔梅蒂阿达》，1835 年)诗意地描绘(很大程度上是虚构)斯洛伐克历史及其英雄。作家运用在史学、民族学、神话学领域的全部渊博知识和生活积累，把斯洛伐克创建成一个关于热爱自由、道德高尚和富有诗意民族的宏伟概念。他的叙事诗、颂歌和悲歌在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识分子中流传很广，他有权取得斯洛伐克诗坛长老的地位。

三十年代出现了斯洛伐克戏剧爱好者剧社，推动了戏剧的发展。斯洛伐克戏剧和喜剧奠基人扬·赫卢普卡(1791—1871)的戏剧(捷克文)《科库尔科瓦，或我们如何避免成为傻瓜》(1830)、《一切都倒了个，或捷斯诺什洛娃·安尼奇卡娶妻，康齐克嫁人》(1832)、《娇嫩活泼的女人》(1833)、《第十三小时》(1835)及其他作品，描述了外省的城市阶层。他喜剧中的基本冲突，众所周知，都是具有爱国情绪的知识分子同来自小资产阶级和贵族中的、从自私自利到被压迫民族阵营的叛逆者之间的冲突。民族因素在角色的安排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并决定了他们的精神心理特征。在日常矛盾的描绘和冲突中，在反角及其阶层的官僚主义、无知和对“上流社会”的滑稽模仿中，有不少生活上可信和典型的细节。他的优秀剧作已上升到社会讽刺谴责的高度。赫卢普卡的喜剧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具有广泛的社会反响，科库尔科瓦成了庸俗小市民阶层的代名词。

第一个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斯洛伐克语言文学爱好者小组”，于 1834 年在佩斯成立，扬·克拉尔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没有民族文化中心的前提下，这类团体起到了消除文化层次中信仰冲突的作用，成为民族精神生活的策源地，为团结民族爱国主义力量的事业服务，为出版斯洛伐克书籍提供了资金。老一辈斯洛伐克启蒙活动家，在贵族学校的捷克斯洛伐克语系教研室或大学生同乡会的基地，极其关注以民族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青年。其中“捷克斯洛伐克语言文学小组”(通常称为“捷克小组”)起到了重要作用。它于 1828 年，在布拉基斯拉夫贵族学校捷克斯洛伐克语系教研室的协助下成立。从三十年代末起，它成为斯洛伐克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对年轻斯洛伐克文学的接班人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学校。“捷克斯洛伐克小组”在斯洛伐克文化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引起了其他国家斯拉夫学组织的注意。1838 年俄罗斯斯拉夫学者 O. 博江斯基，1842 年 И. И. 斯

烈兹涅夫斯基对它进行了访问。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柳多维特·什图尔成为小组的领导人。四十年代,他在斯洛伐克年轻一代爱国知识分子中受到欢迎并具有很高的威望,以至于他的继承者在斯洛伐克精神生活史中被称为什图尔党人,而由他引发的文学流派被称为什图尔派。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跃,涵盖了越来越广泛的斯洛伐克社会的知识界,渐503·渐具有了纲领的性质,这为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思想美学探索提供了强有力的动力。浪漫主义流派产生的前提条件已经形成。浪漫主义思想渗透到斯洛伐克,有一部分来自德国(斯洛伐克大学生在德国大学完成了自己的教育),但首先是来自于同根的斯拉夫国家的文学。诗歌中的民间创作倾向,民歌和各种民间口头创作的出版,还有波兰浪漫主义,密茨凯维奇的创作,以及来自捷克文学尤其是玛哈的诗歌,都引起了极大的兴趣。

三十年代后半期出现了第一批浪漫主义模仿民间创作的叙事谣曲,以及包含着沉思内容的抒情诗体裁——沉思;而在艺术上最成功的范例是柳·什图尔的《黄昏遐想》(1830—1840)由一系列诗歌组成,包含着悲怆的调子,以及对压在人民头上许多世纪的奴役的诅咒。这些诗中第一次以沉思的形式出现了农奴制奴役下的农民形象。所有这一切说明了新的因素在蓄积,对文学中新的哲学和美学原则已被应用。对待民间文学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民间文学被视为民族性格的体现,民族"内心世界"铭记的历史,"一把开启民族神圣性的钥匙"(克拉尔)。扬·克拉尔出版了两卷本的《斯洛伐克民歌》(1834—1835),并附有一篇关于它的长文,在该文中他不仅给"人民缪斯"的创作以高度评价,而且号召诗人去完美地把握人民的语言,并将它提高到全民族语言的水平。这些思想被视为对四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青年作者的祝福,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则是新的尖锐的文学语言问题。

别尔诺拉克语言没有作为全民族的准则得以风行。书面的捷克语在斯洛伐克人的精神生活中曾起过重要的富有成效的作用,如今它已成为作家创作的障碍,这主要是,它没有使文学在大众中成为进步思想的向导和民族统一原则的主要载体。1843 年,以柳·什图尔为首的一群"捷克斯洛伐克小组"的年轻活动家(当时已被当局禁止),接受了将文献转换到以最具有特色的斯洛伐克中部方言为基础的斯洛伐克语的决议。1844 年出现了第一批使用这种语言的作品。向人民大众的语言转变,曾经是文学民主化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这种文学此后便以农民,以劳动底层为目标。语言的改革标志着斯洛伐克文学走上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什图尔派以这些行动奠定了自己在文学中的统治地位,就其实质而言则是浪漫主义的,虽然它的活动家原则上把它同更成熟的欧洲文学的浪漫主义区分开来,并且除了"独特的、民族的、斯拉夫的"这些界定以外,不承认自己文学的任何界定。

绝大多数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对文学改革的支持，使斯洛伐克文学在1844年向着新的发展阶段转变。而起到卓越作用的，是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家、斯洛伐克浪漫主义美学奠基人、社会政治活动家柳多维特・什图尔(1815—1856)。 • 504



扬・克鲁尔
毛笔肖像画 K.布尔基涅作 1852年

他在许多年里，从1840年起在"捷克斯洛伐克小组"，之后在布拉基斯拉夫贵族学校捷克斯洛伐克语言文学教研室任教期间，阐述了自己的思想哲学和美学纲领，在他的政论中也是如此，其基础是黑格尔哲学，首先是辩证法。他将历史进程看作一个从低级到高级，在矛盾斗争中的永恒发展——新与旧、进步与反动；什图尔有哲理地论证了积极对待现实的必要性，并体现在为进步的社会改革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中。民族独立，可预见的、完全从封建主义中解放出来的社会经济进步，以及民族文化的建立——这是他纲领中最重要的目标。

什图尔把自己关于独立自主的民族文学概念，诉诸民间文学。在什图

尔的影响下，对民间文学所展现的民族精神的忠实性，成了斯洛伐克作品的评价标准。什图尔为斯洛伐克的文学批评打下了基础，认为文学家的教育要秉着为本民族解放战斗事业服务的精神。

1844 年，什图尔及其同伴创立了出版团体“塔特林”。1845 年他获许出版第一份斯洛伐克语政治报纸《斯洛伐克民族快报》(1845—1848)，并设有文学附刊《塔特林之鹰》，而其最亲密的同志约瑟夫·库尔班则组织出版了第一份斯洛伐克文学杂志《斯洛伐克学术·艺术·文学评论》(1846—1848，1851—1852)，除了这些早期出版物之外，斯洛伐克什图尔派浪漫主义者的作品还出现在约·库尔班的丛刊《尼特罗》、《塔特兰杂志》和日历中。

在斯洛伐克的土壤上，浪漫主义是作为反封建和反民族奴役的战士的思想体系产生的；在后期它是自己时代革命倾向的表达者。浪漫主义的原则首先在诗歌中取得了优势：有政论宣言式的，其内容是反对压迫和号召为自由而战斗；有悲歌沉思体的，它充满了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或对未来的美好希望的思索。现实的戏剧氛围，反映在带有悲剧情绪的叙事谣曲之中。英雄的民族解放斗争主题，体现于叙事体裁之中，但主要体现于民族历史和讽喻的叙事诗之中，并以一种叙述的诗歌创作形式在诗歌的传说和神话中展开。对民歌、叙事谣曲、民间故事的加工和模仿十分流行，原创作品都具有民间文学的形式。人物象征性形象的塑造，斯洛伐克大自然和人民生活的画面，以及这些画面常常采取的假定形式及其所鲜明表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都体现了浪漫主义典型化的原则。

斯洛伐克的浪漫主义从一开始就沿着几条思想主题和风格线索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诗人萨莫·赫卢普卡，安德烈·斯拉特科维奇，扬·克拉尔和扬·博托。散文中的代表是扬·卡林恰克和约瑟夫·库尔班。

萨莫·赫卢普卡(1812—1883)以自己的具有民间故事、战斗歌曲精神的爱国战斗诗歌《哥萨克》(1846)、《里卡夫的囚徒》(1847)等而独树一帜。他在体现了斯洛伐克人民的主人公的性格中，歌颂了热爱自由和积极反抗民族奴役。他的英雄、哥萨克，崇高的强盗的唯一生活使命，就是战斗；他内心世界的内容就是在看到祖国和人民被奴役时的痛苦，对被剥夺的自由的忧虑。他综合了民间文学的传统，所塑造的不仅仅是概括性的、宏大的人民战士形象和祖国形象，而且也概括性地描述了“真理和谎言”之间的搏斗。诗歌中对奴役的抗议具有包罗万象的(民族和社会的)意义。在简短的扬抑格四行诗中，他如此忠实地表达了斯洛伐克民歌的音韵和无畏，以至于他的诗歌常常难以从大量的民间创作中区分开来。

安德烈·斯拉特科维奇(1820—1872)的诗歌中大多数是开掘个性内

心世界的公民抒情诗。叙事诗《玛琳娜》(1846)、《幼蜂》(1847年、1853年出版)以及捍卫斯洛伐克语言和同胞的政论诗(《不许侮辱我的人民》及其他),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荣誉。众所周知,斯拉特科维奇的抒情主人公常常展现于沉思和内省中,其情绪为人民受压迫的地位所决定。在叙事诗中,特别是《玛琳娜》里,斯特拉科维奇表达出了在其他斯洛伐克浪漫主义者创作中很少见的对物质世界,对生活欢乐的兴趣。叙事诗《幼蜂》歌颂了普通人民崇高的道德品质,并从中看到了斯洛伐克幸福未来的保障。

斯拉特科维奇是最早超出直接以民间文学传统和手法为目标,并对诗歌语言进行加工的人之一,他将很大的注意力转移到诗歌结构中的分节、韵律、语调、声响等。

扬科·克鲁尔(1822—1876)是斯洛伐克浪漫主义文学中激进一翼的诗人,他将社会罪恶问题视为社会不平等和社会压迫的问题,他的主人公的性格与其说是种族学意义上的,不如说是更具社会特征的。克鲁尔把农民同地主的斗争英雄化了,描绘出了农民造反者的形象(关于雅诺什克的组诗,1844—1848年)。克鲁尔的爱国主义思想同人民革命的思想融为一体。他关注民间文学,把握了与激进观点最贴近的社会反抗主题,把握了被压迫者和被欺侮者兄弟情谊的意识,以及叛逆者热爱自由的意识。诗人大都在与现实规律相适应的方面描写现实,这已成为他创作中现实主义成分的来源(关于雅诺什克的组诗,叙事诗《草原之子》和《施采特》及诗歌《恶魔》等)。在哲学叙事诗系列《世界戏剧》(1843—1846)中,克鲁尔从整个世界历史的规模中展现了对现实的浪漫—悲剧性的阐释,在抽象的层次中叙述善恶斗争的永恒性。

扬·博托(1829—1881)四十年代创作中,最具特点的体裁是浪漫主义寓言(《斯洛伐克风情》、《上流社会的勇士》和《克拉特·塔德》),在象征的假定性形象中描绘出斯洛伐克被压迫的地位和争取自由的斗争。在革命前的岁月里,他创作了大量的抒情叙事诗,使用了摆脱诅咒的叙事谣曲主题。他的主人公体现了行动积极、追求功绩的浪漫主义精神。

散文体裁中的旅行随笔(其优秀的典范为约·库尔班的《拜访莫拉夫和捷克的斯拉夫兄弟旅行记》,1841年)和历史小说,曾风靡一时。

最大的浪漫主义流派散文家是扬·卡林恰克(1822—1871),他著有以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勇斗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波兹科维奇》,1842年;《米尔科的坟墓》,1845年;《斯洛伐克小伙子》和《里普多夫斯基公爵》,1847年;《神圣的灵魂》,1848年)。他描写的遥远年代的小说,就其思想美学倾向而言,是和当代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卡林恰克的主人公是一位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或为善良、诚实、公正的理想而自我牺牲的斗士。为了这些

崇高的目标他们准备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爱情、生命。早在四十年代的小说中，尽管情节、人物形象和叙述风格浪漫化，充满主观—抒情的插叙，但卡林恰克就显示了不仅要通过“卓越个性”的性格来揭示这面三棱镜时代的心理，而且要揭示民主主义阶层的代表者，并力图传达出时代的色彩。卡林恰克在引入日常生活体裁的场景时，便直觉地触摸到一条通往遥远过去的形象和画面的现实主义的真实之路。

引人注目的散文家还有什图尔最亲密的同志、继承者约瑟夫·库尔班（1817—1888），他在组织四十年代斯洛伐克的文学生活、传播和确定什图尔的民族纲领中，在1848—1849年的革命事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他的历史小说《大莫拉夫国王的婚礼》（1842）和《圣普鲁科维奇，或大莫拉夫王朝的衰落》（1844），尤其是《奥列卡尔》（1846）以其引人入胜的形式，再现了近乎神话的斯洛伐克人民的过去历史。库尔班创作了以现代生活为素材的小说《从西尔维斯特到三个魔法师》（1847），嘲笑了小市民习气，在对外省小市民生活的描述中得以看到其现实主义倾向。

四十年代，以浪漫主义的什图尔流派为代表的斯洛伐克文学经历了真正的创作繁荣期。在革命前几年的创作，要比半个世纪前的创作都多，而且那些有艺术价值的作品，继续以崇高的理想在教育着后一代斯洛伐克的读者，一直到今天。民族文学过程问题的理论研究已经开始，文学语言得到了改革，尽管在革命后的年代里，社会政治充满了戏剧性的曲折，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

506 ·

第四章 保加利亚文学

十九世纪初，保加利亚文学的民族倾向和启蒙主义倾向继续发展，它们产生于十八世纪下半叶，其最卓越的表达者是保加利亚第一位民族自我意识的“唤醒者”派西·希林达尔斯基，他是流行作品《斯拉夫—保加利亚史》（1762）的作者。这时文学越来越脱离教堂—宗教的教条，转向各种亟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唤醒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意识开始成为文学的主要任务。宗教界的进步代表、正在形成的商业资产阶级，而后是世俗学校（从1835年起）中的保加利亚进步教师，这些人发表了大量的训诫、教学和政论性作品。此时保加利亚的印刷业开始形成，起初在境外，而后来也出现在保加利亚的各个城市。

最早出版的都是些宗教内容的作品：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传记文学以及日历——混合性内容的集子，其中包括故事、诗歌、忠告、格言、寓言。十九世纪中叶诗歌开始发展起来，占绝大多数的是颂诗和爱国主义诗歌。

保加利亚文学在奥斯曼帝国长达四百多年的压制下艰难地发展着。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在保加利亚的土地上恣意横行的是基尔贾林人——土耳其的强盗队伍，他们到处烧杀掠夺，把保加利亚的许多村庄和城市变成废墟。这证明了土耳其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在文学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保加利亚境外的各文化中心——塞尔维亚、多瑙河各公国、俄罗斯，以及君士坦丁堡。

在文学生活还不发达的条件下，保加利亚作家就充分利用其他国家文学的经验和实践。在第一阶段，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关系获得极大成效，同时与西方各国建立了科学思想联系，而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加强并确立了保加利亚与俄罗斯的文化和文学关系，从而促进了两个斯拉夫民族的文化接近，促进了保加利亚民族文学的建立。

十九世纪初保加利亚文学中第一位著名人物就是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1739—1813)，剃度前名叫斯托伊科·弗拉季斯拉沃夫。他接受了帕伊西·席伦达尔斯基的思想，并成为其忠实信徒。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的启蒙、翻译和文学活动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展开，那时他在弗拉察被授予主教，并在布加勒斯特进行活动。1802 年他的两部所谓《维丁集》问世，它们是用保加利亚语写成的，接近于口语。书中除了一些教堂的布道和训诫外，还收录了许多启蒙特点的作品，以及辛基普·菲洛索夫的神话片断、伊索寓言和一些教诲性故事。在《哲学家的智慧》中，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将无聊的僧侣与"贤明的达斯卡尔们"的教师进行对比；后者促进"书本学习"并关心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这些思想与塞尔维亚启蒙者多西费·奥布拉多维奇的观点彼此呼应，而多西费·奥布拉多维奇也是凭借欧洲启蒙主义者的唯理论思想经验。1806 年在勒姆尼克(罗马尼亚)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刊印了第一部新保加利亚书《基里阿科德罗米翁，即星期读物》，这是一本取自《福音书》和《圣经》故事的劝谕集子，用于教堂祈祷和家庭阅读。书中这位唯理论哲学家坚持必须提高民族意识——"保加利亚民族的"意识。

索弗罗尼·弗拉昌斯基最重要的作品是他的自传，按照传统他把它称作《罪人索弗罗尼的生平和苦难》。手稿没注明日期，但大多数学者认为它出现在 1804—1805 年之前，最先由保加利亚诗人和革命者 Г. 拉科夫斯基[①]于 1806 年发表，并成为文化生活中的一件重要大事。

索弗罗尼的这部《自传》与其说是关于一位教会活动家生动感人的故

---

① Г. 拉科夫斯基(1821—1867)，保加利亚革命家、作家。建立了第一个保加利亚军团(1861)，组织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游击队(1866—1867)。——译注

事，不如说是一则关于一位保加利亚人在奥斯曼帝国的压制、各种内讧以及基尔贾林人的侵袭下丧失起码人身权利的故事。作者再现了土耳其政权实施暴政、恣肆专横的真实画面，再现了保加利亚居民——从农民和手工业者到教师和牧师的极端贫穷和无权地位。

507· 这部故事极具历史文献价值，同时也是一部用生动活泼的口语进行创作的充满激情的故事。索弗罗尼的这部书是保加利亚文学中塑造被奴役个性形象的最初试作，引起读者的普遍赞许。实际上，这是一部独出心裁的中篇小说，它为保加利亚散文体裁的形成开辟了道路。

在保加利亚的启蒙和教育发展中迈出重要步伐的是彼得·别龙（1799—1871）的活动。他是一位大商人的儿子，从一位在布加勒斯特学校任教的知识渊博的希腊人 K. 瓦尔达拉赫那里获得良好教育，后来又在海德堡大学研究哲学，在慕尼黑大学学习医学。《有各种教导的识字课本》（1824）为别龙带来巨大声誉。这是第一本含有保加利亚语字母表和语法的保加利亚教科书，其中包括历史、自然、地理和算术知识。别龙按照希腊、塞尔维亚和俄罗斯的教科书样子，用口语编写成自己的教科书，并预定以现代班级教学方法为对象，到十九世纪中叶这本教科书再版了五次。

由于对自然科学思想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别龙四十至五十年代在巴黎、伦敦、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生活过。他专心致力于物理、数学、地质、化学、气象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他筹备并出版了三十二本德语、法语和希腊语书籍。别龙是保加利亚第一批知识渊博的学者之一，他自觉地掌握了唯理论思想并在保加利亚大力宣传，为保加利亚启蒙运动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道路。

与其同时开展活动的还有另一位保加利亚文学家、启蒙主义者瓦西尔·阿普里洛夫（1789—1847）。他出身于商人家庭，曾在一所希腊语学校学习，后来毕业于罗马尼亚的一所德语中学，而后又在维也纳学习医学，但由于生病被迫辍学，最后定居敖德萨，在那里他经常与俄罗斯的启蒙主义者和斯拉夫学者交往。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的是 Ю. И. 韦涅林的作品《古代和现今保加利亚人在政治、民族、历史和宗教方面与俄罗斯人的关系》（1829），这本书，据阿普里洛夫说，在他身上唤醒了真正的“对民族的爱”。总之，应该指出，韦涅林在保加利亚民族复兴中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所以同时代人和后来的保加利亚研究者们都给予他高度评价。

阿普里洛夫是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学校——加布罗沃学校（1835）的创始人之一。作为语文学家他积极参加讨论本族语言的作用和历史，在这方面他表现出惊人的博学。阿普里洛夫促使敖德萨成为保加利亚文化的重要中心，许多保加利亚青年在这里受到教育。他自觉地为保加利亚人指明方

向——努力掌握俄罗斯的启蒙、教育和文化经验。在一封致保加利亚教师P. 波波维奇的信中，他强调只有从俄罗斯人那里，保加利亚人才“能得到各种帮助用以发展自己的启蒙教育……只有在俄罗斯接受过教育的人才能施展才华造福自己的人民，所以让每一个爱国主义者都好好接受这一点吧”。

阿普里洛夫最重要的作品是《新保加利亚教育的朝霞》(1841)，在敖德萨用俄语出版。作者竭力向俄罗斯的社会人士介绍在保加利亚如何推广教育，以及那个自古以来就与俄罗斯人关系甚密的斯拉夫民族如何生活。《新保加利亚教育的朝霞》和第二年出版的本书的《书补》一样，都具有历史—语文特点，两者都对民族文化自我意识的觉醒充满信心和感奋。在韦涅林的影响下，阿普里洛夫开始收集保加利亚的民歌并极力建议其他人记录和研究这些民族遗产。

在保加利亚启蒙主义文学的发展中，那些坚持保加利亚教会脱离希腊教会的具有新思想的教会活动家们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其中最重要的爱国主义者就是涅奥菲特·博兹维里(1785—1848)。由于他奋不顾身地反对希腊的宗教界代表而被同时代人起绰号为“博兹维里”——“不驯服者”。因许多作品都充满启蒙主义思想，所以他多次被捕，在寺院的刑讯室里受尽煎熬，最终被希腊的僧侣折磨而死。

涅奥菲特·博兹维里的重要作品《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幼儿课本》(1835)，是和教师Э. 瓦西基多维奇共同创作的，三十至四十年代在保加利亚的学校里广泛流行。书中包括识字入门、阅读文选、语法、算术、地理和尺牍。后来他又创作了两部享有盛誉的对话集：《博学的欧洲人、垂死的母亲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的儿子》、《可怜的母亲保加利亚的哭泣》。涅奥菲特·博兹维里采用当时在保加利亚十分流行的希腊文学对话形式，而内容则充满爱国主义和唯理性—启蒙主义的思想。作家的立场观点通过寓意性人物柳博米尔(热爱和平)、多布罗米尔(善良世界)、博学的欧洲人表达出来，而可怜的母亲保加利亚象征着祖国的悲惨命运。她是一位保加利亚农民，裹着“黑乎乎的围巾”，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站在扬特拉河岸——这是个令人想起保加利亚昔日辉煌的历史地点。

·508

三十至四十年代保加利亚的诗歌得到发展，主要是音节诗。在体裁方面大多是辞藻华丽的颂诗，例如《痛悼Ю. И. 韦涅林》(Г. 佩沙科夫)、《颂扬古代保加利亚人及其祖国》(Х. 尼科洛夫)。四十年代奈·格罗夫、Д. 钦图洛夫、П. Р. 斯拉维科夫三位诗人几乎同时出现，他们在保加利亚民族诗歌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两位的创作在克里木战争(1853—1856)后得到充分发展，而奈·格罗夫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在诗歌方面留下不可磨灭的足迹。

奈坚·格罗夫(1823—1900)属于保加利亚的那一代年轻人，他们在俄罗斯获得教育，全部的创作、科学和社会活动都与俄罗斯的进步思想和俄罗斯文化联系在一起。奈·格罗夫在敖德萨中学毕业后，又上了黎塞留高等法政学校，毕业后取得俄罗斯国籍，并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在普罗夫迪夫担任俄罗斯副领事长达二十年之久，对保加利亚文化生活中的许多民族创举予以有力支持。当保加利亚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的压迫后，他离开了社会活动，而把自己奉献给科学事业。他编写了五卷本词典《带保加利亚语和俄语词汇注释的保加利亚语词典》(1895—1904)。

作为诗人，奈·格罗夫以几首抒情诗尤其是长诗《斯托扬和拉达》(1845)而获得声望。这首长诗讲述的是两位年轻人由于与父母的独断意志发生冲突而导致爱情悲剧。两位恋人的痛苦以感伤浪漫主义的特征表达出来：按照母亲的意愿斯托扬要娶一位自己不爱的姑娘为妻，但是就在举行婚礼的时候他和自己心爱的姑娘双双殉情了。长诗的结尾是两根树枝编织在一起，在民族诗歌中这象征着永恒的爱情。格罗夫根据俄罗斯诗歌的经验，采用音节—声调并重作诗法，利用民族诗歌中的修饰语和对比手法，使长诗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好像是处于保加利亚民族诗歌的源头。

这一时期翻译文学也获得发展，用保加利亚语出版了乌克兰作家 Д. 布赖凯维奇的《贵族的选择》(1843)、德国作家 X. 特劳茨申的《韦利扎里》(1844)、法国作家 Ф. 费纳隆的《忒勒马科历险记》(1845)，以及大量具有道德—感伤特点的俄罗斯作品。从四十年代末开始广为流行的还有 H. 库尔加诺夫的《自学语文读本》和 A. 加拉霍夫的《俄罗斯文选》，它们促进了俄罗斯作家的作品在保加利亚的流传。

保加利亚的期刊创始人是 K. 福季诺夫(1790—1858)，他出版了保加利亚第一本杂志《趣事》。杂志第一期 1842 年在士麦那(土耳其)出版，从 1844 年到 1846 年定期在那里出版。杂志上刊登一些关于农业、商业的文章，还有政治生活方面的消息，以及原文和翻译的诗歌、醒世故事、谚语和俗语。杂志在保加利亚和旅居俄罗斯、塞尔维亚、罗马尼亚的保加利亚侨民中流传。由于 K. 福季诺夫在杂志中竭力保留教会斯拉夫书面语传统，从而影响了杂志的发行量。

随着世俗学校在保加利亚的发展和采用母语进行教学，使用统一的全保加利亚文学语言的问题就变得十分重要。语言成为唤起民族自我意识的一种手段。在争论语言的规范途径时出现了两种斗争倾向：一种希望保留教会斯拉夫文献的传统(K. 福季诺夫等)；另一种则依靠生动活泼的口语经验。作为比较进步的第二种，在诗人 П. P. 斯塔维科夫和 Д. 钦图洛夫的文学实践中得到具体体现，而后来又由民族复兴时期的大作家——Л. 卡拉维

洛夫和 X. 波特夫将其发扬光大。

1846 年由 И. 博戈罗夫(1820—1892)主编的第一份报纸《保加利亚的鹰》在莱比锡出版。该报的编辑提出唤起民族自我意识、发展生动的口语文学的思想作为自己的纲领。到 1847 年初报纸发行了三期,但是从 1848 年开始,博格罗夫由于获得准许出版先前在君士坦丁堡出版的报纸《萨尔格勒[①]公报》,便中断了《保加利亚之鹰》的出版。

保加利亚文学在十九世纪所走过的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是以启蒙主义思想的确立、文化和文学生活的发展为标志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保加利亚文学中许多发展倾向已初具轮廓,它们将在以后继续蓬勃发展。这不仅体现于保加利亚印刷业的出现、定期出版物的发行、翻译作品的涌现,也体现在本民族自身文学艺术的形成中。在各种文学体裁中最发达的是诗歌,先是颂歌,后来是抒情诗歌。

在诗歌中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并存,并经常相互交叉,而奈·格罗夫的长诗达到这一发展时期的顶峰。

第五章 塞尔维亚和黑山文学

十九世纪初塞尔维亚史以民族解放和反封建运动高涨著称,其高潮是 1804—1813 年和 1815 年两次反奥斯曼占领者的武装起义,最重要的结果是解放了塞尔维亚部分领土,并建立了塞尔维亚公国(1833 年,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不过塞尔维亚人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分离状态保留了下来,因为居住在多瑙河北岸的塞尔维亚人(1848 年该地区叫沃叶沃丁那,中心是诺维萨德)仍由哈布斯堡君主国管辖。塞尔维亚人本土以外的文化文学策源地也继续存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塞尔维亚文化文学领域的许多创举都与佩斯、维也纳、布拉迪斯拉发密不可分,当时不少塞尔维亚知识分子和作家都在这些地方生活、学习和工作。

以塞尔维亚语发展文学的独立区域是黑山。十八世纪末黑山人战胜奥斯曼占领者奠定了这个国家实际独立的基础,并成了文化文学民族复兴过程的发展契机。不过与强大敌人的持久斗争,也耗尽了这个本来就不够富裕的地区。民族文化是在国家极端落后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国家还保留着氏族制度,文化发展极其缓慢。黑山文学形成的重要因素是它同南斯拉夫各民族文学尤其是同塞尔维亚文学密切的交互作用,它们的语言相同,

---

① "帝城",俄国昔时对君士坦丁堡的称号。——译注

种族同根,某些历史文化传统也相近。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发展的特点是,黑山文学和塞尔维亚文学混同发展的倾向占上风。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解放运动的高涨以早期浪漫主义的最初特征反映在文学上。奥布拉多维奇及其老战友以其创作活动提出了民族启蒙阶段的各项任务,人们在为解决这些任务而积聚力量。这时的塞尔维亚文学集艺术发展各阶段的种种传统于一身,以其丰富的过渡和混合形式及现象为特点。开始三十年具有民族启蒙成分的现象占优势,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浪漫主义则在四十年代末进入繁荣阶段。

十九世纪上半叶,表现出一些重要的文化启蒙创举。比如,出版了各门各类科学书籍;创办了几种语言学和文学期刊(报纸副刊《塞尔维亚新民间口头创作》,维也纳,1813—1833 年;文学杂志《塞尔维亚编年史》,布达,1825 年;最后是《塞尔维亚编年史马蒂察》,一种最古老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杂志);在南斯拉夫建立了第一个文化启蒙和科学协会塞尔维亚马蒂察(佩斯,1826 年);1835 年在克拉古耶瓦茨开办了一家常设剧院(以此圆满结束作家 И. 武伊奇在该领域的多年活动)。翻译和改写各个时代各种流派的西欧和俄国作家作品,继续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俄文书籍向斯拉夫人介绍文学作品,是十八世纪形成的传统,它仍然是十九世纪初文化氛围的特征,因为俄塞语言相近,无需翻译)。

510 ·

十九世纪头几十年文学过程中占明显地位的一代人,其创作都深深扎根于沃叶沃丁那,该省早在十八世纪就为塞尔维亚民族文化复兴发展运动奠定了基础。这一代民族启蒙家接受着相互矛盾的两种民族生活因素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解放,塞尔维亚文化的民主化问题更加尖锐;另一方面,则存在对这一过程的反抗,反抗来自强大的塞尔维亚教会。沃叶沃丁那的教会既是一股宗教势力,又是一股世俗势力,教会曾在外国奴役者实施强迫同化政策时,为发展塞尔维亚文化教育做过不少事情,现在由于惧怕反封建运动,他们便利用自己的影响,组织保守势力对文学语言领域的先进思想进行猛烈攻击。

这一代人的文学探索与十八世纪的启蒙思想和体裁体系相关连。立足于塞尔维亚文学土壤的体裁特点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倾向的共存与交织。

古典主义最鲜明地体现在卢基扬·穆希茨基(1777—1837)的诗歌里,他是当时最有文化教养的一个人,古希腊罗马诗歌(包括贺拉斯)的翻译家,杰尔查文的热情读者。穆希茨基的诗歌在十八世纪祖国诗歌传统的交叉点上展开,表现出它特有的高尚精神,对人民命运和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古典主义诗歌命运的忧虑,与诗人秉性特别相符的对公民爱国主义责任

的尊重，问题的广阔性，以及雄辩家诗人的形象。穆希茨基以抒情—醒世的颂诗步入文坛，其中的优秀诗篇都以充满高尚道德的启蒙主义和民族爱国主义理想的热烈宣传，面对同时代人（《人民热爱者之声》，1819 年；《希沙特瓦茨基修道院的琴声》，182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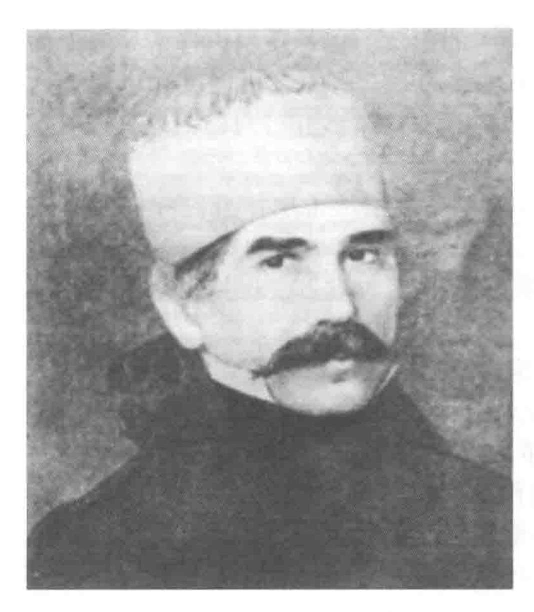
作为文学“双语”传统的拥护者，穆希茨基虽然也用接近民间的语言写作，可是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是用所谓“中间音节”写成的，这是一种受“斯拉夫—塞尔维亚”书面语古老标准束缚，并使作者诗歌思维保持一定抽象性的语言。

开始几十年的启蒙主义散文趋向于感伤主义，通常可归于田园风格和比德迈埃尔风格。虽说如塞尔维亚长篇小说奠基人米洛万·维达科维奇（1780—1842）的范本所表明的那样，这些折中形式的作品，提供的不过是十八世纪欧洲尤其是德国文学二流作品的塞尔维亚方式的改编，但它们在向塞尔维亚人推荐书籍中的作用还是不可低估的。

随着各种新力量涌入塞尔维亚社会的精神生活，人们越来越迫切要求文学面向人民生活、文化和语言（口头诗歌创作已经经历了它的高潮，而来自于它的独特创作冲动正在到来）。以民间口语为基础来改革语言已成了时代的当务之急。这个问题的解决应归功于塞尔维亚民族复兴的思想家武克·卡拉吉奇（1787—1864），他是一位卓越的语文学家、民俗学家和作家，斯拉夫其他各民族复兴活动家（П. Й. 沙法里克，科皮塔尔等）的学生和战友。

卡拉吉奇是农民之子，出生于塞尔维亚民族解放运动最活跃最激烈的瓦列夫边疆区，参加过 1804 年起义。与人民的密切联系决定了他全部活动的性质。1814 年，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自学者，一个起义支队的老文书，卡拉吉奇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塞尔维亚民歌集《斯拉夫—塞尔维亚民歌选》和第一部塞语语法《塞尔维亚民间语语法》。1818 年他出版了著名的《德语拉丁语阐释本塞尔维亚语词典》。这些著作奠定了以民间口语为基础的文学语言原则，确立了表音正字法。卡拉吉奇收集民间创作的大规模活动使他得以发现民间文学中人民历史命运的丰富材料，及其民族精神、道德和诗歌观念的表现（卡拉吉奇出版最重要的民歌集是在 1815 年，1823—1833 年，1841—1862 年，谚语俗语集是在 1836 年，民间故事集在 1853 年）。

卡拉吉奇是塞尔维亚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他在一系列著作（首先是 1817 年出版的《塞尔维亚评论集》下册）里，奠定了文学概念的基础，促进了塞尔维亚浪漫主义的形成。他提出发展文学的主要标准是同民族原则建立联系，这一概念又贯穿了卓越活动家旨在的社会民主阶层，首先是以农民为民族“核心”的对象。



武克·斯特凡诺维奇·卡拉吉奇 肖像画
Д.阿夫拉莫维奇作 1840年
贝尔格莱德国家博物馆藏

文化的民族独特性原则，把卡拉吉奇的概念同浪漫主义联系起来，这一原则是十九世纪初塞尔维亚人民生活中的具体历史事件提示给他的，也是民间创作的艺术本质提示给他的。同时，这一思想的定型是在外族的影响下，首先是在德国（赫尔德）美学思想的影响下发生的。

进步和保守势力围绕着卡拉吉奇提出的文学语言改革展开了斗争，实质上这是一场围绕着民族文化、语言和文学的未来发展道路展开的斗争，它成了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塞尔维亚文学——美学和意识形态生活的基本内容（三十至四十年代特别尖锐）。虽然卡拉吉奇的改革直到1860—1868年才得到充分承认，但它通向胜利之路早就确定了。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先进知识分子对卡拉吉奇创举的积极支持促进了这一过程；两个民族的著名民族复兴活动家，于1850年在维也纳签署了一项关于以什托方言（伊耶次方言）和统一表音正字法为基础的、统一文学语言的协议。塞尔维亚学者的活动得到国际承认，也起了重要作用。卡拉吉奇被选为许多欧洲科学团体的荣誉成员，其中包括彼得堡科学院通讯院士（1851）。他出版的塞尔维亚民歌得到诸如普希金、密茨凯维奇、歌德、格林兄弟、梅里美这样一些当代欧洲文学杰出代表的高度评价。

卡拉吉奇的战友之一，是在1804—1813年和1815年起义队伍中战斗过的西马·米卢蒂诺维奇-萨拉伊利亚（1791—1847）。

米卢蒂诺维奇的创作，处于尚未最终实现理性主义文化传统的范围内，处于发生世界感受交替，产生浪漫主义原则的时期，他的创作仿佛吸纳了过渡时期各种不同而又相互紧密交织的倾向的交叉影响，因而对民族文学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像十九世纪上半叶大多数塞尔维亚文化代表一样，自学成才的米卢蒂诺维奇把民间创作看作自己的主要学校。此外，钟情于奥布拉多维奇的启蒙思想，1819—1825年赴南俄旅行期间与俄国文化的直接接触，逗留德国（1825—1827），其中包括与赏识他叙事诗《塞尔维亚记》的歌德会面——所

有这一切都对作家吸收发达的欧洲文化传统起了促进作用。

米卢蒂诺维奇写过各种体裁的作品——从早期具有主观抒情性，对宇宙奥秘及周围大自然进行哲理沉思的诗歌(1816—1817 年创作的《维丁系列文集》)，到历史著作和历史剧《悲剧奥比利奇》(1837)。密茨凯维奇 1842—1843 年在法兰西学院讲课的时候，曾把悲剧同普希金的《鲍里斯·戈都诺夫》和克拉辛斯基的《非宗教喜剧》作为例子放在一起引用，因为在他看来，悲剧对通过戏剧场景发展民间叙事诗是有代表性的。 ·512

但是，米卢蒂诺维奇进入塞尔维亚文坛，首先是由于民族解放斗争的戏剧叙事诗《塞尔维亚记》(1826)。他在诗歌中首次尝试思考不久前解放起义的事件，而叙事诗也因此为同代人所珍惜(尽管它冗长，有很多含意模糊的寓意，充斥着沉重的古旧语言)。米卢蒂诺维奇以爱国主义为题材的宏伟叙事作品，如同一部塞尔维亚《伊利亚特》，而他构思的这部叙事诗却发端于民族英雄主义的民间创作。不过，作者在俄罗斯创作的这部叙事诗，也接受了俄国古典主义最鲜明的典范——赫拉斯科夫的叙事诗《罗斯记》的影响，它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内容和构思的规模与米卢蒂诺维奇的情绪是一致的。而且米卢蒂诺维奇的这部叙事诗，又以其许多特点预示了塞尔维亚诗歌未来的浪漫主义发展道路。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诗人把解放斗争作为人民功勋来理解，又把起义领袖卡拉乔尔杰作为民族英雄来理解。诗歌语言中表现出作者奔放无羁的幻想和新词创造的随意，它已经打破了作为文学和精神生活原则的教条——这又是通向未来的一大步。

二十至三十年代，塞尔维亚散文发展的崭新阶段，是同一批从解放运动来到文坛的作家分不开的。散文的复兴过程是把长篇小说的书面传统撂在一边，而与回忆录、历史著作、书信、政论等所谓“二流序列”的体裁建立联系。其中最有意义的作品是著名解放运动活动家、军人兼外交家马太·内纳多维奇(1777—1854)的《回忆录》和卡拉吉奇的历史散文(《反土游击队员韦尔科·彼得罗维奇生活纪实》，1826 年)，以及他的政论、书信。人民生活成了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些作者通过人民生活的棱镜来领会历史，而在历史中突出了反对奥斯曼压迫的民族解放起义事件及其参加者和英雄。革新特点还表现在民间语言的运用上。这些散文用民间口语写成，通过在民间口头故事基础上形成的文体，以幽默并能传达人民思维特点的生动语言表现出来。这种与口头散文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散文，同时保持着与古老塞尔维亚文学传统(其中包括言行录)的联系，并在民族因素多方面的体现中表现出它同浪漫主义文学的联系。同时，在忠实描写所反映的现实生活中，在准确选择情节和语言中，也体现了作者们对现实主义创作的向往，从这方面来讲，二十至三十年代的散文(首先是卡拉吉奇的散

文)预示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的发展。

塞尔维亚人民生活中与民族解放斗争有关联的变化,文学发展新原则的形成,受解放运动和卡拉吉奇革命化思想鼓舞而创造的首批民族文学作品,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生活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的,以及沃叶沃丁那的作家群。他们之中有一位是著名的塞尔维亚戏剧家约万·斯泰里亚·波波维奇(1806—1856),是他为民族戏剧的剧目奠定了基础。他以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启蒙主义精神开始了自己的文学活动,翻译了与他同样具有热爱自由情绪的新希腊诗人(里加斯·维列斯金里萨、阿达曼蒂奥斯·科拉伊斯等)的作品;仿作了维达科维奇的散文,以唤起同时代人的民族爱国主义情感。但这位小说家在现实生活面前孤立无援,当年曾被卡拉吉奇讥笑,这促使他创作了第一部揭示作家主要才能——讽刺技巧的作品(讽刺摹拟性小说《不是小说的小说》(1832—1838)。启蒙主义者斯泰里亚认为戏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特殊意义,并在自己活动的各个时期都重视对历史剧和悲剧体裁的创作和研究,把往事视为当代人的训诫。然而,他作为三十至四十年代这些剧本的作者和喜剧作家而获得了文学荣誉,例如《谎言家与撒谎》、《插上孔雀羽毛的乌鸦》、《悭吝人》、《爱国者》等。作者在喜剧结构中遵循了古典主义类型作品所特有的众所周知的规定,同时又拓展了直面生活忠实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体裁的范围(事实证明,塞尔维亚文学和其他许多文学一样,讽刺幽默传统作为这一过程的起源起了主要作用)。斯泰里亚的喜剧题材,同作者所熟悉的沃叶沃丁那省生活有关,那时这个省的资产阶级风气越来越强劲地渗入宗法制生活环境,崇高的民族爱国主义理想和已经确立下来的市侩重商主义道德,也发生了分歧。

尽管斯泰里亚的喜剧主人公相当单一,但由于他对所写的环境具有深刻的知识,善于以准确的语言描述人物,并依靠人民的幽默而创造出千姿百态的同时代人形象画廊,其中许多人物都成了普通名词。在斯泰里亚·波波维奇的喜剧里,十九世纪塞尔维亚现实主义讽刺基本问题的汇合点,同它的强烈反资本主义倾向连在一起,并预示着它的主要主人公类型将是卓有成就的资产者和小政客。

不过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发展的主潮,是由浪漫主义运动所决定的。这非常有力而明显地反映在革命前四十年代两位大诗人——黑山人彼得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和塞尔维亚人布兰科·拉迪切维奇——的创作里。

新黑山文学奠基人,黑山卓越诗人和国务活动家彼得二世·彼得罗维奇·涅戈什(1813—1851)从事写作的时候,黑山文学中占优势的倾向是同塞尔维亚文学的协同发展。

涅戈什是农民之子,黑山总主教兼第一位诗人彼得一世·彼得罗维

奇·涅戈什(1747—1783)的侄子，他开始享有黑山宗教和世俗统领权力时年仅十七岁，当时的黑山国宗法氏族制占上风，部落首领间势不两立的敌视常常导致危害很大的分立主义，并使本来已很艰难的对奥斯曼占领者的反抗，变得更加复杂化。涅戈什开办了黑山第一所小学(1833)，建立了那里的第一家印刷厂。涅戈什个人的人格力量很令人惊奇：他能集军人、统治者、诗人和思想家于一身。作为军人，打仗是他的家常便饭；作为统治者，他能为建立强大的独立国家而残酷地摧毁历代传统；作为诗人、学者，他似乎能从民间艺术思想的有力成分出发，奔向欧洲教养和精神文化的巅峰。涅戈什用多种语言读书，熟悉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的文学和哲学。天生的艺术直觉，同深刻理解文学发展以前各个时期特别是启蒙主义文学的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他准确无误地预示了新世纪的探索方向。他最心爱的作家是拜伦和普希金。黑山诗人不仅把普希金看成当代杰出的作家，而且把他看作其传统与自己特别相近的俄罗斯文化的代表。作为国务活动家，涅戈什不只一次访问过俄罗斯，并把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看作本国独立的保证。作为诗人，他以创作生涯的无数事实同俄罗斯文化联系在一起。比如，在他早期作品中，就有在罗蒙诺索夫颂诗印象影响下写出的颂诗。在他百读不厌的书籍中有杰尔查文、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的著作。涅戈什还翻译了《伊戈尔远征记》的片断，把他的民歌集《塞尔维亚的镜子》(1846)献给普希金。涅戈什对俄罗斯文化重大现象的领悟再一次证明了他个性的豁达。涅戈什的创作源泉在民间史诗中。民间史诗始终是诗人与之息息相关的那个生活环境中生动发展着的现象。诗人同欧洲文化交往越深入，他对发展民族传统文学和作为主要诗歌原则的民间创作的意义，就更加深信不移。卡拉吉奇的活动与涅戈什的解放志向完全一致，所以他积极支持卡拉吉奇的观念。同时，涅戈什创作个性的形成也和启蒙主义传统密不可分，特别在他三十年代的早期创作中以及一些古典主义颂诗和歌颂人民斗争功绩、人类思想与大自然宏伟的《自由记》(1835)中，都能感受到这一点。在启蒙主义传统的影响下，涅戈什天赋形成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对广泛哲学问题的概括，对大型抒情叙事形式的追求。这一特点在作家成熟期的创作中，即革命前的四十年代中，展现得最为充分。1844—1847年，涅戈什创作了他最优秀的作品，其中一部是长篇史诗《小宇宙的光线》(1845)，另一部是抒情叙事的诗剧《山地花环》(1847)。前者的基础是涅戈什的前辈从其他欧洲文学选出的上帝同撒旦作斗争的《圣经》情节(涅戈什的老师米卢蒂诺维奇-萨拉伊利亚也曾把这个情节纳入他的创作)。史诗的某些形象与涅戈什(通过俄文译著)熟悉的弥尔顿的《失乐园》传统相似。当然，涅戈什的史诗还源于作者本人对世界深刻而独特的理解，并与他对

·514

迫切的文化问题的完整综合相关，即黑山人民未来命运的问题，个人参与世界悲剧冲突和尖锐矛盾的问题。在古典主义作品的底蕴中，主观抒情原则得到了发展。

革命前的1847年，涅戈什创作了诗剧《山地花环》，它作为他最独特、规模最恢弘的一部作品载入南斯拉夫文学史册。《山地花环》是献给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的英雄和领袖卡拉乔尔杰的，戏剧以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黑山人民反对土耳其化的人的斗争为情节基础，奥斯曼帝国曾利用这些土耳其化的人挑起民族争端，破坏黑山人的反抗。同时，整个《山地花环》又充满现代性，贯穿着南斯拉夫各民族的主要问题，即民族独立问题，人民群众在争取祖国自由的斗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问题。不过戏剧的力量在于，这一肯定产生于人道主义诗人的内在戏剧斗争之中，诗人为无法避免的血腥战斗和悲剧性的损失所震撼，也为自己参与其中和对其损失负有责任所震撼。诗人的这些深刻的个人沉思，体现在长诗中心形象大主教丹尼拉和修道院长斯特凡身上。

人民原则决定了涅戈什这部优秀作品的许多特点。它反映了黑山人的日常生活和风俗特点，信仰、节庆、人际关系、大主教的作用以及宗法制社会的许多其他特征。人民生活的画面远不是静态的人种描述，也不是地方色彩的再现。浪漫气质的艺术家所面临的最高任务，是揭示人民精神和民族性格的特点，使之迷漫于长诗之中，跃然于纸上。涅戈什认为，这精神与特点的基础首先是热爱自由、民族尊严、英雄主义和热爱家园。同时，长诗多姿多彩的人物画廊揭示了人民精神的丰富性，其中有些人体现了勇敢大胆（米丘诺维奇）；另一些人体现为正义事业而斗争时的高尚人道主义志向和内在的豁达（曼杜希奇）；与人民智慧（斯特凡）同时出现的是矛盾天性的复杂心理（丹尼拉）。诗人对“文明世界”中已经形成的关于“小”民族蒙昧粗俗的言论，采取了当代的论战性态度。呈现在欧洲面前的不仅有此前未曾见过的文化层面，而且就其意义而言，还有出乎意料的人民精神风貌。

1848年前夕，涅戈什完成的这部似乎专写民族问题的长诗，以其热爱自由，抗拒加给个人及整个人民的奴隶命运而进入欧洲先进知识分子的语境，从这个层面说，涅戈什的世界观同浪漫主义存在交汇之处。在欧洲革命的前夜，诗人使自己的诗歌发出了人民的心声。长诗的形象体系及其内涵丰富、充满格言的文体，促进了真正人民智慧的汇集。人民的心声通过作者，也通过特有的民间科洛（一种巴尔干民间舞蹈，类似古希腊罗马戏剧的合唱传统）形式表现了出来（顺便说一句，涅戈什特别迷恋古希腊罗马文学，三十年代他曾翻译过《伊利亚特》的片断）。不过，《山地花环》中的科洛舞与黑山的民间传统密切相连，真正是源远流长，科洛与黑山民间传统相

适应，曾经是勇敢和力量之舞。科洛原以运动和多变见长，这种形式很好地折射出了涅戈什诗学所特有的摆脱古老形式的积极过程（这一过程，使那时正在发展中的整个塞尔维亚文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触动）。这一过程决定了长诗的结构，仿佛在暗示着一股生动的时代潮流。像在生活中一样，长诗结构把各种层次——宏伟的叙事情节和紧张抒情因素的戏剧性——融为一体。

在长诗的语言中，各个层面都综合在一起。作为卡拉吉奇的拥护者，涅戈什以民间口语作长诗的语言基础。不过他也创造性地对待全斯拉夫的传统。他长诗的语汇（像他的其他作品一样）包括了斯拉夫全民语词汇中的重要部分，似乎是在以此强调作者的创作同民族文化和斯拉夫文化厚重传统间的继承关系。在创建英雄的诗体中，诗人以革新的态度来对待作为等值成分之一的语言传统，这是涅戈什富有独创性及其创作阵地广阔的又一表现。

涅戈什的诗歌吸收了作为最重要成分的民间史诗和启蒙文化的传统，从而为文学开辟了一条广泛概括与思索人民命运和人的生活中永恒主题的道路。他的诗歌提供了一个把握宏大叙事形式的范例。然而，这一传统并没有找到它的直接继承者（这方面比较相近的例子，是克罗地亚文学中马茹拉尼奇的创作，他的创作同涅戈什的创作是平行发展的）。涅戈什的少年同代人和下一代塞尔维亚浪漫主义作家走的是另一条路。诗人布兰科·拉迪切维奇（1824—1853）的创作可以证明这一点，他的第一本书《诗集》和涅戈什的《山地花环》，都出版于1847年。

·515

欧洲解放运动日益高涨的四十年代，塞尔维亚知识分子纷纷到欧洲大学中心维也纳、佩斯、布拉迪斯拉发等地留学，沃叶沃丁那的农民、维也纳大学学生拉迪切维奇就属于这一代。这代人的观点是在大学生文学政治小组形成的，尽管他们的思想政治观点驳杂，却都忠于民族复兴和民族独立的理想，坚持包含公民政治自由要求在内的南斯拉夫和斯拉夫统一的思想。这一代塞尔维亚的未来文化活动家、作家和政治家都受到斯拉夫民族复兴思想家卡拉吉奇、克拉尔和什图尔的影响。他们吸收了（包括“青年德意志”在内的）其他欧洲各族人民解放运动更为广阔的概念。这一代人的文学美学兴趣范围，都取决于对独特的民间文化、民间诗歌、德国浪漫主义者的创作、黑格尔的哲学，以及拜伦、普希金、密茨凯维奇、玛哈诗歌的日益热衷。

布兰科·拉迪切维奇是抒情诗人，是关于爱情、青春、大自然诗篇的作者。他处于塞尔维亚浪漫主义抒情诗的源头，预示了这一诗歌后来发展的某些本质特征。拉迪切维奇的早期创作一方面源于沃叶沃丁那城市阶层的

抒情歌曲，另一方面源于他自幼就很熟悉的德国诗歌。德国诗歌特别吸引他的是其中的浪漫主义因素，特别与他相投的诗人是先前的乌兰德，后来的海涅(顺便说一句，塞尔维亚这位诗人也是以德文译著为媒介结识拜伦的)。他的抒情诗从德国浪漫主义那里吸取的经验，是塞尔维亚诗歌不曾熟悉的双重世界感觉，生活过程的动态及其不断的革新和未完成性。虽然拉迪切维奇在德国诗歌的吸引下，创作了不少抒情浓度极高的诗作(《忧郁的回忆》)，但其诗歌世界中一定程度上摆脱周围现实的感觉却日臻成熟。诗人并没有把这些诗收入他 1847 年的诗集，它们的问世都在诗人早逝之后。

受四十年代先进知识分子对人民生活和民间诗歌形式的兴趣的影响，拉迪切维奇也从关注城市阶层的抒情歌曲，转向酷爱并创造性地接受民间诗歌。在这一变化中起着重要作用的，是青年诗人在维也纳同卡拉吉奇的接近。拉迪切维奇成了一名为确立卡拉吉奇思想而斗争的最坚定最勇敢的斗士(他于 1847 年写的一首含有寓意的尖锐讽刺诗《路》，其矛头便指向卡拉吉奇的反对者)。虽然接受外来经验对拉迪切维奇抒情天赋的形成具有不小意义，但决定诗人创作灵感的主要源泉还是民族传统。

能够成为这一佐证的，是拉迪切维奇用抒情民歌体裁写的作品。诗人的创新不在于他再现民间主题、形象和诗歌手段时所运用的技巧(这在他之前就有了)。新颖之处是来自人民的有血有肉的生活感受，是抒情主人公的心理面貌，以及主人公身上特有的那种精神活力，对生活的热爱和那种直率、激情与幽默。拉迪切维奇的创作中折射出了浪漫主义的一个主要问题，即个性自由问题。塞尔维亚浪漫主义在继承启蒙主义者自由思想的同时，通常是从斯拉夫被压迫各族人民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民族层面来解决这一思想的，并把它看作人民的自由问题。拉迪切维奇的自由概念已扩展到个性和个人的自由。他的诗歌对于塞尔维亚文学发展来说，具有阶段性特点。拉迪切维奇用民间语言写作，敏锐地感受着民间语言的音乐性。对民歌韵律结构的创造性理解，奠定了他诗句语调丰富和节奏富于动态的基础。

516·

尽管拉迪切维奇的创作不同于先前阶段的文学，但继承的未必不是其主要传统——公民精神。拉迪切维奇收入他 1847 年诗集的一部抒情长诗《跟中学学友告别》，成了塞尔维亚诗歌的高峰之一。一群毕业于卡尔洛维中学而走向生活的年轻人的道别这一具体事件，引发出了这首叙事诗，它成了真正的青春颂歌。同时，这是一部通过祖国边疆大自然形象表达出爱国之情的诗作，是一部具有四十年代人崇高公民意向和浪漫激情的诗作，它在自己的感受中把两种相反的原则结合在一起——隶属被奴役人民的痛

苦情感,以及在革新生活、解放和联合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方面所充满的反抗情绪,还有对待其他人民的兄弟情谊。诗人继承了塞尔维亚文学中的公民性传统,并把它体现于一种全新的形式中。拉迪切维奇的叙事诗歌通过极富激情和形象性的结构,严整的节奏体系,渗透了诗人英雄面貌所特有的内在自由。

1848 年的全欧革命高潮也反映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尤其是在沃叶沃丁那。革命事件开始阶段明显表现出人民为争取社会政治权利而斗争的性质。人民运动的浪潮席卷沃叶沃丁那的许多城市。先进的民族知识分子(沃叶沃丁那和塞尔维亚公国)把民族解放的希望同实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联系起来。拉迪切维奇对 1848 年法国革命以诗稿形式保存下来的致贺词,是青年中这种情绪最鲜明的表现之一,是他们对欧洲革命事件的同情。

然而在沃叶沃丁那决定事件进一步发展的是几股社会力量,它们狭隘地把被奴役人民的民族权利理解为运动的主要内容,这导致了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矛盾的尖锐化。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对奥地利君主国封建专制集团的妥协,使革命运动遭受失败,也使塞尔维亚人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起了悲剧性作用。1848 年事件也影响到了文学。民族爱国主义理想由于 1848 年革命的悲剧性转变而破灭,这在拉迪切维奇的创作探索中也得到了反映。在他的一些抒情长诗(《戈伊科》、《反土游击队员之墓》,1851 年,以及其他等)里,民族英雄的主题变成了失败的苦痛,哀歌的情绪和神秘主义的回声(同时,斯泰里亚·波波维奇的一部讽刺喜剧里,揭露成分变得更为尖锐)。后来,拉迪切维奇的一部没有写完而于 1924 年才出版的长诗《傻里傻气的布兰科》或《无名氏》的片断,反映了这一生气勃勃的过程,这一过程后来也出现在他的创作中,并把诗人(同他一起的还有塞尔维亚文学)引向艺术发展的现实主义新台阶。

争取民族解放和塞尔维亚土地统一的持续斗争,后来滋养了浪漫主义传统。五十年代初登上文坛的年轻一代作家——兹马伊、亚克希奇、科斯蒂奇——把浪漫主义作为文学发展的主线来接受。大约再过二十年,浪漫主义还将成为文学的主潮。

第六章 克罗地亚文学

克罗地亚文化是在外国占领者分割的土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前夜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而匈牙利王国又隶属于奥地利帝国。达尔马提亚这块土地在威尼斯割据后的 1797 年转入哈布斯堡,十九世纪头十年根据拿破仑意志(和杜布罗夫尼克一起),并入

意大利国土,1814—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决议又把它交给了奥地利。人民隔绝状态无法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不存在统一的克罗地亚文学语言。文学作品用三种方言创作(斯洛文尼亚的什托方言,克罗地亚的卡伊方言和达尔马提亚的查方言),同时拉丁文依然流布很广,哈布斯堡君主国又规定从1781年起德语为官方语言。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还有匈牙利语的移入(1827年规定克罗地亚中小学必须教匈牙利语)。

517·

克罗地亚文学由几种联系不算紧密的区域性文学组成,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启蒙主义倾向,其中的卡伊方言文学(以萨格勒布为中心)在十八世纪末发展特别明显,其最突出的成就是T.布雷佐瓦茨基(1757—1805)的创作,他的喜剧作品嘲笑了贵族和市民们的习俗。作家死后,卡伊传统削弱,这一独特文学的真空大部分由德国古典主义作品的译作和改编填充,而且往往是二流作品。后来,卡伊传统在聚集文学力量和建立统一的克罗地亚文学当中起了一定作用。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为称作伊利里亚的广阔社会政治文化运动所涵盖。十九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文学的主要成就都与它密切相关。

参加伊利里亚运动的是中小贵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运动核心是青年学者文学家小组,它由路德维特·盖伊(1809—1872)领导。他是一位信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诗人、学者,文学杂志《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达尔马提亚启明星》(1835年,1836年更名为《伊利里亚启明星》)的出版人。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种族同源和历史语言的共同性思想,奠定了伊利里亚思想观念的基础。运动由"伟大的伊利里亚"思想而得名,在其拥护者的概念里,这个思想能把据说是出身于古代伊利里亚土著居民的所有南斯拉夫土地上的居民联合为统一民族。产生于克罗地亚人民为争取民族生存而斗争中的这一思想,反映了由历史所制约的对斯拉夫各族人民彼此接近的向往,表达了他们联合一切力量抗击外族奴役者的志向。同时这一思想也包含了对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分离的否定,而他们在文化语言上的完全融合的倾向,与这些民族历史发展的过程是相矛盾的,因而未能得到这些民族的支持。总之一句话,伊利里亚运动的主要创举还停留在克罗地亚人民民族复兴的范围之内,它的重要历史作用也首先表现在这里。

在克罗地亚土地上,文化启蒙生活的高涨与伊利里亚运动密切相关。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陆续出版了克罗地亚文的报纸,社会政治文学丛刊和杂志,其中占据特别显著地位的是《启明星》(1835—1849)和《科洛》(1842—1853)。1837年开办了克罗地亚印刷所。克罗地亚戏剧活动也在进行,其中伊利里亚拥护者们把戏剧活动看成教育和唤起民族自觉的主要手段。出现了一些教育组织和协会,包括一个伊利里亚阅览厅和一个附属

于它的出版和文化教育中心“伊利里亚马蒂察”(1842)。

伊利里亚运动依据于斯拉夫友好合作的理想，并在与南斯拉夫和一般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密切接触中发展。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复兴的活动家沙法里克和克拉尔，及其著名和广为流行的长诗《光荣的女儿》，对伊利里亚理论与实践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以文化教育为基础的伊利里亚纲领，其中心点之一是创造统一的文学语言。它作为塞尔维亚文学语言，是在什托方言基础上诞生的。以这种语言创作出了许多杜布罗夫尼克文学的优秀作品和民歌。伊利里亚运动拥护者把建立在什托方言基础上的语言，视为团结处于分裂状态的人民和人民起而抗拒民族解体的手段。语言改革的基本原理，是1830—1835年间由路德维特·盖伊的著作(《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正字法简明基础》等)所阐述。以什托方言为基础形成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文学语言，打下了两地人的文学语言相互接近的基础，后来又为卡拉吉奇和伊利里亚运动代表签署的1850年维也纳专门协议所巩固。可是民族语言的确立过程也遇到过不少困难。改革家们为联合民族力量而放弃母语什托方言，其活动本身就具有献身精神。随着四十年代后半期克罗地亚—匈牙利矛盾日益尖锐，匈牙利当局为伊利里亚运动设置了不少障碍(1847年匈牙利语成了事实上的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官方语言)。不过，尽管遭遇很多困难，但语言领域的改革还是取得了胜利，其主要明证之一是，以统一民族语言为基础的克罗地亚文学得到了发展。 ·518

三十至四十年代克罗地亚文学发展中特别有益的因素，是跟克罗地亚人在精神和历史命运方面相近的各族人民文学生活的频繁接触，包括与捷克和斯洛伐克思想和文学生活的紧密联系。克罗地亚复兴活动家们，对俄罗斯文学及俄罗斯社会生活表现了极大兴趣。这一时期的研究家Й.巴达利奇后来曾说：“我们的改造活动像葵花向阳一样转向了俄罗斯。”在发展和巩固这两个民族的交往中，起特别巨大作用的是伊利里亚活动家同一批俄国斯拉夫主义者的直接交往，其中包括四十年代初曾住在萨格勒布的И.И.斯列兹涅夫斯基。1842年他曾专门为《启明星》办了一期《俄罗斯文学概观》(这本杂志从1832年开始刊载俄国文学概况)。克罗地亚复兴活动家，从斯列兹涅夫斯基和其他俄国学者那里得到了俄国书籍(有时还得避开检查)。这使他们得以了解俄国文学中最重要的现象及其当代流派。大多数伊利里亚运动的拥护者都懂俄语，阅读并翻译卡拉姆津、茹科夫斯基、克雷洛夫、莱蒙托夫等俄国作家的作品。其中普希金作品的翻译占有特殊地位，俄国诗歌中最有吸引力的是那些响彻公民爱国主义声音的作品。

与德国文学的交流也很有成效。人们通过德国资料了解拜伦的创作，

他的诗歌像对塞尔维亚作家一样，引起了这一时期克罗地亚作家的浓厚兴趣。

民族复兴的克罗地亚文学，在其形成中依靠的是启蒙主义传统，以及对这一传统具有代表性的崇高公民精神和爱国主义。在接受十八世纪民族文学经验，包括接受六十至七十年代斯洛文尼亚启蒙主义文学及其杰出代表M.雷利科维奇创作经验的同时，在古典主义拥护者中享有盛誉的还有十八世纪卓越的塞尔维亚启蒙主义者Д.奥布拉多维奇的创作。同时伊利里亚思想体系中贯穿的人民的民族独特性的思想，使浪漫主义美学吸引了克罗地亚的青年作家。面向民间口头创作在他们的创作探索中起了重要作用，而在这方面给予他们大力支持的，则是塞尔维亚民族复兴思想家武克·卡拉吉奇在民俗学领域的艺术发现。

克罗地亚复兴作家还继承了十五至十七世纪文艺复兴时代达尔马提亚—杜布罗夫尼克文学的独特艺术传统。伊利里亚拥护者对它的兴趣特别浓厚（在这方面他们与塞尔维亚民族复兴活动家不同，这种用拉丁文出版并因此与塞尔维亚居民接受不了的天主教相连的文学，对后者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以什托方言发展起来的达尔马提亚—杜布罗夫尼克文学，是创作以统一民族语言书写的新克罗地亚文学的重要支柱。

创作于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新克罗地亚文学的首批作品，在许多方面仍很稚嫩。青年作家不得不克服用更为熟悉的卡伊次方言写作的习惯，很多情况下又得放弃早期用德文写诗的经验。这种文学的特点之一是，在克罗地亚文学中跟在塞尔维亚文学一样，同时表现出了各种不同风格因素：有崇高爱国主义诗篇和颂诗中的古典主义因素，有叙述民族往事小说的感伤田园诗风格，还有浪漫主义的某些早期特征。外国材料的各种改写所起的作用也相当明显。作品中有的与卡拉姆津的《女长官马尔法，或征服诺夫哥罗德》很相似，作家兼著名的伊利里亚活动家伊万·库库列维奇-萨克钦斯基写的同名中篇小说（1842），就是一种独特版本。这部小说将民族的过去理想化，女主人公形象鲜明（被视为斯拉夫女人性格之化身），关注个性问题，与正在形成中的克罗地亚文学很相似。有些研究家认为，克罗地亚小说家们都熟悉十七世纪的杜布罗夫尼克文学，其中的田园诗作品，早就通过卡拉姆津的小说推动他们接受欧洲文学的感伤主义传统（伊利里亚运动时期人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贡都利奇，其所写的讽寓戏剧《杜布拉夫卡》，就坚持了这种精神）了。最能代表这一时期克罗地亚散文的，是根据历史材料（一般是理想化的）写出的民族爱国主义中短篇小说，比如Д.梅德特尔、Л.武科蒂诺维奇等的作品。早期戏剧作品都写民族往事，总的来说很少有独创性。最为风行的有库库列维奇-萨克钦斯基的民族爱国主义

戏剧《尤兰与索菲亚，或锡萨克城下的土耳其人》(1839)，Д. 德梅特尔的悲剧《特乌塔》，后者写的是古代伊利里亚人同罗马人的斗争。

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克罗地亚新文学一切种类的基础都奠定了。跟塞尔维亚文学一样，最发达的是诗歌。力图成为伊利里亚思想喉舌的青年作者，都关注同代人的民族爱国主义意识。三十年代的爱国主义歌曲和赞美歌(盖伊的《克罗地亚尚未灭亡》，1835 年，等等)广为流传。不过诗句里充斥的辩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诗歌发展的空间。诗歌艺术成熟的表现之一，是斯坦科・弗拉兹的抒情诗集《红苹果》(1840)的出版。

斯坦科・弗拉兹(笔名雅各布・弗拉斯，1810—1851 年)是南斯拉夫民族复兴中个性最鲜明的一个。他出生于斯洛文尼亚，走上克罗地亚文坛时已是一位知名的斯洛文尼亚诗人，他的诗歌是由他祖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所提供的。弗拉兹的期刊活动，在向斯洛文尼亚读者介绍浪漫主义诗歌尤其是德国诗歌的崇高范本中，起了显著作用。弗拉兹是他那个时代最有教养的南斯拉夫作者之一，当他还是格拉茨的大学生时，就迷上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启蒙派的概念，特别醉心克拉尔的斯拉夫人睦邻相处的思想(弗拉兹翻译过克拉尔的作品，并在自己的诗歌里歌颂过他)。弗拉兹是伊利里亚精神的热烈拥护者，他把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言视为落实统一南斯拉夫文学最可行的办法。弗拉兹的立场遭到一些坚持文学民族独特性的斯洛文尼亚文学活动家的反对(弗拉兹不可调和的对手，是斯洛文尼亚杰出浪漫主义者普雷舍伦)。1839 年，弗拉兹离开斯洛文尼亚，终生在克罗地亚文学圈子中生活工作，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从事写作。此间他创办了南斯拉夫文学最有意义的出版物之一——文学杂志《科洛》(1842—1853)。作为克罗地亚文学批评的创始人，他始终不渝地宣传南斯拉夫人友好相处和南斯拉夫统一的思想。他喜欢在《科洛》杂志上发表发展斯拉夫各族文学的材料，并亲自为其他南斯拉夫人的杂志撰稿。弗拉兹是南斯拉夫地区首批批评家之一，所有的南斯拉夫文学及其发展中的共同性，都在他的视野之内。像他所深深敬仰并对他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卡拉吉奇的讲话一样，弗拉兹的文章也贯穿着对建立一种既有人民精神和语言，又有艺术表现力的文学的关注。他在复兴中的南斯拉夫文学里，准确无误地指出了一些艺术方面最有意义的现象，并第一个评价了同代天才作家涅戈什、拉迪切维奇、马茹拉尼奇、普雷拉多维奇等的长处。

弗拉兹的诗歌声音既有勇气又出人意料。《红苹果》(克罗地亚诗歌中的第一部抒情诗集)，是作者以不加修饰的流动旋律通向读者心田的一篇真诚诗歌自白，一种人的自然情绪因素在读者那里欢腾。

弗拉兹的抒情诗在许多方面是在民间诗歌传统中发展起来的，抒情主

人公的形象体系、韵律和深刻的民主精神都源于民歌。诗人把这个传统看作为民族文学复兴与发展而斗争的艺术创作之主要源泉。在这方面他同伊利里亚运动的某些支持者有分歧,他们宁愿推崇杜布罗夫尼克——达尔马提亚传统。

弗拉兹有不少模仿者和追随者(Л. 武科蒂诺维奇,博戈维奇等)。他们当中某些人的创作表现出了某种带实质性的新重点(比如,武科蒂诺维奇的抒情诗里,就加强了同日常生活的接近)。

弗拉兹对民族诗歌进一步发展道路的探索,同其思想情感领域的扩大,其诗歌表现力的丰富联系在一起(叙事谣曲和浪漫曲集《热拉文密林之声》,1841年;诗集《古丝里与冬不拉》,1845年;十四行诗集《梦想与现实》,1846年等)。受欧洲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经验,首先是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创作的鼓舞,弗拉兹把新形式和新韵律引进了克罗地亚文学,其中就有叙事谣曲和十四行诗两种体裁。诗人曾翻译过密茨凯维奇的诗歌并在他的影响下运用十四行诗体。四十年代中期,弗拉兹的诗歌和文学论著中的批评原则得到了加强。在讽刺诗和作家生前仅部分出版的题诗(因其轰动一时)中,弗拉兹转向了日常生活现实。虽然他的讽刺有时缺乏概括性,但诗人对发生事物所持的批评态度,还是克罗地亚文学接近生活途程上的一座显著的里程碑。

对人民生活的深沉思索,首先反映在十九世纪克罗地亚大诗人伊万·马茹拉尼奇(1814—1890)的创作中。他生于克罗地亚海滨,是农民之子,先后在萨格勒布、奥地利和匈牙利读书,熟悉多种外语和欧洲文学。马茹拉尼奇的主要作品是叙事诗《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之死》(1846)。诗人开始创作它时已是一个成熟的艺术家,著名的伊利里亚活动家。从步入文坛那天起,吸引他的就是同唤起民族自觉和爱国主义精神,同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统一思想相连的那些尖锐而迫切的问题(诗歌《伊利尔》、《世代伊利里亚》等)。马茹拉尼奇的早期诗歌倾向于古典主义,这一传统的痕迹一直保留到他的创作成熟期。同时他高度重视独特民族文化语言的民间基础,这一点也自然有所表现。马茹拉尼奇参加了第一部富有特色的《德国—伊利里亚词典》(1842)的编撰。他为完成达尔马提亚—杜布罗夫尼克文学的卓越文献——伊万·贡都利奇的叙事诗《奥斯曼》付出了巨大辛劳,叙事诗的后两章(可能已散失,也可能作者没写完)是马茹拉尼奇创作的,于1844年问世。这部著作受到作者信念的鼓舞,他坚信当代克罗地亚文学同杜布罗夫尼克遗产间的有机联系,坚信世代传统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在叙事诗《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之死》中,折射出现代生活中一个主

要问题，即斯拉夫各族人民解放斗争的问题。黑山人的英勇斗争唤起了诗人去创作这部作品。而推动写诗的真正事实，是 1840 年一个土耳其地方长官在黑山收税的时候被人打死。虽然这事件本身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土耳其化的黑塞哥维那大臣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本人从历史角度看也不怎么重要，然而这是一个胜利，无论在当时的出版物，还是在文学作品和民歌里都有生动反映。马茹拉尼奇的叙事诗在所有这些作品的背景上，以其概括的有力和艺术的价值而显得出类拔萃。

这部不大的诗篇由五首歌组成，像是一出戏的五个场景。第一首歌叙述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对被苛捐杂税压垮的无辜人们的血腥镇压和粗暴势力的嚣张。接下去的三首歌，再现了被奴役人民日益高涨的反抗，最后以残酷的厮杀和暴君死于这场厮杀而告终。第五首歌是诗人同一位同代人的对话，对所发生事件进行了独特的总结——它应当理解为被奴役民族胜利的预兆，善良与正义取胜的象征。研究家们从这部具有浪漫主义性质的叙事诗中，发现了若干与拜伦作品相近的成分（暴君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的形象，叙事诗的结构，像是由一系列由统一构思的场景连结起来）。而且叙事诗的主要特点，诸如关心人民命运，面向民族解放和爱国主义主题，热烈同情共同事业的斗士等，都明显地表现出了斯拉夫浪漫主义的特征。

马茹拉尼奇以地方素材创作的叙事诗（对黑山和土耳其两个民族日常生活习俗准确而富有表现力的具体描写，表达了这一地方色彩），充满了他那个时代热爱自由的理想，充满了崇高的人道感和正义感。在把被奴役人民的悲剧同对未来的乐观看法，同在解放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中必将战胜苛政的信念相结合方面，叙事诗达到了史诗规模。

同时，这又是一部深刻抒情的作品：它从紧张的戏剧场景开始，就感到有诗人在参与其事。作者的抗议呼声就像《山地花环》中涅戈什的声音，变得"雄辩而尖锐"，他抗议的是那些不给小民族以自由权却又傲慢地谴责他们落后的人。作品中心情节之一——斯马伊尔-阿加·钦吉奇对牺牲品的血腥镇压——没有变成对野蛮习俗的描述，这是作家同代人生活的一个悲剧性场景，也是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现实。战前老牧师对战士的呼吁那一场也是当代人生动的声音，渗透着伊利里亚支持者讲话的内容和语调。

· 521

马茹拉尼奇的叙事诗是克罗地亚诗歌发展的新阶段。诗人创造性地把达尔马提亚——杜布罗夫尼克传统与民间文学结合起来。不过在面向文学遗产的时候，马茹拉尼奇是从一个熟悉欧洲诗歌当代成就的艺术家立场来接受它。在文学语言问题上，马茹拉尼奇的立场十分广阔。他作为什托方言基础的拥护者，同时也从其他方言中发现了充实文学语言的生机勃勃的

源泉。

尽管有很多马茹拉尼奇的同代人加入抒情叙事诗的写作，其中最为著名的作品是 Д. 德梅特尔的《陵墓原野》(1842)，但是这种体裁并没有成为克罗地亚诗歌中的主导体裁。他们当中谁也没有接近马茹拉尼奇的水平。十九世纪上半叶克罗地亚诗歌中占优势的还是小型抒情体。

开辟抒情诗新境界的是彼得·普雷拉多维奇(1818—1872)的创作。他是奥地利军队的一名军官，官衔升至将军，其大半生在克罗地亚境外的奥地利边防军中度过。为祖国担忧和身不由己的强烈感觉伴随他一生。他深刻理解民族复兴思想，在这一思想影响下，既在自己的创作中(普雷拉多维奇的早期诗歌都是在德国浪漫主义者影响下用德语写的)，又在自己的生活中(据诗人自己回忆，他从军事院校毕业回到家里的时候，用母语跟母亲说话很费劲)从头学习母语。普雷拉多维奇的全部创作都把语言理解为人民精神的表现，这对伊利里亚运动拥护者和浪漫主义者来说都是富于代表性的。

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诗人出版的两本书——《处女作》(1846)和《新诗》(1851)，坚持的是伊利里亚诗歌所惯有的高尚民族爱国主义情调和斯拉夫友好合作思想(《旅人》、《贺祖国》)。但诗歌的力量却在于，诗人以亲身体验的感情，使克罗地亚诗歌早已熟知的主题和形象变得更加亲切。这特别表现在对他来说很有代表性的回归家园，重获祖国和母语的主题里，也表现在生母与继母这一象征形象的对照上。个人的音调有时尖锐紧张，它由生活不完善和人的高尚追求之无力的惊慌不安的意识所引起，却赋予其诗歌以紧张的抒情语调。

普雷拉多维奇在关于爱情的诗篇，关于生死永恒问题的沉思，关于人的使命及“夹在”天地之间，即自己的高尚追求同周围环境不完善之间诗人的艰难命运的描写中(《诗人》)，开辟了反省式的哲理抒情诗的传统。他的这一创举得到了下一代诗人的支持，并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优秀克罗地亚诗人 C. 克拉尼切维奇的创作中得到了艺术体现。

在奥地利帝国，尤其在匈牙利发生的 1848 年革命，推动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社会民族斗争走向高潮。可是匈牙利各政治集团漠视少数民族权利，又使克罗地亚—匈牙利的矛盾变得极其尖锐。奥地利反动派利用这一点，并借助克罗地亚资产阶级和地主集团的势力，在人民中策动了一场克罗地亚—匈牙利局部战争(1848 年夏末)。克罗地亚自治州州长叶拉契奇的部队参加了对匈牙利革命的镇压。然而克罗地亚政治家借助哈布斯堡统一克罗地亚土地的希望并未实现。匈牙利革命失败后，反动势力扩展到了奥地利君主制管辖的所有南斯拉夫土地。克罗地亚土地的行政分割状态

得以保留下来，对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政治文化生活中有限的民族自由展开攻击，检查制度也在加强。

反动派的进攻以理想的破灭反映在伊利里亚活动家的意识中。文学生活的进展明显减弱，不过文学依然是蕴藏于人民之中的反抗精神的主要传播者。

第七章　斯洛文尼亚文学

·522

拿破仑战争和伊利里亚王国的建立，法国军队的毁灭和哈布斯堡政权的恢复，梅特涅的反动和1848年革命事件，以及紧随其后的专制制度的胜利——这就是决定十九世纪上半叶斯洛文尼亚社会政治生活的历史事件。

尽管伊利里亚王国存在短暂，法国军队进行的改革半途而废，1809—1813年这段时间对于加强斯洛文尼亚人民族自觉意识，还是起了很大作用。关于在小学不教德语而改教斯洛文尼亚语的法令(1810)，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启蒙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它产生于十八世纪后三十年斯洛文尼亚的一个小组之中，小组领导人是一位艺术赞助者乔伊奇，参加者则是最有才华的安东·林哈尔特(1756—1795)和瓦连金·沃德尼克(1758—1819)(见本书第五卷)。不过这些思想的传播遇到了保守意识形态捍卫者的顽强抵抗，他们在十九世纪十至二十年代民族文化运动中起着主要作用。这个主要由冉森教派代表组成的派别其兴趣限于研究斯洛文尼亚语言，收集民间口头创作和为人民创作一些宗教教谕作品。这一派别以耶奈伊·科皮塔尔(1780—1844)为首，他是乔伊奇的学生。科皮塔尔青年时期的政治观点就相当保守，在许多方面支持奥地利政府的官方路线。他当上斯拉夫和希腊的图书审查官以后，不只一次禁止斯拉夫进步出版物和世俗诗歌，尤其是沃德尼克的创作的出版。不过科皮塔尔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并与И.杜布罗夫斯基一起成了科学的斯拉夫学的创立者之一。他的功劳在于出版了不少斯拉夫文学的古代格拉哥利次文献，包括《克洛茨文集》。科皮塔尔在《克赖恩，克伦地亚和斯提尔斯拉夫语语法》(1809)里创立的语法规则，至今还是斯洛文尼亚文学语言的基础。

科皮塔尔号召斯洛文尼亚作家清除外来语汇以纯洁祖国语言，只使用农民词语，这又限制了斯洛文尼亚文学语言的发展。在科皮塔尔看来，民族文学的最高成就不是个别作家的创作，而是民间文学。按他的看法，斯洛文尼亚文学只应该从事民间作品的收集和出版，撰写宗教教谕书籍。

科皮塔尔和拉夫尼卡尔的立场成为发展斯洛文尼亚中央区—克赖恩地

区世俗诗歌的障碍，克伦地亚、斯提尔这些外省在十至二十年代出现了几位诗人（弗尔克梅尔、Ш. 莫德里尼亚克、Я. 普里米奇和 M. 施奈德），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武尔邦·亚尔尼克（1784—1844）。在亚尔尼克的抒情诗里，古典主义成分同早期浪漫主义特点交织在一起。影响他创作的是席勒的作品，因为他曾把其中的一部分翻译成斯洛文尼亚文。

构成科皮塔尔观点的真正反对派和包围圈的，是集合在《克赖恩蜜蜂》文选（1830—1832 年，1834 年，1848 年）周围的一批文化活动家。文集出版家与老一辈不同，老一辈精心培植的多半是宗教教谕和“实用”文学（含有各种各样实际劝导的书籍），这些人则力求赋予文学以世俗性和大众的性质，扩大它的题材范围，提高它的艺术水平。《克赖恩蜜蜂》的灵魂，是语言学家马蒂亚·肖普和最大的斯洛文尼亚诗人弗兰采·普雷舍伦。

马蒂亚·肖普（1797—1835）是个饱学之士，他掌握十几种语言，非常熟悉欧洲文学，特别喜欢歌德、拜伦、密茨凯维奇的作品，也了解普希金和海涅。他认为黑格尔是当代最大的哲学家，高度评价他的辩证法。肖普是他那时代最能自由思考的文学家之一，对波兰和希腊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要求作家对民族历史和现实中最重要的事件作出反映，广泛描写生活，深刻理解民族文化语言，具备高度艺术技巧。肖普在一系列文章中发表的文学理论见解成了斯洛文尼亚文学的浪漫主义宣言，这些见解在普雷舍伦的诗歌创作中有着最充分最鲜明的表达。

523·

肖普和普雷舍伦的立场，是与科皮塔尔及其同道的活动相对立的。两派冲突在所谓的“字母战”期间变得特别尖锐。字母战形式上是由科皮塔尔的学生和追随者 Ф. 梅特尔科引起的，他试图把语音正字法原则和建立在这一原则上的“字母表”引进斯洛文尼亚文学语言。实际上肖普和普雷舍伦反对的与其说是“字母表”，不如说是斯洛文尼亚语言的方言分割，是官僚主义和教权主义集团的压迫。肖普把这次字母战，称作一场青年知识分子反对“把斯洛文尼亚人民滞留于文化政治未成年水平”的斗争。这场惨烈辩论过后，1833 年当局下令禁止使用“字母表”，这是年轻进步力量的一大胜利。

与那组总名为《斯洛文尼亚字母战》的出色论战文章并列的，是《斯洛文尼亚文学史》，这是肖普 1831 年用德文为捷克的斯拉夫学学者 П. 沙法里克的《南斯拉夫文学史》而作（全书于 1864 年出齐）。《文学史》涵盖了斯洛文尼亚文学自古至今的发展，特别重视改革时期和启蒙时代。看来出于审查的考量，作者对丛刊《克赖恩蜜蜂》和普雷舍伦作品的叙述一带而过，但强调了其转折性质。

肖普去世以后，普雷舍伦为革新斯洛文尼亚文学而斗争的战友是安德烈·斯莫莱和埃米利·科雷特阔。安德烈·斯莫莱（1800—1840）对斯洛文尼亚民间文学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的民歌集里的很大一部分（不少是普雷舍伦改编的）刊登在《克赖恩蜜蜂》上。斯莫莱的集子不能全部出版，这主要是由于审查方面的障碍。同时斯莫莱作为斯洛文尼亚民间创作收集家和作家作品出版家的活动，在文学发展中还是起了不小作用。他出版了沃德尼克的诗集和林哈尔特的喜剧《快乐的一天或马蒂切克娶亲》，似乎在以此强调斯洛文尼亚的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之间的传承关系。

波兰大学生埃米利·科雷特阔（1813—1839），由于参加 1837 年革命运动被拘禁于卢布尔雅那。在这里，他与向他学习波兰语的普雷舍伦有了深交。大家知道，普雷舍伦把他的两首诗和密茨凯维奇叙事诗《康拉德·瓦伦洛德》的片断，从波兰文译成了德文。科雷特阔认真地从事斯洛文尼亚民间文学创作，并准备出版《克赖恩斯洛文尼亚民歌》文集，不过它的出版已在他死后的 1839—1844 年。

伊利里亚运动在三十年代斯洛文尼亚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其明显的作用。这场社会政治运动产生于克罗地亚，由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种族同源，语言和历史命运具有共同性，伊利里亚的拥护者们便追求南斯拉夫文学语言的统一。斯洛文尼亚的伊利里亚运动发源地是斯提尔和克伦地亚，那里的斯洛文尼亚人处于少数，特别感到有日耳曼化的危险。

斯洛文尼亚最有名的伊利里亚活动家是诗人斯坦科·弗拉兹，他经过长时期的摇摆之后甚至放弃母语，成了一位最著名的克罗地亚浪漫主义诗人。弗拉兹认为形成统一的南斯拉夫—伊利里亚人（共同体），就可以拯救南斯拉夫，使之避免日耳曼化。在他看来，由于斯洛文尼亚人处于少数地位（只有一百万）已不可能保护和发展自己的文学语言。他移居到萨格勒布，从此他的创作就在克罗地亚文学的轨道上发展。1839 年他在萨格勒布出版了一部献给武克·卡拉吉奇的文集《斯提尔，克赖恩，克伦地亚和匈牙利西部传唱的伊利里亚民歌》。在弗拉兹用斯洛文尼亚文写的早期抒情诗里，就能感觉得到民歌影响，可是那些诗歌在他死后一百年才得以问世。诗歌浸透着对祖国炽烈的爱，贯穿了共同斯拉夫的历史主义精神。其中也表达了痛苦和对普通农家少女的真挚感情。

其余斯洛文尼亚的伊利里亚支持者并未对语言持如此激进的立场。比如，克伦地亚的马蒂亚·马亚尔·齐利斯基就认为，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向斯洛文尼亚语过渡的方言，可以成为全南斯拉夫人的共同语言。马亚尔也像弗拉兹一样，高度评价民间创作，而且是民间文学的积极收集者。 ·524

原则上持另一种立场的是普雷舍伦。作为一个斯拉夫合作思想的支持

者，他同时看到了保持斯洛文尼亚人民族独特性的可能，并相信斯洛文尼亚语言和文化会发展。与弗拉兹的意向相对立，他提出了斯拉夫各独立民族的自由发展，并在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联合的思想。

四十年代失去亲密战友肖普、科雷特阔、斯莫莱的普雷舍伦，几乎不得不单枪匹马地同民族运动的右翼作斗争，右翼势力以亚奈兹·布莱韦斯(1808—1881)为首，他把坚持民族权利同忠于奥地利帝国和天主教联系起来。右翼势力的口号是“一切为了信仰、祖国和皇帝”。甚至在革命高潮如火如荼的1848年，布莱韦斯对他的原则也寸步不让，因为他确认，从消灭地主政权到消灭一般政权只有一步之遥。布莱韦斯及其同道给文学提出了一个非常功利的目的：教育和娱乐人民大众，培养他们无限忠于“祖国和皇帝”的精神。

保守倾向的喉舌是附和布莱韦斯派的诗人伊万·韦塞尔·科塞斯基(1798—1884)。1844年他在布莱韦斯出版的《农业手工业新闻》报上发表了一首忠心耿耿的颂诗《斯洛文尼亚忠于斐迪南皇帝》。诗里以他同胞的名义宣誓忠于奥地利君主。作为对这首颂诗的回答、普雷舍伦写了广为人知的抒情诗《纪念安德烈·斯莫莱》和《祝词》，赞美争取自由的斗争和所有各族人民的兄弟情谊。

这一时期斯洛文尼亚文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日益扩大的同其他斯拉夫人民的文学和文化联系，同作家和文化活动家联系的有塞尔维亚(卡拉吉奇)、克罗地亚、捷克(沙法里克、切拉科夫斯基)、斯洛伐克的(克拉尔)和俄罗斯的(И. И. 斯列兹涅夫斯基，П. И. 普赖斯，В. И. 格里戈罗维奇)。

斯洛文尼亚文学的浪漫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诗歌，这首先得归功于弗兰采·普雷舍伦(1800—1849)创作的繁荣，是他把诗歌提高到了欧洲文学水平。普雷舍伦出身于农民家庭，就读于卢布尔雅那中学，学校的校长是沃德尼克，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学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语言，热爱民间文学和诗歌。中学毕业后，普雷舍伦违背家人让他当神职人员的意愿，考入了维也纳大学法律系，1827年完成学业。在维也纳他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在这里，他成了奥地利君主政体和天主教蒙昧主义的敌人；在这里，这个曾因“无神论和败坏智力”而被逐出私人贵族寄宿中学的年轻家庭教师，第一次打上了“自由思想者”的印记。正由于“自由思想者”的名声，普雷舍伦回国十四年后才获得独立履行律师职责的权利，那是在他死前不久的1847年。

在大学时普雷舍伦就开始写诗。1829年，德国毕尔格的长篇叙事谣曲《莱诺勒》的未完成译稿便落入他手中。文稿旁边有译者乔伊奇的附言，声称由于斯洛文尼亚语言的贫乏和不完善而无法翻译。普雷舍伦不仅把谣曲

译得极为出色，而且往后的全部活动都推翻了乔伊奇的结论，创造了斯洛文尼亚的文学语言，并揭示了其最丰富的潜能。

普雷舍伦翻译的《莱诺勒》和叙事谣曲《水怪》、哀歌《告别青春》一起，刊登在《克赖恩蜜蜂》的创刊号上。《告别青春》标志着普雷舍伦诗歌成熟的开始。这是一部特殊的浪漫主义诗歌宣言，同欧洲浪漫主义诗歌相似，尤其令人想起密茨凯维奇那首著名的《青春颂》。在波兰诗人的笔下，青春象征着争取祖国解放的浪漫主义激情。他的整个颂诗是一曲“自由的朝阳”，在其背后有着一轮发热的“救生太阳”。普雷舍伦歌颂青春，是因为青春的乐观主义，它可以帮助人们更轻松地转移生活重负，在生活中人的价值是由财富来衡量，而智慧、真理、知识则像“一群没有陪嫁的少女”被判为永恒的孤寂。从这首诗中产生出了普雷舍伦创作的一个中心主题——进步的思维个性同小贩利益和利己盘算之世界的冲突。密茨凯维奇颂诗的乐观激情，是由波兰人民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涨所决定的；普雷舍伦勇敢而充满戏剧性的斯多葛精神，则是由斯洛文尼亚民族解放和革命运动发展不够，进步的世俗知识分子人数较少和天主教非同寻常的深重压迫所决定的。正由于这些原因，普雷舍伦的诗歌具有戏剧性质，而有时是悲剧的性质。

《告别青春》里如此坦率而热烈地表达出的对周围现实压迫的抗议，引起了高层神职人员对青年诗人的疯狂攻击。而普雷舍伦则以十四行诗《阿佩莱斯与皮靴匠》(1830)和三韵句讽刺诗《新写的东西》(1831)对此作出回答，它们刻薄地讥笑了科皮塔尔及其拥护者，以及那些教谕、醒世和功利主义诗歌的支持者。由二十首题辞组成并命名为《胡蜂》(1831)的一组作品，也在反对这类诗歌。诗人在《不幸的十四行诗》(1832)的组诗中，进一步发展了《告别青春》中已接触到的主题。他通过其中的六首十四行诗展现了主人公的戏剧性命运，主人公“对知识的致命渴求”吸引他从故土的农民家园来到欧洲首府的“荒漠”，在这里他认清了给他准备好了的跟众多穷苦朋友同样的命运：“……奴隶日常生活的肮脏，贫困的法则和无法摆脱的深渊。”正是在这部《不幸的十四行诗》里，普雷舍伦塑造了一些最有广度、最准确、最富寓言的形象——“生活监狱”的形象，能摆脱这一压迫的只有死亡。在普雷舍伦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里，主人公同现实冲突的主题与天职的主题(《格洛萨诗》(1832)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又创作了一首《致乡亲的哀歌》，叙述诗人的使命不是浪漫主义的高空翱翔，而是面对祖国和人民的责任。

不过普雷舍伦爱情抒情诗的高峰还是那部《十四行诗的花冠》。诗人对一位富家姑娘产生缠绵感情的个人主题，在这里获得了深刻的社会意义。普雷舍伦的十四行诗不仅是对崇高浪漫主义感情异常真诚热烈的倾诉，而

且是对践踏民族诗歌和民族本身尊严的愤怒反抗。在普雷舍伦的《十四行诗的花冠》里，个人主题与民族主题融合得非常和谐："对你和对祖国的爱何其相似：如同一座熔炉升腾的两股火焰！"——诗人这样谈到心爱的姑娘。

十四行诗的花冠是难度最大的诗歌形式之一。普雷舍伦不仅出色地克服面临的困难，而且有意加大了困难的强度。花冠最后一首压轴诗是贯顶诗，把诗人心爱姑娘尤里娅·普琳切娃的姓与名全都包括了进去。

普雷舍伦还写了一部叙事诗《萨维察河畔的洗礼》(1836)。它是在诗人与尤里娅·普琳切娃决裂，以及肖普死后为纪念他而作的。看来，与这些事件相关的感受，影响了叙事诗的整个气氛。"诗体小说"的情节属于八世纪斯洛文尼亚人民反对在本地强制推广基督教的时期，这同时是屈服于异民族压迫的时期。叙事的中心是领导最后一次卡朗塔尼亚起义(772)的切尔托米尔公爵的悲剧性命运。他在寡不敌众的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所有军队，又得知其未婚妻，一个献身于多神教爱神的日娃，改信了基督教，而他也接受了新的信仰。尽管意识到基督教捍卫者的残酷和伪善，切尔托米尔还是成了基督教的传教士，普雷舍伦通过他的消极态度表现了屈服于天主教压迫的斯洛文尼亚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以及斯洛文尼亚民族解放运动的软弱性。

这一时期普雷舍伦的爱情抒情诗以其少有的音乐性和质朴无华见长，但失去了往日灼热的浪漫主义紧张情节，却更加接近于民歌(《别离》、《请求》、《命令》、《记忆的力量》和《窗下》)。那些阐述诗歌使命的诗歌则发出另一种声音。比如，在《致诗人》和《纪念瓦连金·沃德尼克》两首诗里，普雷舍伦谈到诗人的崇高使命是"驱散心灵的黑暗"，"使无意义的事情和语言免于毁灭"，并为此而付出个人痛苦和放弃常人幸福的代价。在类似的见解里，表现出的不是关于诗人"注定使命"的浪漫主义观念的影响，而是由现实历史条件所主使的一种意识，即意识到自己对祖国人民及其文化命运所负的历史责任。

科雷特阔的墓志铭："人故去了，他为人们所做的事情却永世长存"——这是诗人对人的命运和生活的意义的沉思进行总结的那些诗歌之一。《非婚母亲》、《海员》、《铁路》等诗篇，则证明了诗人深刻的民主精神及其对普通人的生活的关注。普雷舍伦思想演变的高峰，是他1844年业已完成直到1848年革命岁月才发表的《祝词》。《祝词》充满了对斯洛文尼亚人民未来解放，对全体斯拉夫人——"光荣的后裔"兄弟情谊，对"一切民族和部族永恒自由"的乐观主义信念。

斯洛文尼亚文学因为有了普雷舍伦的创作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民族文

学。普雷舍伦不仅在自己的诗歌中表现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热爱自由的思想，而且在发展斯洛文尼亚文学语言中起了奠基作用。他创作的哀歌、浪漫曲、抒情歌谣、嘎泽拉诗、格洛萨诗、十四行诗、十四行诗花冠、八行诗、抒情叙事诗的范本，以多种新的体裁丰富了斯洛文尼亚诗歌。在明显具有综合精致艺术烙印的普雷舍伦创作中，德国古典主义，西欧而首先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古希腊罗马和意大利文艺复兴诗歌等潮流，以及对斯洛文尼亚民间文学的兴趣，都得到了反映。同时他的诗歌极其独特而新颖，对后来斯洛文尼亚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普雷舍伦在斯洛文尼亚文学中就像普希金之于俄国文学或者密茨凯维奇之于波兰文学，占有光荣的一席。

斯洛文尼亚散文的首创者是亚奈兹·齐格勒(1792—1869)，他于1836年发表了一部劝善小说《不幸中之大幸，或者孪生儿怪事记》。故事情节发生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其叙述中心是一个斯洛文尼亚工人家庭(父母和两个儿子)的命运，家庭被战争的暴风雨冲散，尽管很不幸，终究还是很幸福。以作者之见，幸福的秘诀在于对上帝的信念和毫不动摇地按上帝圣诫行事。小说写得生动而引人入胜，里面有当代人生活习俗的鲜明画面，特别有意思的是写法国军队在俄国和别列津纳河战役被摧毁的那些章节。

追随齐格勒(不过成就不大)创作紧张动人劝善小说体裁的有：拉夫尼卡尔，Ю. 科斯马奇和 Й. 波克卢卡尔。这些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了许多当时农村生活的问题。与道德劝善小说一起出现的还有民间浪漫型小说，不过这类小说的繁荣却在五十年代。历史问题也吸引了这一流派的代表者。特别对历史题材感兴趣的是约西平·图尔诺格拉茨克(1833—1854)，其作品渗透了全体斯拉夫的爱国主义(小说《无辜与暴力》和《父亲的诅咒》)。

对民间文学的迷恋影响到亚奈兹·特尔金(1830—1905)的创作。在《比斯特里察山谷的民间童话》(1849)里，他歌颂了斯洛文尼亚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生命力，这些品质有助于他们经受住无数的历史考验。

世纪初的戏剧家用德文创作剧本，但经常描写的是斯洛文尼亚的历史事件。斯洛文尼亚的基本剧目像从前一样还是林哈尔特的喜剧。剧本的新作写得很少，艺术水平也极低。突出一点的是 M. 维尔哈尔的浪漫主义戏剧《走出洞穴的伊万卡》(1850)，其戏剧情节发生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在这些事件的背景上，维尔哈尔提出了一些反对异国压迫斗争中的迫切问题。

在1848年革命进程中形成的“斯洛文尼亚协会”，对发展戏剧艺术十分关心，并提出过在卢布尔雅那成立斯洛文尼亚剧团的计划，可是专制制度的恢复，把这些计划的实施推迟到了六十年代。

正是在六十年代，斯洛文尼亚新一代进步作家依靠普雷舍伦奠定的传

统，开始了争取现实主义的积极而彻底的斗争。

527·

第八章　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

人们首次提到卢日昌是在十七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自古以来塞尔维亚卢日昌部族就不得不摆脱法兰克日耳曼部族的占领意图，坚持自己的独立。十世纪末，由于日耳曼人的扩张，卢日昌塞尔维亚人长久失去了自己的独立。十二至十四世纪卢日昌土地遭受德国殖民统治特别厉害（世俗和宗教上层封建势力都是德国的），城市几乎全部德意志化，只有农村人口还是斯拉夫人。十五至十六世纪卢日昌土地整个处于德意志封建国家的影响之下。

十八世纪卢日昌分属萨克森和普鲁士两个德意志国家管辖。塞尔维亚卢日昌农民沉重而带有强制性的劳动和来自德国封建主方面的民族压迫，世世代代束缚着卢日昌人独立文化的发展。然而，尽管条件非常困难，十分不利，它的发展并没有停止，民族文化珍品仍然缓慢地，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充实起来，祖国语言和民间文学的宝藏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

卢日昌的民间文学像其他各西斯拉夫民族的民间文学一样，受到天主教会和封建统治集团的残酷迫害，所以很遗憾，它的全部财富和独特的东西并没有流传到今天。卢日昌人从十九世纪中叶起才开始收集口头民间诗歌创作的各种蓝本。这一时期在卢日昌文化史上才首次出现民歌、格言、谚语、童话、传说等的出版物。

在发现爱情抒情作品或术士童话的同时，我们从卢日昌民间创作中，发现了一些写人民沉重劳动，英雄复仇者，异族桎梏的具有尖锐社会性的作品。卢日昌人以歌曲歌颂自己人民遥远而英雄的过去，歌颂他们同掠夺者的浴血奋战。

卢日昌书面文学的第一部著名经典（《布迪欣誓言》）写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初共出版约五十种卢日昌书籍，十八世纪期间又出版了将近两百种上、下卢日昌文（现代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仍以这两种文字发展）的作品，虽然大部分作品局限于宗教题材（祈祷书、教义问答、《圣经》译文、基督教劝善小说等），还是促进了在卢日昌居民中推广文字。

随着十八世纪末启蒙思想传入卢日昌，开始了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与文化发展的新阶段，提高了人们对祖国历史，民间文学，语言和人种志学的兴趣。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著名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化活动家米哈尔·弗伦策尔（1628—1706）之子亚伯拉罕·弗伦策尔（1656—1704），写了许多关于卢日昌语言史、卢日昌地理、边疆人种志学方面的著作。

应该提到的另一个卢日昌启蒙主义者是扬·戈尔昌斯基（1722—

1799)，他是《一个卢日昌塞尔维亚人关于本族人民命运的思考》(1789)一文的作者，文章捍卫了各族人民权利平等的思想。卢日昌启蒙时代的著名诗人是尤里·门(1727—1785)，他在著名颂诗《塞尔维亚语的广阔前景及对它的盛赞……》(1757)中，歌颂祖国语言之美，号召人们不要使它“消亡”。这一时期进入文学史的作家有尤里·拉克(1740—1799)、冈德雷·鲁什卡(1755—1810)和米哈尔·吉利本茨(1758—1816)，他们都创作了不少巴洛克风格的独特诗歌。

上卢日昌塞尔维亚人文学的前浪漫主义时期，以鲁道夫·门(1767—1841)的创作作结束，其诗歌像他父亲尤里·门的抒情诗一样充满爱国主义思想。他那些以音调和谐接近民歌见长的士兵生活歌曲广为人知。

这一时期下卢日昌作者中只有基托-弗里措·斯滕佩尔(1787—1867)较为突出，他是许多新颖诗篇的创作人。比如，他在《三支快喇叭》这首诗里，歌颂了母语的威力与美丽，并号召人们保护它。他还写过古希腊罗马情节的作品(比如学忒奥克里托斯的田园诗)。

法国革命思想在卢日昌的传播者是卢日昌新闻出版业奠基人扬·杰伊卡(1779—1853)。他主编的报纸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塞尔维亚说书人和信使》，1809至1812年发行，后被拿破仑当局查封。杰伊卡号召读者发展自己人民的精神生活，为卢日昌人的积极政治生活而工作。 ·528

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初，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的发展，虽然成就不大，却是弱小斯拉夫民族精神生活的重要现象，它预示着民族复兴时期卢日昌文化的进一步高涨。

十九世纪上半叶，以卢日昌历史上民族运动日益高涨，文学生活日趋活跃，对民间创作和人民以往历史的兴趣不断提高为其特征。

四十年代里，一代青年文学家走上了卢日昌文坛，在他们的创作中特别有力地响彻着公民爱国主义主题和民族自由思想。文学是当时唯一合法的讲坛，具有爱国主义情绪的青年可以从那里发表自己对于祖国现在和未来的衷情思考。

相邻的斯拉夫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各斯拉夫文学热爱自由的思想，对卢日昌塞尔维亚人的精神复兴和卢日昌复兴的大思想家扬-阿尔诺什特·斯莫勒、冈德雷·蔡勒、扬-彼得·约尔丹等人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卢日昌塞尔维亚文化复兴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是1847年在布迪欣(包岑)成立的“塞尔维亚马蒂察(社)”，这是第一家出版自己的杂志，印刷卢日昌文书籍的科学启蒙和爱国主义团体，一直存在到1937年被法西斯分子查封。

一批曾在布拉格、弗劳兹拉夫、布迪欣、莱比锡及其他城市留学，有教养

又有爱国热情的青年,积极参加卢日昌的社会文化生活,解决文学艺术发展、国民教育、卢日昌期刊出版等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有些青年爱国者以学者、出版家、文化和文学生活组织者的面貌出现(扬-彼得・约尔丹、扬-阿尔诺什特・斯莫勒)。另外一些人(冈德雷・蔡勒、拉德塞尔维亚-韦利亚等)则以文学创作直接为发展文学铺设新路。

塞尔维亚卢日昌民族复兴初始阶段的核心人物之一是扬-彼得・约尔丹(1818—1891)。作为卢日昌塞尔维亚人民歌的收集者和出版者,他完善了卢日昌母语的正字法,出版了语法书。在他 1842—1848 年主持的定期出版物上,刊登了不少塞尔维亚卢日昌诗歌的新作,文学概述,斯拉夫各族文化问题的文章和政治札记。

扬-阿尔诺什特・斯莫勒(1816—1884)在十九世纪卢日昌文学中占有特殊地位。作为普及读物《塞尔维亚新作》(该报是卢日昌民族复兴先进思想的论坛)的主编,他直接影响了卢日昌社会文化生活的形成。斯莫勒收集并出版《塞尔维亚上、下卢日昌歌曲》(两卷集,1841 年和 1843 年)是一件大事,民歌的出版不仅奠定了认真研究民俗学,人种志学,卢日昌人文化史的基础(出版物除民歌外还包括人种志学,神话学,方言学方面的随笔),而且在浪漫主义诗歌的形成中发挥了特别重要作用。

冈德雷・蔡勒(1804—1872)是卢日昌文学奠基人和最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二十至四十年代发表了一些鲜明、生动、饱含欢乐情绪和乐观主义精神的抒情诗,充满着自由、爱国主义、相信祖国光辉未来的思想,以及正义和文明的理想。蔡勒的很多诗句由于音调谐和而变成民歌。由诗人之友 K. A. 科措尔配曲的著名抒情诗《致塞尔维亚卢日昌》(1827)成了卢日昌国歌。与这篇作品相连的热烈爱国诗篇,有《塞尔维亚民歌一首》、《七彩塞尔维亚》、《我亲爱的故土》、《我们将生存下去,塞尔维亚人》等等。属于卢日昌诗歌巅峰之作的,是抒情组诗《一年四季》和《卢日昌婚礼》,它们歌颂了祖国的雄伟,家乡大自然的美丽,普通人的高尚劳动。

Г. 蔡勒的抒情诗是一个博大、崇高和充满仁爱之心的世界。诗人在塑造抒情形象的时候,经常从民间诗歌创作吸取灵感,并巧妙地运用它丰富的资源(《辞行曲》、《民歌一首》、《卢日昌思索》、《刈禾人之歌》等)。浪漫主义叙事谣曲的典范作品是由蔡勒创作的,他把这一体裁引进了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未婚妻之死》,《柳宾锁》等)。

529・

另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扬・拉德塞尔维亚-韦利亚(1822—1907),创作了不少历史题材的鲜明叙事谣曲。其中每一篇都叙述人民生活中一个光荣的历史事件,或被压迫农民反抗封建暴君的激动人心的故事。拉德塞尔维亚-韦利亚是铺设卢日昌小说(《复活与提高卢日昌塞尔维亚人心灵的小

说》,1847 年)新路的首批作家之一。他的主要中短篇小说也和他的叙事谣曲一样,已属于十九世纪下半叶。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塞尔维亚卢日昌文学史上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作家作品的爱国主义倾向,同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各种新文学形式的产生,都为它日后富有成效的发展作好了准备。

第九章　匈牙利文学

没有对民族自由的追求,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都是不可思议的,而正是这种对民族自由的追求,从起源及整体上决定着匈牙利浪漫主义世界观。与此相应,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对国家过去(即历史地自我确立的、摆脱了奥地利统治的贵族)的诗化已成为文学的主题。此后,贵族及平民知识分子对自由的热爱开始突破狭隘的框子,而浪漫主义则具有了激进的倾向性。

匈牙利的浪漫主义历史,是民族自我意识从贵族的民族主义英雄精神上升到真正爱国主义、民族人道主义理想的历史。匈牙利文学受其不发达的社会状况的制约,几乎不曾反映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如果说拿破仑的远征也曾引起过抗议的话,那这抗议也是抽象道义的。一个具有古典主义趣味的诗人——贝内德克·维拉格(1754—1830)有关战争对人类有害、和平对人类有益的诗(《和平的愿望》,1801 年)即是这样。一般地说,受阶层局限的贵族爱国主义与"字面",而不是与不久前的文学品味及潮流所具有的精神相关,并非偶然。以带有比德迈埃尔风格[①]—田园诗色彩的古典主义古希腊罗马理想——为定向,成为上述维拉格——这位被同时代人誉为"匈牙利的贺拉斯"——的诗人笔下所歌颂的明智的不事雕琢、适度的忠诚的基础。然而,甚至在因"华丽"而反对浪漫主义风格的维拉格的创作中,也渗透着新时代的气息。在他的笔下,出现了因奥地利对贵族施加的压力而引起的焦虑及提高民族精神的追求。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在暮年创作了历史著作《马札尔人[②]时代》(1808—1816),书中用爱国主义的借鉴历史的语调,描绘了独立时期匈牙利光荣的时代。

但在另外一位同样是前浪漫主义流派杰出诗人的山陀尔·基什法鲁迪

---

① 比德迈埃尔风格,约 1815—1848 年德国与奥地利的一种艺术风格,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民主主义倾向及市民的世界观与艺术趣味。其建筑与装饰艺术把帝国样式改革为具有家庭亲切舒适感的形式。——译注

② 马札尔人,匈牙利人的自称。——译注

(1772—1844)的创作中,却出现了新的主题。其抒情诗(组诗《悲伤的爱》,1801年;《幸福的爱》,1807年)在一般感伤主义背景下,还表现了对生活的不满;而在历史题材的《传说》(1807)中,对以往向往的日常生活的理想化及对贵族勇敢精神的充满激情的歌颂,与阴暗失望的语调融为一体。但真正具有过渡性并因其所具有的过渡性而几乎充满了悲剧矛盾色彩的人物,是在许多方面都为浪漫思潮的到来做了准备的诗人达尼埃尔·别尔泽尼(1776—1836)。对教育的向往,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对诗歌"有益性"的理念及对道德训诫的酷爱,以及与卡津茨的友好关系,这一切都使他接近启蒙思潮。但他对其所属阶级的猛烈抨击,以及同时代人所指责的他作为一个诗人所具有的弱点——忧郁症——也使他与浪漫主义者接近。在他的颂歌、哀歌、歌谣和题献诗中,古典主义理性的平衡匀称及严格的对称均衡被打破,有时甚至被对时代危机状况的骚乱感受、抒情的主观性、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的丰富多彩所推翻。

实际上,出现于该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剧作家和抒情诗人卡罗伊·基什法鲁迪(即山·基什法鲁迪的弟弟),是匈牙利文学史上浪漫主义的奠基人,也是年鉴——实即匈牙利第一部"厚重"的文学杂志《奥罗拉》(1821—1837)——的奠基人;此外还有诗人考尔岑·费伦茨(1790—1830)和米哈伊·弗勒斯马尔蒂。与其具有蒙昧情绪的兄长不同,卡罗伊·基什法鲁迪(1788—1830)早年即与其父——一个性格严厉的旧式地主——不和,其父兄直接起而反对他的意志。卡罗伊·基什法鲁迪宁愿过一种名士派生活,他在其浪漫主义历史剧《匈牙利的鞑靼人》(1809)上演后立即成为名流。他的剧作往往善于把爱情纠葛与民族解放斗争的急遽转折结合起来,其中《斯蒂贝尔将军》(1818)一剧中,爱情纠葛(一个地主儿子对农家姑娘的爱)具有一定的社会倾向性。作为爱国主义哀诗,浪漫叙事谣曲,尖刻的、讽刺摹拟式的题献诗,谣曲及短篇小说的作者,卡罗伊·基什法鲁迪还是匈牙利浪漫主义者中第一个从民间诗歌中感受到严肃的抒情和生活内容而力求在其仿作中予以发展的诗人之一。匈牙利研究者曾指出,在他的喜剧《媒人》(1817)及稍后的短篇小说中,首都生活题材具有真实的日常生活特征。

另外一个表现出鲜明爱国主义性格的匈牙利浪漫主义者是菲伦茨·考尔切依(1790—1838)。他从青年时代就具有把广阔的审美视野、密切关注全人类问题与对匈牙利陈陈相因的"外省习气"的时而尖锐、时而强烈的不满结合起来的特点。考尔切依是卡津茨及其模仿者们那种以纯语言学和模仿为定向的流派的一个信仰坚定的敌人。在不否认启蒙运动"普遍"及全人类意义的前提下,他又在其文章中,自觉地把匈牙利文学的任务与其抽象的古典主义化、贵族主义的"歌德式"(或前浪漫主义的"奥

西安诺夫式")线索及小市民感伤主义线索区分开来。他本人则更注重从民族历史"暴风骤雨"年代里人民热爱自由的理想和生动的诗歌独特性中寻求支持。

正因为如此,在他的诗歌中,时而描述兹里尼和拉科齐——匈牙利的自由英雄——形象,时而透出如歌的忧郁情调,以此反映诗人对当下的隐秘失望。十年代末和二十年代初,作为诗人的考尔切依从保留到当时的民间文学的语调构造中寻找到许多反映数世纪以来压迫的回声。民间文学那忧郁悲伤的一面,与其作为一个超时代诗人的自我感受——已成过去的启蒙主义的雅各宾运动和未能深入民间的民主主义革命内容——不谋而合。其诗歌(《拉科什》,1821 年;《暴君》,1823 年;三十至四十年代在先进贵族中广为流行的《国歌》,1823 年;颂歌《致自由》,1825 年)渗透着爱国的揭露激情与其对未来的忧患交相融合,更与对胜利的可能的痛苦怀疑、对枉然的感伤结合为一体(《Vanitatum vanitas[1]》,1823 年;《安慰》,1824 年等)。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意识到其崇高道德使命的、常常已达到真正公民的慷慨愤怒的谴责地步的浪漫主义诗人,但他也常常感到自己头上悬着一把民族和全人类不自由的达摩克利斯利剑,这妨碍他冲出重围、展开翅膀。

卡罗伊·基什法鲁迪的剧作、考尔切依的抒情诗,开辟了匈牙利浪漫主义的历史,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米哈伊·弗勒斯马尔蒂(1800—1855)[2]的创作则是整整一个长时段的代表。

在弗勒斯马尔蒂第一部大型作品、具有史诗规模的叙事诗《卓兰的出走》(1825)中,诗人讲述了古匈牙利人开发他们现今故乡的故事。此诗使诗人成名甚至成为名流,诗中的一切——情节、行动及庄重的形式本身——完全符合民族英雄的幻想。作者用悦耳、丰富多彩的六脚韵诗形式描写了匈牙利传说中的领袖阿尔巴德在战争中的胜利,号召人民英勇作战。作者对其自身所处的"软弱时代"的儿女们所说的话,则像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谴责,旨在激发人民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感情、愤怒和勇气。与此同时,仅仅具有浪漫主义英雄武库里程式化英勇行为的阿尔巴德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公式化与比较生动的、具有抒情诗意味的离别的情人形象,带有哀

---

① 拉丁语,"一切均是虚空"。语出《圣经》。——译注

② 弗勒斯马尔蒂,匈牙利浪漫主义诗人。匈牙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 L. 科苏特的拥护者。作品有叙事长诗《卓兰的出走》(1825)、诗剧《钟哥与金黛》(1831)、剧本《血的婚礼》(1833)等。——译注

歌色彩的无法实现的幸福主题形象，则并行不悖：表明即使笼罩在马札尔人荣誉光环的、华丽恢宏的王国中，也不是一切都无可争议，都顺顺当当。在抽象的民族幸福（实即贵族的）理想和有关个人现实幸福的抒情理想之间，矛盾的种子也在成熟。

证明上述冲突及其在弗勒斯马尔蒂创作中的深化，是他的长篇叙事诗，如幻想诗《神奇谷》、《南方的岛》（均为 1826 年）和具有阴暗浪漫主义色彩的《废墟》（1830）、《两座相邻的城堡》（1831）。在前一类作品中理想是不可企及的，真正美好的理想与生活是不可调和的（与此同时也表现了对美的迷恋和追求），此类痛苦感受唤起诗人去往一个童话般的美妙世界。在后两部作品中，则表现了对低劣的民族浪漫主义滥情的失望及对封建主义往昔的厌恶。如今在弗勒斯马尔蒂笔下，封建社会被描绘成一个又野蛮又粗鲁的王国。

531·

为理想与现实的不协调和分裂所折磨的诗人，开始转向民间文学。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弗勒斯马尔蒂创作了许多谣曲及抒情叙事诗体裁的诗。其中若干首是匈牙利诗歌中的瑰宝。这些诗情境简单，感情真挚，形式上无可挑剔，诗中渗透着理智的人生感受和健康的幽默感。谣曲中还包含着社会评价的内容（如《啊，玫瑰温柔的玫瑰》、《被抛弃的姑娘》）。两首浪漫主义抒情叙事诗《别契克列克》（1830）——讲述一个勇敢无畏的强盗和英俊潇洒的心灵征服者的故事——及《美丽的伊洛娜》（1833）——讲述一个朴实姑娘对国王马基亚什单恋的、充满心理表现力的故事——也都属于具有社会色彩的谣曲类诗作。就其题材、世界感受和形象体系而言，所有这类诗都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是长篇悲剧叙事诗，另一方面则与幻想童话剧《钟哥与金黛》（1830）——是弗勒斯马尔蒂，也是整个匈牙利浪漫主义最杰出的作品之一——较为乐观的主题相关。这篇童话具有深刻的哲理内涵，作品中凝结了作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的民间经验及世代相传的智慧。

《钟哥与金黛》的形象本身，就是对民间诗歌传说和信仰的（热恋中的姑娘种下神奇的苹果树；体现老巫婆和竭力想要破坏一对恋人幸福的小鬼恶势力的仙女国和朝霞国）一次创造性的再思考。此剧的文学来源是艾伯特·格尔盖伊的《阿尔吉鲁什——国王之子》（公元十六世纪），而后者也是一部根据当时民间母题改编而成的。《钟哥与金黛》的情境和情节即以它为原本：一个心地纯洁而又勇敢的少年钟哥，去寻找他所爱的仙女金黛所体现的幸福。这篇童话的哲学含义在于：寻找幸福、善良和美好的浪漫主义主人公，为了尘世而抛弃天国，尽管尘世间既没有不朽也没有理想的至善；这里的一切都不牢靠，都不持久。弗勒斯马尔蒂绝非偶然地在这部童话剧中，让在理想幻想和情感的云端翱翔的一对恋人，始终被另外一对——

他们的仆人、用喜剧和日常生活特征描绘出来的巴尔塔和伊尔马——所陪伴。这一对农民帮助这对恋人寻找正确道路，而正因为他们的相助，虽说在这部剧中理想与现实达到了某种童话式的假定性，但仍然不失其和谐的平衡和统一。在未失肉体性同时又非融化在粗陋的利己主义中，美披上了自我牺牲、崇高但仍是现实的尘世之爱的外衣，她能克服障碍，并能取得对巫婆诡计、恶及混沌的胜利。

弗勒斯马尔蒂童话剧真正的人民性就在这一高度的人道主义中。其人民性内涵是在与群戈拉相对立的象征形象——托尔加沙、统治者和智者——的矛盾中得到揭示的。主人公伟大的爱也是在与贪婪、贪权及虚假、怀疑主义、不可知论的学术性的斗争中得到揭示的。诗人在否定自私、压迫、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故作睿智的同时，肯定幸福在于为现实生活服务，在于与非杜撰的、贫穷但绝不气馁的人民和谐统一，在于对人的崇高使命的信仰。

匈牙利浪漫主义在弗勒斯马尔蒂三十至四十年代的创作中开始具有实实在在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倾向性。其最优秀的爱国主义抒情诗正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其中某些作品歌颂了为祖国荣誉而进行的斗争，歌颂夺取胜利的意志(《匈牙利国徽》，1832 年)。著名的《号召》(1836)以其严峻的两难选择："不是死去就是活着"歌颂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意志。《号召》成为忠于自由的诗体誓言，成为真正的民族之歌，在革命前夜的匈牙利广泛流行。号召不知疲倦地劳动的爱国主义口号，在嗣后的作品(《对祖国的爱》、《预言》，1847 年)中也鸣响着。而其他诗作则毋宁说是讽刺和揭露(《给无聊》，1841 年；《命运与马扎尔人》，1845 年)，诗人在这类作品中鞭挞落后贵族阶层的陈陈相因、一潭死水和社会的停滞。在诗歌《阶层会议之家》(1848)中，弗勒斯马尔蒂达到了尖锐而愤怒地嘲弄压迫人民的贵族阶层使祖国蒙羞的高度。

弗勒斯马尔蒂的爱国主义抒情诗把揭露因循守旧，要求具有更大的政治决心与悲剧主题(这部分地把他与考尔切依联系在一起)结合起来。例如，在《无家可归者》(1848)中就可以听到这一主题。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被流放者的浪漫主义形象，表达了一个公民和尚未取胜的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悲哀。"活雕像"(作于 1841 年的同名诗作)这一独特、勇敢而又诗化的形象，也具有同样的悲剧色彩，它表现了失去独立的波兰的悲伤和痛苦。 • 532

四十年代既是暴风雨般的革命前夜，同时也是弗勒斯马尔蒂哲理政治抒情诗及戏剧创作的鼎盛时代。诗人的精神视野进一步扩大，对历史的理解也更加深刻。诗人对历史的思考可以归结为这样一条结论，即必须为了

人类的幸福而给"大多数人以幸福"。在《题古滕贝格[1]纪念册》(1840)一诗中,在描绘幸福未来之图景的同时,诗人断言:只有连"乡村的穷人也获得了人的面貌"时,书籍出版事业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在重要的哲理—沉思体诗作(《图书馆遐思》,1844年)中,弗勒斯马尔蒂几乎是以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精神继续着启蒙主义者的探索。资产阶级进步的矛盾、社会的两副面孔——慈善家和自由的金科玉律、社会和科学的法则——是印在纸上的,是用"罪犯、伪法官、叛徒、暴君和受压迫者的破衣烂衫制成的"——使他震惊。诗人对人类未来的信心在理念上不可能是清晰的。可是,这一信心按自己的方式又是理性的、清醒的和勇敢的,因为它是诉诸于人民——历史的创造者的。在弗勒斯马尔蒂看来,友好联盟和不停顿地反对百万无家可归者——从匈牙利农家小屋居民到北美黑人——的任何压迫,乃是最终胜利的保障。

弗勒斯马尔蒂对创办匈牙利民族剧院的设想持同情态度,甚至还为民族剧院的揭幕式(1837)写了庄重的前言。而在《奥罗尔》杂志上他则为雨果和法国浪漫主义戏剧辩护。此外,他还为普及莎士比亚做了许多工作:撰写论述莎士比亚的文章,译过其作品,帮助演员在舞台上对形象进行阐释。弗勒斯马尔蒂的优秀剧作《奇列伊和匈雅提[2]》(1844)可以与雨果的部分作品相媲美,部分地可以与席勒的(《华伦斯坦的军营》)媲美,尤其是在血肉丰满地表现历史现实方面,此剧或许能令人联想起莎士比亚。弗勒斯马尔蒂描写了具有独特性格的各种人物,从他们的相互冲突中引导出先进的历史倾向(在这一场合下,指打退奥斯曼侵略者及为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而斗争)。剧中进步倾向的捍卫者似乎是英勇豪迈而又忠诚的拉斯洛·匈雅提(后成为著名统帅)。剧中情节也有生动的民间背景。拉斯洛·匈雅提及其近侍和人民,都是正面形象和力量,他们取得了对觊觎政权的分立主义的封建主义者的胜利。这类封建主义的骚乱制造者在多数情况下都描绘得十分生动,具有个人习性和行为的特征。例如吉什卡拉,他并不聪明,但性情暴烈如公牛,一块红布就能引得他疯狂暴怒。或如奇列伊,他是反对匈雅提阴谋的领导者,是一个下流无耻、异常狡猾的阴谋家,是封建乱世滋生出来的荒淫无耻、贪权爱财的贵族显贵的典型代表。就连不太重要的剧中人也都富于个性(例如奇列伊的秘书奇列尔,就和某个中

---

① 古滕贝格(1394—1399年或1406—1468年),德国印刷术发明家。十五世纪中叶在美因茨印刷了所谓四十二行的《圣经》——欧洲第一部全版出版物,公认为是早期出版物的珍品。——译注

② 匈雅提(约1407—1456年),匈牙利的摄政王(1446—1452)。1441—1443年屡胜南部的奥斯曼征服者,1456年在贝尔格莱德之战击败奥斯曼军队。——译注

世纪的莫尔恰林十分相像：一个善于逢迎、两面三刀、胆怯懦弱的仆人）。

道德及政治理想的必胜思想赋予了此剧以高尚的道德内涵。这一思想即使是在国王拉斯洛宴会上唱歌的歌手身上也有所表现。歌手唱道：周围全是骗局和背叛、背信弃义的毒剑和虚伪的言词，可是，诚实的人呵，"不要怜惜力气，要斗争！""……世上只有那既善于破坏也善于创造的人，才能获得幸福！"这一得到抒情论证，但也是行动逻辑所引发的性格冲突的结论，是对《钟哥与金黛》肯定生活这一主题的发展。

弗勒斯马尔蒂真诚欢迎 1848 年匈牙利革命取得的最初的巨大成果——取缔书报审查制度(《自由出版物》一诗)。在叶拉契奇[①]反革命军队进攻的日子里，他以《战歌》一诗呼吁本国人民进行反击。诗人曾任国民议会议员，而在危机的 1849 年则成为匈牙利共和国最高法庭成员。革命失败后他被迫潜入地下。流亡期间他创作了激情洋溢的《诅咒》(1849)，谴责不放一枪便放弃阵地的总司令格尔盖伊[②]。对于弗勒斯马尔蒂来说，革命失败成了他精神生活中一场可怕恶战。其诗意的表现形式就是他的最后一首诗作《老茨冈人》(1854)。诗中表现了一位爱国者无以言喻的悲哀，他亲眼看到了全部生活理想的破灭，看见了民族所遭受的屈辱，使理性蒙辱的，一个经历了对其最优秀的儿女实施血腥镇压的时代的公民痛苦。但就是在这些充满骚乱、痛苦的诗句里，也渗透着对未来的信心。一切都在被破坏，但一切又都在变化，诗人正是在这样的现实中汲取着痛苦而又令人高兴的喜悦。

十九世纪上半叶具有各种特征的匈牙利诗人、小说家和剧作家，都以其不同的偏离并按自己的方式仿佛重复着弗勒斯马尔蒂的演进过程，并使之变形。这一艺术发展总线索的倾向和实质几乎在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多方面、多种多样的接近生活真实的表现。这一时期的著名小说家米克洛什·约日卡(1794—1865)多数情况下还显得笨重、天真而纯朴。但他的多卷本历史小说，尤其是第一部《阿巴费》(1836)，它讲述贵族子弟，一个十六世纪特兰西瓦尼亚暴风般事件的参加者的道德更新故事，被批评界认为可以与瓦尔特·司各特媲美。

·533

① 叶拉契奇(1801—1859)，克罗地亚自治州长，奥地利军将领(1848)，镇压过维也纳十月起义(1848)和 1848—1849 年匈牙利革命。——译注

② 格尔盖伊(1818—1916)，匈牙利革命(1848—1849)期间匈牙利国民军首领(1849 年 3 月起)，国防部长(5 月起)，独裁者(8 月 11 日起)，力求同哈布斯堡王朝达成协议。在维拉戈什附近向 И. Ф. 帕斯克维奇率领的俄国沙皇干涉军投降。——译注

在此之前，安德拉西·法伊(1786—1864)的《白河上的小屋》(1832)获得了迅速而短暂的名声，这是匈牙利社会—日常生活小说的第一部作品。小说把知识青年对理想的追求与落后的地主生活方式做了对比。尽管作家在表现两代人冲突时，过分诉诸于训诫式的议论，但阴谋的编织和往昔的风习描写是成功的，某些反面人物具有生动而又敏锐的洞察力。作家的这一才华在其寓言(1820—1825)中也有所表现。此作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作品所具有的特点，那就是不尚辞藻、尖刻而又简洁的口语笔法，准确而又讽刺的人物素描——对生活原型的透明的拟名再现及恶毒而又清醒的道德感。

卡·基什法鲁迪在剧作中转向民族的历史冲突，力求唤醒爱国主义感情的追求，为埃德·西格里格季(1814—1878)所继承。在其最初的作品(写于三十年代末)中，观众的兴趣之所以被唤醒，的确有赖于作品所大量采用的陈腐—浪漫主义手法(被抛弃的孩子、抢婚、复仇、下毒、失明等等)。但在喜剧《玫瑰》(1840)尤其是剧作《格里蒂》(1845)中，出现了被刻画得惟妙惟肖的人物。《逃兵》(1843)和《牧马人》(1847)中，西格里格季给舞台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表现了农民在道德上要优于地主。

在亚诺什·加莱(1812—1853)同样具有日常生活色彩的抒情诗，尤其是建立在民间文学母题上的长篇叙事诗《退伍的士兵》中，上述追求生活的朴素及真实的倾向，也得到了鲜明表现。民歌采集家、富有教养的著名批评家、美学家亚诺什·埃尔代伊(1814—1868)的兴趣取向，也同样符合这一倾向：他不同意席勒的理想说，而接近现实主义的诗学要求。跟随其后的是一种整体的革命前“改革时代”的总趋向，这就是渐进的社会具体化和与其相适应的民族解放的吸引力、激情和理想的艺术具体化。

人们感觉到并且执著地要求反思西欧美学史的经验。尤若夫·厄缶(1813—1871)的长篇小说，比较接近西方文学，小说表现了匈牙利封建主义和西欧资产阶级制度的广泛画面。亚诺什·阿兰尼(1817—1882)则在1848年革命前夕创作了可以与之相比的具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叙事诗《多尔第》(1846)和《多尔第的黄昏》(1848)，长诗讲述一个跌倒在宫廷门口的农民小伙子——一个真正的民间勇士，其自然朴实和心灵的健康反衬出在社会发展较早的“和平”阶段产生的尔虞我诈和道德堕落。的确，他们是在弗勒斯马尔蒂和裴多菲之后进入“崇高的”民族文学的，而且他们采用的是在许多方面无可挑剔的“天真”的民间文学手法。

匈牙利批评界很早就认为厄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笛卡儿主义者》(1839—1841)，与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抒情诗的情绪、主人公的世界性悲哀)，部分也与巴尔扎克的《幻灭》有相似之处(法国七月王朝后的生

活场景）。至于《乡村公证员》（1845）和《1514年的匈牙利》（1846），则更有权说它们与西方文学接近，尽管它们更接近的是瓦·司各特，以及英国封建资产阶级现实阴暗面的经典揭露者和普通劳动人民的捍卫者——从菲尔丁到狄更斯——的创作。《乡村公证员》中对颠沛流离的人和具有高尚思想和更崇高使命的人（腾格伊）的同情，《笛卡儿主义者》对浪漫主义绝望消沉的摒弃，对社会习性和制度准确而又讥讽的批评，外省官员形象——醉鬼、骗子、吹毛求疵者——所有这一切都令人想起英国长篇小说家笔下那些严肃而又高尚的人道主义篇章。在厄缶表现乔治·多沙农民起义[①]的长篇小说（《1514年的匈牙利》）中，社会批判精神更为深思熟虑也更加尖锐，作者想要制止无限制的压迫可能产生的后果。

与此同时，厄缶创作过程并不意味着匈牙利社会和文学为了社会而牺牲民族问题，相反，文学对一般作为主观抒情和客观历史原则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制约的理解加深了。山陀尔·裴多菲的创作再好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山陀尔·裴多菲（1823—1849）实际上是从弗勒斯马尔蒂较为长久的思想美学道路业已取得成果的地方开始的。对很早就了解乡村、大兵、乞丐漂泊无依的命运的裴多菲来说，民间诗歌不仅是书本而且也是现实智慧的源泉，是他最初的世界观和诗学的根源。他最初在中学和漂泊时代的文学习作，就是沿着民谣的道路走的。“民间”一词不仅具有狭隘的体裁“谣曲”含义（其中可以找到抒情叙事诗的特征），而且一般也含有对世界的态度的意义。裴多菲的特点不仅在于善于艺术地、“以民间精神”引用反题或对比、修饰语或比喻，而且更在于其与人民有着共同的关怀、屈辱、幽默感、爽朗、自然朴实和感情的真挚。 ·534

因此，他的许多诗歌都已进入民间口头传统——人民把它们当作自己的，而和真正的民间文学难以区分（其最普及的诗是《市场》，1845年）。反之，在裴多菲本人笔下，从民间文学主题、语调到抒情诗的过渡常常难以察觉。这一“难以察觉”取决于其艺术接受和观照世界的方法与民间文学相一致。使周围环境和自然人化这一原初的艺术比喻，在他笔下成为真正的诗学基础和主导的艺术形式构成手法——从这颗种子里，渐渐生长出整整一套革命唯物主义的存在哲学。和他所热爱的贝朗瑞一样，裴多菲把歌谣引进“崇高的”抒情诗中，因为这与他自己的美学纲领一致：把人民写进文

---

① 乔治·多沙起义，1514年匈牙利农民反封建起义。起初是十字军对土耳其人的进军，领导者是小贵族乔治·多沙。L.梅萨罗什为起义的思想领袖之一。农民军后被贵族军队击溃，多沙被处死。——译注

学,以便使其接近政治上的统治。艺术的拟人观以及从中生长出的诗意世界感受、存在哲学,首先成为这样一条轨道,沿着这条轨道,在裴多菲笔下民间歌谣和民间诗歌手法融汇成一种严肃而“崇高的”文学。

裴多菲从民间诗歌中所掌握的拟人化诗歌手法和拟人观中,隐藏着丰富多彩、多种多样的审美可能性。这类得到展示和实现的手法成了艺术新意的界限,裴多菲的创作以这些新元素丰富了匈牙利和世界的抒情诗。而其中的界限之一,正是由于浪漫主义者用十分流行的象征和比喻使心灵状态和自然状态接近起来。一种经过巧妙选择过的抒情阐释状态的自然,成为诗人心灵运动的形象化投射(《在哈维什平原》一诗,1846 年)。诗人在日落时分走在空旷无人的大平原上,到处是一片寂静,除车轮的辚辚声时不时地响起外,整个宇宙几乎是寂静的。白皑皑的远山在向后退去,远处牧人的篝火在闪烁着星光,像是从不可知的未来投射来的火种……这一切再加上在高空中(更具“文学”的形象)游动的月亮(被注定死亡的幽灵),散发着朦胧的不牢靠感及存在的终结感。与此同时,这一仿佛原始时代的昏暗,几个世纪以来的木然状态,被一种高尚的情感所照亮。对永恒忧郁的直观同时也成为诗人与既有限又无限的世界,与既艰难又美好的生活同一——“旧的”是时间的灰黯延续,“新的”则是和我们人本身一起不断发生的变化。类似的抒情复体——合二而一——的世界感受,是写于 1847 年的诗《乌云》、《晚霞》、《在路上……》的基础。

在裴多菲笔下,自然的拟人化是以内在运动实现的。诗人以此来发现和实现新意,使心灵和自然状态的形象等值物变得新鲜。这像是把民间创作热爱生活的自然力转化并转变为一种几乎是纲领式的浪漫人道主义。诗人好像从审美方面把留在记忆中的人心及人的性格品行中的优秀东西保留下来。人及其激情在自然这面神奇的镜子里,不仅得到改善和光照(《乌云》、《初秋》1847 年等),而且成为美好得无以复加的宏伟(写于同年的《我的心》、《谁曾见过……》),因为它们是经由一个渴望世界和人变得更纯洁、更优秀、更完美的诗人眼睛所照亮的。

随着与宗法制理想和陈腐趣味的分道扬镳,这一人道主义理想及与其相联的形象体系便自然地、合乎规律地具有了社会反叛性。1846—1848 年间,在诗人笔下,与自然不仅有着比喻式的联系,而且另一更加广泛的、公民式的联想线索也经常出现。被自然照亮的人际关系和人化的自然及其变化、安宁和暴风雨,似乎开始参与为自由、为个人及人民的幸福而进行的必要的社会斗争。而意识到这一点的诗人,在预言这一社会需要和诉求的意志时,某种“技术—人本主义”斗争的比喻便产生了。诗人的心是一堆从中锻造“自由之剑”的“矿石”(《我的心》,1847 年)。奴役的锁链是制造铁轨

的金属，社会进步的真正材料(《在铁路上》，1847年)。于是，一种假定的、仿佛是“社会的”、甚至是社会—造反性的风景就产生了。覆盖着雪被的冻僵平原，宛若一个穿着破衣烂衫的女人，一眼就能让人从她身上感受到一种贫寒、沮丧和软弱的特征(《冬天的傍晚》、《冬天的原野》，1848年)。目睹背信弃义的维也纳骗局，就连黎明前的天空也发出了愤怒的红光(《1848》)。而面对早春，“胆怯的冬天—暴君”流下了“失落的泪水”；早春践踏着“如大海一般的敌人的大舰队”——而这已经是被召唤而来的、高尚而又实施惩罚的革命本身(《冬天的死神》、《给春天》、《海在沸腾》，1848年)。 ·535

与历史对匈牙利解放运动的彻底镇压和惩罚相连的，是一些带有悲剧意味的联想。但尽管如此，裴多菲在民间文学土壤里竞相开放的“第一朵野性小花”似的哲学—诗学世界感受，不仅在起源上而且在其终极意义上，都是不可战胜的光明。山陀尔·裴多菲就其抒情诗的特征而言是和谐的。他童年时代一首歌谣里的叠句——在《在亲爱的故乡》(1848)一诗中——听起来是多么动人、多么温柔啊。这一朴实的叠句，能引起人多么高尚而又深刻的感情啊。因为其中所表现的不单单是回忆，而且还令人想起诗人在其成熟和复杂的一生中，把它作为必要的纯洁理想而珍爱了一生的那一和谐。但另外一个叠句——出自《簌簌秋风……》一诗(1847)——也浮现在我们的脑际，此句同样很祥和，差不多带有田园诗的意味(“把疲倦的头依靠在我的胸口，我的妻子在安宁地、恬静地休息……”)。但此诗的全部内容与此完全不同，用一只手搂着正在沉睡中的年轻妻子，诗人另一只手拿着“自己的祈祷书和教义问答”——在读着点燃火种的革命史。此诗戏剧性的力量正是在抒情性平和的叠句与战斗性的内容之对立中宛转迂回，因为作者心中充满强烈的愿望想要坚持、保卫和平与和谐，使之不受社会恶势力的侵犯。

高尚的人道主义、爱国主义的悲哀和充满社会希望的愤怒威胁的统一，这就是其抒情诗世界的独特之处。政治、革命和人民自发的肯定生活的趋向一样，已经深入到他的血液中，前者只是一种所承担的、紧张的、吞没其所有理性和精神生活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后者的继续才会给人以深刻印象和效力。因此，裴多菲的政治抒情诗也才会如此吸引读者，因为它是从所有成就中发展起来的。正如从自然的人化中自然会产生令人不安的色彩象征一样(红太阳、朝霞、红旗)，从与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联想中，产生的是迫切的、现实的、富于召唤力的比喻(“衣裳褴褛的勇士”)。其诗歌社会尖锐性的增强，对人民命运充满感情的忧患，导致了政治抒情诗的创作。

裴多菲的哲理抒情诗是从诗歌静态向信念坚定的行动过渡的一座独特

的桥梁。这座桥梁，一方面并未失去诗人所特有的天真率直及民间文学和口语表达方式的朴实真挚；另一方面，其哲理诗在理性层面上又十分深刻。抒情诗的语调似乎吸取着诗人从文学、历史、生活、莎士比亚到法国革命，从匈牙利农民战争到1848年欧洲的教训中吸取的巨大精神经验。姑以诗作《人》、《法庭》或《光明》(1847)为例，诗中鸣响着真正意识到了矛盾和迷误的“哈姆雷特式”问题。这是对于解放斗争的艰难性、人民和人类未来的多么紧张的思考啊(《做还是不做诗人》，1845年；《疯子》，1846年；《一个问题使我不安……》，1846年；《失败的羞耻、逃跑的耻辱……》，1848年)。一种把思想和情绪融为一体的特有组合——鼓舞人心的希望、羞耻、忧患、遗憾、愤怒的不平——这一切使裴多菲差不多成了匈牙利诗歌中现代抒情复调体，为某一个令诗人痛苦的主题而鼓舞的戏剧独白体的创始者。

536 ·

尽管如此，即使在充满最紧张的戏剧性的抒情诗中，裴多菲也未失去内在的完整性。这是一种非常罕见的才华，尤其是在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而在这方面，这位匈牙利诗人与海涅完全不同，海涅是在为“希腊派”和“禁欲派”的分裂和分离而痛苦。裴多菲甚至在写作《疯子》精神高度紧张的时期，在写作《极为可怕的时代》(1849)、《生与死》(1849)的暴风雨般绝望的时候，当一切都只预兆着失败，当镇压了欧洲革命的敌人如“披头散发的马札尔人低着鲜血淋漓的脑袋”(列·马尔丁诺夫译本)从四面包围着的时候，也仍旧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他到处都能找到他心中被侮辱在世上被蹂躏的和谐，到处都向扑灭和谐之力量的一切发出奋不顾身的忘我的挑战。在他身上，悲剧性和热爱自由、向往未来的激情——无论是个别诗作(如《法庭》)或整个创作——都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抒情魅力的统一整体，因为裴多菲的悲剧本身似乎就带有或包含绝非从乌托邦的希望中产生的那种历史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乃是对他所体验的悲剧的一次“净化”，使他和读者得以哪怕是从理想方面克服不和谐从而不失去社会—人道主义理想。

裴多菲想要做一个尘世诗人，即在白天而不是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国度”和“子虚乌有的幻想里”创造天堂(写于1847年的诗作《天与地》、《奇思怪想与理性》)。而他的乐观主义的大地和支柱，是拥有其全部完整性、包括其最简单也最高度的创造表现的生动的生活本身。不光自然的和谐具有清洗一切的功能，就是数世纪以来积淀下来的人民信念，都在于生对死、爱对恨的优越性；在于个人幸福与全体幸福的不可分割性(关于这一点可参阅他的诗《恨世》，1846年；《星空》，1847年)。后来逐渐地连解放斗争这一历史创造的实践学校和人间天堂的创建——即人本身的人化——也成为他的支柱。他并不排除(这一点可以轻易地确证)哲理抒情诗，它就是为这一历史需求服务的。他那燃烧到白热化程度的激情，他那拷问一切、富于号



山陀尔·裴多菲像　石印像
M.巴拉巴什作　1845年

召力和尖锐性的思想，则直接诉诸各类身份地位不同的听众、敌人和思想上的同道者。

所以，就他的政治抒情诗的形式而言，几乎都是直接的呼吁，这就不足为怪了。这类诗或是充满讽刺和嘲笑的揭露性话语(《贵族》，1844年)，或是愤怒和骄傲的召唤(《一朵小小的野花》，1844年；《给资本巨头们》，《够了》，1848年)；或是偶而带有像是奋不顾身的勇敢精神(《黑红旗之歌》，1848年；《寂静的欧洲》，1849年)；或是对亲人、不知名的战友、朋友发出的热情洋溢的赞扬、谴责或号召(《匈牙利人》，1846年；《要当个男子汉》，1847年；《给国王的绞架》，1848年等等)。在这些诗中裴多菲从直接意义上走向活跃的人民大众并带着这些诗——到大厅去、到大街去、到讲坛去、到广场去从事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裴多菲相信并证实，诗歌同样可以成为社会政治活动的一种尖锐的武器。他的《民族之歌》(1848)是第一部未经出版物机关审查而发表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广为传诵，有权成为真正革命的诗体宣言。诗作《请尊重列兵》(1849)被以传单形式复印，并作为匈

牙利革命军队战斗条例的非官方附录。

面对哈布斯堡王朝的专横肆虐，自由贵族的妥协主义，在为真正解放人民而进行的斗争中，在1848—1849年解放战争中，裴多菲在所有的历史转折关头，都以“三月青年”领袖身份，以国民议会议员身份，以共和国军军官身份，锻炼成长为一个讲坛诗人，一个诗人兼政治斗士，一个革命的鼓动家。与此相应，他那种有效的、演讲体的、口语语体的抒情诗形式也得以锻炼成熟。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了自由事业：文学史上这样的先例还几乎从未有过。很少有人能像裴多菲那样，用全部身心关注人民的命运，在其心目中，人民这一概念最初和一般的“民族”一样，是比较模糊的，可后来，一切都明确化民主化了——即农民、城市贫民和革命者。他往往把人民的命运和斗争（随着革命越来越尖锐激烈）当作他个人和一个诗人的生活。

数年之间，裴多菲得以认识社会人道主义希望的欢乐及其真正实现的537·难度。在他写于早年，洋溢着幻想童话色彩的通向幸福之路的预告式的叙事诗《亚诺什勇士》（1844）中，包含着多么灿烂光明、多么庄严充实的生活。勇敢而幸运的主人公是一个朴实的农家小伙子，的确是“一下子”、自然而然地、以一种果敢而又迷人的轻松，将所有障碍一举清除，战胜了阴谋和诱惑，走到了仙女国，和心爱的人结为伉俪。而在离写作这一篇仅隔四年的长篇叙事诗《圣徒》（1848年，九十年代才全文发表）中，则笼罩着严峻的悲剧气氛。与自己的扬契·库库鲁扎一起飞往仙女国的裴多菲，这次和幻想家——贫穷汉西历维斯特罗经历了横亘在通向社会正义路上人生痛苦炼狱的所有圈层，尽管——而这位真的成为英勇诗人的不变的历史乐观主义正在于此——公民的成长成为对他们无价的奖赏。

《圣徒》是一部英雄主义的成长史诗：一个诚实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少年，经历了最严峻的考验及对玫瑰色的启蒙主义幻想的悲伤失望，却巩固和加强了对社会崇高理想的追求。这一浪漫主义长诗的主人公，只是在经受了绝望而的确是十字架式的苦难之后，才成为更加坚定、睿智，对许多自由事业真正重大的历史矛盾抱有清醒认识的青年。实际上，社会被分成两种人——优秀的、激情洋溢的思想家和处于少数的备受鄙视的民间那些为人民担忧的自由党人。可怕的金钱势力和特权统治着一切，产生了压迫、奴颜婢膝圆滑的人生机巧，甚至腐蚀了人民，他们在收买、诱惑、毒化着自己的辩护者。人们省悟及在政治上觉醒的道路还很遥远而且充满荆棘，哎，他——西里维斯特罗呀，徒劳地想要用一颗射向暴君的子弹来加速这一过程。

裴多菲的浪漫主义创作尽管具有叛逆性，有时甚至是激越性，但却与任何造作、崇尚词藻或抽象性格格不入。他最主要的美学原则是健康的自然性，而这保障了他在匈牙利文学中长久的生命力。恐怕只有系列组诗《埃

捷利卡墓上的柏树枝》(1845)中个别模仿之作会很快陈旧,在这些诗中诗人穿了一身与他并不十分合身的德国浪漫主义者的衣服,在预言幽灵的到来,而自己也像个幽灵一般徘徊在墓地里。然而,他很快就把这一切给抛弃了,并富于挑战性地把自己美学中的“月亮”换成了“太阳”(《我和太阳》,1845年),在太阳那炽热的光芒之下,“爱与自由”的联盟在他的抒情诗中开出繁盛的花朵。“爱情”与“自由”似乎是其所特有的将日常与英雄、朴实与崇高融为一体的概念符号。而在《圣徒》中也同样如此:西里维斯特罗当然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孤独造反者,但对其精神也可以说是“肉体”——一般城市贫民的日常生活——同样能令人想起狄更斯的色彩。要知道主人公(和作者)被日常生活场景的评价所阐述的高尚悲伤,同样深深植根于生活之中。正因为如此,裴多菲的创作可以准备新的东西,同样和日常生活不可分割,也为嗣后浪漫主义的社会人道主义激情和现实主义概括做了准备。

在裴多菲笔下,批判和肯定的原则不可分割。他描写了匈牙利穷乡僻壤、非建制县的赤贫状况,如《库佳卡巴罗》(1847)就具有尖锐的批判性。然而在此类描写中,当然也渗透了作家对祖国偏远地区,对愚昧、无助人民巨大的爱——即便是一种带有抒情幽默性的爱。而在描写普施塔草原和庄园普通人的其他诗作中,在其无与伦比的风景抒情诗中,则贯穿着作者对农民和雇工消磨时间方式的细致观察——这些诗里包含着多么巨大的爱,多么亲密的、儿子般的感情啊!此类作品中也有社会批判的素描,其中包括严厉的嘲讽和讽刺——《巴列—巴托》(1847)与《奥卡托泰耶》(1847),有尖锐的分析眼光和激烈的解放政治号召。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风习描写;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是理想的激情。但在这两类诗中都充满了改善、更新世界的激情。在以上两类诗中(及其他许多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的爱情、沉思和体验的诗中),还出现了不可重复的一个人,同时又是抒情概括的精神面貌和一个与其民族日常和历史的存在不可分割的革命家兼诗人的生活道路,而人民也正是由于裴多菲并从他开始,第一次全面完整地走进了匈牙利文学。

在诗人的民主主义中,前社会主义的成分业已成熟。其革命和国际的世界观成为匈牙利人民在1848年政治高潮期间所达到的社会意识的高峰。这也就是为什么山陀尔·裴多菲实际上在几年当中巩固和超越了自己国家文学先前的成就,又善于从审美上为以后的发展道路开先河的原因。 ·538

第十章　多瑙河诸公国文学

多瑙河诸公国文学——摩尔达瓦和瓦拉几亚——是土耳其帝国和属于

奥地利帝国的特兰西瓦尼亚的附庸国，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前二十年中，是个别诗人的居留地，其作品被编入书目，在朋友和熟人圈被朗诵，在纪念册里被辗转抄写；有许多诗仅以手稿传世，或在其作者死后才出版。

后来得名为拉丁学派（或阿尔迪亚尔学派）的文化启蒙派，首先关注的是历史和语言学问题，并提供了某些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是伊·布达伊-德列亚努（1760—1820）的《讥讽—喜剧—讽刺长诗》、《茨冈风情或茨冈营》（1812）。遵循文学上的楷模（从《巴特拉哈米奥马希亚》到弥尔顿），他利用了自己杜撰的历史情节及与其平行发展的爱情故事。长诗充满反封建思想（抗议剥削阶级的强暴、教会的教条主义，肯定人权和人民的自决权）。与此同时，在众多散文体注释中，作者表述了阿尔迪亚尔学派的历史观和对罗马尼亚的语言起源观。总的说来，长诗是对奥地利帝国社会状况的批评分析。

多瑙河诸公国中十九世纪初最重要的诗人有扬库·维格雷斯库（1792—1863）和科斯塔克·科纳基（1777—1849）。他们那种歌颂享乐生活的诗歌作为个性自我确立的第一批尝试，是浪漫主义倾向的先声，1821年以后，成为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流派。

秘密同盟分子在亚历山德拉·伊普西兰蒂领导下发动的起义和1821年的土多尔·弗拉基米雷斯库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反映了巴尔干人民进行斗争的两面性：民族的反奥斯曼帝国和社会的反封建。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多瑙河诸公国经历了民族成长期，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意识开始在此期间产生反对内外（奥斯曼帝国）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贵族进步力量。这一时期提出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有启蒙主义层面（人民教育的普及与民主化，第一批报刊杂志的出版、出版事业和剧院的创建）的，也有社会政治层面（民族解放、社会改革、农民问题）的。具体的社会问题激发了文学把启蒙主义理念和古典主义文学形式，追随并改造面向未来的浪漫主义激情，使文学具有民族自由的预感。浪漫主义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形成，是作为对僵死的封建主义的陈腐性的反动而形成的。

最初一批报纸的出现，推动了文学发展。这些报纸于1829年在瓦拉几亚的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发行（《库里耶路尔·罗马尼亚斯克》），在摩尔多瓦则有格奥尔格·阿萨基（《阿尔宾娜·罗马尼亚斯克》）；它们很快就有了专门的文学副刊。

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1802—1872）和格奥尔格·阿萨基（1788—1869）是前革命时期诸公国文化生活中的两位杰出人物。他们作为教育家和教科书编撰者为教育和语言的发展付出了巨大力量，他们还推动了民族剧院的创立，从事翻译工作，同时他们自己也是文学家。他们的文化和文

学活动推动了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而后者反过来也推动了革命思想的形成，尽管在政治观上他们两个人并非总是处于先进思想的高峰。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曾加入1848年的临时政府，但他主张与大贵族妥协，阿萨基则根本没有参加1848年革命。

动摇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地区统治的俄—土战争（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1829年的亚得里亚波尔协议），旨在反对专制政权的秘密同盟及社团的成立，文化启蒙主义运动的积极活动——这一切都推动了爱国主义感情的高涨，巩固了对即将到来的民族解放的信心。同盟的优秀代表人物真切地感觉到所处这个时代的过渡性质，意识到了个人为人民和社会所处的状况所应担负的责任。人们把现代生活当作是一个历史阶段，在此阶段里斗争应当取得决定性胜利，而在其后，全民和全社会的福祉便将实现。对待历史的类似态度在诗歌中产生了两条线索。历史的过去首先是在所谓的“废墟诗”中出现的，其奠基人公认为是瓦西列·克尔洛娃（1809—1831）——诗歌《基尔克戈维什特的废墟》（1830）——的作者。几乎所有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诗人都在写作同一主题：亚历山德拉·赫里索维尔蒂的《致尼亚姆茨城堡废墟》（1834）；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的《基尔克戈维什特废墟之夜》（1836）；亚历山德雷斯库的《从前·咏基亚鲁鲁伊修道院》（1834）、《基斯曼的月出》（1842）、《德雷格尚的坟墓》（1842）、《科津的密尔契的幽灵》（1844）；约翰·卡津纳的《在茨别沙城堡废墟上》（1847）和米哈伊尔·库楚兰的《尼亚姆茨废墟上的一日一夜》（1840）。 ·539

“废墟诗”的特点是其哀歌的语调，它往往诞生于夜间的浪漫风景，风景充当背景，由此反衬出欢快的号召，即要当代的本国人民起来斗争，不要丢掉祖先的荣誉，不要辜负他们的荣誉。一旦诗歌涉及当代生活，爱国主义号召便会代之以肯定生活的激情。没有一个推动社会生活向前发展的事件被诗人忽略。对于他们来说，当代生活是历史活生生的步伐，而诗歌则记录着它的每一步。扬库·维格雷斯库写作的诗歌《萨图恩（为布加勒斯特第一个剧院于1819年的建立而作）》即是一例。1821年有整整一系列诗作值得注意：扬库·维格雷斯库的《福音》、《罗马尼亚之歌》、《专制政权治下的人民之歌》；瓦西列·法比安·波勃的《1821年的摩尔达瓦》；格奥尔格·阿萨基的《给摩尔多瓦人（为地方政权的建立而作），1822》阿萨基还以诗作《为1828年将民族语言纳入摩尔多瓦人民教育而作》引起反响。《1829年俄国大军颂歌》为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所作，《罗马尼亚军歌（为1828年建立民族警察局而作）》系扬库·维格雷斯库所写，《1830年新年，为摩尔多瓦第一部行政及立法组织规则汇编的公布而作》则出自格奥尔格·阿萨基之手，《茨冈人的解放》（1840）出自瓦西列·亚历山德里之手等。所有这些

诗作似乎汇成一个统一、庄重的当代颂歌洪流了。

在多瑙河诸公国文学形成期的思想艺术生活中，翻译起着重大作用。二十至三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意义尤其重大，它不仅把其他民族的文化介绍进来，而且形成了向封建主义宣战的世界观。伏尔泰帮助人们摆脱宗教思维方式和教会道德（《阿尔济拉或美国人》、《宗教狂或穆罕默德先知》、《美列帕》均有译本），与此相关，感情和个人体验的世界得以确立（普雷沃的《曼侬·莱斯戈》、歌德的《维廉·迈斯特》、拉马丁的诗作均有译本）。人具有个性，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但同时，作为一个公民他还应有其自己的责任感——因此，在翻译理论的同时还翻译拉辛的戏剧（《不列颠人》、《熙德》）。对自由的追求，与专制制度和暴君的斗争，迫使作家转向拜伦和雨果（《玛丽·都铎尔》、《昂杰罗》）。正如译自普希金的《茨冈》所肯定的那样，个人自由不应变作对他人的奴役。安季奥赫·康捷米尔的《讽刺诗》译本激发了人们对封建社会的批判态度。同时，译本还是一个艺术学校，帮助人们掌握文学形式，考验了母语表现力的可能性。

在推动民族文学形成的同时，翻译作品到四十年代初似乎有压倒创作之势。因此，历史学家、政论文作者、杰出的社会政治活动家马·科加尔尼恰努[①]（1817—1891）在 1840 年创办了《文学达基亚》杂志，在一篇宗旨性的文章中，作者直接宣称翻译并不能制造文学，并号召用一切办法发展自己的创作，而创作应当以历史材料、当代生活和民间风俗为基础。科加尔尼恰努在开辟民族文学发展之路时，依赖于已经产生的倾向。就在同一年（1840），格·阿萨基的抒情叙事诗《达基亚和特兰亚》出版，还出版了科·涅格鲁齐的短篇小说《亚历山德鲁·雷普什尼亚努》。阿萨基的抒情叙事诗以传说为基础，它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浪漫主义作品，即作者很少对历史的忠实性和历史思考感兴趣，被摆在首位的是古老传说的浪漫主义情节。嗣后，类似这样的历史抒情诗，在迪·博林迪尼亚努和瓦·亚历山德里[②]的创作中有所发展。科斯塔克·涅格鲁齐（1808—1868）的短篇小说是历史题材作品中的杰作。作者以格历格列·乌列克[③]的摩尔多瓦编年

① 科加尔尼恰努，1860—1861 年为摩尔多瓦，1863—1865 年为罗马尼亚公国政府首脑；曾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1876 年，1877 年、1878 年任外交部长，历史学家、作家。1887—1890 年任罗马尼亚科学院院长。有历史著作、短篇小说、政论和剧本等。——译注

② 亚历山德里（1821—1890），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作家、戏剧活动家、民间口头创作活动家。1848 年革命的参加者。作有抨击小市民习气的辛辣讽刺喜剧《雅西在狂欢节》（1852）、《基莉察在外省》（1852）、爱国主义抒情诗集《多依纳歌曲》（1843—1853）。——译注

③ 格历格列·乌列克（1590—1647），摩尔多瓦国务活动家，亲波兰。贵族，作家。摩尔达维亚第一部著名编年史的作者。——译注

纪事为基础，创作了一部与暴君斗争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作品。

为文学寻找民族基础的追求，迫使作家们把目光转向历史和民间文学。

安东·潘恩（1794—1854）为普及民间文学做了大量工作，在自己的印刷所里印制了若干部歌谣集。他的主要著作是《谚语集或民间故事》（1847）。他把谚语按主题归类，并给每个栏目创作了自己的诗。他以此创作了一部类似于道德法规或《人生指南》的书。

民间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价值，尤其是诗歌和民歌多依纳，豪伊杜克[①]歌谣和抒情叙事诗、传说和故事，在瓦·亚历山德里于1852—1853年间出版的由他亲自记录的歌谣出版后，得到了充分的展现，编者还在书后附上了由阿雷克苏·鲁索[②]及其他文化工作者收集的作品。这是对民间文学的一次真正发现，但这绝不是说，在瓦·亚历山德里的《歌谣》出版前，诗歌与民间文学是完全绝缘的：格·阿萨基和埃里亚德·勒杜雷斯库就已经利用过民间传说（《火蛇》，1842），瓦西列·亚历山德里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处于民间诗歌的影响下（《多依纳》、《安德里-波帕》、《巫婆》、《占卜者》、《费特-洛戈费特》、《契涅尔-契涅尔》等诗）。

进入诗歌的民间文学，有助于文学语言的形成。这在十九世纪前半叶是一个具有头等重大意义的问题，因为当时被人们曲解的阿尔迪亚尔学派的思想和正在成为时髦的法语，促使"理论"基础和文学语言人为的"拉丁化"。

民间文学促进了反封建世界观的形成。在这方面，歌颂豪伊杜克——民间复仇者——的英勇果敢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豪伊杜克英雄歌和历史歌谣，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在民间歌谣中反映和歌颂反对压迫者和迫害者的斗争，已经成为文学的财产（瓦·亚历山德里的《多依纳》、《游击队员之歌》，科·内格利的《游击队员之歌》），许多诗歌把"起来进行斗争"的号召具体化了，表明应当为了什么、对准谁来进行斗争。民间文学的基础赋予文学以社会意义，而这种社会意识有时会由民族解放思想所产生的全民爱国主义热忱所掩盖，同时这种热忱在1848年革命酝酿期中又明显不足。社会主题、揭露劳动人民的无权地位，只有在切扎拉·博利亚克（1813—1881）的《乞丐在行进》、《茨冈之女和贵族之女》、《劳动者》、《暴力》、《苦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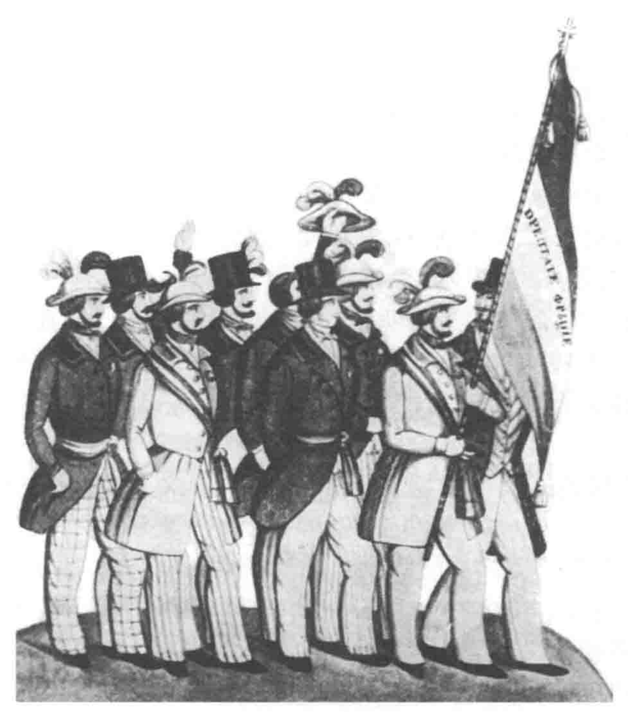
---

① 豪伊杜克，十五至十九世纪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武装抗击土耳其的参加者。1877—1878年俄土战争中豪伊杜克曾同俄军为解放保加利亚而并肩作战。巴尔干各国许多作家在其作品中歌颂了豪伊杜克的功绩。在此意为"古游击队歌"。——译注

② 鲁索（1819—1859），摩尔多瓦和罗马尼亚作家、政论家。作品有讽刺剧《日克鲁切鲁尔·瓦德雷》（1846）、长诗《罗马尼亚之歌》（1850），歌颂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此外，还写有反对封建残余的特写和论文等。——译注

中才可见到,尽管他的诗也远离历史及社会具体问题。

一方面,关于社会理想的概念极为模糊;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反对现行封建压迫和镇压体系的斗争,这使得寓言成为一种流行文学体裁。所有诗人除极个别外,都写作寓言,但最常采用这一体裁的是格里戈列·亚历山德雷斯库、亚历山大·多尼奇。与寓言关系密切而流行程度并不亚于寓言体裁的是讽刺诗和献诗。这类诗尽管未超出日常生活和风习批判的范畴,但这一相对的狭隘性并不妨碍它们动摇封建社会制度。



1848 年的一组革命者 木刻画
彼得雷斯库作

在二十至四十年代的社会生活中,戏剧起着重要作用。布加勒斯特"爱乐协会"的成立(1833)和"爱乐—戏剧音乐学院"在雅西[①]的成立(1836),要求有一个全民上演剧目。讽刺喜剧最适合时代的感受:社会恶行被看作是可以克服的,在同它们的斗争中,笑、讽刺和讥笑是最重要的武器。

科斯塔克·法卡的喜剧《羡慕法国的女人》(1833)是第一批民族戏剧之一。但民族戏剧的奠基人是瓦西列·亚历山德里,他的戏剧有《来自亥

① 雅西,罗马尼亚东部城市雅西县行政中心。——译注

莱的法尔马措》(1840)、《女时装师和官吏》(1841)、《来自萨达古尔的约尔格》(1844)和《狂欢节期间的雅西,或梦中的密谋》(1845)。如果说在亚历山德里的前三部戏剧中尚未超出嘲讽城市居民风习和人物典型的话,那么在喜剧《狂欢节期间的雅西,或梦中的密谋》中,类似的嘲笑已经针对有钱人的政权对可能的阴谋——即革命式变革——的恐惧感了。

1848 年前夕,在摩尔多瓦,亚历山德里开展了最广泛而积极的文学活动。作为诗人、戏剧家、民歌收集者和散文家,他还创作了《一个金币的故事》(1844)。尽管《故事》是以散文写的,但似乎在其身上集中了所有诗歌体裁:书中既有寓言比喻,也有沉思和讽刺,还有对虚假浪漫主义激情的讥讽,而当涉及多瑙河诸公国中茨冈人的状况时,还表现了真正浪漫主义的激情。瓦·亚历山德里采用多种浪漫主义手法,对社会同样屈服于金钱势力之下的各个阶层作了粗线条的评述,同时表述了自己时代主要的进步观点——从要求语言的纯洁性到摆脱封建主义专制。

就思想内容和使用多种浪漫主义文学手法的丰富性而言,亚历山德里的短篇小说《一个金币的故事》是这一时期基本上还属于"小体裁"——个别的场面、素描、场景、生活的断片(或《一个金币的故事》那样的一组组素描)——的小说所取得的光辉成就之一。这种小说与在西欧和俄国极为盛行的"社会风情特写小说"十分接近。这种小说追求描写和表现事物的具体性和忠实性,与诗歌的讽刺有几分相似,这说明它与早期文学有着内在联系。与此同时,正是由于这种艺术的忠实性,这些"素描"才成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先声。

1848 年革命在多瑙河诸公国遭到了失败。多瑙河诸公国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文学在其最坚定的革命斗士的身上仍然继续着它的激情。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有两个人物,即尼古莱·贝尔切斯库和阿列科·鲁索。

尼·贝尔切斯库(1819—1852)是一个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著有《瓦拉几亚奠基到当代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艺术》(1844)、《论各个时期罗马尼亚诸公国中耕地劳动者的社会地位》(1846)、《论给农民分地问题》(1850)和《罗马尼亚史上的革命进程》(1850)。他在其著作中从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出发来思考历史进程,这使得这些著作不仅对社会思想的发展,而且对给民族历史以极大关注的文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贝尔切斯库给本国文学带来了科学政论文的话,那么亚列斯库·卢梭(1819—1859)则在其《罗马尼亚之歌》(1850)中,提供了感情政论文的样本。他学习了圣经中《雅歌》的手法,创作了祖国和人民的赞歌。《罗马之歌》发出了反对民族和社会不自由的热情号召。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多瑙河诸公国文学急遽形成的时期，其突出标志在于文学所有种类和体裁的产生。以反封建斗争和酝酿1848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标志的民族复兴时期浪漫主义的高涨，实现了一件主要的大事：把文学坚定地置于民主主义立场之上，并赋予文学以民族基础：历史、民间文学、人民生活。

542·

第十一章　希腊文学

奥斯曼帝国长达三个世纪的统治打断了希腊文化的发展，只是在十八世纪后半叶才为民族复兴创造了前提：反对奴役者的起义浪潮此起彼伏，社会—经济的一定高涨为已经初露端倪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古希腊的几个离乡分散[1]中心——维也纳、威尼斯、巴黎、布加勒斯特——启蒙主义运动广泛开展，其使命是唤醒被压迫希腊人的意识。1814年在敖德萨成立了秘密社团“友谊社”[2]，开始着手为民族解放起义做准备。1821年起义爆发，并随即发展成为民族解放革命，1830年革命结束，希腊被承认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早在十八至十九世纪之交，在业已成熟的革命事件的气氛下，就在进行着热烈的有关希腊文化命运、文学语言问题的争论。革命—启蒙主义者里加斯·维列斯金里萨(1757—1798)的思想广泛流行，他是《火红的国歌》和仿照1793年法国宪法样本拟订的自由希腊宪法的作者。里加斯用民间口语普通话——雅语——面向广大民众写作。

十九世纪初，诗人阿塔纳斯奥斯·赫里斯托布洛斯(1772—1847)和约翰尼斯·维拉拉斯(1771—1823)是信念坚定的雅语拥护者。他们既以其理论著作也以其诗歌创作为新的希腊文学语言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赫里斯托布洛斯在歌颂享乐生活的抒情诗中的诗歌语言的古典主义精致性(《抒情诗》，1811年)，以及维拉拉萨笔下与民间文学传统的接近(《诗与散文》，死后出版，1827年)，开辟了雅语作为新希腊文学语言的可能性。

雅语最活跃的敌人是法纳里奥特，即古希腊官吏阶层代表人物的语言。法纳里奥特是康斯坦丁诺波利的一个富人街区——在奥斯曼统治时

---

① 离乡分散，历史名词，指被侵略者逼迫由故乡分散迁出，例如古代犹太人。——译注

② 友谊社，1814—1821年希腊爱国者的全国秘密组织(按烧炭党和共济会的机构组建)，1821—1829年希腊民族解放革命基本上是由该组织准备的，建立于敖德萨(1818年后总部设在伊斯坦布尔)。1820年起领导人是A.伊普西朗蒂。——译注

期，它是希腊语书面语传统的一个特殊中心。古代语言就是在这里发轫的。法纳里奥特分子（尼·杜加斯、阿·帕里奥斯、普·科德里卡斯）认为，法纳里奥特语的复活是希腊精神复兴的主要前提条件。许多法纳里奥特分子迷恋法国启蒙主义运动，但是在法国革命后，为革命思想日益普及所吓倒的法纳里奥特分子，很快就开始研究起更保守的雅典立场，其中包括语言问题。

希腊启蒙主义思潮最大的活动家阿达曼蒂奥斯·科拉伊斯（1748—1833）选择了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他力求使自己国人接近西方文化成就，其中包括普及古希腊罗马遗产。1805年他在巴黎着手出版《希腊文库》——这是一部古希腊作家作品的注释本，它的出版为他带来了欧洲的认同。科拉伊斯以雅语为宗旨，但坚持有必要从词汇中清除那些累积下来的“野蛮语汇”，把语法体系规范化。

在科拉伊斯主要倾向是民主主义的纲领中，却包含着一些人为的复古措施，将其实现定会导致“纯”语言（卡法列乌萨）即远离民间语言的形成。形成于三十年代新希腊国首都，由各个欧洲城市聚集起来的文学家——法纳里奥特们组成的浪漫主义雅典派，就是沿着这条道路——语言的日益复古——前行的。

然而早在二十年代，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就已富有成效地解决了语言问题，在其创作中成功地把民族传统与世界文学最新经验综合起来。狄·索洛莫斯成为近代希腊文学的奠基人。的确，他的诗歌在长达数十年间只在约尼群岛（约尼群岛派）一个研究者组成的狭小圈子内流传，而真正促使希腊文学进程全民化的因素，则要晚得多，即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当约尼群岛派和雅典派合流以后才开始形成（约尼群岛到1864年才成为希腊国家的一员）。

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1]生于约尼群岛的一个小岛（即扎金弗）上，他诞生的1798年，正是土耳其人处死里加斯·维列斯金里萨那一年。在扎金弗岛上的贵族圈子里，到意大利受教育已经成为惯例，所以年仅十岁的狄奥尼修斯·索洛莫斯被送到意大利上学。他在意大利期间正值意大利文学中浪漫主义倾向的确立期，他那时代的意大利诗坛经验——其爱国主义和热爱自由、忠实于人民语言的精神以及来自民间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无疑对他诗歌秉赋的形成产生了影响。他最初的一批诗作是用意大

① 索洛莫斯（1798—1857），希腊诗人。著有歌颂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颂》（1823）（用希腊民间语言写的第一部巨著，开头的几节从1865年起成为国歌）、长诗《拜伦之死》（1825）和抒情哲理长诗《自由的被围困者》（未写完）。——译注

利语写的，但是，1818 年回故乡后，便开始执著地研究起母语和希腊民间歌谣来，并用雅语创作诗歌。

1823 年 5 月，在革命胜利进军的影响下，他创作了具有抒情—史诗性质的长诗《自由颂》。诗人采用夸张笔法，以充满紧张情绪的浪漫主义热情，描绘了希腊爱国主义者为争取祖国自由而进行战斗的画面，但在处理高尚的革命题材时，他有时采用古典主义诗学手法——演讲体，即常常带有训诫性语调、个人化及严谨的结构。

索洛莫斯对希腊及其文化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启蒙主义思考，在其《对话》(1824)——诗人与其朋友、学者和教育家的对话——中得到了清晰表述。在索洛莫斯心目中，这些概念不可相互分隔：在坚持民间语言权力的同时，诗人理解，只有沿着这条道路，明天的自由希腊才有可能全面而富有成效地发展民族自我意识的所有形式。

1824 年在瑞典，另一位受到民族解放革命鼓舞的希腊诗人出版了《抒情颂诗集》，他就是安德列阿斯・卡尔沃斯(1792—1869)。和索洛莫斯一样，他生于扎金弗，而青少年时代在意大利度过。他属于接近意大利杰出革命诗人乌戈・福斯科洛圈子的诗人，曾与后者同在瑞典，随后又在英国侨居。1820 年回到意大利后，卡尔沃斯参加了烧炭党人的组织工作，一年后被迫再次出国去瑞典。他从瑞典关注着希腊革命事件，并以其《抒情颂歌集》对事件作出反映，两年后，在巴黎出版了第二本《抒情颂歌集》。这同样是一种自由颂，是对革命命运及其道德教训、对自由希腊未来的激动人心的思考，是浪漫主义、情感和意志本质与古典主义严格的思维逻辑，表现话语题辞般的精确性及古旧的、但还未失去其生动性、鲜活性及人的话语的热情洋溢性语言的独特组合。

卡尔沃斯为自己诗歌提出的道德训诫任务，比索洛莫斯表达得更明确。从一首颂诗到另一首颂诗，他彻底地发挥反对暴君的主题，警告本国人民不要接受"狡猾"西方强国的"庇护"，揭露其真正的掠夺目的，同时揭露专制制度的非正义性。在希腊诗歌中，像这样清醒的社会思想在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的科斯季斯・帕拉玛斯成熟的作品出现前，我们还未见过。

索洛莫斯和卡尔沃斯在二十年代的创作，是对 1821 年希腊革命事件的直接和明确的反响，也是新希腊诗歌激动人心而急遽的"开端"。这两个巨大的诗歌现象自然被写进了全欧浪漫主义全景画面之中——抒情和史诗因素、以读者的情感反应为定向的高尚表现性倾向——尤其是卡尔沃斯笔下的反抗暴君倾向。他们笔下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传统浪漫主义的双重世界观：与理想相联的是自由的理念和 1821 年革命的实现，处于对立面的则是与之相反的力量。

希腊诗人的意志动机具有鲜明的启蒙主义倾向性，这一倾向性又与古典主义传统的某些特征相联系——类似现象在整个巴尔干和中欧地区都可以看到，因为以上地区的浪漫主义是在民族解放运动的轨道上形成的，并与未能充分完成的启蒙主义阶段的任务一致。然而，在索洛莫斯和卡尔沃斯笔下，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诗学的融合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浪漫主义。

希腊民族解放革命已接近完成，但人民经过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斗争果实，却从他们手中流失了。主宰人民命运的原来是一些大国强国。按照伦敦国际会议（1830—1831）决议，希腊被承认为独立国家，但却从中割去了伊庇鲁斯、塞萨里亚、克里特及一系列其他希腊领土。约尼群岛被置于英国保护下。希腊被强加上了君主专制政体。巴伐利亚王子奥托成了希腊国王。对革命成果的失望，在革命后新希腊的演变过程中带有全民性质，并在全部希腊文学中有所反映。 ·544

1826 年，卡尔沃斯来到革命的希腊，但很快就离开希腊而到了科孚岛，在那儿从事教学工作。与历史现实的接触并未与期待吻合，创作动机悲剧性地中断了。诗人于 1826 年死于伦敦，从 1826 年起没有发表过一首诗。

索洛莫斯在远离新希腊国文学生活的约尼群岛上写作。他同样对希腊在革命后的发展感到失望，但他的创作危机并未马上发生。扎金弗时期最后数年的生活和诗人 1828 年前往科孚岛的最初生活，对他来说原是极富成效。在新近革命事件的影响下，他写作了长诗《拉姆勃洛斯》（1823—1824）和散文体作品《来自扎金弗的女人》（起笔于 1826 年），以及长诗《自由的囚徒》的第一种稿本。如果说在第一批长诗《自由颂》和颂歌《为拜伦勋爵去世而作》中，自由思想是专门在民族从异族压迫下解放的层面上表述的话，那么在《拉姆勃洛斯》和《来自扎金弗的女人》中，这一主题已具有道德伦理色彩，而在《自由的囚徒》中则更有深刻的哲理内容了。

在《拉姆勃洛斯》中，可以感觉到一种浪漫主义回声，即把人当作一种具有双重性的本质，一种对立原则的代表——低级和崇高。爱国主义感情和责任导致长诗主人公站在希腊革命者的行列，但这个人在对待所爱的玛丽娅、孩子的态度上也能作出一些低级行为，其个人的非道德主义又受到诗人强烈谴责。

希腊诗歌实际上并未形成在欧洲浪漫主义中极为盛行的独特个性主题：个性自由被理解为与民族自由密不可分，主要冲突发生在解放斗争的轨道上，甚至发生在当重心转移到道德领域里的场合下，解决个性问题的方法并非取决于浪漫主义的个人主义，而取决于个性和社会的和谐，以及人的共性追求。

索洛莫斯创作了与《拉姆勃洛斯》平行，但却在浪漫主义怪诞层面上的

《来自扎金弗的女人》,诗中写到一个丑陋而凶狠的女贵族形象,一个“人民最凶恶的敌人”,诗人把她与所有高尚和美好的东西对立起来,这与囚徒与美索龙嘎城敌人所进行的斗争有关。长诗《拉姆勃洛斯》最终并未写完(我们手头只有一些分散的章节和片断,还有一些作者阐述情节的札记),而《来自扎金弗的女人》则是希腊以雅语写成的散文的第一个最辉煌的典范之作,它直到1927年才最终面世。

长诗《自由的囚徒》是为英勇的美索龙嘎城保卫战一周年而作,此役结束于1826年4月10日,以被围者勇敢突围和城市的毁灭作结。长诗的第一稿在抒情层面上展开,写人们如何在为死难的英雄们哭泣。但这样的解决无法使索洛莫斯满意,所以第一稿并没有完成。诗人想通过美索龙嘎城保卫战来表现希腊革命的高潮及其道德高度,对新稿的修改他早在科孚岛期间就开始了。



《迈索隆吉废墟上的希腊》Э.德拉克洛瓦
1830年 波尔多博物馆

在1833—1834年间，他同时写作了两首长诗——《自由的囚徒》第二稿和《克里特女人》。这两首诗按构思都是抒情史诗性长诗，但它们留给我们的都只有一些片断——一些抒情声部。如果说索洛莫斯摒弃《克里特女人》抒情—史诗的构思较快的话，那么想要把《自由的囚徒》最终写完的念头，在嗣后的二十年中始终未曾熄灭，而且激发了诗人不倦地寻找着所希望的解决方法。受具体事件——美索龙嘎城保卫城——的影响，索洛莫斯描绘了民族意识在历史高潮时刻的概括形象。他力求重现历史现实，它似乎体现了美和自由的理想。然而，索洛莫斯所体验到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不协调，妨碍了完整的艺术世界——即以抽象来体现真实——的创造。现实并未加强浪漫主义对绝对的追求，而这又不能不在作者立场的抽象性上有所表现，在史诗体例的软弱性上，以及在不自觉地追求纯抒情诗形式的倾向上有所表现。

索洛莫斯从1844年以来一直在加工的长诗《自由的囚徒》无论是第二还是第三稿，最终都未能完成。他也没写完最后一部长诗《鲨鱼》(1849)。诗人死于1857年，死时实际上已远离希腊文学生活，希腊人只知道他的早期作品。1859年他的朋友、年轻的诗人伊·波里亚斯出版了他的一卷集。

索洛莫斯的诗歌传统——在他生前和死后——都只在约尼群岛上的学生圈子中保存。在写作传统浪漫主义题材(爱国主义斗争、爱情、死亡、民间文学母题)时，约尼群岛诗人(伊·季帕里多斯、伊·波里拉斯、格·马尔科拉斯)仍忠实于民间语言和民间歌谣的诗体。十九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当约尼群岛学派和雅典学派合为一体时，其创作经验对全希腊文学的进程产生了良好影响。约尼群岛派的散文，并没有提供多少重大的成就，而在戏剧中，值得关注的是诗人安托尼奥斯·马特西斯取材于扎金弗生活的戏剧《巴扎里克》(1830)，希腊文学史家卡·基马拉斯将其称为希腊社会戏剧的第一部作品。

约尼派似乎存在于全希腊文学进程的边缘地带，其中的基调由同时随着希腊新国家形成而产生的雅典派所提供。早在二十年代后期，就有一些受过教育的希腊法纳里奥特分子从康斯坦丁诺波尔和西欧涌到这里来，他们认为自己是祖国遗产的保存者，自己的职责就是为新的民族文化奠定基础。1827年在日内瓦，雅科瓦基萨·里左萨·涅鲁洛斯(在语言问题上是科拉伊斯[①]最公开的政敌)用法文出版了《当代希腊文学教程》一书，表彰了

① 科拉伊斯(1748—1833)，希腊启蒙主义者。1805年开始出版《希腊丛书》(希腊古典作家)，支持1821—1829年的希腊民族解放革命。——译注

法纳里奥特派在希腊民族复兴事业上的功勋，歌德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书评。

第一部雅典派作品公认是帕纳约基斯·苏措斯写于二十年代出版于1831年的长诗《旅伴》。该诗中炽热而充满悲剧爱情的浪漫主义主题，幻想中孤独的痛苦，是在法国浪漫主义的明显影响下产生的。帕纳约基斯·苏措斯（1806—1868）及其长兄亚历克山德洛斯·苏措斯（1803—1863）从巴黎回到希腊，二十年代在那里，浪漫主义成为主导文学流派。

由英勇的希腊人民民族解放斗争激发起来的雅典派的浪漫主义火热激情和灵感，在遭遇到革命后最初几年的气氛后，很早就蒙上了阴影，正如历史学家尼·斯沃洛诺斯所指出的那样，希腊人就是这样对待“异族的入侵”的。

早在1831年，在亚历山德洛斯·苏措斯的讽刺诗集《希腊全景》中，作者就指出“自由”的出走及其斗士的失望情绪。四年后，这一自由的“出走之痛”又反映在据他所说“是为了谴责暴力和反民族行动而写的书”——诗集《吉他》（1835）中。

描述民族解放斗争及其英雄的诗与长诗，负有歌颂人民功勋的使命，它们同时是对未来的召唤，对希腊统治者的谴责和挑战，对他们的诅咒；同时是号召人们争取民族尊严、确定民族尊严的一种特殊形式，对异族暴力的病态反应，所以它们要诉诸于古希腊古老的伟大见证者——古代语言。

以古代语言为指向，对于法纳里奥特派来说似乎是一种传统，但在雅典派浪漫主义那里，这一传统却并未立即形成。其中许多早期作品是用雅语或在雅语的强大影响下写成的——刚刚完成的人民革命气氛对于语言的民主化极为有利。然而，很快无论是雅语还是科拉伊斯的“中间道路”，就被雅典派的浪漫主义者们给坚决否定了，其语言的古旧化进行得极为迅疾而急遽。

这一毫无成效的定向，使得雅典浪漫主义者失去了与人民交往的可能，但却得到官方希腊的鼓励。四十年代，当时的首相伊·科列基斯便提出所谓的在从前拜占庭帝国范围内复活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对古代语言的崇拜成为雅典派宣扬的主题，并被客观地纳入官方政治轨道。

在巴伐利亚停滞期和伪古典主义行政干预期的气氛中，雅典派浪漫主义的兴奋点很快就熄灭了。早在帕·苏措斯的《吉他》中就已看出古典主义倾向占了上风。在帕·苏措斯的《吉他》之后，他再没有写出任何比较重要的作品。在亚历山大洛斯·兰加维斯的创作中（1809—1892），新古典主义倾向已经据主导地位。三十年代初，他和雅典派中任何一位浪漫主义者一样，强烈地体验到民间诗歌传统的影响，采用纯民间语言写作，积极采用民间的十五行诗体。亚·兰加维斯在德国学习期间形成浪漫主义，在此期

间成为他自觉的创作纲领，这特别体现在作者为浪漫主义戏剧《弗洛西尼》(1837)而作的前言中。不过，早在长诗《蛊惑家》(1840)中，亚·兰加维斯也已表现出明显的向古旧体的转向。其后，无论语言、题材还是诗格，都不可避免地古旧化。

只有讽刺诗在这一条件下，得以保持富于公民热情的生命力旺盛的浪漫激情。阿·苏措萨的创作就证明了这一点，它与其说是以其艺术成就，倒不如说以其人类文献的鲜明力量和坚持革命成果，反抗暴君的激情吸引了当代人，也吸引了文学史家。

亚历山德洛斯、帕纳约奥基斯·苏措斯和亚历山大洛斯·兰加维斯，是构成雅典浪漫派核心的法纳里奥特派，他们决定着第一代人的创作风貌。第二代雅典浪漫派已不具有其前人当初从国外回到雅典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力。他们可能活动的范围极其狭小，尽管他们依旧诉诸于爱国主义主题，但对个人内在生活的兴趣也明显增长，而且，对个性的再现也没有早期浪漫主义那样的表现力，远非那么圆熟、温和。诗人对最大限度上直观性的追求预先决定了他们对民间语言保持一定程度的忍耐。德·瓦拉瓦尼斯(1829—1854)的部分诗作是用雅语写的。在伊·卡拉苏察斯(1824—1878)的诗中，可以明显感觉到民间诗歌的韵律及其词法和结构。

第二代雅典浪漫派的文学传记十分短暂：1854 年，瓦拉瓦尼斯差不多还是个少年就死于肺病，1860 年卡拉苏察斯也沉默了；1873 年他自己了结了自己的生命。六十年代，第三代雅典浪漫派走上诗坛，它彻底失去了其最初的完整性，失去了与民族生活利益和任务的创作联系；它没有得到彻底实现社会改造的可能性，是整个雅典派的共同悲剧(德·帕帕里戈普洛斯、斯·瓦西里阿迪斯以特殊的力量，通过未能实现个人命运这面镜子表现出这一悲剧。)

尽管诗歌在雅典浪漫派的文学活动中无可争议地占有主导地位，但许多雅典浪漫派往往还以戏剧家和散文家面目出现。例如，帕纳约基斯·苏措萨就写过希腊早期长篇小说之一——《列安德尔》(1834)，它在乌戈·福斯科洛[①]《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的强烈影响下写成。亚历山德洛斯·苏措斯发表了戏剧《迷途的儿子》(1830)、《首相》(1843)和《不驯的诗人》(1843)，此外还有长篇小说《1831 年的流放者》(1835)。然而，当时表现出自己最多方面才华的，是亚历山大洛斯·兰加维斯。他的多卷本文学

---

① 乌戈·福斯科洛(1778—1827)，原名尼可洛。意大利作家，1816 年移居英国。著有长篇小说《雅科波·奥尔蒂斯的最后书简》(1798)、长诗《墓地哀歌》(1806)、带有革命古典主义色彩的悲剧《埃阿斯》(1811)和《理查德》(1813)。还有语文学著作。——译注

遗产包括——除诗集和长诗外——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文学史和考古学论著(从 1844 年起,他是雅典大学考古学教授),还有回忆录。亚·兰加维斯的仕途一帆风顺,他当过外交部部长和大使。

547· 亚·兰加维斯认为他的主要文学事业是诗歌,其实,他对散文的贡献也很重要。其取材于他在克法洛尼亚岛生活的道德训诫小说《公证员》(1850)和明显在瓦·司各特《艾凡赫》影响下写成的长篇小说《莫列伊先生》(1850),为希腊文学开辟了历史小说体裁。长篇小说的情节取自拜占庭时期,而发展中的希腊历史地理学恰在此时开始转向这一时期,认为重现希腊古近历史时代之间不间断的联系,是他们的责任。这一潮流下最重要的作品是康斯坦基诺斯·帕帕里戈普洛斯的《从古代到今天的希腊民族史》(1853 年出版了第一个一卷本;稍后,在 1860—1874 年间,出版了五卷本)。不过,在历史地理学论著和希腊极为流行的历史小说中,在年轻国家的条件下,表现力求思考民族统一性的追求时,其中也能感觉到那些妨碍对当代尖锐社会问题作现实主义观察的民族主义的"伟大思想"。

文学诉诸于生动希腊现实的罕见例子,是季米特里奥斯·维赞基奥斯(笔名季米特里奥斯·哈德济阿斯拉尼斯)的喜剧《巴比伦》(1836),此剧描写距解放运动完成前不久的新希腊国的第一个首都纳夫里昂,并再现了一系列真实而鲜明的民族性格。在一般倾向的散文中,则摒弃了最迫切的社会问题,躲避到安全的历史情节领域里——或是躲到拜占庭时代,或是躲在 1821 年革命时期。构成例外的是帕夫洛斯·卡里加斯(1814—1896)的长篇小说《塔诺斯·弗列卡斯》(1855),它真实地表现了有产者政权的专制和被压迫人民大众备受折磨的生活。

这一时期希腊文学中构成特殊一章的,是民族革命参加者的回忆录。其中埃·克萨托斯的《"秘密组织"回忆录》(1845)是其奠基作之一;格·捷尔茨基斯于 1836 年写作而于 1851 年问世的回忆传说中关于人民革命领袖特·科洛科特洛尼斯的《回忆录》;帕纳吉斯·斯库泽斯的《被奴役的雅典编年纪事》(1841)以及最后有关人民统帅之一亚·马克里扬尼斯(1794—1864)的《回忆录》,成为一种专门教孩子识字的课本,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份充满感情的见证。在这一系列里,最鲜明的人类文献和文学纪念碑无疑是马克里扬尼斯的《回忆录》。它不单是一部革命时期和革命后各种事件的编年纪事,还是民族大震荡关头人民情绪的一面镜子。马克里扬尼斯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都渗透着民间智慧及其形象性、直接性和真诚性。遗憾的是,马克里扬尼斯的《回忆录》直到 1907 年才问世,成为二十世纪希腊文学生活中一件大事。

由此可见，到十九世纪中叶，希腊文学中对革命后现实的失望已在增长，这既反映了雅典派浪漫主义的明显衰退，也反映了历史主题的急遽增长，而后者常常是抗议的手段和逃避不愿接受的现实的避难所，不过与此同时，与培育了官方国家这一客观倾向相应，也滋生了民族主义的“伟大思想”。

约尼群岛[1]和雅典学派得以持续下来，但在六十年代，已经可以看到两者相互接近的最初步骤。约尼群岛派影响雅典派的最早使者，是诗人阿·拉斯卡拉托斯（1811—1901）和瓦拉奥里基斯（1814—1879），他们明显脱离了浪漫主义诗学的框架。在雅典派危机深化的条件下，其创作对正在成熟的激进变革起到了预言者的作用。

第十二章 阿尔巴尼亚文学

· 548

十九世纪上半叶，阿尔巴尼亚仍处在几个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蓬勃发展的被称之为“民族复兴”的文学运动，其许多特征还未得到确立。但这场运动有自己的预言家，以纳姆·维奇尔哈尔吉（纳姆·帕奈奥特·布雷迪）（1797—1866）为代表。他出生在南阿尔巴尼亚，大半生却在多瑙河各公国度过，在那里参加过解放运动。纳姆·维奇尔哈尔吉是阿尔巴尼亚第一部识字课本（1844）的作者，他以自己创造的字母表为基础编写了这部课本。1836年他向“所有的富人和受过教育的东正教阿尔巴尼亚人”发出“教皇通告”，通告中首次形成了民族复兴的文化纲领。“教皇通告”虽然用希腊文写成，但其中却十分明确地提出要求用母语阿尔巴尼亚语发展教育。

对新阿尔巴尼亚文学语言的形成起决定意义的，是1827年出版的（由科孚岛的不列颠圣经协会出版）第一部完整的从希腊语译成阿尔巴尼亚语的叶万格里的作品。B. 梅克西在学问渊博的著名主教格里戈里·格伊罗卡斯特里斯基的领导下完成了这部译著，在这一版本中使用了希腊字母。

阿尔巴尼亚诗歌的东方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比以前更具宗教情调，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了发展顶峰。穆罕默德·屈丘库（1784—1844）（绰号为穆罕默德·恰梅里茨）的作品最著名也最流行。他生于恰梅里茨的科尼斯波村（南阿尔巴尼亚），在开罗接受高等宗教教育，回国后成为一名霍加。[2] 除了翻译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宗教作品外，他还创作了几首新颖独特的长

---

① 约尼群岛，或名伊奥尼亚学派。——译注

② 霍加，伊斯兰教国家里有特权的人们的尊称。——译注

诗,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尔韦赫》(约1820年),它将近东流行的一则古老的童话—冒险故事改编成诗歌。长诗讲述了一位品貌端庄的妇女埃尔韦赫的种种奇遇,她虽历经磨难、身陷囹圄,却始终临危不惧,保持一颗诚实真挚的善良之心。美德获胜了并受到了奖赏。尽管诗中充满了明显的道德说教,但其叙述仍引人入胜。故事情节发展急剧,大量的东方风格也无损语言的生动性和民族性,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当时的读者和听众对此都非常了解。穆罕默德的另一首长诗《尤素福与佐列哈》是将东方文学中一则著名的圣经故事改编成诗歌,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埃及达官贵人的妻子暗恋尤素福仁王。在保留总的道德说教特点的同时,诗人还十分注重表现主人公各种行为的心理动机,以及他们的内心感受。历史体裁在穆罕默德的创作中表现为长诗《攻克迈索隆吉翁》,诗中希腊民族解放斗争的一个情节,是从土耳其的立场上加以阐述的。

一首篇幅不大的长诗《酒徒》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兴趣。诗人站在官方伊斯兰教的立场,愤怒指责和谴责酗酒这一恶习。显然,在这部作品中也能发现虔诚的散那派教徒[①]站出来,义正辞严地反对宗教祭酒仪式,因为它利用托钵僧教派[②](来自伊玛目[③]阿里的崇拜者)的成分,使人处于神魂颠倒的状态。毫不例外,这场辩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在阿尔巴尼亚盛行的贝克塔希主义[④],指向那些混合着伊斯兰教各宗派主义成分的教义。上个世纪初的南阿尔巴尼亚叛乱首领本人——阿里-巴沙·捷佩林斯基也是贝克塔希托钵僧团的信徒。

这一时期在阿尔巴尼亚的东方诗歌中,开始出现的正是贝克塔希主义思想,这说明与社会和政治斗争有着密切关系的伊玛目各派别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在这方面,民族讽刺诗人泽涅里·巴斯塔里的创作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因为他不仅站在自己所属的贝克塔希托钵僧教派的立场上强烈批判官方伊斯兰教僧侣,而且强烈谴责旧阿尔巴尼亚社会的所有残酷压迫农村和城市贫民的封建行政上层分子。在这位一贫如洗、无家可归的地拉那诗人的四行诗(拜特偶句)中,暗含着一股要击败整个社会的教阶制度的愤怒:"这里别伊举着鞭子,那里霍加捧着书(即《古兰经》)。啊,我的心,你最好破碎吧!"关于自己,诗人则这样写道:"我把整个世界当作自己的屋子,黑色的大地是我的母亲,辽阔的天空是我的华盖,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兄

549·

---

① 伊斯兰教派之一,与西阿教派相对。——译注

②③ 由哈哲·贝克塔希于十五世纪在土耳其创建的托钵僧团,1826年被官方查封。在土耳其一直存在到1925年,后来中心设在阿尔巴尼亚。——译注

④ 指伊斯兰教神权国家的最高执政者兼宗教长。——译注

弟姊妹。"泽涅里·巴斯塔里的拜塔偶句充溢着东方情调，并表现在旧地拉那喧闹嘈杂街区的言语环境中。

这样的自发社会抗议表现，除了以尖锐的讽刺诗歌形式表达出来外，还将那些明显打破阿尔巴尼亚伊斯兰教的宗教分歧加以对比，与此同时，在贝克塔希主义的各个教会中心，十九世纪上半叶醒世诗歌也获得发展，它为宗教—历史长诗的创作提供了最初尝试。

在贝克塔希托钵僧团为穆罕默德的孙子——年轻的侯赛因（根据什叶派的传说，他是在卡尔巴拉城下的一次战役中被背信弃义的人杀害的）服丧的日子里，在许多集会上都高声朗读伊朗诗人萨纳依[①]（十二世纪）译自富祖里的作品《真理之园》的一些片段。在这部作品中伊斯兰教的早期历史是从什叶派教义的立场进行讲述的，对伊玛目阿里及其儿子们的悲剧命运予以特别关注，因为对他们的崇拜构成什叶派教徒宗教仪式的基础。

十九世纪上半叶涌现出大量的富祖里作品的译著和改编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塔利普·弗拉舍里于1842年完成的长诗《哈季卡亚》。这部长诗文体晦涩难懂，篇幅巨大无比（六万五千句诗行），东方风格使其语言过于累赘，证明作者具有渊博的知识。长诗作为历史性长篇史诗体裁传统的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十九世纪末新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古典主义作家纳伊姆·弗拉舍里[②]，则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

新阿尔巴尼亚文学运动取名"民族复兴"（"Рилиидье Комбетаре"，通常简称为"Рилиидье"），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居民区迈出了自己最初的步伐。意大利阿尔别列什人（"阿尔别列什人"——古代民族的自称，意大利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人保留这一称呼）的诗歌创作，早在三十至四十年代就繁荣起来，并且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阿尔别列什人开始加入那波利王国的政治和文化生活，那里的斗争思想当时非常强烈，人们纷纷起来要求获得民族和政治解放，摆脱令人憎恨、粗暴无礼的君主制度。阿尔别列什人积极参加意大利民族的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他们也努力思考仍处于奥斯曼帝国压制下的本民族的命运。由于在萨恩·杰梅特里奥·季·科罗纳（卡拉布里亚）和帕列尔莫（西西里亚）宗教学校获得广泛的人文知识，南部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居民的知识分子阶层迅速成长起来，他们满怀热情地开始研究历史文化遗产。

---

① 萨纳依（1070—1141），波斯和塔吉克诗人，宗教醒世诗体裁的创始人，有长诗《真理之园》、《奴隶故地漫游记》。——译注

② 纳伊姆·弗拉舍里（1846—1900），阿尔巴尼亚诗人，民族复兴运动活动家，著有抒情诗及长诗《阿尔巴尼亚人的真正愿望》（1856）、叙事诗《斯坎德培的一生》。——译注

他们收集民间作品，研究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历史往昔，与欧洲浪漫主义具有性质上相似的特点。早先阿尔别列什人对“伟大时代”——十五世纪阿尔巴尼亚人英勇反抗奥斯曼的入侵——的祭祀，现在成为正在诞生的民族浪漫主义的出发点，并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全民思想的热情高涨和文化视野的扩大表现在科学活动方面，创作了许多关于阿尔巴尼亚人民包括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在内的历史、民族传统和语言的作品。十九世纪上半叶发表的历史作品中，最重要的是温岑佐·多尔萨的《关于阿尔巴尼亚人：研究和思想》，于1847年在那波利出版。

诗歌的腾飞是以卡拉布里亚诗人叶罗尼姆·戴·拉达的文学活动为标志的。戴·拉达一直生活并创作到十九世纪末。但只有他的第一部作品——1836年出版的（原文和意大利译文）长诗《米辽萨奥之歌》——成为阿尔巴尼亚语的诗歌杰作，并当之无愧地在欧洲浪漫主义众多作品中占有一席之地。叶罗尼姆·戴·拉达（1814—1903）生于卡拉布里的马季村，在宗教学校里获得广泛的文学知识，毕业后专心在祖国各地收集民间作品。后来在那波利从事司法活动。1837年因参与反君主主义密谋的筹划而被警察局逮捕。四十年代他在那波利一户意大利贵族家里担任家庭教师。1848年革命期间，戴·拉达以中间自由主义的立场，在那波利出版了报纸《意大利的阿尔巴尼亚人》。

《什科德拉执政者之子米辽萨奥之歌》是一首关于爱情和死亡的长诗，诗中刻画的感情与作者年轻时对一位农民姑娘的爱情有关。长诗的故事发生在十五世纪，男主人公为一位中世纪阿尔巴尼亚公爵的儿子，但是在他的思想和感情里却能辨认出十九世纪初年轻人的影子。作者将自己的主人公置于自己所亲近熟悉的阿尔巴尼亚—卡拉布里亚村的日常生活和地理环境中，甚至不打算再造中世纪阿尔巴尼亚的历史环境。长诗由三十首短诗组成，其中每一首都表达了两位主人公抒情故事的一个情节。作者在不断交替的自然和心情背景下对他们进行描述，把离奇的梦境与绚丽的日常生活画面神奇地结合在一起。情节的发展只能根据短暂的抒情语调、单个的细小情景、含义深刻的简短对话，以及男主人公断断续续的回忆加以猜测。

长诗的爱情线索以抒情感情的清新、内心活动的心理刻画细腻而引人入胜。而伴随浪漫爱情的内心焦虑只是复杂艺术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长诗包括年轻诗人对诸多问题的思考：关于爱情和死亡的永恒问题，关于什么对于人最重要——个人的幸福还是对祖国的责任，关于生活的意义，关于美。还可以看到诗人提出两个不依赖于人的命运但却永恒存在并永恒运动的成分——大自然和时间。大自然的美景被诗人一一描绘出来：春天万象更新，绿草茵茵，鲜花烂漫；夏天的清晨空气清新发亮，天空碧蓝如洗，亚麻

花芬芳美丽；秋天细雨蒙蒙，葡萄成熟诱人，山地牧羊人的营地夜晚发出沙沙声和羊儿的咩咩声；冬天寒风凛冽。时间在长诗里是一个主要的、确定不移的因素，是一个轴，所有的爱情故事情节都围绕着它旋转——从第一次胆怯羞涩的约会到满腔热情的尘世幸福，再到幸福的破灭，最后是男主人公违背了严肃的天职（而沉湎于个人生活）——以死抵偿。在时间运动的背景下，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开始发生并命中注定以悲惨结束。由于确信这一切是人类存在的共同规律，所以作者借自己主人公之口提出并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每一代人都应牢记过去的生活足迹。正是时间问题在长诗《米辽萨奥之歌》中成为主要的和特意安排的一个方面。

戴·拉达自身就为阿尔巴尼亚文学的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证明阿尔别列什民间文学对他的诗歌产生了巨大影响。诗人确实在利用阿尔巴尼亚民间文学惯用的八音节和六音节诗格相结合的方法，以意大利的阿尔别列什人中流行的短篇巴拉达诗体裁为范本，进行自由诗体创作，既没有押韵也没有分节。但是诗人并没有刻意把《米辽萨奥之歌》模仿成民歌的体裁。更确切地说，他不需要这样做，因为他本人就生活在阿尔别列什民间诗歌传统的活生生的环境中，所以依靠这些传统对他来说是自然而然、驾轻就熟的。尽管他没有模仿阿尔别列什民间诗歌，但却创造性地发展了它的那些合乎他艺术思想的诗歌成分。

毋庸置疑，戴·拉达的早期创作与曾经鼓舞过意大利浪漫主义作家的思想界有密切关系。欧洲文学尤其是意大利文学是促进诗人创作自我意识形成的环境，因为诗人在卡拉布里亚长大并长久生活在那波利。

《米辽萨奥之歌》有机地融入了十九世纪初的全欧文学运动潮流，并成为一支风格独特的浪漫主义流派。这部作品是阿尔巴尼亚语文学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现象，就是对于戴·拉达本人来说，这些青年时代创作的诗歌也是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四十年代初，戴·拉达创作了长诗《塞拉菲娜·道比之歌》。这是第一部诗体长篇小说，讲述的是一位中世纪阿尔巴尼亚贵族妇女的命运。通过她的生活和爱情波折，戴·拉达希望展现一幅十五世纪即斯坎德培[1]时代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图景。但是纷繁交替的浪漫主义情节既没渲染上时代的历史色彩，也没表达出真挚的抒情感受。长诗《塞拉菲娜·道比之歌》是戴·拉达创作民族—历史长篇史诗的开始，但是这些史诗都没有达到他第一部作品的诗歌高度。《米辽萨奥之歌》出版时附有意大利译文，因此不仅

---

① 斯坎德培（约 1405—1468 年），原名乔治·卡斯特里奥蒂，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译注

在意大利的阿尔别列什人中间享有盛誉，而且在更广泛的文学范围内也声名远扬。许多同时代人都对其大加赞赏，其中包括拉马丁和 Ф. 米斯特拉尔。[1]

戴·拉达的作品在阿尔巴尼亚很晚才开始出名。现在戴·拉达作为一名古典主义者而载入阿尔巴尼亚文学史首先要归功于长诗《米辽萨奥之歌》。

---

① Ф. 米斯特拉尔(1830—1914)，法国普罗旺斯诗人，菲利伯派运动领袖。所著的诗集《黄金岛》(1876)、《橄榄林丛》(1912)均取自民间传说。1904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译注

第六编　美洲大陆文学

第一章　美 国 文 学

1. 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的美国文学

在美国文学史上，十八世纪最后十年到十九世纪最初几年，可以认为是过渡时期。独立战争的炮火已经烟消云散。在国家的政权结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逐步建立起稳固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基于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上的国民经济迅猛腾飞。但是美国文学在世纪过渡时期尚无充分准备用艺术手段研究新的现实。在十八世纪，文学的主要任务在于促进争取国家独立和社会革命的民主改革。当时是公开政论性文学、抨击文章、政治诗歌和社会哲学散文占据文坛，经典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富兰克林、T. 潘恩、杰弗逊和弗瑞诺。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文学的传统体裁仍然是政论和诗歌。“哈特福德贤人”（J. 巴洛、J. 特朗布尔、T. 杜埃特及其他人）还活跃在文坛，他们尚不能摆脱早期英国启蒙主义美学和诗歌流派的束缚。巴洛坚信没有民族史诗就谈不上民族文化，二十年呕心沥血地修改他早期的长诗《哥伦布的梦》（1787），终于把一部离奇的作品《哥伦布颂》展示在读者和批评家面前。美国文学史家至今怀着某种尴尬的感情回忆这部作品。几十位年轻的作者着手创作斯梯尔和艾迪生风格的描述时尚习俗的随笔（其中包括华盛顿·欧文、J. 保尔丁、J. P. 肯尼迪）。他们的意图高尚，充满爱国情操。他们想用批判、讽刺的手法向国民展示现代时尚风情，但没有取得成功。早期启蒙主义风格的随笔已经过时。

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美国出现一批作家（威廉·希尔·布朗、S. 罗森、H. 福斯特、H. 布雷肯里奇、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一般称他们是美国早期长篇小说作家。他们没有创作出杰出的作品，但尝试把早已在欧

洲普及的长篇散文的叙述手法运用于美国现实。

第一批美国浪漫派作家的作品在艺术上存在弱点的根源是显然的：方法不适合描写的对象。这些小说的素材应当是新的美国现实，为表现这个现实早期英国启蒙主义制定的那些旧的美学体系未必适用。希尔·布朗、罗森、福斯特企图以理查逊感伤主义小说的传统描写美国生活；布雷肯里奇的《现代骑士》更是以十八世纪英国"喜剧史诗"为样板。只有查尔斯·布罗克登·布朗(1771—1810)脱离了这批模仿者。他在 1798 和 1801 年写的小说(《威兰》、《奥蒙德》、《埃德加·亨特利》及其他)也依照英国浪漫主义传统：布朗运用了"哥特式小说"和威廉·葛德文的创作经验。但是新的社会问题的提出，迫使他寻找另一种方式和表现手段，而这些问题的意义对美国来说几十年后才显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布朗小说中深入的心理描写，他对人性意识"阴暗面"的特殊兴趣，对人的个性的高度重视。因此爱伦·坡和纳撒尼尔·霍桑把他列为自己的导师之一，并非偶然。

布罗克登·布朗英年早逝，在后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特殊人物。

小说从气质、内容到形式都是民族性的，一般认为它诞生在浪漫主义时代。

552·

2. 浪漫主义时代

浪漫主义时代在美国文学史中占据了近半个世纪：开始于十九世纪第二个十年，终止于六十年代国内战争的炮火中。

浪漫主义是美国文学史中最复杂的时期之一，充满内部矛盾和纷争。同时，无论如何评价它的意义都不会过分。此时逐步奠定了民族文学最完美的传统。但它的形成过程充满了戏剧性冲突，残酷的论战，大大小小的文学纷争。

浪漫主义思想的基础是十九世纪初国家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它把美国提高到欧洲最发达国家的水平，并为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保障。任何一个国家在十九世纪都没有这样高的发展速度，短短的几十年间美国从一个各式各样农业殖民地的混合体变成有着发达的工业、商业、金融业、通讯网络和庞大海运能力的强大国家。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资产阶级实用主义道德标准的丑陋实质也开始逐渐地显现出来。加尔文主义宗教思想的传统说教与启蒙主义者制定的第三阶层道德学说，互相交织一起，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逐渐演变成某种可憎的新体系，既反人道又与美国民主"父辈"们的理想规划背道而驰。

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和社会结构的紧张变革不仅诠释了浪漫主义思想的产生这一事实本身，同时也决定了它的某些特色，其中包括一种特殊的两面性，一方面是为年轻祖国自豪的爱国之情，另一方面又因革命民主理想的破灭而深感苦涩，二者交织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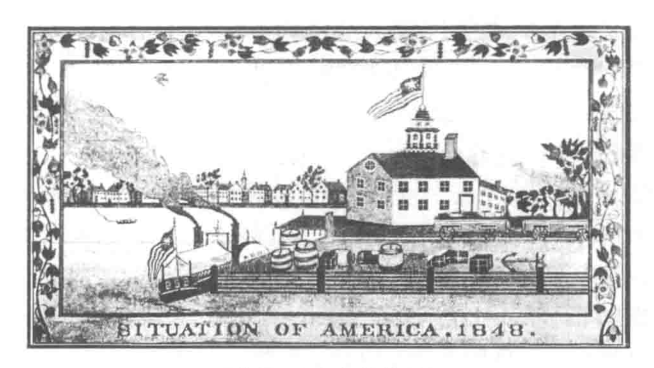
在美国浪漫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这两种成分的平衡被迅速打破。前者彻底消失，后者增长起来。在哲学上表现为从以“自助”一语表示的社会道德体系转向爱默生的“自信”体系，在社会学中则表现为从杰弗逊的民主理想转向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在诗歌领域走过了从布莱恩特的《死亡观》到惠特曼的《草叶集》的道路，在散文领域可以把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和梅尔维尔的《白鲸》视为里程碑。这就是美国浪漫主义思潮演变的一般方向。

浪漫主义时代在美国文学史中比较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早期(二十至三十年代)是浪漫主义“先天”阶段，以浪漫主义精神开发本民族的现实、大自然、历史，尝试用艺术手段探索美国资产阶级文明，探索它的迷惘、错误、异常。但是应当指出，这种探索的出发点是认为美国民主的基础是健康的，能够抵御“外来”的不良影响。

伴随成熟阶段(三十年代末至五十年代中叶)的到来，是三十年代末的经济动荡与激进民主主义运动的空前高涨和沉重的国内外冲突，其显著特点在于浪漫主义者作出一系列悲剧性发现，首先他们发现，社会丑陋现象并非外部因素作用于似乎理想的社会结构，而是植根于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本性之中。与此相关的则是许多美国诗人及散文作家，爱伦·坡、纳撒尼尔·霍桑、梅尔维尔以及其他人作品中的感伤主义的、悲剧性的情调。

结尾阶段(五十年代末到国内战争的爆发)是美国浪漫主义意识及浪漫主义美学的危机年代，其结果是美国作家和思想家逐步认识到，浪漫主义意识已经不再胜任描写社会生活的现实，给不出解释它神秘之处的钥匙，也不能指出解决它矛盾的途径。包括华盛顿·欧文、N. 霍桑、梅尔维尔、朗费罗、肯尼迪等人在内的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经历了一段异常痛苦的精神危机，有时甚至完全停止创作活动。

美国浪漫主义思潮和文学的出现大大晚于欧洲先进国家。当二十年代初期美国浪漫派作家刚刚引起本国公众注意的时候，欧洲思想界和文学界的浪漫主义运动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美国思想家和诗人广泛借鉴了欧洲，特别是英国浪漫主义的成果。这里所指的不仅是大量存在的模仿、借鉴的作品，同时也有对欧洲浪漫主义哲学、美学以及文学经验的创造性运用。



《美国1848年的状况》
石板壁画 纽约 朗·艾连德 布鲁克海文 菲力浦博物馆

美国浪漫主义比欧洲浪漫主义更多地表现出与启蒙主义思想及美学观点的紧密、深刻的联系。这涉及政治理论、社会思想、思想方法论以及艺术风格。换言之，美国浪漫主义不仅仅摧毁了启蒙主义思想，同时也是它的直接继承者。

在美国精神生活和文学中，地区性也在浪漫主义创作中留下印记。这是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最稳固的因素之一。时至今日人们仍然在谈论美国西部文学，谈论波士顿习俗，谈论中西部地区作家等等。每一地区的文学在参与全民族文化运动的同时，又保留着自己的思想艺术特色和不同的发展速度。由此而产生了美国各地文学过程的不均衡性。

3. 早期美国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运动把美国文学引上世界舞台。自从华盛顿·欧文的《见闻札记》(1820)和库珀最初的几部历史小说(《间谍》，1821年；《舵手》，1823年)出现之后，欧洲批评界再也不敢高傲地把美国看成“追随者的天地”，他们被迫承认，在美利坚合众国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民族作家。

华盛顿·欧文和库珀以及一批不甚知名的散文作家和诗人(布莱恩特、J. 保尔丁等人)是文学中“中部”各州：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带头人。此时多条运河及公路的建成把纽约变成全国的商业中心，经济上与所有地区都建立了稳固的联系。与此同时这座迅速膨胀的城市变成大陆的“主要门户”，通过它实现美国与全世界多方面的联系(其中也包括文化联系)。

使“中部”各州成为文学中心的原因还有，这里有相当重要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费城曾经是美国第一个政治和文化的首都。纽约和费城是主要的出版中心。这里出版书籍，发行杂志，富兰克林、T. 潘恩、年轻的华盛顿·

欧文和J. 保尔丁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工作过。一般说来，“中部”各州的精神较少受地区偏见的束缚（虽然不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这种精神被认为是美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在这方面一个意义重大的事件就是维廉·科林·布莱恩特（1794—1878）的创作。美国诗坛第一位浪漫派诗人和“天性论者”布莱恩特向国人展示了祖国大自然的诗情画意，就像“哈得逊学派”画家在绘画领域所作的一样。诗人的特殊功绩还在于他试图确定当代诗歌的某些任务并制定民族浪漫派诗歌的理论基础。爱伦·坡的著名诗歌理论在许多方面都是出自布莱恩特1825年所作关于诗歌的演讲。

在1810—1820年代之交一种强烈奔放的爱国主义成为时代的旗帜，不时地演变成狂妄的民族主义，其起因是经济高涨和美国人在1812—1814年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即将到来的独立战争五十周年大庆。提倡“美国人的美洲”的著名门罗主义理论的产生，并没引起同时代人的惊奇，也没遇到多少认真的抵制。

二十年代初美国人的自我感觉中也还存有一丝苦涩。美国的精神生活仍然受着欧洲大陆的制约，但对此已经厌倦了。美国人必须拥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与“高尚”、“民主”，如果可能，与“英勇”的亲近感。他们需要有自己的历史学方法，这种方法能提供有关过去历史的材料，需要有自己的文学来提供对这些材料的情感感受。

对民族历史及民族文学的共同兴趣为历史体裁的产生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文学介入历史或者历史介入文学从一开始就伴随着美国浪漫主义运动直至接近它的终点，虽然逐渐有所减弱。

在二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艺术表现的主要对象是过去的历史。沿着华盛顿·欧文（在短篇小说方面）和库珀（在长篇小说方面）开辟的方向有他们众多的追随者。詹姆斯·科尔克·保尔丁，这位随笔作家、讽刺家、民主派爱国者，写出了一系列历史题材的小说《考尼格斯马克》（1823）、《一个荷兰人的家》（1831）、《到西部去》（1832）。费城的医生P. M. 巴德所写的历史小说（《鹰谷之鹰》，1835年；《尼克-列索维克》，1837年）当时广泛流行。纽约作家查尔斯·芬诺·霍夫曼在这一体裁方面也作出贡献（《格雷斯赖奈尔》，1840年）。

新英格兰州以及南方各州也追随纽约和费城的榜样。在一定意义上说，美国早期浪漫主义可称作“历史学”，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科学历史学，而是艺术的历史学。

历史题材不仅用来歌颂英雄的过去，同时也用以提出当代的紧迫问题。历史体裁的这一特性也完全是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特色。

美国浪漫主义历史题材的散文是从“司各特”式的长篇（主要出自独立战争时期）和出自过去殖民地时代的短篇开始的。但新形式的散文叙述方

法很快就脱离了这些传统，这种新形式后来在十九世纪前半叶的文学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这里所指的是海上霸权的体裁（海事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和特殊类型的浪漫主义冒险小说。

4. 欧文

华盛顿·欧文（1783—1859）的传记说明，这是一位精明强干、精力旺盛、多才多艺、勤奋的人。他是纽约一个殷实商人家庭十一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既是律师和记者，又是编辑和出版家，当过商业公司驻伦敦的代表，对英作战的年代做过州长副官（领上校衔）和外交家——驻马德里大使。他还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旅行家，走遍美国许多无人居住的地区，在欧洲也作过漫长的旅行。

555· 欧文的创作，像他的整个人生一样，清楚地分为三个时期。分界的年代分别是1818年（欧文决定以文学为职业）和1832年——在多年居留欧洲之后回到美国。

年轻的欧文按政治信念是共和党人，联邦主义派，因此是杰弗逊民主思想的对立派。像许多美国年轻人一样，他崇拜十九世纪的英国，崇拜它的理性说教，幽默的环境和诙谐地描写风土人情。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系列杂文《杂拌》，这是华盛顿·欧文和他哥哥威廉·欧文以及他们共同的朋友J.保尔丁在1807—1808年间共同匿名发表的。此外还有欧文一人于四年前写成的《奥尔德斯泰尔先生的信札》（1803）。这些杂文，综合起来乃是对纽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讽刺性评论，从政治冲突到妇人们的时装。这两部作品不仅是模仿英国描写时尚的杂文、随笔——虽然已经“现代化”了的——同时也是对它们轻松愉快的讥讽。

1809年欧文发表了《纽约外史》，他把该书说成是某位历史学家狄德利希·尼科尔包克尔的作品，此人是位滑稽绅士，身着天鹅绒裤子，头戴拖辫子的假发和三角帽。似乎是他突然失踪，身后只留下一箱手稿。《纽约外史》是诙谐故事，滑稽的模仿和讽刺，内容充满对现实，对国家和城市生活大小事件，对知名人士这样或那样行为的隐喻。书中充满了衬托一个历史学工作的所有点缀。其中大量出现那种在有关“新荷兰”的科学论著中才能遇到的材料，包括州长们的传记。但是在描写粗俗琐碎事件过程中过分的学术性和严肃腔调恰好产生了喜剧效果，而这也正是作者的初衷。

在《纽约外史》中大量的事件、观念、人士遭欧文刻薄的挖苦，诙谐的讥笑，滑稽的模仿或者雅致的讽刺，其范围是无限的：从早期荷兰移民幼稚的生活观念，到托马斯·杰弗逊的国家政策；从冒牌学者的历史学著作到美

国人着迷的瓦特·司各特的长诗。历史时期从形式上看似乎包括自开天辟地以来直到十七世纪末，但实质上《纽约外史》是一本写给现代人有关现代的书。往事在这里只是各种讽刺性诠释或影射的借口，而不是像司各特的长篇那样以艺术眼光加以研究的历史事实。欧文暂时还没有达到以浪漫主义精神理解历史的水平。

之后欧文经受了漫长的思想和创作危机，在此期间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哲学及美学观点发生了质的变化。《奥尔德斯泰尔先生的信札》和《杂拌》以及《纽约外史》的作者的思想，还受着启蒙主义的限制，创作活动还附合启蒙主义美学的标准。而《见闻札记》和《布雷斯布里奇庄园》的作者已经彻底属于浪漫派的一代，这在"历史题材"小说中尤为明显。

成熟的欧文保持着对唯利是图和贪得无厌的反感，对投机坑骗行为以及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许多特点的反感。但在整体上他承认资产阶级文明发展的必要性、合理性，放弃了过去对作为社会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偏见。

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他对待艺术创作原则和任务的态度方面发生根本变化，导致他对待历史和历史在文学中的体现，对待散文体裁艺术性等等方面观点的改变。此外欧文长期居留欧洲期间(1815—1832)有机会深深地沉浸在浪漫主义环境之中，这也是相当重要的事实。

自 1818 年到 1832 年间是欧文创作最富成果的、最成功的年代。在这些年间产生了作家最优秀的作品，四本浪漫主义风格的散文和短篇小说：《见闻札记》(1820)、《布雷斯布里奇庄园》(1822)、《游客谈》(1824)和《阿尔罕伯拉》(1832)。此外西班牙历史札记(《哥伦布传》和《攻克格林纳达》)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在最初的实践中，特别是在收入《见闻札记》的文章中，作家放弃了早期启蒙主义美学所规定的严格体裁划分。在他的《札记》里和随笔中，抽象的沉思与具体的习俗描写结合一起，生动的画面与民间创作和传说的活跃的情节相结合，启蒙主义形象抽象的多面性与浪漫主义的性格个性化相结合。叙述中提高了历史、民间文学、情节、性格逻辑成分的作用，这有助于新体裁的形成。除去在不同程度上脱离传统体裁的随笔、杂文、"写生"之外，在他的书中也能看到一系列可以毫不犹豫称之为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的作品。

· 556

欧文时常对欧洲题材感兴趣。他的许多散文和短篇是写英国的，另一些作品中的情节发生在德国。西班牙为他提供的材料写成了一整本书(《阿尔罕伯拉》)。但他始终是一位美国的民族作家。他以纯粹的美国观点阐述和评价欧洲题材，这种观点常常使欧洲人感到意外，为艺术描述欧

洲现实开辟了新的天地。与此相关的还有欧文独特的幽默，受到欧洲大陆国家众多读者的青睐。

当然，欧文的“美国”短篇小说引起了我们特殊的兴趣，如《瑞普·凡·温克尔》、《睡谷的传说》、《道尔夫·赫里杰》，或者关于寻宝人的系列故事。浪漫主义者欧文的世界观和美学立场在其中表现得最为充分。这些短篇小说是欧文艺术才华的顶峰，从中不难发现他所创立的体裁典型，正是它们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浪漫主义小说进一步发展的道路。

所有“美国”短篇中描写的都是过去的事件，仍然委托那位不思安静的狄德利希·尼科尔博克执笔。按照欧文的意图，新的尼科尔博克是一位“真正的”，也就是浪漫主义的历史学家。他钟爱轶闻传说，从中发现了过去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信仰、偏见、兴趣、爱好、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

从情节的角度看，“尼科尔博克的故事”并不新颖。这是在浪漫主义时代变得粗俗了的非凡惊险故事，寻宝的故事，梦幻情节，神秘巧合，一见钟情的爱情等等。有时欧文直接利用美国、英国和德国民间传说的情节。他这些小说的成就和价值不在于情节，而在于曼哈顿和奥尔巴尼生活和习俗的历史画卷，在于哈得逊河的沿岸风光，在于所描绘时代普通人的“肖像”，最后还在于作者的特殊语调，在这种语调之下他把对荷兰小市民自古以来的自私和个人主义、目光短浅，对他们的思维懒惰及保守主义的讥讽与对过去年代平静如水的时光的怀旧心情结合起来。小说的特色是描写特别生动，线条特别清晰。欧文无疑享有创立文学风景描写美国学派的荣誉。

欧文的“美国”短篇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年轻的民族意识正在寻找对美国民族自己传统的依托，对自己国家的大自然及其独一无二的传说的依托，而欧文正是提供了它所渴望得到的东西。

在“尼科尔博克笔下”描绘的往事中还有一个不十分明显，但却相当重要的含义，欧文对现实的评价是通过与某个假定的理想相对比来实现的，这个理想就是往日的乌托邦，是早期荷兰移民的理想化境界，那里“还没被忙忙碌碌的新英格兰移民发现，也来不及加以占领。那里永远安静平和，一切都有条不紊，无需奔忙，不必急躁，不存在生存竞争”。尼科尔博克的世界是用来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无耻的道德信条相对抗，与资本主义发展的残酷代价相对抗。然而如前所述这个理想是假设的，对此作家本人非常明白。他一面描绘着感人肺腑的“理想”过去的画卷，同时他又在讽刺它也讽刺自己，因为他意识到，现代的罪恶不是今天才产生的，而恰恰是植根于那种理想化的生活，这就是在他描写“理想化”的过去时的半讽刺情调的来源。

欧文历史观的浪漫主义两重性就在于，过去在他的短篇中既是与现代

对立的假想世界，又是与现代紧密相连的现实，是十九世纪资产阶级美国的成就和罪恶的根源之一。

1832年欧文回到美国，这标志着新的漫长的思想和创作危机的开始，直到他的最后时日也没能从这个危机中解脱出来。正当他的同时代人——库珀、爱伦·坡、霍桑、梅尔维尔——越来越深刻、严厉地批判美国资产阶级文明的时候，欧文放弃了他的批判立场，倾向于毫无保留地接受在经济、社会、政治、思想领域所有伴随资本主义进步的一切。他徒劳地试图利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来表现实质上是反浪漫主义的构思。“狄德利希·尼科尔博克尔和瑞普·凡·温克尔的黄金时节已成过去。欧文的笔已经丧失了他神奇的力量……”（帕灵唐）

5. 库珀

詹姆斯·费尼莫·库珀（1789—1851）有充分根据被认为是美国历史小说的创建者，世界文学中“海上小说”的奠基人，此外他发明了一种特殊的浪漫主义笔法，用这种笔法他把民族题材“边疆”、印地安部落的历史命运以及美国的大自然综合起来加以描写，这种笔法至今没有确切的术语。

库珀的创作历史可以大致地分作两个阶段：早期（1820—1832）和晚期（1840—1851）。两者中间有一段持续七年之久的空白，这段空白乃是“杂文间奏”。他在这个“向同胞开战”年代创作的不多几部作品，具有公开的论战特色。

库珀在着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时候，已经是一位成熟的人士，他的信念，包括社会政治信念在内已在很大程度上最终形成。他是百分之百的共和派，杰弗逊民主的拥护者，热衷于法国重农主义思想。他追随杰弗逊主张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业生产是基础，把“寄生阶级”（即工业家、金融家及商人）的作用压缩至最小。由此他对美国十九世纪十至二十年代资本主义腾飞的态度有两面性。一方面作为一个爱国者，“民族主义者”，他为美国经济的强劲高涨感到自豪，同时进步的总方向和代价又引发他伤感的思考。

库珀最早觉察到美国人崛起中的民族意识的需要。他意识到，历史小说乃是能满足读者对美国英雄的过去历史的兴趣，同时也能表现出为年轻的祖国而自豪的爱国情感，在当代人看来，他们的祖国以自己的榜样揭开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这种想法促使他从事文学实验，而这些实验给他带来了世界荣誉。

库珀以《间谍》（1821）一书奠定了美国历史小说的基础。在《间谍》发



558 ·

詹姆斯·费尼莫·库珀
《库珀文集》第一卷卷首画
纽约 国家图书馆

表之后作家即获得"美国司各特"的绰号,这不是偶然的。但是瓦尔特·司各特小说的模式不经改头换面是不能移植到美国土壤的。问题不仅在于两人明显的思想分歧,瓦尔特·司各特是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而库珀是民主派共和党人。他们对待历史进步的性质和含义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不相符。库珀自己也百般强调这些区别,特别是在用欧洲历史材料写成的小说里(《刺客》,1831年;《黑衣教士》,1832年;《刽子手》,1833年)。在库珀之前原则上能否用美国历史材料写成历史小说的可能性尚不明朗。其主要事件在所有人的心目中还记忆犹新。当作家着手描写历史人物和独立战争的进程时,他必须保持绝对的准确性,彻底抑制想象力的冲动。换句话说,他应当成为历史编纂家。

库珀找到一种新的把历史和虚构结合起来的方法,既不牺牲自己的想象,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性。这注定了他的实验将取得成功,于是在《间谍》之后有关美国独立战争的历史长篇和中篇潮水般涌入美国书刊市场。显然,库珀类型的历史小说正好符合美国文学在精神世界所面临的任务:肯定新世界对旧世界的道德优越性,共和制对无政府状态的优越性,国家独立对殖民地制度的优越性。

在作家的创作生涯中,《间谍》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库珀将在多部著作中加以论述的问题,尽管只是萌芽状态。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历史小说,《间谍》就成为库珀一系列体裁实验的基础,这些实验一方面导致他创作五卷《皮袜子故事集》,另一方面则是"海事小说"。

"海事小说"作为一种体裁出现在美国有一定的规律性。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海上强国。它的商业、工业、农业、交通运输都和航海密切相关。进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美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捕鲸船,而商业和军事船队只在数量上(而不是质量上)让位于英国船队。航海成为最普遍的职业,几乎每个家庭的成员中都有海员,"海上生活"迅速变成民族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舵手》(1823)是库珀在文学的海上风景领域的初次尝试。小说在读者群中无可争辩的成功促使他更加全面地完善这一体裁。

库珀海上小说的形式在二十年代即已形成(《红色海盗》,1827年)。作家在叙述过程中大量引用舰船生活的材料,他冲破启蒙主义美学的束缚,确定了在小说中运用"海事语言"的必要性,即使用特殊的术语、职业词汇、海上行话等等。库珀所描写的舰船和海上生活只有用职业海员的手笔才能做到。在他之后就不可能以非职业的手法处理材料了。因此美国海上小说的特殊性质之一就在于作者的内视角,从海员的角度观察并描写现实。

库珀这种体裁的艺术手法当然不仅取决于材料,同时也服从于对材料的理解方法。作家依据在浪漫主义诗歌和散文中广泛运用的区分和概念,其中也依据"陆地"与"海上"生活根本不同的思想。"海上生活"特殊性的观点使作家可以将人置于资产阶级社会关系之外,从而使他能达到道德高尚并提供给他真正自由的天地。

库珀进行的另一方向的实验与他的一种意图有关,即对当代现实某些进程的历史进行研究,这种现实带有纯美国民族特性。这里首先指的是关于领土扩张和伴随而来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传统上称之为"拓荒潮",关于美洲大陆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归根结底,指的是关于美国人民的未来。这些问题正是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里所反映的问题,这部小说是库珀艺术遗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系列小说《皮袜子故事集》中结合着各种体裁的特点:冒险故事、历史小说、道德小说、哲学散文和"教育小说"。但是各种体裁的特点并不融为一体,而是共存。五卷集的哲学特点集中在皮袜子的独白以及他和其他人物的对话之中。历史小说和冒险故事的成分主要与情节相关连,特别是与描写战争的部分相连。库珀开创了一种传统——综合的叙事史诗,这种传统后来得到美国十九至二十世纪散文家的支持和发扬,他们是 H. 梅尔维尔、F. 诺里斯、T. 德莱塞、W. 福克纳,T. 沃尔夫等。

《拓荒者》(1823)按最初的设想是叙述历史上"边疆"地区的习俗。那里逐步形成了社会关系、哲学、经济、法律原则、社会习俗和道德标准——换句话说,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文明,库珀认为,这种文明对美国的未来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边疆"的概念本身不仅仅具有在大规模领土扩张年代的历史含义,因为它反映着在现代民族生活中蓬勃发展着的进程。因此库珀对传统体裁进行了重大改革。小说中描写的事件发生在过去,但不是很久远的过去——不到三十年。小说中没有历史人物或者事件。情节持续的时间只有一年。事件的发展不慌不忙,不时地被插话、细致的描写以及片断杂文所打断。

与此同时,不能把《拓荒者》看作纯粹描述习俗的作品。小说思想内容的核心是一个社会哲学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一个复杂相互作用的

“三角”关系：大自然——人——文明。这个问题在五部作品中都不同程度有所展开，但在《拓荒者》中它占据核心地位。

大自然与文明的冲突在库珀和他的同时代人面前已经是社会历史的一个现实。拓荒者的西进不仅是战胜艰难险阻的勇士们的进军，同时也是强盗的疯狂掠夺。所有这一切都广泛反映到《拓荒者》中。小说的主要冲突以及情节的发展都不同程度地与大自然和文明的这一主要对立相关联。

在库珀眼里，大自然不仅具有物质和美学价值，还有道德价值。不应忘记，美国浪漫主义哲学是法国启蒙主义自然神论观点（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理论（康德）哺育起来的。想象中人类的生存是处在与另外三者的关系之中：上帝、大自然、社会，而大自然时常是以人类英明指引者和天神意图传播者的身份出现。按照库珀的信念，人类如消灭了大自然，那么他失去的不仅是物质生存的依赖，同时也失去智慧的源泉。

在《拓荒者》里，保护大自然不受人类蹂躏的主题和小说的两个核心人物紧密相连——皮袜子和法官坦普尔，这两人在各方面都是对立的。法官代表着文明和法律，皮袜子代表人类和事物的自然体制。两人都反对贪婪地掠夺大自然：坦普尔是大自然的律师；皮袜子是它的圣徒。坦普尔寄期望于法律，而皮袜子依靠说教和道德榜样。两人发现，他们在资产阶级文明的根本恶习——自私自利，不顾代价的贪婪，无所顾忌的利己主义——面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小说的结尾是：坦普尔在被践踏的大自然中继续调整文明的机器，而皮袜子则“作为开辟了穿越大陆的道路的拓荒者中最先进的一员朝着太阳下山的方向走去”。

《最后的莫希干人》（1826）的内容基本契入在《拓荒者》所展开的问题范围之中。但是重点已经转移，另一批问题占据了压倒地位，与此相适应，叙述体裁和整体结构也跟着变化。其中历史和冒险小说的体裁特点突现出来。

与此同时，作者的注意力并非被情节以及英勇的冒险所吞没。他仍然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自古以来的两大问题上：美国大自然问题和美国印第安人问题，二者综合一体。文明与自然的冲突相应地转化为外来人“违背自然”的文明与红皮肤土著人自然的风俗习惯间的冲突，而印第安人的悲惨命运则成为作品的主题之一。

在《最后的莫希干人》里关于大自然的思想与《拓荒者》中是一样的，但表现这种论点的美学原则改变了。部分原因在于《最后的莫希干人》中的情节是发生在“文明大进军”之前，大自然还保持着它富丽堂皇的本色。民族大自然之伟大这一主题在这篇小说中更加响亮。库珀在《最后的莫希干人》里建立了一个包含着美国大自然和美洲本土居民的综合形象，这个形

象体现了浪漫主义者珍藏心底的一个思想：他们面对着一份民族的，独一无二的遗产，美国人在建设新“文明”的过程中要加以继承。库珀获得了美国文学中第一个开发印第安题材的荣誉。这是公正的。在他之前有一些先行者——散文家、回忆录作者、诗人、短篇作家、民俗学家，但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只有库珀给了这一题材以史诗的规模，并把红皮肤人命运的问题提升到伟大悲剧的高度。



苏人侦察兵
A. 米勒水彩画 1838 年 10 月
萨乌斯费尔德（密执安）Y. 列维特收藏

《最后的莫希干人》是美国文学中第一部用艺术手法描写美国印第安人生活的小说，书中描写了他们的风俗、习惯、礼仪、传统，他们的外貌和性格。

但是，库珀为自己提出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用艺术形象和画面向国人展现民族传统中他们尚不十分熟悉的领域。在《最后的莫希干人》中，印第安人世界同时又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依据荷兰“理智学派”哲学理论提出的某些道德—哲学观点的对立物。其中库珀是在抗议对“文明的高尚品质”作无端吹捧，似乎“文明”比“原始”更高尚。

在恩卡斯的形象中道德的概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形象本身具有象征意义。这个印第安年轻人的性格所特有的绝对无私、正直、诚恳、直率、高尚、心灵的敏锐、谦虚、勇敢构成一个理想的价值尺度，库珀把它推荐给读者，让他们以这个尺度来衡量文明进步的精神内涵。

但是恩卡斯形象的含义不仅局限于此。从象征性的角度看，年轻领袖的牺牲预示着美国整个红皮肤居民未来的命运。所有情节线索都归结到恩卡斯之死的场面。库珀经常强调事件的重大意义：不是死去了一个人，而

561· 是整个部族的灭亡。通过一个印第安年轻人的悲剧故事，库珀提出一个令所有当时的进步美国人士不安的问题——美国土著居民的历史命运问题。

《大草原》(1827)继续展开《皮袜子故事集》系列小说前两部中提出的问题，同时也是整个系列的终结。小说的情节发生在1805年，也就是离开读者已有二十年之久，现代美国的主题获得更多的发挥。居首位的问题是占地风潮，库珀对这个问题从社会—历史，从法律，从道德—哲学角度，甚至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全面研究。在所叙述的众多冲突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是两个人物的矛盾——皮袜子和占地者布什。小说中表现出的占地风不仅仅是占有未开垦的土地，也是一种生活立场，道德准则，侵略性心理目标，甚至是社会信念。在布什和他儿子们的形象里不仅仅体现着拓荒者的恶劣品质(与之对立的是体现了拓荒者优秀品质的皮袜子)，同时也体现了库珀不能接受的美国资产阶级文明的总特点。布什是库珀小说中最令人厌恶的恶棍。众所周知，作家在创作《大草原》的时候，他还相信美国有能力回到善良的道德原则，建立真正的民主社会。但是布什的形象却引起读者不安的怀疑：未来是属于占地者们的。这个思想是从整个小说的字里行间产生的，首先是从布什和皮袜子性格的相互关系中体现出来的。似乎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两人都崇尚大自然，两人都勇敢、强悍，两人都奔赴西部，因为都不能忍受社会强加给人的限制。但是共同点只是表面的，因为布什身上体现着皮袜子不能接受的东西。纳蒂·班波不能生活在"文明"和"法制"的条件下，因为这违背大自然的智慧，违背上帝的法规和天然的人道主义；而布什是因为他在现行的社会体制之下感到束缚：他的贪婪、掠夺本性、致富的欲望和道德上的无政府主义把他推向大西洋沿岸，推向大草原，在那里他能施展才能，除了暴力之外无所顾忌。皮袜子是向西部撤退，而布什是进军西部，他获取的不仅是大草原，还有整个美国。

库珀在二十年代写成的三部有关皮袜子的小说组成一套完整的三部曲。四十年代初作家又加进两部小说《探路人》和《杀鹿者》。这两部小说作为被作者在三部曲中"漏掉"的描写主人公生活的新章节有机地结合到作品中。

皮袜子的形象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其中包含着启蒙主义的哲学理想，文学和口头创作传统，个人道德心理范畴所理解的美国民族历史和当代现实的典型特征。

纳蒂·班波形象辩证的复杂性具有悲剧的本色。在着意向同时代人推荐一个道德榜样、新人形象的同时，库珀又立即指出它注定失败的结局。高尔基在提及皮袜子这个库珀人物命运的悲剧性时，非常准确地指出："他作为森林和草原的探索者，'新世界'的探索者，为人们在那里铺设了道路，

而这些人反过来又谴责他，说他是罪人，因为他违背了他们自私的法规，这些法规是他的自由感所不能理解的。”

在欧洲生活七年（1826—1833）之后，库珀对美国现代社会状况以及它发展前景的观点发生重大变化，虽然不是根本变化。这些变化既和作家在欧洲的生活经验有关，也与由于社会道德方面一定的进步引起美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改变有关。

库珀在三十年代的创作中越来越激烈地批判美国的道德基础，但与此同时作家的思想意识中的保守倾向也逐步加强。《归途》和《家乡面貌》两部讽刺小说的主旋律是刻薄的、不妥协的批判。前者是讽刺寓言，完全保持斯威夫特的风格，矛头主要针对资产阶级美国的政治习俗；后者按风格接近于狄更斯和萨克雷的讽刺作品，描写他从欧洲回来之后所见到的美国社会生活图景。

从这些年库珀的杂文作品中也很容易发现他保守倾向的增长——《致同胞的信》，讽刺文章《美国民主派》。他把他的立场概括为一句离奇的话：“真正的民主派是保守的，上帝保佑，有需要他保卫的东西。” ·562

四十年代是库珀创作积极性再次高涨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近二十部小说，其中有《探路人》、《杀鹿者》、《环形山上的殖民地》、《海狮》、《两位海军上将》，关于利特尔奈扎赫的三部曲（《萨坦斯托耶》、《土地丈量员》和《红种人》）。这些作品受到同时代读者的青睐，时至今日仍然在读者中广泛流传。但是库珀早期和晚期的创作之间有着根本区别。二十年代库珀是发现者和实验家：他提出问题，将新的体裁引入文学等等。在他的晚期创作中，这种创新精神已不复存在。甚至库珀四十年代写的最优秀作品也存在重复的缺憾。

6. 成熟期的浪漫主义

美国成熟期浪漫主义的时间界限是模糊的，有条件的，正像所有文学现象的时间界限都是有条件的一样，标志是1837年。正是在这一年美利坚合众国受到新的经济危机的震动，这次危机比1819年那一次严重得多。杰克逊总统把权力交给马丁·范·部伦，这正是杰克逊民主寿终正寝的开始；大致在此期间在波士顿出现了所谓的“超验俱乐部”，在纽约出现了文学—政治小组，自称“青年亚美利加”；W. 莱格特开始出版《光明磊落的人》——最激进的民主派杂志之一；O. 萨利文动手发行《民主评论》，这是一本在整个十五年期间起主导作用的文学批评杂志。1837年前夕爱默生发表了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论自然》，这在美国浪漫主义思潮的演变过程中起

THE PRAIRIE,

A TALE.

BY THE AUTHOR OF
THE PIONEERS,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 etc.

« Mark his condition, and the event; then tell me,
If this might be a brother. »

IN THREE VOLUMES.

VOL. I.

PARIS:
PRINTED FOR HECTOR BOSSANGE,
BOBÉE ET HINGRAY. — BAUDRY. — GALIGNANI.

1827.

J. F. 库珀《大草原》一书的扉页 巴黎 1827 年

了异常重要的作用；霍桑发表了《重讲一遍的故事》；埃德加·爱伦·坡将《怪诞故事集》交给出版商。换句话说，1836—1837 年的众多事件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浪漫主义思潮和艺术手法的发展，决定了成熟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特殊性质。

成熟期的结束更加模糊。浪漫主义思想和美学的危机是逐渐成熟的。一些作家早一些时候意识到这个危机，另一些作家则晚一些。一些地区的浪漫主义思潮长久地不肯放弃自己的立场，而在另一些地区则是瞬间瓦解。浪漫主义的衰落大致发生在五十年代的后半期，在那之后美国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一部重大的浪漫主义作品。

在成熟期时代，美国的文学生活空前地活跃、繁荣而且规模巨大。老一代浪漫派作家还没离开舞台，又出现了一批新的人物：爱默生、梭罗、惠蒂埃、朗费罗、洛厄尔、霍姆斯、霍桑、梅尔维尔、惠特曼、爱伦·坡、比彻·斯托以及其他一些如今已被遗忘的名字。文学杂志的数量大大增长，其中有

563 · 一些出版物对国家文学事业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问题不在于人物及

出版物的数量和名称。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老一代浪漫派作家引入美国日常文学活动的某些体裁最终得以形成并巩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海事小说”、历史小说（美国方式的）都获得稳定的美学标准，并在美国文学中确立了牢固的地位。不仅如此，其中某些部分得到理论的论证，例如爱伦·坡所建立的短篇小说理论，或者霍桑的浪漫主义历史叙述方法的理论。在历史小说中哲学问题大大深入，兴趣转向了生活习俗史。

“新的历史主义”原则迅速扩展到文学的所有形式和体裁，其中也包括诗歌和戏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家喻户晓的诗人亨利·朗费罗。在他的历史长诗《伊凡吉林》（1847）、在《迈尔斯·斯丹狄士的求婚》（1858）和在1856年开始创作的《新英格兰悲剧》（《约翰·恩迪科特》和《贾依尔斯·科里，塞勒姆的农场主》）中，历史事实只占不多的位置；历史主要从习俗和道德方面加以展示，而习俗和道德是以十九世纪的道德概念加以诠释的，有时历史获得传说的色彩。

在“海事散文”领域的变革也相当彻底。拿早期美国“海上小说”的样板和四十年代的海事作品相比较，这一体裁发生迅速的普及化，表现出海上生活的明显社会分化，以全新的态度对待“海上性格”问题。

新体裁或体裁变种的需求开始产生。梅尔维尔的《白鲸》就是明证——这是一部综合性的小说，从体裁的观点来看，世界文学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其叙述方法的多样性可以用“浪漫主义乌托邦”这一术语来概括。

除十八世纪末讽刺杂文的论争之外，美国文学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紧密地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相关联。文学集团一般都具有明显的党派特色，文学斗争本身也被看作是政治斗争的一个侧面。

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在思想、哲学、美学观点和原则方面毫无共同之处的作家，为达到某种社会—政治目的而团结在一面共同的旗帜之下。可以引用美国浪漫主义的废奴潮流作为明显的例证。在愤怒地抗议奴役黑人的诗人中，我们可以看到亨利·朗费罗——一位受人尊敬的哈佛大学教授、欧洲经典作品的专家、翻译家和驰名抒情诗人。和他并肩战斗的有约翰·惠蒂埃——农场主，自学成材的诗人，彭斯的崇拜者，新英格兰农村和农民劳动的歌手。在这一“集团”中能遇到杰姆斯·罗塞尔·洛厄尔——波士顿“波罗门僧侣”，高尚的诗人和尖刻的批评家。在这一星座中的一颗巨星是朴实的、严守教规的家庭主妇，子女和家务缠身的哈里叶特·比彻·斯托。她受到长老会教堂严格传统的教育。她父亲、众多的弟兄、丈夫、儿子都是神甫。从儿童时代就灌输给她的清教徒教规永远是她思想意识中的主导成分。在比彻·斯托早期的文章、特写、文学素描中就表现出两个倾

向，成为她整个创作的特点：喜欢说教，训导和对故乡历史的永恒兴趣，对古老新英格兰地区居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心理的兴趣。她晚期的长篇和中篇——《教长的求爱》(1859)、《奥尔岛上的明珠》(1862)、《古城居民》(1869)、《波格纽克人》(1877)——属于“地方色彩”派，在这个派别形成过程中她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很少有人记得比彻·斯托早期的散文和晚期的小说。在后人的记忆中只留下短短的五年期限(1851—1856)，这五年她从事废奴主义活动。在这些年她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1851—1852)、《关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题解》(1853)和《德雷德，阴暗的大沼地的故事》(1856)。这些作品中只有《汤姆叔叔的小屋》直到今日继续使读者感动不已。

现代文学研究界在这部书中找到许多缺点：多愁善感、宣扬基督徒的逆来顺受、社会和平主义、天真地相信：依靠向奴隶主和奴隶贩子施加道德改造就能解决问题等等。的确如此。但是小说的弱点丝毫不能掩盖它激愤的揭露，不能掩盖小说所描绘出奴隶制度“生动的悲剧性现实”。女作家用充满现实主义力量的具体形象和情节向当代人展现了蓄奴制度的悲惨绝伦和非人性，她超越了个人的宗教观念，歌颂了不愿与之妥协人士的勇敢。在炙热的时代气氛中，小说所起的作用犹如弹药库中的火花。这也正是林肯的想法，他把比彻·斯托称作“引起大规模战争的弱小女人”。

564·

比彻·斯托写了《汤姆叔叔的小屋》，朗费罗写出《奴役篇》，惠蒂埃写了《自由之声》，洛厄尔写了《比格洛乌札记》，希尔德雷斯写了《白奴》。这些作品构成一条统一的、目标明确的思想和道德战线，这条战线对当代人思想意识影响之深怎么估价都不会过分。

促进成熟期浪漫主义美国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是民族的艺术批评的出现，它成为文学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批职业批评家是爱伦·坡、詹姆斯·洛厄尔、埃德温·威佩尔。在文学争论中批评家总是战斗在最前线。引起热烈的杂志笔墨争论的课题众多而杂乱无章，其中占据核心位置的是有关美国的民族文学问题。必须克服长期以来文化上对过去宗主国的依赖，其必要性在世纪之初就已经非常明显。几十年来创建独立的民族文学的号召响彻云霄。但只有在成熟的浪漫主义时代，当事实上已经为独立的美国文学奠定了基础的时候，才更加尖锐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美国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应朝什么方向发展？是什么决定着它的“民族性”？于是掀起了争取文学进一步普及化的伟大战斗，寻找有独到特色的、能成长为“群众的荷马”的民间天才，他们能替人民说话，以人民的名义、为人民的利益说话，至少有一半的文学争论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参加的有批评家、诗人、散文家，从

不甚知名的作家到文学泰斗：爱默生、梅尔维尔、惠特曼、爱伦·波，甚至“老头子”华盛顿·欧文、库珀、布莱恩特也不能无动于衷。

成熟期浪漫主义思潮和艺术蓬勃发展的二十年，也正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及精神生活迅猛前进和变革的时期。

这一时期社会—政治进程的性质产生了两方面的反应。一方面厚颜无耻的实用主义越来越成为社会政治道德观念的精神基础。个人财富变成衡量社会地位的准绳；伟大的民主原则演变为畅销的口号，无所顾忌地被利用来达到与民主毫不相干的目的；毫无原则，蛊惑人心，腐败成为政治生活和党派斗争的本质属性；个人意识被启蒙主义者定位为“争取幸福”，如今已等同于争夺财富，它越来越受到大众传媒的左右：报章、杂志、小册子、传单、针对不同阶层的讲演，从街头集会到国会会议。由此产生使个人意识趋于同化的倾向，“千人一面”，最终导致调和统一。

另一方面，美国生活中同样的这些过程又激起抗议，引发不同出发点的大规模民主风潮，从废奴运动到自由土地党人运动，促进了社会哲学思想的发展，它不懈地寻找途径，以实现那些被资产阶级文明残酷压制的理想。

成熟的美国浪漫主义对当代社会规章和习俗的尖锐批判与争取民族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文化领域民主化的激情结合在一起。当然必须马上说明，浪漫派作家创作活动的批判作用，“建设性”作用，不会超出浪漫主义世界观的限制。

第二代浪漫派作家试图弄清资产阶级民主社会反人道、反民主的本性，同时找到与之对抗的手段，发掘进行根本改革和复活已被丧失了的理想的可能性。因此在用艺术手段表现民族现实过程中的重点有所转移。现在引起诗人、散文家、哲学家、政论家兴趣的不再是大自然的宏伟，也不是国家各地区生活结构的特殊性。被推上首位的是人，美国人，臭名昭著的“新亚当”。在他身上寻找一切根源的根源，其中也包括民主社会悲剧性演变的根源。人们把进行剧烈的变革以唤醒真正的民主精神的希望也与他联系在一起。对人的个性的兴趣，对人的已实现，特别是未实现的潜在能力的兴趣，成为世纪中叶美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按一般传统，成熟期美国文学的重大事件都认为是霍桑、爱伦·坡、梅尔维尔、惠特曼等的创作。人们常常指出，上述作家之间的区别是巨大的。但如果找到正确的观察角度就不难发现，这些作者从事的是共同的事业——研究当代美国意识。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兴趣都有一定的侧重点：霍桑注重道德意识问题，它的本质、历史演变和当今状态；爱伦·坡重点研究人的心理状态；梅尔维尔则研究人的理智，研究它如何适应生存的普遍根本规律，研究它如何确定自己在系统等级中的地位，从个人意识的微观世

界到宇宙的宏观世界；惠特曼努力综合现代人的自我感觉并给以完美的诗歌再现。集中注意个人意识并不意味着丧失对社会生活整体的兴趣，丧失对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的兴趣。人与社会的对立在文学中已经不是新鲜事物，而在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中又获得复杂化的、双重的品格。

人的个人意识被解释为现实破坏性影响的客体和牺牲品。与此同时任何寻找社会恶劣行径的根源和本质的企图又把浪漫主义者引向人，引向人的道德观念，人的心理。于是人就成为恶劣行径的代表和第一根源，不管这种恶劣行径表现在什么领域。当谈到克服恶劣行径的可能性时，谈到进步，谈到社会改革，谈到"革命"时，如果可能，浪漫主义者还是把目光转向人，转向人的潜在能力。任何浪漫主义者都以自己的方式设想改组民族生活的途径，但每个人都同意亨利·梭罗（1817—1862）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和国家的状态完全取决于公民的精神世界，唯一能铲除"恶"并实现真正民主理想的革命乃是个人意识的革命。难怪热衷于个人自我完善思想的列夫·托尔斯泰成为梭罗的狂热拥护者。

梭罗的主要作品《沃尔登或林中生活》，是世界文学中最富诗意的非小说性作品。作品基于作者在离康科德不远的小湖沃尔登度过两月隐居生活期间所写的日记。那是一处"一个人"的乌托邦营地，但目的不是改造社会，更不是给人类提供一个值得模仿的正确生活的榜样。目的在于磨练"理智的"、"有道德的"立场，超越公认的道德和社会心理标准，从虚伪中区分出真正的价值。梭罗写道："在污秽的见解、偏见与传统、迷惘和幻想……的掩埋之下让我们努力触摸到坚实的土壤。"这个"坚实的土壤"就是个人意识革命的基础。

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个情况，它把美国浪漫主义以后命运的许多现象变得更加清晰。无论从哪种观点研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研究过程中积累观察结果和事实，其观察结果和事实与浪漫主义人文主义的根本原则都是不相容的。越往后就越明朗：用个人意识甚至某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的特点，来解释民主理想和资产阶级民主实践之间的尖锐抵触是不可能的。一种不安的思想逐渐模糊地显现出来：社会不幸的根源乃是制度所固有的，植根于它的基本原则之内，恶的第一原因不在于违反法律，而在于法律本身。随着这个思想不断得到确认，浪漫主义的总危机也就临近了。到处不断展现在浪漫主义者敏锐目光前变化多端的恶事，在他们看来开始具有命中注定的、不可抗拒的特色，因此在他们的创作中悲剧成分出现增长。与此同时对于把生存规律性提升到意识规律性的概念是否正确产生怀疑，这就使浪漫主义者完全丧失了通过每一个个人的内部革命来改造社会的希望。不自主地产生了一种思想：个人意识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制约

性是反方向的，即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思想意识。浪漫派作家还没有接受这个思想的准备，因为它要求方法论的彻底转向。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美国的精神生活中心北移，波士顿在美国文化史上开始起到不亚于纽约或费城的作用。新英格兰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清教徒意识仍然控制着马萨诸塞、佛蒙特、新罕布尔各州居民的思想，如今它成为新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的发源地，争取“新民主”的堡垒，人道主义运动的中心。

在三十年代新英格兰变成全国最发达的工业区，民族经济发展的带头羊。与这些变化相关联，号称“美国民主”的社会制度的尖锐矛盾，其不完善性就显得突出了。新英格兰的现实为批判的头脑提供了丰富的食粮，使他可以思考人在新的、“民主”的社会条件下的命运，而且这种思考不是有关一般人或一般人民的抽象的启蒙主义范畴，而是适用于一定时代具体的个人，对他来说，民主政治的资产阶级变种是他不安的社会经验的一部分。

新英格兰精神文明（也包括文学）的繁荣，还因为新英格兰意识对一定类型的各种意识形态体系的产生并接受它们有所准备。这里指的是深深植根于十七世纪的从正统清教徒诠释的加尔文宗教教条，走向十九世纪一位论基督教的传统。这个传统吸收了基督教众多教派甚至邪教的学说，为美国培养了J. 爱德华兹、C. 马瑟、E. 哈奇森、U. 钱宁（老）。这个传统的本质特征之一就是自省，把意识集中于自身，集中于人灵魂中善与恶，上帝与魔鬼，美德与罪恶的斗争。

显然，正是新英格兰提供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历史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等众多领域的改革思想。只要指出几个名字就可以明显看出新英格兰思想战线的沸腾程度。拉尔夫·爱默生——哲学家，诗人，美国超验主义奠基人；亨得·梭罗——作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公民不服从”理论的创始人；马加雷特·富勒——编辑家，记者，文学批评家，美国妇女解放运动奠基人之一；布朗森·奥尔科特——传教士，哲学家，“新教育学”奠基人；威廉·加里森——编辑家，出版家，废奴主义运动首领……也可以把一些文学家霍桑、梅尔维尔、洛厄尔、比彻·斯托、惠蒂埃、希尔德雷斯纳入这个名单，他们的创作在促进新思想的传播方面一点也不亚于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

成熟的浪漫主义时代的美国文化史中最典型的现象，就是超验论者的活动及其创立的思想。这并不是说超验主义系统观点吸引了广大美国民众的思想并得到广泛传播。相反，超验主义信徒的范围不超出新英格兰边界，即使在新英格兰本州他们的拥护者和反对者的人数也一样。但重要的是，超验主义者的思想勾画出激发全国各地的美国作家思考的一系列问

题。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没听过爱默生的演讲，没读过梭罗或奥尔科特的著作，甚至不知道他们所接触的乃是超验主义思想。如常言所说，思想是在大气中传播的。超验主义者没有发明什么新鲜东西，但是他们建立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并非无所不包，许多民族生活的重要问题留在它的界限之外。但一些根本问题，首先是关系到社会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在这里得到反映。超验主义者的功绩在于他把这些问题提得非常明确，绝不模棱两可。

从理论角度来说，美国超验主义乃是浪漫主义人文思想的哲学观点。567·从本质上说爱默生的学说是某种宗教和哲学概念的杂交产物。它的民族根基是一位论教派思想，而世界根基则是新柏拉图主义和主要透过科尔里奇、卡莱尔和库辛的著作所理解的德国古典哲学。超验主义者在认识论方面是直觉主义者，在伦理学方面是利他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无政府主义者，在社会学方面他们热衷于道德范畴的空想社会主义。把系统各部分连接成一个整体的中心环节是无所不包的个人主义，它建立在微观和宏观世界同一的思想基础之上，建立在个人的和世界的灵魂、人类自我意识与宇宙、自然和精神规律同一性思想基础之上。这个思想允许把人看作宇宙的精神中心，把认识与自我意识等同起来。

超验主义尽管异常抽象，尽管它热衷于哲学推论，但也有着实际目的。实质上只有爱默生，在一定程度上还有泽多尔·帕克，可以认为是纯理论家。“先验俱乐部”的其他成员都试图在实践中运用爱默生的思想。他们设想，自己的目的在于建立仁爱的、公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社会民主化，巩固思想意识的民族特色，而达到这些目的可以通过全面的精神改革来实现。从这一观点来看，超验主义的核心就是爱默生的“相信自己”的学说，帕灵唐公正地称之为个人主义壮烈的终曲。

与广泛流传的印象相反，这一学说不否认意识与周围现实的相互作用，不否认人与“自然”在认知和制定道德规范过程中的相互作用。学说的中心环节无疑是人类意识的神圣化思想，或者用爱默生的术语“灵魂”，它是世界意识的一部分，或者“超灵魂”。由此产生一种思想：每个人的行为都服从道德规范不可能是从外部强加的。它是自我意识、神圣的直觉和藏匿于灵魂深处的道德感的产物。

从整体来看，美国的超验主义乃是浪漫主义人文思想的哲学精髓，它为理解成熟的浪漫主义时期美国文学发展的特点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诚然这一时期的四位伟大艺术家——霍桑、梅尔维尔、爱伦·坡、惠特曼——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列入超验主义者行列。不仅如此，他们都以极不信任的态度对待爱默生的理论，有时还讥笑“各种超验主义”（梅尔维尔的说

法)。但他们在自己的艺术实践中解决着的问题,也正是爱默生和他的战友们在理论领域冥思苦想地寻求解决的同样问题。

7. 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的创作遗产不算多而且价值不同。其主要部分是一部短篇小说集(《重讲一遍的故事》,1837 年,1842 年及其他),四部长篇小说(《红字》,1850 年;《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1851 年;《福谷传奇》,1852 年;《玉石雕像》,1860 年),散文随笔集《我们的老家》(1863 年),几本儿童作品。

霍桑的创作始终忠于主题和既定立场,这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这中间体现了作家的力量也孕育了他的悲剧。时代在变化,而他则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历史向美国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有新的思想、观点、艺术原则。而他无力克服惯性,他生活的晚年创作成果稀少,原因是否就在于此?他并不老,无病,但没能把任何一件创意完成到底,他也意识到在时代的要求面前自己艺术上的无能。

霍桑出生在新英格兰,几乎在那里度过了一生。新英格兰也是他艺术作品的世界。霍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创作和故乡精神生活的紧密联系。对他来说新英格兰不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概念,而首先是从理智和道德范畴陈述的历史概念。他感觉自己是几世纪传统的继承人,若干代哈桑姓氏清教徒的后继者,他们中间有航海家、商人、官员和法官。

在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霍桑的文学构思中不难发现早期浪漫主义传统的影响:热衷于美国历史的英雄篇章,先辈的伟大事业;热衷于以爱国热情歌颂民族历史。顺便说说,这一传统在霍桑的创作中表现得有些异乎寻常,似乎预示着历史题材发展中新的转折。政治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中包括美利合众国获得独立以及向共和制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过渡,并不引起他的兴趣。他潜心埋头于十七世纪新英格兰历史,那时清教徒异端思想刚刚出现萌芽,独立和共和制思想在人们看来就像是叛乱,是魔鬼的诱惑,有能力思考这些东西就已经是英雄的伟业,不消说采取哪怕不大的实际行动了。

· 568

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霍桑对社会现状感到强烈不满,意识到民主理想和当今现实之间的矛盾。在寻找社会之恶的根源时,他像大多数新英格兰浪漫主义人文学家一样,把目光转向人的个性,人的灵魂,转向"人类心灵的秘密"。霍桑坚信,"一切恶都源自于人",尽管如此,未必有人敢于称他是厌恶人类者。

霍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把人的思想意识理想化的思想，而超验主义者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相信自己”的理论。在他的想象中人的灵魂就是善与恶辩证实体的容器，两种成分交织在一起甚至相互融合，有时两者难以区分，试图消灭其中之一就会导致消灭生命。由此而产生一种思想：完美是不可能的，这一思想常常作为情节主题出现在作家的许多作品中，在这些作品中争取达到完美的企图必然引向悲剧的结局。

霍桑的基本信念之一就是认为现代的恶植根于过去，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最可怕的是现代为过去所统治。由于霍桑是在道德范畴和个人意识的水平上观察问题，过去这一概念就丧失了具体的历史特色，从而具有传说的轮廓，成为道德—哲学概括的土壤和材料。难怪他坚持认为作家有权追随想象的轨迹，不考虑事实和文献，只保持“一般轮廓的真实性”。

霍桑背离了瓦尔特·司各特和库珀创立的历史叙述方式。他写的不是关于历史，而是关于过去，两者在他看来不能等同。他感兴趣的不是历史真实，而首先是时代精神，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在行动中所遵循的道德原则。在霍桑的作品中一切都服从于他的这个兴趣，包括历史背景下的《荷兰素描》。霍桑写道：“老一代人的事业是种子，这些种子必然会在遥远的未来产生善的和恶的果实。”是谁，什么时间，因为什么播下这些种子？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回答这个问题就意味着找到了理解现代道德的途径。

霍桑的创作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界限就在1850年，构成这条界限的不是方法上的前进，而是对体裁的选择。第一个阶段可以大胆地称为短篇小说时期。作家无条件、无保留地热衷于短篇体裁。第二个阶段的主要兴趣在于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最高艺术成就是《重讲一遍的故事》和《古屋青苔》两部文集；第二阶段的代表作有《红字》和《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

文学史在传统上把霍桑和华盛顿·欧文及爱伦·坡看作是美国短篇小说的三位创始人。在刚刚产生的时期这种体裁尚不具有结构上的原则。短篇小说还保留着传统启蒙主义小品文的气质，情节叙述、思考、训诫和习俗描写松散地结合一起。小品文的影响表现在所有早期美国短篇小说家的创作中。这种影响对霍桑更加明显。在他的短篇小说里观察、描述和思考总是比时常具有假定性质的情节发展更重要。

霍桑往往放弃编纂独特的情节，满足于展现流行的隐喻和比喻。霍桑把隐喻变成情节，以此提供道德论述的话题：牧师用黑纱对别人掩藏自己的面孔(《教长的黑面纱》)；在人的胸膛寄生着一条蛇(《利己主义胸中蛇》)；作者同自己镜中的替身谈话(《镜子先生》)；雪姑娘和孩子们玩耍(《雪姑娘》)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并非表现离奇的事件，也非平淡的寓言。

素来存在的隐喻逐步演变成概括的象征，利用这个象征使离奇的事件（在读者的想象中）转化为现代社会道德生活领域中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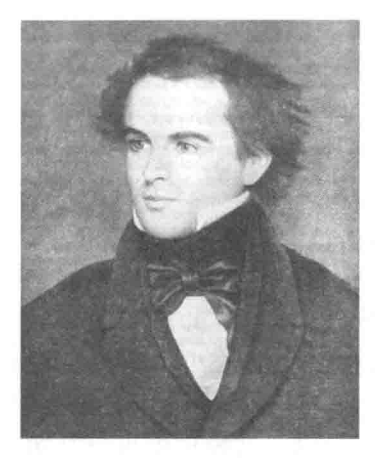
像华盛顿·欧文和爱伦·坡一样，霍桑也很自愿地在短篇散文领域一试手笔。他的一些短篇小说保持着小品文的性质，没有任何引进某种类似情节的意图；另一些则建筑在利用古老传说、神话的基础上；第三种在艺术结构上近似寓言；第四种类似华盛顿·欧文的滑稽喜剧，也就是草稿，素描。尽管形式多样，但不难发现某种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基于涉及问题的共同性，开诚布公的教诲和经常体现出的作家观点。霍桑在短篇小说领域进行实验的成果是不容怀疑的，难怪爱伦·坡在创立短篇小说理论的时候，正是以《重讲一遍的故事》为材料的。

霍桑的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近似于他的短篇小说。这种近似可以从第二阶段任何一部大作品中观察到，但特别清晰的表现则是五十年代初的两部代表作《红字》和《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在这些作品中人物很少，基本上没有情节，决定主人公命运的主要事件被置于叙述之外。情节似乎隐藏在久远的过去，在主人公的记忆之中，有时事件久远到如此程度，以至它们只存在于模棱两可的传说中，可以任意加以阐述。他的长篇小说中的性格基本没有内部的运动。亨利·詹姆斯确切地指出："他们只是人物线条，而不是性格，所有的人物更是肖像，而不是一个个的个人。"与短篇小说的类似情况，在长篇小说的结构中也不难发现。但是要指出的是，情节的"贫乏"，性格的"肖像化"以及结构上的不连贯，都是根据作家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小说总的艺术原则而产生的现象。

如前所述，霍桑经常处理的是灵魂、良心、过失、罪孽等这样一些概念，差不多所有的主人公都是在这些范畴的系统中思考和行动的，甚至作者的议论也很少超出这个范围。对霍桑来说，也正像对所有超验主义者一样，美国的精神存在，它的习俗，它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原则乃是一种内部现实的多重折射，我们把这种内部现实称作个人的道德意识，而霍桑则形象地把它比喻为深邃曲折的洞穴，里面交替着充满善和恶的意念，只有在洞穴的最深处才隐藏着人的真实本性——纯粹的善的萌芽，但人的本性很难显露出来。正是这些纯粹善的萌芽才从原则上向人提供升华到道德顶峰的可能性。按霍桑的观点，改造现实的方案应当从"纯净心灵"开始。这个方案有机地融入美国浪漫主义人文思想的范围，粗浅看来，这和超验主义个人意识革命相似。但这种相似不是绝对的，不仅如此，分歧也是原则性的。

霍桑不仅拒绝接受人类意识神圣化的论点，也反对个性完全自主的思想，而这一思想是爱默生和梭罗异常珍视的。关于自己对这类观点的态度，霍桑在短篇小说《韦克菲尔德》中有非常明确的表述："在我们神秘世界 ·570

表面的纷繁中间，单独的个人与整个社会制度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而各种制度互相之间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也如此紧密地相联系，以至于人只要瞬间脱离这种联系，他也会遇到永远丢失生活中位置的极大风险。"



纳撒尼尔·霍桑肖像
C.奥斯古德画 1840年
萨勒姆(马萨诸塞)爱塞克思学院

霍桑在这里没有表明联系众人关系的性质。根据他的创作可以设想，他认为这种关系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人类活动的许多方面。但占据首要地位的无疑是人的精神存在领域的各种关系，它们产生于将个人道德转化成社会道德意识的过程。

在短篇和长篇小说里，霍桑都没有直接叙述暴行和罪孽的事实，只有这些事实的抽象信息、传说、暗示，霍桑压倒一切的兴趣在于暴行和罪孽行为的道德后果。同样，对他来说，预谋有时是不自觉的意念，有着重大意义。在这方面他与实用主义清教徒有严格区别，对实用主义清教徒来说，重要的是"犯罪"的事实，"惩戒"的事实，没有人去探讨犯罪的动机，动机是清楚的——魔鬼的奸计。惩戒的意义也是清楚的——压制魔鬼，歌颂上帝。至于在这一过程中造成了人的生命的牺牲，他们对此无动于衷。相反，霍桑首先对动机、预谋以及之后的罪恶感感兴趣。在清教徒的实践中有一条简单的道德原则：没违反教规的人就是无罪的人，因此也就脱离了罪恶人群。而霍桑却不能接受这条原则。按照他的观点，没有罪恶念头也没有罪恶行动的人只是极少的例外。其余的整个人类分作三种类型的罪人：被揭露的犯有不道德行为的罪人；犯有这种罪行但未被揭露；有犯罪意图却没有实施的人。让我们回忆起寓意深远的《红字》：海丝特胸前戴着一个绣成的红色标记——她犯有罪行并被揭露；丁梅斯代尔的红色标记在皮肤上燃烧，但别人却看不到——他也犯有罪行，但未被揭露；相信神灵并品德高尚的路人在遇到海丝特时感到胸中刺痛，他们有预谋，但没有行动。

在霍桑看来，人类就是一个罪孽的巨大团体。他不主张把"被玷污的良心"作为团结人群的基础，但他也反对这样的观点：人制造的罪恶——不论是公开的、隐蔽的、根本未实现的——可能成为团结统一的障碍，这样他就冲破了严守教规的清教徒过分严格地把人分作"清白的"和"不清白的"、"被拯救的"和"被谴责的"、"上帝的奴仆"和"魔鬼的奴仆"："人不应该抛弃自己的弟兄们，即使他们犯有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如果人的双手是清白的，

那么罪恶意图的阴影也会掠过他的心头。”

但是确立罪人们之间普遍的平等关系还没解决“纯净心灵”的任务。而这个任务是能够解决的吗？在这一点上霍桑产生严重的怀疑。难怪在他的短篇和长篇小说中出现人类命运注定论的主题，一种难以解释的顽固精神的主题，怀着这种顽固精神，人走在歧途之上，甚至明知等待他的是悲惨的结局。

在作家短篇及长篇小说的潜台词里，时常出现某种超级力量在左右着人的活动的思想，关于无所不包的法规的思想，关于人不能左右的“万能的神灵”的思想。人不能感知“即将发生事件的无声脚步”：每前进一步都受到“不期而至的、不可知的偶然事件”的挑唆，但人类的生存并非一盘散沙，因为凡人的生活“还是要受某种规则的统治”。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规则？谁人确定？有利还是有害？有否可能在这个规则的框架之内实现“纯净心灵”，实现人和社会的完善？霍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也几乎不去寻找答案。对此他缺乏足够的哲学深度和勇气，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成熟时期的赫尔曼·梅尔维尔。

霍桑的思想超越道德思想和概念的范围，而走向纯社会学范围的情况相对较少。如果人类理想（基于社会的理想）对他来说是比较清楚的话，那么达到理想的途径则仍是一件带有很多未知数的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不超出传统的浪漫主义思维的框架。像爱伦·坡一样，霍桑寄希望于美和创作的改造和纯净作用（《创造美的艺术家》、《德劳恩德木雕像》、《雪姑娘》）；像梭罗一样，他提倡简朴和自律与英明的哲理相结合——“纯朴的生活，崇高的思想”；他与库珀和爱默生一起欢迎人接近大自然——智慧与崇高道德的源泉（《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他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人的内部潜在能力——善于能够改造现实的爱的能力，寄托在精神的力量和自由的思想。

像爱伦·坡一样，霍桑非常重视艺术对人的思想情感的感化作用。他认为作家的首要任务是唤醒人们的心，促使读者思考和感知，感受理智和情感的腾飞。不可能“教会”人行善，只能推动他，刺激他的道德发展。当然，在读者领略艺术作品时，他在享有情感—理智自由的同时要有一定限度，而这个限度的根据已包含在作品的文本之中。在用艺术手法解决这一任务的过程中，不确定性原则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原则在成熟期浪漫主义文学中被广泛运用。

在第二代浪漫派作家中，没有人能像霍桑那样广泛而多样地运用不确定性原则，特别是在长篇小说中，也许梅尔维尔可算作例外。在作品结构、情节结构、人物性格，在一系列寓意广泛，确切说是不确定的象征中，以及

在作者的评价和旁白中很容易发现这条原则。它表现在叙述的不确定性上,因为作者的立场是变来变去的:忽而他以所描写事件的同时代人的眼光看世界,于是各种偏见、迷信就具有无可争辩的现实的特色,而传说与现实并列,因而无法区别作品人物的内心独白、半直接引语和作者的叙述;忽而他注视着启蒙主义和纯理性主义十九世纪的过去,于是过去时代的悲剧就获得明晰的、传说性的轮廓;有时他又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上,这可以使他用批判的目光看一眼过去,也看一眼现代。不确定性是霍桑的自由天地。实行这条原则不要求作家花费逻辑方面的努力。引导他的是他所依赖的直觉与想象,虽然有时他觉得自己处于创作危机的边缘。在创作《带有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的时候,他写给自己的一位记者时说:"有时当我疲劳的时刻,我觉得整个作品就是彻头彻尾的奇谈怪论。但问题就在于作家在创作浪漫主义小说的时候,他正驰骋(或者应当驰骋)在深不可测的奇谈怪论的边缘,而他的艺术就在于尽可能地靠近悬崖边缘,但不落入深渊。"

显然,霍桑倾向于用象征手法阐述现实。时常有人认为他是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的创始人。霍桑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充满象征,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有的无所不包,有的受一定局限,但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象征都是不确定的。有一次作家自己承认:"我不能把思想与体现思想的象征分开。"他表达得不十分准确。霍桑的象征乃是思想与形象不可分割的综合体,二者只能存在于融合的统一之中。

8. 埃德加·爱伦·坡

埃德加·爱伦·坡(1809—1849)的一生不长,而且过得不很幸福。他两岁即成孤儿,被里士满的商人J. 爱伦收养,而爱伦并不想正式把他过继给自己。领养人和被领养人之间的关系不恰。1827年爱伦·坡彻底离开了不十分欢迎他的爱伦一家的庇护。因为没有生活来源,他应征入伍,然后又进入军事学院,但到1831年为了从事文学活动而放弃了在军中谋求升迁的意图。他幻想成为一名职业诗人,但发现诗歌给他带来的钱不多,他不得不从事编辑工作。几年期间他编辑过《南方文学使者》和《伯顿绅士》杂志,《格雷厄姆斯》和《百老汇》杂志,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和编辑才能。爱伦·坡大部分创作精力花费在撰写批评文章、特写、评论,直到四十年代美国读者才承认他是一位小说家和诗人,但继续认为他首先是文学评论家。

爱伦·坡的文学批评活动虽然多种多样,但都汇总于创建民族文学运

572·

动的总框架中。像许多文学界的同行一样,他努力争取把美国文学提高到欧洲的水平,与其他人的区别是他把注意力集中在艺术手法的问题上。爱

伦·坡所制定的一整套美学原则的观点贯穿他所有的批评文章，他这套观点的基础就是要对艺术创作的任务，对创作过程的特殊性有明确的概念。爱伦·坡的系列文章《创作的哲学》、《诗歌原理》、《诗论》，对霍桑小说的评论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这套观点，这些文章很久以来即已成为教科书了。

爱伦·坡作为诗人的世界声誉，他对许多民族的诗歌的深刻影响，似乎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实际上他的作品不多。正式确定的诗歌作品总共五百多首，其中只有《帖木儿》和《艾尔·阿拉夫》相对长一些。其余全是较短的不同水平的抒情诗。托马斯·艾略特有一次说，爱伦·坡的诗歌作品中"只有不多的几首是真正成功的作品。但是世界上没有一首短诗或长诗能像爱伦·坡的这不多几首诗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读者，如此牢固地深入人心"。

爱伦·坡的全部诗歌遗产除1845年以后写的几首之外都收集在四本诗集里：《帖木儿及其他》(1827)、《艾尔·阿拉夫，帖木儿及其他》(1829)、《诗集》(1831)《乌鸦及其他》(1845)。

爱伦·坡认为人类认识活动的意义就在于领略"至高无上的真理"，这"至高无上的真理"是传统唯理论认知方法所不能理解的。他受一种浪漫主义思想的左右，该思想认为有可能通过"天堂之美"接近这种真理。"天堂之美"的范畴本身不能用逻辑的方法加以阐述，因为它处于逻辑和理性论述之外。人若想接触这种"天堂之美"只有在一种特殊的，能引起"心灵的高尚冲动"的，近似于神魂颠倒的情感状态下才有可能。任何一位诗人，哪怕是最天才的诗人也不可能创造出，甚至描写一下"天堂"的而非地上的"美"。诗人有另外的目的——唤起读者的情感冲动，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才能"豁然省悟""天堂之美"。

爱伦·坡的诗歌的总原则就是使任何一部作品都着眼于情感—心理激励作用。他把这种作用称为"总体效果"，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统一。诗歌创作的所有领域以及其它局部组织原则都要服从于这"总体效果"。

爱伦·坡的诗歌所描写的对象只有一个——广义理解的美，包括埃德蒙·伯克所说的崇高范畴。在诗人看来美的源泉是存在的三大领域：大自然、艺术和人的关系世界，对后者的理解相对狭窄。诗人只对作为爱情和死亡的情感产物所产生的关系感兴趣。

但是大自然、艺术及人之间的关系还只是诗意想象材料，诗人的想象根据诗的意境中的规律对现实加以改造、再现。在这一意义上说，美乃是诗人想象的产物。爱伦·坡的关于诗意的爱情的观点可以作为典型的例证，按他的观点，与凡人不同，诗人爱的不是女人本身，而是投射到一个活的个

体身上的理想形象。这个理想形象是创作过程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对某具体女人的品质加以升华，加以理想化。诗人花费他自己灵魂的宝藏、他的本能、想象力来创造理想。正如著名美国诗人 R. 威尔伯所指出的那样，爱伦·坡的诗意爱情乃是“单方面的创作行动”。

爱伦·坡的诗歌客体的局限性是他着眼于情感—心理效果的直接结果。与此相关联的还有他诗歌中的不确定性。在诗人的作品中一般没有空间、时间以及其他界限，这些因素赋予内容以确定性、具体性从而具有单一性。诗人的任务在于启发读者的想象并排除一切可能对他构成限制的东西。但读者的意识不能沉浸在无节制的自由之中。它必须沿着一定的方向进行“思考”。与此相关的是爱伦·坡的诗歌的另一特质——暗示性，这种暗示性有时是用推理的潜台词，但主要通过情感潜台词达到的。诗人自己把这称为“神秘含义”，虽然他和传统的神秘主义毫无关系。他不只一次地声明过，这个术语他是“用在那一类在表面明确的含义下面藏有隐蔽的、暗示性含义的作品”。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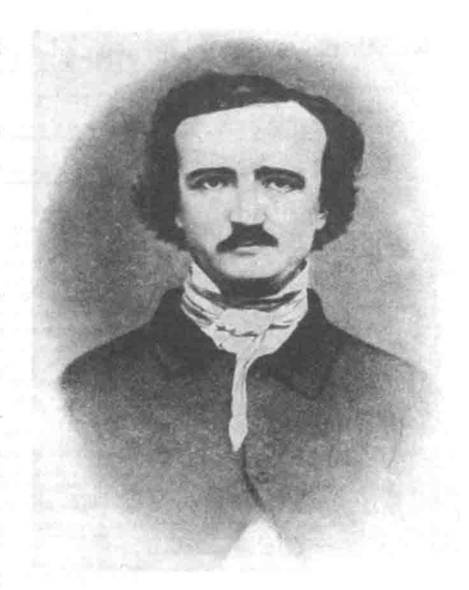
诗歌的不确定性和暗示性的意图就要求它具有隐喻性。但爱伦·坡的隐喻有两大特点不容忽视：第一，他的隐喻都围绕在象征物周围，这些象征物就像是灯塔，指引读者在“隐喻的海洋”中漂流；第二，隐喻本身具有成为象征的内部倾向，在许多情况下就是象征。二者有时难以区分。

象征的内容起源于三个领域：大自然、文化和艺术家本人的意识。与爱默生一样，虽然这和爱默生没有关系，诗人确信，“象征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大自然本身无论整体还是局部都是象征”（爱默生）。从这个源泉中他广泛引用。他的诗中充满各种色彩、声音、气味的象征。在诗人笔下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太阳、月亮、星辰、海洋、湖泊、森林、白天、黑夜、一年四季等等。人类文明产物也是象征的源泉：古希腊神话、民间迷信、建筑物、雕塑、《圣经》、《古兰经》、民间传说、享誉世界的诗歌、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以及历史英雄。最后一类象征没有别的来源，就是诗人的想象。一般称之为“人造象征”，因为它们在人类意识中没有任何固定含义。显然破解这类象征是最困难的。

爱伦·坡的诗歌另一个典型特征是音乐性。钟情于音乐是浪漫主义诗歌意识中的一个特性。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爱伦·坡从音乐中引出诗歌，但他不仅从根源上，也从功能上将二者连接起来。在诗句的音律中他看到通向统一的途径，看到实施激情感化、安排潜台词（或称“神秘含义”）、达到暗示性的途径。

爱伦·坡的诗就像是乐曲。他所理解的音乐性包括了诗歌的声音结构与形象—思想内容的有机统一。许多人在发掘爱伦·坡的诗歌的音乐性时

时常失败，因为批评家们脱离艺术系统的其他因素来观察“纯音响”，没注意到孤立的声音会变得空洞，失去感情色彩和作用。爱伦·坡从来没把诗歌和音乐等同起来。他坚持主张，诗歌是音乐和思想的结合。



爱伦·坡　银版照片 1848 年

在试图为诗歌天才的活动划定界限时，爱伦·坡写道：“如果存在一系列思想，这系列思想能明晰清楚地从沸腾纷乱的人类脑力活动中区分出来——这就是常青的、闪光的天堂，它只能被真正的诗人一个人所领悟，成为他权力的有限范围，他的理想和梦幻紧密封闭的伊甸园。”换句话说，爱伦·坡不允许诗歌创作超越严格限定的情感—美学任务，于是也就赋予诗歌静止性，剥夺它表现复杂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能力。诗歌的命运就是表现“梦幻世界”。而表现“存在的真理”则是散文的财富。

从 1831 年起爱伦·坡开始写散文。十八年期间他写出两部中篇（《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1838 年；《罗德曼日记》，1840 年）、哲学论文《我发现了》（1848）和近七十部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各种杂志和不定期刊物上，后来收集到五部集子里：《怪诞故事集》（1840）、《埃德加·A·坡传奇故事集》（1843），两部《故事集》（1845 年和 1849 年）以及在伦敦发表的不署作者姓名的盗版书，书名为《催眠术》。　·574

爱伦·坡的散文遗产的基本核心是他的短篇小说。正是在“小篇幅”的散文中他表现出辉煌的技巧并达到艺术手法完善的顶峰。

爱伦·坡继续由华盛顿·欧文和霍桑所开始的试验，他使新体裁的形成得以进行到底，赋予它一些重要特色，我们正是根据这些本质特色来划分美国浪漫主义短篇小说的。爱伦·坡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实际成果，意识到把他的（和别人的）经验加以理论阐述的必要性，他制定了体裁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发表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有关霍桑的文章里概括地作了论述。

爱伦·坡在发展美国以及世界短篇小说形式方面的重要贡献，是他实际钻研了该体裁的一些亚种——冒险小说、科学幻想小说、心理小说。

在爱伦·坡的短篇小说中占核心地位的是心理小说，时常被称作“可怕的”，或者“恐怖的”。其主题是，在人道主义理想熏陶下的人类意识与新的产生于美国资产阶级文明前进过程中的非人道倾向相冲突的悲剧性后果。

New-York Mirror:

A JOURNAL OF LITERATURE, NEWS AND THE FINE ARTS.

PUBLISHED EVERY SATURDAY MORNING.

VOLUME I. NEW-YORK, SATURDAY, FEBRUARY 8, 1845. NUMBER XVIII

We are permitted to copy (in advance of publication) from the 2d No. of the American Review, the following remarkable poem by EDGAR POE. In our opinion, it is the most effective single example of "fugitive poetry" ever published in this country; and unsurpassed in English poetry for subtle conception, masterly ingenuity of versification, and consistent, sustaining of imaginative lift and "pokerishness." It is one of these "dainties bred in a book" which we *feed* on. It will stick to the memory of everybody who reads it.

The Raven.

Once upon a midnight dreary, while I pondered, weak and weary,
Over many a quaint and curious volume of forgotten lore,
While I nodded, nearly napping, suddenly there came a tapping,
As of some one gently rapping, r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Tis some visiter," I muttered,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Only this, and nothing more."

Ah, distinctly I remember it was in the bleak December,
And each separate dying ember wrought its ghost upon the floor.
Eagerly I wished the morrow;—vainly I had tried to borrow
From my books surcease of sorrow—sorrow for the lost Lenore—
For the rare and radiant maiden whom the angels name Lenore—
Nameless here for evermore.

And the silken sad uncertain rustling of each purple curtain
Thrilled me—filled me with fantastic terrors never felt before;
So that now, to still the beating of my heart, I stood repeating
"'Tis some visiter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
Some late visiter entreating entrance at my chamber door;—
This it is, and nothing more."

Presently my soul grew stronger; hesitating then no longer,
"Sir," said I, "or Madam, truly your forgiveness I implore;
But the fact is I was napping, and so gently you came rapping,
And so faintly you came tapping, tapping at my chamber door,
That I scarce was sure I heard you"—here I opened wide the door;—
Darkness there, and nothing more.

《纽约明镜》的一页

载有爱伦·坡的《乌鸦》1845年

爱伦·坡可能是在这些倾向中注意到精神空虚威胁的第一位美国作家。在与没有人立足之地的世界发生冲突时胆战心惊的人类心灵，痛苦和精神创伤，人的恐怖心情成为艺术—心理考察的对象。而这种考察的结果取决于作家总的哲学—美学立场。

爱伦·坡的世界观及思想方式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内部矛盾。他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成长在弗吉尼亚州，该州的历史发展此时已经度过了辉煌的“弗吉尼亚复兴”时期，进入经济、政治、精神生活深刻的没落期。他一生的最后十二年——最富成果的时间——是在费城、纽约、波士顿，也就是在美国资产阶级实业及商务的心脏度过的，对其政治理想、生活方式和道德原则他深深地厌恶和鄙视。他本人也是实业家，但心灵深处永远是“弗吉尼

亚绅士”，一个精神贵族。爱伦·坡短篇小说中死亡、没落、毁坏的主题，个性衰败及对生活的恐惧的主题与当时美国民族生活的总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但却完全符合弗吉尼亚的“没落”气氛。爱伦·坡时代弗吉尼亚的没落感，没有希望、没有目的的感觉感染了作家的整个世界观，成为他的想象所创造的超越时间、空间的世界的基础，在那个世界上一个人充满恐惧的心灵在悲惨的痛苦中挣扎。

在吸引艺术家爱伦·坡注意的各种心理状态之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惧怕感：惧怕死亡，惧怕生活，惧怕孤独，惧怕人群，惧怕疯狂，惧怕知识。爱伦·坡心理小说公认的顶峰是《厄舍古厦的倒塌》，这部小说描绘的已经不是对死或对生的恐惧，而是对生死恐惧的恐惧，也就是导致个性崩溃的心灵恐惧的极端形式。

有一组特殊的小说，其情节主线是“禁果”原理。这些小说是艺术地再现浪漫主义者在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提供的新条件下，在人的社会行为领域所作的“发现”，在这种条件下表面的个性自由与每日每时的制约性相矛盾，与不可能自由地表达意志相矛盾。人的意志受到束缚和各方面的制约，这已是无可争辩的明显事实，而这种不自由的本质却没被理解，表面上似乎是神秘的，注定的。人就像是环境的牺牲品，他的行为被想象成被迫的。在个性的道德意识和他的实际行动之间，在理想的意愿和具体行为之间出现巨大差异。像其他浪漫派作家一样，爱伦·坡曾经在个性意识的范畴内诠释社会心理现象，此时他分析了“心灵的疾患”，这种疾患类似早已发现的推动人去违反禁令的心灵异常。他用一个术语——“变态心理”来称呼这种疾患。在作家看来，“变态心理”是当前社会状态的普遍、典型现象。他一直坚持认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疾病，是越轨。

爱伦·坡作品的研究家还注意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常有另一类心理变态——意识分裂，与“变态心理”并列。作家对这种变态的兴趣有另一种本质，它是从方法问题和叙述结构出发的。众所周知，他的叙述经常使用在浪漫派散文中传统的成对的方法：小说的叙述者和小说的主人公。叙述者代表道德—心理标准，而主人公代表背离标准。但在爱伦·坡的小说里叙述者和主人公时常是一个人。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标准，也体现了背离标准的现象，于是叙述就具有自我剖析的性质。因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意识的两重性，它似乎是表现在两个层面上。一个属于作出行为的人；另一个人则是在描述、解释这些行为。这种两重性乃是作家自觉运用的一种手段。

在不同的小说中这种两重性的表现程度不同。在一些小说中隐隐约约，在另一些小说中则表现比较明显。只有在小说《威廉·威尔逊》中两重性的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两”个意识已经不能“共存”在一个性格里，每

一个意识都“要求”有独立的活人的体现。把有道德的和进行评价的意识与不道德的和正在行动的意识分开之后，爱伦·坡给“两”个主人公同样的名字。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外表，但分头生存。只有在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威廉·威尔逊被威廉·威尔逊杀死之前的一句话里，作家才揭示两者双重存在的统一性。

艺术家爱伦·坡热衷于各种精神变异是众所周知的。但很少有人注意，他只注意那些导致违反社会道德法规的变异，疯狂的象征性含义在他的小说中有着深刻的社会意义，建筑在仔细观察和分析人类心理基础上的主人公们的“疯狂世界”，乃是反映现实的一种形式。

爱伦·坡之所以特别注意人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弄清楚妨碍意识进行正常的、货真价实的工作的力量的本质何在。爱伦·坡一生相信“理智”，在他看来，只有理智才能引导人和全人类从存在的悲剧性矛盾中解脱出来。批评家认为他是浪漫主义的唯理论者，并非偶然。显然，作家对人的智力活动有巨大的兴趣。这个兴趣贯穿了爱伦·坡的整个短篇小说遗产。这最集中地体现在所谓“推理”小说里。总共有四篇：《莫格街谋杀案》、《失窃的信》、《神秘的玛丽·罗瑞》和《金甲虫》。正是这四部作品奠定了爱伦·坡作为冒险小说创始人荣誉的基础。

576·

推理小说的概念要比冒险小说的概念宽广。冒险小说吸取了推理小说的情节主线：揭露秘密或罪行，保留了叙述类型：小说提出一个需通过推理方法加以解决的任务。冒险小说还保留了经常出现的一对人物：主人公——讲故事的人。主人公是个有高深学问的人，善于思考，古怪，拥有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讲故事的是个讨人喜欢的人物，精力旺盛，不甚聪明，虽然人品高尚。主人公的功能是揭露秘密，找到罪犯，而讲故事的人的功能是提出不正确的设想，以便在此背景下突出主人公的洞察力。爱伦·坡的推理小说的关键特点在于，集中了作者注意的主要课题不是罪行或者侦破罪行，而是引导着他的人。这就是《金甲虫》中的列格兰和其余三部“推理小说”中的杜品。

这些小说的情节结构是刻板的。有两个层次，表面层次和深层次。在表面层次是主人公的行为，而在深层次是他的思维活动。表面层次内容贫乏，但这种有形动感的贫乏从紧张的内部智力活动那里得到补偿。主人公分析对比各种事实，对每一个细节，对每一种假设都加以斟酌。运用他浩瀚的学识和强大的逻辑推理能力。他的智慧粉碎错误的理论并就地树立起不容置疑的，包含问题答案的观点。在这一过程中爱伦·坡展现了思维过程本身以及它的原则、逻辑。冒险小说的激情不仅表现在揭露秘密上，而首先是在展示美，展示战胜混乱的“不可知”世界的理智的巨大潜能。推理

小说是探索智慧的活动，同时也是智慧的颂歌。

在推理小说里，作家分析研究了两种意识，姑且称之为粗俗的和不粗俗的。粗俗意识赋予了除列格兰和杜品之外的所有人物。这种意识在不同程度上类似世俗观念，一般不承认任何异端思想。其主要特征是钟情于实用逻辑，力图扫除一切粗俗唯理论所容纳不下的东西，把它们归纳为"奇怪的"，"不可理解的"，"神秘的"。

列格兰和杜品的"分析能力"是不粗俗意识的产物，他们可以有本能的洞察力并能将这种洞察力置于逻辑分析的严格控制之下。爱伦・坡给这种意识以很高的评价，认为它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完成任何任务，不仅是揭露犯罪方面的，还有科学的、社会的和哲学的。在智慧的阶梯上它只让位于创造意识。

爱伦・坡的推理小说的叙述特点，还在于本能洞察力因素只是主人公分析性判断的起点。它埋没在大量事实、报纸信息、警察的报告、讲故事人的议论之中，夹杂在对杜品"奇特"的习惯和他的生活方式的详细描述之中，夹杂在杜品本人充满归纳和演绎结构的解释中间。这个起点很容易被忽略。这也正是许多爱伦・坡的模仿者和追随者那里发生的情况，他们没能看到，"杜品方法"之中除演绎法之外没有别的。

美国浪漫派作家非常喜欢赋予最富幻想的臆测以生活真实性。他们使用的最简单、最传统的方法就是在叙述中加入许多生活详情、细节。爱伦・坡第一个想到"利用科学原理来达到生活真实的目的"，他的这些话正是给科学幻想文学制定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作家本人在这一领域的实验可以分成几类，我们有条件地称为科学普及类(《斯芬克斯》、《一星期中的三个星期天》)，"工艺"类(《汉斯・普法尔》、《气球骗局》、《梅隆塔・托塔》)，讽刺类(《与一具木乃伊的谈话》、《山鲁佐德的第一千零二个故事》)和辩证法类(《凹凸山的故事》、《催眠启示录》、《瓦尔德马先生病历之真相》)。有条件是因为没有任何一篇是单纯性质的，而是与其他类型综合一起，只能说某种倾向占主导地位。把它们归纳在一起的只有一点：所有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与某种科学发现、发明、观察相联系，与某种奇特事实相联系。在这中间发明和发现只在很少情况下成为主要描写对象；更多情况下只是话题、借口，以引发对存在于人类经验异常领域的事物的思考，是一种把不可思议的事物变成真实的手段。

・577

J. 凡尔纳和 H. 威尔斯是两位科学幻想文学的泰斗，在他们的创作中最终形成了两个方向(技术工艺的和社会学的)，两人同声承认爱伦・坡是他们的先驱和导师。凡尔纳甚至把自己的长篇小说之一献给他作为纪念。但是不能根据这一点就把这位美国作家看成"体裁的创造者"。爱伦・坡的

经验只是一种实验，它只表明科学幻想作品有可能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独立存在，实现这一可能性则是晚些时候的事。作家的功绩在于他创建了一系列手法，这些手法已经牢固地进入科学幻想文学的美学原则，时至今日仍然保持者“生命力”。这些手法的大部分涉及虚构与事实的相互作用领域，是把不可思议的东西“转化”为逼真的东西的方法，主要运用在技术工艺性科幻文学中。

在谈到爱伦·坡的散文遗产时，不能不提及，他试图把短篇小说作为美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主要形式从理论上加以阐述。作家的出发点是，短篇小说乃是一种针对广大读者的杂志体裁。因此而决定了对“简短散文”提出的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要求。

爱伦·坡认为，在构思方面最重要的是独创性和新颖（新颖是独创性的必要条件），而新颖不应是绝对的，只要求表面的新颖。绝对新颖只能提供理性的满足，而表面新颖则能提供美学的满足。与诗歌一样，最重要的环节是对读者的意识施加影响。因此短篇小说理论中的核心范畴就是“整体效果”，作品的所有方面都应服务于取得这个“整体效果”。但是如果在诗歌里这种效果是建立在不确定性基础之上的话，那么在散文里效果则应是确定的，不容曲解的。按照坡的想法，效果是众多因素的总和，其中包括情节的各个环节必须服从于总的目的，包括描写对象的整体性，包括风格的和谐统一。

最后还需指出作家赋予巨大意义的真实可靠性原则。对他来说，关于读者对作家的信任问题，关于他们之间的联系的问题是立即提出的，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达到“整体效果”。

“强大无比的真实可靠性魔法”，是爱伦·坡的短篇小说理论中的关键论点。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制定了整个系列的手段和方法，用来促进达到真实可靠的效果。这一系列手段和方法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注意。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曾经在一篇著名的论述美国作家的文章中给予很高评价。

埃德加·爱伦·坡关于把短篇小说作为一种体裁的理论概念，主要依据的是美国浪漫主义散文的经验。但是他所提出的某些论点也可能扩展到浪漫主义美学范围之外。这些论点到今天仍然保持着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义。

9. 梅尔维尔

赫尔曼·梅尔维尔（1819—1891）的命运奇特而悲惨。他是一个破产了的纽约商人之子，从童年时代起就独立谋生，实际上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他的中学就是银行和法律事务所，在那里他充当一名仆役或文件抄写员，而他的大学就是水手的船舱和轮船甲板。但是梅尔维尔的确是学识渊博的人。在对生活哲学理解的深度方面，在思想的大胆无畏方面，任何一位浪漫派作家也不能与他相比。

1846 年梅尔维尔出版了第一本书《泰比》。从这部书开始了他一生中的写作生涯，但总共持续了十年。如果不算他死前不久写的篇幅不大的中篇《比利·巴德》，1857 年以后他就没写过散文。

在国内战争年代，梅尔维尔迁到纽约，在那里得到海关货物稽查员的职务。在这里他发表了四本篇幅不大的诗集：《战争的整体和局部》(1866)、《克莱尔》(1876)、《约翰·玛里及其他水手》(1888)和《蒂莫莱昂》(1891)。

《泰比》使梅尔维尔名噪一时。书的材料、提出的问题以及思想—哲学方向出乎意料地应时。书赢得了同情者和反对者，也给梅尔维尔带来朋友和敌人。在朋友中间应当指出文学—政治小组"年轻的亚美利加"的成员，这个小组也把梅尔维尔吸收进来并帮助他在当代复杂的文学生活中找到方向，激发他为新的、民主的民族文学进行斗争的热情。 ·578

《泰比》的成功，鼓舞梅尔维尔立即着手写"续集"(《奥穆》，1847 年)。这两本书给梅尔维尔带来一种声誉：他经受过无数命运的折磨，周游过世界，曾经被吃人的野人俘虏并善于把这一切引人入胜地讲述出来。而他最初的两本书的严肃方面却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使作品具有自传性质的只是材料，而描写的课题却是美国多方面复杂的生活。

1849 年，梅尔维尔发表了一部"奇怪"的书《马迪》，它到今天仍然让批评家们迷惑不解。书中体现了作家从事广袤的哲学概括的初始愿望，试图不仅从人的个性层面上，也从民族、国家、全人类的层面上诠释生活。但梅尔维尔作为艺术家遭到了失败，其原因在今天看来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他试图写一部作品，那里完全没有具体的生活材料，也没有作者的个人经验；另一方面他过分表面地理解了浪漫主义者的认识论观点，这种观点把想象看作通向真理的最近途径。因此从《马迪》的字里行间体现出来的构思，就是放弃生活经验，"任凭想象自由驰骋"，实现这样构思的意图导致了灾难。

经过《马迪》的失败之后，梅尔维尔重新回到已经过考验的叙述方式，表现保留着自传体裁的特征，他又发表了两部小说，其中之一(《雷德勃恩》，1849 年)利用了他作为见习水手航行在圣劳伦斯河上的经验；另一部(《白外套》，1850 年)则利用了他在"美国"号巡洋舰上服役时对水手生活的观察。在两部新书里面，自传的成分绝对地减少了，而增加了哲学深度。实质上梅尔维尔在 1845—1850 年间所写的五部作品，都证明了他作为思想

家和艺术家的迅猛发展。所有这些作品都是通往《莫比·迪克》必要的阶梯。

《莫比·迪克,或白鲸》是梅尔维尔的创作高峰,写作过程非常痛苦和困难。按照他最初的设想是要写一部有关捕鲸行当的中篇,而实际写就的却是一部宏伟的民族史诗,写作过程中摆脱了浪漫主义散文的所有传统体裁限制。它的广袤的象征性,哲学深度以及作者思想的大胆无畏,引起十九世纪读者和批评家的困惑。可能正是因此小说在同时代人面前没有获得成功,正像作家最后的三部作品(《皮埃尔》,1852 年;《依斯莱尔·波特》,1854 年;《骗子》,1857 年)的命运一样。

梅尔维尔的创作遗产多种多样且价值不一。他作为思想家和艺术家演进过程中重要的里程碑是《泰比》和《莫比·迪克》。文学史家在这两部书中看到的不仅是作家天才内部发展的证明,同时也是美国浪漫主义历史中有阶段性意义的现象。

向往不寻常、奇特、不俗事物的浪漫主义意识,对遥远的边疆,对地球上未被探索的角落,对未开化或半开化的东西,保持着初始纯洁性格并与美好的大自然和谐统一的民族的生活有着强烈的兴趣。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浪漫主义者从启蒙主义者那里继承来的遗产,当然是经过根据新的思想—艺术任务加以改造了的。大多数浪漫主义的主人公都是到处游逛的旅行者,在许许多多浪漫主义的长诗、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情节主线里都有旅行。"游记"在浪漫主义体裁家族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希望作品具有记实的准确性和可信性。Travelogue(旅行见闻)的美学本质就是艺术性的文献。

《泰比》是一个普通水手不加修饰的叙述,内容是他如何从捕鲸船上逃跑,被吃人的野人俘虏并在他们中间生活了几个月,借此机会他观察他们的风情、习俗、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人的性格、心理等等。看上去故事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如果有编造,那也只是很少的部分。不管怎样,梅尔维尔总是顽强地、坚决地强调他所描写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是真实的,以避免批评家对某些事件的真实性表示怀疑。

与此同时,自由、幸福的野人的生活图景乃是浪漫主义乌托邦的经典范例,这些野人思想意识尚未受到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违反自然的文明的沾染和歪曲。叙述者的兴趣与其说是在野人的"美德",莫如说是在文明的罪孽,而野人是摆脱了这种罪孽的。这正是他们幸福和自由最重要的条件。"粗野"和"文明"的强烈对比就是小说自始至终的潜台词。《泰比》证明,作家从自己创作活动的一开始就走上一条用哲学—艺术观点理解有美国特色的资产阶级文明法规的道路,直到最后也没离开过这条道路。这一进步的高峰就是他著名的有关白鲸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也是美国浪漫主义最伟

579·

大的艺术成果之一。



梅尔维尔 L. F. 格兰特的版画照片

《莫比·迪克或白鲸》的写作时间是四十至五十年代之交。此时国家正一步步无可挽回地走向国内战争。美国精神生活中弥漫着即将来临的灾难气氛，惶恐地预感到民族将要经受沉重考验。这种预感很容易在许多散文家、诗人、哲学家、政论家的创作里发现。这一时期浪漫主义人文科学正以迫切紧张的心情，试图透过人的内心世界探索他社会行为的本质。在当代人看来，未来就取决于美国人在危机时刻如何行动。

梅尔维尔也受到同胞们这种探索热情的感染，但作家的立场和探索范围却有着原则的特殊性，这也就决定了他著作的独创性。一般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在哲学—美学结构方面，是以宏观和微观世界等同的思想为出发点，通过个人意识探索宇宙规律。而梅尔维尔是少数对等同思想提出怀疑的人之一，他们向自己提出了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外部力量性质的问题。他不排除外部力量对个人意识的作用，因此他并不忽视人的内心世界。但同时他也不排除另外的可能性，他的主要注意力不是集中在个人身上，而是在全人类和整个宇宙上。

小说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构思几次发生变化。作品结构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增加了新的篇章，对已写好的部分进行了改写，章节之间变换了位置，去掉了一些人物，增加了另一些人物，出现了新的个别情节，这仍然是构思改变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小说《白鲸》的形式也是特殊的，它不是事先预设的，而是在作品写作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海洋自然景观诗意的描写，略显枯燥的科学议论，伊丽莎白悲剧风格的对话和独白，哲学插话，寓言故事，追捕鲸鱼的画面，分割鲸鱼躯体的描写，行业工具的清单，有关个人、民族、国家命运的思考等等，所有这些依次排列，引导读者花费一定的努力从一个话题转向另一个话题，领略作者思想的深邃逻辑。

关于小说属于哪种体裁的争论至今没有结果。一些人认为是海上小说（捕鲸系列）；另一些人认为是社会小说；第三种人认为是幻想小说；第四种人认为是哲学小说；第五种人认为是冒险小说等等。所有这些人所说的都正确，因为《莫比·迪克或白鲸》的确包含了上述各种体裁的特征，但同时他们所说的又不正确，因为《白鲸》不能归纳入其中任何一类。除此之外，小说不能分割成冒险的、“捕鲸的”、哲学的、社会的、幻想的“碎片”。所有

·580

这些成分已经相互“融合”，形成一个不容分割的整体。《莫比·迪克或白鲸》的体裁是综合性的。小说中熔炼了美国浪漫主义散文的主要成果和许多世纪世界文学的经验。当梅尔维尔列举自己的导师的时候，他不仅指出库珀和 R. G. 达纳，也举出荷马、莎士比亚、拉伯雷和塞万提斯，他这样说丝毫不歪曲事实。

实质上梅尔维尔实现了美国人多年的理想：拥有民族的叙事文学，虽然他自己并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当我们把《莫比·迪克或白鲸》称为叙事文学的时候，必须立即说明，“叙事文学”的概念在这里不是用黑格尔的含义，不意味着诗歌和戏剧的严格对立。相反，它体裁的多元性恰好产生于诗歌文学、叙事文学与戏剧文学的相互作用之中，也是在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小说形式的综合（冒险小说、“教育小说”、诙谐史诗、历史小说等等）。

文学史家经常把《莫比·迪克或白鲸》称作美国浪漫主义散文发展中的顶峰。这样的论点并非没有根据，但范围太广了。例如未必能把这部小说看成历史散文和心理散文进化过程的顶峰。但它是文学的海景图画中集大成之作，应该无可争议。

库珀在自己的“海事小说”里，把航海与历史结合起来，但让它脱离了当代社会现实。他的追随者沿着使这种体裁自由化的道路前进，试图消除这种脱离现象，把海上生活纳入美国社会存在的框架里（R. G. 达纳《当普通水手的两年》）。梅尔维尔展示的轮船甲板不仅是民族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其最集中、最有象征意义的体现。

今天捕鲸业是罕见的，捕鲸行当在经济中占据的地位微乎其微，猎取鲸鱼是奇特的事。十九世纪中叶的情况不同。美国经济几乎就是“附着在鲸鱼身上”。捕鲸业吸引了数万人，成百万的资金，它不会比钢铁工业、煤炭或纺织工业更有特色，当然如果不把航海这一特点计算在内。《莫比·迪克或白鲸》这部民族史诗不是以鲸鱼为敌，而是依靠它们，一位批评家说得很对，这样的书只有梅尔维尔这一代美国人才能写得出来。

任何一个对十九世纪捕鲸行业的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在《莫比·迪克或白鲸》这部书中找到一个无价的、独一无二的源泉。但是它并不是描写生产的小说。虽然单独的捕鲸人的生活和劳动也引起人们的兴趣，但首先是构成一种环境，在这个环境里生活着作品主人公并闪烁着作者思想的火花，他寻找引向广泛的道德、社会、哲学问题的途径，这些问题已经远远超出捕鲸行当的范围。从“捕鲸”材料里引出小说的哲学、社会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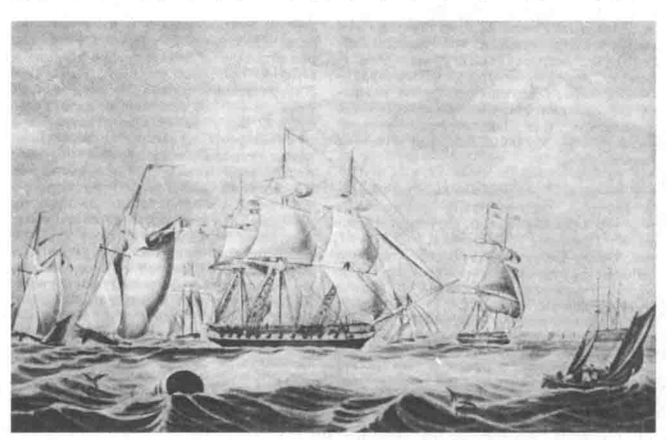
鲸鱼在《莫比·迪克或白鲸》里过着双重的生活。一种生活——物质的——发生在大洋深处，用生物学和捕鲸行业术语加以描述；另一种生活则

在人类意识的空间里展开，在社会、哲学、道德和心理范畴的环境中展开。在第二种生活里与其说鲸鱼有生物学的本质，莫如说它们具有象征性本质。实质上在《莫比·迪克或白鲸》里，全部有关鲸鱼的描写都引向“白鲸”，这条白鲸已经和捕鲸行业毫无关系了。它在人类意识中的生活比它的物质存在重要得多。白鲸是含义广泛的象征、魔鬼强大力量的体现和等待破解的伟大宇宙秘密。

《莫比·迪克或白鲸》中的社会问题基本上与小说的行业描写结合在一起。社会问题溶化在无尽的与行业的这种或那种特色相关的五花八门的联想中间。这丝毫不降低小说社会问题的重大意义，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相互关系性质总的结论，就像海上暴风雨一样震耳欲聋地宣称：“私有制——这就是全部规律。”

梅尔维尔的思想不愿受占统治地位的现代宗教和哲学概念的束缚，这些概念把世界的任何“最高法规”都归结为各式各样上帝的力量。作为悲观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他怀疑类似概念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在自己的小说中，他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分析和考验，而任何一种概念都没能经受住考验。与此同时作家明白，他不能回避那些与个人意识相关联的问题。按他的想法，认知万能的法规取决于人类理智的活动，而理智在梅尔维尔看来并不是无懈可击的工具。由此而提出新的任务：探索现代思维的认识论原则，或者换句话说，探索认知过程中意识的类型。这正是小说的许多与白鲸相关联的场面、情节、形象的哲学含义，白鲸象征着“超级力量”、“最高意志”、“宇宙”。

在认知过程意识的众多类型中梅尔维尔举出三种：冷漠型、主观投射



在斯皮特海德停泊场集中了各式各样的船舶
不知名画家的石印画
十九世纪前半叶 列宁格勒 中央海事博物馆

型、客观消极型。第一种徒劳无功。它只记录现象，不去理解现象的象征意义，对万能的法规也不感兴趣。第二种是悲剧性的。他不善于理解事物的客观含义，但把自己的主观观念投射过去，例如就像亚哈把生存在自己头脑中关于“世界之恶”的观念投射到白鲸身上。实质上白鲸到底是什么样的，象征性体现在白鲸身上的力量的真实内容是什么，对亚哈来说都无关紧要。他设想，只要他消灭了白鲸，就战胜了世界之恶。事实上亚哈面前只有一条路——自我毁灭。只有伊萨马利的消极意识才能领略真理，他的意识与梅尔维尔本人的意识一样，正走上与谢林认识论近似的道路，时常挣脱唯心主义思维的羁绊，得出准确的唯物主义结论。

从正统的宗教观点来看，伊萨马利所发现的真理违背上帝的意旨，是可怕的反叛：宇宙间没有左右人、社会、民族、国家生活的超级力量。那里面既没有上帝，也没有绝对精神，没有天意的法规。那里面只有广袤无际，一片空虚，飘忽不定。宇宙的强大力量是不受制约的。它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其中也包括对人。白鲸的巨大力量，它的精力，它永不休止，它的恶意，这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正像它雪白的身躯一样，只是“无色的苍白”。

582· 《莫比·迪克或白鲸》是对美国公民的威严警告，在梅尔维尔看来，他们正以自己鲁莽的行动把美国国家这条大船引向灾难，轻率地寄希望于超级力量的干预。作家对他们说：没有超级力量！不存在上帝的理智，不存在命运的法规。美国的命运掌握在你们手中。

五十年代前半叶是美国浪漫主义发展史的顶峰。霍桑、梅尔维尔、爱默生、比彻·斯托、梭罗、朗费罗、惠特曼等最重要的著作正是在这一时期面世，还有其他一些不十分重要，在美国文学生活中没起重大作用的作品。

在美国，浪漫主义运动高潮的兴起不慌不忙，占据了三个十年时间，而它的衰落却迅猛异常，并且是灾难性的。国内战争开始前夕，也就是近六十年代，浪漫主义作为文学潮流已经是日暮途穷并且实际上停止存在了。战前年代美国的文学生活表面上很活跃，甚至轰轰烈烈，但同时也进入一个痛苦的危机时期。老一代浪漫主义者已经完全退出舞台；年轻人痛苦地感到缺乏信心，感到无力应付历史现实所提出复杂至极的问题。浪漫主义艺术正经受着深刻的衰败，这个过程是无可挽回的。可以这样说：美国的浪漫主义者在登上最高峰之后发现，他们眼前没有路。他们静静地，不加反抗地离开舞台，为后代留下最宝贵的艺术和哲学遗产。

第二章 加拿大文学

1. 法语文学

对法语文学来说，十九世纪前半叶是艺术意识逐步形成的时期。在加拿大（从1763年开始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从最初的尝试过渡到真正意义的文学发展，是在对抗英国政府推行的"非法语化"政策的气氛中进行的，在从法国传来的新思想与忠于保守宗法传统、教权传统的复杂交叉形势下进行的。

世纪之初文学生活像在那以前的十年一样，集中于报纸上。但是从1806年开始——这一年创建了《加拿大人》报——加拿大法语新闻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由激进的爱国势力的首领彼埃尔·贝达尔（1762—1829）所创建的这份报纸，表达了在美洲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一代法语加拿大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晚些时候报纸又转入出色的报人、社会学家艾蒂安·帕朗（1802—1874）的手下，从此报纸就在"我们的制度，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法规"的口号下发行。

报纸上出现的常常是不知名的地方诗人的诗歌，这些诗公开模仿布瓦洛和十八世纪法国诗歌。属于这类作家的有约瑟夫·凯内尔（1746—1809），他写了一些滑稽书信、诗歌对话、田园牧歌和警世诗。还有以一部《夏托盖大捷》和《尼亚加拉瀑布素描》走红的约瑟夫·默尔梅（1775—1820）。两人都生于法国，在美洲定居后成为加拿大最初的两位诗人。

但是古典主义的标准很快就被另一种标准所代替。在魁北克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书信、讽刺、歌曲、讽刺诗以及其他诗歌作品》（1830）（由米歇尔·比博[1782—1857]所著）并"以勤奋学生的名义献给导师布瓦洛"，这部书就成为对加拿大古典主义的最后奉献。1837年小菲利普·奥贝尔·加斯佩声称："统一的世纪已经过去。法国宣布莎士比亚是世界第一个悲剧作家。"报纸上出现一些颂歌、悲歌，公开模仿拉马丁、雨果、维尼，使用一些典型的篇名如《秋天》、《为何绝望》、《愁苦》、《致民众》、《朝圣者》、《森林的精灵》、《我的心啊，你为什么那么阴郁》等。

从三十年代开始，法语加拿大文学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强大影响下逐步形成。在传播浪漫主义情绪方面与法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接触起了重要作用，但接受欧洲影响以及这些影响的性质是由一种探索精神所决定的，探索的目标就是符合时代特点的自我表现手段，是由要确立自己的民族自我

意识的意图所决定的。

法语加拿大浪漫主义发展的第一步(三十至五十年代)与法语加拿大历史中火热的时代相关联。在法国六月革命和加拿大1837年起义(这次起义是由民族解放运动引发的)这段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加拿大知识分子,既感到革命前年代的激情,也痛苦地为自己民族的存在本身担忧。探索适应于时代的艺术,体现在民族文学传统尚未形成的条件下,并出现了不同方向上的分歧。

革命前和革命后最初年代的诗歌,不仅受到拉马丁、雨果、维尼的影响,也受贝朗瑞歌谣、德勃罗和德拉维尼革命诗歌的影响,政治动乱在题材方面得到了直接表现:哭诉祖国的困难,歌颂自由,揭露暴君,肯定民族主权,号召进行斗争。缺乏具体性以及诗歌方法的不成熟被公民的激情所补偿。

弗朗索瓦·格扎维埃·加尔诺(1809—1866)是未来的历史学家,在他的诗歌中祖国和自由是两大主题,在这两大主题下或者表现对往日伟大的忧郁惋惜,或者号召国民在"自由的威严旗帜下"为祖国而死,此时表现出热情的冲动、愤怒、鼓舞。关于法语加拿大人的命运,加尔诺有时直言不讳,有时则用描绘其他民族的悲惨遭遇的手法。法兰西的形象是怀乡情绪的源泉,是法语加拿大人所渴望的自由象征:"欧洲强悍的英雄们,在你们终于获得自由之后,请迎接年幼的弟兄们来到你们的广场。"在加尔诺的诗中(与此时期其他诗人一样)有许多古典主义的成分,但这些成分都服务于表现新的情绪,这种情绪与浪漫主义对历史进程的不满相联系。

三十年代一代人试图创作长篇小说,这表现了他们开创民族文学基础的爱国热情。时代精神气氛的特点带有自由思想和激进主义的某些特点,此时这些都反映到一些小说的前言里,这些前言都包含有法国浪漫主义者们的宣言的回声,此外这也反映到采用这种体裁的意图本身,虽然这种体裁在法语加拿大充其量被认为是无益的,因为有关激情和道德的议论"在《教义问答》中已经说得尽善尽美,而且比欧仁·苏或者亚历山大·仲马的作品要好得多"(艾蒂安·帕朗)。这些小说本身不过是学生对法国二流作家的模仿。

在法语加拿大第一部长篇小说《寻宝者或者一本书的影响》(1837)的序言里,小菲利普·奥贝尔·加斯佩(1814—1841)坚决摒弃"彬彬有礼的题目"、"田园诗歌、榆树下的幽会和单独在丛林中散步",因为这一切只能满足"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闲散的宫廷欲望"。作家主张:"当今在工业化时代必须深入研究人的心。"加斯佩称自己的小说是"历史"的、"道德"的,因为他是"按本来面目描写事件",而人则是按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表现"来

描写的。书中提及巴尔扎克、大仲马、雨果、诺迪耶、拉门奈、莎士比亚、拜伦、司各特以及其他人，但是加斯佩的直接导师仍然是世纪之初的法国小说家。

寻宝人是从事炼金术的夏尔·阿芒，人们都认为他是个疯子，他一心要用邪恶的妖术获得财富和周围人的尊重。为了和另一世界的人交往，主人公除其他东西之外，还需要一只被绞死的人的手，在小说情节中加入补充情节线索，内容是有关送货人吉那梅被杀以及主人公如何企图把被处决的杀人犯的手据为己有。在这第二个情节中加入两个补充的传说：关于和魔鬼跳舞的罗萨·迪亚蒂利普和犯有各种罪恶、不怕上帝和小鬼的"铁手"罗德里格。除此之外，与夏尔·阿芒的故事并行还有一个故事，即爱上他女儿的大学生、医生圣-塞朗的故事，他是个观察者、道德分析家，在这个人物形象中带有夏多布里昂笔下人物的特征（迫使远离上流社会的《忧郁天性》），这样，小说就是"各种成分并存的大杂烩"。"哥特式散文"中常见的阴暗、神秘的气氛，情景和画面在小说中与在民间传说基础上产生的题目与形象相结合，与民众习俗的画面相结合。作者的世界观充满对当代现实的不满（小说的"现在时"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作品的两个主人公同样对这个现实感到厌倦：孤独地在自己简陋、破损的茅屋里幻想着发财的夏 ·584 尔·阿芒，还有圣-塞朗，他了解到周围世界自私的根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容不下"真理、心灵的平静和和谐"。尽管对神秘的、另一世界的事物作了美化，被浪漫主义者鄙视的世俗意识在小说中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立场：作家为夏尔·阿芒惋惜，由于他的愚蠢而注定终生追逐虚幻。

从1835年开始，在法语加拿大杂志上发表了众多的短篇小说和传说（P. 布歇·德·布歇维尔的《特拉法尔加的塔》、U. J. 泰西埃的《埃玛或不幸的爱情》、A. 帕皮诺的《卡罗利娜》、O. 苏利亚尔的《金狗》以及其他），正是在这些作品的共同影响下出现了《寻宝者》。这些篇幅不大的作品往往以民间传说作为根据。情节基础大多是神秘的事件、恐怖故事，把读者引向常理之外：突然的死亡或者被杀，提前装入棺材，死者灵魂的显现等。民间传说的情节，哥特式和情节剧式的气氛与主人公形象相结合，主人公虽然并不明显，但一定是忧郁的，如夏多布里昂那样的。

法语加拿大的第二部小说是约瑟夫·迪特尔（1825—1886）的《1812年的恋人》（1844），一方面和迪克雷-迪梅尼尔传统相联系，受夏多布里昂的影响，同时又是朝着讽刺小说的体裁过渡，是掌握大仲马和欧仁·苏的小说技巧的尝试。迪特尔在序言里捍卫小说这种体裁，反对指责它对社会习俗有不良影响。迪特尔把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视为"小说的皇帝"，他认为作品的成就就在于他"揭露了社会结构的罪孽"。但是在小说序言中

阐述的这一重要思想没能体现到小说本身中去。迪特尔在小说文本中引进大量的哲学、社会、道德题材的作者议论，而作品的结构只靠主人公龚扎尔夫·德．P和路易斯·圣-费玛尔奇特的遭遇简单地串联起来。小说充满各种事件，决斗、偷窃、追逐、化装、奇遇和辨认，一个接着一个，而人物形象和过去一样显出夏多布里的影响。龚扎尔夫·德．P苍白、严肃、额头上带有神秘东西的标记，喜欢孤独。

虽然小说的名字与加拿大重要的历史事件——1812年战争相关，但不能把迪特尔的作品称作历史小说。那里面缺乏地域色彩，历史（夏托盖战役）只是作为偶然事件嵌入小说。在回答因“如此不尊重历史真实”而气愤的想象中的历史学家时，迪特尔写道：“我们也不满他没能更好地开导我们，因为自从英国人在我们国家建立了统治之后，我们有关加拿大历史又知道些什么。”

这个问题证明，对革命后四十年代的民族历史的兴趣在增长，这正是对法语加拿大人民能否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产生怀疑的年代。浪漫主义的典型兴趣在于自己过去的历史，对这一兴趣的回应则是弗-格·加尔诺的《加拿大历史》(1845—1848)。达雷姆勋爵宣称，法语加拿大人是没有前途的民族，因为他“既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自己的文学”，为回答这种论断，加尔诺创作的这部《历史》的责任就是弘扬英勇的过去，弘扬殖民地和与英国进行战争的年代，恢复民族荣誉，肯定民族尊严。在为自己的著作仔细地安排实证的过程中，加尔诺在系统观点方面主要以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为标准(基佐、梯叶里、米希勒)。他有关历史进程的观念是以从梯叶里那里引进的民族间对立的思想为依据。欧洲的英法两大民族随各自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而进行的斗争对加尔诺来说就成为一种背景，在此背景下展开了加拿大历史，这部历史继续着两个伟大民族之间的悲剧性对立。由于真实性与艺术表现力之间的紧密结合使得加尔诺的这部书成为民族文学的里程碑。为了传达历史精神，再现事件的色彩，加尔诺叙述了第一批移民的勇敢，叙述了与英国人进行战争过程中所建的功勋，创造了一系列历史人物的画卷。讲述充满戏剧性冲突和英雄伟业的过去就成为一部民族史诗，这部史诗的核心是有着特殊命运的人民的形象。法语加拿大人在美洲大陆的这种命运被加尔诺阐述成不断的斗争——与大自然斗，与敌对的印地安部族斗，与英国人斗——为保持并确立自己的民族性以及宗教信仰而斗争。

585· 由于加尔诺的《历史》为民族的法语加拿大神话奠定了基础，促进浪漫主义拯救世界情绪的产生，它为民族文学进一步的发展指出了道路，鼓舞了几代作家。

民族特殊性的思想促使加尔诺认真地研究加拿大历史，同时也产生了

对加拿大当今现实特殊性的兴趣。从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人们进行了一些尝试：用比较接近现实的作品，用描写加拿大习俗的作品来对抗当时已开始发展起来的讽刺小说，这种小说是以法国同类作品以及库珀的作品为参照的。约瑟夫·帕特里斯·特律伊利埃·拉孔布（1807—1863）的中篇小说《父辈的土地》叙述的是一个姓沙文的农村家庭所遭遇的各种不幸，他家开始时破产，而后来又重新获取了自己的财富——父辈的土地。在序言里拉孔布为其作品简单的情节及和平的结局寻找根据，他写道："一些读者可能希望我们的小说有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他们可能喜欢……让我们的叙述具有恐怖风格的特色，大多数现代小说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们所写的是有关这样一个国家，它的习俗到处都显现出纯洁和自然，如果以凶杀、投毒或自杀为结局，我们的作品……就会不真实，甚至是可笑的。"

在拉孔布的小说里规划了典型的"法国—加拿大"类型的人物：热爱劳动、屈从命运的父亲，外出寻找幸福和财富的儿子，耐心等待儿子归来的母亲。作家的兴趣在于围绕主人公的现实环境以及它对人物命运的影响。但是在拉孔布的作品里风俗习惯的描写服务于表现一种对立：一方面是古朴的习俗，乡村生活的纯朴、愉快，另一方面是城市文明所带来的贫穷、灾难。于是拉孔布的中篇成为"忠实于土地的小说"的创始作品，一种把与土地的联系看作最高民族、社会、道德价值的体裁，这种体裁自六十年代起与历史小说一起成为法语加拿大文学的主要体裁。

更强的现实主义倾向表现在皮埃尔-约瑟夫·奥利维埃·肖沃（1820—1890）的长篇小说《夏尔·盖兰》（1846—1853）里。在《法国革命与文学》（1844）的片段里肖沃像斯塔尔夫人一样，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代言人"。他把现代文学发展的性质与变化了的社会状况的本质联系起来，强调以历史的态度对待艺术的必要性："如果自由世纪的散文和诗歌不用专制时代的语言说话，难道就能鄙视它们，认为它们衰落了吗？不，先生们……它们已经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在《夏尔·盖兰》里虽然仍有当时时兴的夏多布里昂的痕迹（在小说第一章第四部分开头引用一段《阿达拉》的文字，小说主人公阅读《殉难者》等等），肖沃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巴尔扎克的传统。但作品的体裁特征却是折衷的。一个在加拿大定居下来的生意人用无耻的阴谋把盖兰一家人从他们的土地——父辈的财富——上赶走，这段充满社会意义的叙述融化在习俗画卷和加拿大绚丽风景的描写里。一些场面再现了地方风俗习惯并证明了宗教在法语加拿大居民生活中的作用，1832 年魁北克省遭遇霍乱流行的描写，一些对话中表现出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面目，爱国热情以及对 1837 年革命前民族问题的关注的描写——所有这一切都归纳到有丰富表现力的加

拿大全景画卷里，并证明作品的副标题——《加拿大习俗小说》——是确切的。

但在《夏尔·盖兰》这部小说里，还描写了一个领略了生活经验的年轻人。该主题的拉斯蒂涅的变种可以在昂利·瓦赞的故事中看到，他下定决心不惜任何代价谋求名利，为了在社会的阶梯上得到升迁，宁愿作阴谋家、恶棍。至于主要角色，则他的思想发展就像在启蒙主义小说里那样，从最初幼稚的梦幻，不确定的理想经过精神折磨，生活的考验以及心灵震撼，逐步走向成熟并投身于实际行动。

在把夏尔·盖兰的命运与历史时代相对比时，肖沃在小说开头写了“社会疾患”（英国人的统治和魁北克省因循守旧停滞不前的结果），表现年轻人在从学校毕业之后在社会结构之中找不到位置。选择的局限性——权力，医疗，宗教——缺少空缺的职位使得法语加拿大年轻人中有钱者终日游手好闲，没钱者则饥饿致死，或侨居国外。夏尔·盖兰在作品末尾放弃了他原先选定的律师职业，转而从事土地耕作，这样他的使命就是指示出路并拟定标准。小说尾声富有启发意义，它证明主人公找到了自我，得到富足并实现了自己的爱国志向，他开垦了无主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创建了新的教派，兴建了教堂，经营着模范的家业，保持着古朴平和的习俗。

586·

法语加拿大浪漫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以奥克塔夫·克雷玛齐（1782—1879）的创作为终点。他的诗歌遗产不多：二十七首短诗和长诗，是在1849至1862年间创作的。1863年克雷玛齐由于债务的纠缠远走法国，从那以后就没回到加拿大来。属于诗人第二阶段，也就是法国阶段的创作有他的书信，内容包括了他对法语加拿大文学和魁北克省的精神气氛的思考，还有一部日记《包围巴黎》。

克雷玛齐有关法语加拿大文学的思考是悲观的。他认为两个原因阻碍了它的发展：一是公众、“小贩”社会的冷漠，这些小贩不能超越精神空虚的生活；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自己的语言，结果使法语加拿大文学不过是一种偏远省份的法国文学。

克雷玛齐认为自己是浪漫主义的信徒。他赞赏“古典主义的叙述风格和方法”，但他指出，他们的“思想已经过时”，“对心灵和智慧已无所奉献”。他称缪塞和拉马丁为“时代人物”。但是克雷玛齐与浪漫主义诗歌的直率激情格格不入，他写道，不可能“用自己的不幸为轻佻艺人剪裁服装”。在他的诗歌里没有个人主题，他只写重大的民族题材和具有普遍意义的题材。诗人热衷于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理想，这些理想在他的诗歌中获得吞没一切热情的性质，他还热衷于死亡的主题。虽然所有克雷玛齐的诗都是对一些具体事件的回应，但他有关诗人神圣使命的概念保持着浪漫主义

的高昂情调。

克雷玛齐歌颂加拿大，赞赏它的森林和湖泊。他着眼于过去的历史，写第一批殖民者和传教士，为那些注定要蹂躏"失去记忆的土地"的人感到惋惜，将对祖国的热爱与伤感的语调、对法国的崇拜以及对英勇历史的缅怀结合在一起。

在最著名的一部作品《卡里戎的旗帜》里（这部作品给他带来民族诗人的荣誉），克雷玛齐按史诗的原则展开情节，他把现在与英勇的过去相对立，过去的标志就是带有皇室百合花的旗帜。老兵，军团旗手蒙卡姆将军珍藏着这件圣物，他下决心尝试改变历史进程。他漂洋过海来到法国皇帝面前，要把这面被子弹打穿的旗帜拿给他看，以此唤起他对被丢弃的法国儿女的怀念。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在凡尔赛的环境下老兵终于明白，他那复活往日的企图注定是要失败的。他回到加拿大，为的是死在法国军旅获得最后胜利的地方，傍依着那面旗帜，以一曲对他的颂歌结束整个作品。

克雷玛齐不仅崇拜法国过去的辉煌，也崇拜拿破仑的法兰西。他从大洋彼岸领略拿破仑三世的形象，是透过在法国诗人创作中用浪漫主义气质美化了他伟大先辈的形象加以实现的。因此克雷玛齐的诗歌《东方战争》及《卡斯特尔费达多》等等充满雨果《东方吟》风格的夸张激情，是对第三帝国士兵功绩的歌颂。这些士兵对他来说乃是曾经在蒙卡姆的旗帜下战斗，写下一页加拿大光荣历史的人们的后继者。

最深刻的浪漫主义情态，表现在克雷玛齐以死亡为主题的作品里（《亡者》、《三个亡灵的散步》），这些作品按其性质接近于哲学—宗教长诗体裁。在《亡者》里，用晚秋的风景为情节发展作铺垫，当时"天空正在聚集乌云，准备着冬天用来覆盖世界的丧服"，诗人脱离了生者的世界，充当死者的保护人。他写道，死去的人的宁静只是生者为袒护自己自私的遗忘的权利而编造的幻想，而死者需要的是纪念和祈祷。这里哲学—宗教观念转化为极其深刻的个人感受，表现出把死亡世界的幻想与准确的自然细节相结合，这正是典型的戈蒂耶和波德莱尔"阴沉的浪漫主义"气质。在未完成的戏剧化长诗《三个亡灵的散步》（1860—1862）里，诗人竭力要回答一个问题：人的血肉之躯能否经受得住死后的折磨，这就预示着要加强波德莱尔的情调。在长诗的一个情节中，棺材蛆在折磨自己的猎物时魔鬼般尖刻地宣告，它才是不容争辩的现实，人的所有幻想在这个现实面前都粉身碎骨了。

· 587

克雷玛齐意识到类似的作品会引起读者的厌恶，他写道：浪漫主义学派并非在丑陋与美妙之中更钟情于前者，它是以本来面目理解自然的，它认为可以进行观察，有时也可歌颂上帝操劳所创造的一切。

这样，前半世纪法语加拿大文学的发展充满各种探索，经常伴有关于文

学的理论方面的创造性思考。除去最初古典主义的试验之外，文学的创立过程正好与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同步，在浪漫主义中首先吸引法语加拿大人的是自由的思想，其次则是民族特殊性的思想。此时虽然法语加拿大诗人和作家是以早期法国浪漫主义，有时是以前浪漫主义为标准，但这并不排除晚期浪漫主义直到波德莱尔的影响。浪漫主义主题具有各式各样的性质，由于没有像欧洲那样的尖锐性，它们自由地与古典主义的诗歌成分相结合，与感伤主义倾向相结合，个别情况下朝着现实主义方向发展。

2. 英语文学

十九世纪前半叶英语加拿大文学与十八世纪后半叶一样，保持着地方性质，处于刚刚形成的阶段，首先依据着启蒙主义传统，追随着英语文学的榜样（开始是英国文学，后来则是美国文学）。

例如，奥利弗·戈德史密斯（1794—1861）明显地模仿自己的前辈、英国感伤主义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并写出一部长诗《蒸蒸日上的村庄》（1825）。这部长诗在形式上非常近似于英国诗人的长诗《荒村》。虽然加拿大人戈德史密斯的这部作品在艺术上逊色于英国戈德史密斯悲泣忧伤的长诗，但它仍然是加拿大英语民族文学发展中的里程碑。

英语加拿大省份的文学中最重大的、受到国际承认的事件，是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托马斯·哈利伯顿的一部书《钟表商或斯利克城的山姆·斯利克言行录》（1836）。这部书是传统游记形式的英国写作方法与无情节讽刺小品的结合。作品的中心人物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佬，它偶然地成为讲故事人的伙伴，他认为美国人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民族。自信的山姆灵巧地推销自己的商品并获利（他卖钟表，有他自己成功的“心理学”销售风格），他鄙视一切与生活的实际方面没有联系的事物。例如他不仅认为研究古代语言、经典音乐、美术是无聊的胡闹，也反对读书，除去那些能帮助人掌握会计学的书。

山姆虽有某些讨人喜欢的特点：清醒的头脑、机敏、幽默感，这一形象乃是对美国民族性格鲜明尖刻的讽刺。作者真实地再现并讥笑了一个特殊时期美国人心理的某些本质方面，在这一时期美利坚合众国在摆脱了殖民统治，宣布实行民主共和制理想之后，开始表现出扩张倾向，造就了一批投机商人，六年之后狄更斯在美国札记中对这批投机商人进行了尖刻的描述，此时正是《钟表商》的续集《山姆·斯利克在英国》出版的前一年。人们常把哈利伯顿称作“美国幽默学派”的奠基人，这不是偶然的。

哈利伯顿的作品中还有一些篇幅是描写普通人悲惨命运的。作为历史

学家和有关新斯科舍省著述的撰写人，他引用了大量有关平民生活状况的事实和统计数字。

在《钟表商》作为单行本出版之前，哈利伯顿一直在《新斯科舍人报》发表文章，这份报纸的编辑是他的朋友约瑟夫·豪（1804—1873）。从豪的社会文学活动性质以及他的文学兴趣来看，他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豪在加拿大文学史中的作用，与其说是在诗歌（他写过长诗和短诗，自己并不十分重视）或散文（写过主要在新斯科舍省的旅游札记以及政治评论）方面，莫如说在于他发行了在英属北美最重要的一份报纸本身，在这份报纸上发表文章的不只哈利伯顿，还有戈德史密斯以及其他当时的作家，豪也发表自己的作品。除此之外豪的功绩还在于他创办了一个文学俱乐部，在那里进行着讨论和争辩。 ·588

在姐妹作家凯瑟琳·特雷尔（1802—1899）和苏珊娜·穆迪（1803—1885）的作品里，体现了对纯朴纪实性和描述性创作的偏爱。前者的作品有《加拿大的边远地区》（1836），有一个典型的副标题：《来自一个移民军官妻子的信：不列颠美洲国内经济的例证》。

在特雷尔笔下，加拿大是一个没有神奇故事和传说的国家。但这个国家的美景使作家陶醉。它的大自然画卷的特点是纯朴无华；在这些描写中她的写作技巧达到很大的成功。

苏珊娜·穆迪的自传性著作《丛林的艰苦岁月》（1852），描写的是开发加拿大的艰难。这些作品为十九至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学开辟了开发荒地和森林的先驱者们生活的题材。

斯坦迪什·奥格雷迪（1793—1841）十九世纪初从爱尔兰移民并定居在蒙特利尔，他的长诗《侨民》（大致发表于1842年）归于在加拿大诗歌和散文中普遍的题材：从欧洲本土移民并开发新土地。作品中表现出这一时期英语加拿大诗歌所共有的特点：许多华丽的辞藻和共有的传统的片段。

浪漫主义风尚在十九世纪前半叶即已在英语加拿大文学中出现，首先表现在约翰·理查森（1796—1852）的历史著作中，其创作过程无疑受到司各特和库珀散文的影响。理查森是北美商人与印第安女人的孙子，他度过童年的地方正是加拿大人（与印第安人一起）抗击1812年入侵的美国军队的地方。作家一直对印第安题材感兴趣。勇敢的印第安人领袖特库姆塞成为理查森的长诗《特库姆塞或西部战士》（1828）中的核心人物。庞蒂亚克率领的印第安军队围困底特律是小说《瓦库斯塔》（1832）的历史依据，这部小说与它的续集《加拿大弟兄们》（1840）一样获得很大成功。还应当提起的有理查森引人入胜的回忆录《在加拿大八年》和未完成的《1812年战争史》（1842）。

1812年与美国的战争,社会情绪的高涨以及1837—1838年前后加拿大的起义,都促进了加拿大人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在各省社会和文学生活中,这一过程的开始是以十九世纪前半叶出现的许多期刊为标志的。在法语加拿大报纸《加拿大人》之后,英语加拿大人出版了《保卫者》,发行人是约瑟夫·威尔科克斯,爱尔兰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加拿大人反对派情绪的灵魂,他的革命信念极其彻底而不妥协。到五十年代以后,英语加拿大文学中实现了各省精神上的充分接近。把各地区文学融合成统一的英语加拿大文学的方向就是浪漫主义。

第三章 拉丁美洲文学

1. 西班牙美洲独立战争时期的文学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前半叶是拉丁美洲历史的转折时期。这是准备和实现反西班牙的民族解放革命的时刻,在此期间各重新组成的国家迈出了最初步伐。

独立的思想决定着生活的所有领域:政治、科学、艺术。

文学参与了创造精神气候的过程,只有在这种气候下才能摆脱殖民地枷锁。文学参与了反西班牙解放战争,这场纷乱的战争从1818开始一直持续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而当拉丁美洲各国取得独立之后,文学又成为民族形成的因素。斗争和创作往往在解放运动活动家本人的生活中结合一起,其中有它的第一位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他的文学遗产非常巨大,589·奠定了他在整个拉丁美洲文艺史中的地位。他的演讲、书信就像阿根廷人贝尔纳尔多·蒙特阿古多的自传体著作《政治回忆录》(1822)和墨西哥女作家特莱莎·密耶尔的《回忆录》(1812)一样,记录了当时历史人物的典型特征。有时这些活动家被比作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他们命运的戏剧性异常紧张,他们的政治和个人冲突达到白热化。

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过渡,从殖民地状况到独立地位的过渡(自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一个特殊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从过去继承下来的传统和新潮流发生了冲突。

拉丁美洲独立的思想和反西班牙的解放战争在精神领域,是启蒙主义和欧洲唯理论的产物,它们都经过了前面整个政治经济发展过程的准备,具体说是殖民统治不可逆转的危机。两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在西班牙远隔重洋的殖民地,起了促进政治动荡的作用。

殖民政权残酷镇压启蒙主义和革命思想的宣传。新格林纳达殖民帝国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安东尼诺·纳里尼奥,只因翻译并出版了《人权和公民宣言》就付出终身监禁的代价。另一个在厄瓜多尔发行了第一份报纸的勇敢的启蒙家哈维耶尔·埃斯佩霍,也只因把卢梭的《民约论》译成西班牙语而受到残酷迫害。顺便说,这本书在西蒙·玻利瓦尔的政治教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很明显,这些渗透到欧洲所属拉美殖民地的先进思想的贯彻过程是相当复杂的。拉丁美洲的思想家和作家从自己的历史发展的特点和要求出发,坚定地挑选欧洲文明中的成果并加以改造。例如,那一时期拉丁美洲意识形态相当典型的特征就是唯理论与天主教的共存。全美洲爱国主义是作家和解放斗争领袖创作和实践活动的共同特征。历史命运和文化的共同性,解放斗争任务的共同性——这就是这种爱国主义的基本前提。民族感的产生是晚些时候的事,在那一时期西班牙殖民地的居民把自己看作大美洲祖国的儿子。

那些年思想上的意向,首先在诗歌领域得到直接的艺术体现。对美洲祖国的热爱,解放的思想——这就是独立诗歌的基本主题。与它最为贴切的就是古典主义的美学纲领,古典主义相信进步,具有平民性并呼唤古希腊罗马文化。西班牙诗人曼努埃尔·金塔纳的多首颂诗就成为直接的榜样,安德列斯·金塔纳·鲁用他的风格写出诗歌《九月十六日》,乌拉圭人弗朗西斯科·阿库尼亚·费加罗写出诗歌《东方新升起的太阳多么美丽》,这首诗后来成为国歌。但同时以浪漫主义态度领略现实的萌芽也开始出现,这首先表现在用强烈的抒情色彩歌颂祖国大自然以及历史英雄人物。

所有这些典型的潮流,都出现在解放战争时代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的创作里:何塞·华金·奥尔梅多和安德雷斯·贝略。两人首先体现了正在获得解放的美洲独立的思想,一个主要是在英勇战斗的画卷里;另一个则是在描写原始大陆的自然财富和沉重力量的过程中。两位诗人的思想和各自的生平都体现了美洲各西班牙殖民地间的历史和精神上的统一。贝略生于委内瑞拉,而主要的启蒙和创作活动都贡献给智利,生于厄瓜多尔的奥尔梅多却和秘鲁以及其他安第斯山脉国家有着血肉联系。

《胡宁大捷,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是何塞·华金·奥尔梅多(1780—1847)最重大的颂歌式作品。这部按照创作意图异常宏伟的著作,乃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刚刚沉寂下来的战役所作的直接回应。诗人有意地混淆两个实际事件——一个是1824年8月6日玻利瓦尔领导下在胡宁谷地的大捷,另一个是同年11月10日由苏克雷将军领导的阿亚库乔战役,这次战役最

终导致西班牙政权的崩溃。"解放者"玻利瓦尔事实上参加了胡宁战役,但战斗规模用阿亚库乔战役加以扩大。奥尔梅多自己解释他所作的混合:590 ·"发生胡宁战役的时候我开始写我的颂歌……但一个月期间没有进展……后来发生了阿亚库乔战役,于是它的炮声惊醒了我。"玻利瓦尔在这首长诗中以希腊传说中雷神的面目出现。

> 是谁像暴风雨一样冲进战场,
> 像一位火热的长着翅膀的胜利信使
> 跨在飞翔的战马上犹如威严的神灵
> 出现在四面八方?
> 这就是他,这是战神的光荣儿子!

在《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里,诗歌的韵律和形式是古典主义的。在长诗的段落中间不只一次地安排了奥尔梅多与罗马诗人贺拉斯之间的对话。不是别人,正是长诗的主人公玻利瓦尔自己关注了古代传说形象对奥尔梅多的影响。他发现了颂歌作者有意违背他所歌颂事件的实际进程。在胡宁的战斗中双方使用的都是冷兵器。玻利瓦尔写给诗人说:"您居然在……听不到一声枪响的地方开了一炮。"

对安第斯山脉风景的描写,对那些进行过英勇战斗的山峰的描写,充满了抒情色彩。这种热情洋溢的风格显然与古典主义严格的诗句不协调。新的浪漫主义美学对第一部争取解放的拉丁美洲英雄史诗的影响,还表现在奥尔梅多迫使一个伟大的印加先辈人物瓦伊纳·卡帕克在史诗中复活。从机械逻辑的观点来看,这可能很奇怪:这个被西班牙入侵者推翻的印加帝国最后一个统治者瓦伊纳·卡帕克,会欢迎自己征服者的后代。但也存在另一种合于情理的历史逻辑:诗人把久远的印加先辈形象与反西班牙战争英雄的形象联系起来:正是这样,他确认在为争取政治独立而进行斗争的时刻美洲各族人民精神里具有特殊性的思想。

在《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里,瓦伊纳·卡帕克不仅仅是复活了的美洲历史英雄。作者还委托他说出自己的需求以及关系到奋斗中的各族人民共同命运的预言:"你们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一个大家庭,你们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儿子!"

长诗有两种版本(1825 年和 1826 年),其中在第二个版本中(增订版)增加了作为瓦伊纳·卡帕克的补充人物。这就是阿兹台克最后一位皇帝蒙台苏玛和他英勇的侄子瓜特蒙茨。第二种版本进一步巩固了奥尔梅多的在拉丁美洲历史上解放斗争传统继承性的主题。

二十世纪厄瓜多尔最伟大的诗人豪尔赫·卡雷拉·安德拉德，从奥尔梅多的《献给玻利瓦尔的颂歌》里，看到了新大陆文学的艺术特殊性的最初表现："这首长诗的独创性，形式方面是古典主义的，灵感却是浪漫主义的，高尚的思想，形象的优美，所有这一切都保证了它在十九世纪诗歌作品中的卓越地位。在美洲产生了新的诗歌，创立了新的形式。昔日殖民地的天空如印加人的幕布笼罩着安第斯山峰，在这片天空中已经没有雷声灌耳的丘比特的位置，他被瓦伊纳·卡帕克所代替，这是神谕的声音。就这样新大陆的现实和新人闯入了世界诗坛。"



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 S. V. 莱诺尔德斯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

与奥尔梅多同时代的诗人安德雷斯·贝略（1781—1865），也是一位拉丁美洲出色的学者和社会活动家。他是西蒙·玻利瓦尔的教师，他的青春年代是争取解决斗争时期思想文学生活中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作为委内瑞拉革命的外交代表被派往伦敦，后因革命暂时受挫而失去这个职位，贝略利用在欧洲逗留的机会，广泛地获取知识，后来他把这些知识全部贡献给拉丁美洲的启蒙事业。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他创办了第一批出版机构《美

洲丛刊》和《美洲文集》，那上面反映了正在美洲大陆发生的事件。发表了他的多首《美洲的席尔瓦》（席尔瓦是西班牙语诗歌中的古典格律形式之一），诗中歌颂了争取解放的美洲各年轻民族。

第一首席尔瓦《致诗神》（1827），是一篇年轻的美洲精神独立的火热宣言。作者号召神离开欧洲，把目光转向未开垦的新大陆，那里“土地尚穿着朴素的装束”。

二十多年之后，这首纲领性的《致诗神》作为第一篇被收入第一部全美洲的诗集《美洲诗集》（1846）。

在安德雷斯·贝略的第二首席尔瓦《致热带地区农艺的颂歌》里，年轻的美洲自我肯定的思想，溶化到精心描绘的祖国土地和人类劳动的画卷之中。这首农艺的颂歌是以维吉尔的《农事诗》为榜样的。

591· 对亲爱的热带土地上的植物和果实进行的详尽描述——蔗糖，香蕉，丝兰，棉花，棕榈——充满了直率的抒情，这种情感又为居住在远离故乡人的思乡情绪所加强。从对自然世界的感受中产生崇高的爱国情感，这种爱国情感又与美洲的独立和自由的思想不可分。

噢，我的美洲啊，
自由人民的年轻家庭，
在惊愕的欧洲面前，
你骄傲地扬起头颅
和自由的桂冠！

贝略是启蒙主义思想的狂热鼓吹者。在第二篇“席尔瓦”里，他热切地号召人们回到耕种土地上去劳动，因为他所属国家的人们由于战乱以及国内各种冲突而疏远了劳动。在歌颂纯洁的农村劳动的字里行间充满卢梭主义精神，他认为农业劳动是未来独立民族兴旺发达的保证。贝略是当时唯一一位不歌颂激烈战功的诗人。他呼唤和平劳动的声音显然与战争歌手们的悲壮诗句形成鲜明对照。人们时常把两个委内瑞拉人——玻利瓦尔和贝略——合并一起，看作独立时代三面神的两副面孔，一个是英勇战斗中的骑592· 士，另一个是创造性世界的歌手。但是贝略却不能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长年受内讧困扰的祖国。他应邀来到智利，这是唯一一个在争取独立战争之后国内生活比较稳定的国家，正是在智利贝略充分施展开他的文学—启蒙事业和科学活动，成为智利文化之“父”。

如果不说起在战争年代兴起的与高雅的“学术”诗歌并列的，另一类所谓“民间”诗歌，那么独立时代诗歌发展的图景将是不完整的。这就是直接

与民间口头创作相连的平民诗歌。

它的出现本身就是由历史在那时期实现的深刻进步所决定的。在最初的几年中，像马里亚诺·梅尔卡尔（秘鲁）、巴尔托洛梅·伊达尔哥（乌拉圭）这样几位独特的，互不相似的诗人即已展现身手。

马里亚诺·梅尔卡尔（1791—1815）开始时，以传统的古典主义风格写作，同时也创作了模仿高乔民间口头创作的短诗——亚拉维。

太阳（高乔印第安人主要的神）经常以存在的最初价值出现在梅尔卡尔的亚拉维里。诗人利用了民间口头文学的形象：亲爱的——鸽子，家庭——巢穴，此外他还对高乔口头文学最喜爱的体裁——寓言进行深入挖掘。在寓言《石匠和骡子》里，他以被驱赶的动物的名义，说出对美洲土著居民所受压迫而提出的公开抗议。

梅尔卡尔参加了库斯科省印第安领袖普马卡亚领导的反西班牙秘密活动，失败之后被俘，1815 年被枪决，当时他年仅二十三岁。正因为如此，不仅在秘鲁文学里，也在全拉丁美洲文学里，他是第一个把美洲土著居民口头文学手段引入西班牙语诗歌里的人。

巴尔托洛梅·伊达尔哥（1788—1822）是另一个民间平民文学的创造者，他的一生也与参加反西班牙战争相关联。他出生在蒙得维的亚，1811 年参加了 J. G. 阿蒂加斯的解放军，在他早期的作品之一《献给东方弟兄的进军》里，反映了解放军艰难的进军。以自己的充满了民族特色的诗歌载入当时的诗歌史，在这些诗歌里他利用民歌的诗节结构叙述当前事件。伊达尔哥用平民语言写作，有时甚至是粗俗的，时常以亲昵的讽刺语调谈论历史战役和历史人物。

还是在殖民地时代即已形成传统的匿名讽刺诗，不仅流行于独立战争时代的平民诗歌创作，还对当时的新闻出版业产生明显影响。最鲜明的例证之一，就是 1812 年开始在墨西哥发行的杂志《墨西哥思想家》。杂志的奠基人兼撰稿人是霍塞·霍萨尔金·费尔南德斯·利萨尔迪（1778—1827），他之进入拉丁美洲文学史不仅是以他尖刻的、讥笑殖民地社会腐朽的启蒙杂文，更为重要的是他创作了拉美第一部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产生的背景反映了拉丁美洲文学进程的特色。

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殖民统治时代（十六至十八世纪）中，在新大陆这片土地上不存在、也不可能产生小说这种体裁。按照中世纪模式建立起来的封建殖民社会的封闭、宗法制度和停滞的生活，不利于产生小说。而且还存在一纸形式上的皇家禁令：禁止在西班牙的美洲领地上撰写并出版“牵涉上流社会题材以及臆想情节内容的文字”。只是在十八世纪，才出现了道德说教性的散文作品，它们可以看作是小说的萌芽。只有在殖

民地制度的基础崩溃之后，才为以小说的形式领略现实提供了前提条件。这种情况最早发生在墨西哥，在那里反对西班牙的解放斗争带有最平民化的性质。

《佩里基略·萨尼恩托》（意为"癞皮鹦鹉"）是对腐朽殖民地社会的尖刻讽刺，于1816年面世，当时正值战争高潮。这部书是利萨尔迪的杂志《墨西哥思想家》的自然延伸，杂志在保皇党人暂时胜利的时刻被禁止。由于找不到其他进行启蒙活动的机会，费尔南德斯·利萨尔迪就着手创作小说。《癞皮鹦鹉》从形式上看是典型的滑稽小说，而从表现生活的方法上看，是所谓"风俗派"的，即描写风俗的。殖民地社会的瓦解，非正统阶层即城市贱民走上舞台，其中包括破产的移民、混血儿、印第安乞丐，匿名讽刺的流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在西班牙殖民地先进知识分子中间的广泛传播——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这部作品的产生，它在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的体裁中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形式。

593·

费尔南德斯·利萨尔迪仔细关注自己主人公的一生，从他的童年直至死亡。佩里基略是不道德、不理智教育的牺牲品，自己是破产贵族阶级不劳而食的偏见的牺牲品。那一系列把主人公推上街头，把一个有教养家庭的后裔变成滑头、流浪汉的背景条件，被作者与殖民制度的整体衰落联系起来。作为卢梭教育原则的狂热追随者，他在作品的叙述中对这些原则进行了宣传。

小说的主要部分详细描写了流浪汉佩里基略的各种奇遇。他游荡在已经腐朽了的社会大厦的所有偏僻角落，展现了一幅全面衰退的图景。费尔南德斯·利萨尔迪作为一个坚定的启蒙主义者，把希望寄托在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上。全书的最后几章描绘了合理国家结构的理想情景，就像欧洲启蒙主义者幻想的那样。

《佩里基略·萨尼恩托》作为一部独一无二的启蒙主义流浪汉小说的典范流传于世。在拉丁美洲其他地区，小说这种形式只是在几十年之后才出现，当一个新的时代——形成民族的时代来临的时候。

2. 西班牙美洲各独立国家的文学　浪漫主义的产生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末拉丁美洲迎来独立的时代，在过去西班牙殖民地领土上组成了一些独立生存的共和国。获得独立之后即开始了民族形成的过程，但这并不排除在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即已形成的拉美文学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保持至今。因此必须在两种因素——民族特殊性因素的和泛大陆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观察拉丁美洲文学发展的后续进程。

新大陆各共和国的命运极富戏剧性。它们都背负着殖民地遗产的沉重负担：封建关系的统治，种族歧视和土著印第安人被孤立，政治上没有权力，专制统治形式，普遍的贫困和没有文化。同时他们又变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殖民地后备军，成为它的农业原料附属品。拉丁美洲各国必须走一段很长的路才能真正享有已经宣布的独立，走一段以几十年国内冲突开始的路程。

当时先进分子社会活动的意义在于，不仅从社会方面也从思想上根除殖民地遗产的残余。十九世纪卓越的阿根廷作家和思想家胡安·保迪斯塔·阿尔贝蒂，是这样描述这种形势的："只掌握政治上的独立而没有工业上、哲学上和精神上的自由，这意味着有自如的双手，而头脑却被禁锢。"

独立的拉丁美洲年轻文学发展的出发点，是对民族自我陈述手段的需求。相应地出现了"文学美洲主义"和"文学民族主义"的口号和纲领。这种纲领之一就属于著名智利作家兼社会活动家何塞·维克托里诺·拉斯塔里亚，他在1842年圣地亚哥"文学协会"开幕式上发表的演说中，对这个纲领作了表述。在他提出的有关"文学民族主义"问题时的社会视角非常重要。"文学的民族特性就在于它应当有自己的生命，有特殊性，就像拥有它的人民是独特的一样，并且准确地反映人民的性格特征，反映得越准确，文学就越是人民的。需要使文学不成为某一个特权阶级的宠物，使它不局限于狭窄的人群范围，因为那样它就会由于自身的弱点而服从于有限的兴趣。"

领略民族生活的激情自然地与全美洲大陆的爱国主义紧密结合。"如果我们想拥有文学，那么它必须是民族的，它必须反映我们的习俗风情、我们的大自然，正像我们的河流湖泊只反映我们这半球的星星一样"——这是阿根廷诗人和批评家胡安·马利亚·古铁雷斯在编辑美洲第一部诗人文集时所写前言中的话。 ·594

前面提过，在准备反殖民地革命的年代新大陆的作家，由于渴望摆脱陈腐的程式化西班牙写作模式的桎梏，而把目光转向欧洲启蒙主义作家、哲学家的创作。从走上独立道路的那一时刻起，拉丁美洲作家就更加积极地引进他们的欧洲同时代人所建立的哲学和美学观点。在刚刚成立的各共和国内民族文学尚缺乏坚实的传统，残酷的国内无政府主义又破坏了社会生活的稳定，在这种条件下吸收欧洲的思想经验是历史的必然，是符合规律的，但是国外影响在拉丁美洲文学发展中的作用，被孤立于历史条件之外而绝对化了，并且被某些批评家看成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这种观点不自主地反映出传统的欧洲中心论观点，在观察新兴的各国文学必须向先进文学学习这一因素时，忽略了这些文学的特色。一些学者——佩德罗·恩里克

斯·乌拉尼亚、阿尔丰索·雷耶斯及其他一些人——经过艰苦努力确切地阐述了发达的欧洲文学在年轻大陆文学内部过程中的促进作用的规律性：在这一过程中必须经常考虑到民族因素与公共因素间的相互关系。

第一个在独立的拉丁美洲各国文学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全大陆文学方向，就是浪漫主义。雨果、拜伦在十九世纪的新大陆国家有着非常高的知名度，他们被当作政治和艺术的圣徒。但是如果在拉丁美洲没有自己繁荣浪漫主义艺术的前提，他们的影响也不会如此巨大和广泛。

浪漫主义是拉丁美洲文学史上最长的艺术时代；它在几十年间，从二十年代直到世纪末，依然保持着统治地位。

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先进的社会思潮与浪漫主义口号的自然融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些阐述各年轻共和国民族意识基础的作品在当时也获得"浪漫主义哲学"的称号。不只解放后的拉丁美洲第一代，以后的若干代知识分子，也把浪漫主义当作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艺术甚至生活的纲领。一方面是全面地领略民族生活的一切自然表现和习俗的意图，另一方面是对当前社会冲突的兴趣，对社会所遭受的残酷风暴的兴趣，两方面因素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

与欧洲浪漫主义不同，个人主义的反抗激情、个别主人公的自我表现，在拉丁美洲的浪漫主义中并没有起重要作用。新旧大陆正处于两个不同的时期——后者已经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而前者还饱受无政府主义内讧和专横的封建主义之苦。拉丁美洲浪漫主义文学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苦难祖国的命运，探索它的民族本质。

拉丁美洲各年轻共和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也决定了要对艺术现实进行一定选择，即那些与民族任务合拍的现实，决定了要对引入国内新环境的欧洲浪漫主义观点和形象进行坚决的改造。拉丁美洲浪漫主义从不同作者那里只吸取那些与自己贴近的成分、主题、形象，这样就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典型民族形象。在浪漫主义发展潮流中，所谓风俗派艺术逐步成熟起来，表现了西班牙美洲土地上形成的习俗、风尚。

拉丁美洲浪漫主义的鲜明特色是创造大自然的形象。

大自然——这是展现在艺术家目光之前的第一个最直接的现实，表现它就意味着理解自己世界的第一步。湍急的河流，高耸入云的山峰，茂盛的植被，原始森林，一望无际的大沙漠——这整个宏伟的、桀骜不驯的大自然，产生并支持着紧张的情绪，维系着对那围绕作家的独一无二的世界的狂热情感。在用艺术手段展现大自然方面，拉丁美洲作家从夏多布里昂和洪堡那里得到灵感启发。

在浪漫主义时代诗人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之中，首先应当注意到自我肯

定的渴望:“任何地方也不像在美洲天空之下那样,大自然让我们如此深刻地领略它的雄伟,它对待我们是如此的诚挚和强劲。”委内瑞拉诗人何塞·拉蒙·耶佩斯的这些话,可以用来表述大多数浪漫派作家的情绪。应该指出,这些话在措辞上也符合著名德国学者洪堡的著述。他曾经在十九世纪初到西班牙美洲旅行。

当把艺术地再现周围自然环境看作民族精神,“文学美洲主义”的最初表现之际,应当提醒的是大自然的形象在以前殖民地文学中只起微弱的作用。还是那位洪堡就注意到,在表述十六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征服南美时期的长诗中缺少风景描写。当然在十八世纪古典主义诗歌中有许多风景片段,但只有在浪漫主义文学中,大自然才成为形象地领略周围世界的基础。

民族自我肯定的另一个源泉和因素就是艺术地再现历史。历史题材对诗歌,而晚些时候(指世纪中叶以及后半世纪)也对散文起到首要作用。争取独立的战争唤起了对拉丁美洲民族起源的兴趣,对他们的历史传统,当然,首要的是对西班牙征服美洲时的情况的兴趣。正如在创造大自然形象的过程中一样,拉丁美洲作家在开发历史题材时也从浪漫主义美学中找到支持。墨西哥是在最发达的印第安文明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国家,有着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正是在这个国家殖民地前和殖民地时期题材的作品多的原因。历史题材进入散文比进入诗歌更早。争取独立的战争结束一年之后,1827 年,在美国费城发表了一部匿名小说《希科坦卡尔》,描写历史上征服阿兹蒂台克帝国的戏剧性事件之一。三十年代出版了伊格纳西奥·罗德里格斯·加尔万的第一部历史浪漫主义长诗《夸乌特莫克的预言》。它描写反抗西班牙侵略的英雄——被科尔特斯折磨致死的阿兹台克年轻皇帝。夸乌特莫克的形象在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也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他性格中的英雄气质吸引了哥伦比亚诗人费尔南德斯·马德里的注意,他在 1826 年写了同名悲剧;古巴浪漫主义诗歌的卓越代表女诗人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则把自己的长诗《夸乌特莫克》(1946)献给他。



《秘鲁印加人的后代,如今在利马一个叫彼得的西班牙人家里作仆人》
M. 吉汉诺夫绘 1818 年
列宁格勒 艺术研究院博物馆

但是十九世纪第二和第三个四分之一世纪,浪漫主义在成为拉丁美洲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方向之后,它并不是绝对无所不包的。在墨西哥

诗歌领域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长时间共存，那里在十八世纪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传统是相当稳固的。卓越的先进社会思想宣传家伊格纳西奥·拉米雷斯，就是一位坚定的古典主义拥护者，由于他激进的禁欲主义被称为“魔法师”。智利是唯一一个在社会生活方面取得相对稳定的国家，那里较早开始建立资本主义，智利散文坚决地致力于习俗描写，不含浪漫主义激情。

浪漫主义以最发达的形式出现在拉丁美洲南北两极的两个国家——古巴和阿根廷。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特殊的历史—社会形势，从而也决定了这两个国家的浪漫主义的民族特性。

596·

古巴是唯一一块在解放运动时期没取得独立的西班牙殖民地。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奴隶制度的存在有关，在奴隶制基础上维持着古巴的经济基本领域——甘蔗种植场经济。古巴社会的上层——甘蔗场主们——最为惧怕黑人起义，因此他们宁愿与殖民当局妥协。被排除在全美洲解放运动之外的古巴，长时间受着双重的压迫——宗主国的压迫和奴隶制的压迫。一些先进分子如菲利克斯·瓦雷拉、卢斯-伊-卡瓦列罗、安东尼奥·萨科由于对古巴的凄惨状况进行了批判性分析而受到迫害，作家们试图成立的文学研究院，也因殖民当局专横干涉而销声匿迹。在多明戈·德尔蒙特-伊-阿庞特(1804—1853)家中的家庭小组，就成为文学—精神生活的中心。德尔蒙特是一位天才的启蒙家、文学批评家，写过好几部长诗，他是许多年轻作家的教导者和保护者。其中第一位黑人诗人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被赎买为自由人，就应归功于他。

德尔蒙特在自己的纲领性宣言中，不承认他是浪漫主义自由诗歌的拥护者(“艺术需要纪律”)，他甚至谴责拜伦和雨果抒情诗的放荡不羁是“不道德”。但他的口号——“争取解放祖国”、“文学古巴化”——与全拉美浪漫主义的公认准则是符合的。正是应该首先从这方面评价1830—1840年间古巴浪漫主义诗歌的所谓“黄金世纪”的作品，这个“黄金世纪”是由于一些人的名字而形成的：德尔蒙特本人、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加夫列尔·孔塞普西翁·巴尔德斯、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

“锁链下的岛屿”的命运也反映到诗人们的遭遇上，埃雷迪亚被迫逃避当局的迫害而侨居国外；普拉西多被处死，因为怀疑他参与秘密活动；德尔蒙特有幸逃亡。

因此古巴诗歌压倒一切的主题就是呼唤祖国的自由：

我深受震动
心中充满愤怒

皮鞭无情地抽打
奴隶裸露的身躯

普拉西多的誓言和德尔蒙特的这些诗句发生共鸣:"……我永远不屈从于暴君,与强暴斗争永无休止……"

在埃雷迪亚的《流亡者之歌》里,祖国自由的主题得到最完美的形象体现。

何塞·马利亚·埃雷迪亚(1803—1839)无愧于西班牙语浪漫主义第一人的称号。童年时代就表现出自己的才华,他从八岁起开始翻译古希腊诗歌。成年埃雷迪亚的艺术创新,在于他放弃古典主义风景诗的传统,把大自然的形象创造成自己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在《流亡者之歌》里体现了诗人爱国热情中的怀乡色彩。远离祖国的痛楚,意识到不可征服的遥远距离——这一切就决定了诗歌抒情的紧张性:

大地在呼唤,我们凄凉的目光
遥望无垠蔚蓝笼罩的天边
那里显现出朦胧的山峰……
噢,心儿呀,你哭泣吧!那是我的祖国……

埃雷迪亚的大自然形象反映了诗人的精神痛苦,他的绝望和孤独,这个形象与其说秀丽,莫如说悲壮。在他的短诗《尼亚加拉》里就是如此,倾泻而下的强大瀑布唤起诗人个人的孤独感和被驱逐感——"没有爱情,没有祖国,我不能摆脱忧伤和呻吟"。在短诗《在乔卢拉的神坛上》也是如此,年幼诗人思索的深邃和阴暗给人以深刻印象,他思考着时间之稍纵即逝和人类生命的短促。

埃雷迪亚的抒情诗,反映了为祖国的悲惨命运担忧的诗歌主人公心情的高度紧张。他有着出众的智慧并受过良好教育,他熟悉欧洲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他从事翻译,也撰写文学批评文章。

与他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巴浪漫主义"黄金世纪"另一位卓越代表人物加夫列尔·孔塞普西翁·巴尔德斯。他是个无家可归的贱民,自学成才,以笔名普拉西多著称(1809—1844)。这是一位典型的民间即兴作者,他的诗具有辉煌的优美形象性。埃雷迪亚是把诗歌作为表现内心世界,表现有关客观存在的矛盾的思考工具,而普拉西多的动机则是直接地表现日常的周围生活,表现它的喜悦和悲伤。埃雷迪亚的语调是激动、热情的,而普拉西多的语调则是柔和的,低沉的。但当两人描绘祖国宝岛的大自然时,歌

颂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斗争时，就自然地显现出他们诗歌动机的共同性。普拉西多广泛运用民间诗歌的各种形式——浪漫诗，以及讽刺、寓言等。有一首最著名的《希科坦卡尔》，就是用浪漫诗的形式写成，诗中歌颂墨西哥印第安反抗运动领袖。正当西班牙当局肆虐横行，压制反抗情绪的时刻，普拉西多却向世人提起相邻民族不屈服于入侵者的古代先人，有其深刻的用意。他本人就因参与反政府的阴谋活动的指控而被处以极刑。

古巴的历史现实是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在岛内取消奴隶制，二十世纪来临的前两年才消灭了西班牙暴政。抚育着爱国抒情诗的解放战争持续了三十年。这样，古巴的浪漫主义就比正常情况延长了五十年，其中第一个"黄金的"十年产生出最优秀，最独特的成果。

古巴那一时期浪漫主义风俗派散文的典型样板，是西里洛·比利亚维尔德(1812—1894)的小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1839 年出版前半部)。主要的情节线索是描写一个年轻美丽的黑人—白人混血儿，"青铜圣母像"和一个发迹的商人的儿子之间悲剧性的爱情。贯穿整个小说的是对国内歧视黑皮肤居民的强烈抗议，抗议种族主义者的偏见。四十年后又出版了小说《塞西莉亚·巴尔德斯》的后半部——古巴最激进的废奴主义作品。

还有一部古巴浪漫主义时期的典型作品，充满反奴隶制精神的小说《萨福》(1844)，出自女诗人赫尔特鲁迪斯·戈麦斯·德·阿韦利亚内达(1814—1875)的笔下。它的主人公——一个黑人——拥有异常的高尚和勇敢的品格。一个被歧视、被压迫种族的儿子身上笼罩着优美和献身精神的光环。在他对一个白人女人的悲剧性爱情和最终结局中，蕴含着对可耻的古巴奴隶体制的坚决谴责。

阿根廷是拉丁美洲浪漫主义的另一个策源地，在这里它是以综合的形式出现的，包括了民族文化最初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诗歌、散文、哲学、美学创作。

阿根廷浪漫主义的公认领袖，是诗人和哲学家埃斯特万·埃切维里亚(1805—1851)。作为欧洲先进社会和艺术思想的宣传家，他把这看作建立民族文化最重要的支柱。"美洲应当借鉴所有能满足她要求的一切事物，为了认清自我并为自己照亮前进的道路，美洲应当高擎人类理智的火炬前进。"他的这一思想，首先在 1837 年"青年阿根廷"协会成立大会的开幕式上发表的著名演说《象征性的言词》中作了表述，后来又加以扩展并发表在论文集《社会主义原理》(1846)中。当时又出版了对它进行补充的埃切维里亚的著作《1837 年以来拉普拉塔知识分子运动的回顾》。两部作品依据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对包括阿根廷在内的美洲西班牙殖民地历史命运进行了分析。也正是在那个年代，批评家胡安·马利亚·古铁雷斯正式提

出了初生的阿根廷文学的任务和目的。埃切维里亚还发表了一系列美学方面的文章。

浪漫主义"1837年的一代人"的经历充满戏剧性,该组织后来又以它的成立日期作为组织名称——"青年阿根廷"或"五月协会"(1810年5月是阿根廷解放战争爆发的日子)。年轻的作家们刚刚登上社会—文学活动舞台,立即受到阿根廷以至全拉丁美洲最凶恶的暴君之一——胡安·曼努埃尔·罗萨斯的直接打击,作家们被迫侨居国外,其生命的大部时间是在异国他乡度过的。"1837年的一代人"中的诗人们的政治抒情诗,充满紧张情绪,感情充沛,猛烈抨击暴君与对祖国的思念结合一起。

何塞·马莫尔对暴君的诅咒饱含火热的激情。埃切维里亚对阿根廷人屈从于暴政当局而深感绝望,他在流亡中向阿根廷青年发出呼吁。

诗歌在诗人们看来也是政治行动。两位诗人时常使用号召书、公开信这样的形式,不是偶然的。如果谈论浪漫主义时代阿根廷文学真正独特的发明,那么这些发明与用艺术地掌握阿根廷民族生活特点有关,这些特点以"潘帕"和"高乔人"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来界定。

在南美洲占据拉普拉塔河流域大部面积的广袤的潘帕草原上,几个世纪以来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居民阶层——高乔人。高乔人的祖先是西班牙占领军的士兵,被殖民当局安置在这一地区是为了保卫从印第安人手中夺取的土地。潘帕草原上的印第安居民与美洲其他区域的土著相比,还处在较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长久保持着原始人的好斗性。在以布宜诺斯艾利斯为中心的沿岸发达地区和无边无际未开发的潘帕草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可逾越的差距。俄罗斯旅行家和作家彼得·奇哈乔夫描写了上世纪中叶的潘帕草原,在高乔人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了"原始放牧狩猎生活的有趣例证,这种现象大部分只保留在历史传说之中"。 ·598

无边无际的壮丽草原,自由自在的居民,所有这一切都为浪漫派作家的诗歌灵感提供了巨大的源泉。埃切维里亚的长诗《女俘》就是浪漫主义的第一部重大创作。

在《女俘》中潘帕草原不仅仅是情节发生的地点,同时又是参与情节发展,决定着主人公命运的活的力量。

作品的基本冲突在印第安人与充满豪迈、勇敢精神的高乔士兵之间展开。他们的首领伯里安被俘,他的妻子马丽亚来解救他,他和她一起逃跑。伯里安在路途中死去,马丽亚由于在此之前印第安人杀死了她的婴儿而失去理智,也死了。

伯里安和马丽亚的整个苦难经历不仅是在草原的背景下,也是在它强大力量参与下展开的。无比广阔的拉普拉塔草原尚未被人类征服,因此它

具有统治力量，这个现实就决定了大自然在《女俘》以及其他浪漫主义作品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草原的空旷无垠引起人的孤独感，这正是浪漫派作家的典型情感。埃切维里亚受到欧洲浪漫派作家的启发，整个《女俘》和个别章节的题头词，用的就是拜伦和拉马丁的诗句。用艺术手段再现阿根廷的大自然——这就是埃切维里亚对以他为带头人的民族文学发展的主要和决定性的贡献。

直到后来潘帕草原和高乔人仍然是阿根廷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题材，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那个时代在拉普拉塔还有另一种类型的诗歌——民间平民诗歌继续发展。在与民间口头创作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所谓“高乔诗歌”，在伊拉里奥·阿斯卡苏比的创作中获得特殊的体现。“高乔诗歌”的历史自二十年代的巴尔托洛梅·伊达尔哥开始，终于 H. 埃尔南德斯创作的宏伟巨著的长诗《马丁·菲耶罗》(1876)。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末尾，阿根廷文学还提供了一部作品，它不仅成为阿根廷也成为全拉丁美洲哲学—艺术思想的典范。这就是多明戈·福斯蒂诺·萨米恩托(1811—1888)的《法昆多》，1845 年出版于智利。

这部书乃是抨击性政论和艺术性表现手法的融合。详尽的地理—民族学、社会学特征、历史考证和主人公——阿根廷二十年代政治活动家法昆多·基罗加——的罗马化传记结合一起。

萨米恩托的理论在副标题《文明还是野蛮》中已经提出，而在第一章中即已展开，这一章的标题更像是学术论文“阿根廷共和国的自然特征以及它所产生的特殊性、风俗和思想”。萨米恩托的出发点，就是确认国家的自然条件对它的社会组织、历史的决定性作用。空旷荒芜的潘帕草原对萨米恩托来说就是民族生存的主要负面因素。

“荒原从四面八方围绕着这个国家，甚至深入到它的内部领土。渺无人烟的巨大原野找不到一幢供人居住的房屋，这一般就是各省之间的天然界限。一切的一切都无边无际：无边的平原，无边的森林，无边的河流，地平线永远是模糊的，被烟雾笼罩着，这烟雾使你分不清大地和天空的界限。”据此萨米恩托作出第一个结论：“广袤无垠就是阿根廷共和国所遭受的不幸。”

这个不幸完全是具体的。空旷的土地虽然蕴藏着巨大的自然资源，却不被利用，它不能增进国家的经济：“……荒野的大自然还要长久地强迫人们遵从它的规律，文明的影响微不足道，成果甚微。”野蛮的根源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所有领域都与文明的载体——城市发生矛盾，城市

599 ·

是商业、教育、社会学术的中心。在潘帕草原和城市（这里首先是指强大的、已经繁荣起来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之间存在着不可化解的矛盾和敌意。

在萨米恩托看来，城市和潘帕草原居民之间的差异有非常关键性的意义。在蛮荒的原野上人们经常面对危险，形成了一些习惯于暴毙的人群。这就是草原居民——高乔人的残酷、勇猛、宿命论性格的根源。

这部书的主人公法昆多·基罗加就是潘帕草原的产物，他嗜血成性，好报复，粗野；他的举止更像一头野兽，而不是人。他靠阴谋和暴行在阿根廷广阔的领土上夺取了无限的政治权力。只有另一个更加狡猾的暴君，刽子手胡安·曼奴埃里·罗萨斯能够战胜他。罗萨斯用血流成河的残酷阴影覆盖了阿根廷几乎两个十年的历史。

萨米恩托关于野蛮和文明的斗争是历史的动力的理论表现出合理的简单化倾向。这是典型的浪漫主义对比手法，虽然其中也包含了带有实证主义特色的现实主义的观察和表述。


萨米恩托照片

《法昆多》浸透着欧洲的社会和艺术思想。作者时常引用雨果、司各特、夏多布里昂、勒南的著作。但是有一位作家——库珀，萨米恩托把他当作自己的战友，作为艺术家库珀的世界与他自己的世界是吻合的。萨米恩托写道："费尼莫·库珀把自己书中的情节，从被种植园主占领的地方移植到土著和萨克逊两大种族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争斗的疆域。"因此阿根廷作家在库珀的众多人物身上，找到了许多与南美潘帕草原居民在风俗习惯上的共同之处。当然类似的比较有相当大的局限性：库珀关于野蛮与文明斗争问题的观点和萨米恩托的理解是不相符的。美国作家已经明白资本主义进步的劣根性，至少在道德方面，但这种比较本身是有意义的。

萨米恩托的《法昆多》，对以后拉丁美洲整个文学和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几乎立即在欧洲获得反响。1846 年就在法国《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书刊目录文章，文章中对《法昆多》的评价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新颖作品，历史资料丰富，诸多耀眼的形象和色彩，是一部有趣的小说"。

六十年代在伦敦出现了《法昆多》的英译本，在巴黎更早，1853 年就翻

译了这部著作。根据这个译本发表了该书的俄文节译(《俄罗斯地理学会学报》,1853—1854年)。这样拉丁美洲文学在十九世纪前半世纪末就提供了一部创作,它的意义在国外,甚至大陆之外都得到理解。“这部巨著成为当时的经典之作。它过去和现在都是所有对美洲所遭苦难的进程、原因、后果感到不安的人们关注的中心。”(佩德罗·恩里克斯·乌拉尼亚)

600·

3. 巴西文学

从1800年到1822年(也就是巴西宣布独立的年代)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葡萄牙殖民地居民为争取国家的独立而进行的顽强斗争。虽然巴西人取得独立的过程避免了公开的军事冲突,但在此之前的人民起义、军事政变以及独立派人士积极的政治活动遭到过残酷镇压。

1808年,葡萄牙王室为了逃避拿破仑的入侵而迁到巴西。摄政亲王,后来又是国王若昂六世,被迫开放巴西港口,并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以活跃殖民地的经济及文化。在里约热内卢兴建了印刷厂,开始出版发行报纸和刊物,开办了国民图书馆、博物馆和一系列学校。读者的范围扩大了,文学生活也进入新的阶段。

在尝试运用诸如抨击文章、小品文、政论和文学批评这样一些对巴西人来说新鲜的文学体裁过程中,地方的政论作家追随着欧洲启蒙主义文学的榜样。修道士鲁亚基姆·拉贝洛-依-卡奈卡(1799—1825)的《皮菲亚至达曼书简》(1823),就以火热的激情和政治上的激进主义著称,他数次参加反对葡萄牙,反教会的起义,由于试图在巴西北部六省宣布成立共和国(所谓“厄瓜多尔联邦”)而被处死。

这些年他也发表许多诗歌,但大都不超越古典主义仿制品的范围。十八世纪后半叶的巴西古典主义运用了广泛的体裁体系,充满探索精神,艺术成绩卓著,此时已被另一种文学所代替,虽然内容丰富,但美学上还不成熟,是模仿性质的。用习惯的颂歌形式的华丽辞藻传播启蒙主义思想,在抒情诗里复述着从贡萨加那里学来的阿那克里翁玩乐诗体和田园歌主题。这种继承性还突出表现在诗人们隐藏在其中的臆造出的乐土居民的名字。例如以笔名亚美利科·埃利济奥发表的《亚美利科·埃利济奥诗选》(1825),就出自荷塞·博尼法西奥·安德拉德(1763—1838)的手笔,这是一位学者和政治活动家,巴西政府第一任首脑,日后被人们称作“独立之父”。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新艺术、新思想的气息已经传到巴西人身边。当时著名的传教士弗朗西斯科·德·蒙特·阿尔维涅(1784—1857)的演讲和

文学活动，对年轻人的思潮有很大影响。他是夏多布里昂的狂热追随者，在自己演说和布道时，公开表示出对个性的新理解。虽然他不公开地违背教义，但赋予天主教以个人宗教的色彩，甚至是宗教情绪。他在听众心里启发的这种宗教情绪与对和谐的渴望相联系，它作为一种深刻的、按本质是主观的美学情感产生于对自然的观察。年轻的诗人们纷纷奔向这位布道者，他后来与著名的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和波尔托·阿列格雷保持通信联系，促使他们理解浪漫主义思想。

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巴西是在众多的群众起义过程中度过的，这些起义的目的就是争取共和制或联邦制的国家管理体系。最著名的有发生在巴西南部的十年"法拉波斯（穷人）战争"，年轻的加里波第参加了这场战争。所有各阶层居民都不满唯葡萄牙马首是瞻的第一个君主，再加上在葡萄牙发生的威胁王朝利益的事件，迫使佩德罗一世于1831年放弃王位。到四十年代末，由于通过了一系列宪法限制并彻底摆脱了过去宗主国的制约，佩德罗二世王朝才逐步稳定下来。

如果说，在这些暴风骤雨年代迅速形成了民族的话，那么在文学领域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巴西的"这一术语只是在这些年才被广泛运用。文学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巴西文学"，它探索新的美学体系，在这种体系之下文学能够表现新的民族品格。这种探索最初是以理论形式进行的，只是到了这个时期的末尾才出现了第一批艺术成果——第一批诗集，第一批剧本，第一批小说。巴西浪漫主义艺术上的腾飞发生在五十至六十年代。这样，它的发展是滞后的，民族浪漫主义原则的内部成熟过程拖长了，但是在巴西既能确切地观察到文学运动与社会进程的直接联系，也能观察到先进的欧洲思想的作用，还有，也是最重要的，正在形成中的民族需求的决定性作用，这种需求决定着如何选择、掌握和改造所有引进的事物。 ·601

"中间人"促进了浪漫主义思想向巴西的渗透，这个现象被称作"法国—巴西前浪漫主义"。1816年一个法国艺术考察团来到里约热内卢，它的成员居住在蒂若卡郊区，很快组织了一个对巴西风情感兴趣的艺术家、作家、批评家们的营地。这个小组成员写的书——泰奥多尔·托奈的《巴西田园诗》（1830）、埃德瓦尔德·科比埃（未来诗人特里斯坦·科比埃的父亲）的《巴西悲歌》（1823）、达里埃尔·加维和菲利普·布歇的历史小说《雅卡莱或图皮南贝》——本来是面对法国读者的，但这些书在巴西也很著名。两位熟知葡萄牙语并深入研究过巴西文献的法国批评家起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位是斐迪南·德尼，他在自己许多随笔中试图把夏多布里昂的抒情风景和洪堡《自然图景》的优美结合起来。斐迪南·德尼的《热带自然情景》成为浪漫主义大自然观念的基础。1826年在巴黎发表了《巴西文学简史》。他

指出，巴西人民拥有取得艺术独创性的一切条件：激发诗意情感的宏伟大自然，充满各种事件的历史以及人种方面的特色。德尼的这些思想受到葡萄牙浪漫主义权威人士阿尔梅达·加雷特的肯定（他写道："这个广阔国家大自然的宏伟画卷能启发诗人们写出有更多独创性的作品，提供非凡的形象和语汇……"）。阿尔梅达·加雷特的这些思想成为巴西浪漫主义纲领的基础。

第二位是法国的美洲学家欧仁·德·蒙格拉夫，他把十八世纪巴西文学的两部主要作品译成法语：贡萨加的《迪尔塞乌的玛丽莉娅》和圣塔-里塔·杜朗的史诗《卡拉穆鲁》。回国以后，他成为法国历史研究所的奠基人之一并担任学术秘书，继续宣传巴西文化。1834年他建议三位在法国学习的巴西知识分子进入历史研究所担任通讯研究员，并讲授巴西科学、文学、艺术课程。从1836年他们开始出版一份科学—文学—艺术杂志《尼泰罗伊》，它的口号是"一切通过巴西，一切为了巴西"。在这份杂志上（只发行了两期）正式提出了巴西浪漫派作家的纲领。

这个纲领的某些论点已经在巴西各种出版物上有过表述（虽然并未充分展开）；《尼泰罗伊》的成员之一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把它们加以概括，在《论巴西文学历史》一文中提出了两个根本问题："巴西能够激发起自己诗人们的想象吗？巴西本地人有诗歌吗？"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为正在形成中的民族文学提出了"有效原则"（他自己的措辞）：大自然和印第安人。所有的旅行家都认为巴西的自然环境是独一无二的，它拥有强大的鼓舞力量。印第安人创造了自己的传说，这些传说也是巴西文学的当然财富。面向大自然，面向印第安人就会使巴西文学变得突出，保证它的独创性。

从这一时刻起，民族独特性思想就成为巴西浪漫派作家的主导思想。在以后的几十年间，批评界对这个思想进行了讨论，虽然有时发生激烈的争论，但事实上巴西文学中所有重大的作品都是在这一思想的激励下产生的。个人主义，以及蒙特·阿尔维涅在年轻文学家心目中灌输的个人精神自主思想，也贯穿了一种特殊的、诗意的民族主义。祖国感似乎成为确认个性的力量，透过它个性把自己与世界相对照。

巴西浪漫主义的历史始自1836年，在这一年开始发行《尼泰罗伊》杂志，多明戈斯·若泽·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1811—1882）出版了诗集《诗意的叹息和思念》。马加良埃斯并不具有很高的诗人天才，他远未能实现他自己所制定的美学纲领。此外他的书是在欧洲写就的，书中不少篇幅被观察希腊或者罗马废墟时引发的思考所占据。但诗的情调是新鲜的：这是一首永远明快的、甜蜜的思乡曲。欧洲的自然景色引起诗人对巴

西热带雨林无可比拟的景色的回忆，回忆起他在祖国度过的童年。诗人思念祖国。后来另一位浪漫派诗人安东尼奥·贡萨尔维斯·迪亚斯在短诗《流放之歌》(1846)中总结了这种对民族财富的诗意情感，这是巴西诗歌的瑰宝，所有语文教科书都以它作开头。这首诗富有奇特的音乐性，纯朴，由几个稍加改变的句子组成，每个巴西人自童年时代起就把这首诗深深铭记在心。 ·602

《流放之歌》的题头词取自歌德《威廉·迈斯特》中的米尼翁之歌。它的作者也幻想着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去。但这不是意大利，不是古典主义和谐的理想境界，也不是与现实世界对立的纯粹梦幻，而是他自己的祖国——那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家。"我们的天空星星更密，我们的草地鲜花更多"——诗人的情感正是以这种天真的直接观察打动人心。对他个人经历中的事实所作的曲解也颇具特色：他根本不是被流放者（和早些时候的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一样），他也曾在欧洲学习，但对巴西浪漫主义意识而言，任何形式与祖国的分离都是流放。

与对民族情感的主观感受线索，即抒情线索几乎同时，在巴西浪漫主义创作中也产生了习俗描写的线索，艺术家的目光指向个性之外，描述性内容超过了表达性内容。在年轻的、刚刚建立起来的国家中的生活特色，习俗风尚方面不同种族成分的古怪结合——所有这一切都吸引着艺术家的注意。习俗描写产生于浪漫派作家对所有富于民族特色的事物的兴趣，对传统和民间创作的兴趣。巴西习俗描写的特点是喜剧性或者感伤性的色彩，更多的是二者兼有。作家发掘自己人民生活中可笑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方面，但又欣赏这个生活，就像是欣赏儿童嬉戏。

习俗描写的产生还与争取民族戏剧的斗争相关联，贡萨尔维斯·德·马加良埃斯和《尼泰罗伊》的其他成员也参与了这个斗争。斗争以胜利告终：自1837年起两所剧院开始活动，政府把彩票收入转让给剧院作为财务支持。保留剧目中的重要部分是路易斯·卡洛斯·马尔丁斯·佩纳(1815—1848)的独幕喜剧：《乡村司法官》、《乡村节日上的家庭》、《英国人司机》、《复活节游行中的犹大》以及其他等等。马尔丁斯·佩纳还写过几部歌德风格的正剧，但他的荣誉主要与风俗喜剧有关。

马尔丁斯·佩纳短剧的题材摇摆于风俗喜剧和闹剧之间，纯朴，传统：寻找婚嫁的成功对象，两个姑娘的竞争——一个朴实，另一个卖弄风骚，理智和情感的斗争等等。有许多闹剧性的混乱场面，化装，偷听，突如其来等等。但是爱情风流韵事在马尔丁斯·佩纳的世界之中并非关键。主要的是环境，它决定着相爱双方的命运。而环境是无数民间节日和风俗的场景：复活节游行，各种圣灵节和圣汝安节，农村盛宴，联欢等等。环境也是社会

人物类型的画廊，从农场主到假币制造者，马尔丁斯·佩纳对许多社会新举措持坚决的批判态度：刚刚由政府建立的农村民事法庭由于法官的无知和愚蠢而变成了一场闹剧，民族近卫军的军官和士兵公开利用自己的官衔进行讹诈和勒索，在首都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官员阶层，他们以自己的开明自豪，而事实上只是奴颜婢膝地模仿宫廷贵族，如此等等。一些剧中人（例如《塞塔涅斯在首都》中精力旺盛的商人）直接批评政府，认为它要对巴西人民的落后、愚昧负责。但是马尔丁斯·佩纳的批判态度，并未演变成痛苦的失望和从整体上否定巴西社会。剧作家对这个尚未安顿就绪、管理不善，但又十分自然而生动的世界保持着柔情。

第一部巴西习俗描写性小说，是若阿金·曼努埃尔·德·马塞多（1820—1882）的《褐色女郎》（1844），取得在当时说来巨大的成功（在作者生前曾八次再版）。在那之后接着又出版了《金发少年》（1845）、《两次爱情》（1848）、《罗萨》（1849），以及这位知名高产散文作家的几十部其他的作品。马塞多倾向于感伤主义的习俗描写，在他的风格中隐现着各种模仿的痕迹——从葡萄牙文艺复兴时代的田园诗到乔治·桑。马塞多小说的情节，都发生在首都，在喧哗的街头，在豪华或者简朴的客厅里，在大学生的聚餐会上，在家庭舞会上。主人公一般是大学生，来自外省并保持着对童年爱情感人的忠诚。马塞多也不乏批判精神，但主要集中在家庭和风俗结构的恶习方面：贵族的自负，家庭专制，追逐未婚夫，贵族夫人们的任性和粗鲁的天真，摩登医生们的骗术等等。

603·

马塞多有幸创造的这个形象成为巴西文学中的原始样板之一，以后的每一代巴西作家都要对它加以再创造。这就是他第一部小说中的褐色女郎卡洛莉娜，她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马塞多的所有著作中，是巴西型的女人的体现。她有一对黑辫子、绿眼睛，面部线条不规则，但姿态却无限优美——从此她就以这种面貌出现在十九和二十世纪艺术家们的想象之中。马塞多的褐色女郎有些神秘、调皮、敏感，表面风流，但敢于爱并力争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形象还只是一幅草图，一个女人类型的轮廓，但这个轮廓也令人神往。卡洛莉娜的绰号——褐色女郎——从那时起就成为标准语和家庭日常用语的普通词汇。

马塞多还发表了一部历史小说《穿短外套的女人们》，生动描绘了殖民地时代的里约热内卢，相当尖锐地批判了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葡萄牙当局的舞弊行为。情节建筑在揭露巴西总督之一的宠儿的罪行之上。小说充满对各种节日和风俗的描写，广泛引用了反葡萄牙讽刺诗的片段。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巴西文学已经摸索出达到民族独创性的道路。民族独创性是文学的主导思想，但它不排除对巴西当代现实的批判态度。

民族独创性所要求的不是辞藻华丽的歌颂，而是要求艺术家深入吸取民族现实，发掘它的特色和内在力量。巴西艺术面临的这个任务要在之后的几个十年中才能完成。

第七编　东亚、东南亚和中央亚洲文学

本编序言

适用于十九世纪"远东文化圈文学"概念的文学，有中国文学、朝鲜文学、日本文学，这一时期在清朝统治下发展起来的西藏文学、蒙古文学，以及在相当时期内传统上与该文化圈相连的越南文学。

这一时期对所有远东国家来说，都是旧的封建关系发生危机的时期，是西方欧美资本力图渗入这一地区的时期。东印度公司和其他英国商行继续敲击中英通商贸易的大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剧增。1838 年清朝政府在广东的全权代表林则徐采取果断措施反对这一行为，导致所谓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战争以强加给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结束：对英开放五个主要港口，香港归英国管辖一百年。上半世纪英法美等国军舰还多次出现在朝鲜各海岸，要求为自己开放通商口岸。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美国以炮击沿海城市相威胁，试图深入日本。结果日本于 1854 年为美国舰船开放了两个港口。从十九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起，越南政府就企图向欧洲人关闭自己的国家，但在五十年代末法国把自己的大型舰队派往那里，以其奠定了越南殖民化的基础。上半个世纪强大的农民起义浪潮("白莲教起义"和"天理教起义")席卷远东各国，仅 1841 到 1849 年发生于一个国家的起义和暴动，就达一百一十起，日本在三十至四十年代与个体农民的行动同时，在各大城市掀起了反对城市富人商贾的"米骚动"，朝鲜农民的起义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特别强大的是 1811 至 1812 年发生的由洪景来领导的起义)。上半个世纪只有越南较为稳定，出现了 1802 至 1820 年的经济高涨时期。

反对西方列强殖民政策及压制国内人民反抗的斗争，强化了文化文学发展中的保守主义倾向。所谓强调继承传统，其实强调的是传统中最保守的成分。无论是中国、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的文学，都在中世纪民族传统的

轨道上，在儒学强大的影响下发展；然而，也不能认为儒学的影响都是彻底反动的。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在越南，儒家学说的理性主义与基督教的强大影响相对立，对基督教神话的批评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有时候儒学内容只是外部表现，诗人们（如阮公箸）歌颂的还是努力为国立功的有识之士，往往是一些以文学语言作诗的儒家学派诗人，提出一些发出全民心声的主题。就是在中国，爱国主义和公民思想也是通过与儒学相连的高雅文学表达出来的。

在地区文学中，通行的依然是以公文体裁（文学像从前一样包括了直到上报皇帝的奏折在内的所有书面文字）为主的中世纪文学体系，下层大众文学受到排斥，有时遭到禁止，直至取消和焚毁。在这远东和西方文明发生不可避免冲突的时期里，也出现了个别运用新词汇写外国主题的作品（中国的张维屏，越南的高伯括）。总的说来，远东国家的文学（包括当时依附于中国清朝政府的西藏和蒙古），是在整个创作清规戒律十分严格的复杂条件下发展的。而且除了少数的例外，文学同现实生活的联系非常间接。诗歌中盛行的传统主题，成功地转述了历代著名诗人笔下的形象，比新诗作品更受青睐。文学中没有出现新的体裁，也没有出现足以表明文学发展新阶段的、有独到见解的作品。当时远东文化圈的文学，还是在与西方和其他地区艺术创作相隔绝的情况下发展的，以描写西方和俄国事件为内容的个别作品（越南的菲利浦·宾，日本的佐久间象山），无法引起社会共鸣，而在西藏文学中仍然沿用印度情节和形象，不过不是从当代新印度文学而是从古代梵语文学中取材。

605·

同以往各世纪一样，区域内各文学间的联系基本上是单向的：中国文学依然在区域内（除西藏）各文学中，以两种存在方式广为流传，它既是以地区共同语——文言文写出的古老文学（朝鲜的汉文，日本的古文以及越南的汉文），又是为地区各语种文学提供翻译和改写情节的文学。这种双重性与中国文学发展的一定特点有关。如果说以文言文写成的无情节高雅诗文，不加翻译就易为邻国读者所接受的话，那么以接近口语的语言所写的大众文学（中长篇小说，戏剧作品）就要求为异语读者做一番翻译工作。与中世纪晚期文学的特点相适应，地区文学像从前一样，以两种语言向前发展：规范的地区共同语和生动的地方语。此时的藏语对蒙古人起了文学语言的作用。1719 年起，满语成为蒙古人的官方公文语言，只有藏语文学还保持着中世纪文学的特点。用规范藏语创作，虽然里面也出现了某些新倾向，比如贡唐·嘉措·丹白准美运用多种语言，写了四个佛教徒的戏剧性对话，不过这种新质也是对老规矩的遵循，因为古印度的戏剧就是以多种印度方言来写的。

同十八世纪一样，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交往中，起首要作用的是中国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恰好在这时出现了这类作品的整套蒙文译作(《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从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保存的书目索引(截止 1840 年)可知，这一阶段的汉译蒙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将近二十部，这些译作既创造了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首批蒙文长篇小说的前提，也为以古代中国长篇叙事诗情节为基础的、东蒙民间口头故事奔森·乌力格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

早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日本就出现了一批最为普及的中国长篇叙事诗和长篇小说译本。十八世纪首译的英雄传奇《水浒传》到十九世纪上半叶已是空前普及。1828 年出版了由著名长篇小说家马琴完成的译本，1829 年又出版了两种新译本。继这些译作之后，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改写本(日本出版这部长篇叙事诗的第一批改写本，是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1799 至 1801 年出版《忠义水浒传》，1850 年也是由马琴完成了全部主人公都是女子的《女水浒》[①]。从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日本出现了不下五种接近原著的转述本和将近十五部较远离文本的改写本(包括为孩子们而作的)。在当时的出版物中，其他一些中国长篇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的改编和缩写，也占有不小地位。这些作品的故事发生地搬到了日本，主人公也是日本人，有时候连情节也改编得相当随意。这是一个接受和创造性地运用邻国文学经验的特殊阶段，是改编和民族化缩写与原著直译共存的时期。中国小说与地方民间创作一起，继续以其情节冲突滋养着日本文学，同时异域情节赋予日本作家的，往往也仅是某种冲动(有情节联系的只是作品的开端，情节的后来发展所遵循的，则是纯粹的日本叙事逻辑)。马琴的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就是这样写的。小说的开头是一个四世纪中国著名图腾传说的日本化改写，写一个公主和一条救国公狗的姻缘。在故事开篇，马琴运用了《水浒传》里的一些情节调转，这些情节影响到一批水平不一的长篇小说。 ·606

中国文学在地区的领先，由来已久，从各朝各代到十七至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上半叶却显示出了中日文学发展中的一定平衡。尽管有诸多禁止和限制，尽管文学与社会的联系还十分间接，日本文学作为具有鲜明滑稽手法特点的城市文学，还是有了长足发展，并开始超过地区其他文学，积累着新的品格，使它在明治资产阶级革命后得以闻名于世。

---

① 我国有学者认为，《女水浒》是 1783 年由伊丹椿园首作。——译注

第一章 中国文学

1. 文学过程概述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保留着中世纪特点，而且在民族传统的轨道上发展，是综合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于儒学思想体系的文学是传播官方理念的强有力手段，就是那些敢于离经叛道、推进启蒙思想的文学家，也都具有儒学的共性。适应儒学观念虽然使文学有了声望，但也在一定意义上起了功利作用。文学首先作为道德完善的手段，作为支持和巩固某些规章制度的工具而得到重视，那些规章制度则用儒家学说来调节国家、人民和个人的生活。当时佛学和道学对文学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的影响，与儒学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源于过去的思想创作原则，已规定了文学要仿造过去的事物。书本学问体现的原本是接受时代检验的艺术经验，这时却成了远远高出现实生活知识的东西。受鼓励的是对过去文学杰作的模仿。体裁、形式、形象、情绪、词汇，一切的一切都得采用列祖列宗的。

叙事散文和戏剧集中关注的是再现程式化的典型。一般来说，创新仅限于某个作家放弃一些已经顺理成章出现的形式和体裁，开始用另一些业已陈旧，只是看似贴近新生活的形式进行创作。文学创作中盛行着对形式的崇拜。形式越精细，越符合标准诗学要求，越接近刻板公式，就越受到赞赏。

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两股基本潮流继续并存。第一股是高雅文学潮流，包括古典诗词和无情节散文，后者又有古文和称作骈俪文的韵文之分。这些体裁的作品是用古旧的书面语文言文写成的。第二股潮流是民主主义潮流，包括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以杂剧和传奇为主要体裁的戏剧。这种类别和体裁的作品，大多用接近活语言的白话创作。

儒家美学将这两股潮流严格分开。从事古典诗歌和无情节散文创作被看作正当事业，以其创作出的作品归于能够体现儒家真理——道——的高雅文学。长短篇小说非常普及，但不讲艺术优点的儒学传统，认为它们无权称为真正的文学。不过在实践上，某些作家创作中两股潮流的清楚界线，却可能消失得荡然无存。正统儒学把支持“国粹”当作自己的责任。中国的文学有意孤立自己，使它蒙受了重大损失。十九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中已能看出明显增长的孤立主义情绪。享受过早期清朝皇帝优待的基督教传教士，已失去昔日在朝廷的影响，并遭到驱逐。甚至当新情况已经唤

起中国将视线转向西方的时候，落入中国先进人士视野的也仅是西方文明的物质价值，而不是它的精神价值。宫廷收到俄文藏书或者由传教士报纸刊登的几首译成中文的《伊索寓言》，都是一些引不起什么社会反响的偶然片断。

禁锢于陈旧美学框框又失去外部刺激的文学，只能是自身的再造。这一时期文学作品颇丰，但在整体上无法同以往各世纪的杰作相匹敌。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作家，也表达自己对周围现实的态度，但如果不借助先辈的声望，不会引用儒学经典为己所用，他就要冒同代人听不到他声音的危险。不过我们还是得肯定，旧文学的坚石出现了裂痕。“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中国生活的巨大影响也不能不给文学留下印记。古典诗词和无情节散文中表现最为强烈的启蒙观点，一步步为自己开辟了道路。

2. 高雅散文

这一时期和前一时期一样，中国文学生活中起先导作用的是桐城派（见本书第五卷）。桐城派的人数不断增加。桐城派人士的世界观基础是正统的宋代儒学，他们赞同对文学的纯理性和功利主义的理解，把它看作儒家思想——道的载体。他们认为，古代无情节散文最能通过语言表现他们的思想。他们把艺术创作的特征概括为一个简单而生硬的公式——义法论。桐城派的奠基人方苞引用《易经》的“言有物”、“言有序”来解释它，“物”（义）指的是儒家思想，也就是文学的内容；“序”（法）指的是古代散文所固有的形式。

桐城派的公认首领是姚鼐（1732—1815）。他死后五年出版了他编纂的《古文辞类纂》，这部著作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姚鼐追随他的老师，认为成就作家的决定性因素，是研修儒家的“六经”，认为只有它是唯一能表达道统的东西。姚鼐从本质上发展了桐城派的文学理论。在谈及诗与散文本质一致这一思想时，他论证了诗包括在正统文学范围，也把它作为儒学道统的载体加以阐释。他用编辑《古文辞类纂》强化桐城派这一新思想，收进一些能体现道统的真正诗歌范文。姚鼐号召学习的目标首先是宋代诗人苏轼和黄庭坚。

姚鼐同时也提出了他评价古代散文作品的标准体系。他称之为八大要素：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认为前四个要素是主要的，或者叫做内部的；另外四个是次要的，或者叫做外部的。姚鼐支持他的先辈刘大櫆关于散文有两类风格的思想，他写道：“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唯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

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远视，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608· 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复鲁絜非书》）

十九世纪上半叶明显看出姚鼐弟子的积极创作活动。他们是方东树（1772—1851）、管同（1780—1831）、姚莹（1785—1852）、梅曾亮（1786—1851）等，还有一些刘大櫆的少龄弟子。十九世纪中叶，梅曾亮的一代弟子也加入了文学队伍。姚鼐的弟子和追随者保持了对桐城文学理论原则的忠诚。思想美学纲领的共同性成了强大的凝聚因素，不过姚鼐之后的许多弟子已经不满足于简单地重复正统公式了。比如，他们继续研究姚鼐的新思想，关于散文中存在阴阳刚柔风格的问题（方东树、梅曾亮），关于诗歌作为一种表达道统的文学形式能够达到的水平问题（姚莹、方东树）。

方东树和梅曾亮认为，文学向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并把这视为它的客观规律。共同的本质把过去的文学同现实的文学联系在一起。但在他们看来，今天的文学不是过去文学的简单重复。在这方面，姚鼐的弟子们强调作者创作个性的意义。他们认为，在模仿过去公认范本的时候，文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取得成就，只要作者在模仿过程中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创作个性。

对姚莹来说，重要的是桐城派弟子注意利用文学去议事，对现实事件作出直接反应，就是说，姚莹赞赏切近政论文的散文，因此桐城派理论的雅洁主张受到怀疑。刘开（1784—1824）不承认古文同对仗格律的截然对立，他从不同文体的相互影响中，看到了有利于儒雅散文发展的因素。不过这些革新带有局限性，并没有触动学派的基本原理。他们渐渐冲刷了正统的两岸，不让鲜活的思想消逝并激发了桐城派理论的内部演变，但演变进程缓慢，有时会停滞，况且热衷于雅洁思想的人们在密切关注反对的证据。

古代散文的体裁组成和选题，还是传统的，尽管每个桐城派成员常有体裁和题材上的侧重。比如，管同偏好“论”和“记”；梅曾亮喜欢给同时代人的文集写序和跋，室内性质的题目居多。其文章问世的缘由可能是个人的境遇，学界和官场日常生活中的事件，某个友人出版一本书。一般来说，这些文章里都含有以儒学精神形成并由当代人创作活动的历史类比所确认的评价。当然，桐城派文人也写了一些论述国家管理，君臣关系，臣民关系，社会暴乱的原因，镇压起义者的办法一类的文章。为响应这一主题，管同

写了《对用刑说》，方东树写了《化民正俗对》，梅曾亮写了《士说》、《民论》等等。这些作品中包括了社会批评成分，不过是来自上层的批评，是从文人学士立场出发的批评，是以早在孟子时代（公元前四至三世纪）就已形成的原则为根据的批评。这种批评的唯一目的是巩固现存制度和官位等级。由于自己的社会出身和社会地位，桐城派人强烈反对人民起义，他们喜欢通过自己的作品讨论遵守和违反道德准则的问题，家庭道德规范问题和修身养性以成完人君子的方法问题（刘开的《学论》和《贵齿论》）。此类作品中的儒家观点与日常处世之道完全一致。桐城派人喜欢面向历史，从中搜寻自己的道德理想，同时也搜寻能用来批评当代的反面例证（梅曾亮的《韩非论》和《晁错论》）。他们努力从古书中吸取对当代有益的经验，为儒家文集写出点评和后记（管同的《读三传》、梅曾亮的《后汉书跋》等）。

姚鼐弟子的创作中常常透露出他们模仿先辈人物的强烈愿望。管同模仿韩愈（公元八至九世纪），写了一组同类名目的论文《永命》、《原人》、《原灾》。他们还以柳宗元（八至九世纪）的譬喻性故事风格，写出了诸如梅曾亮的《观渔》和管同的《记蝎》这样一些文章。成功运用讽喻的是管同所写的《饿乡记》。桐城派人对当代的政治事件并不是漠不关心，方东树的《病榻罪语》、姚莹的《防夷急务状》和《致乌都统》都包含着对英军侵华的谴责。不过这是在传统室内文集总背景下出现的个别情况。 ·609

与桐城派同时，在无情节散文中还存在一个正统派别——阳湖派，它是由阳湖（江苏省）出生的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1761—1802）创立的。阳湖派形成于十八世纪末，并被认为是桐城派的旁支。十九世纪上半叶继承这一流派传统的有文论家兼诗人的陆继辂（1771—1834）和李兆洛（1769—1841）。他们与桐城派故作姿态的雅洁主张格格不入。尽管刘大櫆的思想影响很大，在他们的创作中严格的古代古文还是和韵律散文的文雅与崇尚词藻结合了起来。在理论方面，李兆洛也和刘开一样，发展了古文与骈文共存的思想，甚至编写了一部在同代人中颇为流行的《骈体文钞》。然而从总体看，对仗散文还是丧失了不久前的声望，明显地被古文崇尚者挤掉了。在思想、体裁和题材方面，这些作家的创作与桐城派的创作没有多大区别，只是风格完全不同。他们力求以句中重复同等字数的象形汉字来保证文章的格律，力求保持对仗的结构原则。四言诗使风格简练，紧凑，自然唤起了作者对词汇特别精心的筛选。

3. 诗歌

十九世纪上半叶，诗歌中最有影响的派别称作宋诗派，它始于三十年

代，是在翁方纲（1733—1818）影响下形成的。这一派的特点表现在它的奠基人程恩泽（1785—1837）和祁寯藻（1793—1866）身上。他们两位是高官显宦又是文人学士，是宋代新儒学派热诚的追随者。这一派诗人宣称，能作模仿范本的是宋代（十至十三世纪）诗歌，首先是苏轼和黄庭坚的诗。他们特别看重宋诗中盛行的主题和形象，从形象到语言都模仿宋代大师，再现宋诗的外部特征被看作一项准则。当然，总体上忠于宋诗并不排除个人创作的偏好。宋诗派被称作先师的，还有唐代泰斗杜甫、韩愈和白居易。

在把取材于先辈诗歌形象和思想作为自己的原则时，宋诗派诗人根据的是黄庭坚（十一世纪）的观点，即一个人的才能是有限的，而过去伟大诗人们的思想和形象世界，是取之不尽的。他们追随黄庭坚，认为诗歌最完美的境界应源于饱览群书，博大精深。作为道德定标点的是儒学关于人的完美个性的见解。宋诗学派是社会方面的袖手旁观者。诗人们回避公众主题，偏爱取自文人官宦生活的传统室内题材和景物抒情诗，创作致友人们的诗体赠言。他们摒弃过分的矫饰，赞赏自然朴实的语言，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要用活的语言。

世纪中叶，当宋诗派的最鲜明代表何绍基（1799—1873）的才华充分显示出来的时候，宋诗派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何绍基属学者名流，官职对他吸引力不大，他辞官很早。何绍基的诗人才华同他书法家兼绘画家的卓越才能紧密结合。何绍基称李白、杜甫、韩愈和苏轼为自己的诗歌先师，比所有这些人都贴近他的是黄庭坚，在他的观念中，黄庭坚就是诗人兼书法家理想的化身。何绍基认为言为心声，只有具备崇高志向和纯洁心灵的超群人物，才能通过诗歌语言传达真理。他喜欢《诗经》教导的儒学公式，主张矜持、温和、真诚、率直的文风。他在创作中讨厌粗俗，对粗俗的解释也充满儒学精神。何绍基最不喜欢通过诗文曲意奉承和恶意中伤，哪怕表达起码的不满，他对放纵、刺激、夸大、骂詈的语句都表示不能容忍。毫无疑问，有意淡化社会性创作主题，限制了他的诗歌题材。他喜欢为名画题诗，同好友交换赠言，以富于灵感的语言赞扬书法艺术。

610·

在他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景物抒情诗。诗人遍游中国大地，强烈感到山河的壮美，又善于发现最富表现力的细节。比如，他看到“诗人腹底本无诗，且把青山当书读”，并表示愿以大熊星座的长勺舀取空中繁星。何绍基对大山景致倾注了痴迷真情（《爱山》、《画山》、《登华顶》、《游嵩》等）。诗人的许多诗篇是写游览古都的，那些古都都具有驰名庙宇、圣地，庙宇、圣地又与历代诗圣的美名相连（《登洛阳城楼》）。一般说来，何绍基的诗歌形象很传统。诗人忠于自己的原则，摒弃浮华，追求朴实，就在这朴实无华中表达自己的理想：

读书松树里，人意与松清。
四山风雨来，不乱读书声。
读书如此松，林叶通灵光。
立身如此松，寒坚出奇苍。

从何绍基的诗里可以明显看出宋诗派的特点，但总的说又像永远会从大诗人那里遇到的情况一样，他宣扬的理论框架之于他的创作是太狭窄了，创作总比理论更为丰富，更为广阔。

这一点可以在更大程度上用在宋诗派另一位代表人物郑珍（1806—1864）身上。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留下了一批地理学、古文字学、儒学经典、家蚕养殖等方面的著作。他的第一本诗集出版于1854年。他在向前辈诗人程恩泽学习作诗技巧时，赞赏程道：

我读先生古体诗，蟠虬咆熊生蛟螭。
我读先生古文词，商敦夏卣周尊彝。

从这些诗行看出，郑珍从程恩泽的作品中吸取的是词语的力度和远古深邃的气息。郑珍的美学观点与何绍基有共同之处。他也认为，诗人应当关心书本知识的扩展并在自己身上培养起高尚情操。

与其他宋诗派诗人一样，郑珍很多作品是写高山狭谷，激流瀑布，花草树木的（《南阳道中》、《下滩》等）。他喜欢给绘画和书法杰作题辞，也爱给友人赠诗。他常常面向过去，给一些诗人——具有高尚理想的人（嵇康）和具有写诗才华的人（陶渊明、孟郊）以应有的赞扬。郑珍同其他宋诗派代表人物的区别，是他对社会不公不是漠不关心。他满怀愤怒写到欺压百姓的残酷贪官（《经死哀》、《捞胡狼》），写到给农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水灾，写到矿工与铸工的悲惨命运（《珠海铅矿场》）。当郑珍目睹太平军进军贵州的时候，他在一组诗歌里对事件作出反应（《9月16日挈家发荔波》、《往南丹州》）。不过由于自身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对太平军持敌视态度，认为他们是痛苦命运降临到和平居民和他本人身上的罪魁祸首。

郑珍的同乡兼友人是莫友芝（1811—1871）。他坚持保守观点，敌视太平军和其他暴动者，颂扬镇压起义的将领尤其是曾国藩，把曾国藩表现为一个知识渊博又熟谙古风的人。在莫友芝的诗歌里，可以找到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各种事件的反映。他喜欢写赠诗，首选收赠者是著名诗人和有实力的官宦。莫友芝是一个热情的藏书家，并为古文手稿和善本题过不少献诗。他最具特色之处是模仿古代词汇，运用书本形象和情感不大

外露。

611· 诗歌中还存在宋诗派以外的其他派别。有些大诗人周围形成了创作团体,团体成员把他们引为效法楷模,并把他们认作自己的先生。1812年广州诗人张维屏(1780—1859)创立了一个诗社"云泉山馆"。他是一个才子,绘画和书法卓有建树,获进士头衔。辞官后他在自己那个称作"听松庐"的画室里过隐居生活,写风景诗。张维屏是中国诗歌界最早面向外国题材,在诗作中运用外国术语(例如:火轮)和外语词汇的人。在《金山篇》中,他讲述了美国人采矿致富的事情。诗人认为,中国也最好由人民去做这件事:"听民自为上勿预,什中取一当无愆。五金出土皆有用,有而不取空弃捐。但令有利又不忧,闻风踊跃民称贤。因民利民自不费,富民富国利相连。"张维屏称陶渊明和白居易为自己的先师,珍重他们诗歌的"率直"。张维屏本人的风格也以其爽快和清晰见长。杭州的汪远孙(1789—1835)领导一个诗社"东方吟社",诗社影响很大,其中有张际亮(1799—1843)、潘德舆(1785—1839)和以深奥、精致、悠远、艳丽相结合手法创作乐府,并对诗歌发表高见的著名大师郭仪霄(1775—1855)。身后留有百首诗篇的张际亮,在同代人中颇负盛名。他过着流浪生活,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张际亮出身寒门,为人直爽,对他人的痛苦十分敏感。他把饱满的激情和对生活的贴近放在诗歌首位。

常州派在词的创作领域成就不菲。属这派的有周济(1781—1839),他是诗人兼理论家,《词辨》(1812)和《介存斋论词杂著》的作者。他通过这两篇著作发挥了常州词派富有特色的转意理论,转意是词作所必需的寓意(譬喻)手法,这种作诗法不可避免地会使风格复杂化。周济还主张扩展词的题材范围,认为词要适时出现,效法辛弃疾(十二世纪)一类的作者。他还号召人们学习十二至十三世纪诗人的创作技巧,他以编辑《宋四家词选》(1832)而确立对他们的继承关系。

快到十九世纪的时候,浙江派明显受到排挤,它不久前的辉煌开始暗淡。不过这一派的传统还在一些诗人的创作中得以保留下来,其中最突出的是项鸿炸(1798—1835),四部诗集《忆云词》的作者。在他以优雅笔调写就的几首诗《秋声》、《池上纳凉》、《春夜》里,哀伤情绪占上风。

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诗文里,与明显盛行的正统倾向相并列的进步倾向也很突出。这种倾向是由启蒙主义思想和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情绪引起的。

启蒙主义观点的表达者之一是卓越诗人兼评论家龚自珍(1792—1841)。他出身于富裕官宦家庭,在朝廷供职。他的世界观是在儒学影响下形成的。他力求把激动他的当代任务与儒家学说结合起来,但认为"仿

古法而行之,正以救今日之病”。龚自珍与那些否定批评现存秩序和将现存秩序绝对化的正统人物不同,他意识到,盲目奉行老规矩和惧怕新事物势必给中国造成不良后果。他在《乙丙之际箸议》(1815—1816)中,号召皇帝进行改革,以防止帝国危机。他的改革纲领包括完善选拔进士入朝做官的科举考试制度,废除陈旧的习俗礼仪。龚自珍把财富分配不公视为主要罪恶并建议重新分配以消除贫富悬殊(《平均篇》,1816年)。他主张禁止吸食鸦片和中外贸易平等,号召尊重人的个性,重视人的优点和才干。在谈到他那时候的清帝国时,龚自珍痛苦地写到朝廷里“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在批评朝政号召改革的时候,他仍然一成不变地从传统公式出发,主张由“天子”训迪其“百官”“共治”天下,但他拥护的是稳定而有威信的政权,求其“治天下之效”,而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

龚自珍的作品以其风格独特,精致讲究,刻意文雅见长。他的某些评论是以直接揭露的形式写出的。较为突出的是《明良论》。其《古史钩沉论》一篇运用的是历史选编的传统方法。龚自珍有时也喜欢用讽喻形式,比如,在《病梅馆记》里,把赶时髦和出于唯美考虑培植成“曲”状的冬李梅和它们天然生成的“直”相对照,寓意的实质是说“曲”了的人们就像那些病树,应该得到治疗,把他们扶“直”,以恢复他们天生的本性。

政论家龚自珍的进步观点影响到他的诗歌创作,包括最著名的《己亥杂诗》在内。它由三百十五首绝句(一种独特的诗人自白)组成,写于1839年,历时八个月。作为诗人的龚自珍,以全力书写传统题材。杂诗里有极富表现力的风景小照;以其名胜古迹驰名于世的城市诗篇(《杭州龙井寺》、《过扬州》);献给才妓小云的一组小诗;会友忆友的诗作。创作中还能明显看出佛教主题,写到佛教的寺庙、节日、仪式,诗人与之交友的僧人以及自己对佛经的迷恋等。但从龚自珍的诗歌里,也可以听到社会旋律。他揭露社会上层人物,谴责统治者的无所作为。同情普通百姓(《饼歌》、《不论盐铁不筹河》)。当他目睹河上“一缆十夫”的情景时,忏悔之情涌上心头:“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当“西山风伯骄不仁,虓如醉虎驰如轮”的时节,诗人夜不能寐,担心“一夕炭价高千缗”,穷人无处去筹那么多买炭钱。龚自珍在写到他视为当代人道德理想和楷模的往日英雄时,也具有社会色彩。

龚自珍有他非常独特的风格。他喜欢稀有的,在其他诗人那里很少见到的语汇,还乐意用佛教词汇进行创作。他的诗歌语言比较复杂,常常含有寓意。形象几乎永远建立在隐秘联想历史暗示与对照上。龚自珍既不同于桐城派也有别于宋诗派诗人,他的启蒙主义意向总是穿透儒家学说养成的传统积淀,在他的世界观中起重要作用。这些意向在包括宣南诗社成员

在内的同代人中，引起共鸣以至最后为二十世纪初的进步诗人所接受。

龚自珍的同道，有威望的政治活动家林则徐（1794—1856），也作为官宦文人进步一翼的代表抨击中国的落后，主张进行改革。他的名字与坚决反对吸食和贩卖鸦片密不可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政治形势的深刻理解表现在他的政论文章里（《拟谕英吉利国王檄》，1839年；《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篇》，1841年）。林则徐关心中国利益，抵抗英人入侵。他的政论文章题材紧迫，摒弃模仿，在风格上也另辟蹊径，与桐城派有别。从他的诗作里，像从他的评论里一样，听得到时代的声音，但这声音是低沉的，他对朝廷主降派的谴责并不直率，只是通过暗示来进行，如批评界所指出的，从他的诗篇里听到的“是抱怨而不是愤慨”。

诗人兼评论家魏源（1794—1856）也以颇丰的学术著作驰名。通过学习儒学经典，他深深懂得，当今的事物必定源于古代，但他也清楚，新条件下的国家在充分珍惜往事的时候已不能满足于对它的简单重复，国家需要新办法新措施。这时的魏源认为，儒家学说用于实践时远不是永远正确的。在《默觚》（默——魏源的字默深之缩写）一文中，有许多对古代性与现

613· 代性，对二者之间的继承性与差异性的议论。魏源说：“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以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他坚持的一个当代进步观点是重视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天下其一身欤！后元首，相股肱，诤臣喉舌。然则孰为其鼻息？夫非庶人欤！九窍百骸四支之存亡，视乎鼻息，口可以终日闭而鼻不可一息柅。”

魏源把研究西方经验尤其是技术成就，看作克服中国落后的途径之一。他认为中国要有工厂和船坞，制造武器和军舰，到那时就会有强大的海陆军，能抵御外敌。魏源把这些思想和其他一些思想写进《海国图志》（1844—1846）一书，此书在向中国介绍西方世界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不过魏源和龚自珍一样，在给自己的理论寻找论据时，大部分还是依据儒家著作，期望如那些书籍所提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此语出自《后汉书》，公元五世纪）。魏源的爱国主义是和中国中心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关心面临英国侵犯的国家巩固，导致了有民族主义精神的《圣武记》的出版（1842），书里鼓吹了大清帝国的征服战和讨伐战。

魏源在诗中竭力模仿白居易（八至九世纪），其中包括积极运用民歌形式。他是一个硕果累累的诗人。收在他集子里的近八百首诗，基本上是景物抒情诗。在再现大自然画面的时候，魏源喜欢描写运动中的大自然，描写它的变化和对比，以及给人印象的迅速更替。下面是《钱塘观潮行》一诗中的几个典型诗句：

逆风飞，海立起，
天风刮海见海底，
涌作银涛劈天驶。
病者睹之气皆生，
勇者睹之神皆死。

诗人对社会生活也不是漠不关心。他看到水、旱、战、赋经常威胁百姓，这“四灾”的共同后果永远是饥饿。在《偶然吟》里他讲到“不忧一家寒，所忧四海饥。痌瘝苟不寥，尧禹亦何为”，认为为官者统治国家，忙于朝政，但更重要的还是喂饱百姓的肚子。当耳闻濒死者的啼饥号寒时，就该去自摘乌纱了。《江南吟》(1831)描写挣扎在苛捐杂税下的农民之苦难，也使人心灵震撼。在《都中吟》中魏源怀着不安的心情描写置国事于不顾的上层统治者的腐化，写那些“缠头金帛如云堆”，“聊凭歌舞恣消遣”的高官显宦。诗人还把清代官宦的愚钝同历代著名活动家的英明与政绩加以对比。《秋兴》(1841—1842)和《寰海》(1840)表达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掀起的爱国主义热情。其中许多篇章描写中国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揭露鸦片作为社会灾祸给中国带来的危害。

魏源通过诗歌谴责了一些目光短浅口是心非的政治家，那些政治家忽视边境的巩固，当英国人已在中国土地上点燃战火的时候，他们不予以回击，只试图以过去的辉煌徒劳无益地吓唬外国人(“先声枉使群夷慑，退舍曾麾众岛舟”)。

魏源那些满含对朝廷主降派批评的爱国主义诗篇，与他政论文中的启蒙主义议论相呼应，表现出诗歌中进步倾向的日益增长。

爱国主义主题鼓舞了许多诗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事件的首批响应者之一是张际亮(《传闻》、《镇海哀》、《宁波哀》、《浴日亭》)。他的战地速写不注重描写效果，而倾向于有节制的概括，通常是把战争描写的重点放在敌人进攻的突然性上，放在中国军人的顽强性和他们蒙受的巨大损失上。张维屏的《三将军歌》和《三元里》流传很广。前者塑造了一些顽强同敌人厮杀并阵亡沙场的勇士形象；后者歌颂了广州城下三元里乡的农民义军，他们违抗朝廷怯懦军官的禁令，举起义旗重创了英国人。

贝青乔(1810—1863)参加了中国东部的抗英斗争，写了由一百八十八首讽刺诗组成的很有意思的《咄咄吟》。每首诗出现的缘由都用随诗出现的散文注释加以说明，而且这说明也带有讽刺语调。贝青乔讥笑对战争的毫无准备，清朝将领的胆怯和投降政策，那些人是既不善于也不愿意打仗的，“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 ·614

灯”。这是对一名指挥官的讽刺，瘾君子指挥官已奉命守卫通往宁波的一座桥梁。

战争主题最经常的表现形式是军事行动的诗体纪事。有时可以形成一组诗，比如赵函的《十哀》就包括《哀虎门》、《哀舟山》等。诗人们痛悼中国军队的失败，与此同时他们也歌颂没有临阵逃脱的统帅，经常会有的那些对敌勇敢作战的清朝将领。与之并立的还有歌颂巾帼英雄的诗篇，写那些宁死不屈的女中豪杰。对鸦片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有各种不同倾向的理解。多数诗人号召坚决抵抗侵略者，有些人还特别重视人民群众参战；另一些人则赞美皇帝，认为皇帝是理解和怜悯受苦受难的人民的；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支持朝廷显贵们的投降主义理论，将民族尊严置于脑后，愿以任何让步为代价同英国人媾和。相当多的情况是，战争唤醒了诗人去面对祖国历史，从中搜寻爱国榜样和治国方略，最吸引他们的当属与抵御外侮有关的事件。

爱国主义诗歌无论从格律和语言上，还是从形象体系的性格上都是传统的。诗人歌颂战争英雄的时候常用夸张手法。张维屏在一首题名《黄总戎行》的诗篇里，写到同名英雄时说：他“群贼畏之如天神，众军亲之如家翁”。在描写手段上盛行对前辈文学的借用。描写战场必用的形象是“白骨”，肯定为正义捐躯的人物时用“碧血”，国家完整而稳定的固定象征是“金瓯”，战前准备的状况叫“枕戈”。

很久以来，侵略成性的凶手就被形象地称作鲸鲵了。每当写鸦片战争的诗歌叙述到英国侵略者的时候，就会出现这个形象（“纵使鲸鲵跋浪高，岂无京观筑周遭”；“出水鲸鲵困，登山虎豹雄”）。英国人还被称为盗、红毛、赤毛、犬猪等等，几乎总是轻蔑或侮辱性地称呼他们。相反，在肯定正面英雄的时候，就用“虎”和它的派生词。诗人严钖是这样描写上海附近炮台保卫者某将军的：“敌人畏公谓公虎，虎目视敌光眈眈。”

一般来说，当时都喜欢用不够新颖没有什么独特表现力的常用修饰语。比如，白云、苍海、碧海、长夜、黑夜。比较用语也是很刻板的，把海比作镜子，把炮轰比作雷击，把发炮弹比作下雨（而且流泪也比作下雨），把大船比作山（指大小）或者比作云（指数量）。

诗歌语汇完全是传统的，但是同外国人交战的主题，给诗歌注入了一些新词语，首先是外国人名地名的汉文音译，还有火轮、火轮船、鸦片、新闻、甲必（出自甲必丹——大尉一词）一类的新词新义。还流行一些从欧洲法国人那里借用来的词语，法兰西用于两个意思，既指国也指人，其他如大炮，即武器。词汇的革新尽管数量不大，但它正在一步步准备着旧诗格律的解体。

许多诗人都在创作中深入挖掘与鸦片战争有关的主题。而像陆嵩

(1791—1860)、黄燮清(1805—1864)、姚燮(1805—1864)这些人,在积极面对战争题材的同时,也写了一些描写普通百姓疾苦的作品,以其继承溯源于杜甫和白居易的社会抒情诗传统。在《鬻儿行》里,陆嵩写到一对老夫妇的痛苦,他们被迫卖掉儿子以养家糊口。姚燮在《谁家七岁儿》这首诗里,写了一个饥饿的孤儿:“……伏地啮枯草,根劲牙不强。野犬过频嗅,跳跃求其僵……”骇人听闻的崩溃画面(“白骨浩纵横,零残手与足,郇荒狗彘饥,矫尾食人肉”)反映在黄燮清的《南归》、《灾民叹》和陆嵩的《望雨》与叹诗里。在这些作品里,失声痛哭的是那些自然灾害的牺牲品,无家可归的农民。也是在这些诗里,响彻着对那些饱食“粮肉”反视人们及其生活如“虫豸”的富豪及官吏的谴责。

鸦片战争时期一批诗人以诗歌发出公民呐喊,他们的经验由林昌彝(1803—?)以《射鹰楼诗话》作了概括。林昌彝的观点接近林则徐和魏源,他指出同代人作品的功过成败,表达了对诗歌创作的进步见解。他主张诗歌应有充实的思想内容和重要的社会意义,并举出杜甫和陆游为例。在他的想象中,诗人应当对当代事件作出反应。当时的正统美学将仿古绝对化,林昌彝则拥护诗歌手法的独创性,拥护形式与风格的多样化,不主张硬性模仿某些古代范本,虽然他并不否定那些范本的意义。

爱国主义和具有鲜明社会主题的诗歌浪潮意味着,世纪上半叶文学中的进步潮流已脱颖而出,并且达到了相当规模,已不仅仅存在于龚自珍、魏源这些带头人的创作中。这股潮流是由时代本身产生的,那些把国家文学生活掌管在自己监督之下的正统学派,已经无法压低时代的痛楚声音。但也未必能说,中国诗人已经形成了始终如一的观察世界的进步观点,相反,观点常常很矛盾。比如张维屏,他在歌颂三元里人民武装斗争的同时,就公然宣布自己与事件无干:“炮似雷霆刀似雪,老渔孤坐且哦诗。”许多诗人同情不幸者,但不妨碍他们公开敌视太平军起义。时代把诗歌推上新路,但历史的惯性和儒家世界观的强大压力起了阻挠作用。天朝帝国依然在中世纪观念中生活,这些观念是天子权力无限,道德价值由古人遗嘱,中国有特殊的世界地位,其他国家和人民不过是大清帝国的纳贡者和诸侯国。病态地体验着中国的国耻,一些诗人成了沙文主义情绪的俘虏。比如,朱琦于 1843 年写了一批新战歌,其中歌颂了清朝历代皇帝的军事和讨伐远征。类似诗歌的出现只能解释为,朱琦主要从儒家立场观察现实。

4. 小说和戏曲

世纪上半叶小说的主要形式是长篇小说,虽然在其发展中出现了明显

持续的衰退。小说家继承了早已形成的传统,但没有使它丰富起来。他们勤勤恳恳地模仿先辈在实践中确立起来的范本,导致创作思想的萎缩,妨碍了更深刻地认识周围世界,以至最终阻碍了长篇小说的发展。

最有成就的是言情小说,它比其他形式更加适应日益增长的对描写感情世界和私生活的兴趣。小说的共同点是重视能揭示各种不同命运的情节,就是那些给人们准备好的爱情生活中或幸福或悲惨的命运。在言情小说里,特别是它的变种"才子佳人小说"里,表现出对儒家所理解的贞操的理想化。不过这种理想化常结合进一些色情成分,用以表现作家对儒家道德的伪善和治家禁忌的专横作出的反应。描写爱情冲突常与描写社会阶层、日常生活、家庭习俗相伴而行。

世纪初一些中国人继续沉醉于《红楼梦》,接二连三出现这部载誉小说的续集和仿作,诸如《后红楼梦》(1805?)、《红楼圆梦》(1814)、《补红楼梦》(1819?)、《红楼幻梦》(1843)等,不一而足。关于这些作品的作者人们几乎一无所知,他们全部采用笔名(诸如海圃主人、梦梦先生等)。小说主人公的主调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不过续集和仿作再现主人公之后,总设法将叙述引向大团圆结局。曹雪芹具有反封建倾向的爱情悲剧,变成了理想化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圆满俗套。为了使新结尾同原《红楼梦》结尾相协调,后续作者们求助于幻想手段,其余方面都以众所周知的方法处理,没有大的革新,虽然偶尔也有仿作版本写得更富有表现力,描写事件和人物行为更精确,更合理,更有说服力的时候。

616·

作为十八世纪言情小说变种而形成的"才子佳人小说",其代表性著作是张士登的《三分梦全传》(1835)、曹梧冈的《梅兰佳话》(1839)和黄翰的《白鱼亭》(1842),这些作品能使人明白,它所采用的体裁套路却表现不出什么特色。"才子佳人"作品中与众不同的是陈球的长篇小说《燕山外史》(1810),它与大多数白话小说不同,是用书面语写成的,具有骈体散文的高雅风格。陈球小说的情节取材于冯梦祯的短篇小说《窦生传》(十六世纪)。小说情节紧紧围绕两个人物——窦绳祖和爱姑展开。爱姑初为窦生情人,后来与之姘居,最后嫁他为妻。他们不得不经受各种磨难,忍受离别的痛苦,但结局十分美满:钟情者不但喜结良缘,而且作为遭受苦难的奖赏而芳名永传。

"人情世态小说"在基本继承传统的情况下,适当扩大了描写范围,其中之一是把描写新的主人公(歌伎和青楼妓女)放在首位,用高尚女子特有的准则,明显地将她们理想化。青楼妓女不仅被赋予诱人的外貌、优雅的举止和敏锐的感觉,而且必定具备儒家所倡导的妇人美德。

魏秀仁的长篇小说《花月痕》(1858)的女主人公,就是以这样的恣态出

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以反衬法写到两位才学颇深的好友（韦痴珠和韩荷生），在妓院里结识了两位歌伎。这两位歌伎的名字似乎预示了她们的未来：一个叫秋痕，一个叫采秋。而且韦痴珠和秋痕的爱情确实结束得很惨，饱尝爱情体验的韦痴珠没有给自己的才华寻找用武之地。妻子在世时，他没拿定主意娶秋痕为妾。后来当妻子卧床不起的时候，他打算自尽，悲痛万分的秋痕也已气息奄奄。韩荷生的一生是另一副样子，他官运亨通，由于在镇压暴动中表现出色而加官晋爵。韩荷生顺利地娶了采秋，采秋将因他的最高爵位而成为宫廷贵妇。魏秀仁则利用相当简单的结构达到既定目标，证明命中注定的东西一定会应验。为强化激情效果，他以感伤情调的抒情描写充实小说，引进了许多诗句。

中国传统还把由陈森撰写并在读者中获得成功的长篇小说《品花宝鉴》列入"人情世态小说"。这部作品描述上流达官名士的浮华生活，写他们的风俗、习惯、娱乐、消遣，首先是写同性恋这一中国现实中的异常现象。小说情节发生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对时代的外部特征，陈森记述得准确无误。而且《宝鉴》里的许多人物身后都有取自当代达官名士的现实原型。陈森并未对大贵族的倒错习俗作公开揭露。他仅扮演一个旁观者，然而他的小说却在客观上促进了对类似的伤风败俗习尚的谴责。

言情小说特别注重生活的隐秘方面，依据体裁法则，当然应深入到人类灵魂的奥秘中去，然而这些小说的作者在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时，却无能为力。一般来说，小说家们只是例行刻板公式，通过言谈举止记录下情感和外部表现。在塑造形象时，他们首先关注的不是揭示个性，不是再现具体性格，而是精选和表现那些能够确定主人公社会道德类型属性的精神气质特点。他们认为共性更加重要，类型重于性格，陈规旧套比独特性的对待上更应从优。

在普及性上可与"人情世态小说"相匹敌的，是侠义小说，也叫武侠小说，其特点是把那些主持公道、除恶扬善的高尚而勇敢的强盗们理想化。这些主人公的社会理想极其模糊，不过"绿林好汉"们的冒险事迹，流民强盗的浪漫精神却保证了侠义小说的巨大成功。这一时期的侠义小说，受到封建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宣传了作为社会生活最高道德准则的忠君思想，使"绿林好汉"的行动和其他人物的行动一样，都同忠君要求相适应。比如，俞万春（1794—1849）的长篇小说《荡寇志》（1851），就是站在毫无隐讳的反动立场写出来的。小说把好汉分作两类：第一类受到热烈赞扬；第二类受到仇视与否定。属于第一类的头面人物，是陈希真和他武义双全的女儿陈丽卿。父女起事是为了报仇，反对势力家族高俅的横行乡里，无法无天，但后来，他们把自己的起义队伍并入青州总管云天彪大将的讨伐队，

参加了对梁山泊起义者的镇压。俞万春把施耐庵(十四世纪)《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搬到自己的小说里来,写出了第二类好汉。俞万春视他们为恶的化身,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背叛自己的原则,负荆请罪,也不愿意效忠准备赦免他们,争取他们来反对尚不悔改的起义者的皇权。

《荡寇志》里反映了俞万春政治上的好恶,也反映了他镇压人民起义的切身经验。小说是对世纪初无数次农民起义的反响,目的是在公众舆论面前使之声誉扫地。俞万春对为皇权而战的人们赞赏备至,对梁山泊起义者则极尽污损之能事,甚至在细节描写中也不放过强调的机会。比如,当渔人俘虏他们的首领宋江时,他原来已被剜去了左眼,被毁坏了面容。



文康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插图 十九世纪末

由文康撰写的同样属于侠义体裁的《儿女英雄传》(1850),是以另一种方法处理的,虽然中国批评界认为它里面不仅有《水浒传》的影响,而且有《红楼梦》的影响。这是世纪中叶中国小说中最成功的作品之一。小说的中心人物是侠女何玉凤。她的父亲被有权势的大将军纪献唐陷害,她拿起武器发誓替父报仇。她为追捕和惩治凶犯化名十三妹上路,途中却像"绿林好汉"一样,保护受冤枉的好人。何玉凤身上结合了孝女和侠客的各种优点:纯洁孝顺与果断好动的性格,精湛武功与强健的体魄完全结合在一起。胆怯柔弱、光说不练的书生安骥,与勇敢而精力旺盛的何玉凤相对照,他沉湎于深奥莫测的儒道世界,却完全不会保护自己,更谈不上保护他人。安骥的父亲安学海同何玉凤的父亲一样,成了纪献唐倾轧和专断的牺牲品。以子女尽孝道教育出来的安骥,也决定去搭救父亲,但靠的不是利剑而是金钱。当他出现在客栈和佛

寺的时候，由于自己的胆怯和光说不练而陷入困境：脚夫和和尚千方百计要霸占他的钱财。

要不是何玉凤及时赶到，结局将不堪设想。她救出安骥和跟安骥一起并被他看中的村姑。她的作媒，才使两个被搭救者得以喜结良缘。就在此时，似有天赐良机，安学海出现了。他被洗清一切罪名，眼下正从京城回家。几位青年人从他口中获悉，何玉凤的父亲离世前已被证实无罪，恶棍纪献唐已被揭露处决，所以现在已无仇可报，继续充当武侠，意义也不大。此前已失去母亲的何玉凤，有意削发为尼，而安学海不愿迁就，于是何玉凤便嫁给安骥为妾。小说以安憩闲适的家庭颂歌结束：安骥应试出众，供职顺利，妻妾和睦相处，情同手足，为其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儿女英雄传》含有若干社会批评成分，谴责了不公与专断，卑鄙行为与加害他人性命的图谋。但是这种批评从整体上被儒家道德——忠孝节义等的宣传掩盖了。对帝国政权的理想化，也历历在目。文康在展开情节时，摒弃了尖锐的社会冲突，归根结底不是用高尚复仇的女子暴力，而是以天子权力解决了冲突。从小说中明显可以看出，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不义行为都逃不过天子的眼睛。从这个角度看，《儿女英雄传》明显是一部正统之作。

内容和人物的构成，与侠义小说相近的是公案小说。这是一些写“清官”的作品，清官身上既有责任感和正义感，又有判决繁难案件的敏锐洞察力。审理案件的办法含有侦探小说的成分，使得这类小说极为流行。当时最著名的一种公案小说是无名作者写的《施公案》(1838)。一种说法，认为小说主体部分成形不会晚于1798年，但作品出名是在十九世纪初。《施公案》是一部长达九十七回的大型作品，描写清官施仕伦。施仕伦的原型施世纶，于康熙年间(1662—1722)供职，以其睿智和原则性与传奇式人物包公(十一世纪)齐名。《公案》里的施仕伦是皇帝宝座的忠诚捍卫者，只要不违背君主利益，他时刻准备好为正义而斗争。施仕伦判案的业绩是和他忠心耿耿的观念紧密相连的。如果从儒家立场评价他，无疑是个正面人物。他在分析案情时，认为使用中世纪的酷刑理所当然，必不可少，小说作者对此也安之若素，丝毫不觉难堪。施仕伦对待下属异常严厉，完全忘记了人道原则。一句话，施仕伦及其信念、判案实践和对人态度，都是封建制中国的典型现象。

在公案小说中“绿林好汉”也起同样重要的作用。绿林好汉常以合法政权的敌人或与之有冲突的面目出现，但他们往往由于各种情况的促使而脱离自由强盗，向当局认罪，转而被当局利用来为自己效劳。《施公案》中的黄天霸就是一个由强盗迅速转成皇座的顺从奴仆的人物。这个残酷而奸诈的小人被俘之后，屈服于施仕伦的劝降，转而出卖自己的原则和弟兄为当

局效劳。在第六十六回里，他救出被强盗俘虏的施仕伦，并惨无人道地镇压自己的结义弟兄及其妻室。值得注意的是，投靠施仕伦的黄天霸，为表示自己的忠诚而改名为施忠。无名作者不遗余力把黄天霸塑造为英武的勇619·士形象并极力说服读者，使之相信他是一个高尚而值得赞扬的人；反之，农民起义首领豆耳东却被写成了反面人物。

小说创作中还有一个重要流派——讽刺小说。属于这类体裁的作品有：崔象川的《玉蟾缘》(1827)和李汝珍(1763？—1830?)的《镜花缘》(1828)。《镜花缘》是世纪上半叶中国小说中最卓越的一部作品。其实仅把它看作讽刺小说未必正确。这是一部非常大非常复杂的作品，其中交织着幻想、风俗、文人学士和游记等各类小说的成分。作品的研究者常常不无根据地把它比作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李汝珍触及了众多问题，其中心问题则是妇女的命运。他主张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他认为通向男女平权的途径，是由宫廷举行专门的女科考试，女子可以像男人一样通过考试步入仕途，为国家效力。确立男女平权思想，讽刺中国盛行的保守秩序、社会风俗和陈规陋习，批评诸如懒惰成性、阳奉阴违、奢侈吝啬等弊病，所有这些都与启蒙主义者的观点一拍即合。况且小说中批评和嘲笑的否定对象，都是与作家通过描写君子国和女儿国所表达的乌托邦理想相对照的。

小说叙述的事件，发生在著名女皇武则天在位(684—705)的时代。秀才唐敖遭受诋毁，离开天朝，由商人林之洋和舵工多九公护送出洋。他走访了黑齿国、两面国、聂耳国、豕喙国及其他想象出来的国家，他和他的旅伴们在这些国家碰到许多难以置信的怪事。小说前半部幻想的重要性不亚于讽刺。唐敖留在了不死岛上，过不多久，他的女儿唐小山也沿同一路线来到这里，寻找一块刻有一百多女子名字的玉石板。小说下半部把唐小山这个人物推到首位。遵照父亲指引，她来到天朝首都参加女科考试，沿途访问了她父亲曾逗留过的一些国家，小说里的其他女主人公纷纷出场，与唐小山会合。天才的姑娘们在考试中均成绩不菲，并个个获得玉石板名单中预示的官职。考完以后，女主人公们各行其道，各奔前程。小说的最后几章，描写忠于皇帝的一批将领起事反对武则天，他们的富于才学的妻子们去占领四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妖术营地，并恢复了合法帝王的宝座。

就艺术方面而论，《镜花缘》很传统。小说的一些主要人物，女的也好，男的也好，有他们外貌、性格、思维、举止上的个性特点，但即使在这些比其他人物刻画得更深刻更全面的人物身上，李汝珍也力求首先揭示出他们那些固有的社会类型特点。其余形象则借助刻板地罗列优点来塑造：年轻女

子漂亮、能干、博学，具有女人的美德，孝敬父母。这种描写与其说证明了作者创作才能的局限，不如说是他对中世纪传统的迁就，作者本来是熟练地掌握了各种艺术手法的。比如，在对女儿国国王进行描写时，他并未采用刻板公式，而是利用了富有表现力的，对中国小说来说是至为新颖的借喻手法，说她“那种温柔体态，倒像比刀还觉厉害”。

小说中活跃着百名女子，要赋予每位一副独特的肖像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所以作者情愿诉诸集体肖像。比如，对董端的五个女儿，他是这样描写的：“个个都是娇比艳雪，慧比灵珠。”而在第六十六回提供的是一幅百名女子的共同肖像。在书中，女主人公总是集体出场，不仅考试时，探讨学问时，宴饮时，就连自杀时也是集体出场。一般来说，综合描写就是把普通词汇和对之进行华丽修饰的定语，巧妙地结合和构成固定用语，以达到美化效果。从小说里可以明显看出历史散文的影响——充斥着冗长的罗列（一百个女主人公的名单，五十五种酒的名称）。这些特点使小说风格接近历史著作，说明作者对中世纪的艺术思维法则还是抓住不放。 ·620

上面已经提到，传统方法依然在小说中盛行。对传统的过分依赖不可避免地产生模仿倾向。比如，在一批历史和幻想体裁作品中，就使人非常明显地感到这种模仿性。这样的小说有何梦梅的《大明正德皇帝游江南传》(1821)、丁秉仁的《瑶华传》(1824)、邹必显的《飞跎全传》(1843)，以及各种版本的《西游记》等，对有情节的小型作品也可以这样说。短篇小说家争先恐后地模仿蒲松龄、纪昀、袁枚（见本书第四、五卷）。类似的例子在许秋垞的《闻见异辞》(1846)和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1847)中，也不难发现。

小说作者们的立场总的说是保守的，充满正统新儒学的天朝主义精神。几乎从所有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家身上，都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他们对这些起义的敌视，他们将其视为反对当局的非法暴动，认为起义带来的只是灾难。新儒学的理想是与佛教和道教的理想（人之命运的定数，因果报应）共生同在的。比如，有些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实现了道教所讲的永生，作为在世时所受苦难的补偿或是积德行善的报答。

人物的魔幻式再现，他们与上天和神灵间的自由交往，后者对人们命运的干预——所有这一切来自佛教和道教的观念，来自民间文学的东西都进入了小说，而且作为小说叙述很自然的组成部分被接受下来。对非凡与魔幻形式的迷恋，是在强制推行儒学理性主义条件下一种特殊形式的排解。当然，某些小说里含有一些与启蒙主义同源甚至一致的思想（《品花宝鉴》里号召禁吸鸦片，《镜花缘》中保护妇女的平等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说已从本质上脱离了保守主义世界观。

这一时期的戏曲中，看不出艺术上的辉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仍是传统剧种杂剧和传奇（见本书第三卷）。这些剧种固有的程式还在严格保持，不过偶尔出现传奇和杂剧某些形式特征的混合。戏曲家们宁愿到先前的文学艺术作品或历史著作里去搜寻情节，也不愿从他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取材。一般来说，改编读者和观众熟悉的传统情节时，无论在阐释人物上，还是在叙述事件梗概上，都没有加添任何实质性的新东西。当然，当戏曲作家使人感到作品中描写的往事同当代事物有着相呼应的关系时，无论戏曲程式的假定性还是思想的理解力所引起的情节修正，就都可能发生了。戏曲作者逃避革新，为早经确定的角色所接受的刻板定势，把主人公的个性化特点推到第二位。像在小说里一样，创作类型角色比揭示独特的性格更重要。独特的、不可重复的东西让位于重复的、类型化的东西。在古代诗歌散文领域颇具成就的文学家写作戏曲作品，可以看作是正统和大众两股中国文学潮流正在接近的征兆。

世纪初不仅小说家而且戏曲作家也都乐意面向《红楼梦》，按照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调撰写戏本，有时不加赘述，只是通过戏曲形式把内容简单地陈述一遍。比如，陈钟麟在他八十折戏本《红楼梦》(1837)这部松散而拖沓的作品里，就是这样做的。不过也有以创新办法来解决的，以荆石山民为笔名进行创作的吴镐，就挑出最适于舞台演出的情节，把它压缩到十六折戏里。十折《红楼梦》(1819)戏作者石韫玉，也以类似方法运作。石韫玉(1796—1837)属于学识渊博的显宦贵族，他的杂剧编成了一组《花间九奏》。戏本写到唐玄宗一个妃子嫉妒他对宠姬杨贵妃的态度（《梅妃作赋》），还写到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外室，漂亮而有才华的桃叶（《桃叶渡江》），都以言情为主。其中有五种戏是献给中世纪享有盛誉的几位文学家621·的，有陶渊明（《桃源渔父》）、白居易（《乐天开阁》）、苏轼（《琴操参禅》）等。每种戏写一个实在人物的一段生活插曲，图解戏曲家想要鼓吹的一种思想。比如，石韫玉通过戏本《对山救友》，便谴责了忘恩负义的人。作者从杂剧作家康海(1475—1540)的生平中取出一个小故事。康海在势利小人面前替李梦阳鸣不平，而当康海自己陷入困境时，李梦阳甚至不愿为他说句话。为类似的忘恩负义所触动，康海也曾写过他的一出著名杂剧《中山狼》。

戏曲作家周乐清(1785—1855)创作了一组由统一构思联结起来的戏本，作家本人也是在百姓中以清正廉洁著称的官员。戏本共八种，统名叫《补天石传奇》(1837)。像神话始祖女娲以熔石补天一样，周乐清也企图纠正历史上的不公。他利用流传极广的情节，但把每出戏里的传统悲剧结局都换成了圆满的结尾。比如在《定中原》这出戏里，讲的是英明宰相和战略



根据长篇小说《施公案》创作的以《连环套》为剧情的中国民间画
十九世纪末 同益盛印刷所印刷 莫斯科 Л. 李福清收藏

家诸葛亮消灭司马懿，而把刘禅扶上宝座后，使中原归属蜀国，实现了两国联合。而实际的历史情况是，诸葛亮没达到统一中国的目的就死了。他的敌人魏国大将司马懿也没被打死，当蜀国受到魏国打击时，刘禅杀死妻儿最后自己也自尽了。《纫兰佩》一出戏是写古代大诗人屈原（公元前四世纪）的，根据传统说法，屈原成为宫廷倾轧和阴谋的牺牲品之后，在绝望中投入汨罗江溺水而亡。周乐清却把诗人写成一个被搭救的人，写他回到祖国效力并重新得到楚王的信任。

写传奇剧的还有李文翰（1805—1856），他 1842 至 1847 年间出版了四种戏本。其中最有名的故事《胭脂舄》，取材于蒲松龄的短篇小说《胭脂》。女主人公的艳遇导致犯罪，罪行最终被一批英明的官员揭开，官员还惩治了真正的罪犯——杀人凶手和淫棍。

已经提到过的诗人黄燮清，他从事戏曲创作是文学生活中的一个显眼现象。他写了《倚晴楼七种曲》，比较喜欢使用历史材料。在《茂陵弦》一戏里，他写了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年轻寡妇卓文君的爱情，还讲到司马相如接近武帝并成了他的军师。戏中的爱情故事推动了情节发展，但后来其注意力却转到揭示司马相如的政治见解上去，表达了他具有原则性的大胆议论。《桃溪雪》中勇敢貌美的女主人公吴绛雪，刚刚丧偶，就决心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拯救深爱的城市以免受屈辱和洗劫，个人生活的情节安排使读者准备好接受故事的悲惨结局。戏本《帝女花》是写命运波折及其不可避免性。黄燮清以十七世纪中叶历史事件（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明朝倾覆，满清人继位）为背景，展示降临到明朝末世十五岁公主坤舆头上的考验。

十九世纪中叶将近的时候，北京形成了一种地方戏曲的新品种，后来被

称作京剧。早期京剧剧目由昆剧改编，通常是从大型剧作里选出符合京剧要求的一两幕来编写（单独或混合）。历史情节，尤其是《三国》戏（《群英会》、《定军山》、《捉放曹》、《让成都》）特别多，而且戏里最多见的主角是老生，因为那时老生均由名角扮演。唱词通常由演员自己来编，演出过程中可以随意改动，后来才开始出版京剧唱词。第一部剧本是木刻的，剧名为《极乐世界》，1840 年补上了作者序言，作者托名观剧道人，情节取自蒲松龄的短篇小说《罗刹海市》。大体上说，京剧积蓄力量十分迅速，世纪中叶已相当普及。

622 ·

第二章 朝鲜文学

十九世纪李氏王朝统治摇摇欲坠。正祖王（1777—1800）死后，封建内讧加剧，遭受压制迫害的不仅有基督教拥护者，还有包括"实学"运动支持者在内的许多进步学者。

连绵不断的歉收和饥荒，难以置信的高额征税，无止无休的封建纠纷，加剧了国家的内乱。农民、商人和手工业者起而反抗难以忍受的压迫，大土地所有者又要求享有两班贵族的权利。许多县里开始出现呼吁书，它们的作者号召（甚至以诗歌形式）人民起来争取废除残酷的法律。农民开始行动，起义者烧毁地主的庄院，袭击县里的贪官污吏。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朝鲜文学没有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作品仍以训民正音（又称谚文，朝鲜文字）的文学语言和生动的朝鲜语这两种语言写成。"四家诗"（李德懋、柳得恭、朴齐家、李书九四家）继续向前发展，他们的作品在中国也很出名。

十九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诗人兼思想家之一，是丁若镛（号茶山，1762—1836 年），他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曾对"实学派"思想作了总结，并在十八世纪获得了巨大发展。他著书五百多卷（本），涉及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和军事学诸多领域。他以批判的

623 · 眼光对待儒学原理，揭露不人道的封建剥削制度，主张社会改革。丁若镛的进步观点反映在他的许多诗歌作品里。在《饥民诗》、《龙山吏》、《猎虎行》和其他一些诗篇中，他揭露了两班贵族的浪荡生活，官吏的飞扬跋扈和腐儒们的愚昧无知。

讽刺诗人金笠（字性深，号兰皋，1807—1864 年）的创作，在民间广为流传。他原名金炳渊，但人们主要是从他的笔名金笠去了解他的诗歌才华。他的名字"笠"，取尖顶草帽、斗笠之意。金笠就是头戴一顶斗笠，走遍全国，他边走边写诗，并在城市大街小巷朗诵。他在《咏笠》一诗中写道：

浮浮我笠等虚舟，
一着平生四十秋。
牧竖轻装随野犊，
渔翁本色伴沙鸥。

金笠出身于一个因反对王室而失去财产与特权的两班士大夫家庭。二十岁时成为一名"流浪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明快的幽默和从民间生动语言吸取来的尖锐词语，他用这样的诗句嘲笑富人的贪婪与残暴、愚钝和傲慢，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寄生与腐朽；同时表达了他对普通百姓的热爱，对他们苦难命运的同情（抒情诗《跳蚤》、《两班是非》、《犬》、《嘲两班儿》、《垂头客》、《赤贫》）。金笠还歌颂大自然景色的壮观（《金刚山》、《白海鸥》），写他对生活的沉思（《老人》、《影子》、《站在拒客主人的篱笆门旁》、《自叹》、《鹰》）。金笠的诗歌在社会文士之中也同在黎民百姓之中一样流行。许多初学者有意模仿他，甚至冒充金笠的作品。他的诗歌一直以手抄本流传，直到他死后许多年，才被正式承认，其诗歌才得以出版。

这一时期的小说在继续发展。出现了一批新的民间小说。像从前一样，其中大部分是佚名作品。小说人物与十八世纪同类小说的主人公非常相似。形象的塑造符合那些定型的标准。比如，女主人公要相貌非凡，才干超群，又富有忍耐力。她们不抱怨命运，能毫无怨言地接受降临到她们头上的种种不幸。

歌颂妇女心灵美的《沈清传》，是这类体裁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关于沈清为盲父献身的传说，在《沈清传》成书之前，已流传很久。约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之交，一位无名作者根据传说的主调写出了《沈清传》。同一时间里还出现了不少异名版本。十九世纪下半叶又有人根据小说情节创作了一部剧本。小说明显分为两部分，上半部描写日常生活，现实的主人公在现实的环境中行动；下半部描写女主人公死后发生的事情，用童话式的幻想手法进行描写。姑娘成了祭祀海龙王的祭品，但她并没有死去，她坐在一朵荷花里，掉进了国王的水下宫殿，又从荷花中复出，当上了王后。小说像民间童话一样，有一个圆满结局。小说谴责了欺骗掠夺人民的佛门僧侣。沈清的悲剧故事引起巨大的社会共鸣，因为它被看成为一部背负苦难命运的全体朝鲜人民的悲剧。

《裴裨将传》中的人物就显得不同，描写一个裴姓小官吏和一个妓女爱娘的故事。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一些作者经常选中的女主人公恰恰是妓女（比如《春香传》），因为妓女低微的出身和地位，能更为明显地强调出她们心灵的美丽和行为的高尚。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像是出自以调皮鬼为人物的

滑稽小说，因为无论男女都不是现实的主人公。作为小说情节基础的是十七世纪一位作家写的一个裸体官吏被关进柜子的故事，故事情节曾在许多国家流传。小说开始时，爱娘既泼辣又狡猾，她以谄媚和伪善掠夺了裨将。可是到最后，像中世纪小说的女主人公常有的那样，爱娘变了一个人，她成了一个恪守妇道的忠实妻子。裴裨将也脱胎换骨改邪归正，并在小说结尾成了一名英明而公正的地方官。

《彩凤感别曲》的主人公（姑娘彩凤和青年张弼成）是理想化的人物。像许多其他小说一样，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吏，赶来搭救处于困境时刻的主人公。他惩罚罪犯，解救受冤枉的好人，他起到的作用像是有一股超凡脱俗的善良势力在干预。《彩凤感别曲》的书名也取得不寻常。一般来说，中世纪的小说都以男女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并将小说视为一种独特的传记。像现在这样写，书名则强调了小说中诗句的作用。姑娘写的叙事诗不仅表明彩凤的写诗天才和渊博学识，而且引导读者去注意女主人公的情感和体验的深度。小说里没有传统的交代——程式化的景物描写或者主人公品质和相貌的描述。情节是动态中发展的，这一点使它接近长篇小说（如十七世纪金万重的《九云梦》）。但就是《彩凤感别曲》中那些看来似乎具有中世纪小说的典型特点，也已经具有了另一种新的品格。描写人的那种传统公式和片面性被破坏了。女主人公没有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行事，她坚持自由，为爱而出嫁，拒绝父亲加给她的那个富家子弟。这部作品和《春香传》一样，提升了人的个性，而这一点，对于妇女的个性尤其重要。这些小说，以及金笠的诗歌，都反映了十九世纪上半叶朝鲜文学中的一些新潮流，这些新潮流将在世纪的下半叶得到进一步发展。

624·

第三章 日本文学

1. 世纪上半叶日本文化的发展

十九世纪初，日本明显表现出经济衰退和整个封建关系解体的征兆，封建关系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桎梏。商品货币关系的增强和资本主义方式的发展，导致了封建社会制度的动摇，加速了军事贵族统治阶级的瓦解和内部的分化过程。

德川晚期社会的人物，不再是巩固封建秩序时期忠于封建领主、时刻准备建功立业的英勇义士，而是浪人，即由于先主失去封建氏族地位而被迫辞职的武士。浪人为寻求生存手段蜂拥般流入城市。他们之中有人学手

艺，有人做生意，或者就去当作家、画家、医生，有的甚至沦入社会最底层。贵族丧失了经济实力和社会威望，不能不令统治集团恐慌。他们为缓解统治阶级的财政状况而加紧盘剥农民。于是暴动遍及全国，不时地发展为农民战争。

同时，出现了不满德川政策的诸侯组织，其目的是在复辟皇权的口号下推翻幕府统治。加入统治集团敌对营垒的有经济上业已巩固、政治上尚无权力的城市资产阶级，以及怀有激进情绪的知识分子。从本质上反对封建主义的先进分子，是那些"兰学派"的拥护者。十九世纪的"兰学派"人物有高野长英、吉田松阴、渡边华山等。他们在介绍西方（主要是荷兰）科学成就的时候，意识到日本落后于欧洲国家，于是批评幕府实施的锁国政策，主张打开国门同外界建立贸易联系。在形成反幕府的思想派别中，起巨大作用的还有"国学派"，十九世纪上半叶，这一思潮的最大代表是平田笃胤（1776—1843）。平田的那些论述日本古代文学名著和神道的著作，其主要热情在推崇作为日本素来统治形式的古代帝制，他把古代帝制和现行制度相对照，认为后者是"篡了位"的。平田笃胤的观点成了反对现行制度那场运动的思想支柱。

·625

在这一形势下，政府把最严厉地推行社会生活细则和残酷监督政策视为克服混乱的唯一法宝。所有反对正统新儒学的社会思潮都被说成"伪科学"，它们的拥护者都遭到迫害。任何加入反政府活动的行为都会受到死刑的严惩。



蒲原　雪下乡村　彩色木版画　安藤广重作
取自《东海道五十三景》约 1834 年
莫斯科　普希金国立美术博物馆藏

文学和戏剧中，禁止表现当代事件，不仅个别作者的作品，而且全部体裁都遭到禁止。责成作家在创作中毫不动摇地贯彻儒学道德原则。这样一

个停滞、黑暗、绝望(一些日本史学家这样描述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不可能不在文化的特点中反映出来。那时的艺术创作中充满着生活的不稳定感。在文学、戏剧和造型艺术中,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类似西欧巴洛克的风格。

那么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文学中确立起来的这种新风格,其主要手法是怎样的呢?十七世纪作家曾满腔热情歌颂人自身的人格价值,在如今的文学中这种热情明显下降。个人是作为许多事件的众多参考者之一被描写的,人的个人命运受不受关注,取决于它同氏族或部族命运相联系的程度。在戏剧作品和侠义小说中,可以看到众多的人物角色,在版画作品"浮士绘"中,也开始出现人物众多的构图。人的内心世界只有通过其外部表现才能得到揭示。人物的日常生活环境失去时代的具体标志,代之以假定性的历史特征。艺术表现了强烈的热情,强调了人物的超人胆识和英勇。动态原则在文学中具有了特殊意义,一幅叙述主人公的战功、冒险和神秘变形的宏伟画卷,便创作出来了。看来,新风格的内在要求之产生,在于那时的作家倾向于14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材料,以及复杂情节和不寻常的叙述类型。十九世纪上半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所有中国叙事小说的日文译本和改编,它们的情节和形象在文学中被广泛利用,从而赋予日本文学以一定的异域情调和精致风格。

626・

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艺术最重要的特点是追求惊人的震撼效果。它珍视不同寻常的内容,追求幻想手法,即使作品以众所周知的现实事件或具体史实为基础,也运用虚构。人们对彼岸现象的兴趣日益增长,在戏剧、版画和充斥自然主义细节的叙事文学里,都有幽灵、鬼魂、人类苦难、垂死挣扎和杀人场面的出现。世界是噩梦般的,同人格格不入的。人经常失去尊严。他丑陋,有时还十分怪诞,孤立无援。有名的北斋(1760—1849)创作了一套含有寓意的版画,上面的人不像落在蛛网上的苍蝇,就像衔住渔翁钓钩的鱼儿。倾向于寓意、象征、抽象善恶标准的人格化趋势,一般来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艺术所固有的特点,不仅造型艺术是如此,语言艺术也是如此,戏剧和叙事作品的情节冲突,往往建立在好坏两类人物的对抗上,而其结局必然是善战胜恶。

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中的一个显著倾向是将现实神话化。如果说十七世纪作家的作品中人物性格和事件一般是由现实生活环境决定的,那么德川晚期作家笔下的世界状况和人类行为,则被看成某种神赐的结果。时代的艺术意识似乎又返回到中世纪(佛教)关于现世万物的空想观念中了。人们的命运也在因果报应的思想轨道上被诠释。艺术不仅将现实神话化,而且将它戏剧化。描绘那些扮演著名角色的演员,已成为版画最喜爱的主

题。戏剧诗学影响到散文，在散文中情境的戏剧性具有巨大意义，而人物的塑造要符合一定的戏剧角色类型。所有这一切都赋予那时的艺术以假定性。世界仿佛是戏剧的舞台，而人们的生活被理解为演戏，有时候是悲剧，有时候又像是欢乐的闹剧。

十九世纪上半叶，新艺术风格的形成，是与丧失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头二十五年的许多文学成就联系在一起的，那些文学成就以真正的人道主义、热爱生活和现实性为其特点。这种新风格同西鹤和近松门佐卫门的优秀作品所素有的"同现实的亲昵接触"（巴赫金语），是格格不入的。然而，把幕府晚期的艺术文化仅仅想象为绝对退步也是不正确的。在它的发展道路上也有一些无可争议的成果，特别是在彩色版画和歌舞伎艺术方面。艺术视觉的非凡和反常，对世界不协调的感觉，使当时一些杰出大师冲出传统主题范围，借助离奇的象征和怪诞的手法传达现实的内部矛盾，更深入地探索了人的情感世界。在叙事散文小说中出现了一种长篇——史诗体裁，这种体裁与先前文学不同，它描写的不是一连串的冒险，而是所写事件的经过严格论证了的和相互制约的一整套情节结构体系。

这一时期诗歌中盛行一种相反的倾向——简化一切描写手段。它涵盖不了叙事文学的全部体裁。除了时代的基本文体外，得到发展的是以口语写成的平民小说（言情小说和滑稽小说形成）。这是一种努力贴近现实的文学。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江户文化，也就是首都文化繁荣的时期。早先日本文化生活的荟萃地是西部城市京都和大阪，称作上方文化，十八世纪末被江户文化取而代之。这种迁移证明幕府首都江户已成为全民族文化中心，它在语言上也反映了出来：东部关东方言占据了文学主导地位，就像以前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都用京都大阪语言、关西方言写成一样。文化由西而东的迁移过程，明显地改变了文化生活的地图，使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传统，这从文学发展的许多特点中反映了出来。

2. 戏剧和剧院

十九世纪初一种传统，一成不变保持至今的戏剧形式，就是歌舞伎。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存在着两类戏剧艺术：歌舞伎和木偶戏净瑠璃。十八世纪末木偶戏已不再盛行，由活演员上演的歌舞伎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时候江户已成为戏剧创作和表演艺术的中心。1793 年由世纪中叶大阪剧作家并木士雄造发明的旋转舞台，成了江户戏剧演出的宝贝，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又发明了双面旋转台，为施展全部特技，表现戏剧演出的舞台效果创

造了条件。十九世纪上半叶,标志着歌舞伎剧作发展的全新阶段。如果说从前歌舞伎的戏文只是演员可以随意改动的演出情节示意图,那么这一时期的歌舞伎剧作才首次具有了文学意义。从前剧作家是戏剧中的次要角色,现在演出成功与否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剧本的优劣。

十九世纪前三十年的领衔歌舞伎剧作家是鹤屋南北四世(1755—1829)。他出身于手艺人家庭,很早就有投身于戏剧事业的志向,但许多年间都只给别人的剧本写个别场次,直到1801年才成为一个戏班的首席剧作家。他的第一部独立剧本是《天竺德兵卫异国故事》,写于1804年。主题是由现实事件引起的: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播磨省一名商人两次出海印度并因此而获得绰号"印度(天竺)人德兵卫"。他写的旅途见闻得以保留下来,南北曾经读过。不过《异国故事》主人公经历的那些不可思议的惊险故事,在南北的作品里只具有充当其中一段插曲的资格。剧本是以所谓的"历史剧"的传统写成的,决定情节纠葛的是一个强有力的凶犯,某个朝鲜大臣所施展的诡计,他想借助巫术以夺取对日本的统治权。随着剧情的展开,一切都清楚了,德兵卫就是这个大臣的亲生儿子。在父亲死后,他企图实现其父的险恶阴谋。南北的剧本与前辈作品的区别并不很大,不过,同异国情调和神话情趣相结合的舞台效果,保证了它在观众中的成功。剧本作者也由此具有了优秀剧作家的名气。

1804—1829年,南北写了一百多部剧本,主要是对前几世纪歌舞伎剧本的加工。他的许多剧本源于传统体裁的家庭故事,即关于诸侯家庭内部的纠纷和倾轧,如《破解心灵之秘的彩线》(1810)、《东部樱花女的故事》(1817)。此类体裁剧本的情节线索,可以这样来形容:诸侯死后,其财产应当由继承人来掌管。但突然发现祖先遗物被盗,为了家族的荣誉和财富的复归,必须把失物找回来。接下来是一连串与寻找失物有关的惊险情节。最后失物回到合法物主手中。恶受到惩罚,善取得胜利。剧本刻画了种种不同的典型:有偷盗家庭贵重物品的凶犯,有忠于老爷的艺妓,还有帮忙寻找凶犯的神仙和鬼魂。鹤屋南北在构想家庭纪事剧本时,严格遵循体裁法则。但与此同时,他在阐释主要人物形象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自由,以此来改变戏剧的假定世界。在南北的许多剧本里没有出现"善"与"恶"的尖锐对立,剧中人物的性格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片面性,抽象道德价值间的冲突,转入了人际关系的领域。

不仅在鹤屋南北的创作中,也在整个歌舞伎剧目中,总的来说,最重要的剧本之一是《东海道四谷怪谈》(1825)。剧本主人公是无业武士民谷伊右卫门,他背叛了自己的领主,根据报应法则应该受到严惩。剧情的进一步发展都与伊右卫门的新罪行有关,其结果,把主人公引向了早就注定的

结局。伊右卫门由于生计而极度绝望，他妄图杀死妻子阿岩，娶有钱邻居稀音家的女儿青梅为妻。伊右卫门通过自己的仆人小平从邻人手里弄到毒药，以冒充治病的草药端给妻子。面容扭曲丑陋、精神受妒忌折磨的阿岩濒临死亡。伊右卫门又来责难小平同自己的妻子有染，为了摆脱他，把他跟阿岩的尸体一起钉到木门上，再把木门抛到河里。死者的鬼魂有着年轻妻子和岳丈的面容，它对伊右卫门穷追不舍。为了摆脱可怕的妖魔纠缠，伊右卫门杀死了青梅和仆人，剧本终场时，他自己也死在一个宿敌手下。这出戏揭示出当时文学风格所固有的全部特征，即非理性，对恐怖的病态追逐，对残酷举止的崇拜和走投无路的低沉情绪。戏里的全部事件集中表达了一个思想，即恶遭恶报的不可避免。无情的劫数不仅惩罚了伊右卫门，也使违抗父命、嫁给他的阿岩，以及在阿岩死亡中负有罪责的稀音家父女成了牺牲品。不过作品的含义，绝不在于将具有早期歌舞伎戏剧精神的善恶主题抽象道德化。剧本的悲剧性冲突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矛盾，在许多方面受着社会和心理的制约。主要主人公的形象不是恶的抽象象征，而是社会生活具体罪恶的体现，南北戏剧的艺术创新和重大意义正在这里。

南北死后，戏剧的发展明显衰退。快到五十年代时，才有一批新作品充实歌舞伎剧目，这时的江户戏剧领衔剧作家是濑川如皋三世（1806—1881）；他最著名的剧作是《东山樱花庄子》。樱花庄子是个历史人物，下总省的一个乡长。他挺身而出保护深受诸侯苛捐杂税之苦的农民，敢于把请愿书递到幕府将军本人手里，因而在 1653 年连同妻儿一起被钉上十字架。濑川如皋的剧本叙述的就是这样一个为拯救同乡而献身的英雄的悲剧命运。剧本的结构中心是樱花庄子启程去东京之前，同家人告别的场景。他明知等待他和亲人的是痛苦的死刑，但准备至死都要完成自己做人民保护者的使命。剧终时，被处死的樱花庄子变成了一个对自己的折磨者毫不退让、紧追不舍的可怕幽灵。剧作家根据那时的戏剧美学原则，重新处理了历史材料。剧本用很多虚构情节把现实的同幻想的事物别出心裁地交织起来，农民暴动主题本身也赋予这部作品以现实的迫切性。

十九世纪上半叶，戏剧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与河竹默阿弥（1816—1893）这一名家分不开。默阿弥是江户一个成就不菲的商人之子，他酷爱戏剧，跟剧作大师学戏，其名字首次出现于剧目海报上是 1835 年。默阿弥共创作剧本三百六十部。他最爱写的主人公是反对道德规范和社会制度的强盗。在许多剧本里，作者都把自己的人物理想化，使之具有灵魂高尚的特点。比如，同名剧本主人公鼠小鬼就是一个劫富济贫的高尚强盗。但大多情况下，他笔下的强盗形象都丧失了浪漫主义的光环：这是一个盗贼、杀手、勒索者。在沦落到社会最底层后，被排斥，被追逐，犯下了所有的新罪，

最后要么自灭，要么落入统治者手中。

默阿弥的剧本主题是现实本身所提出的。在食物持续匮乏，人民生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犯罪率大幅上升，掠夺团伙拦路抢劫。一个因贫困而加入盗贼团伙的浪人；一个为帮助陷入债务的老爷而行窃和凶杀的忠实卫士；一个被快要饿死的父母卖给“青楼”的农家少女——所有这些默阿弥的人物，都与当时的现实保持着生动的联系。血淋淋的罪行，暴力和淫乱场面，在他的剧本里汇成了一个社会解体的可怕形象。默阿弥剧本的特色不仅仅在于对当时现实问题的兴趣，还在于它本身就具有丰富的舞台表演可能性。剧本《河内山和直侍》叙述一个直侍和尚的故事。他因为爱上一个高等妓女而丢掉僧侣称号，从而走上了抢劫道路；剧本重头戏是主人公的精神“复活”。直侍回顾自己的一生时，认识到破坏僧侣的誓言之后，不可629·能再回到德行的道路上去，于是他从此屡屡犯罪只干坏事。所有这些场面都是“哑”场。笃信宗教的和尚变成一个凶犯，只借助变换演员的面部表情来加以表现。默阿弥戏剧的固有的紧张情绪及表现人物的可信程度，给他带来了卓越戏剧家的荣誉，他的剧本迄今没有离开过舞台。

戏剧艺术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起过特别重要的作用。这种艺术对当代人的智慧和心灵所产生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其间接的证明便是政府对剧团的迫害。1841 年，幕府将军的谋士水野忠邦提出一个限制戏剧创作，威胁歌舞伎剧种存在的改革纲领，下令把戏班迁往郊区，禁止演员同其他市民接触。演员社会地位极其低下，以致人口普查都不把他们统计在内。但歌舞伎剧种不但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生存下来，而且推出了大批杰出的剧作家和演员。

3. 诗歌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诗歌是在与戏剧作品不同的另一种风格轨道上发展的，不过它也体现了这一文化时期的特点。早在芭蕉(1644—1694)和芜村(1716—1783)的创作中已达辉煌顶点的抒情俳谐诗，随着小林一茶(1763—1827)的步入文坛而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阶段。一茶出身于农民家庭，少年时期为求生计从家乡信州来到江户，跟一名俳句大师学创作。1790 年大师死后，一茶自撑门面树起诗歌学派。他的整个一生都是在艰难困苦中度过的。他在一首描写新年的俳句中写道：

就是这种节日的欢乐，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只苦涩的苹果，

啊，这穷人的春天！



小林一茶 肖像画
松村春甫作 1810年

一茶创作了两万多首俳句，主题和诗歌语言都很有特色。他写的《我之春》(1819)和《父亲寿终日记》等抒情散文，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一茶进行创作的时代，俳句不仅占据了日本诗歌的主导地位，而且已开始形成一个封闭式的艺术体系。芭蕉的美学原则已具有了不可动摇的经典性质。芭蕉所描写的千变万化的大自然画面，都充满了深刻的哲理思考，在当时的作品里，同类描写也往往成为一种形式手段和对传统的遵循。芭蕉诗歌素有的内在原则——会神的直观性，寓意性，言犹未尽，是由他对生活的创造性思考产生的，而到了他的追随者手里后，却变成了目的本身，变成了表现作诗艺术的方法。

一茶在继承芭蕉传统的同时，以新的内容充实了俳谐诗，并增添了新的韵律。无论他写什么(写途中夜宿、家乡风光、青蛙逗趣，或是冬夜无家可归的幼童，写会友之欢或是丧友之悲)，他的全部抒情诗都明显地表现了诗人对世界的个人态度。如果说芭蕉的创作是在佛教—禅影响下形成的，一般说，感情比较富于包容性，个人因素已经化解于某种超出个人之上的情感之中(这赋予他的创作以哲理深度和非单一性)，那么在一茶的作品中，就永远存在情感的一个现实而具体的载体，即诗人本人： •630

晚间纳凉，默想静思，
当暮钟乍响时，
我蓦然领悟了那运命的无常。

他抒情诗的首要主题是歌颂大自然的壮观，在这壮观的自然面前人人平等：

我们当中无一外人，
我们彼此情同手足，亲如弟兄，
在樱桃树下齐开共盛！

一茶的俳句语言质朴而又富有表现力，其中常常夹有口语语调和玩笑语气：

> 我不晓得此地的人怎么样，
> 只知田间吓鸟的稻草人
> 全是瞎子，直至最后一个。

一茶的诗歌尽管自然、具体、朴素，还是以它自己特有的方式来表现讽喻，描写青蛙、麻雀、苍蝇、蜗牛等小昆虫动物的诗篇，在他的创作中占有不小的分量：

> 喂，别后退，
> 你这瘦瘦的青蛙！
> 一茶在给你加油哪！

这些诗篇不是诗兴大发时的即兴之作，它们记录的是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对俳谐诗来说，置身于自然界的万物都具有美和意义。像在北斋的风景素描中一样，在一茶的这些抒情诗里，以寓意方式表现了对那些为命运所作贱，自身尊严蒙受侮辱的人们的深切同情。小林一茶拓展了俳句的范围，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它的审美本质，简化了诗句语言，他的抒情诗为俳句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他所提供的发展空间在新时期一些诗人的创作中确立下来。

短歌是日本抒情诗中的古老格律，十七世纪开始走下坡路，但十八世纪上半叶又成了短歌成就卓著的发展阶段。城市文化的兴趣产生了俳谐诗，把短歌排挤到了后面，不过短歌具有封闭式的这一特点，使它成了少数热衷古风者的寄托。可是快到十八世纪末的时候，情况发生明显变化。大批有才华的诗人给这个似乎奄奄一息的体裁注入了新的生命。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及其他一些十八世纪"国学派"的学者，都从事日本文学古代文献的语言学研究，他们不仅引起人们对古代经典短歌的兴趣，而且在研究这一格律的优秀范本时，提出以"真情"为重的诗歌原则，并把不受传统约束的诗歌经验的原生性观念与这一原则结合了起来。十九世纪上半叶亮贯(1753—1831)、香川景树(1768—1843)、桔曙览(1812—1868)、大隈言道(1798—1868)等诗人在遵循这个原则的同时，努力以创新精神反思古典主义短歌传统。他们在自己的作品里经常运用合乎规范的新意，由传统引申出来的象征和"季节"的形象性，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不是形式手段，而是

表达个人情感和体验的一种方法。

身后我将把什么
留给这个世界呢?
春天——樱桃树林,
夏季——声声布谷;
金秋——那成熟了的槭树树种。
——亮贯

对当时短歌作者产生主要影响的是俳谐诗。不少作者研究芭蕉的遗产时都尊他为师。正是俳谐诗以其承认一切现实现象值得诗意歌颂这一点,促进了短歌题材的扩大,赋予短歌以生动直接地反映所见所闻的特性。对十九世纪上半叶的短歌来说,不再有"低级"形象存在,它勇敢面对日常生活,珍视准确可信的细节。刻意贴近日常生活的短歌得以繁荣,与桔曙览的创作密不可分。他有意放弃流行的"诗歌"题材,从实际生活简单纯朴的欢乐中吸取灵感:

在发烫的火盆边
甜蜜地打个盹,
该有多么惬意!
世上再没人能
把你推醒。

诗歌面向日常生活题材,导致了其调性的改变。短歌很少唱出散发着万事皆空思绪的音符。尽管运用的是传统形象,诗中更常听到的却是与按本来面目接受生活紧密相连的,认可生活的主旋律: ·631

人活一世
好似旋花开放,
那一瞬,那一日……
我不再需要什么,
除了我已拥有的此种生活。
——亮贯

创作短歌的诗人们克服了教条的积习,为艺术视觉的新原则铺设了道

路。他们的创作是把古典主义短歌传统，与文学新时期改造这一格律的运动结合起来的中间环节。

4. 叙事散文

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文艺学中的小说有个总名称叫做“戏作”（戏说的意思）。这个术语十八世纪末开始使用，当时一些有文化的人常常为了“解闷”而写些小说性质的东西，为了把它与“学术”著作区别开来而称它为“戏作”。虽然起初这个术语含有非艺术行话的意思（艺术创作被认为是闲暇时光的高雅消遣），后来它却逐渐向所有作者的作品靠拢，也包括以文学为生的职业作家的创作。

戏作不是单一的小说体裁。它里面既包括了以雅致风格写出的“高雅”体裁作品，也包括了用口语创作的低级通俗小说。“读本”属于“高雅”体，是用来读的，这样叫它是为了区别后一种的“绘本”；“绘本”主要部分是简单的木版画，文字起辅助作用。“读本”也有插图，但它的基本部分是文字。十九世纪上半叶读本的基本主题是写中世纪神奇勇士们的丰功伟绩和冒险故事，他们冒险的目的是恢复自己氏族的光荣和威力。从体裁看，这是一种准历史侠义小说，是两种东西独特的折射，一方面有日本的封建叙事诗传统；另方面有中国十四世纪长篇史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特点。读本注重虚构，童话和神话旋律很强。尽管不乏确切的历史背景，也提到一些真实的事件和现实的历史人物，读本的历史主义显然受到限制。在描写过去的事件时，明显流露出“非历史化”和把史料神话化的倾向。读本的特点在于，按阶段性考察，它不属于中世纪艺术传统，而属于另一类文化。读本神话化的起因是作者对当代社会的失望，他们感到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真正的理想。读本中的幻想、英勇、历史、神话都具有了不同于日本叙事传说或者中国历史英雄小说的性质，它们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显然程式化的艺术幻想世界，一个与现实的无道世界和日常小说相对立的世界。这类作品的创作者感到自己不是一个简单的作家，而是一个教育者，自己的使命是适应儒学传统要求，以“警恶唤善”的创作教育人。与这一规定密不可分的是读本写人的原则：形象的象征和道德意义要压倒生活的具体特性。

十九世纪上半叶最大的读本作家是泷泽马琴（1767—1848）。他是一个不富裕的武士子弟，放弃了世袭特权，辞去了武士职务，把一生献给了写作事业。马琴不仅是本国文学名人而且是中国文学名人。由于改写日本英雄史诗名著和中国长篇小说《水浒传》及《金瓶梅》（十六世纪），使他成名。

不过他真正的荣誉是以自己的史传演义小说而取得的。马琴这种体裁的早期作品之一，是1804年[①]完成的《椿说弓张目》，描写中世纪著名义士源为朝的冒险故事。1156—1159的荒乱年代里，随着家道中落，主人公源被放逐到大岛，但他从那里逃脱了。经过多年漂泊，他来到琉球岛。主人公在那里作出许多义举，从一群图谋篡位的歹徒手下救出公主，并娶了她，当上一个幸福昌盛国家的国王。

长篇小说的情节以现实事件为依据，这些事件都和十二世纪中叶源氏望族的败落有关，不过作者的构思并未遵循历史的真实。从《镰仓年代传说故事》(13世纪)可以知道，为朝在放逐中死了。在马琴的小说里，这位主角不但以奇妙方法从敌人手下获救，而且成了琉球诸国王朝的奠基人。像史诗主人公该有的一样，他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和胆识，不过作者集中注意的与其说是为朝的赫赫战功，不如说是他的美德。主人公是作为某种正义理想世界的缔造者出现的，这世界既符合儒家道德原则又符合武士理想。马琴讲到主人公的命运时，经常提醒读者，任何不良举动：对领主不忠也好，儿子不孝也好，都不会不受惩罚，而善行总能使人战胜困难取得胜利。训诫是作家艺术方法中须臾不曾离开的特点。 ·632

训诫充分表现在马琴1814—1841年间分部发表的最著名长篇小说《南总里见八犬传》里。马琴创作这部宏篇巨作时，以反映十五世纪事件的编年史为基础，但史料仅在确定作品的时间范围，以及选择作为主要人物之一的强有力的封建主——义实里见(1417—1488)时起了作用，小说的情节和主人公的命运却完全是虚构的。小说的书名有点非同寻常，这是由于小说开端的一段插曲之故。义实里见的城堡被敌人包围，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义实在绝望中许诺，谁能拿下敌人的头来给他，就把自己漂亮的女儿许配给谁。他的警犬八房立即站起身来，很快带回敌酋首级。义实克敌制胜，不能违背自己的诺言，于是伏姬和八房进了山洞。

一年之后，伏姬得到神的启示：她将生下一群无畏的勇士，他们能使里见一家的光荣和力量倍增。此时，义实的一个忠实诸侯出现了，义实本来有意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正是他在深山里找到了一个蔽护所，为救出未婚妻，向八房开枪射击。但一颗子弹却打中了伏姬。这时从伏姬伤口升起一团白气，白气托起她的水晶念珠并把它们带往天空(这神奇念珠中的八颗珠子，每颗上都写着一个汉字，标明儒家的一种道德理念。念珠原是伏姬生病时，爸爸从寺庙里请来的。它治好了女孩的病，从那以后，女孩就把

① 中国学者认为是1806—1811年。——译注

它戴在颈上，从未分开）。珠子向四面八方飞落，每到一处就生一个孩子。每个孩子手里都握有一颗珠子，他们的名字又都以“犬”字开头。起初他们没料到彼此的存在，但后来他们见了面，并根据珠子认了亲。八位义士屡建奇功，为里见家杀敌复仇，战胜了无数凶恶的妖魔鬼怪，保护了大批无辜的受害者。书的结尾写到，他们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成了圣贤，在伏姬和八房住过的山洞集合，又像当初出现一样，奇妙地消失了。

《八犬传》表现出中国文学影响的明显痕迹，而且不仅有传奇小说的影响，还有中世纪早期志怪小说的影响。比如，小说中起关键作用的伏姬和八房的故事情节，就来源于干宝的《搜神记》（四世纪）。干宝有一篇故事写一只狗，名叫盘瓠，它把敌方将军戎吴的头衔来交给神话般的帝喾高辛氏，得到了他的女儿作为奖赏。盘瓠夫妇搬进山洞居住，他们的子孙后代则繁衍为居住在中国南方的部族。小说的这个情节反映了古代关于图腾祖先的观念。马琴的小说利用这个情节不仅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文学手法，而且也成了作者独立进行神话创作的依托。伏姬和八房在一定意义上类似神话般的英雄始祖。他们是新一代勇士和高尚男子的奠基者，负有在恪守儒家道德的基础上恢复世界和谐的使命。

马琴的小说情节结构复杂，众多人物的命运和行动不仅连为一体而且相互制约。佛教因果报应思想是小说的主要组成部分。马琴认为里见氏族经受如此考验的原因，是当初义实曾犯过一个对武士来说不可饶恕的错误——他没有履行保全一个敌人之妾性命的诺言。死者的复仇阴魂附在了一个豢养八房的胡獾身上。这样一来，小说后来事件的发展就是早已确定的了。作为对背信弃义的惩罚，义实失去了爱女。女儿出生以后就注定要为父亲赎罪，难怪她名字里的“伏”字是由“人”和“犬”二字组成。她把自己的命运和八房连在一起的时候，为拯救里见氏族而牺牲了自己。在个人的幸福愿望和职责之间进行道德选择的这个时刻，是极其悲剧性的，但也完全是同一回事。不允许二者择一。在道德家马琴看来，无条件尽职是通向人性和社会完善的唯一途径。小说把严格的道德训诫同引人入胜的虚构结合起来，正是这一点赋予了作品以统一性和完整性。马琴的创作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叙事文学中最有意义的现象之一。他的小说辞藻过于华丽，饱含诗意的对往事的联想与暗喻，由于采用中国传统中有节奏地组织起来的圆周句和形象而变得较为复杂。他的书首先是写给有教养的读者看的，但其中包含的灵魂高尚与正义思想，明显表现出来的传奇特点和情节的多样性，又使它成了广大读者的财富。

另一名作家——柳亭种彦（1783—1842）的长篇小说接近马琴的作品。他出身武士望族，吃穿不愁，往往不是为衣食而是为消遣写作。他和马琴

633 •

一样，以创作传奇小说为主，不过不是那么依据中国小说传统，而是依据歌舞伎的“历史剧”诗学。种彦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是《伪紫式部的乡村源氏》，是紫式部久负盛名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十一世纪）的改写本。《源氏物语》在日本漫长的文学史上一直保留着它的美学声誉，并对后世历代创作产生着积极影响。在十七世纪，《源氏物语》成为井原西鹤长篇小说《好色一代男》艺术再认识的对象，长篇中讲述一个源氏王子讽刺性同貌人（市民世之介）的故事，这个故事旨在再现那个时代日本生活的广阔而现实的画面。柳亭种彦以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紫式部长篇小说的材料。他把《源氏物语》的情节，搬到流血的内讧与纷争不断的十五世纪。小说事件不是在宫廷温文尔雅的环境中展开，而是在政治阴谋、流血倾轧和残酷屠戮的氛围里展开。处于小说描写中心的是门第高贵的武士，幕府将军足利义正（1435—1490）的儿子光氏和他的爱妾，一个出身不甚高贵的女子花桐。书名里“乡村的”不能从字面上理解，因为对被宫廷贵妇紫式部视为首都文明载体的显贵来说，新型军事贵族（种彦讲的正是这个阶层和他们的理想）都是些粗俗的野蛮人。像“光彩照人的王子源氏”一样，光氏被描写为漂亮非凡，才华横溢，而且淡泊名利，远离权势。不过当得知贵重的祖先遗物去向不明时，他却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找回来，于是，与寻找失物相连的一连串惊险情节开始了，有点御家物的戏剧味道。小说对光氏的爱情奇遇描写，浓墨重彩，不过带有强调惊险的性质，但对两位主人公的内在情感生活则无强烈追求。

在把紫式部的言情小说改写为情节充满激烈冲突的作品时，种彦彻底丧失了小说的抒情性和心理深度。与崇拜“物哀”相连的《源氏物语》的高雅唯美倾向，让位给了积极的叙事原则，也让位给了对勇敢、无畏与机智的崇尚。性格的心理可信程度，已被以假定的戏剧类型角色为公开方向的“类型演员素质”所取代。但正是这种惊险性和戏剧效果的目标，吸引了那时的读者。在许多岁月里（小说第一部出版于1829年，最后一部第三十八部出版于1842年），读者急切地等待着每部新书的问世。小说语言精致，情节引人入胜，与《源氏物语》的情节相呼应，更给小说增添了几分优美。但在种彦的书里，或许缺少一点紫式部作品所固有的最基本东西，即那复杂而有生命力的“人类内容”。小说《伪紫式部的乡村源氏》明显地表现出了时代艺术风格的许多重要特点，同时也成了其历史局限性的证明。英雄传奇小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奇妙而独特的文学产品之一，但是，为日本小说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的并不是它，而是那些可靠地反映当代人生活，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作品。 ·634

属于这类作品的，首先是中篇言情小说和长篇“人情本”小说。这一体

裁形成于十九世纪初，以上个世纪流行的失意浪子的“青楼”冒险小说为基础。人情本小说也绘声绘色地描写“妓院”风俗，但小说写得严肃，甚至装腔作势。小说着重点不在讲述人的冒险故事，而在表达人物的感情和体验。中国通俗小说《金瓶梅》影响到“人情本”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不过“人情本”的主人公不是西门庆之类的放荡公子，而是又高尚又敏感，有深刻爱情体验的青年人。与中国长篇小说相比，其中的色情成分有明显减轻和降低。主要的情节结构原则不是宣扬情欲徒劳无益的佛教思想，而是讲述忠贞爱情怎样帮助主人公克服一切考验并得到幸福的故事。

为永春水（1790—1843）因创作了大量人情本作品而享有盛名。他市民出身，熟悉江户娱乐区小市民——商人、店员、妓女、演员的生活，这五光十色城市人群的代表，便成了他言情小说的人物，其中最优秀的一篇小说名为《春色梅历》（1832—1833）。小说主人公丹次郎是一个大臣的私生子，交给一个妓院老板抚养。为给丹次郎继承养父事业而设置障碍，妓院一个店员诬告他偷了贵重物品。倒霉的年轻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被迫躲了起来。丹次郎有一个未婚妻和两个艺妓情人。主人公靠她们的帮助揭发了诬陷者，收回了自己的产业。他同未婚妻完婚后，又将其中一个情人纳为小妾。

这部作品的主要价值在于它面向当代现实生活，有血有肉忠实可信地描写了普通市民的道德风貌。春水小说里的人物与马琴和种彦笔下的人物之不同在于他不是美德和缺陷的抽象体现，而是生动艺术观察的客体。力求“从内在”思考人的个性，力求深入到主人公灵魂运动和情感发展的复杂世界中去，是春水创作的特点，从他的创作中有一条直线通向新时期的现实主义小说。春水的革新还表现于，他是最早意识到活的语言在创造艺术作品中的丰富可能性的日本作家之一。小说是用口语写的，对话占有显著地位。人物说话相当富于个性，而且成为塑造形象的一种基本手法。面向人物情感世界的“人情本”小说，客观上带有反封建反儒学的性质，因而成为政府监察部门抨击的对象。1841 年春水的一些作品被宣布为“不道德”作品，作家在家中被捕并戴了五十天手枷，书籍也被查禁和销毁。这些镇压手段不可能不影响春水及其后继者的创作。往后几十年的言情小说带有公开道德说教性质，毫无疑问，这降低了它的艺术价值。直到十九世纪末，随着醉心欧洲文学时期的到来，日本知识分子开始面向民族传统，对江户人情本的兴趣才得以复苏。春水的小说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著名小说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与十九世纪上半叶中长篇言情小说同时发展的，还有另一类通俗小说——惊险喜剧小说和喜剧小说滑稽本。具有真正人民精神的这一体裁作品，继承了中世纪的闹剧狂言、十七和十八世纪讽刺性摹拟散文的传统，以

及井原西鹤短篇小说的传统。滑稽本的领衔作者是十返舍一九(1765—1831)。有关他的一生,保留下来了不少传说和趣闻,这些传说趣闻把他形容为一个性情古怪的人、放荡子、插科打诨者。这是人们的想象力把他的那些通俗易懂作品的人物特点,转移到了心爱作家身上。实际上一九出身于贵族家庭,他在脱离氏族成为作家之前流浪了很长时间。起初他为木偶剧团写剧本,后来定居江户之后创作了不少幻想和言情小说。使他名留于世的作品,则是描写调皮鬼的喜剧小说《东海道徒步旅行记》(1802—1822)。小说情节的大致轮廓是,两个江户平民,快乐的调皮鬼弥次郎兵卫和北八,他们听说古都京都非常漂亮就沿东海道前往那里去冒险。他们沿途遇到了各个社会阶层各种职业的人物,从商人、武士、僧侣、农民、赶驴人、高等妓女到流氓、地痞、小偷、骗子手等,无所不有,一幅带有大量色彩鲜明滑稽可笑细节的广阔日本生活全景,跃然纸上。

小说的形象体系源于民间笑文化传统。中心人物弥次郎兵卫和北八很像中世纪闹剧中的平民。他们的固有品质是取之不尽的生活乐趣。脱离阶层偏见的充分自由,诙谐地摆脱各种困境的能力。他们是无拘无束的欢乐世界的代表,因而拒绝接受带有残酷准则和森严等级的官方世界。周围世界的一切,包括他们自己在内,对他们来说都只是说猥亵俏皮话,开粗鲁玩笑的对象。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作家描写的世界不是狂欢式的子虚乌有,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现实,这一历史现实给作者提供了不少对之进行讥笑和讽刺性挖苦的口实。高傲的乞讨武士,包治百病而又大字不识的医生,丝毫不拒凡人欢乐的和尚尼姑,极力模仿武士的商人——所有这些滑稽可笑的形象,对当时的现实来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九小说的笑不仅使人开心,它还撕去了虚伪文明的面纱,将其内幕和残缺展示给人看。《东海道徒步旅行记》是真正的人民之书,它用活的语言写成,以“拉伯雷式”的幽默、滑稽、讽刺来点缀与装饰,是日本最畅销的书籍之一。

另一位公认的滑稽本大师是式亭三马(1776—1822),他是流行作品《浮世澡堂》(1809—1813)和《浮世理发馆》(1813—1814)的作者。德川时代的日本澡堂和理发馆是一种独特的市民俱乐部,顾客在那里议论城市新闻,休息和消遣。这一剧情地点的选择,对实现作者创作时代风俗喜剧的构思,是最合适不过的。在澡堂和理发馆里,顾客进进出出,有聚有散,他们的谈话已成为机智速描和准确而尖锐观察的动因。三马的人物取材于现实生活,他以高超技巧塑造出了各种各样的滑稽形象:装腔作势议论男人优劣的首都漂亮艺妓,抑制不住向每人发号施令的退休官吏,即使在澡堂也大肆吹嘘自己货物的商人,搜索枯肠咬文嚼字叫出日常用品名称的老学究等等。三马的书没有固定情节,一系列城市生活场景打乱了顺序的编

排，其叙述基础是人物对话。因为想借助各个人物的语言特色描述来再现他们的面貌，作者既用了首都的口音，也用了国内其他地区的方言。像在一九的小说里一样，三马的滑稽小说发出多种声音，作者声音和各个人物声音不但没有融为一体，而且在语调上使它们显得更加突出。人物语言的风格化和个性化，力图在其中表现出最富代表性的东西，这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滑稽小说在形成当代日本小说的过程中，一项最为重要的成就。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日本古典文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在封建反动正在来临，与西方精神文化缺乏某些重大接触的条件下，十七世纪末蓬勃兴起的向新时期文学的过渡，在日本至少被拖延了一个半世纪。十九世纪上半叶，许多文学形式和体裁以向中世纪艺术传统回归为特征，其结果是像十七世纪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导致新艺术风格的形成。这种风格在戏剧和某些叙事文学体裁中占上风之后，同诗歌和通俗文学中以现实主义态度描写现实的一些原则结合在一起，而后面这些原则在许多方面预示了日本文学往后发展的特点。

636·

第四章　藏语文学

十九世纪，西藏地区文学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继续沿着中世纪传统轨道发展。文学活动越来越集中于操纵神权政治的喇嘛教派格鲁教派的寺院里，而当时的西藏已完全归中国清朝政府管辖。

十九世纪刚开始，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规范过程接近完成。文学的发展基本上放慢了速度，这因为最大部分的注释各种不同佛教教义的工作已经完成，对印度、西藏及其他邻国佛教史各主要阶段的规范看法已确定下来。由此显示出，同毗邻国家和地区相比，西藏中央部分的文学积极性在降低，而那些地方部分却在十九世纪出现了不少大型喇嘛寺院。

在班禅喇嘛所在的西藏扎什伦布寺院里，班禅四世喇嘛洛桑·丹必尼玛（1781—1854）的大型文集正在创作之中，以规范和普及各种宗教礼仪为目的而撰写的佛教成套仪式的作品居多，有两卷是描写构成喇嘛神殿核心的五百罗汉的。

在发展藏语文学中，继续起明显而重要作用的是东北藏安多地区的两座寺院：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它们的住持注释了规范化作品，编写了普及全藏的教本和佛教教言，供贡唐仓里的僧人学习。总体而言，宗教—哲学著作是沿袭十八世纪末已确定下来的相当清楚的脉络发展的。

对史学著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是安多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1737—1802）。他于暮年写成真版《水晶宝鉴》一书，其中讲述了古印度、西藏、中

国、霍坦和蒙古的历史，以及该区域佛教和非佛教哲学宗教体系的一些基本原理。著作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西藏佛教教派的历史和教义，以及佛教入藏以前古代西藏苯教的历史和文学。土观著作享誉藏蒙，这得益于作者知识的渊博和他对佛教繁难问题的清晰论述。

十九世纪出现了专门的《佛教史》著作，写佛教学说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蒙古和中国"胜利行进"。这些史书是蒙古作者用藏文撰写的，所以既可以把它们算作西藏文学也可以把它们算作蒙古文学。史书把蒙古史看作佛教世界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传入蒙古被看作自然而然又必不可少的事情，因为它使蒙古摆脱罪孽得到幸福，并且这一举动与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似乎想在蒙古人中传播西藏萨迦派教理的活动有密切关系。十九世纪刚开始时，这个观点已在蒙古历史编纂学中牢固树立起来。

遵循源于十七世纪蒙古编年史家的传统，这些著作把蒙古佛教史分为三个主要阶段：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在世时的传播初期；元帝国灭亡后的衰退时期；宣布喇嘛教为国教的阿勒坦一汗（十六世纪）时的复兴时期。同时，宗教史也与蒙古国家史密不可分。此外，十九世纪蒙古藏文的史书都重复着十七世纪有人已说过的三大佛教君主国相互交替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以宗教护法王为首的第一个佛教君主国存在于古印度，第二个在西藏，第三个就在蒙古。像以往一样，史书的结构以佛教史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来确定，叙述风格没有明显改变，依然停留在对事实和事件紧凑而枯燥的叙述框架里。

敏珠儿-呼图克图（1789—1839）死前不久写成的《瞻布洲（即宇宙）史地概貌》，应该说是十九世纪文学的一个有趣现象。作者是北京几个喇嘛寺院住持人的助手。跟写宇宙的那些作品半离奇的资料一样，概貌包括对西藏、印度和一系列毗邻地区的描写。作者对西藏有关宇宙地理的了解并不满足，所以他向欧洲地图和包括在京俄国传教士在内的行家去请教。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远离西藏的地名写起来都像俄国地名。简洁求实的叙述风格是作品特色。叙述有时会被转述轶闻、传说所打断。这些轶闻传说或与各类佛教寺院、雕像、圣像等有关，或与各个时代的神仙、圣人、现实活动家有关。轶闻传说的语言更富诗意，但仍与枯燥的地理描述区别不大。

变化不大的还有传记文学。最流行的还是几乎每个著名宗教活动家都要写的自传，他们把这看作在同代和后代人面前做"总结"，交待自己合乎教义的生活和值得佩服的事业。根据传统传记和自传要把主人公描写成顽强克服一切障碍、"摆脱苦难"、"拯救"自己而走上佛教正路的人。于是，为读者和听众创造了行动的楷模。作品的结构很传统，与主人公的生活道路和"事业"在时间顺序上保持一致。作品语言通俗易懂，修辞上没有拔高。

十九世纪最大的学者兼作家之一，是拉卜楞寺院（在安多）的活佛贡唐·嘉措·丹白准美（1762—1823），他是许多作品的作者，作品中的大部分是佛教哲学教本。不过最有意思的是《通向真理之路的剧作和诗歌游戏》一书。这是四个教徒就宗教哲学题目进行的谈话，每位教徒都说自己的母语。主要谈话人是西藏人舍依拉布和蒙古人毕力格，说梵语的印度人普拉之尼出任裁判人，以解决谈话者的分歧。汉人策惠则是谈话的主持人。从作品独特的戏剧形式可以看出，这是对一部印度古代剧作的模仿（作者本人在跋里也承认这点）。那个剧本的剧中人一般说的都是印度半岛各地区的方言。作品特点从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跟在作者语气昂扬的开场白之后的，是风格简洁求实的谈话本身。

贡唐·嘉措是上演戏剧《察木·米拉日巴》的作者，该剧演的是西藏大诗人米拉日巴（1040—1123）的一段生活经历。宗教神秘剧以十四至十五世纪生活为基础，再现了米拉日巴同一个猎人的神奇邂逅。猎人贡布·道尔吉一生屠宰生灵，违背了佛教基本戒律。苦行者规规矩矩履行职责，以热情赞美宗教教义为佛教增光，深深打动了粗鲁的猎人，他终止杀生，做了米拉日巴一名弟子。

取材于文学源泉的一段故事，经过贡唐·嘉措的加工，具有了全然不同的面貌。现在处于注意中心的是猎人，猎人的角色同时由两名演员扮演，他们的对话成了戏剧演出的基础，况且这一对话常常具有振聋发聩的性质，因为作者认为自己的目的，是与包括富人当权者专断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罪恶进行斗争，有时甚至根据演出情况，对在场官吏直呼其名。

贡唐·嘉措写了一本训诫内容的箴言诗，以宗教和世俗生活为题材，是在释迦-潘吉他·贡格·扎参（1182—1251）的箴言诗影响下写成的。其中一首诗这样写道："即使君主富有，/也难为乞儿之君。/正似壮树一株，/无冠依然裸露"。贡唐·嘉措的创作反映了一些新倾向。这些倾向当时正在西藏边区佛教僧侣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力求恢复一种充满道德自我完善呼吁的"真正"佛教，据说古印度曾存在过这种佛教。由此便产生了一种为返回到似乎比现实更好的社会，而同社会罪恶进行斗争的愿望。

不过总体来说，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藏文学，还是中世纪类型文学创作的典范，是为传播远离真正人民理想的宗教醒世观点服务的。

第五章　蒙古文学

十九世纪初，蒙古语言文学依然忠于早已形成的传统。被延长的蒙古中世纪，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整个蒙古文化的形式与内容。像从前一样，

创作了历史演义文学，包括历代著作片断、各种传说轶闻、诗体格言等等。比较有名的是下面一些著作：未署名（可能是鄂尔多斯的）作品《青史》出于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讲述从创世到蒙古诸国王及其后裔在位的种种大事；阿里雅-潘吉他·衮布写的喀尔喀《黄金数珠》（1817）和耶喜巴勒登写的《宝贝数珠》（1835）；金巴道尔吉写的乌喇特编年史《水晶宝鉴》；以及喀尔喀作者太吉·嘎勒丹写的最有意义的作品之一《宝贝数珠》（1842 年或 1860 年左右）。总的来说，所有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充分利用西藏和中国著作来源，其中大部分篇幅关注佛教在亚洲和蒙古的传播，同时事件的叙述也越来越求真而少有艺术性。与前一时期暴露出的倾向相适应，历史编纂学与文学创作之路已坚决分开，尽管也能看出在叙述中利用形象和情节描述的个别尝试。

手抄民间文学作品在蒙语世界不胫而走：史诗传说（首先是格谢力阿德的某些章节和集成）、地府游记（有关目见莲，那仁格日勒，绰依吉德—达吉尼的）、“框形结构散文”和各种仪式（包括萨满教）所用文本的汇编。同样得到关注的还有藏语文学的翻译，从各种佛教著作改写和翻译过来的印度—藏文故事。出现了一些诗歌理论文章，编纂了一批经典蒙语语法书和词典（最有名的藏蒙词典范本是由阿格旺丹达尔喇嘛编著的），以及各种不同的述评。

在社会精神生活中受到蒙古封建主和清朝政府鼓励的佛教，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蒙古人认为，面向西藏和印度的宗教、文化和文学是与中国化相对立的，它可以成为保持民族独特性的一个因素。在文学发展中继续起显著作用的是藏语，包括语文学在内的各类著作都用藏文写成。有时甚至借助藏文字母表记录蒙文文学作品。

开始于十七至十八世纪的蒙古作家藏文创作，继承了咱雅-班智达·罗桑·赤烈、松巴-堪布·益希班觉、彰嘉-呼图克图·洛比·道尔捷的传统。应该提出的是阿拉善的丹达尔·拉让巴（1759—1842），他的诗歌附在他的宗教—哲学著作里，包含种种道德训诫。另一位必须提到的是学问渊博的喀尔喀喇嘛，文学家阿格旺·哈依杜布（1799—1838），他创作了众多宗教—哲学和文学作品。第三位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诗人，用藏蒙两种语言写作的拉布杰。

传统源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醒世格言，仍在继续发展。它越来越为佛教内容所充实，经受了藏汉文学的影响，在醒世格言传统轨道中形成的一种新体裁名为乌格诗，它渗透着佛教情绪，以独白或对白形式表现的道德化议论，常常通过动物之口说出，偶尔类似的话也由人甚至物来言说。这种形式一方面与古代蒙古文学相吻合（中世纪叙事诗中成吉思汗的跑马所

说的话)；另一方面又与其影响颇大的本族民间口头文学相一致(写动物的童话、寓言等)。乌格体的基本原理体现在阿格旺·哈依杜布的创作中。比如，在《绵羊、山羊和公牛的谈话》里，预先注定要送去屠宰的动物无望地呼吁他们的喇嘛主子发善心。在《头发蓬乱的策林巴依勒和看家犬的谈话》里，一条看家犬在同喇嘛主子的争论中占了上风。这一体裁的进一步发展表现在一系列无名氏作家的作品中，它们的作者追随阿格旺·哈依杜布，从佛教观点揭露罪恶的杀生行为，并抨击人类的种种毛病(《老鼠的话成了玩笑》、《墙头乌鸦和喜鹊的谈话》、《绰号闲人的迟钝喇嘛如何同他机灵的夜莺用诗句交谈》、《百灵鸟和天鹅的话》)。从这类作品中除了能看到道德教诲箴言，还可以发现对神职人员的批评，对市民的安定生活与变化无常的草原牧民的生存状态所作的对比，以及对其他道德—哲学和社会问题的讨论。

639·

乌格体在即兴诗人呼乌里奇·桑达格(1825—1860)的创作中达到了真正的繁荣。桑达格是诗人本名，呼乌里奇是故事讲述者。在桑达格以训诫、诉怨、忧郁沉思为内容的韵文独白中，明显地表现了蒙古文学的揭露批判倾向。赋予大自然、动植物以演讲天才，"让它们开口说话"的桑达格，讲述的是孤儿的悲惨命运(《离开母驼之驼羔的故事》)，分手的痛苦(《风滚草的故事》、《春融雪的故事》)。他运用讽喻手法表现供职不自由的沉重负担(《看家犬的话》)，抨击个别官吏的懒惰成性，愚昧无知，他们待人的蛮横无礼和对百姓痛苦的冷漠无情(《官吏司书优劣记》)，况且他的作品多以牧民日常生活为背景。

十九世纪上半叶，蒙古文学已经能够谈论作家的个性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呼乌里奇·桑达格就是如此。不过，毫无疑问，具有真正鲜明创作个性的还是那位有着非凡命运的卓越抒情诗人拉布杰(1803—1856)。他是当今称作东戈壁省的那块土地上一位贫苦牧民的儿子，八岁时被认定为戈壁呼图克图(喇嘛神职最高级)四世的转世。这使俗人家庭出生的这个男孩生活发生突变——他必须成为一个宗教活动家。拉布杰获得与教职相称的教育。作为一个朝圣者，他访问过安多、中国圣山五台山、阿拉善和北京。他还建立过几座寺院。据同代人证实，他虽教职甚高，却能接近俗人，依然热爱生活，自尊而坚强。他能做到同封建主对立，与大公持不同意见。拉布杰的作品证明，他不仅是位有教养的佛教徒，而且是个大度睿智、出身平凡的普通人。

拉布杰流传至今的有蒙文诗歌一百七十篇，藏文诗歌一百八十篇。其中不少以训诫意义的箴言和哲理沉思为内容，另外一些反映的是当时的社会精神生活和日常生活。拉布杰创作的特点在于与民间口头创作的联系，

掌握蒙古文学传统的能力,以及善于运用藏语诗学的手法。他那些内容颇有深度的抒情诗以其领域广阔见长,哲理的,训诫的,爱情的,无所不包。从主旋律看,拉布杰的诗篇很传统,贯穿热爱家乡,热爱母亲的主题。其中大量是以民歌风格创作的,并流传下来,成了民间口头创作的保留节目。蒙古人中相当流行的歌曲《充满尊严》就是拉布杰所作,歌颂了爱情和女子之美。拉布杰的爱情宛如自然之美,人类的生活好似四季之交替。他以赞赏的语言描写了爱慕对象的鲜亮容貌,婀娜的体态,清脆的嗓音,温柔的性格(《充满尊严》、《面向八方》)。拉布杰遗产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韵文训诫箴言诗。几乎有关人类的一切领域都逃不出诗人的视野,他谴责了诸如嫉妒、吃醋、失信之类的缺点(《关于宇宙法则的箴言》)。《金钥匙》这首诗教导人们要学习知识,彼此善待。拉布杰是第一部蒙文戏剧作品《月杜鹃传》(以同名佛教小说为情节)的作者。剧本于1832年上演时他又给它配了音乐。拉布杰第一个表现出了蒙古文学广阔领域的诗学独创性,虽然这一文学仍在中世纪传统轨道上发展,其中也已显示了一些对日后文学发展颇为重要的新倾向,生发出一些新主题,出现了一些新体裁。

第六章 越南文学

· 640

十九世纪,特别从二十年代明命登上王位以后,越南阮氏王朝千方百计地巩固封建大贵族制度,实行"闭关锁港"政策。但当时也出现了几股新潮流,潮流的先驱是那些到过欧洲或到过西方列强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的人。其中起明显作用的是一些在欧洲呆过并在那里受过教育的越南天主教徒。比如,1822年在里斯本完成《杂事散记》一书(手稿不久前发现于梵蒂冈)的菲利浦·宾牧师,就批评过当时越南的儒家繁琐哲学学派并指出欧洲教育制度的优越性。他还写了论述法国革命的书(《平民绞死国王》)。越南王朝则依然遵循传统,依靠儒学,并试图提高这一学说已经动摇的威信,把它和异己的天主教截然对立起来。

因此在十九世纪二十至五十年代,当局全力支持的保守倾向有所加强,出现了很多用越南口语给平民百姓写的训诫叙事诗。诗里反复讲述儒学经典作品(《论语》、《诗经》、《书经》)。写出(也以诗体)了不少足资垂训的书籍,书中提供了一些竭诚履行儒家道德规范的楷模。比如诗人李文馥(1785—1849)就改写(13世纪)儒家《二十四孝》,写出了诗体《二十四孝演歌》。训诫叙事诗的目的是展示理想的行为楷模(比如《家训歌》就是独特的越南诗体《治家格言》)。与此同时,这些诗歌还描写一些反面的,不过可能实际存在而又极其典型的例子,告诉人们不该效法什么。诗作特别追求

繁琐具体。无名作者写的《妇人训诗》，明白写着："年轻女子不要去宝塔（浮屠）闲逛，有的在那里东张西望，有的跟人眉来眼去暗送秋波。"同时诗里还有指摘性的语句，用来保护"流一杯汗吃一碗饭"的穷人。一位不知名的作者号召人们同情那些"皮肉并非铁打铜铸的"流离失所者。训诫诗中占有特殊地位的是《天南国音歌曲》，诗歌站在儒家唯理论立场上讥笑基督神话，首先是关于"贞洁受孕"的神话，其挖苦对象就是基督和圣母。叙事诗追求的目的是使越南人远离天主教。作者从儒家的唯理论和对迷信与奇迹的怀疑出发，揭露了基督神话的内在根据不足。

帝国朝廷鼓励儒家思想道德的传播，拼命往音乐剧嘂戏戏本里塞入忠君理想，在塑造英雄人物时强调他对君主的忠诚。宫廷戏剧嘂戏的演出形式，越来越复杂。比如说，《万家箱》是一出由一批共同人物串起来的连续剧，一演就是一百天。

当时文学中的反对派，以继续忠于十八世纪末被推翻的郑氏集团和黎朝（人们常把关于"黄金时代"的幻想同黎朝联系起来）的遗老遗少为代表。这些诗人对待生活很消极，受佛教影响，用没落情调渲染生活，把现实想象成梦一般的空泛幻影。比如，在阮辉琥（1783—1841）的叙事诗《梅亭梦记》里，主人公梦中见到一个美女，这美女就是黎朝皇帝的化身。清县夫人阮氏（生活年代不详）在她一些诗里，沉湎于对过去的回忆，对黎朝众多皇帝及其帝都昔日富丽堂皇的回忆。人们常把她那些以朦胧梦境迷醉人的优雅诗篇，比作古老暗淡的绘画。

不过，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在渐渐向现实靠拢，甚至可以说是在"降低"主人公身份，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也更趋平凡。叙事诗不再描写理想化的高大主人公，而去塑造另类形象。李文馥用名称本身强调了其特点，即《非优雅故事》。诗歌的论战性很强，诗人有意识地把平凡主人公和诗意化的主人公对立起来。甚至出现了描写调皮鬼的嘲讽小说。一部未署名的叙事诗《记一个机灵的滑头》，描写一个出身低微的主人公，靠玩弄伎俩而娶亲发财，并以此羞辱那些曾经笑话过他，心想"母鸡哪敢与凤凰比高低"的人。从一位无名作者写的格言诗《六畜争功》里，也可以看到降低主人公形象的情况。诗歌像是提供了一幅越南社会的纵向"剖面图"：水牛是承担全部繁重劳动的农民（牛虻螯背，水蛭吸腿），警犬是保镖，山羊是账房先生，公马是军事长官，等等。每种家畜都夸口争功，出任法官的主人则给他们解决纠纷。作者显然是力图调和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641 ·

叙事诗的散文化和面向下等现实的过程，使它脱离了久已定型的观念，类似的倾向也影响到了其他诗歌体裁的发展趋势。比如，李文馥的那首抒

情诗《硬币》，就以对生活的清醒认识而引人注目，诗里承认了金钱这个正在觊觎宝座的新主宰的无限权威。

上述倾向独特地折射在诗人阮公箸（1778—1858）的创作里。他出身于穷苦军人世家，他那演员的自由的天性，较早地表现出来，少年时代便进了一个戏班，虽然时间不长，也成了在封建的越南备受歧视的职业的一员。后来他当了官，但由于性格独立，很有见地而仕途坎坷，宦海浮沉成了他的家常便饭。用越南的谚语来说，他是一个“忽而爬上象背，忽而骑上犬脊”的人，直到六十五岁时，还被降成了一名士兵。阮公箸生活在一个朝廷极力复活和巩固儒学权威的时期，他虽然充任儒家道德理想的歌手，实质上歌颂的却是人的优秀品质。诗人在被他引进的许多越南文学的篆歌体唱段里，塑造出了一个类似英雄勇士的形象。这形象具有儒家美德，却是一个寻找个人光荣，追求建功立业的男子汉。阮氏主人公具有庄重的自由意志，而不是朝廷对臣子所要求的盲从。一个追求重大建树的欲望，使诗人得不到满足。在一首题名《顺竿爬赞》的讽刺诗里，他以格言形式画出了一幅虚饰浮华的升官图（“好吧，咱们等着瞧，看谁会后退，谁能爬得更高”）。



龙 珠母镶饰 越南
十八至十九世纪

处于越南历史新阶段之交的真正象征性人物，是高伯括（1809—1855）。他是越南史上为数众多脱去官员乌纱帽，而成为人民起义领袖的儒家学者之一。他随外交使团前往当时荷兰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亚以后，受到西方世界的影响，看清了越南在蒸汽和电力时代有多落后，也懂得了儒家学子的书本智慧多么不合时宜。高伯括可以被称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改革运动的先驱。这一运动的活动家都要求革新国家，以欧式新体制来取代陈旧的国立研究机构。

同欧洲人的接触，对欧洲人生活方式的熟悉，使此前业已动摇的那些关于儒家教条牢不可破的观念更加摇摇欲坠。早期吸引越南文学家的是欧洲人的个人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高伯括大概是第一个把祝福诗篇献给欧洲女人（《大洋彼岸女郎》）的越南大诗人。因此诗人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在越南人眼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上：一只越南人不用的牛奶杯，在白人妇女手里一般都成了欧洲人生活方式的象征。在另一首诗里，同样具有象征

· 642

性的是殖民地欧式城市的某些标志，每行诗都告诉诗人同代人一点新东西（《白人乘行的黑皮马车》。诗人对欧洲技术奇迹的兴趣，表现在《红须人火轮歌》）一诗里。诗歌的激情不仅表现为见到轮船时的惊奇与赞叹（轮船“无帆，无桨，人们对之不推，不拉”，却“像奔马一般，疾驶”向前），还表现为由此而引发的沉思，这样的船只将会构成对祖国的危险。这里表现出了对东方具有代表性的启蒙主义成分，既有反殖民主义的功能，同时又与意识形态中的封建保守倾向相对立。

第八编　南亚和东南亚文学

本编序言

十七和十八世纪之交开始表现出来的南亚和东南亚社会与文化的分散现象，从来没像十九世纪这样明显地影响整个地区。在三大宗教影响区域范围的划分（东南亚大陆和斯里兰卡的佛教，印度主要部分和东南亚大部分岛屿的伊斯兰教和菲律宾的基督教）和历史发展不平衡引起的文化分歧之上，又加上了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后果，殖民主义的扩张使区域内诸国受欧洲列强影响的性质和强度各不相同。只要把菲律宾和老挝作个对比就可以相信，这一时期这一区域各国之间的反差确实惊人。十七世纪已经基督教化的菲律宾，十八世纪的文化是“西班牙母亲”“大众文化”独特的民俗化回声，而几乎同一时期信奉了佛教的老挝，其通向世界的唯一窗口还是处于湄公河下游几百公里外的古老国家柬埔寨。不过由各局部地区的共同特点所形成的相似文化演变过程还是可以使人谈出它们发展的相似之处的，因为这些地区的社会历史命运有共同点。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南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正处于中世纪阶段，它们绝对没有耗尽实力，很多情况下也没有丧失前进的能力。比如，十九世纪无论在一些独立国家还是在欧洲人管辖的国家都可以看到某些文化高涨的征兆（前者如泰国的“黄金时代”，后者如“爪哇文艺复兴”）。不过这些亮点的特点多半是希望恢复自己过去的高度文化成就或者以自己的民间文学来充实它。比如，爪哇文学家热衷于创造一些古代爪哇叙事诗格卡温的新写法，而对世纪头二十五年的泰国宫廷文学来说最有代表性的是用吸纳某些民间文学形式和体裁来扩展高雅文学的范围。所以与其说泰国的顺吞蒲和爪哇的朗哥瓦西多是最后的古典诗人，还不如说他们是本国文学史重大转折的预言家。

南亚和东南亚地方国家性的削弱和消失与其他某些因素一起导致甚至

同一地区皈依同一宗教的国家之间来往都在削弱。应当说在阿瓦宫廷发展文学重要体裁中表现出来的泰国文学对缅甸文学的强大影响属少数例外。同时在那些作为欧洲影响前哨的地区开始形成一个地方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开始对来自西方的文化动向发生兴趣。

不论十八世纪以来的欧洲如何，最令东方震惊的还是它的启蒙主义遗产。这笔遗产没有立刻在天主教的菲律宾风行起来，菲律宾直到十九世纪上半世纪还在开发西班牙传统，包括变了形的地方抒情史诗《阿维茨和科里多》和英雄喜剧《摩洛—摩洛》，尤其在弗朗西斯科·巴拉塔斯的作品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印度文学家处境就不同了，他们有可能研究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大部分成就。一些孟加拉和马拉提文学家（拉姆·莫汉·拉伊，Г. Л. В. 代洛济奥，鲍尔舍斯特里·扎布赫卡尔等）拥护这些思想，大都成了地方新闻学、社会科学政论和地方散文翻译的创始人，而散文翻译又奠定了孟加拉和马拉提新散文的基础，使这种新散文能够于十九世纪下半世纪完全形成。虽然从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或米尔扎·迦利布这样一些乌尔都语大穆斯林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对现实目标的认定或对未来目标的追逐，而确定这些目标似乎已来到新时期的大门口，这一时期各印度语种的高雅文学还是朝传统方向继续发展。在旁遮普、阿萨姆、奥里萨、印度南方以及尼泊尔文学中则仅有一些修改中世纪标准的尝试。

在建立同欧洲文学的区域联系中起不小作用的是殖民主义列强本身的文化政策。比如，在扩大自己对印度尼西亚影响范围时没少费力的荷兰人限制了文化载体在那里的活动，因为爪哇殖民区的文化最发达，荷兰人害怕激化同那里多数居民的矛盾。这又部分地决定了如下事实，即在我们所考察的这段时间里丰富的爪哇语文学（像东南亚各岛屿的其他某些文学一样）还停留在习用的题材和思想上，而现代化的早期特征已经从一些马来语作家的创作中显现出来，这些当年离乡背景的印度穆斯林现在处于英国管辖范围，而英国的行政机关在十九世纪初已把自己的影响及时扩及到荷兰的东印度，而且在马六甲半岛站稳了脚跟。这批作家，包括其中最成熟的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勒卡迪尔·门希在内，都想像同代印度人拉姆·莫汉·拉伊，戴本德拉特纳·泰戈尔等一样，在诸如自传、游记、随笔这样一些体裁中一显身手，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如果说到东南亚陆地国家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老挝（越南文学此时还在远东文化传统轨道上发展）以及 1815 年由英国人管辖的兰卡，那么它们被卷入现代化的过程要晚得多，而且南亚和东南亚作家也随着他们接受西

方文学教育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越来越接近的共同倾向。他们彼此间日益接近，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文学家也日益接近。

第一章　印度诸语种文学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在整个印度斯坦次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政权：1803年不列颠人占领德里并把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蒙古皇帝变成了东印度公司的寄养者；1818年随着强国马拉提被挫败，几乎整个德干高原脱离印度归属英国人；1823年阿萨姆失陷，1843年信德陷落，最后，1849年叛乱的旁遮普放下武器。一个大不列颠殖民主义的印度宣告建成。

不列颠统治的确立，打破了印度封建主义的封闭，并渐渐把它纳入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印度社会结构的变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起初似乎存在两个孤立而封闭的世界，每个世界都依自己的法律生活。但从十九世纪开始，占领整个国家有了主人公感觉的殖民主义者就以必须实行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面目出现了。殖民主义者虽然追求发财致富，其更大的业绩却在破坏天职方面，他们的活动促进了资本主义成分的成熟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形成。

客观历史进程需要国家有根本性的转变，国家发展的内部需求决定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产生，但在殖民主义统治的条件下这种意识形态的诞生道路是很复杂的。新思想的表达者和传播者是一批掌握了欧洲先进科学文化成就的民族知识分子。传播新世界观的前提是印刷书籍，出版期刊，引进欧式教育。在印度首倡印刷业的是一批基督教传教士。远在英国统治完全确立之前，他们就着手出书了，后来又出版英文和印度各种文字的报纸，报纸里与宗教宣传并列的是国内外生活信息。传教士们建立了一整套学校网，出身于各种姓各阶层的孩子都在那里学习。他们的活动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达到了相当规模，整个世纪也没消停下来。他们开设了一批东方特种中学，后来慢慢变成著名的威廉堡学院(1800)、西兰布尔学院(1818)和毕晓普(主教)学院(1820)。

先进的英国知识分子坚持兴办世俗教育的合理性，包括传授自然科学。由于他们的压力和印度人士的努力，在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及其他一些城市开办了一批欧式学校。

必须同时在两种方向上进行斗争——既反对正统传统，又反对殖民制度。同正统传统的斗争往往带有爱国主义内涵，因为克服自身落后不仅被看作民主资产阶级秩序取胜的必要条件，而且被看作摆脱殖民主义奴役的

保证。这个复杂课题还引起了一场广泛的社会文化运动，名曰“印度启蒙”（不过在印度史学文献里给它取了另外一个名称叫“印度文艺复兴”）。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印度启蒙主义者多半靠的是十七世纪的英国唯理主义者（培根和霍布斯）、十八世纪的启蒙主义者（洛克、休谟），也在一定程度上指靠法国百科全书派的思想资源。对印度社会思想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是英国实利主义派（本瑟姆）和十九世纪初的自由贸易主义思想，还有唯一教派和再浸礼派学说。这样一来，印度启蒙主义者靠的就不仅是十八世纪欧洲经典启蒙主义了，他们集西方各派社会思想之大成，而且为建立能在印度条件下发挥实效的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唯理论体系对其进行了适当改造。

印度启蒙学派解决了一整套综合性课题：哲学的，政治经济学的，宗教的，道德的，和美学的。它的目的就是自下而上，从社会经济基础到为其服务的意识形态，破坏封建社会的整个结构。

在反对过去遗产中的否定现象时印度启蒙主义者同非常保守的（印度教）宗教势力发生了冲突，因为这份遗产体现着印度教的权威。由此而产生了印度教的另一个特点——反对宗教分化、多神教、祭司学院、偶像崇拜等等，进行宗教改革。启蒙主义宣扬一神教和非位格神思想，在否定种姓特权和人们在神面前平等的思想中存在对平等可能性的资产阶级理解，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们在以新内容充实传统文化的基本标准时，反省与反思了玛牙，种姓，羯磨，因果报应等观念。

随着传教士广收新教徒和抨击印度人宗教的加强，随着民族资产阶级与英国殖民统治者矛盾的激化，启蒙主义者越来越把印度教看作可与不列颠统治相抗衡的民族传统。

随着英国人的政策越来越公开地表现出它的侵略性，在全国各地区都出现了反抗殖民压迫的策源地，随时随处都有农民暴动发生。

印度各地出现和形成启蒙—改革运动的时间前后不一。最先显示新过程的是东印度公司的领地中心孟加拉。不仅站在孟加拉，而且站在整个印度启蒙源头的带头人是拉姆·莫汉·拉伊（1772—1883），他是当时罕见的渊博人物，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他创立了以实施社会改革而同宗教偏见进行斗争的宗教改革协会“梵社”（1828），并且是创办自由思想堡垒印度学院（1817）的倡导者之一。

拉姆·莫汉·拉伊奠定了孟加拉民族散文和政论的基础。1821 年他创办了《新闻夜光》报。乌尔都文、波斯文和印地文报纸首先在加尔各答出版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干劲。他对孟加拉语的应用功不可没，是第一个在其论文和哲学著作中运用散文的人。似乎没有哪个题材和知识领域他没在著作中触及过。他编纂了孟加拉语语法，翻译了印度古代哲学集优婆尼沙

墨，还就种种法学和政治问题发表过意见。他是出版自由、资产阶级自由的积极捍卫者。他向时代发出遗教“把法律同理智协调起来”，又以他那真正人道主义的乐观态度教导他人：“平等之敌和专制之友永远不可能得逞。”他是扩展传统世界疆界并将整个人类包容进去的第一个印度人。

拉伊拥有众多追随者，他们组成孟加拉思想运动中的一个自由主义派别。这些人中有著名泰戈尔家庭的第一个代表德瓦尔卡纳特和戴本德拉纳特（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祖父和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接管了“梵社”，文学家奥克霍伊库马尔·德特（1820—1886）和伊舍尔钱德罗·维达沙戈尔（1820—1891）成了他的积极战友。在继承拉伊思想和遗教的同时，他们开始发展他后期已粗具轮廓的倾向：慎重对待传统中有正面价值的东西。他们建立了一个“孟加拉语言文学奖励协会”（1836），一个“真理探索协会”（1839），着手出版地方语期刊，还翻译了一些梵文经典作品。同时他们继续根据现代要求进行印度教改革，批评英国人的印度文化政策。

当时印度社会思想的辉煌一页同亨利·路易·维维安·代洛济奥（1809—1831）的活动密不可分。代洛济奥的思想是在培根、洛克、休谟、亚当·斯密、T. 潘恩、本瑟姆的影响下形成的，对当时青年影响巨大。他否定宗教，尤其是印度教，将其视为理解世界途中的障碍，进步的阻力。

代洛济奥的友人和追随者在他死后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团体“青年孟加拉”。印度研究家 Б. 达特在评价这个团体时写道，它的成员在孟加拉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类似法国百科全书派的作用。

站在马拉提启蒙运动源头的是鲍尔舍斯特里·扎布赫卡尔（1812—1846），洛克希塔·瓦迪（戈帕尔·哈里·德姆舒克，1823—1892），佐蒂巴·普莱（1827—1890）和其他许多人。

马拉提启蒙主义知识分子坚决主张确立资本主义关系，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关系可以实现社会平等。

马哈拉施特拉的启蒙主义运动以建立一系列文学启蒙团体为特征，这些团体在许多城市设有分部，并出版多种报刊杂志，而报刊根据刊名就可以判断它的倾向，“知识”一词必不可少，如《知识》、《知识初升》、《知识夜光》、《知识光》、《知识集锦》等。

随着英国人的到来，穆斯林失去了往日在印度的优势地位，他们当然有充足理由仇视新制度。穆斯林反对英国人统治还表现在他们与印度人不同，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仍对欧式教育不感兴趣，而且坚持不与当局合作。第一个穆斯林的社会组织“穆斯林联合会”1855 年才成立。

在唤起穆斯林思想积极性和发展散文传统及乌尔都政论中起明显作用的是德里学院（1825）和著名数学家、翻译家兼政论家拉姆·昌达尔

(1821—1880)。拉姆·昌达尔通过他创办的首批乌尔都语文学杂志《印度之友》(1848)和科学历史周刊《读者福祉》向乌尔都语民众介绍了东西方国家的科学文化成就。拉姆·昌达尔受过培根、洛克、斯密学说和英国革命思想的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的印度启蒙主义者尚未放弃臻于完善的美学体系,但他们的意识形态结构为摧毁印度人传统的艺术思维教条创造了前提。从这种意义上讲他们对传统文化理念标准进行的反思具有重大意义。关于历史前进和社会进步的学说,对宿命论看人观点的克服,人类活动改造力的理念,不要从敞开世界"灵魂"中,而要从人的身体和精神素质全面发展中认识存在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促进了社会问题和个人生活主题的确认,促进了艺术中个性因素的发展。

647·

此前从来不懂社会冲突主题的印度文学在新时期得到了社会决定论思想的充实。宗教哲学的说教,包括因果报应的理论,是要消除人对他所处社会地位的各种不满,把世界和社会不完善的罪责都推到人身上。新的启蒙主义思想看出周围环境和主导道德中的罪恶根源,并要求重审旧事物,改善生活条件,把人从永恒原罪说中解救出来。社会生活矛盾的揭示,人类存在价值的张扬预示着悲剧美学标准即将产生。

社会和地理视野的扩展,对另一种文明的了解,改变了印度人的艺术天空性质,但是印度人生活和存在的新方式,启蒙主义者精心研究的课题却很难进入艺术领域,对这些东西的艺术理解发生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带有病态,从十九世纪上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印度学者把这一时期(很多时候是把整个十九世纪)称作"翻译时代"或"准备时期",因为它不以创作大型艺术作品著称。这很奇怪,然而是事实:十九世纪有一批杰出的文学家,但没有杰出的文学作品。十九世纪上半叶印度启蒙主义者着手创造新语言文学时面向的是梵语经典遗产传统,而不是中世纪文学经验,因为后一文学已把古代经典的几乎整个世俗路线置之脑后。新时期的首要问题是创造和加工散文语言。各地方语种的散文和文学散文传统要么全无,要么发展极其薄弱。

对发展和挖掘印度各语种文学散文作出突出贡献的是威廉堡学院的一批研究人员。这座学院建于 1800 年,为教授殖民官员地方语而设。应邀而至的都是懂地方语的人,他们的任务是用翻译、改写或随意改动的印度口头和书面文学作品编写教材教参。正是这个学院出版了首批地方语书籍。这些出版物不仅把印度教徒而且把穆斯林的文化经典变成了广大民众的博大财富。

十九世纪头二十年一些梵文散文经典几乎译成了所有的地方语,有《五

卷书》、《嘉言集》、《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十王子传》、《迦丹波利》等。乌尔都语作家面对的则是整个穆斯林散文作品，《一千零一夜》、《蔷薇园》、《巴赫蒂亚尔故事》、《哈特姆·塔伊》等等。

十九世纪印度文化活动家重视语言文学的这类形式完全合情合理，因为它带有世俗性质，含有风土人情和文法知识，还有传统的教学论手段，最后一点对文学创作者意义特别重大。

学院研究人员的工作集中于翻译和改写经典文献其重要性还在于，它给学院以外作家进行创作以强有力的推动，而以民间口语为宗旨的方针又促进了广大读者群的形成。对散文的浓厚兴趣还促成了散文体历代诗作的出现（《往世书》、《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迦梨陀娑的戏剧或菲尔多西的《王书》）。

西方文学译著对发展新散文传统产生了无可争议的影响。各印度语种出版物的首批范本当然是《旧约》和《新约》（《马太福音书》等）译本，基督圣徒传，宗教劝诫故事等等。传教士们的书面作品比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印度其他教种的著作要高出很多。印度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对非宗教文学表现了更大的兴趣。几乎全国所有地区已经运作的文化启蒙机关（“中小学读物协会”、“翻译家协会”、“奖励委员会”）主要从事的都是外国科学、教学和文学作品的翻译。 ·648

印度文学家的启蒙主义宗旨决定他们看重英国的训导学著作（劝诫性寓言故事等）。印度人百读不厌的作品是班扬的《天路历程》、约翰生的《拉塞勒斯》、理查逊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等，还有斯梯尔和艾迪生的启蒙主义政论。印度政论作家学习艾迪生和斯梯尔，给启蒙主义思想加上日常应用的包装，用艾迪生的话说，就是“以讥诮复活德性，以德性缓和讥诮”。

急于形成国人新觉悟的印度作家心甘情愿地仿效欧洲教学手段，学会了欧洲启蒙学派的文学形式和体裁，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以欧洲形式替换东方形式，而在于研究出在新时代条件下能起作用的文学形式，以取代传统的中世纪形式。不过印度作家运用的不仅有启蒙运动的经验，还有启蒙后的艺术实践。在他们眼中，整个欧洲语言文化，文艺复兴也好，古典主义也好，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也罢，都是为人而斗争，为恢复生存快乐而斗争的一种象征。就其实质而言它以人为本，渗透着个人主义的情致。对他们来说，几百年来欧洲文化中各种不同艺术派别间的思想美学分歧毫无意义。因而研究弥尔顿遗产的课程卓有成效。他那以《圣经》故事为基础的艺术世界对印度人的传统神话史诗思维来说很好接近，很易理解。他那叙事诗

里的主人公及其境遇在他们头脑中也同民族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主人公及其境遇相接近。与此同时，表现出共和主义志向、革命情绪和时代思想的弥尔顿创作帮助印度人以新的伦理美学内容充实自己的神话形象，使他们把神学中心论道德变成人类中心论道德，把神话情景变成人的情景。

莎士比亚作品令印度人吃惊的是人的积极性，是那热烈的激情，那主人公精神起伏的幅度，那紧张的道德哲学氛围。

然而不能不考虑印度文学自身传统的作用而把欧洲文学的影响绝对化。印度人翻译以前的民族经典比翻译欧洲作家作品来得更早更多当然没什么奇怪。而且应该看到重要的一面，即印度人用民族语言翻译的古印度经典是戏剧、史诗和抒情作品，从欧洲文学翻译过来的主要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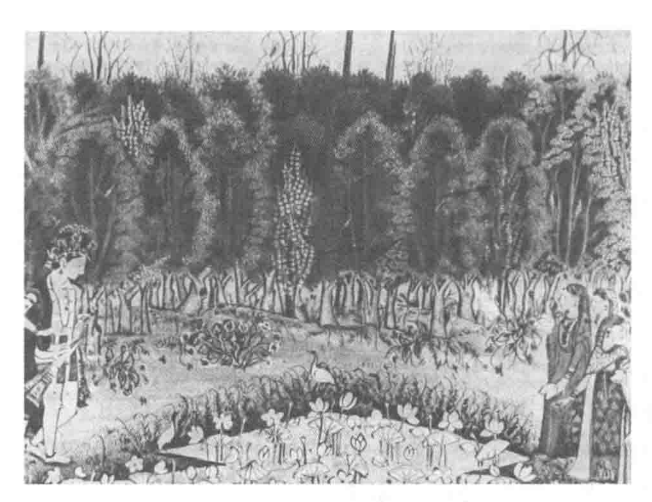
一般说该文学阶段的散文不再是印度文学的"灰姑娘"。在这方面起了巨大作用的是政论，政论是十九世纪印度文学最重要的收获。

印度政论从诞生起就以英国醒世杂志(《旁观者》、《闲话》、《监护人》、《潘查》)为目标，带有明显表现出来的启蒙性质，小说从政论学习来的也不仅是题材，还有某些表达手段和表现手法。在传统美学标准已被破坏，新的美学标准尚在制定的时期，政论是作为一种精神领域而出现的，在这个领域不仅能实现意识形态功能，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美学功能。在生活和道德随笔、评论文、杂文、小品文中人们都掌握了艺术概括手法，练就了形象化评述的手段。

在形成艺术散文中起显著作用的是以各种印度语描写杰出人物活动的随笔和论述(《苏格拉底生平》、《彼得一世》、《库克上尉》、《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哥伦布游记》等)。这些作品提供给印度读者的不再是神秘的"灵魂"地府游，而是既有事业又有忧虑的具体个人在现实人间环境中的地上旅游及地上生活。这类作品首先出现在孟加拉、马哈拉施特拉、乌尔都语区、古吉拉特。孟加拉传记文学新范本中就有译成各种文字(如马拉提、古吉拉特)的随笔《拉姆·莫汉·拉伊生平》和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的《自传》。艺术因素较为明显的是描写各大城市及其居民生活，类似欧洲风情特写的随笔，一般说篇幅都不大。

649·

在欧洲影响中心，社会经济最活跃的孟加拉和马哈拉施特拉，率先并迅速发展了新的艺术形式。当然，那里还保留着封建主义艺术文化成分，进行创作的还有一些印度研究家 M. 曼欣哈所说的那样作家，他们"按时间表已经生活在新时期，但艺术和精神境界还处于中世纪"。不过他们的创作在文学中已经不起主导作用了。相反的是"外省"地区，像阿萨姆、奥利萨、



克里希纳神往的戈比(牧女)
小型绘画 纳拉嘎尔作 约1810年 私人收藏

整个南方——泰米尔纳德、卡纳塔克、喀拉拉、安德拉、旁遮普边区，中部操印度语地带等，这些地区的中世纪语言艺术立场还要顽固得多。

很多文学中继续发扬着唱赞歌的传统。在这条巴克提抒情诗的轨道上比马·博伊编写了自己的诗歌集，他死于1895年，是奥利萨邦的一个克拉德族人。有“古吉拉特最后一位中世纪诗人”之称的达亚拉姆(1760—1852)以波德和嘎拉比格律写了一组宗教训诫诗，歌颂牧童神克里希纳的田园牧歌游戏。泰米尔文学中最流行的体裁之一是往世书，古代梵文宗教故事的诗体改写，比如《马契亚往世书》就是瓦达马莱亚帕·比莱改写的，他还写过不少同一体裁的其他作品。米纳克希松达拉姆.A.比莱(1815—1876)写了将近六十种往世书，在其他宗教诗歌体裁领域也著述不菲。兰卡人阿鲁穆加·纳瓦拉尔(1822—1876)是第一批学校课本的作者，泰米尔语经典作品的出版家，他把《佩里亚往世书》改写成散文，为发展现代泰米尔散文打下基础。收入拉马林加·斯瓦米(1823—1874)著作的宗教颂歌《圣诗》整整一个世纪在泰米尔人中盛誉空前经久不衰。 · 650

泰卢固语文学中盛行的体裁是中世纪晚期的抒情诗。阿拉马拉祖·苏拉马尼亚姆(1831—1892)、马达布希·温卡塔恰利亚(1835—1892)等诗人模仿中世纪作者，热衷各类诗歌“游戏”和诗句的古怪形式。他们作品的情节多取自宗教神话和传说。当然，他们同泰米尔语作家有区别，泰卢固语诗人表现不出以往那种神秘主义的勤勉，他们研究宗教形象时，不是真正敬神，而是在做审美化的游戏。

上半世纪泰卢固语作家都在从事散文创作，对散文的兴趣很大程度上

是由学校教育的需要和出版中世纪散文珍品的英国人查尔斯·菲利普·布朗进行考察引起的。1847 年《摩诃婆罗多》一书的散文版本《阿迪帕尔瓦姆》完成。再早，1830 年，Д. 马利卡尔改写了波斯语的《四个游方僧》，而且在新时期散文家的创作里出现了当时诗歌中具有代表性的热衷雅致音节和装饰音节的现象。为写格律散文作品作家们不用当代语言，而用他们所说的"纯净"语言，这种语言以中世纪泰卢固语的词汇语法构造和诗文为准绳。这种文学的典型范本是《五卷书》和《嘉言集》的两章改写《端正品行训诫之夜光》，改写本的作者是钦纳亚苏利，他对许多同代人产生过重大影响，但也阻碍了散文语言大众化的进程。

继承马拉雅拉姆语阿特卡塔——身势戏剧和文本共生——传统的是伊拉依曼·坦比(1782—1856)，卡利马努尔·维德万(科伊尔坦布兰，1825—1857)及其仿效者。阿特卡塔必须采用往世书和史诗情节。科伊尔坦布兰的剧本《拉万那的胜利》最为独特，剧中的拉万那形象没按惯例进行解释：他不再是那个残酷的恶魔罗刹，而是一位引人同情和尊敬，具有尚武精神的英雄。

由于历史条件特殊，旁遮普文学进入发展新时期比其他地区晚，旁遮普直到 1849 年才成为印度英人占领地的一部分。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国家生存期间旁遮普人民的凝聚力达到了很高程度，它在信仰宽松条件下形成的艺术文化也汇集了不同信仰的各个民族的珍品，综合了口头和书面文学传统的各种成分。在这里进行创作的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他们赋予旁遮普艺术文化的是各不相同的面貌。

十九世纪旁遮普文学中仍然流行叙事诗歌。这种体裁叫吉萨，描写各民族各阶层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为写自己的悲剧旁遮普作者采用了取自各方面的情节，有印度文学的(《那罗和达摩衍蒂》等)，有阿拉伯文学的(《莱拉和梅农》)，有波斯文学的(《法尔哈德和希琳》)，有旁遮普本地存在过的，还有印度谷各族移民——克什米尔人、信德人、伊路支人——民间文学中流传的。

旁遮普最后一位写吉萨的著名诗人是哈希姆·沙赫(1751—1821)，他以写瑟西公主和布努王子爱情悲剧的抒情叙事诗《瑟西和布努》而享有盛誉。哈希姆在选择表现手段时能掌握分寸，他避免了多余的诗句修饰，摒弃了习用的罗列同声同韵等形式主义手法。与许多前辈不同的是，哈希姆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上，而不是情节的外部波澜曲折上。瑟西和布努的爱情故事在旁遮普流传已久(中世纪大诗人哈菲兹·巴尔胡达尔，赛义德·瓦利斯·沙赫等人都写过这个题材)。依照传统写法作者应该在处理情节时把自己写成一个事件的目击者。哈希姆却用准确而形象的

有说服力词汇加强了事件真实性的幻想空间。旁遮普文学中有一股特别强大的世俗诗歌清流是因为旁遮普诗人都有一条通向法尔西语经典作家萨阿迪、胡斯洛、哈菲兹等人的宽阔通道。

旁遮普作者很注重地方色彩，常把用地方民间文学阐释的日常生活背景描写引进作品。旁遮普人进行爱国主义战争期间地方因素也随着旁遮普诗歌中公民爱国主义作品的繁荣和英雄故事体裁（瓦尔）的形成而增加起来。作为口头民间创作的一种体裁产生，又经人民英勇精神渲染的瓦尔逐渐取得了书面文学的一席地位。而在成为“高级”文学的一种体裁之后，瓦尔也并未失去它的根基，出身社会底层的弹唱诗人仍不只一次回首光顾它。

· 651

十九世纪以短篇叙事诗享有盛名的是卡迪尔·亚尔和沙赫·穆罕默德（1780—1862）。卡迪尔·亚尔是穆斯林诗人，如他自己所说，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他写了一篇英雄叙事诗《哈里·辛格·纳利夫》，描写旁遮普人同阿富汗部落的斗争。穆斯林诗人歌颂锡克统领这件事证明了旁遮普社会深层的根本推动力，证明了旁遮普人民族统一觉悟的程度。旁遮普人更为鲜明的民族感情是由沙赫·穆罕默德表达的，他写了一部叙事诗《锡克教徒对英作战传说》，用来纪念1845年至1846年的战争。作为所写事件的参加者，诗人通过这部独特的诗歌大事记歌颂了锡克教徒及其统领兰吉特·辛格的英勇精神，悲痛地讲述了旁遮普部落长（军事长官）们的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这种自私自利和背信弃义是造成战役悲惨结局的原因。这里的作者不是作为哭诉王朝失败与倾覆的宫廷诗人出现，而是作为人民代表出现的，他既承受了作为人民悲剧的战争结局又意识到了这场悲剧的后果。

旁遮普文学的例子表明，在封建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中世纪型文化深处，即使没有外界因素（此处指英国）的影响，也形成了中世纪传统内部瓦解的征兆。旁遮普文学的世俗化倾向首先表现在基萨（Кисса）、瓦尔（Вар）一类体裁的发展中。而此时旁遮普的艺术家们——印度教徒、锡克教徒、穆斯林——所创造的不是印度教人、锡克教人或者穆斯林的文学，而是综合了这些传统中各种因素的旁遮普文学。

旁遮普文学刚刚显示出来的内部结构变化乌尔都语文学表现得最清楚。乌尔都语作家的创作早在中世纪就显示出两种艺术传统——印度人和穆斯林传统——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在萨德里金·穆罕默德·法伊兹，米尔·达尔德的作品里，尤其是米尔·塔基·米尔的诗歌里都发生过一个摧毁贵族唯美主义和穆斯林宫廷诗歌封闭性的过程。乌尔都语文学具有全印度民族色彩，它吸收民间口头创作的主题、思想和形象，以大众化特点充实自己（从形式和思想主题方面），所以能表达人民的艺术自觉。所有这些倾

向都明显地表现在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1740—1830)身上,他的创作是高雅经典和民间诗歌成分的有机结合,穆斯林和印度文化传统的有机结合。我们既可以从他身上发现翱翔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经典诗歌的睿智和雅洁,也可以发现民间艺术略显粗俗的勃勃生机和朴实无华。

纳兹尔把新的主人公——人民大众领进文学,实现了真正的美学革命。他的诗歌反映了最主要的时代特征:饥饿、崩溃、手工业衰退,以其具体物质精神表现来说明千姿百态的普通人生活。纳兹尔抛开美学禁忌,化平凡为诗意,对艺术世界的时空坐标进行了重要的修正。

说纳兹尔的作品有深刻的人民性不只因为它里面打上了劳动阶层生活方式的烙印,写了"广场和市场",手工业作坊和商业店铺的熙熙攘攘,主要还因为它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那些以黄金、卢比、面饼、麦粥等等为"主人公"的哲理诗作品里。在这里诗人已上升到了对生活的社会哲理思考。他那些描写社会冲突和生活扭曲形态的诗作给社会讽刺作品奠定了基础。纳兹尔嘲笑了那些大权在握的有钱人:宫廷的谄媚者、封建王公、穆斯林教界。人们常用苏菲派和虔诚派学说的影响来解释纳兹尔诗歌的社会敏锐性和他讽刺作品的民主性质,甚至存在一种把纳兹尔看作苏菲派骑士团或虔诚派诗人迦比尔追随者的倾向。纳兹尔的创作不是在某一个传统的轨道上形成的:它综合了印度各派文学传统和成就,又以任何一种传统都不具备的新质丰富了自己,这就是现实主义的新质,印度新艺术思想曾为达到这个境界痛苦地奋力拼搏过。无可否认,此前作为全印度文化标准的虔诚派和苏菲派思想有影响,但是必须考虑到,从整体上说纳兹尔没有接受过神秘主义的神魂颠倒,没有接受过对贫困和禁欲生活的膜拜及称之为"消极的平等"即贫困平等的思想。对诗人来说虔诚派和苏菲派中最主要的东西不是宗教方面的,而是文学方面的:虔诚派人士和苏菲派人士的概念、形象和他们那色彩斑斓的比喻丰富了诗人的艺术调色板。

纳兹尔的创作是一个佐证,它证明在印度文学传统的深层出现了多条无需欧洲文化影响就会通向新时代的路径。作为民族悲剧活生生的见证人,诗人没像他的许多笔友一样陷入冷漠和悲观("在这个已经死亡的罪恶世界上你休想进行创造",米尔·塔基·米尔曾如是说),在他告别昨天的时候也毫无悲观沮丧的痕迹,他说:"当今的时代不是破坏女神时母当道的时代,/当今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

纳兹尔第一个跨过新世界的门槛,透过人,透过"罪孽的脉管"看见了创造的光轮:"这个世界的帝王是人,/穷人和最穷的乞丐是人,/富人和穷人同样都是人。"(《论人》)

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像许多超越自己时代的艺术家一样，没能为同代人所理解，他的作品也由于不符合美学标准多年被忘诸脑后。传统人士把他的诗歌称作“市场”诗歌，由于不能流通而没能影响上一个世纪的印度艺术文化，尽管具有西方传统的一些文学家于十九世纪开拓的许多艺术原则在纳兹尔·阿格巴拉巴迪的诗歌里已有光辉的体现。

十九世纪印度最大的诗人是米尔扎·迦利布（1796—1869），他的创作是在宫廷贵族诗歌（以伊朗诗歌传统为宗旨）和印度波斯语文学的轨道上形成的。受过良好法尔西语学校训练（他创作的大部分作品都是法尔西语的）的迦利布越来越重视乌尔都语。诗人同宫廷人士的交往逐渐削弱，他的创作便突破官方文学的习用主题而被全印度的综合问题充实起来。面向乌尔都语之后迦利布扩展了他诗歌的思想题材范围和表现手法。

他的诗歌打上了不倦思索的烙印，努力深入“事物本质”、“思想王国”，掌握最细微的感情色彩。诗人的艺术世界很矛盾：既有对“往日好时光”的惋惜，又有对适时变化的渴求；既想品尝快速流逝生活的欢乐又要谴责无所用心骄奢淫逸；对宗教教义也是褒贬兼施。迦利布的内心矛盾表现在下列诗行里：“我为爱情和生活的永恒欢乐奉献了自我，/我祈祷闪电之火焚毁一切，但我惧怕它的烈焰。”

迦利布经历过1857—1859年的流血事件，是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蒙古帝国崩溃的见证人。诗人痛苦地慨叹道：“如今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的/是粗暴强大的英吉利人……/黑暗的日子无尽无休。为生者预定的/是一条通向痛苦营地的道路。”

习惯生活方式的瓦解，舒适豪华的封建宫廷——传统学术和高雅文学的殿堂——的完结，常常使人产生“世界末日”的感觉，在艺术家的作品里会反映为苦闷和悲观情绪，迦利布的诗歌里就有类似情绪出现，不过他能保护自己的诗歌免受无出路的阴暗情绪的控制，奔向相信未来的智者贤人（“精神上的自由人仅在瞬间屈从忧郁，/他们终会以电闪的热焰点燃忧郁房间的灯盏”）。

他身上存在的是“创造的苦闷”，但他有足够的精神力量，使他不在艰难岁月丧失对“奇妙的理智力量能推动和装饰生活作坊”的信仰。迦利布是穆斯林，但不是宗教狂，也不歧视其他宗教。他诗篇里的主人公无论在人间还是天上的主宰面前都不会自戕，不会被作践，而是又骄傲又勇敢的人。

通常把迦利布称作“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和新时期的开山祖”。他可能如人们所认为的，比他年长的同辈人兼老师纳兹尔更“传统”，不过在整体上采用传统题材和主题，与封建人士保持较密切交往的同时，迦利布还

是给习用的诗歌题材和主题增添了现实的迫切性。他的全部著作都是对新时代进程,对十九世纪人的思想热情的艺术理解。十九世纪人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性和戏剧性,同时又有勇气迎接它。诗人死后步入文坛的几代穆斯林艺术家景仰的不仅是他的睿智和形象的漂亮,还有他强大的叛逆精神:"我有亚当的脾气,天生像他,/我公开宣布自己的不安分!"他发出建立新世界的号召:"需要建立另一个世界,/为的是我破旧的茅舍再生。"

653・

迦利布不仅是一个能同时用法尔西和乌尔都两种语言成功创作的诗人,而且是一个不脱离现实又保有真正知识权威的学者。在《评〈阿因-伊・阿克巴里〉》一文里迦利布号召人们不要回避现实存在的问题,号召人们过眼下生活而不要"翻陈年旧历",而且表达了他在人的智力面前,在改造水能和风能的科技奇迹面前的兴奋心情。迦利布的散文著作《正午的太阳》和特别有名的,含有1857年起义内容的《达斯坦布》,以及他的书信体遗产都是对发展乌尔都散文的贡献。

与迦利布同时创作乌尔都文作品的有穆明-汗(1800—1851),穆斯塔法-汗・谢夫塔(1806—1869)和谢赫(长者)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祖克(1789—1854),这些人在蒙古帝国驻德里的挂名长官宫殿进行创作,仿佛是1857—1859悲剧事件前夕封建贵族诗歌的回光返照。

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散文经典文献的出现是乌尔都语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很久以来印度就广泛流传着产生于穆斯林国家的散文传说。这些已形成一种独特体裁——达斯坦——的传说,一般由职业说书人——达斯坦戈——口传。十九世纪初根据威廉堡学院编者提议,由印度人协助,首次出版了达斯坦。众多中世纪达斯坦版本里艺术上最当之无愧的有:密尔・阿门的《花园与春天》,他采用的是广泛流传的《四个游方僧》情节;赛义德・海达里的《谈话精髓》,加工的是关于哈特姆・塔伊的神话故事;尼哈尔昌德・拉霍里的《爱情宗教》,加工的是《蔷薇园》的故事情节。作者加工作品不限于穆斯林阶层流传的情节,所以在乌尔都文散文版本中也出现了不少梵语文学的流行作品:《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欣哈桑・巴蒂西》、《薄伽梵歌》等。除了达斯坦,还出版了各种小说的改编和翻译,有萨阿迪的《古利斯坦》、《一千零一夜》里的童话、《莱拉和梅农》,迦梨陀娑的《沙恭达罗》和《罗怙世系》、《罗摩衍那》与《摩诃婆罗多》的片断等。这些都是附设于德里学院的"翻译家协会"的活动家们编写翻译的。

印度其他地区从事记录和改编口头及书面文学作品的作家主要都在各公国朝廷。十九世纪上半世纪乌尔都散文中的独特现象是两位作者的创作,两位作者是赛义德・英沙拉-汗・英沙(1756—1818)和米尔扎・拉扎布・阿里・贝特・苏鲁尔(1786—1867),都与勒克瑙文学学派有联系。他

们文化修养极高，以多种体裁进行创作，不过他们首先是作为以新原则创作小说的作家登上文坛的，进行创作时只用新情节，不用传统情节。

英沙的《凯塔蒂的清晨》(1803)写一个乌代·班王子和漂亮公主凯塔蒂的爱情故事，他们克服种种稀奇古怪的阻力(不无超自然力的协助)终于获得幸福。小说从诗学类别看与达斯坦有惊人相似的地方：主人公出身高贵，语言风格单层化，在对比中评价人物，经常被突发插曲打断的惊险情节，刻意追求的教益，玄妙的氛围等等。不过在与史诗传统保持同源关系的同时，作者引进了印度境外发生的一些情况。作家对语言的态度也比较新鲜。他运用的是印度北方广大地区流行的克里波利方言。这种方言当时尚未成为文学语言，印度教人和穆斯林同样都听得懂，所以《凯塔蒂的清晨》被看作乌尔都语和印地语的共同财富。

与晚年才来勒克瑙的英沙不同，苏鲁尔从当艺术家一开始受到的就是勒克瑙文人精细口味的影响。他的主要作品《奇迹》(三十至四十年代)描写让·阿拉姆王子的惊险爱情，明显打着精致风格的烙印。

苏鲁尔和英沙一样，情节确定以后，在很大程度上模仿了民间达斯坦的结构。还有一个使小说更为传统化的特点，它是以韵律散文写成的，其中含有许多文雅修辞，不乏波斯文学和乌尔都文学古典大师的诗句。 ·654

如果说英沙反映的是全印度的共同风格，那么苏鲁尔的地方色彩就具体多了，这特别表现在对主人公现实日常生活，自然景色，勒克瑙及其郊区一般生活氛围的描写上。虽然苏鲁尔的书过尚词藻，其中不乏超自然的神奇东西，它仍不失为文学接近生活途程中的一个最重要阶段，为乌尔都散文后来的现实主义写法打下了基础。苏鲁尔在运用口语描写主人公及其生活环境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在将情节搬到勒克瑙贵族宫廷时繁化词汇，相反，在描写下层社会圈子时简化词汇)。苏鲁尔通过引入大量对话打破了达斯坦故事叙述的四平八稳和从容不迫。这是一项创新，因为乌尔都语叙述性艺术文化一般说和整个穆斯林世俗文化一样，同印度教文化比起来，更具独白性(比如说，它不懂得戏剧，所以当十九世纪把梵文剧本译成乌尔都文的时候，所有对话都改成了作者的叙述)。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印度教作者在自己的散文作品里多么喜欢用戏剧手法。

总的说印度达斯坦应当列入小说创作的早期形式。在整体保有“东方”特色的同时得到文学加工并于十九世纪以文字记载下来的达斯坦，在许多方面可与中世纪小说的欧洲形式——骑士小说、惊险小说、艳情小说等——相比，只要它含有这些体裁的特点或在某些类别的作品中有与早期欧洲拉丁语系某一形式相应的地方，就能相比。

印地语新文学史的基础实际上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奠定的。它同婆罗丹都·哈里什钱德拉的创作密不可分。英沙早在上半世纪所写的《凯塔蒂的清晨》之前言里就曾讲过，他要写一本“除印地语以外不含任何其他语汇的书”。他的想法源于现实复杂的语言环境，因为当时存在彼此相当接近的几种方言——伯勒杰、阿沃提和克里波利，而其中的前两种早已进入文学创作（中世纪已形成此两种语言的广阔诗歌传统）。克里波利语则是北印度广泛流布的一种口语，印度穆斯林将其视为“印度斯坦”的语言、“印度教徒”的语言。十九世纪克里波利语渐渐被用于文学创作，随后“印地语”这个名称被固定下来，伯勒杰、阿沃提则被当作两种方言对待了。克里波利印地语进入文学流通的同时积极补充了梵文语汇。这样一来，克里波利语赋予乌尔都和印地两种印度语言以新的生命力，前者成为以阿拉伯—波斯语汇充实，并以阿拉伯体字母加以巩固的克里波利文，后者则成了相当梵化的克里波利文（天城体字）。

在形成印地语文学语言中起过巨大作用的是威廉堡学院。学院人士制作了史诗情节的首批加工作品。学院同人中的著名人士有萨达苏克拉尔（1746—1824）、英迪·阿拉汗（卒于1878年）和拉卢支·拉尔（1763年生）。留下鲜明文学痕迹的第一部印地文作品是拉卢支·拉尔的《爱之海》（1803），作品基础是《薄伽梵往世书》的第十部。拉尔的功劳在于他利用一个最为普及的情节——克里希纳生平中的一段插曲，他的青少年时代，他的军功和政绩——创造出一部散文作品，以其展示生动口语的艺术可能性。

马拉提语原版著作诞生于1857年，当年出版了巴巴·帕德马纳扎（1831—1906）的长篇小说《亚穆纳游记》。十九世纪的一批印度人从以理性原理改造社会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出发，掌握了关于社会现实与人的“自然本性”相矛盾的启蒙主义思想，作家们以家庭首先是以妇女悲惨命运为例来展示这些问题。长篇小说《亚穆纳游记》写一对青年夫妇，教会学校毕业并秘密加入基督教的女子亚穆纳及其丈夫维纳扬周游马哈拉施特拉的故事。维纳扬由于意外不幸而去世，等待亚穆纳的是可怜寡妇的命运（强制剃度，禁戴饰物，禁着盛装，隐居遁世等）。亚穆纳行动果断，她跑掉了，并再婚嫁给一个基督教徒。作者描写了不只一个寡妇，而是好几个寡妇的命运，因为对他来说至为重要的是展示不只流行于亚穆纳家乡特里扬巴克，而且盛行于全马哈拉施特拉的陋俗。时间地点很具体，讲述的每个故事都可以作为一整部长篇小说的题材。企图通过一个情节框架处理整个题材是马拉提语启蒙文学早期小说的一大特色，当时对长篇小说情节结构的手法还没有作过精细研究。从《亚穆纳游记》情节结构原则中可以看到梵语框形结构小说和早期英语小说的影响。创作长篇小说的时间就是制定马拉提

655·

语标准的时期。长篇小说语言朴实，接近口语，但在一定程度上能感觉出英语用语和语法的影响。

马哈拉施特拉的诗人们以翻译改写梵文作品和部分欧洲作品，编辑中世纪马拉提经典作家的作品限制了自己的兴趣范围。这一时期的许多著名诗人也是大学者和启蒙学家。他们当中有 K. 奇谱隆卡尔（1824—1878）、Л. B. 戈德博尔（1799—1894）、Л. Г. 帕拉吉（1844—1911）、Г. С. 莱勒（1825—1898）。而他们之中许多人（奇谱隆卡尔、戈德博尔、莱勒）在自己的诗歌创作里没有宣传那些思想。诗歌仍然停留于高雅语言艺术范畴，在精致学术诗歌轨道上发展。当然不少辉煌的梵语文学译作——《云使》（奇普隆卡尔），《罗怙世界》（莱勒），以及翻译过来的司各特叙事诗和华兹华斯等人的诗歌，都是这一时期出现的。

马拉提语戏剧产生于 1843 年，这年上演了威什努达斯·巴韦（1819—1901）的剧本《西塔未婚夫的选择》，剧本复活了民间戏剧传统和古典剧作的一些手法，本身是一段著名史诗情节的改编。剧中散文台词和诗歌台词交替出现。巴韦在他后来的所有剧本（约有五十部）里都只写歌词和诗句，对话则由演员临场发挥。剧本最重要的角色是主演、小丑和舞女。主演领着合唱团和乐队居于舞台中央，他以歌曲伴随演出，解释舞台上发生的种种事件。

在桑格利（马哈拉施特拉南部）少数上层人士中取得轰动一时的效果之后，巴韦开始为广大民众演出。巴韦的戏班在马哈拉施特拉各大城市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以至引起了知识分子对民间戏剧活动的兴趣。巴韦一直是在民间戏剧轨道上进行创作的，他在简单演出（达沙瓦，勒利德，贡德哈洛）的基地上奠定了现代职业戏剧及其演出的基础。

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和现代题材首先表现在孟加拉戏剧中。在关闭加尔各答列别杰夫剧团后的将近半个世纪里没有创作出一部孟加拉剧本。快到世纪中叶的时候，加尔各答开始出现戏剧爱好者的戏班，上演翻译或改写的梵文或英国剧本（《沙恭达罗》、《茉莉和青春》，以及《威尼斯商人》和《哈姆雷特》的改写本）。

孟加拉诗歌领域也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五十年代表现尤为激烈。十九世纪头号诗人是伊舍尔钱德罗·古普特（1812—1859）。古普特出身于贫寒家庭，失去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可是他成了孟加拉社会鼎鼎大名的人物，而且作为启蒙家和爱国者影响了同代人。他是政论家，孟加拉流行杂志《新闻海》和《太阳》的发行人。古普特的诗歌题材极其多样，从描写孟加拉人的节日活动和烹饪法，到进行社会讽刺，写热烈的爱国主义抒情

诗。古普特的讽刺矛头指向“有先见之明的预言者”——经院哲学家和术士,因为这些人为支持荒诞的偏见而将陈规旧套奉为圣旨(《伪婆罗门》、《孀妇律》、《库里尼主义》),他还讽刺拜倒在英国人面前的“世界主义者”(《奴颜婢膝》)和殖民主义者。诗人创作的主旋律是热爱祖国,它特别鲜明地表现在下列诗篇中——《祖国》、《母语》、《靛蓝场主》、《印度命运》。古普特的下面两句诗已成名言:“对我来说,祖国的犬只重于异邦的偶像。”

《靛蓝场主》一诗最鲜明地揭示了古普特的讽刺才能。农民们抱怨维多利亚女王说:“没有比占领者担当保护角色更糟糕的事情,/有时连毒蛇也会出于恩惠而吞下青蛙。”

656·

古普特诗歌的人民性首先表现为他诗歌的爱国主义公民精神,他第一个创作了孟加拉诗歌中的诗歌源泉——祖国母亲的形象。

古普特的创作和许多其他艺术家的创作一样,反映了现代思想倾向:作家面临的任务是帮助自己的同胞摆脱封建社会伦理束缚,确立人间幸福和自由的权利,摒弃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宗教道德,确立起人们头脑中的个人幸福原则。与此同时启蒙主义的思想道德又要求限制个人主义,建立个人理想观念,这理想就是个人意志和感情服从为民族为祖国服务的社会责任。在进步作家的优秀作品里,人都挣脱了残酷而狭窄的种姓—帮会制关系,而同具有另一种价值取向的制度接上了火,现在不以种姓、门第来判断人的价值,而以他的公民社会地位,以他对社会对祖国的态度来判断他的价值。文学展示给人们的是,人只有获得自由才能不做种姓偏见的俘虏,才能成为一个公民。

对发展新印度诸文学起巨大作用的是英国文学。英国文学将印度人带入新思想世界,介绍他们认识另一种诗歌形式,向他们展示散文作品无与伦比的可能性。英语成了印度人同西方各族人民进行文化文学交流的主要手段,它还使他们,不管这听起来有多奇怪,认识了穆斯林东方的精神价值,因为多数阿拉伯—波斯文学译著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而且印度各族人民熟悉彼此的艺术文化也是通过英文译著。在英语成为欧洲与印度之间和印度各文学之间的交流手段之后,它又以印度主智派的特殊语言给一种新现象注入了活力,这现象就是印度英语文学。

第一个印度英文诗人是亨利·代洛济奥。1826年他带一本抒情诗《诗集》走上文坛。代洛济奥的诗歌明显受欧洲文学影响,里面极易推断出英国浪漫主义抒情诗的形象系列、修辞手法乃至旋律。但在整体模仿的同时,他的诗歌打上了当时印度人思想感情的烙印,饱含了对印度的热爱和高尚的公民责任感。在献给印度学院大学生的诗篇中,诗人谈到当他看见

预示祖国光荣未来的“新思想正在成熟”时他那溢于言表的兴奋之情。他的诗作《致印度——我亲爱的家园》可以称作印度的国歌。诗人把印度比作被“铁链”锁住翅膀的骄傲山鹰，写到它失去往日力量和美质的艺术。在另一首诗里他表达了自己对复兴祖国昔日光荣的信念（《但总有一天沉睡者会醒来……/我国家的竖琴，请让我拨动一次你的琴弦吧》）。

用英文写诗的还有代洛济奥的同龄人卡希普拉萨德·高希（1809—1873），古普特的学生龙戈拉尔·邦多帕德哈伊（1827—1887）和十九世纪大诗人兼戏剧家迈克尔·默图苏登·德特（1824—1873）。高希很早就放下创作活动去搞政论了。古普特和德特度过迷恋英语时期又回到母语的自然古朴。类似演变对当时搞创作的印度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典型的。

龙戈拉尔·邦多帕德哈伊掌握古普特爱国主义抒情诗和拜伦、雪莱爱自由诗歌的精髓之后，以民族史料为基础创作自己的作品。邦多帕德哈伊四部叙事诗中最好的要算《帕德米尼传》（1858），无论诗人的艺术技巧还是爱国主义感情在这部作品里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叙事诗和情节基础是中世纪传说中的历史事件——德里苏丹阿拉奥迪诺包围拉贾斯坦的城堡奇托尔——和拉贾的夫人帕德马瓦提的功绩。帕德马瓦提宁死不屈，给奇托尔妇女做表率，首当其冲冲入火海。诗人同代人很容易读解出叙事诗的潜台词，揣度出作者针对当代现实表达出来的意思。叙事诗许多诗行在成为歌曲，成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解放运动参加者的进行曲之后都已是独立存在的篇章。

默图苏登·德特的创作是孟加拉文学发展中的最重要阶段。作为诗人和戏剧家的德特不仅从本质上革新了诗歌和戏剧，而且深深影响了孟加拉人的艺术知觉。他革新并丰富了孟加拉文学的诗歌语言、体裁体系和描写可能性。可以说，现代孟加拉文学正是从默图苏登·德特开始的。德特的创作辉煌时期是在1859年至1862年，这期间他写出了最优秀的作品：1859年两部社会讽刺戏剧《难道这就叫文明》和《老鹦鹉的羽毛》；1860年历史悲剧《克里希纳公主》和神话叙事诗《蒂洛塔马降生》；1862年是分九部的英雄叙事诗《梅格纳德之死》和叙事诗《巾帼英雄》。

· 657

德特是第一个能把欧洲和印度艺术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的作家。德特从本质上改造了孟加拉戏剧，他的作品被收入经典剧目，同样他也合理地运用和掌握了现代孟加拉戏剧家的经验，包括进入当代人文学知觉的社会生活戏剧经验。能够作为五十年代末孟加拉人艺术知觉可靠财富的长篇小说和特写文学的早期范本，古普特和邦多帕德哈伊的社会爱国主义诗歌，所有这些都为德特作了先期准备，打造了他的创作，使之具有孟加拉艺术文化的新品格。

德特的第一部戏剧《多福公主》存在许多他给自己同行指出过的毛病：结构松散，剧情拖沓；独白冗长，损害表现力的过长叙述，千篇一律的单调语言。剧本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它谴责了压制妇女天然感情和恋爱权利的封建习俗和道德法规。正是这种对神话的人道主义阐释保证了《多福公主》的成功。第二部戏剧《帕德马瓦提》(1859)的情节取材于希腊神话，足见德特对欧洲文学的眷恋。

德特的两部喜剧《难道这就叫文明》和《老鹦鹉的羽毛》巩固了社会生活戏剧在孟加拉文学中的阵地。这些剧里，反映了启蒙主义政论和文学作品集中批评的那些现象。

在前一部喜剧里，德特通过主角诺博巴布(译为"崭露头角的先生")及其友人的形象讥笑了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既远离真正欧洲文化又背离民族传统，漠不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伪启蒙活动。

在《老鹦鹉的羽毛》里德特又展示了印度现实生活中的另一种普遍现象——传统封建道德固守者的假仁假义口是心非。

作者的同情心在普通农民一边。穆斯林哈尼夫和印度教徒巴舒斯波蒂是两个贫苦农民，他们不介入宗教对抗，却在反对自己地主的斗争中表现出阶级团结。

采用能促进文学接近生动现实的当代生活材料，也深深影响了两部剧本的语言。德特剧本的人物用活生生日常语调丰富起来的普通百姓语言说话。德特的主要成就在于，他在利用语言为人物作社会和个性定位方面开始了认真尝试。比如，诺博巴布之流用特殊的孟加拉式英语说话，老一辈代表人物用纯孟加拉语，穆斯林的语言则充斥着乌尔都和波斯词汇和成语。值得注意的是孟加拉社会某些阶层的反应，他们认定德特的剧本是在批评自己，于是利用自己的社会威望阻挠其搬上舞台(首场演出都在后来，六十年代末)。

德特以其《克里希纳公主》一剧奠定了孟加拉历史悲剧的基础。情节以十九世纪初拉贾斯坦内战史上的一些事件为基础，根据戏剧家想象作了些变动。

虽然五幕十四场的戏剧演起来很笨重，《克里希纳公主》还是孟加拉人最喜欢的剧本之一。默图苏登·德特曾说过："世上最好的戏剧莫过那些悲喜剧成分兼备的戏剧。"剧本受当代人的热烈欢迎，又得到日后的普及是由于同克里希纳线索相连的英雄因素与悲剧因素的结合，由于其他人类情感的多样性，以及日常生活喜剧环境的存在。戏剧的启蒙—古典主义冲突——人的责任感与爱情的冲突以及责任的胜利——再好不过地适应了时代意识形态的需求，因为不仅是艺术家，而且是所有的先进人物都在利用

民族神话和历史材料唤醒同代人的爱国主义情感。德特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女主人公行为的爱国主义性质，把她剧中的命运同梅瓦尔拉贾神奇妻子帕德马瓦提的命运加以比较，后者是宁可殉身不可受辱的。剧本的生活喜剧层面具有强大的艺术感染力，其中起主宰作用的是大人物，最有生活气息的两个形象——多诺达什和莫多尼卡。多诺达什是印度戏剧中的全新现象，新资产阶级时代、企业家时代的产物。诡计多端，狡猾奸刁，他行为的基础就是追逐暴利。多诺达什（意思是“金钱的奴隶”）为追逐一己私利而表现出他的发明天才和施展技巧的本领。

不过，默图苏登·德特能以现代孟加拉文学奠基人的身份进入孟加拉人心目当中还要归功于他的诗歌创作。正是在诗歌领域最强有力地表现出了德特创作才能的革新精神和革命精神。

德特的第一部叙事诗《蒂洛塔马降生》曾被说成“新孟加拉文学的诞生”（霍罗普罗沙德·夏斯特里语），它的出现是对传统诗学勇敢果断的挑战。叙事诗是用孟加拉诗歌从未见过的无韵诗写成的。他收集传统音节诗的押韵法，使停顿流动起来，赋予诗句以语流的自然性。德特这果决的一步曾引起艺术鉴赏家的惊慌失措暴跳如雷，但很快就被叙事诗无可争议的高度艺术优点制服了，这优点就是“形象的庄重美丽，对自然界的凝神关注，美感的细腻和语言的恢弘（P. 博舒）。诗人采用了两个恶魔兄弟的著名神话情节。恶魔兄弟松德和武帕松德同天神作斗争，天神借助派给他们的美女蒂洛塔马的魅力征服了兄弟俩。蒂洛塔马勾引松德和武帕松德爱上自己，完成使命。兄弟俩为拥有她在搏斗中战死，她本人却飞上天去变作了一颗星。

当传统的封建制度和观念已经崩溃，形成印度人民族自觉的痛苦复杂过程正在发生的时候，由时代精神本身所决定的，对强有力叛逆性格的向往和对现实的英雄主义理解，表现在许多艺术家身上，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德特的创作中，表现在《克里希纳公主》、《蒂洛塔马降生》，特别是巩固了作家身后“文学叛逆者”（诗人本人语）声誉的大型英雄史诗《梅格纳德之死》里。叙事诗《梅格纳德之死》取材于《罗摩衍那》，而且是其中最有戏剧性的部分，写兰卡统领罗波那魔王带领他的队伍同拉马神作战以及罗波那英勇的儿子梅格纳德（英德拉吉特）战死的故事。德特从根本上重新领会宗教阐释过的传统情节，改变了其中的道德重心，他把罗波那父子这对恶的化身处理成了崇高道德品质的体现。“我鄙视拉马和他的喽啰，对罗波那的思索点燃了我的想象力——他是一个光荣的小人物。”德特这样写道。这是对正统思维方式的坚决挑战，诗人的进步同胞都能从正面评价和接受叙事诗的深刻含义，因为在反对中世纪偏见的斗争中他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

上感到自己身上的罗波那。在歌颂反对众神及其爱主拉马的罗波那和英德拉吉特时，诗人也“反对了宗教本身”，批驳了“敬神及其素有的克己、赤贫和自戕思想”（拉·泰戈尔）。同代人能充分感到的不仅有反正统思想，还有德特诗歌中一些不无重要性的其他思想，那就是热爱自由的思想，为祖国献身的爱国主义思想，诗人把这些思想体现在罗波那和他英勇的儿子形象身上。德特以诗意叙述的整个过程展示英德拉吉特语言行为的庄重高尚，写他为保卫“金色兰卡”免受拉马禽兽入侵而奋不顾身地作战。魅力不比英德拉吉特逊色的是罗波那形象本身，他经受了失去爱子及一切所得的全部痛苦，但没有被折毁，在败绩下他仍然高大挺拔。

《梅格纳德之死》中反思传统神话情节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弥尔顿《失乐园》的影响，德特曾认为弥尔顿是超时代超民族的优秀诗人。德特的神话叙事诗《巾帼英雄》也是孟加拉诗歌中引人注目的现象。《巾帼英雄》以奥维德的《书简》引发，但以印度神话为材料。它以书简组成，每份书简都是古代传说中一位女英雄富有激情的戏剧独白。诗人塑造了一批坚持自身爱情和幸福权利的孟加拉妇女形象。

659·

默图苏登·德特是在印度文学中确立十四行诗体裁的第一人，后来十四行诗日益成为流行体裁。德特收有百余首十四行诗的诗集（1866）是在法国写成的。诗人通过这些诗篇总结自己的一生，许多篇章渗透了思乡愁绪和对遥远祖国的爱恋之情。诗人为印度的奴隶命运而难过，歌颂辽阔祖国的美丽，批判自己青年时代对祖国和“祖国语言瑰宝”的轻蔑。

印度文学该阶段的特征是开始了摧毁中世纪美学标准，破坏先前体裁等级划分的缓慢痛苦过程，出现了若干新的文学体裁。其重大成就是创造了新性质的散文并把它推到了艺术文化的前列。梵文经典的翻译和改写奠定了十九世纪散文的坚实基础。这种从自身传统基地上成长起来的散文似乎作好了迎接另一种散文传统，欧洲散文传统的准备，逐渐发生了明显的结构变化，它同欧洲文学的接触预示着新质文学的诞生。由当代问题不断充实的诗歌，虽保留着全部保守主义教条，也在生动现实和时代意识形态因素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不过速度没有散文那么快。

第二章　僧伽罗（斯里兰卡）文学

1815 年在斯里兰卡史上发生了深刻的悲剧性事件：僧伽罗国体的最后一个堡垒——康提王国垮台，英国殖民者成了国家的全权主人。事件引起空前震动，是全岛欧洲殖民化三个世纪以来（从十六世纪初）所没有过的。

希望破灭，惊慌失措，仇视异邦，痛苦不堪和被迫的低首下心——这种种复杂的思想感情连同那场直到彻底失败的斗争中许多具体事件一起载入历史作品，首先是写战争的英雄史诗哈坦纳中。

在《抗英战争》一诗里描写了1803年反对康提国王维克拉玛拉吒辛哈(1798—1815)的一支英国作战部队，当时兰卡统治者取得了暂时的胜利，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敌人。叙事诗带有明显的歌功颂德性质，令人想起早年葡萄牙人占领该岛时创作的那些同类作品。维克拉玛拉吒辛哈被写成一个高尚的统治者，开始时对来犯敌人既宽容又仁慈。诗歌通过细节再现英国人狡诈的军事计划和军事行动，写军队的推进，军事将领的作战，讲到被迫同占领者对立的兰卡国王怎样带领自己的文臣武将重创敌军。诗歌以阴暗的笔调生动描写英国人在瓦格尔谷战役遭受失败的画面，对不列颠人占领拜蒂科洛康提的第二次不成功尝试也作了简略描写。叙事诗以一群妇女口吟艳情诗行和祝愿公式结束。对维克拉玛拉吒辛哈的过分赞美还表现在叙事诗《什里·维克拉玛拉吒宫殿颂》里，叙事诗描写了国王登基第九年在杜姆巴尔省举行的一次“国王”开垦稻田仪式(僧伽罗人认为此类仪式是以魔力守护和保卫整个国家的有效手段)。叙事诗把维克拉玛拉吒辛哈说成“誉满全球”的国王，“如日中天的臣民保护人”。

1815年至1817年间，英国人占领康提王国以后所写的叙事诗《瓦迪加们的战争》(瓦迪加是国王的世袭名字)腔调就完全不同了。维克拉玛拉吒辛哈被指控为罪恶多端，信仰欠诚，不善统治，使臣民蒙受重大损失和痛苦。在赞美的上下文里根本没提到他的南印度氏族出身。叙事诗的作者是维亚里格勒的显贵卡维孙达拉，他的整个同情心都在本可登上王位的僧伽罗领袖人物之一埃赫列波拉身上，甚至写到他参加推翻维克拉玛拉吒辛哈王位的事件。作者从历史上把僧伽罗人在地方王权保护下摆脱殖民者桎梏获得解放的最后希望与这个埃赫列波拉联系了起来。这些王者间的冲突在当时(1816年前后)的许多其他作品里也有艺术体现，比如《埃赫列波拉故事》、《恶行史》。此类作品里维克拉玛拉吒辛哈都被描写成一个篡位者、独裁者、好色之徒和凶手恶棍。他的朝廷一片倾轧，他的王国一片混乱，他的臣民深受掠夺与饥饿之苦。这些诗歌明显反映了当时僧伽罗社会历经的悲惨绝境。 ·660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僧伽罗人创作的无论散文还是诗歌作品中历史题材都占不小地位。早在前一世纪基尔蒂什里拉吒辛哈在位时就已开始，到维克拉玛拉吒辛哈统治时还在编写的《皇族小家谱》，1820—1821年由维亚里维塔·萨拉南卡拉的弟子完成。这部作品将近七分之一是写僧伽罗末代皇帝统治时代的。为祖国受辱而失望和悲痛的感情在作者心中又明显战胜了

对事件恰如其分的评价：失败的全部罪责都归咎于不幸的当权者一人，骂他缺德，犯下了弥天大罪，直到说他“诋毁”佛教教义和分裂国家。



民族格斗
埃姆比亚卡庙宇木雕 十九世纪

基拉马·达马南达的叙事诗《僧伽罗语荟萃》(1820)讲到僧伽罗传奇式祖先维扎伊王子在兰卡出现的故事，讲到来本岛传布佛教的马欣达使团(公元前三世纪)。1834年完成一本书(作者是阿斯基里老寺院的一个方丈，亚坦瓦拉-马哈蒂拉和尚)，直译其名《名家名言述评》，用作者的话来说，全书八十八部，每一部都是一位僧伽罗国王“不繁不简不详不略的历史”。作者写书的资料来源是《大世系》和《小家谱》。描写的内容还包括末代国王的故事，英国人在被征服国家的活动，他们对逆臣反抗的镇压以及国家法庭的组织。毫无疑问，作者在迫不得已渲染对不列颠统治者的忠诚时，也在竭力宣扬国人依照过去康提王国首都和外省的部署而举办的种种活动，他高兴地指出，佛教典礼和仪式仍在按古代习惯继续进行(有些仪式被禁止那是后来的事)。

属于历史类的还有几部僧伽罗佛教徒重要圣物叫做佛牙的诗歌作品。1815年维亚里格勒的卡维孙达拉写了此一题材的叙事诗《圣牙史镜》，1845年又由卡哈南达·纳瓦拉特纳完成一部《圣牙仪式》。

一批类似“文集”的东西创作了出来，通常是诗体，写僧伽罗历史上各种各样值得关注的事件。创作佛教内容的新经文也被视为爱国主义行动。僧伽罗文古代佛经都很难懂，巴利文的就更不用说，读经困难早已呼唤出一种称作卡维-巴纳-波特(诗歌生命书)的布道诗体裁。十九世纪初一些以格言诗形式写成的教言集非常盛行，其中往往含有各种各样佛本生经的引文。这种文集有时以问答形式，偶尔也以长者劝诫幼者的形式编写。以此类诗作久负盛名的是佛教教义和佛教道德宣传家米希里皮亚涅·达马拉塔纳(1768—1851)，他经常把自己的训诫编成无韵的谐谑格言。他生动形象地讲述罪人如何在地狱受苦，好像同一主题的民间木版画。达马拉塔纳的弟子科加拉·达马蒂拉卡(其最有名的作品是《愚蠢的罪孽》)也模仿他进

661 ·

行创作，吸收许多民间作品的情节和表现手法。

不少作品是以传统体裁创作的，其中就有这一时期的赠诗杰作，诗人塔拉兰贝·亚京都1813年写的《黑天鹅寄语》。这位作者跟名人巴拉纳（十八世纪）一样，请求神仙马哈森治好他的瘤疾。他是国王维克拉玛拉吒辛哈的信徒，而后者曾被称为兰卡的太阳，享有同主神萨克拉同样的荣耀，是佛教的捍卫者。叙事诗以其精致见长，含许多称作"沙布达兰卡拉"的东西，比如，在描写大自然时，作者利用同音法能够传达出飞禽走兽及潺潺流水的声音。

基塔拉加马的僧人德瓦米塔写的叙事诗《凤头麦鸡寄语》（1815）形式上更为传统，而且跟卡维孙达拉的《瓦迪加们的战争》一样，是埃赫列波拉的一篇辩护词。天文家希尔帕迪帕蒂1833年写了叙事诗《七女寄语》，他对信徒所取特殊路线（从库鲁内格勒省纳特哈甘纳村到丹布格）的具体描写和先用诗后用韵律散文的新颖形式都很有意思。

作诗技巧精湛是这一时期许多作者创作的特点。比如，上面已经提到的米希里皮亚涅·达马拉塔纳，他在这方面就享有盛名。他写的一首敬佛赞美诗作七种声音组合都可为人所理解（或重述、翻译）。他另一些诗节的诗行从左往右读和从右往左读都一样。

此时一种诗体书信流传起来。上一世纪末即已成名的女诗人加扎曼·诺娜（唐娜·伊莎贝拉·佩鲁玛尔）提供了这一体裁的精致范本。提供范本的当然还有米希里皮亚涅·达马拉塔纳。

十九世纪初僧伽罗文学创作中保留了传统的学术文体，有关于爱情和爱情科学的论述（《激情瑰宝之最》，1811年），关于民间医学的论述（《瑜伽论宝库之珠》，1816年），关于房屋建筑的论述等等。

十九世纪上半世纪僧伽罗文学亟待革新。许多人敏锐地感到这一需要，所以在各类体裁里都作了探索革新手段的尝试，不过暂时不是根本性的，只在传统形式和标准范围内进行。一些人建议用幽默语言讲解佛本生经的经典情节，另一些人则试图在传统形式作品中加进对当代现实和现实特征的描写。比如，维亚里希蒂亚瓦的苏曼-泰拉是叙事诗《孔雀寄语》的作者，他在描写摩尔人（兰卡穆斯林）的风俗习惯时，就加进了白人妇女参与的场面，看得出来，那是一些不列颠官员的妻子。《河上节日》（1807）一诗的作者萨马拉塞克拉·迪桑纳亚卡也表现出具体描写现实事件的倾向，他这部诗描写的是马特勒地区尼勒沃勒河上举行的宗教活动，描写当中部分地再现了佛祖传奇性生平中的一些事件。

还有一条革新道路：面向新文学和民间文学史料，这一时期更多的是面向泰米尔文史料。比如，世纪之交拉纳斯加列-泰拉就把译自五至六世纪

泰米尔文献《蒂鲁古拉尔》的一些诗行纳入了自己最长的醒世叙事诗《为世界服务》。文献影响还表现在《为世界服务》这部叙事诗的无韵诗格律上。在此前后萨别-维达涅也以原来泰米尔材料创作了一部叙事诗《辛纳穆图故事》。

这些年开始了文学创作问题的争论。不过争论涉及的多半是诗歌格律和个别手法问题。部分争论记载在米希里皮亚涅·达马拉塔纳一封广为人知的信件里，是就萨马拉塞克拉·迪桑纳亚卡《河上节日》里的一行诗进行争论。

在这可以叫作期待变化与革新的时期较有时代意义的是，从先前远离文学创作的阶层中产生一批作者。比如，在康提王国快要败落的时候，唐布加尔村的一个铁匠带着他的佛教叙事诗《三大护符》走上文坛。以文学行家之见，这部作品的长处是文笔朴实感情真挚。总的说十九世纪上半叶僧伽罗人的文学创作不很强。文学家，尤其是世俗文学家的命运悲惨而凄楚。他们失去传统的靠山（国王和显贵），没有了生存手段，便日趋贫困。有一件当时的痛苦材料保存了下来：加扎曼·诺娜寄给英国当局（这是旧传统的可悲变化）一批诗体请愿书，里面讲到自己的穷困和她那些饥饿的孩子，并伸手请求援助。

662·

僧伽罗文学家和整个僧伽罗社会一样，面临的任务是在即将到来的时期悟出一些痛苦的真理并找到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归根结底是一条既能保存独特性又能实现彻底革新的斗争道路。

第三章 尼泊尔文学

十八世纪中叶尼泊尔由封建公国割据建成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之后，国家的历史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包括1804年就任首相比姆森-塔帕在内的第一批统一国家首领竭尽全力巩固年轻国家，保护国家的独立，因为当时强大的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威胁到它的独立。

世纪初决定国家政治精神氛围的主要事件是英国—尼泊尔战争。尼泊尔虽然打了败仗，仍保住了它的独立地位。不过尼泊尔人受到的打击极为明显。像历史上常有的那样，这次战争的失败成为唤醒和促进民族自觉的刺激因素。在文学领域这个过程首先表现为试图通过歌颂尼泊尔人民的勇敢和军人的英勇确立其伟大精神。过程的另一方面是试图证明，由首任元首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宣布了国语的尼泊尔，不仅有书面应用语，而且有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语言。

值得注意的是，十八世纪是马拉时代中世纪尼瓦尔文化繁荣的“黄金时代”，随着世纪末的到来文学中的戏剧“黄金时代”也跟着结束，此时的戏剧按古典标准创作，反映的却是刚刚开始的文学大众化过程，其表现是神话情节逐渐被历史情节所代替，作为新型集合角色的人民（确切说是农民）形象走上舞台，剧中的人民可以向公正的首领控告欺压者等等。所有这一切都伴随着一些戏剧体裁、风格、结构的变化。

十九世纪类似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这一时期已成文学主导形式的诗歌当中。传统颂歌斯图蒂再次成为几十年间的领先诗歌体裁，不过已同马拉时代的颂歌有了本质区别。首先，十九世纪的斯图蒂与历史现实直接相连。诗中歌颂的形象以及诗歌本身变化都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从传统的崇高形式向特别世俗化的形式转变。虽然颂歌的功能负载外表看来一如既往，要歌颂点什么，弘扬点什么，它的本质却完全改变了。它从对上天神灵和尘世强者伟大帝王的吹捧变成对人民光荣、坚定和勇敢精神的歌颂，人民即使被战胜，它也能以自己的勇气使敌人闻风丧胆。内容方面的改动常使斯图蒂传统结构得到改变。这些过程可从最著名诗人亚杜纳特（生于 1811 年）的作品例证中清楚地看出。

国家的命运，祖国统一和独立的问题深深激励着亚杜纳特，他的颂歌都是歌颂尼泊尔军人的。甚至献给比姆森-塔帕的斯图蒂第一部没有提到这位尼泊尔民族英雄的名字，而尼泊尔谷随便哪个城市，换句话说，整个祖国边陲都会在作者与勇敢的尼泊尔军人间建立起一定的诗意联想。不但比姆森-塔帕，而且亚杜纳特为之写诗的所有经受失败痛苦的同胞，都会把这些歌颂廓尔喀人英勇无畏的诗行牢记在心。为了强调思想的可信，诗人把现实存在的人物，英国驻尼泊尔首任总督的大名写进了诗句（对这种体裁来说完全出乎意外）。 · 663

为了使人相信每行诗讲的都是真话，亚杜纳特努力做到细节上极度可信。读者得到了关于尼泊尔军人着装的完整信息（苏丹头戴黑钢盔，士兵身着灰制服黑裤子）。对英国人的行动，同样也作了如此精确有序的描写。

读者发生了变化——说实在的，与其说诗人面对的是某个具体的人，不如说他面对的是全体同胞——这一变化引起了形式上的许多重大变化。免去了列举崇拜对象优点的必要台头，也免去了作者为衬托被歌颂者之伟大而表示的自我谦卑。言过其实的修饰语，传统斯图蒂中给神灵或君主罗列的头衔全部消失。射入眼帘的是从一段到一段频频出现的修饰语勇敢、无畏等等，用这些修饰语说明的也是同样反复出现的军人一词。华而不实的赞美被若干物质化的日常细节或成分所取代，似乎把一个整体特意化整为零。

亚杜纳特的第二首颂歌其著名度不亚于第一首，是献给沙阿王朝最后一位代表，实际执政的拉真德拉·巴哈杜尔·沙阿的。这首颂歌很有意思，虽然拉贾仍被写成能把民众从社会罪恶中拯救出来的救星，可是通常以他的官吏出面的社会罪恶负载者在这里已是一个实际存在的人物了，他的名字叫库拉南达。“曾经有过一小块土地，但被泛滥的河水冲走，/令我痛不欲生。/当债主前来讨债时，我因他而发疯。/万般无奈，我为获救而向您求情。/承蒙您租赁给我萨普塔里的土地，/可它带给我的不是盈利而是亏空。/库拉南达官爷劫走我的一切，直到去年的收成。/如今我已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颗粒无影，两手空空。”

颂诗之摒弃传统十分明显。对命运的类似抱怨，是富有说服力的证明，它证明在原始颂文体裁的范围内已经发出纯粹人类的尘世之声，这声音既改变了斯图蒂的性质，也改变了它的使命。

十九世纪以印度史诗和往世书为情节的传统翻译和改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首先，这些译作是用尼泊尔文写的。不错，尼泊尔文中还有大量借用迈蒂利和伯勒杰的东西，不过面向尼泊尔这个事实本身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以新的非梵文为基础的诗歌传统的开端。有一种明显观察到的情况也很重要，那就是从关怀人们命运和苦难的角度来评价某个神灵或圣人，其中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十九世纪初巴桑塔（创作年代为1806—1855）根据《薄伽梵往世书》和《摩诃婆罗多》改编的克里希纳著名生平中强调了神仙的人性。比迪亚拉尼亚克萨里在自己的《婚礼歌》里继承“黄金时代”十分发达的艳诗传统，以细节描写神仙克里希纳的爱情嬉戏，巴桑塔却与这位同辈不同，在自己的《克里希纳传》里写出一位最有人性的神仙。巴桑塔的克里希纳具有普通牧童的相貌，他不仅生活在普通百姓之中，而且分担着他们的忧患。巴桑塔实实在在地讲述了克里希纳的整个一生，而最为详细的可以说是揭示了英雄行为的人性线索，这条线索特别鲜明地表现在童年克里希纳身上，他任性，顽皮，但有孩子的天真烂漫。在同恶魔庚斯的喽啰进行斗争时，克里希纳凭借神力保佑获得胜利，而对这一点，描写时只是一带而过。巴桑塔笔下的庚斯喽啰企图加害克里希纳，却是一帮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的家伙，因而战胜他们就标志着从恶势力控制下得到彻底解放。

克里希纳偷摘神仙因德拉花园里的极乐花这个情节吸引了巴桑塔，那是为了说明克里希纳关心他生活于其中的普通人。因德拉决定惩罚顽皮的小神仙，在他的家乡戈库普村密布乌云，降下暴雨。但克里希纳把高山举出水面，拯救了众人。强大的因德拉蒙受侮辱，并且还向克里希纳请求保护。潜台词明显表明，因德拉遭到失败不是因为他没有克里希纳创造奇迹

的那种能力，而是因为他创造奇迹时表现出对人们的漠不关心。大神梵天也受到克里希纳的奚落。不过作者想说的不仅是克里希纳的人性和善良，他希望的是，“人们听了这个故事后，能理解什么是善良”，并懂得他们一生中应该怎么做。

十九世纪尼泊尔人对他们所能接受的古印度和穆斯林艺术文化经典的兴趣越来越浓。这一时期从梵文翻译成尼泊尔文的有《十王子传》、《鹦鹉童话》、《僵尸鬼故事二十五则》，从乌尔都文翻译过来的全穆斯林诗歌传统作品有《蔷薇园》、《哈特姆·塔伊》，包括《阿拉丁神灯》在内的《一千零一夜》片断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翻译基本上都是散文。而且开始改编一些尼泊尔早已存在的神话情节，这些神话原是诗歌形式，现在译成了散文。比如，翻译了波怛阇利的《马特西因德拉纳特故事》。不错，这是一部很少有的韵体散文，可是它证明了一件事，尼泊尔散文标准的研究业已开始。

有趣的是，这部作品还反映了强调某个神话人物参与人间事务的普遍倾向。波怛阇利再次提起师爷—纳蒂不是偶然的，因为对尼泊尔人来说师爷们的名字是和神灵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它还常被理解为所有地球上的人都平等。《马特西因德拉纳特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尼泊尔人熟悉的故事，讲那伽蛇神离开尼泊尔致使国家大旱。对人们满怀同情的马特西因德拉纳特竭尽全力弄回蛇神，从饥饿中拯救出尼泊尔谷居民。因此这部作品有了几行顺理成章的结尾：“一些人称马特西因德拉纳特为活佛，/湿婆教名人称他为太阳，/而他，只是个师爷，他下凡尘世只为关怀人民。/两个概念在他身上已融为一体。”

十九世纪与世俗诗歌同步宗教诗歌发展迅速，一些联合成宗教派别仲斯马尼的诗圣像前几世纪一样提供了不少诗篇。他们当中最有天才的是吉扬迪尔达斯(1821—1883)。他作为无数祈祷歌和布道诗的作者而出名。他的作品里不仅反映了包括反对种姓歧视，偶像崇拜，祭祀及其他宗教礼仪在内的宗教改革思想，而且反映了吉扬迪尔达斯公开维护颠沛流离无以为生者的社会立场。因此在他的圣歌里与用圣人传统精神颂扬仲斯马尼派的训诫并列，常能见到一些具体的、尘世的、有鲜明社会特征的诗段：“富人法律取胜，人民苦难无穷，//何谈执法贪官公正？”或者“农夫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干活，无衣无食；只有早逝，何有所获？”

值得注意的是，经常被称为“东方尼泊尔群众领袖”的吉扬迪尔达斯修改了先辈诗圣的许多传统。其中包括摒弃一些由阿沃提、伯勒杰和旧尼泊尔语杂糅而成的圣徒秘传用语，以尼泊尔广大现代听众听得懂的语言创作自己的全部作品。此外，他写圣歌的时候运用了普及最广的民歌吉瑶列和

佟格纳的旋律。为适应直接宣传自己思想的主要任务吉扬迪尔达斯认为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来写较好。不过在祈祷歌和“布道诗”里还能见到一些充斥复杂联想形象的诗句。比如，下面是写给普通人，以吉瑶列惯用的节奏和最清楚的语句写的几行诗：“鱼无水不游，/鸟无翅不飞，/瑜伽没有耐性不行，/同样，人们也该懂得，要获救缺少师爷难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见到下面这样一些复杂得多的盛赞仲斯马尼训诫之光的诗行：“当拉紧语汇的缍绳，以宗教的盾牌自卫时，/我在以艺术的箭支提高认知的水平。”

而且类似诗行里大大扩大了梵文语汇的数量。所以可以说，吉扬迪尔达斯本是相当熟悉古典诗歌的，但他在自觉地远离传统，努力把自己的意思传达给每个听众。

这位天才诗人的创作是尼泊尔文学发展中的重要路标，因为作者鲜明665・表达出的社会性世界感受首次亮相。此外，这点也很重要，即吉扬迪尔达斯在制定诗歌语言标准方面功劳不小，在做这项工作时，他不顾一切传统，坚决选择了母语尼泊尔语。

第四章　印度尼西亚群岛和马六甲文学

对努沙登加拉岛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进行得不无痕迹，那里以它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当时英法的角逐。1808 年至 1811 年爪哇成了荷兰东印度新总督、“铁腕元帅”赫耳曼・威廉・丹德利斯疯狂活动的舞台，他在那里独断专行，飞扬跋扈，跟他的主子拿破仑一世在欧洲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在英国皇统中断的五年中英国东印度公司驻爪哇的总督斯坦福德・莱佛士中尉率兵侵入苏丹的首都，结束了班达和井里汶苏丹的主权统治，并坚决打消了巴邻旁苏丹坚守独立立场的企图。当伤亡惨重的荷兰人在占领地终于站稳脚跟并着手在那里整顿秩序的时候，中爪哇爆发了一场迪波内戈罗王子领导的起义，那是爪哇贵族中最坚决的代表挣脱外国压制的最后一次尝试。然而付出重大代价历时五年的爪哇战争以荷兰人战胜起义者告终，他们巩固了自己的阵地，把大部分爪哇农民变成自己的代役制农奴。不仅如此，跟随荷兰士兵来临的是西苏门答腊漫长国内战争(1803—1845)决战时期的到来，而在 1846 年、1849 年荷兰人又派军事考察团到巴厘岛，企图把实际权力扩大到所有这些地区。此时行动较为谨慎的英国人则照常干预马来苏丹的事务，并沿马六甲海峡安插好多据点，于1826 年将其联成海峡殖民地的总统统治区，成为后来英属马来亚的奠基石。

然而，就在这动荡不安的年代，沙努登加拉岛仍保留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角落，那里具有传统精神的文学活动还在继续，中爪哇一个不大的国家——梭罗国就是这样的。早从十八世纪下半叶梭罗国的一些文学家就有意忽视有损尊严的现在，把视线投向几乎被人遗忘的过去：他们创作卡威文古典叙事诗的新爪哇改写本，试图把中世纪神秘哲学论述的智谋传授给同代人，努力使爪哇贵族具有聪明、坚定、无畏等优秀品质，因为这些品质是他们从流行的戏剧观念和文学中所了解的古代英雄——拉马、阿周那、加托科乔身上弥足具备的。这种闭锁于自身传统，妄图一成不变而又不能不变的文学常被称作“爪哇复兴”文学。

印度尼西亚文艺学家普尔博切罗科把“爪哇复兴”分为复活经典和创作新作两个时期。应属第二时期的有小约索迪布洛（卒于 1842 年），他做的工作是修复语言陈旧的古典文学名著。小约索迪布洛接替父亲宫廷诗人的职务后，应当说起到了与父亲合作改编（或者更准确点，是编辑）《婆罗多大战记》的作用。1818 年他本人改编了中世纪爪哇诗人坦图拉尔先师的叙事诗《阿周那—务扎伊夏》，并把自己的作品称作《阿周那—萨斯罗》。此后不久出现了一本几乎同名的《阿周那—萨斯罗保》，源于爪哇戏剧传统，由辛杜·萨斯特罗长老完成。到十九世纪，盘踞爪哇剧坛的各种“戏剧小说”和文学剧本就越来越多了。十九世纪已具我们所知形式的爪哇木偶剧却相反，愿意排演卡威文老叙事诗改编成的新爪哇剧本，以此把“爪哇复兴”文化普及到梭罗国境外去。“爪哇复兴”的戏剧和史诗利用《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的部分主题，促成了我们在爪哇接触过的那些神话概念的规范化。

梭罗国的作家没有局限于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爪哇文化传统。对十九世纪的爪哇文学家来说，印度—爪哇和穆斯林传统是亘古不变的宇宙和社会秩序的两个方面。因此，与小约索迪布洛亲笔创作具有古爪哇传统的《阿周那—萨斯罗》同时出版穆斯林教派的作品《阿米尔·哈姆扎传》和《先知传》就没什么奇怪了。这两条线也模模糊糊由梭罗国作家的大量神秘—思辨和训诫著作继承下来。这部分作家的一些作品源于中世纪文学名著。比如，一些编辑所熟悉的梭罗国《帕尼蒂—萨斯特罗传》是古爪哇《尼蒂萨斯特拉》的加工，诗体《塔米萨拉廷》则不外是那个小约索迪布洛补遗的马来中世纪宝鉴《塔米萨拉廷》写法的翻版。先是诗人兼艺术赞助人，最后当上梭罗国国王的巴固·布沃诺四世（1820—1823）为统治者写过一部诗体宝鉴《务朗列》，在十九世纪的爪哇享有巨大声誉，他还有另一部叙事诗《务朗埃斯特里》，专写妇女职责与义务。

· 666

“爪哇复兴”文学素有的百科倾向明显反映在《真蒂尼》里。这部大型叙

事诗包含了有关爪哇地形、艺术、音乐、魔术、占卜、情诗,尤其是神学和神秘教派的种种材料。它是由后来的巴固·布沃诺四世领导的一整个创作集体(小约索迪布洛、朗哥苏特里斯诺、萨斯特罗迪普罗等)于十九世纪初完成的。叙事诗《真蒂尼》的基础是阿莽·罗戈族长的故事,他是曾几何时统治东爪哇公国的实力人物,已被推翻的吉里之子。在马塔兰和泗水军队灭亡公国之际几乎丧失所有亲人的阿莽·罗戈成了中世纪爪哇典型的徒步朝圣的神秘主义者,后来以传播异教邪说的罪名被马塔兰苏丹处死,他曾幻想为死去的亲人向这位苏丹讨还血债,报仇雪恨。构成书本核心的秘传深奥道理在叙事诗中是通过对话形式表述的,这一处理方法就像它与之有同源关系的那些爪哇神秘—思辨和叙事诗一样。

把与爪哇史有关的口头和书面传统东西联为一体的愿望还表现在梭罗国编写的一些史学概略里,这类东西的标准叫法是《爪哇史话》。梭罗国史学资料引人注目的是它古老的民族中心主义,其中把从人类产生到十八世纪的爪哇史都说成世界史。十九世纪初才完稿的一部《爪哇史话》印本是由老约索迪布洛补遗的。他儿子则以两部篇幅不大的叙事诗《普拉尤特史话》和《围攻史话》而出名,叙事诗完美无瑕相当准确地讲述了十八至十九世纪初梭罗国历史上的段段趣事。

"你将是梭罗国最后一位宫廷作家",小约索迪布洛似乎对他的孙子朗哥瓦西多(1802—1873)这样说过。朗哥瓦西多这位杰出修辞学家,在其诗歌音乐性无与伦比的创作里集中了"爪哇复兴"早期文学的许多属性。诗人开始时按老规矩就读于爪哇伊斯兰经学堂,后来来到东爪哇和巴厘,那里的农民至今还懂得不少古爪哇文,木偶剧演员们则在不久前还到卡威文叙事诗里去搜寻题材。朗哥瓦西多回到梭罗国后当上王储文书,他的首批文学试作都出自这一时期。年轻诗人沿着宫廷官阶扶摇直上,五十岁上成为宫廷诗人,终其一生,博取了当时最大爪哇语文学家的英名。

朗哥瓦西多的著作多种多样,但局限于"爪哇复兴"文学所接受的各种体裁。这里有源于印度爪哇和中世纪传统的浪漫主义叙事诗(《查理的西彭·阿拉姆·库图克》)、《旁吉·扎恩·蒂拉姆》)和源于十六至十七世纪传说的爪哇穆斯林圣徒传(《贤者索诺》),有语法书和论述编写表年诗艺术的著作,有散文体的《帝王本纪》,有以爪哇戏剧传统为基础的大型爪哇神话史,它包括所能想到的,取自沿海文化时期爪哇语史片断和诗人从欧洲熟人那里得来的,有关高加索和里海的材料(有材料说,他曾在荷兰人出版的爪哇文杂志《布洛莫尔塔尼》当过编辑)。人们对朗哥瓦西多的道德劝善叙事诗《乱世箴言》、《至理名言》,《金玉良言》等表现出无可争议的

兴趣,这些叙事诗反映了诗人对现实世风日下的不满,预言了理智与正义

的必胜。不过不能不提一提，在印度爪哇人眼里，道德的普遍下降是世界史周期终结期第四阶段的显著标志，对爪哇穆斯林来说也是世界末日的预言，因为他们那里自古以来只把新时期到来的希望寄托在埃鲁·佐克罗（又译卓戈，正义之王）的降临上，犹如毗卢遮那之于佛教徒，迈赫迪之于穆斯林。

我们从日惹公国一部史话中发现的正是这样一幅不堪入目的画面，不过它已具有了预言的形式，画面中的女人丧失了羞耻，贵族丧失了对领主的忠诚，孩子们则失去了对父母的孝敬。日惹公国创作的作品比较少。其中有一部《迪帕涅加朗史话》，是由迪波内戈罗本人以韵文体史话形式写的爪哇战争史，既有必定要有的半神话式开端，又有对若干史实相当详细的描写。在巴固·阿拉姆公爵家族出身的著名史学编纂家苏里奥内戈罗积极参与下，古旧词汇的运用和丰富华丽的描写成了十九世纪中叶正在发展中的风格特色。另一座自治的芒库内戈罗王公宅邸为爪哇文学培养了一位显要作家芒库内戈罗四世。一般认为，他在形式方面影响了朗哥瓦西多，他创作了许多消遣的、道德的和哲理思辨的叙事诗，其中公认最好的是《高等知识》。十九世纪上半叶宫墙外的爪哇语文学活动也许只有中爪哇的伊斯兰经学堂还在继续，不过那里广为传播的神秘思辨叙事诗和改写成韵文的神学辩论，以及各类圣徒传，都不含任何新成分。

努沙登加拉岛殖民秩序的巩固导致该地区同其余亚洲国家文化联系的转向，并削弱了印度尼西亚各民族间的传统联系，从而也削弱了爪哇人聚居区以外爪哇文学的影响。比如，在创作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巴厘文学作品时，越来越难解决的问题是用哪种文字来写，用更有强烈地方色彩的传统爪哇—巴厘文，还是用仍有清晰爪哇痕迹但已是巴厘文的文字来写。巴厘人的诗歌较之散文像从前一样占绝对上风：人们继续在那里借助贴近地方语言的滕加汉或马恰帕特格律歌颂印度经典史诗英雄的传奇故事（《阿周那的失败》、《祭祀空蒂》等）。那里还出现了一些当地新加工的，描写寻找未婚妻的五王子的叙事诗，以及在爪哇声誉明显下降的其他叙事诗。地方民间文学作品出现了各种书面语的新版本，其性质时而接近故事诗（《普拉奈·西特莱》），时而接近描写骗子的叙事文（《楚帕克》、《安德尔》、《帕克·邦凌》等）。西爪哇是巽他人聚居的地方，爪哇文学语言在那里的传播面也不如从前。那里传播面最广的是巽他文的瓦瓦腔，一种继续接受爪哇诗律和诗学影响，却不只从爪哇文学，也从地方民间文学吸取题材的叙事诗。许多浪漫童话叙事诗（《东庚·苏拉旺萨的故事》、《普拉卜·蒙丁·拉伊亚的故事》）在内容方面与巽他人的口头史诗极其相似，那些作品在当地和一些更为短小精悍滑稽可笑的瓦瓦腔一样受到青睐。我们从十九世纪巽他文

· 668



爪哇古典舞蹈
T. C. 拉弗尔扎《爪哇史》插图 伦敦版 1817 年

瓦瓦腔或巴厘叙事诗中还能看到一些看来与影响力仅次于努沙登加拉文学的马来语文学相似的作品。

整个努沙登加拉的一般文化分割过程还影响到马来文学语言的传播。比如，十七世纪只有马来语文学的北苏门答腊苏丹国亚齐，十九世纪已经有亚齐语的穆斯林注释本和叙述文学了，而且这种文学的一部分作品就是马来文译作（十九世纪布吉和望加锡文学中译自马来文的占可观比重），另一部分亚齐语文学则似乎没有马来本原型（《帽子传奇》，讲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帽子的起源，或者《宝剑传奇》，讲先知阿里听到妻子法蒂玛在墙外同他本人的宝剑谈话，便错误地怀疑她变心）。不过此时亚齐语文学的活跃并不妨碍在亚齐土地上出现十九世纪初最后成型的《亚齐习俗》这类马来文名著，正像顽固的布吉语编年史传统不妨碍布吉统治者对马来语编年史家甘拜下风一样。无论在马来居民为主的地区（马六甲半岛、东西苏门答腊岛）还是加里曼丹或马鲁古群岛多民族杂居的沿海城市，十九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在继续创作马来文的精品名著。马来文学从爪哇人中发现读者，也从他们当中“招募”了作者，难怪我们能从马来手稿中间发现大量在巴达维亚（即雅加达）写好的抄件，就像在井里汶、三宝垄、淡目，甚至巴米加三（马都拉）一样，而在这些记录抄件的相应目录中往往附有如下一些脚注：“爪哇化的马来语”，“巴达维亚和荷兰词儿太多”，“非常糟糕的译自爪哇文的马来文”。

十六至十七世纪显示出来的马来文学语言向努沙登加拉岛广大地区扩大的形势，十九世纪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向前发展，它在若干地段退却，但在另一些地段进展顺利，为的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转入更广阔的进攻。促进这一态势的是马来文学语言继续作沙努登加拉岛的伊斯兰教语言存在，而这时的伊斯兰教已成为马六甲半岛和整个印尼群岛沿海城市的主导宗教。

这种情况对在国家这些地区作为混合语[①]传播的“普通(低级)马来语”提高地位产生了积极影响。欧洲人随着在沙努登加拉岛地位的巩固也把马来语作为全岛的语言加以利用。同时十九世纪以马来文书写的各种作品数量大增,从以“无法容忍的马来文”所写的作品到以其风格稍逊于公认的十七世纪古典马来文学范本的精品名著。

十九世纪马来文学有很长时间以停滞为特征,造成停滞的原因有多种解释,有的说是由于穆斯林经院哲学的强霸,有的说是由于地方社会的不景气,还有的说是由于殖民主义者对努沙登加拉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粗暴干涉。确实,十九世纪上半叶最传统的古典马来文学名著——神学和神秘论文,圣徒传,醒世文学,有浪漫色彩的希卡亚特(传奇)和沙依尔(叙事诗)史学著作都在继续流传。与它们同时存在的是在传统轨道上创作的新作品。比如,根据1846年某些报道写出来的浪漫色彩叙事诗《阿卜杜勒·穆卢克》,一百年前也可能出现并同样受欢迎。而(1807年完成的)《文莱王族世谱》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比十六世纪的马六甲王族家谱逊色。不过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另外一些马来文精品佳作中可以发现某些爪哇或巴厘文学中已明显存在的新东西。比如,1821年编辑出版的浪漫色彩叙事诗《西兰巴里》,其风格上的降格以求和对日常生活的刻意描写可以令人说出它的故事诗色彩,而《柔佛国传奇》的恪守历史主义则证明着,马来历史文献学已无需外力推动就从崇拜皇族祖先转向“尊重事实”了。不过只有把这些名著同十九世纪初以及那之前出现的相应体裁其他作品作一番方法论的比较,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我们感兴趣的这段时期许多文学名著之所以出名,多半因为文稿叙述简洁。可以猜测的是,人们既采用了史话,更采用了马来传统历史编纂学中的马来文爪哇岛通史材料——《爪哇古代国王的故事》(1837)或者《爪哇古代王族世谱》(1813年副本),以及地方史(其实更有意思)《井里汶达弗塔史话》(1819年副本)。不清楚的是一些题材最有意思的历史叙事诗是不是含有世界新景观,例如描写1811年西爪哇战争的《英人攻城记》,描写1842年捕捉中国大走私犯的《侨生孔希德[②]》,或者描写1819至1821年征服巴邻旁那段历史的《文登之战》,依X.霍伊卡斯之见,后一部叙事诗“从其对荷兰人仇恨的程度看可以称作讽刺作品”。不能不使人遗憾的是穆斯林起义首领图安库·伊玛姆·邦卓尔的书至今没人研究过。能有把握说上几句的只有为数不多的启蒙主义开拓者,他们用马来文写作,是一批特殊的,被从

① 原为英语 lingua france。——译注

② 俄文 Конг Сит,这里的汉字表达可能不确。——译注

家乡驱逐出来的印度穆斯林，他们之中形成了一个有教养的地方阶层，由文书、译员和读书人组成，阶层的名字叫门希。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士有一位是《孟加拉国风习传奇》的作者艾哈迈德·里贾卢丁·宾·哈基姆·隆·法基尔·坎杜（约1780年生）。《传奇》是旅行随笔，作者力图通过它传达自己从加尔各答得来的印象，1810年他到过这个比他家乡槟榔屿更为欧化的地方。《马绍尔传奇》的作者阿卜杜拉·宾·穆罕默德·阿卜·巴卡尔·拉贾·博尔达尔汗谢赫易卜拉欣·米斯里是加里曼丹岛庞提拉克（今坤甸）人，他作品中的人物Г. B. 丹德利斯是一个严厉而公正的统治者，结束了爪哇拉贾的专横，为商人开辟了活动的天地。

十九世纪初上述这些作者都和最著名的马来启蒙主义学者阿卜杜拉·宾·阿卜杜勒卡迪尔·门希（1796—1854）有交往，后者半是阿拉伯人，半是泰米尔人，就是说他出身于两个民族，在努沙登加拉文化移入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像其他许多用马来文写作的作者一样，马来语并不是他的母语。他天生该步他父亲的后尘，啃书本，当教师，做译员。他从小就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一个有教养阶层的代表，所以不能不从旁观察他所在的当代马来社会，也不能不感受到对他明显的疏远态度，处于一种创造状态，照例也是一种消极状态。在阿卜杜拉生平中起决定作用的一件事是他的双亲曾住过马六甲，马六甲市1811年成为莱佛士的府邸所在地，而那时的莱佛士正准备入侵爪哇。作为九个（！）认识马来字的马六甲人之一，阿卜杜拉很自然地当上了莱佛士的首席文书，后来他教英国人和美国传教士学马来语，再后来帮助英国学者研究马来文的各种文字纪实，就这样他一步步跨上了马来启蒙的门槛。

正像东方经常发生的那样，西方时尚的出现常常超出文学范围，更多反映在作品题材的扩大上，而不是作品结构的改变上。我们不知道阿卜杜拉对英国文学熟悉到什么程度，除了部分法书、课本或者应传教士之邀翻译的《小亨利和他的奶妈》，至少在他的著作里没有提到相应的东西，而且这些著作本身也不带西方文学影响的痕迹。那时候《阿卜杜拉从新加坡到吉兰丹航游记》（1838）、《阿卜杜拉传》（1848）和一些未完成的达吉港旅游随笔（阿卜杜拉是在去麦加旅行的途中死在达吉的）在十九世纪马来文学流程中使人叹为观止的正在于它们题材的广泛——无论莱佛士的工作程序和马来民间的神鬼学，中国秘密组织的集会和马六甲英中学院的奠基，马六甲热带丛林土著人的生活和马六甲从未见过的照相机，还是陪审员们的审判——所有这一切都引起作者的关注，都在他的《阿卜杜拉传》一书描写和讨论之列。这第一位马来"无报记者"在他伤心地提到莱佛士同马来王子端古隆在进行幕后谈话时，感叹道："如果我忽然知道了他们谈话的秘密，

我当然会在这部传奇里告诉你们!”他那焦急的心情简直是昭然若揭。 ·670

阿卜杜拉的书籍里包括不少对英国要人和传教士所做的中肯而刻薄的评价,描写过英国海员的酗酒和官员的无所事事,甚至对自己的偶像莱佛士也不放过其政策上的失误,尽管阿卜杜拉倾心热衷盎格鲁—撒克逊文化和法制,那是他唯一了解的理性对待生活的方式,是他向所有(用他的话说)由于国君虐待和民众无知而陷入异国人之手的同胞极力宣传的东西。由此可见,阿卜杜拉也和许多亚洲启蒙者一样,崇拜印出来的话,将其奉为摆脱无知的灵丹妙药。

阿卜杜拉启蒙主义的激进思想,他超群非凡的洞察力和激情,对现实弥足准确鲜明的描写,都使他的《阿卜杜拉传》更像对他所经历的那些事件的回忆录和编年史,因为作者在他的书里更多是作为观察家和道德教育家出现而不是作为作品主人公出现的。

阿卜杜拉在语言活动方面很像(其余方面一点也不像)朗哥瓦西多:他特别看中中世纪文学名著《马来史话》和《马来诸王习俗》的语言,作为这些名著的出版者他把《五卷书》从泰米尔文译成了马来文。值得注意的是,阿卜杜拉本人的散文常常转向,忽而像《马来史话》的叙事体,忽而像《众王冠》(十七世纪)的训诫法,后者是他作为范本同一些西方社会政治文本一起推荐给马来拉贾们阅读的。

总之,十九世纪上半叶努沙登加拉以荷兰人巩固统治和英国统治势力伸入著称。这一地区(首先是最发达的爪哇地区)的传统文学中表现出若干积累地方文学传统,总结自身文学经验,吸取自己民间文学部分力量的尝试。在地区许多文学中都把类似倾向同在一定程度上密切关注周围现实,关注由于欧洲更加逼近而发生的明显变化结合了起来。这一点从很早就起地区文学中介作用的马来语文学中看得最清楚。马来语作者创作中表现出他们对欧洲人在努沙登加拉岛内外所进行的改革活动日益增长的兴趣,还表现了清清楚楚的启蒙主义倾向。

第五章　菲律宾文学

尽管很迟,诸如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战争和宗主国革命这样一些重大事件的反响在十九世纪上半叶还是传到了菲律宾。1813 年 4 月马尼拉隆重颁布 1812 年加的斯宪法。菲律宾(绕过墨西哥总督府)与西班牙开始直接通商,到 1821 年,菲律宾诸岛最终脱离墨西哥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群岛上享有世界声名的烟草、大麻和蔗糖生产剧增。被称为“上帝和西班牙之敌”的外国人获准有限制地进入首都,那里出现了一批外国商行和某些列

强的代表机构，包括 1820 年一段时间由在马尼拉办公的俄国半官方领事馆。1834 年马尼拉港“开放”，成为对外通商口岸，菲律宾人的生活方式从服饰、礼仪、节日等外部特征开始全面欧化。此时天主教和宗教教育的地位都得到巩固。对唤起菲律宾人民族政治自觉具有特殊意义的是西班牙议会中的代表团，议论中的菲律宾人席位一直延续到 1837 年。菲律宾人深入了解西班牙和其他欧洲国家，向往立宪制，在菲律宾诸岛产生各色自由思想——这些就是西班牙议会制给菲律宾人上的几堂课。

十九世纪初起菲律宾各岛扩大兴办世俗教育的可能性，越来越多的菲律宾知名人士在西班牙的马德里、巴塞罗那等大学完成学业。西班牙报刊开始进入马尼拉。1811 年 8 月 8 日出现西班牙殖民当局以菲律宾文创办的第一份报纸《最高机关报》，报纸出版到 1813 年 7 月 4 日，其停刊原因可能与菲律宾的总督加罗卡·德·加拉瓦伊塔的任命有关，因为他早被墨西哥和宗主国的革命事件吓破了胆。1846 年终于创办了第一份全菲西班牙文报纸《希望》。马尼拉和外省的书籍发行量也日益增长。比如，1779 年已创办的国家之友经济协会，仅在 1823 年就散发推销了一万三千二百二十份语法书、正字法手册和其他中小学生读物。菲律宾人对西班牙人文学作品，对欧洲音乐、绘画、建筑的了解都更加深入。

671·

十九世纪上半世纪随着地方知识分子的出现开始创作出越来越多本来意义上的菲律宾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既用本地文写，也用西班牙文写，本地文主要是他加禄语，其他有伊洛戈语、比科尔语、邦板牙语、宿务语、班乃语等等。既然靠近首都的他加禄语言区文化水平最高，他加禄语文学在这一时期也就有长足发展。而且他加禄语文学的这种领先作用一直保持至今。不过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除他加禄语文学以外只能说有某种语菲律宾文学的个别现象，而谈不上有经常持久的文学过程，因为上世纪中叶，当他加禄语言开始被确认为文学语言的时候，产生了用它书写的各种体裁作品（几乎到十九世纪末各种语言的菲律宾文学仍然以韵文为多）。

西班牙文化的影响早在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就在菲律宾童话、神话、史诗、传说、民歌中初露端倪，起初特别表现为民间文学的影响（其传播者是来岛的西班牙僧侣和士兵）。随着时间的推移，影响越来越显著，由于教育的普及十九世纪菲律宾人连古典西班牙戏剧、诗歌和长篇小说的影响都能感受到了。这种文化语言影响很大，但并没有包罗万象，覆盖一切，证明这一点的是菲律宾主要语言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并且还在逐渐向文学语言发展，虽然那里的西班牙统治已长达三百三十多年。而在这一时间同样被前西班牙殖民者统治的大多数拉美国家里，西班牙语言文化实际上已几

乎挤掉了当地语言文学，在新的混合型文化中占了上风。

十九世纪上半叶早期菲律宾继续出现各种富有典型基督教色彩的童话版本，其中总有由上帝的预见，圣母玛丽亚和天主教圣徒的善良意志所创造的奇迹般变化。先由口传，再于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记载与加工的菲律宾传说故事很多，传说的主人公有查理大帝，狮心理查德一世，法兰西十二贵族，光荣的西班牙骑士锡德·坎佩阿多尔，哈里发科尔多瓦，首领曼苏尔或阿里-曼苏尔，拉剌七王子，好君主伯纳多·德利·卡尔皮奥等等，这些主人公随同西班牙长篇小说传入菲律宾。这时无论西班牙史诗的内容还是主人公甚至主人公的名字本身，都有可能被严重菲律宾化，行动也会搬到菲律宾岛上来。改写特别多的是伯纳多·卡尔皮奥的形象，他在菲律宾人的心目中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民英雄，能把他们从西班牙压迫下解救出来的未来解放者。

菲律宾传说故事或叙事诗的情节大部分讲西班牙中世纪征服中南美洲时期和收复伊比利安失地时期的英雄故事，两种体裁他加禄语称布哈（直译：生活）或萨利塔（说话或叙述），伊洛戈语称帕纳比阿或萨瑞塔。诗的格律分为两种，十二音节的阿维茨和八音节的科里多，前者为歌和叙事诗，后者为西班牙叙事曲和浪漫曲的菲律宾改写。如果说阿维茨充满快活的内容，有较为幸福的结局，那么科里多就比较忧郁凄凉，往往以悲剧告终。演出它们的时候由菲律宾吉他或其他乐器伴奏。阿维茨以行板速度，科里多以快板速度进行。最著名的阿维茨中有首次由阿列霍·德利·皮拉尔神父补遗的《阿维茨圣阿列霍·德·孔费索拉》和马里亚诺·塞拉菲奥神父写的《雷蒙多·德·班乍福塔》，以及佚名作品《唐·璜·蒂尼奥索的一生》和《多尼·伊内斯的一生》等。最优秀的著名他加禄科里多有《伯纳多·卡尔皮奥》、《死君主》、《要人阿达尔纳》、《法兰西十二贵族》、《拉剌七王子》、《奥伦蒂斯王子》等等。虽然这些十九世纪上半世纪最为繁荣的菲律宾文学作品经常没有署名，其中某些作品出于何人之手嗣后还是得到了确认。正是这一时期这种新颖的菲律宾民间文学同作家的书面文学最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672

十九世纪初就已形成的菲律宾宗教诗剧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推动。它的基本体裁是写天主苦难与热情的帕西昂，其中叙述耶稣的降生、生活、苦难和死亡，更多是从对他进行审判写到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作为范本的第一部帕西昂写于1704年。1814年首次出版由著名神学家马里亚诺·皮拉皮尔补写（这使书特别出名）的新版帕西昂《我们光荣的主耶稣基督受难史》。十九世纪上半世纪完成了原版帕西昂的编纂（有一部是阿尼塞托·德·拉·默塞德1856年写的）。除他加禄语，还有群岛其他许多语种的原

本和译本帕西昂存在。

西班牙喜剧《斗篷与长剑》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通过墨西哥传入菲律宾，本地化以后变成一种可以上演的东西，叫做袍剑戏，或者通称摩洛—摩洛(源于西班牙摩洛人)，以训诫方式描写基督教徒(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同菲律宾群岛南部穆斯林作战当中的现实和虚构情节，描写中基督教徒永远是胜利者并使异教徒有了真正的信仰，这种描写却不见得符合实际。第一部这类袍剑戏《菲律宾国土上的海盗战》戏文是天主教耶稣会士赫罗尼莫・佩雷斯于十八世纪写成的。摩洛—摩洛的剧中人照例是一些信仰基督的王子和军事将领，一批穆斯林公主始终不渝地爱着他们，最后公主们断绝同人民的来往，接受了天主教。当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一些菲律宾人用他加禄和其他地方语种写这类剧本的时候，他们简化了写法，并渐渐向消遣娱乐方面转化。这类剧本中最有名的是摩洛—摩洛《阿利姆丁，霍洛苏丹》、《希梅纳公主》、《奥拉达尔王子》、《米列卡德尔王子》、《奥罗斯曼和扎菲拉》、《弗罗兰第和萝拉》。这些富有特色的街头宗教剧酷似巴西同类物，而后者的出现则应归功于葡萄牙的影响。十九世纪末这类戏剧的演出被喜歌剧萨尔苏埃拉排挤了。

十九世纪随着建立在宗教文学基础上的教育事业之发展，逐渐形成世俗文学，世俗文学压倒宗教文学，使之退居次要地位。上半世纪取得辉煌成就的是他加禄语三大诗人(三驾马车)的创作，这三大诗人是何塞・德・拉・克鲁斯、阿纳尼亚斯・索里利亚和现代他加禄文学奠基人弗朗西斯科・巴拉塔斯。他们的文学遗产没有完全保留下来，许多手稿流失了。何塞・希休・德・拉・克鲁斯(1746—1829)，笔名胡森・希休，被公认为科里多诗人。他与那些写夹杂外国词汇、诗义含混不清作品的早期诗匠不同，是头号道地的他加禄语诗人。他的感伤主义爱情诗中最著名的一篇是《定情金戒》，赞美了定情者的忠诚。最为流行的作品是阿维茨《弗洛罗和克拉韦拉》、《罗德里戈・德・维尔亚斯》和几首摩洛—摩洛。诗人的主要遗产由数量不菲的科里多组成：《法兰西十二贵族》(阿维茨《罗兰多》)、《伯纳多・德利・卡尔皮奥光荣传》，以及由他补写的《克拉里托》、《阿德拉和弗罗兰第》等。他笔下的伯纳多・德利・卡尔皮奥是一位“具有钢铁意志的褐色骑士”，从上世纪初开始成为久盛不衰的菲律宾独特的“文化英雄”，甚至成了那一时代的象征，为被奴役人民的自由幸福而斗争的斗士。

德・拉・克鲁斯的年轻同代人阿纳尼亚斯・索里利亚作品中较流行的有两部阿维茨——《伊内斯太太》和《弗洛里尼奥王子》，还有几部喜剧和摩洛—摩洛。人们还认为他是有意思的科里多《西赫斯蒙多一生》的作者，这部作品由诗人欧洛希奥・胡利安・德・通迪阿马补遗过，是根据卡尔德隆

的剧本《生活如梦》的主题写成的，其情节搬到了菲律宾。它是一部民族性改写的典型范例。用他加禄语写的阿维茨和科里多，为了更广泛地吸引读者，可以取个他加禄的，西班牙的，混合的或者双重的名称。

荣膺他加禄诗歌王子甚至国王尊号的弗朗西斯科·巴拉塔斯（巴尔塔萨尔-伊-纳瓦埃斯，1788—1862）比他的前辈及同辈强出许多。他生在古代他加禄语文化中心吕宋岛上的布拉干省庞伊奈村一个佃农家里（人们称他为庞伊奈的天才或伟大诗人）。诗人很早就显露出对诗歌创作的真正热情，认识许多布拉干本地诗人并能背诵他们的作品。二十岁上他去马尼拉求学，进了著名的圣何塞学院。教授他哲学的是当时写出《帕西昂杰涅吉斯》的著名诗人马里亚诺·皮拉皮尔。巴拉塔斯背诵着那时所有马尼拉诗人的作品，同其中许多人来往，加入了首都的文化生活。他在何塞·德·拉·克鲁斯指导下提高技巧，学习创作阿维茨、科里多和摩洛—摩洛的秘诀。 ·673

没有脱离家乡祖辈生活的年轻布拉干人吸收着首都文化的营养。他看戏剧演出，摩洛—摩洛和搬上舞台的帕西昂，听马尼拉湾岸边弦月窗下的音乐，还参加马尼拉丰富多彩载歌载舞的宗教节日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激发着他诗学的直觉。这时他写了很多很多坤迪曼，一种根据恋人意愿创作，可在吉他伴奏下演唱的情歌，就像在意中人阳台下演唱的西班牙小夜曲。作为一位外省农民诗人，他在1835—1836年间赢得了潘达南岛第一美女玛丽亚·阿松森-利韦拉（诗人的主要叙事诗《弗罗兰第和萝拉》就是献给她，MAP，或者塞利亚的）的好感。不过另有材料说，抒情诗的女主人公也可能是玛丽亚·安娜·拉莫斯，因为大写字头也是MAP。塞利亚成了诗人的未婚妻，但由于地方财主，妒忌狂马里亚诺·卡普列的诋毁几年后诗人被关进了监狱。在牢房里他继续叙事诗的创作，开头结尾都提钟爱的塞利亚的名字。这部叙事诗完成于1838年或1839年，不仅在诗人的创作中，而且在菲律宾文学史上都有划时代意义。1840年起巴拉塔斯迁居巴朗牙，在那里当法官助理。但到五十岁的时候又以剪过一个地方财主未婚妻的一绺卷发为罪名被投入了监狱。他的晚年是在文学创作中度过的，既为养家糊口搞创作，也听心灵吩咐行事。关于巴拉塔斯有不少神话式的传说。他去世（1862）留下两箱手稿，都在失火时焚毁了，偶然保存下来的只有《文雅的印度》的一个副本和《弗罗兰第和萝拉》的几张校样。他的其余作品有的根据副本，有的记录同代背诵者的口传，或完整或部分地恢复了原貌，有些如今只有名称为人所知了。巴拉塔斯在改革内容之后创造出自己的风格，使他加禄语诗歌的所有传统形式——科里多、阿维茨、坤迪曼、摩洛—摩洛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他既在当时已经陈旧的达利特、卡拉加丹这样一

些他加禄语古典形式上，又在十四行诗和接近幽默故事，这里叫作萨依涅杰的闹剧这样一些对他加禄语文学来说较为新颖的形式上试了试笔。数量可观的喜剧和闹剧是他在晚年写成的。许多喜剧和摩洛—摩洛由于在他生前死后多次上演，部分节目才得以保留下来。



674 ·

现代菲律宾硬币上的浮雕 Ф. 巴尔塔萨尔

诗人抒情诗中最先流行起来的是一首《继续》(1834)。后来他为婚礼、洗礼、命名日、纪念日等写了大量抒情诗。他甚至研究出一种特殊的赞美风格拉迪诺，使抒情诗表现出一种特别的浮雕感。《纪念一位少女》、《为新娘而作》、《娶妻》(引自《鲁道夫和罗扎蒙达》一剧）这些抒情诗都以细腻的抒情和忧伤的情感见长。

保存最好的是诗人的摩洛—摩洛。既然要上演，它们的脚本就被复制了下来。这些作品都是与菲律宾没有直接关系的历史题材，但能使人感受到它们的民族主义潜台词。作品证明作者在世界史，地理学，希腊—罗马神话诸领域知识渊博，对当时的欧洲现状也了如指掌。他的最早剧本之一是《奥罗斯曼和扎菲拉》(1840)，从外表看这是一部写悲欢离合的喜剧，实际展示的却既是个人的，又是概括起来的苦难（有时人们会把它理解为叙事诗《弗罗兰第和萝拉》的舞台体现）。

人们和国家的痛苦与灾难同样表现在与上述剧本一脉相承的《穆罕默德和康斯坦萨》里，剧本里有对不义当局直截了当的抨击。其他摩洛—摩洛中最为著名的有《唐·努尼奥和赛琳达，或天真爱情的不幸》、《奥雷达托和阿斯特伦涅，或一个女人的忠诚》等。1841年起经常上演的剧本是《阿里，曼苏尔和罗莎琳达》。作者通过表现高尚的倾倒者以及他们太太的爱与憎，狡猾与奸刁，妒忌与卑鄙把人类的一些典型性格推上了人间法庭。表现粗野势力的得逞、低下人们的屈辱使巴拉塔斯社会声名大振。这特别表现在他创作中有点独立价值的闹剧《文雅的印度和热恋的土著（尼格罗人）》里，它是十九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喜歌剧——萨尔苏埃拉的第一个范本。诗人以尖锐讽刺的形式表达由种族歧视引起的民族痛苦，并巧妙地绕过了西班牙检查机关的触角。剧中没有西班牙人出现，可是一位本地美女轻蔑

地拒绝了首批来岛的阿埃塔人代表托明戈向自己摇尾乞怜的献殷勤，认为他配不上自己。这部剧本和巴拉塔斯的其他作品都促进了菲律宾文学中民族自觉意识的产生，加强了菲律宾人的民族自信。所有这些作品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他那部最著名的叙事诗《弗罗兰第和萝拉》有联系。

在这部有着摩洛—摩洛诗学的强烈影响，由三百九十九节四行诗组成并追随骑士长篇小说轨迹的叙事诗里，巴拉塔斯不顾最残酷的教权派机关检查，做到了用老百姓可以接受的他加禄语言，通过鲜明的形式，表现沉积于骨肉同胞心中的反抗精神，难怪这部叙事诗能在诗人生前出版四次，散发上万份，达到菲律宾前所未有的规模。很难把这部叙事诗同无论是菲律宾还是欧洲文学中哪种体裁作比较。诗人把真正的菲律宾内容投入了与本地不相干的情节之中，给主人公加上了民族特点，促使他们做出符合人民道德标准的事情。尽管诗里还有相当大的宗教影响，但作为世界主要创造者出现在作者和读者面前的不仅有上帝，还有人。诗体长篇小说的情节，在作者选择的遥远阿尔巴尼亚展开，可能是因为这个国家，第一，它跟西班牙没有联系；第二，早在十五世纪它就被奥斯曼帝国占领，而在我们写到的这个时候，它也和菲律宾诸岛一样处于异邦人桎梏之下。在这个国度里，在这个国家所在的虚构的世界上，活动着一些与实际完全相像，对巴拉塔斯时代来说极富特色的人物：国王们，王子们和公主们，伯爵们和公爵们，西班牙和菲律宾历史上必定要有的摩洛人，这些人都符合摩洛—摩洛标准，必定接受天主教信仰。大概就是这些东西把西班牙检查官弄糊涂了吧，虽然我们早从叙事诗开头就已读到下面几个诗行：

在我亲爱的国土内外
邪恶已成无可战胜的强暴势力，
善良被践踏于路尘之中，
连道德也在陵墓中安息。

邪恶，枉法，卑鄙和吹嘘
将头高高昂起，而上帝的正义
却俯身在地，无力爬起，
只任泪水顺她双颊淌去。

叙事诗的两个序篇也很新颖：不是对天主教神父和当权大人物的照例吹捧，而是面对塞利亚和读者说话。这两篇坤迪曼都是面对普通人的。第一条情节线索演的是阿尔巴尼亚国王林塞奥，他的女儿萝拉公主，国王亲

信布里塞奥公爵和他高尚勇敢的儿子，萝拉的未婚夫弗罗兰第。他们的对立面是阿道夫伯爵，他通过施展阴谋夺得国家权力，杀害了公爵布里塞奥，派弗罗兰第到野林去送死，把萝拉弄到手。第二条情节线索演穆斯林王子675・阿拉丁，他的未婚妻弗列里达公主以及他们的敌人，失去祖国却一味追求公主的阿里・阿达布。弗罗兰第不仅自己摆脱了困境，拯救了国家和未婚妻，而且帮助曾让他们信奉天主教的穆斯林获得了独立。像大多数科里多和摩洛—摩洛一样，这里有两个三角关系——基督徒的（弗罗兰第—萝拉—阿道夫）和穆斯林的（阿拉丁—弗列里达—阿里・阿达布）。不过弗罗兰第和阿拉丁之间由同甘苦共患难而产生的友谊是通常的摩洛—摩洛闻所未闻的事实。由此很容易得出一个思想，即菲律宾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携起手来与共同的奴役者——西班牙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这是一部描写爱情和斗争勇气，描写正义战胜邪恶，描写人道和人性的叙事诗。而且，像通常的摩洛-摩洛一样，诗中讨论了羡慕、忌妒和卑鄙问题。

在巴拉塔斯的创作里，特别是在《弗罗兰第和萝拉》里，他加禄语口头诗歌的各种传统手法似乎被编纂起来形成一定的形式，成了菲律宾文学中的永久财富。巴拉塔斯以同邪恶进行斗争的思想丰富祖国文学，赋予自己的主人公以无法遏止的爱自由精神。正是在他的创作里，菲律宾文学开始与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

这一时期的邦板牙文学以袍剑戏或称摩洛—摩洛体裁为主。其最高成就是由安塞尔莫・霍尔何・德・法哈尔多神父（1785—1845）创作的篇幅最长的摩洛—摩洛《来自科尔多瓦的唐贡萨洛之一生》。摩洛—摩洛讲一位向伊萨贝尔女王一世传播天主教信仰和真理的西班牙将军的生平事业。这部长篇小说式的三卷故事（三万一千行）首次在巴科洛尔上演是在1831年。它以手抄本流传，直到1912年才出版。这个剧本不背沉重的社会包袱，而且被看作邦板牙人的《弗罗兰第和萝拉》，一部吸收了不少民间文学成分的作品。

伊洛戈语文学中占优势的是西班牙和他加禄语阿维茨及科里多的民族语本译作和改写。有关于狮心理查德的叙事诗，海梅・德利・普拉多的故事，《法兰西十二贵族》，《伯纳多・德利・卡尔皮奥》和许多类似的东西。后来也正是在这些材料的基础上伊洛戈语文学经典作家莱昂纳・弗罗伦蒂诺（1849—1884）的才华得到发挥，开了花，结了果。1845年以伊洛戈语发表了奥古斯都僧团僧侣安多尼奥・梅希亚的大型帕西昂，不过揭示这部作品原作的著名文艺学家，伊洛戈人 M. A. 福隆达认为它是被尊为天主教圣人的文森特原作的翻译。比科尔语文学作品当中以宗教剧最为突出，尤其是马里亚诺・佩费克托的一些弥撒剧。这一时期的宿务语文学也以类似体

裁为特色。

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文的严肃诗歌开始由菲律宾人自己创作。第一个这类诗人是何塞·德·韦尔加拉，他是一位非职业文学家，1813 年被推举为西班牙国会中的菲律宾代表（实际上在菲律宾代表团将要到来的当口国王斐迪南七世驱散了这个机构）。名气更大一点的诗人是绰号为菲律宾伯爵的路易斯·罗得里格斯·瓦雷拉。他的诗句里（文集《菲律宾的帕尔纳斯》，1814 年）民族自觉成分很强。这类诗歌首次动摇了关于西班牙人智力优越的神话。

在西班牙人占领之前的菲律宾文学中，甚至可以发现大众戏剧的雏形。弦乐伴奏下的舞剧表演和音乐舞蹈剧很普及，诗歌形式的讽刺喜剧也很流行，其中广泛采用了谜语、俏皮插语和谚语。因此，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麻逸国某些岛屿的少数民族中已经诞生了戏剧和戏剧艺术。它们可能是由布格坦甘（即他加禄人、比科尔人、伊戈罗特人及其他部落在祭祀亡人时进行的各种表演形式的统称）发展而来。

戏剧作为特殊的文学形式在菲律宾诸岛成熟于西班牙人占领期间。

菲律宾印刷业开办于 1593 年前后，当时用木版印刷了以西班牙语和他加禄语对照且被认为是奥古斯丁僧团僧人胡安·普拉先尼亚所著的作品，而这部基督教作品直到 1640 年才从菲律宾确定的五十七种首批出版物中发现手抄本。十六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西班牙人彻底征服菲律宾群岛之后，在欧洲，尤其是西班牙民间故事的明显影响之下，民间口头文学开始发展起来。菲律宾书面文学也发挥了类似的作用。与此同时，开始收集西班牙人占领之前的菲律宾文学典范，掌握西班牙语的菲律宾人也开始了解欧洲文学作品。

第六章　缅甸文学

缅甸作为中央集权制封建王国跨入十九世纪。年轻贡榜（雍笈牙）王朝的强制制度在王权无限的条件下进一步巩固了封建专制。各种内部势力的团结决定了军事力量的强大，军力的增强先从征战行动（征服阿萨姆和曼尼普尔的印度小公国）表现出来，后又在顽强抵抗英国殖民主义者（1824—1826 年第一次英缅战争）的义战中有所体现，这种团结也促进了民族经济和文化的高涨。

在缅甸文学史上十九世纪上半叶是一个戏剧兴起和繁荣的时期，诗歌争奇斗妍的时期，也是散文语言发展的时期。当过去的形式常常失去与宫廷礼节寺庙仪式相连的旧日功能，新的书面创作形式历历在目的时候，人

们会感到这是一个文体体系发生变革的时代。这一点最明显地反映在宫廷676·骑士诗歌里，那里不仅积累了大量体裁（主要指吟唱诗形式），而且抒情诗和叙事诗之间也划上了清晰的界线。抒情诗看重短小精悍的隐情作品，叙事诗则吸取了戏剧文学的坚实文风。文学中独领风骚的仍像过去一样是韵文，而且比起以往各个世纪来更为五彩缤纷，无拘无束。散文则尽管有十八世纪个别作者取得的成就，依然在较为狭窄的范围内运用。宫廷文学家对古典形式进行反思，对民间文学倍感兴趣都首先从诗歌上反映出来。世俗（非僧侣）作家作用的增强，读者和听众群体的扩大引起了文学的大众化和消闲化倾向。

某些革新因素先从十八世纪末开始活动的吴吞纽、吴温漂、越马沙的纳瓦德、妙瓦底吴萨等诗人的创作中显现出来。吴吞纽（1726—1806）以其封号敦丁垡温马哈西杜出名，他的遗产包括了中世纪宏伟诗歌中几乎所有体裁的作品，从林加和比釉（两种以佛经为情节用巴利语写成的宗教哲理诗歌）到雅都和鲁达（两种大型骑士抒情诗）都有。吴吞纽在严守传统诗学的同时拓展了体裁的题材范围，容许写圣徒传时有风格自由。他以取自《库达卡-尼卡伊》的本生故事为情节的九部比釉很有名。吴吞纽沿着逊卡拉维科尤（约 1588—1648 年）指示的道路往前走，使比釉发生某种程度的世俗化，较为重视主人公们的尘世劝善行为，爱情生活体验以至引人入胜的惊险故事。对比釉的世俗理解后来又在吴尧奇（1774/75—1835）的创作中传承下来。他的叙事诗《孔雀王》或者《伊迪代因苦行僧》从精神到题材都与马哈西杜的作品异曲同工。这样一来，一种尚未同圣徒传情节失去联系的惯用宗教说教体裁就有时像醒世论文，有时像长篇骑士小说了，作为前者它论述君主职责、臣民义务和宫廷伦理，作为未丧失劝善意义的后者，它在精神上又很接近雅甘（一种世俗叙事诗，见本书第五卷）。十九世纪传统比釉虽然没有断线，消闲化倾向毕竟开始占了上风。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地反映在吴逊（约 1782—1849 年以后）的后期作品及其弟子吴瑞希（1798—约 1858 年）的创作中。

吴逊是公认的鸿篇巨著大师，作为比釉的改革家，他不仅追求熟悉情节的新鲜阐释，而且追求作诗技巧的现代化（摒弃稳定的押韵法，摒弃四言诗的诗行规则等）。提出启蒙任务以后，诗人把通俗的佛教本生故事讲成针对轰动题材的讽喻，既引人入胜又富于教育意义。写苏达素姆的叙事诗（同名本生故事）里讲到的破戒皇帝故事就是这样的，故事对玩忽职守的统治者发出了警告。比釉《玛豪地下通道》中献给莫明苦行僧玛豪的颂文也是这样的。吴逊在他最优秀的叙事诗《奥马丹迪》里描写了一幅幅宫廷生活的鲜明画面，那里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作为出家人生活的特定人物，而是

作为现实的人类性格出现了。作者不吝挖苦，描写了好色的婆罗门们看见奥马丹迪时候的惶恐不安：正向盛宴贪婪扑去的馋鬼突然呆若木鸡，沉湎于少女美色的皇帝谋士醒过来就跟少女调情。吴逊大胆嘲笑挖苦，改变了叙述语调，不无痛苦地针砭宫廷私通。可是后来在他弟子吴瑞希的叙事诗里，吴逊的这种冷嘲热讽情致已经让位于公开的娱乐消遣，诗人利用同样一些传统情节叙述的只是男女之情风流韵事了。

宫廷诗歌中像嗳钦这样一些体裁变化不大，虽然这类作品十九世纪已经丧失了它文学之外的功能。吴吞纽、吴尧奇或越马沙纳瓦德的叙事诗被看作高雅文学的典范，不太适宜仪式朗诵。有代表性的大型颂诗作品是小纳瓦德（或称本名吴努的越马沙的纳瓦德，1755/56—1840 年）的茂贡（记事诗）集。作为名扬四海的达官显贵和宫廷诗人，纳瓦德极力美化贡榜王朝的成就，歌颂自己的故土。他的十六部茂贡是内容广泛的颂诗，多写官方史书上的重大事件，缅甸在土瓦、惹开和阿萨姆的军事胜利，一些重要的外事举动（《中国使节莅缅》），城市建设（《明王宫》）等等。诗人运用传统形式和题材时成功地添加了新的描写对象，深入研究了神话的英勇精神和传说的史话特点，有时甚至把茂贡写成以古印度书籍或缅甸年谱为题材的学术论文。这种体裁，形式上依然是歌颂在位君主的颂文，但已发展为一种大型的抒情史诗画卷。

早在十六世纪就已产生的叙事体他钦在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存在时间不长。早期他钦是一种从本生故事或阿瓦丹吸取情节，以布道为目的进行表演的较为舒缓的圣歌。贡榜时代的诗人们，尤其是吴温漂（约 1738—约 1803 年），不仅丰富了这种叙事诗的题材，而且赋予它以历时叙述的特点。他的大部分作品描写缅甸史上的重大事件，既有真实事件，也有传说中的事件（《历代王朝歌》、《二十八浮屠歌》、《中国如何求取佛牙》等）。作者也不拒绝写圣徒生活的传统情节（《拉马如何试图从佛陀树上扔掉乔答摩》）。他最著名的一部叙事诗是《罗摩之歌》，这是在缅甸文学土壤上对一部印度支那版流行史诗进行的首次改写。诗里表现出吴温漂强烈的佛教情绪，主要主人公写得像个菩萨，是个有着合乎教规经历的理想角色。从整体看吴温漂的创作具有世俗的歌功颂德性质，因为他的他钦像是官方的年谱，负有歌颂贡榜王国朝廷的使命，这就不仅把他同实实在在的缅甸各朝各代拴到一起，而且把他同传奇式的统治者们联系了起来。

在反思各种体裁的同一时期，小型抒情诗充实了宫廷诗歌。爱情抒情诗的种种形式按惯例都归类为钦，以强调它们的乐曲本质。大部分钦可以在伴奏下公演。十九世纪盛行的钦种有哦钦（爱情浪漫曲的一种）、波垒和峦钦（哀怨曲）、巴比釉（鼓点伴奏歌曲）、勃外（由乐队伴奏的一种音乐会咏

叹调)、垒钦(忧郁的“船歌体乐曲”)、东钦(由闹板伴奏的花炮歌)。大部分这类诗歌都以格调忧伤见长,能传达出恋人们的各种不同感情。抒情诗的各种短小样式逐步排挤人们喜爱的雅都及其变体,缓慢地渗入了正式诗歌。对抒情诗这一领域作出显著贡献的有女诗人梅贵(约 1788—1848 年),王后玛妙格礼(1809—1845),以及稍后的公主兰太康丁(1833—1875)。梅贵的哦钦既起源于十八世纪上半世纪的民歌,又起源于雅都或鲁达型的“历法”诗。不过她通过某个月份的天气特征,花草树木和果实种籽所描述的“季节”属性,只是传达直觉情绪的一个背景。梅贵首次引进诗歌规程的体裁是欧钦(哭诉),一种庄严肃穆由女诗人本人在葬礼上演奏的乐曲。玛妙格礼的曲目单五彩缤纷——从悲哀的巴比釉到哲理的连韵诗德埸无所不包。1845 年奉她丈夫达亚瓦底国王之命她被判处死刑。据传玛妙格礼死前写过一首绝别诗德埸,同阿南达图里亚那首著名的林加(1173年)遥相呼应:

现世的一切在法的操纵之下,
降生到人间预示着死亡,
光荣的主宰,怀着仇恨闯入生活激流,
去干他罪恶的勾当。

兰太康丁公主创作中的隐情曲,多半以她本人引入的波垒体表现,寄给他热烈爱恋的丈夫加纳翁王子,而他们的共同生活并不十分美满。整组波垒恋歌都建立在夫妻交替独白的基础上,其中包含着只有恋人才能听得懂的暗语。

抒情唱词的典范作品常常被吸引到大型叙事或戏剧作品里。在暹罗诗剧戏文影响下创作早期戏剧的时候,曾运用过一种叫作“阿瑜陀耶风”的歌曲摹拟,那是著名文学家妙瓦底吴萨(1766—1853)及其追随者的创作中所素有的风格。歌词的文学功能并不排除它的隆重仪式功能(新歌词可为各种宫廷节庆活动而作:垒钦为划船,东钦为放焰火)。更大众化的歌词还可以更自由地用于宫墙之外。一个奇妙的例子是坡杜多吴敏(约 1798—约 1848 年)和卢吴敏(1800—1861)两人激烈对骂甩出的讽刺歌词竟然成了当时非常流行的抒情诗。下面是卢吴敏和他在阿瓦当医生的弟子编写的一首歌词片断,写给民间节日上代表“极可尊敬的”坡杜多吴敏的稻草娃娃:

这是一首闹板伴奏的歌曲,欢快响亮。我们取乐时,总要把一位先生来歌唱。这位老爷大名鼎鼎,人称“坡杜多首长”,不怎么值

得尊敬，倒要把蹩脚诗人当……他用稻草作身，却着一件僧侣的盛装，至于常住不离的寺院，那是个藏污纳垢的地方……

这首带有江湖艺人诙谐讽刺风格的“对骂”诗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在官方编年史中保存了下来，而且因为在颇为不敬的上下文中讲出了佛教的真情实况。

十九世纪的抒情体裁明显排挤了盛典诗歌。对民间歌曲的关注为有些麻木的官方诗歌大树注入了新鲜汁液。标准杠杠削弱，出现一些更加通俗易懂灵活多变的形式，发生了旧有体裁的内部位移，而追求冲出佛教教条框框，用感情诗歌代替理念诗歌，距离创作的世俗化道路已只有一步之遥。

缅甸文学的戏剧体裁是在泰语戏剧传统推动下以史诗为基础逐步形成的。十九世纪上半世纪两种产生于十八世纪的领先戏剧体裁——大型宫廷纪事剧和能上演的本生故事剧得到迅猛发展。两种形式在题材、风格、功能上有区别，但都是整个印度支那传统情节同缅甸经典叙事体诗作的独特结合，并在阿瑜陀那、万象、清迈等宫廷戏剧的舞台实践影响下发生了局部变化。著名缅甸文学家妙瓦底(《伊瑙》、《达莫达郭达》)，达多吴达马亚扎(《钦哈巴达》)，兰太康丁公主(《恩大温达》、《维泽亚加利》)等人的宫廷剧都是一些详详细细情节繁杂(而且结构松散)的诗体叙述(可允许节奏分明的散文)，被用作哑剧的说明，也可以当文学作品阅读。此类作品的世俗化不仅表现在形式上，还表现在取材非经典史诗的情节上(《五十本生故事》系列，罗摩或伊瑙的传说故事)。具有骑士文学传统的宫廷剧常以特别复杂的章法和包括巴利语或梵语词汇的语言写成，因而也只能供一小部分宫廷鉴赏家享用。

在文学里和舞台上更为完善的一种戏剧形式是比雅扎，它的发展与吴金吴(约1733—约1838年)的创造紧密相连。吴金吴是一个享有盛誉的诗人、剧作家和朗诵演员，接受阿瑜陀耶传统和缅甸宫廷剧影响之后，他的剧本具有了不少地方民间演出的性质。比雅扎剧本紧凑小巧容量很大，可以作为一夜演出的戏文基础(大型宫廷纪事剧的演出则可能拖到一个月)。戏剧情节发展受严格逻辑支配，简洁的文字又常常遵循三一律(地点、时间、情节的一致)。巴代达亚扎(1684—1754)曾做过的将戏文分场，韵文体与散文体交替出现，对戏剧情景进行说明等等，所有这些根本不被宫廷剧作者所遵守的东西，都被返回佛教“蒂皮达卡”传统圣徒生活情节的吴金吴所采纳。剧作家的剧本中有一定数量的佛本生经故事(《玛豪》、《维丹达亚》)，另外一些是作者利用流行的使徒传主题和冲突，以它们为基础构筑的新情节，虽然对观众来说已经习以为常(《巴勃亨》、《德瓦贡班》、《温甘

达》)。像从前许多诗人一样,吴金吴在他的作品里触及大量伦理道德问题,描写强烈热情的碰撞,从道德上歌颂涵盖面极广的主人公(英勇的战略家玛豪、神圣的苦修者维丹达亚、神奇的将领德瓦贡班)。贯穿吴金吴所有剧本的是争夺王位的斗争,统治者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这在倾轧内讧频生,阴谋叛乱不止的缅甸王国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与此同时,同圣徒传情节相连的醒世功善成分在惊险情节面前明显后退,佛本生故事叙事的从容不迫也被舞台动作的快速节奏所掩盖。鲜明的可视性,幻想与现实有趣的交织,取自民间戏剧的歌舞穿插,都使吴金吴戏剧的普及越出了宫廷平安的界线。十九世纪下半叶的吴邦雅(1812—1867)及其他作者发展了吴金吴的成就。

缅甸文学家习惯以韵文阐述自己的思想,只偶尔写写散文。在学术著作、宗教哲学著作、公文著作中笔调比较轻松的是历代年谱,醒世书简,法规汇编和叙事体的宗教作品。这些作品也功能严格,但与其他类型的作品相比,允许虚构的程度要大一些,这就给了创作者自由表达的空间。编年史家开始遵照佛教史传统来写,然后就可不受拘束,选中那些符合他理想的事件和生平来写。训示书简的作者或法典的编纂人也可以把收件人或法庭主宰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道德问题上来,等等。具有一定艺术性的这几类作品,十九世纪还获得了一些政论特点,散文家们利用传统形式触及的不仅有伦理问题,还有社会政治和国务问题。比如,修道院院长莫温伊韦-斯哈亚多以古老醒世寄语密达萨写给巴奇多的谏言其革新就很明显。他在以例行祝词祝贺王朝节日并号召恪守圣训的同时历数了君主的所有职责,用摘自古代论文、圣徒故事里的楷模来充实劝告,同时也未回避对现实政治事件的暗示。

679·

逊南达达扎(约1757—1813年)的醒世书简带有另一种性质。这位杰出修道院作家和布道者面对广大出家人和在家人讨论日常行为规范。五百二十八件密达萨的文集都是写给亲属、道长和弟子的信件,其中讲到每个收件人的道德责任。他的寄语吸收了口语和民间语言的精粹,写得既生动活泼又通俗易懂。密达萨的世俗化倾向得到逊奥坎达马拉(约1773—1838)和下半世纪一些作者的响应,同时崇高训示也敏锐地反映了新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

为数不多的情节散文永远以说教布道格调为特色。醒世小说或佛本生故事两种体裁从内容到形式都与巴利佛教书面语有关。以佛本生故事写作的有吴奥巴达(十八世纪末)及其追随者。缅甸散文中标准佛本生故事的文学译作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发展。醒世小说的题材比较广泛,与佛本生故事同时采用的有阿瓦丹和圣徒传故事。醒世小说和佛本生故事的作者通常

是在布道活动过程中写圣徒传的僧侣。两种写圣徒生活的叙事体裁不仅各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而且促进了缅甸文学剧本以及后来新型小说的发展。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编纂的著名《琉璃宫史》对充实史学文献作出了贡献，为编此书专门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莫温伊韦-斯哈亚多、吴逊及其他宫廷文学家组成）。作者以中世纪经典作品为范本，集中描写早期缅甸蒲甘王国时期，以及蒲甘史前各发展阶段——传播佛教，古印度佛教统治者当政，太公时期和室利察咀罗——的早期统治。《琉璃宫史》被当作一部地方传奇、历史故事和传说总集，一部严密而简洁的文学语言范本接受。它在最古老的碑铭文学同二十世纪的短篇小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第七章　泰国(暹罗)文学

十八世纪由曼谷王朝重建的暹罗王国迅速积蓄力量并在短期内成为东南亚最强大最巩固的王国之一，所以十九世纪也成了暹罗史上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不过十九世纪上半叶还像从前一样由王国宫廷和佛教团体来行使发展民族文化事业的职权（教育体制仍是修道院式的）。

习惯说法把十九世纪称作“王国启蒙”时期、传统复苏时期和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文学遗产中很大比重系王室成员所写，开明帝王的创作也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上半世纪泰国文学中明显存在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较为进步的倾向，它为书面文化开辟了广阔前景，出现于拉玛一世在位时期（1782—1809），明显为下一任君主统治时期（1809—1824）所继承发扬；第二种显然是保守倾向，宣扬复古推崇佛教文学，拉玛三世在位时（1824—1851）最为活跃。两种倾向的出现都与执政国王的思想意向、文化政策和个人品质有关系。 ·680

拉玛二世继承了他父亲拉玛一世开始推行或者说打算推行的文化政策。他力求发扬古典文学传统，掌握民间文学即无名“低级”文学遗产，以创造出古典（宫廷）风格与朴素民间风格独特结合的融合体，在书面文化普遍大众化和世俗化的条件下把世俗情节和宗教情节更自由地结合起来。拉玛三世的见解完全不同，他只承认佛教文学，主张回到古老经典作品，这就意味着脱离大众化，钻到巴利语和古暹罗语宗教题材、情节和形象的故纸堆里去。当然，即使在拉玛三世在世的时候这种倾向也没有最终占上风（顺吞蒲的创作或洛坤诺剧的迅猛发展是说明问题的最好例证），不过不难看出这种文化政策阻碍泰国文学许多有益创举的不良后果。

上半世纪泰国开办了一所佛教博物院，里面有丰富的美术和古老书籍收藏品，从那时起达官显贵家的年轻人都在那里接受佛教教育。1834 年至

1848年曼谷开始印刷书籍，起初只用巴利文，从1837年美国传教士Д.Б.布雷德里创办印刷所开始，也用泰文印书。与英文《圣经》和几部中国长篇小说的译本一起还出版一些本国古典作品。拉玛三世在位时出了第一份刊物《新闻》。不过这些创举都没有影响二十至四十年代的文化生活，到他死后才由他的后继者们加以效法和发挥。从整体看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文学状况，证明了古典传统的胜利和创作的高度繁荣，而且由于民歌体裁形式的加入和顺吞蒲及其他文学家的革新，高雅文学的界限在向外扩展，读者和观众的圈子也在扩大。

文学创作中像从前一样，占上风的是韵文作品，散文文学似乎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只要想想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或《众王之王》那高超的译本就足够了——见本书第五卷），散文语言却依然受阻。十八世纪末开始的诗歌与戏剧角逐导致戏剧最终作为独立的文学种类分立出来，诗歌昔日的统治地位逐渐削弱。

文学力求扩大传统范围。十八世纪末入围的情节反复加工（《伊瑙》、《拉马坚》、《五十本生故事》），新的情节大批出现并迅速流行（《昆昌与昆平》，达农猜的调皮故事），最后，已被遗忘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古风的情节也得到恢复（比如《马哈猜德》）。主题情节的丰富多彩是十九世纪泰国文学的最大特点之一。反复加工取材于民间文学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情节——昆昌与昆平的故事——至关重要。很久以来人们都把这个情节视为一种独特的口头朗诵诗塞帕（色帕），塞帕有时又被列入民间戏剧。十九世纪以前的宫廷文学家不用塞帕写作，人们认为用民间形式写作欠严肃。正如研究家们所说，塞帕作为一种口头创作早在阿瑜陀耶王朝早期，甚至素可泰王朝时期就已出现了（虽然十五世纪方被人提起）。这是一种带有童话和日常生活情节，以格仑诗体写成，可以用来演唱的作品，常在民间节日宗教盛典（婚礼或成年仪式）上演出。出家人或在家人朗诵塞帕常有独特的响板或铜盘伴奏，后来还用好几种乐器，朗诵能做到雅俗共赏。这类作品都带有即兴特点，时而靠近民间传说，时而贴近宗教神秘剧。

描写昆昌与昆平的塞帕是将泰国古已有之的情节运用于暹罗古典文学的稀有范例。将它引入宫廷诗歌范围证明人们的文学见解有一定进步，也证明对民间文学有了起码的尊重。故事讲同爱一女的两个情敌的生活和厄运，以及三人的家庭纠葛，原是完全不适合作宫廷文学题材的。从容述说娓娓道来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要人，不是达官显贵和婆罗门，而是服役阶层的小人物。情节大约发生在1491—1529年间，处于中心的是纯粹的日常生活事件，自然的人类感情和动机。置于首位的是爱情关系：两个有着对立地位、相貌和性格的同龄人，由于同时爱上漂亮的娘萍而相互角逐，而

681·

娘萍从小爱恋昆平，到一定时期又赏识昆昌，此类情感矛盾引发出一连串戏剧冲突。所有的个人生活变故都在城市与国家生活背景上表现出来。民间节日或宗教盛典画面同军事远征和自然灾害等等的描写交替出现。情节的个别片断看来起笔于十八世纪末，不过整个文本是由一个宫廷诗人小组于十九世纪头二十五年编撰而成的。叙事诗不仅规模恢弘（四万多行），而且风格多样，结构松散，因为宫廷塞帕的每位编撰者都在完全隔绝的情况下写作。据推测，作者当中有顺吞蒲、布拉亚德琅、格鲁米王子和国王拉玛二世本人，后者同时兼任审查官、批评家和编辑。

西达农猜奇遇故事出现于官方文学也在这一时期。西达农猜是个平民百姓（有时是农民，有时是市民），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民间笑话中经常出现的可爱角色。调皮鬼的恶作剧多半针对富商、官吏、大臣，甚至王子和国王。主人公本人有时狡猾而刻薄，有时天真又粗鲁。讲西达农猜的泰国塞帕十九世纪初开始流传，世纪中叶由宫廷文人记录下来，后来又把塞帕的一些情节搬上了洛坤诺剧舞台。

十九世纪上半叶泰国文学的发展与宫廷文学小组的活动分不开。拉玛一世时期形成了由一些特殊咨议组织在国王支持保护下集体进行创作，讨论并决定文学问题的传统。拉玛一世及其继承人希望继承纳莱大帝的文化传统，再次努力把王宫建成诗学思维的中心。拉玛二世王除参与塞帕《昆昌与昆平》的创作，还写了为数不少的古体诗歌和剧本。他的优秀作品中有一组船夫曲，含有对民间节日、农村生活，甚至暹罗菜谱的鲜明描述，还有几部短篇叙事诗，打开了上演《拉马坚》的通路。不过从拉玛三世一登基（1824），宫廷气氛就急转直下：王宫变成宗教文学堡垒，从前的文学组织也纷纷下马。这时坐镇宫廷进行创作的著名诗人是帕拉玛努七切诺洛亲王和王室文书奈米。创作超出宫廷文学生活范围的顺吞蒲靠边站了。

这一时期的泰国诗人继续用传统诗歌格律写作，既以最古老的形式（花句诗等），也以稍后形成的新形式（屏谣等）写作，但是没有一个人绕得过尼拉体（记行诗）。传统尼拉是叙事抒情作品，书信体，十九世纪的尼拉具有一些新特点：与德布莫利法师诗歌中对大自然的冷漠观察或那林迪贝德的晶莹高雅爱情诗一起，我们看到的是玛哈沙格或德差迪颂作品里的战斗激情和奈米长诗中的鲜明节日气氛与笑迎生活态度，还看到布拉亚德琅尼拉中炽热的情欲。传统尼拉诗作品都和旅行、远征、朝圣有关，所以启程上路，长途跋涉，离散分手是叙事诗中必不可少的主题。以作者那林迪贝德王子（约 1780—1809 年）取名的《那林尼拉》（1809）写的是出征南国期间沿湄南河的航行，它以展开的独白描述大自然的生动画面，再现皇家舰队的雄伟壮观，又用主要篇幅回忆别离的首都，描写爱情的梦幻。在相似的环

境下布拉亚德琅(约1765—1835年)也创作了一部《达琅尼拉》,作者是一位显官,也参加了南下对缅甸的远征,不过是在步兵队伍里。在他的诗里尼拉固有的哀歌情调有所改变:那林迪贝德晶莹平静的抒情让位于冲动的激情,细腻的景致也为迸发出自然力的描写所代替,结果则与胜利进军的情绪余波十分合拍。布拉亚德琅保存下来的诗歌遗产有《随殿下游梅德纳河尼拉》、《布达廖德尔赞》和以屏谣体写成的爱情怨歌集。布拉亚德琅对十七世纪诗人尤其是西布拉德推崇备至。对大师的模仿可从其创作中略视一二。

682・ 玛哈沙格(1782—1832)是拉玛二世之子,军事将领,他的诗歌克制而冷峻。他有一部屏谣体诗集,一部为演出而写,以"布拉洛"为情节的叙事诗,此外还写了一部以1820年远征老挝为题材的著名尼拉,是一部语言和表现手法都很复杂的作品。军人诗人运用立律(律律)格律(古老格律莱与克龙的新颖结合),赋予叙事诗以凝重舒缓的节奏,他通过详细描述事件,努力把读者带入严肃进军的生活境界,以强调所发生事件的重大意义,但描写的中心并不在交战,而在远征本身的种种波折与突变。与玛哈沙格这部叙事诗相呼应,不久以后德差迪颂亲王(1793—1859)也写了一部尼拉,是讲讨伐老挝呵叻王国起事的。对讨伐艰辛克制而阴暗的描写夹杂着号召爱国主义的插笔。奈米的尼拉再次把我们带到德琅到过的南暹罗,不过与参加军事行动的布拉亚德琅不同,奈米是作为王国和平使节来到这里的。诗人揭尽全力描写边陲地带的大自然和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这已是自然景色和风俗描写尼拉的典范了。出家诗人很少运用尼拉体,但十九世纪诗歌优秀作品里就有一部由著名佛僧哲人德布莫利(1787—1836)写的《游达拉克连尼拉》。这部叙事诗只有保存下来的残片,是作者去阿瑜陀耶城郊捕象期间创作的。事由本身的平凡并没有影响作品的风格。这是一份从哲学高度来描写大自然,感受声响世界、绚丽色彩和人间万物的东西,同诗人的内心思索世界完全和谐一致。

在十九世纪泰国文学名家中占据特殊地位的是顺吞蒲(1786—1855)和帕拉玛努七切诺洛(1790—1858)。顺吞蒲阅历丰富,一生经历了文学的荣誉,被贬的痛苦,宫廷的成功,受逐的不幸,仕途的意外,爱情的波折,修行的平静和狱中的煎熬。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依靠本人的天赋,在世的时候能够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大贵族的景仰,这是泰国文学中的例外现象。顺吞蒲创作的特点是题材广泛,体裁多样,并富于大胆的革新精神。顺吞蒲心爱而习用的格律是八音节的格仑,他的大部分作品是用格仑体写成的,而在那之前人们认为它不能登大雅之堂。后来格仑格渐渐排挤了其他古典诗歌的格律,顺吞蒲用它写出了尼拉(通常是用克龙和立律来写),浪

漫曲和歌，以及醒世题材、历史题材和戏剧体的叙事诗。在普及诸如塞帕和克龙叙事诗这类新体裁的事业中诗人功劳也不小。保存下来的顺吞蒲文学遗产里有八部尼拉，两部塞帕，若干种不但表明作者的作诗天赋，而且表明他非凡才学的抒情体、叙事体和编年体叙事诗，还有几组摇篮曲、屏谣和格言诗。他的公认创作高峰是《帕阿派玛尼》。这是一部大型童话叙事诗，写帕阿派玛尼王子和他兄弟西素旺以及儿子信沙姆的故事，其情节是泰国文学中第一个完全由作者幻想创造出来的成果。顺吞蒲的创新不仅表现为对爱情、离别、海战、风暴这些主人公命途所遇进行的激动人心描写，还表现为通过抒情插笔和人物的生动对话把尼拉的抒情性与戏文的鲜明形象性结合起来。帕阿派玛尼数不清的冒险、娶亲、失踪、追逐有时令人想起《伊瑙》或《沙穆达戈特》的细节，而这种相似是纯粹表面的。顺吞蒲的主人公远不是传统性格的主人公，作为诗人和乐师，主人公的天性更倾向于独处和幻想，而不是追逐军功伟业和王冠显位。《帕阿派玛尼》是歌颂大海的诗篇，波涛汹涌的大海几乎是作为独立人格，作为视觉形象出现的。叙述中的童话色彩与现实紧密交织：叙事诗中那些子虚乌有国家的帝王、隐居修士、外国海盗、海中怪物迫使读者和观众不断回忆起亲切的故土，想象出泰国的宫廷生活，感受到人民的精神，辨认出熟悉的大自然。梦幻与现实汇合成一条统一的叙述流，诗里首次出现了泰国文学中以略带讽刺笔调描写的欧洲人身影。此外，诗人还力求讲述一些海外的奇妙风俗（基督教的葬礼），借以传达些国外宗教方面的信息。顺吞蒲的作品对同辈人有特别强烈的影响，可是同朝廷的复杂关系经常反映到他的命运中来：作为拉玛二世的宠信，顺吞蒲甚至在帝王在世的时候也没逃开坐牢，拉玛三世时又遭到长期贬黜，诗人直到拉玛四世在位（1851—1868）后期才受到应有的敬重。

帕拉玛努七切诺洛亲王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是贵族世家中精通佛教思想的大师，宫廷的偶像，十二岁出家做沙弥，终生居住寺院，很快占据了佛教团体的高层职位。所有这一切都给他的文学创作打上了鲜明烙印。他不赞成拉玛二世的文化政策，便和与自己同气相求的人极力限制宫廷文学小组的活动，恢复宗教文学旧日的统治地位。拉玛二世时这些尝试效果不佳，到拉玛三世时帕拉玛努七切诺洛就成了顶尖人物。诗人的主要作品都在这一时期写成（当然有国王的授意和推动），复佛教之古的倾向也占了上风。支持这一倾向的其他文学家有：诗人的兄弟格拉伊颂威七德（1798—1846）、巴姆廖博里甲格、伊德沙拉努巴布。帕拉玛努七切诺洛多采用泰国史和巴利语佛教文学当中《马哈猜德》、《五十本生故事》的经典情节，运用那时已经相当僵化的体裁和格律进行创作。

帕拉玛努七切诺洛的著名作品之一是历史史诗《达楞败》,写暹罗大帝纳黎宣打败缅军首领玛哈乌巴拉查(1592)的一次胜仗。史诗以风格语言空前复杂和广泛使用高棉、巴利—梵语词汇为特色。描写战地和宫廷生活的场面带有教谕—颂扬性质。他的其余作品都贯穿说教布道精神,以佛教教事为题材。追求宗教文学鼎盛的亲王诗人活动,从整体上说大大阻碍了泰国文学的进步。

从文学诗歌、民间艺术和佛教神秘剧土壤上成长起世俗宫廷戏剧,作为它发展的总结是上半世纪经典剧作准则的稳定化。拉玛二世当政初期洛坤乃(对"宫内剧"的称呼)已达到很高水平,它排除孔剧和舞剧,取得宫廷戏剧主导地位。由于拉玛一世及其在位时工作的专门戏剧咨议会的共同努力,短时间内编出了一份洛坤乃剧目大全。拉玛二世的努力又使宫廷剧目得到充实,而且那时创作的全部戏文都经过重新审查和校订。据说拉玛二世是许多传统题材戏剧的作者,其中的优秀剧作是《伊瑙》和《拉马坚》。两部戏剧风格文雅,被誉为传统经典,反映了作者对史诗的充分理解和阐释。拉玛二世还作了将洛坤诺或称"宫外剧"的演出纳入宫廷剧范围的尝试。宫外剧是作为"宫内剧"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在戏班组成、表演技巧、服装和道具方面都与宫内剧有区别。起初洛坤诺是一种平民戏,由江湖艺人(都是男演员)在广场、寺庙和殷实人家府邸为观众演出。剧目多由口传,数目有限,但比洛坤乃又广又多,因为在演出《拉马坚》、《伊瑙》、故事集《五十本生故事》片断的同时还根据童话和传奇主题设场演出。拉玛二世对"宫外剧"的兴趣表现在整理剧目的意图上。取材于《五十本生故事》的六个剧本编集出版就署上了国王的名字。年轻时参加到父亲创作中来的还有猜达布王子,后来的拉玛三世,不过执政以后他就着手铲除娱乐性的演出了。戏班被逐出王宫,可是戏剧还继续存在和发展,演出改在达官显贵的宫殿或城市阔佬的府邸。王室家庭成员照样在他们那里安安静静组织"宫内剧"的演出。"宫内剧"和"宫外剧"的界线日渐模糊、消失,形成了共同的剧目和舞台表演技巧,演员也逐渐不仅作为舞蹈人或艺人出现,而且作为歌手兼朗诵人登台演出。

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散文文学存在两种本质上互不相同的形式。在御用宫廷文学里散文只用来编纂历代年谱、法规汇编和各类艺术方面有些新奇著作的文件。比如,拉玛三世有时给邻国国王,有时给大臣或军事将领,有时给泰国医师(由于病治不好,拉玛三世晚年深受其苦)写信,信件不仅含有又实际又有趣的材料,还以优美的文体吸引人。历史著作中最享盛誉的是帕拉玛努七切诺洛创作的《阿瑜陀耶编年史》,作者写它的意图是证明王朝交替中暹罗王权的合法继承性。帕拉玛努七切诺洛的书写得言简意赅,

是散文体历史文献的稀有范本，与以往的年谱不同，文中不给传说和幻想事件留有任何余地。从高棉文、华文、印度文翻译过来的文学作品在发展文学散文中起了一定作用，比如拉玛三世翻译《要人述》的尝试。

这些年与御用散文文学并存且有点独立意义的是泰语民间文学，创作的作品有传奇、童话、城乡日常生活故事。其中一部分会被记载下来。十九世纪上半叶曾出现过一系列城市故事，有的还写着准确的记载日期，一般说这些书都带有消遣娱乐性质。这些佚名短篇描写现实生活中的偶然事件或历史史实，有时是发生过的趣事或幻想式的梦境。小说里的人物通常是市民——商人、手艺人、僧侣、乞丐、小偷等等，很少是贵族或军人。不太复杂的情节，一目了然的文体和生动活泼的语言使最没经验的读者都能读懂这类作品。一些小说讥笑了宗教偏见，另一些则相反，确认了彼岸势力的权威。有时恶毒的挖苦与天真的信赖共存，不过更常见的还是健康思想取胜。文学家还不至于屈尊到写这类情节的东西，虽然说帕马哈门德里写调皮鬼的诗剧《拉登兰代》正是以写城市乞丐的流行小说为基础完成的。巴利语文学（暹罗字体）是十九世纪泰国散文文学的特殊部分，因为论述道德、哲学、语言学、天体演化等等的佛教论文都是僧侣们在寺院大墙内写的。

第九编　中近东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该地区文学中尚未发生传统艺术标准、文体体系的本质性变化与突破，不过逐渐充实了新的思想和题材，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体裁。引起这些过程的条件是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尖锐起来的危机，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的产生，城市资产阶级作用的加强和西方科学艺术思想的影响。阿拉伯人、库尔德人反对土耳其统治和阿富汗人反对英国人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开展，日益壮大，因而加强了前一阶段开始显露的文学分崩离析过程——作为"阿拉伯文学"而存在的组织机构纷纷解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地方民族文学开始形成。

民族意识的形成，表现在上述过程中对文化价值和传统体系的重新审视。十九世纪上半叶在不少国家的文学家活动中，显现出了以时代要求为依托，从恢复宗规外（民间）和语言文化的非艺术层面（应用散文）这一角度来重新审视古典遗产的倾向。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学的世俗化和大众化。了解欧洲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社会中一部分人（首先是封建上层贵族和城市各阶层）去思考社会过程，去探讨一些建设性的理性思想和概念，而这些思想和概念又会考虑和认可生活中新的、进步的形式。在熟悉欧洲社会经验和思想的先进社会阶层代表的影响下，土耳其、伊朗、埃及的君主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尽管性质温和，客观上还是为现代教育和进步思想的发展，民族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和新文学形式的产生，提供了一定空间。

同该地区各国首先建立经济文化联系的是法国（法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活动特别积极），近东知识分子也主要从法国了解欧洲科学思想和艺术经验。阿拉伯各国、土耳其、伊朗都建立了欧式教学机构，创建了印刷出版

业，出现了报纸杂志，产生了政论作品，而这些政论作品是十九世纪近东文化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团体，有“科学之家”（伊朗）、“翻译协会”、“图书协会”（土耳其）、“科学艺术普及协会”（叙利亚）等。所有这些改造改革都是在文化革新的旗帜下进行的，只是各国叫法不同：土耳其叫“改革”；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叫“高潮”；伊朗叫“革新”。以天赋人权、个性自由、君主立宪等思想滋养的文化社会革新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讲，可与西方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相类比。它的思想体系源于一个信念，即科学与应用知识的推广，教育事业的发展，可以改造社会条件，克服封建主义的闭关自守，改善国家的落后局面。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国家的启蒙思想尚未形成严整的体系，也不具有激进性质。第一代穆斯林启蒙学家的活动就是以宣传温和改革的方式进行的，但在存在君主专断和伊斯兰统治的残酷制度、封建法律恣肆的国家里，这样的活动有巨大意义。一些启蒙主义者本人也常会为其思想而献出生命（阿米尔·卡比尔、马卡姆·法拉哈尼、伊泽特·毛拉等等）。时代的先进人士为顺利宣传新思想，被迫从穆斯林权利法规中寻找为自己活动进行思想辩护的理由，并用以批评不合理的制度，向开明君主进谏道德的传统说教方法。这一时期里，出现一种打着虔诚正统伊斯兰旗号重新审视文化范畴，再现往日辉煌的倾向，这是思想斗争的一种形式，是为唯理主义思想和新的生活方式寻求论据的一种手段。

该地区各国启蒙—改革思想的传播很不平衡。这时期的土耳其形成了较为有利的条件，那里 1839 年至 1856 年进行的仁政改革，打开了通向他国获取西方科学文化成果的大门。埃及和叙利亚面向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独立国家体制的需要，也是对土耳其扩张政策的对抗。在该地区，尤其是叙利亚，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播新思想中起了显著作用，他们把自己的活动目标，定在商界和那些对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感兴趣的自由化地主身上。

新思想没有直接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文学里，但促进了审美意识的重新定向和传统艺术体系的逐步解体。在这方面起很大作用的是政论。政论是新思想的媒体，推动了散文语言的发展，确立了新的词汇、术语和后来为文学所掌握的概念。虽然文学暂时还停留在中世纪体裁和表现手段的范围内，可是中世纪文学体系内部已显现出变化，原有体裁位次被打乱。周边文学体裁和低级文学体裁已活跃起来并具有了美学重要性，民间文学的作用在加强。先进作家意识到的时代冲突（中世纪秩序与个人权利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旧体裁和美学概念的内部，并逐步加进了现代生活材料，还夹杂了一些新的社会和伦理问题。

如果说十八世纪体裁界线是不可逾越的，那么十九世纪上半叶就开始了消除体裁区别的过程。诗歌中的古典主义颂文依然是主要体裁，但这一变化也波及到它。在那些饱含激情和过分高雅而献给权威人士的喀西达体诗歌里，也加进了现代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生活的事实与现象。

散文作用的增长已成为十九世纪上半叶文学的特点。诸如利赫利亚、游记这类传统叙事体裁，特别得到普及，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周围现实为指向的。这些传统体裁自身也发生了一些本质性的变化。比如，无论利赫利亚里，还是某些玛卡梅体诗歌里都加大了日常生活材料的分量，加强了讽刺和劝善成分。民间文学成分渗入书面文学，以语言非同一般的大众化、表现手段和词汇的丰富为标志。同时变化的还有作者的立场，人们更加认清了自身劳动和本人个性的社会重要性与公民重要性。所有这些发生在传统叙事体裁中的变化都通向小说形式的形成，尽管这个过程长达几十年。

传统艺术体系中的变化大多是在欧洲文学影响下发生的。土耳其、伊朗、阿拉伯国家创作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作品是莫里哀、拉封丹、费纳隆等人的，众所周知，这些作品都是翻译的首选，即使没被西方文学显著影响的国家（库尔德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坦）也出现了传统文学陈规的瓦解。比如这一时期的库尔德文学，它处于库尔德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影响之下，却因世俗倾向和反封建倾向而得到丰富，其中响彻爱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的调子。面向非文学语言的索拉尼，把民间艺术成分纳入文学，都表达了库尔德诗人民族自觉意识的增长，表达了他们对创作具有普遍意义的全民文化珍品的关心。

阿富汗斯坦文学处于阿富汗人反对英国占领者的解放斗争条件下，这一文学中产生了具有高度公民情感和真诚人类体验的诗歌。与占主导地位称作“印度风格”的作品并列的是一批以“霍拉桑风格”创作的史诗作品，其风格以形象化手段的朴实自然见长（哈米德·卡什米里的《阿克巴尔书》、古拉姆·穆罕默德·阿洪扎达的《战争纪实》）。 ·687

对叙利亚、土耳其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一时期以创作新戏剧的早期尝试为标志。叙利亚出现的阿拉伯戏剧考虑到了影戏卡拉格兹的经验教训。土耳其情况也一样，那里的第一个原版剧本 И. 希纳西的《诗人娶妻》，就是民间戏剧阿纳多卢和卡拉格兹的传统与欧洲戏剧经验的融合。

像大多数东方国家一样，对该地区各国的文学状况尚无充分研究，许多材料还未纳入学术范围。

出版业形成的初期定期出版物，常常是刚刚出世就寿终正寝，许多登在

报纸杂志上的文学作品也就与之一道消失。所以我们掌握的往往只是同时代人对这些作品的评语而不是作品本身。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当时的精神生活已相当充实，因而正是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后几个阶段具有明确形式的新文学基础。

第一章　土耳其文学

土耳其从中世纪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过渡拖了很久。十九世纪上半叶书面文学还同以往一样多以诗歌表现，基本上是传统的内容和形式。诗人运用的是惯用的形象，最复杂的隐喻，独出心裁的修饰和比较，这些都迎合了学术名流和旧诗鉴赏家的美学观念和口味。作者经常诉诸非常熟悉的苏菲派形象性体系，以求理解当代生活中的某些形象。创作了一些文体精致儒雅的嘎泽拉诗，臃肿累赘而富有歌颂性、哲理性和劝善性的喀西达诗和叙事诗。穆罕默德·阿基夫-帕夏(1787—1845)的大部分类似体裁的作品都是如此，同他的散文作品不大一样。休莱曼·费希姆(1788—1845)和佩尔泰夫-帕夏(卒于1837)的著作也如出一辙。当时盛行的是道德劝善作品，以及貌似学术的韵文和其他各类中世纪著作。

时代精神生活特点是，在社会先进人士意识中扎根的启蒙主义思想日臻成熟。十八与十九世纪之交，奥斯曼帝国继续经受深刻危机。非土耳其各族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土耳其落后于欧洲发达国家这一点，对土耳其本国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马哈茂德二世(1807—1878)进行的军事、行政和文化改革是后来一系列改革——仁政改革(1839—1856)的先兆，尽管有局限性，还是有它一定的进步作用。旨在巩固君主专制的各项改革措施，在客观上促成了封建基础的动摇。这表现于教育的某些发展、出版事业的活跃、土耳其语期刊的组织、以向土耳其人介绍欧洲卓越的科学与军事著作为目标的国家翻译局之成立(1821)等方面。土耳其青年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国外接受教育，或到国内新型学校学习(从三十年代末起)。对包括外国东西在内的学术著作(大部分通过翻译，小部分通过原著)感兴趣的读者群在日益扩大。这些新事物都是土耳其和欧洲联系得到加强的结果。

早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许多逃亡的保皇主义分子就从法国迁到土耳其来，他们当中有些人占据了军事或其他部门顾问的位置。那时共和国政府还向土耳其政府派过一些军事专家和工匠师傅，教授土耳其人学习技艺。后来，特别是十九世纪初，同法国的交往更加密切，以致对土耳其的内外政策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十八世纪末，反动侨民来到土耳其，加剧了法国大革命反对者和拥护者之间的斗争，拥护者一方是长期定居近东的法意侨民后裔，有商人、手工业者和各类知识分子(医生、工程师、科学家，其中就有著名的雅各宾党人，自然科学家拉马克)。法国移民区成员，共和主义信仰者曾在伊斯坦布尔举行政治示威(1792)，并试图组织(伊斯坦布尔、士麦那等地)作为雅各宾人俱乐部分支机构的人民团体。革命拥护者还在奥斯曼帝国边疆地区(比如，巴尔干)和地方资产阶级的圈子里，以及波兰侨民当中存在过。看来，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影响到有启蒙主义激进情绪的土耳其人的世界观。这些人之中突出的有天才外交家，后来当上外交部长并制定过很多公民改革方案的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1800—1858)；有百科全书式的渊博学者，掌握好几门外语的太医和官方历史编纂家阿塔乌拉·穆罕默德·沙尼扎德(卒于1820年)；有苏丹私人医师继承人，国家现代医学教育组织者之一穆斯塔法·贝赫切特(卒于1833年)；有东西方语言专家，高级文集翻译，军事学院教师，医学和数学书籍作者霍扎·伊沙克；有官方历史编纂家，第一份土耳其文报纸《大事志》编辑(1831年起)埃萨德·埃芬迪(卒于1848年)等。

· 688

为发展十八世纪产生的实证论思想，十九世纪初的一些土耳其作者写了许多著作(政论的、训诫的、回忆录的等)，其中贯穿着需要科学进步和普及教育的思想。作者还要读者相信，掌握国家和国家机构某些环节的，应该是启蒙主义人士，而全权领导他们的又只能是具有启蒙思想的“公正”君主，君主则要依据有权威的法律制定出的“法规”办事。这类著作的独到之处是以伊斯兰教法典的若干条文来“论证”新思想的观点。同时，作者还以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号召人们运用西方的成功经验。

在那个时代的杰出文化活动家中，占有光荣一席的是诗人凯彻吉扎德·伊泽特·毛拉(1778年或1785—1829年)。他以神学的清苦教师开始自己的活动，最后占据了一系列重要岗位——麦加宗教法官、麦加和麦地那首席大臣等。有一段时间，马哈茂德二世及其左右亲信都保护过他。伊泽特·毛拉以敢于公开发表对土耳其内外政策的意见而出名。在支持苏丹进行改造的同时，他也激烈抨击国家的“歪风邪气”。作为一个口才卓著的演说家，他敢在大国民议会上当着君主本人的面讥笑那些主张同俄交战(1829)，并盲目相信必会取胜的达官显贵。他附议那些认为土耳其必败的少数人，而且向苏丹证明和平及与俄国保持睦邻关系的好处。然而，诗人却为他勇敢的洞察力付出了生命代价——他被流放并在流放地被毒害致死。

伊泽特·毛拉青壮年时期创作的诗歌收在一部文集里，冠名《春华》与

《秋实》。作者运用生动的口语成分，以便广大读者都能读懂他的诗。从一部篇幅不长的苏菲体(以其实质和形象体系而论)叙事诗《爱情之花》中，可以看出作者简化句式和减轻理解难度的意图。而带给诗人真正荣誉的著作则是《凯尚苦》(1825)这部多少带点散文情节框架的诗体(八千节两行诗)游记，描写他第一次流放时的有关事件：他去凯尚(东弗拉吉亚南部的一个小镇)的路途，在那里为期一年的逗留和回伊斯坦布尔的归程。通过对个人多舛命途的叙述，诗人以批判的眼光，有时以尖锐讽刺的口吻，甚至忧郁幽默的格调，来谈论国家的生活、首都与外省各社会群体的风俗习惯，描写外省生活的野蛮画面和当局的不法行为等。与此同时，诗人指出，他本人任职期间随时都在揭露盗窃国库者和其他有欺诈行为的人。全书贯穿着浓烈的公民感情。

这部多层面作品的特色，是过去年代的文学传统同书中得到鲜明精湛表现的新东西这二者的结合。伊泽特·毛拉把内容、形式、容量极为不同的插入情节、镶嵌故事、书简和文件(真实的与虚构的)、景物和肖像素描、日常生活场景统统融入了书里，它丰富的内容似乎获得了最自由的表达方式。

“游记”和回忆录文学传统及其所具有的合乎礼仪说法，惯用的描写手段，都有助于对这部著作的接受。利用既属于基本诗歌形式——梅斯涅维，又适于各种不同场合的格律诗(喀西达、嘎泽拉、凯特、鲁拜)写作，不仅使叙述有了活力，而且拓展了对这些形式的历来评价。比如《时世怨》，是用土耳其和近东其他国家文学中早已存在的批判乱世的形式写成的。作者以现实生活的新内容充实了它。许多景物和肖像描写具体而贴近现实，这使它不同于中世纪诗歌里那些华丽的抽象描写，也不同于人物的传记描写传统。伊泽特·毛拉笔下的个性，直接依赖于其社会地位，以及个性与作者相互关系的性质。比如，他以赞美语气、庆典风格写到宰相及其他类似大人物，尤其在写到苏丹的时候，就会用上所有描写统治阶级要人的传统手法，以及用在他们身上的特定修饰语和隐喻赞美词。

689·

《凯尚苦》赋予镶嵌的故事以重大意义。在一部作品的上下文中使用镶嵌故事的写法，其本身是很传统的。书里的故事都与情节总体相连，同时又具有独立性，风格和主人公则各色各样。伊泽特·毛拉强调事件叙述要有凭据，准确无误，确定了文件和书简的日期，而这些文件书简便构成了该书的重要部分。

对于土耳其文学中日益加强的启蒙倾向而言，这绝非偶然。诗人是一位土耳其语言改革家。《凯尚苦》的语言，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它的词汇并没有过多的极为复杂的阿拉伯和波斯成语，不是只有高文化读者才能看





伊泽特・毛拉《凯尚苦》
扉页及第一页 1881年版

懂。它运用的是日常表达法,有时具有方言色彩。

·690

书里引出一个新型抒情主人公,他个性鲜明,以当时少有的直率讲了些个人事情(想家、担心留在伊斯坦布尔的子女、为不见来信而坐卧不安、怕流放期间自己不安全等等)。他捍卫自己的生存权,走自己选定的生活道路,从来不顾诽谤者的风言风语。个性因素对当时的土耳其文学来说,是一种新东西。不过这里主要的是,作者兴趣广泛,他能从社会角度评价生活中的某些事实与现象。游记体裁使伊泽特・毛拉得以讲述岁月变迁,讲他本人承受了复杂时代的一切重负。与伊泽特・毛拉著作有内在联系的作品是齐赫尼・拜布尔特鲁(1795年或1800—1859年)的《传奇故事集》或称《传记》。齐赫尼・拜布尔特鲁是一本阿鲁孜诗集的作者,集子里除收入阿鲁孜体诗还收入了以民歌风的音节诗写出的科斯玛和德斯坦。这给土耳其国内外一些文艺学家提供了将齐赫尼列入民间口头诗人的理由。梅斯涅维体的《传奇故事集》里,包含了多种诗歌形式(喀西达、嘎泽拉和各种分节诗)和散文片断。他在许多地方接近《凯尚苦》作者的立场,以讽刺笔触描写首都和外省各社会群体的生活,讥笑身居要职人物的各种毛病,作扩展诗歌领域、简化诗歌语言的尝试等等。以此看来,在这里表现出了两位诗人所有的接触与交往。

如果说,十八世纪土耳其的先进社会思想,首先表现在一些作者的言论与书信风格(一些论文,驻外大使写的文章报告的片断等)同政论作品相近

的话，那么十九世纪前叶这些观点已经反映在诸如伊泽特·毛拉和齐赫尼·拜布尔特鲁这样一些作家的文学作品里了。

与土耳其文学正在到来的启蒙时代相联系的新东西，早期曾表现在诗歌里，后来这一作用便转向了散文。过不多久即将对土耳其整个文化产生决定意义的那些思想，暂时还只有少数几位作家赞同。不过一个世纪前已经证明文学发展转折点的某些倾向，在十九世纪上半期许多诗人的创作中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土耳其文学，正处在形成民族自觉意识的轨道上，其中有一种日益强化的倾向，就是以接近民间诗歌的形式反映人民生活。革新文学和使文学接近读者的要求，把土耳其作家的注意力引向民间文学。

特别普及的一种形式是沙尔凯，著名诗人瓦西夫·恩德伦鲁（卒于1824年）也曾以这种以民歌为基础的悦耳旋律进行过创作。他那些不时带点幽默的直率诗句都充满口语腔调，传统形式常被用来表达新颖内容。比如，他的两首塔赫密斯（由三十三和三十二节相应五行诗组成的抒情诗，两部分中的每个第五行都是一种特殊的副歌）遵循诗辩传统，本质上却是以母女独白形式写的寻常幽默小说。注重实际的妈妈想在女儿出嫁之前教她一些检点行为的经验：讨好丈夫，顺从公婆等等的礼节。姑娘大胆而调皮的回答，却说出了她对爱情与婚姻完全不同的看法：她不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认为那是在封杀受心灵支配的爱情。她将来也不会成为丈夫的附庸，因为她不是以金钱收买的奴隶。姑娘机智的言谈夹杂着尖锐的讽刺和放纵的玩笑，在不乏幽默的诗句里有着对中间社会阶层的风俗习惯和伊斯坦布尔生活方式的忠实描写。

诗人们利用了口头诗歌的节律及其形象体系。比如，阿基夫-帕夏悼念夭亡孩子的哀歌就是这样的。使文学语言风格接近城市中等读者接受水平的思想，只有穆罕默德·赛义德·佩尔泰夫-帕夏在他给自己的诗集所写的前言里声明过，可是那些诗也是用传统古典风格的阿鲁孜体写成的。

反过来，书面文学也影响到民间口头诗歌，其中常能听出东方古典大师创作的回声。许多民间诗人都利用阿鲁孜节律体系，不过一般说来，以音节构诗体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作品，揭示其独特性更为鲜明，突厥民间文学自古以来就以音节体系为本。易卜拉欣·德尔特利（1772—1845）和穆罕默德·赛拉尼（1807—1866）等杰出民间歌手的诗歌，向来都有深刻的社会内容和高度的公民精神。他们运用讽刺手段，有时也用不大显眼的真正民间幽默，来表达人民的愿望及对不合理秩序的抗议精神。

691·

进步倾向的发展导致土耳其文学质的飞跃，这在后来，当文学进入文学史的启蒙阶段时，便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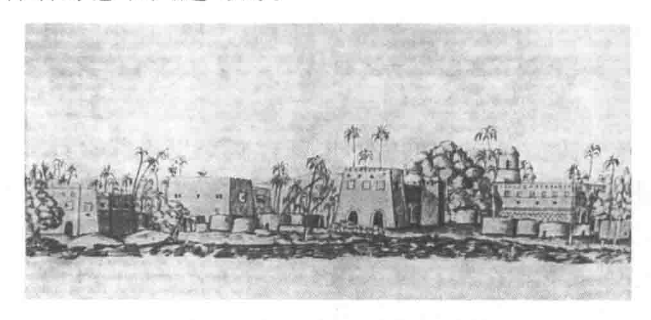
第二章 埃及文学

中近东各国十九世纪初以社会文化革新为标志，而埃及革新的外部推动力，则是拿破仑的远征（1797—1801），埃及人在拿破仑远征过程中实际感受到了欧式殖民化的威胁。后来的变化都与穆罕默德·阿里掌权时代（1805—1849）有联系。埃及脱离奥斯曼帝国得到事实上的独立以后，他就着手进行经济、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多项改革，这些改革促进了经济高涨，并为国内资本主义关系的后来发展准备了土壤。改造也触及了文化生活——出现了第一批以欧洲模式组织的世俗学校，有外国老师任教，派年轻人到法国去学习各种专业知识。翻译活动得到了开展，它不仅很快覆盖了教学和科技领域，而且覆盖了文学艺术。1821 年在布拉克市建立了第一家埃及印刷所。1828 年起出版第一份政府机关报《埃及新闻》。1835 年成立了一所译员学校（后来改为语言学校），学校师生翻译出将近二百种书。

埃及先进人士认为，与追求古阿拉伯文化复兴同样值得注重的，是认真接受新事物，并从现代任务角度研究新事物。在这一过程中，阿里-爱资哈尔宗教学校起到了双重作用。以保守主义堡垒著称的阿里-爱资哈尔，同时也是古代经典学术文学传统的保护者，它以这些传统的乳汁养育了阿拉伯的复兴。绝大多数早期埃及启蒙学者的名字都与阿里-爱资哈尔密不可分。这些人中有哲学家兼诗人哈桑·阿塔尔谢赫（长者，1766—1838 年）、阿里-爱资哈尔原任校长兼《埃及新闻》报首任编辑，著名词汇学家易卜拉欣·达苏基（1811—1883）、工程学院阿拉伯语讲师，许多欧洲东方学家的老师里法·拉费阿特-塔赫塔维等等。阿拉伯东方同欧洲的交往和接受欧洲文化的过程，最鲜明地反映在史学年谱和描写游历欧洲国家的利赫利亚体作品里。时代的先进人士当然首先产生了写新事物观察记的需要，所以这些作品对当代人的重要性就不仅取决于新信息的多寡，而且取决于思想是否新颖。历史材料中特别突出的，是拿破仑入侵目击者贾巴尔蒂（1754—1825）最早撰写的《昔日怪事》。

以利赫利亚体写作的人当中，首先应当提到的是里法·拉费阿特-塔赫塔维（1801—1873），他是穆罕默德·阿里派往法国的首批留学生中的神学院学员，后来当了语言学校的校长和组织者，是早期埃及文法国文学翻译家之一。他翻译了费纳隆的《忒勒马科历险记》（贝鲁特，1867 年）；还有一本很有意思的巴黎札记《巴黎记事提纯》（布拉克，1834 年）。在这部著作里，他不仅写到法国首都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写到它的文化机构（特别是剧院），还讲到自己亲眼目睹的 1830 年 6 月革命，并议论起宪政和自由

平等博爱等问题。在法国时，他阅读过孟德斯鸠、卢梭和其他十八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学家的著作，此时他的议论便以他们的论述为据。拉费阿特-塔赫塔维在他的札记里，加进了很多《古兰经》和哈底斯（圣训）的引文，力求以此证明，无论新思想还是欧洲方式的社会生活，同伊斯兰教都没有矛盾；相反，伊斯兰教教义对这些早有预见。使人产生浓厚兴趣的，是至今未发表的一部俄罗斯札记《透析俄国相关资料的赠礼》（约1850年），作者是应邀前往彼得堡讲阿拉伯语的爱资哈尔学校教长穆罕默德·艾亚德·阿特-塔恩塔维（1810—1861）。札记除了记录旅游，还写了俄国简史和《俄国人风俗》随笔，里面除了纯粹的日常生活内容，还有不少篇幅写到俄国文化，而且作者是怀着好感和兴趣写的。



埃及风景画《德尔·哈比亚德》
Д. К. 谢加托画 1819年 卢卡国立图书馆藏

一种广泛利用启蒙主义学家阐述各种政治、社会、宗教、哲学问题，并普及科学知识的政论文章马卡拉，成了十九世纪的新颖散文体。这种依靠欧洲政治发展起来的体裁，也有它自身的民族基础：一方面，演说辞是阿拉伯人当中源远流长的普及艺术，它的传统常被用来适应现代性要求，另一方面，有一种寄语或论文叫里萨拉，根据其宗旨既可用作修饰性的也可用于严格学术性的散文。

报刊、政论、学术和文学著作译文，都刺激了阿拉伯文学语言的革新，而传统主义者却极力保护其标准不变。在革新语言和文学风格中作出贡献的，还有史学著作和旅行记，后者的内容与最新时尚紧密相连，表现了人们不常见到的新奇现象。既然这些体裁不要求固定修饰风格，其语言形式也就更容易与内容和谐一致。

诗歌和艺术散文等传统体裁，历来都受严格标准束缚，革新进展很缓慢。收入十九世纪上半叶诗人文集的，通常是以伪贝陀因人精神写出的华丽颂辞，记录当地事件发生日期的深奥表年诗，骑士爱情诗，以文字游戏为基础的俏皮笑话。以高雅押韵散文写出的寄语和玛卡梅体作品，都在重复

著名而有教益的情节。复兴古代遗产的意向既表现在研究、注释和出版古代和中世纪名家的文集上,也表现在一些诗人(例如阿里-阿塔尔)模仿他们严谨风格的试作里。这时期文学家的特点是无所不会,对各种各样的艺术和学术体裁,都能面对和尝试。比如哈桑·阿里-阿塔尔,除了诗集,他身后留下的还有寄语、语法、演说术、逻辑学、医学和天文学书籍。他的弟子哈桑·阿里-库瓦伊迪尔(1789—1846)是诗人、哲学家,又是尺牍大师。阿里·阿德-德尔维什(1797—1853),是埃及总督阿巴斯一世的宫廷诗人,又是很多诗、歌、玛卡梅和训示作品的作者。

第三章 叙利亚文学

·693

叙利亚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口众多(某些地区达到居民百分之五十以上),自古以来与意大利和法国交往密切。叙利亚印刷事业的产生,比埃及早一个世纪。十九世纪随着西方对地中海国家兴趣的增长,基督教传教士们的活动也活跃起来,耶稣会(来自法国)和新教(来自美国)传教士尤其多。教会学校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精神武器,不过客观上在传播现代教育和启蒙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传教士们出版许多文学教材,促进了翻译活动的开展。十九世纪叙利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由教会学校或本国欧式学校的毕业生组成。

1847 年成立了一个"精通科学艺术协会",协会宗旨是"以辩论,通信,口讲和通报方法研究科学艺术","以语言文字消除精神隔绝和迷信","唤起对获取知识和利益的普遍向往"。协会曾举行公众报告会,组织普及知识演讲,出版包含各种材料的"著作",支持新文化创举,收藏大量图书。协会活动家赞成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成就,同时也十分尊重和重视古典文化遗产,从事古典文献的出版工作。

协会的积极成员有:纳赛夫·阿里-亚济吉(1800—1871),他是黎巴嫩埃米尔(酋长)贝希尔二世谢哈布的书记官,纯语主义语言学家,甚至在穆斯林当中也被认为是阿拉伯语最优秀的鉴赏者,曾编写过不少当时最有权威的语法教程和修辞学教程。另一位是布特鲁斯·阿里-布斯塔尼(1818—1883),叙利亚本国第一所非教会学校(1863)的奠基人,反映语言变化的大型阿拉伯语词典《洋环洋》(1866—1869)的作者,第一部欧式阿拉伯文百科全书《知识圈》(1876)的组织者兼编辑。

科学知识、欧洲文明的现代成就、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报刊进行普及,而且协会成员都积极参加报纸和杂志的编辑工作。除了政府在大马士革、阿勒颇和贝鲁特的官方出版物之外,五十年代起又有《消息园》、《园地》等报

纸相继出现。有几种报纸在巴黎、伊斯坦布尔和伦敦等地出版。除了纯粹信息材料，叙利亚报刊还刊登了许多各种题材的科普文章，以及本来取材于欧洲资料却被阿拉伯化，以致改得面目全非的中短篇小说。

这里的文学语言革新过程与埃及的同类过程，是平行进行的。但如果说在埃及首先涉及的是自然科学技术词汇，那么在叙利亚很大程度上触及的就是与社会生活、人文学科和哲学有关的语言层面。

像埃及一样，利赫利亚体作品的内容得到了革新。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充满生活细节描写的巴黎旅行记《法里雅格谈天录》（巴黎，1855 年），作者是黎巴嫩人，被 A. E. 克雷姆斯基称之为“新阿拉伯文学的布兰贝乌斯男爵”的艾哈迈德·法里斯·阿什·希德亚格（1804—1887）。诗人、政治家、语言学家，为复兴古典遗产形成新文学作了很多事情的希德亚格从基督教改信伊斯兰教，成了土耳其统治的狂热捍卫者。用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他那些批判性言论，他对欧洲生活的某些方面，风土人情，甚至对法国教授运用阿拉伯语言中的某些错误所进行的嘲笑。他自己还通过运用格律，引用诗

694·

句，词音重叠等向读者炫耀他掌握古典修辞的功底。指出这一点是很有意义的，《谈天录》不是作者旅途观感的简单记录，而是创作带有虚构主人公和鲜明讽刺场景的长篇游记小说的一次尝试；讽刺不只涉及法国人，连墨守成规的阿拉伯人也未能幸免。

这时期诗人们的创作基本上继承了中世纪宫廷诗歌的传统。诗星都集中在黎巴嫩埃米尔贝希尔二世的宫廷里。其中的尼库拉·图尔克（1763—1828），绰号俏皮话大王，不仅以其歌功颂德之作，而且以其讽刺诙谐诗歌闻名，有时写些相当“低级”的题材，比如跟埃米尔的管家吵架，因为后者在计算诗句的时候给诗人少算了，等等。他颇有知名度还因为他是写拿破仑入侵埃及的历史学家，是以幽默笔调详细描写贝希尔二世宫廷风俗的玛卡梅诗的作者。比尼库拉·图尔克年轻的同代人——布特鲁斯·卡拉米（1774—1851），是诗人兼外交家，以颂文风格高雅而享有盛名。他创作中的精巧范本，古典语言的极致是称作《阿里—喀西达　阿里—哈里亚》的一首诗，二十三行诗以同一个词“哈里”押韵，表达的却是这个词的二十三个义项。

贝希尔二世最大的颂文作者，是上面已经提到的纳赛夫·阿里-亚济吉，那个法国作家拉马丁在他的东方旅行日记里极力称道的一个人。除了语言学著作，他还留给后人几部古风集，其中既有充满华丽比较法的喀西达诗，也有具有训示倾向，已经成为谚语的哀歌，还有机智奥妙的表年诗……玛卡梅诗集《两海汇》（1856）也是亚济吉的作品，他曾说过，编辑文集的目的就是教给读者尽量多的运用古词的有益规则。

十九世纪以产生几乎没有本国传统的戏剧而著称。世纪中叶全阿拉伯世界熟知的只有影戏卡拉格兹。叙利亚懂得欧式戏剧概念大约是在十八世纪，而且是通过教会学校了解的，因为每逢节日都有那里的学生演剧。剧本通常是历史或道德内容，教师们自己把它们翻译或改编过来。



纳赛夫·阿里-亚济吉
版画照 选自《伊·尤·克拉契科夫斯基选集》
第三卷 莫斯科 列宁格勒 1956年版

公认的阿拉伯戏剧之父是马伦·安-纳卡希(1817—1855)，他是一位贝鲁特商人，去意大利经商期间接触到欧洲戏剧，而且产生了创办阿拉伯剧团的强烈愿望。在组织起戏剧爱好者小组之后，纳卡希翻译加工了莫里哀的喜剧《悭吝人》，并于1848年把它搬上家庭舞台。随后又演了两部喜剧《大大咧咧的阿布-里-哈桑》和《妒忌狂》。有人认为第一部戏是莫里哀的喜剧《冒失鬼》的加工，第二部则起源于《贵族中的小市民》。戏剧演出时伴歌伴舞。所有喜剧剧情都发生在阿拉伯人当中，名字、事由、场景，一切都阿拉伯化了。

与欧洲作品的改写和取材于历史情节（其中最叫座的是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相关的情节）的剧本一起，出现了一批纯粹阿拉伯内容的剧本。七十年代才出现阿拉伯职业剧团和剧目，那已经是阿拉伯国家启蒙主义思想和艺术文化发展下一阶段的事情了。

第四章 伊拉克文学

十九世纪初，伊拉克是近东最受奴役的一个国家，它是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边缘省份，流放犯人的地方。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些激发埃及和叙利亚等国阿拉伯改革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也没有深入到伊拉克并引起什么社会共鸣。在伊拉克有教养的人士中，流传的是传统诗歌作品、历史年谱和纪实、《古兰经》解说、神学、哲学和民族学初探、游记、韵文体和散文体谜语、趣闻逸事、笑话大全等。流传最广的是颂文。伊拉克颂文作者的基本思想，都取自世世代代灌输到阿拉伯各族人民意识中的奥斯曼意识形

态武库，因为奥斯曼苏丹是伊斯兰教徒的哈里发(元首)，宗教的保护人。

诗人及其鉴赏家在模仿经典作家方面，显得风采迷人。伊拉克省长总督们的颂文作者兼史料编纂人萨利赫·阿特-塔米米(1776—1845)模仿了阿布·塔马姆(九世纪)，像那位老祖宗一样，以非常复杂的短语，陈腐过时的古语词汇来充实诗句。一般说，诗人们在写作颂文的时候，都用传统文学中的陈词滥调，也总是把当代统治者同以往世纪的著名穆斯林活动家，以及哈里发的理想化形象加以对比。不过在有些颂文作者的诗歌里也常常反映当代生活事件。比如，阿特-塔米米在颂扬达乌德-帕夏(1817—1831)建筑大批清真寺和学校的时候，顺便带出地方官吏出错而造成水坝被毁的事情，讲到了他们缺乏道德而想发国难财。诗人以谨慎的方式提出建议，如何着手灌溉，修复水坝，开凿和清理运河，完善城市公用设施等。

阿卜德·阿里-巴基·阿里-奥马里(1790—1862)在巴格达的土耳其行政机关身居要职，曾给土耳其苏丹本人呈递过一些谏辞。他的《斗篷喀西达》是当时伊拉克最流行的作品之一。当时人对这首诗推崇备至，因为它是阿拉伯东方上百首模仿同名诗中模仿得最好的，原诗作者是阿拉伯人自古喜爱的埃及人阿里·布赛里(十八世纪)。在这首每五句半诗组成一个诗节的塔赫密斯里，阿里-奥马里以其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词藻华丽、词汇丰富和诗才横溢使同辈折服。

在呈献给省长总督们的官方谏辞中，阿里-奥马里描写了对人民起义的镇压，替当局的残酷行为辩护。诗人经常强调他对朝廷及其代理人的忠诚。他在炫耀自己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对奥斯曼帝国政府的忠诚时，像许多其他伊拉克诗人一样，颂扬了援助过苏丹的英国和法国。

阿里-奥马里由于他的歌功颂德诗篇赢得逊尼派奥斯曼人的信赖和支持，他的宗教诗篇又使他得到了什叶派阿拉伯人的承认。他的文集《好人遗迹》(1854)非常流行。在这部文集里他猛烈抨击倭马亚王朝人士，因为他们把哈里发政权变成世袭政权，而“虔诚的哈里发君主们”在世时，政权是选举出来的，是协商性的。阿里-奥马里通过宗教颂文在歌颂穆罕默德、阿里和阿里-侯赛因之后，还赞美那些“神圣的”苏菲派教长，伊拉克众多苏菲教派对此交口称赞。

在另一部文集《明辨善恶者掌权的灵丹妙药》(开罗，1896 年)里，阿里-奥马里通过仿古表现出新文明渗入伊拉克的影响。文集中刊登他谢世前几个月写的一首诗，是阿拉伯东方歌颂新时代技术成就的首批诗歌中的一篇，讲的是伊斯坦布尔至巴格达电报线路的开通(1861)。随着这篇沃斯弗的出现，伊拉克诗人们越来越想把文明成就当作诗歌的财富，并以这种方式来扩大社会题材。

这一时期启蒙主义思维的最初萌芽开始闯入伊拉克文学(阿拉伯文艺学家称该阶段为文学高潮时期)。许多伊拉克文学家逐渐形成一种不仅对异族压迫,而且对封建主义现实的激烈反对态度,他们尽其所能支持普及知识和改善居民生活,并将其诉诸统治者的“健全头脑”和善良感情。

这种情绪经常从阿布德·阿里-加法尔·阿里-阿拉斯(1806—1873)的颂文作品里流露出来。他有一首颂文,在歌颂残酷镇压卡尔巴达和巴士拉两地居民的苏丹驻伊拉克代理人时,通过传统的夸大手法慢慢替两地居民开脱,并小心翼翼地提醒无情的统治者应以慈悲为怀。他用前伊斯兰诗歌精神所写的优秀喀亚达中,有一篇是献给达乌德-帕夏的,后者是诗人先前的靠山,现在因失宠而倒台。喀西达以贝陀因-扎希里诗风格写成:诗人骑马奔驰在草原上,在目睹早已废弃的宿营地时,流下了热泪,因为他想起了曾经同达乌德在这里共同度过的那些幸福时光。不怕苏丹发火的阿里-阿拉斯就以这样的方式,表达了对达乌德的忠诚,用他的话来说,一切美德都同达乌德一起从伊拉克消失了。

同辈人还喜欢阿里-阿拉斯的酒诗,它很像阿布·努瓦斯(八至九世纪)的同类诗歌。他的哲理抒情喀亚达艺术精湛,每个拜特(两诗行构成一诗节)都以渗透着悲观色彩的箴言结尾,有阿里-穆塔纳比(十世纪)晚年的诗歌精神,也有阿里-马里(十至十一世纪)的痛苦沉思:人生在世时间短暂,死亡吞食一切的不可避免等。

从十九世纪初开始,伊拉克社会深处一股不满外国人统治的情绪成熟起来,不时流露在公开言论中。但是这种缺乏组织分散零乱的言论,常被土耳其当局以残酷手段压制下去。所有这些都不可能不反映在伊拉克文学家的创作中。比如,阿里-阿拉斯歌颂因残暴而声名狼藉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时,又用讽刺诗讥笑了那些土耳其当权者。他在一些诗篇里号召同胞们行动起来反对土耳其人。不过在后期诗歌里,他放弃了民族解放的希望。在他一些塔赫密斯里谈到,伊拉克人除了侨居国外没有其他生路。在一组写到不安分诗人马哈茂德·本·阿布德·阿里-加尼·阿里-扎米勒(1780—1863)的诗歌里,特别能看出他的诗歌所具有的那种特殊的感情紧张性。诗里清晰地暴露出他否定社会不公,反对外国压迫者施暴的叛逆志向。1832年阿里-贾米勒被驱逐出伊拉克之后,他曾宣布,他要担当起友人的责任,继续同自己所仇恨的奥斯曼制度作斗争。受外国当权者侮辱的民族感情,是这组诗歌的经常主题。诗歌里值得一读的就是那不只一次提到的,称作“阿拉伯思想”的东西,它与民族自觉意识的增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阿里-贾米勒像阿里-阿拉斯一样,以一个军人诗人的姿态出现在自己

的诗歌里，能够激起战友胸中对敌人的深仇大恨，也能以胜利者的身份走出浴血的战场。他诗歌的形象朴实无华，毫无传统的修饰。他对贝陀因人的勇敢精神和战斗技能赞叹不已，他只把解放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依他看来，城里人既娇嫩又顺从，没有能力进行反抗。虽然阿里-贾米勒和阿里-阿拉斯一样，以最阴暗的笔调描绘伊拉克的情况，但他仍然相信解放已经为期不远。

在当时伊拉克文学中留下最明显痕迹的，是阿里-贾米勒反奥斯曼斗争中的亲密战友马哈茂德·谢哈布·阿德-丁·阿里-阿柳西(1802—1854)，他是诗人兼散文家，语言学家兼神学家。他死后出版了四部文学著作，其基础都是充满起伏的生活事件。这四本书是《异地他乡奇闻怪事与出境游魂，或国外逗留及归程》、《出游伊斯坦布尔，陶醉万象知识乡》、《宁城返途醉酒》和《阿里-阿柳西玛卡梅》(1857)。他的《玛卡梅》属于书信体文学。这本足资垂训的书简集服从一个统一的构思：阿柳西把这些书信写给自己的子女，希望同他们分享生活的经验，培养他们批判地接受现实的精神。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用传统萨治体(押韵散文)写成的。从他的作品范本可以看出，伊拉克散文是怎样逐渐分解为学术散文和文艺散文的。他以大量具体信息充实自己的作品，使伊拉克文学接近现实。阿柳西扩展了玛卡梅的体裁范围，把游记、寄语、训言、传记、回忆录交织在一起，为新文学散文的出现创造了前提，因为在诞生中的伊拉克散文里，各种体裁形式尚未来得及找到自己的准确表达法。

虽然伊拉克各代文学家的继承关系从未间断过，那里的文学舞台上也经常出现大人物，这个国度的思想和形象演变还是极其缓慢。与其他民族文化载体失去联系的伊拉克文学家，只能从自己的阿拉伯穆斯林文化遗产中寻求一点支持，所以没有一个当地文学家具有国外知名度。不过也正由于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伊拉克作家，把社会思想引上了民族解放运动和启蒙主义思想的轨道，他们的贡献才特别巨大。

第五章　库尔德文学

十九世纪初以前，多方言的库尔德文学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画面，以北方库尔曼吉方言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古典主义诗歌，十七世纪最为繁荣，十八世纪中期开始走下坡路。十八世纪末，这种文学同它富于特色的民间传统中断了联系，成为苏菲派教长、库尔德封建主的宫廷诗人等一小群人的财富。十九世纪初库尔曼吉语文学的题材仅限于隐秘抒情诗、颂诗和宗教神秘诗的狭小范围。

十九世纪继续存在的还有戈拉尼方言文学，主要表达“真理”教派的思想、观点和情绪，诗歌的主要题材是渗透浓厚神秘色彩的宗教哲理诗和言情写景的抒情诗。以这种方言写作的最杰出诗人，是才情横溢的大自然歌手毛拉维(1806—1882)。

十九世纪产生并继续向前发展的，是南方索拉尼方言文学。十九世纪以前这种语言从来没有作为文学语言在库尔德人中间存在过，后来索拉尼语文学脱颖而出并占据首位。这一文学诞生于苏莱曼尼亚地区，苏莱曼尼亚曾作过库尔德公国中最强盛的巴班酋长国首府二百年。巴班酋长国不把徒有虚名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政权放在眼里，它不仅保持了事实上的独立，而且在整个近东起到了不小的政治作用。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库尔德诗人作品很少，但可能存在过丰富的索拉尼方言诗歌。十九世纪最大的库尔德诗人之一哈吉·卡迪尔·科伊就曾写道，住在“基尔库克草原和阿夫罗曼山上”他的同辈库尔德诗人，“多得不计其数”，而且提到过菲克里、兰如里、凯菲、埃明·贝克·达扎伊·马什维、瓦法伊等的名字。

新文学特色体现在以下诸方面：有点疏远传统题材(讴歌爱情、歌功颂德、宗教神秘主义的神魂颠倒)，尽可能简化诗歌语言，向民间语言靠拢，还有最主要的一点——做些表达人民切身需要和夙愿的尝试。尽管巴班酋长国有相对优越的条件，但整体来说，库尔德人的政治环境还是极其恶劣的，因为巴班当局同奥斯曼当局经常发生冲突，各省库尔德人不断举行起义，这些起义又势必为奥斯曼当局和伊朗当局所残酷镇压，这都给维护母语文学生存权利造成相当不利的条件。

新文学是在缺乏民族文学遗产的情况下，坚持发展起来的。所有处于阿拉伯和波斯古典主义诗歌影响下的前辈库尔德巴班诗人，都以古典主义传统精神写作，都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创作作品。

索拉尼语文学传统的起源，同诗人纳利(哈迪尔·艾哈迈德·纳利，1800—1856年)的名字密不可分。纳利及其追随者萨利姆(1800—1866)和库尔迪(1812—1852)深刻意识到，只有以祖国语言为基础民族文学才能顺利发展，所以他们大声疾呼，消除阿拉伯化和波斯化倾向，为纯洁诗歌语言而斗争。他们努力塑造清晰而简朴的形象，结果以阿拉伯—波斯经典诗歌形式写成的诗句，确实能使库尔德读者感到亲切易懂。诗人们遵循中近东经典诗歌传统，利用阿鲁孜诗体形式，通过自己的诗作传达出民族精神和色调。这对纳利来说是极富代表性的，由于他的诗歌形象和词汇质朴而清晰，常常被当作民间文学作品来接受。

·698

降临到诗人祖国头上的横祸——奥斯曼大兵压境下巴班酋长国的灭亡——在纳利及其同代人作品中得到了生动反映。诗人及其追随者歌颂库

尔德英雄们的战绩和荣耀，赞扬库尔德诸公国昔日的强大无敌，为公国的灭亡而痛悼，为失去的家园而悲伤(包括纳利在内的大部分库尔德巴班诗人被迫流落他乡)，而且激烈抨击了伊朗和土耳其的奴役者。萨利姆在他那首著名诗篇《留下我吧》里，痛悼巴班酋长国的悲惨灭亡，叹道："啊，破碎的心，作为教训瞧一眼时代的遭遇吧，/瞧一瞧，土耳其人和命运对口操库尔德语的人们都干了些什么!"

库尔德讽刺诗的奠基人是谢赫·礼萨·塔利巴尼(1842—1909)，他诗歌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主题显得更为尖锐，并极富社会倾向性。他的创作充满了对社会不平等和不公正的不可调和性，谴责了富人政权的卖身投靠和贪图私利，神职人员的虚伪道德和假仁假义，并在库尔德社会进步民主观点的形成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诗人嘲笑社会不平等的扭曲现象道："如果一贫如洗的穷汉仅有一个缺点，它会为众人所知;/一个腰缠万贯的阔佬，即使他有无数恶习，也会隐蔽得密不透风。"

纳利追随者的诗歌里的爱国主义和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主题，他们用祖国语言创立为人民利益而服务的文学之追求，以及使诗歌语言大众化和民主化的倾向，部分地继承了艾哈迈德·哈尼(十七世纪)的创作探索，从而也部分地成了十九世纪上半期库尔德人的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自然发端。

哈吉·卡迪尔·科伊(1816—1897)是最大诗人之一，也是库尔德人起义的歌手、启蒙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他的诗歌力图唤起库尔德人的民族自觉意识，动员他们去同民族压迫、无权地位及落后现象作斗争。诗人仍处在阿拉伯—波斯古典主义诗歌传统的强烈影响下，可是他开始逐渐远离那种故弄玄虚的诗歌形式，甚至责备他同代人的这个弱点："作诗手法如此大量滋生，/以至诗句的意思消失于它们之中，/意思被抽掉，不再是掉价的事情。"

这一时期诗人创作了大量嘎泽拉体抒情诗，歌颂恋人的美丽与魅力。诗人的诗句是写给百姓的，以鲜明生动的语言写成，诗里的形象贴近普通读者，他经常面向库尔德民间文学，从中摄取很多形象。诗人曾公开声言，清真寺已经变成淫荡、吵架与胡闹的基地和源泉，宗教学校也成了野汉、酒徒、浪荡子聚集的地方。

哈吉·卡迪尔·科伊的反教权主义情绪和对神职人员的公开抨击引起他同库尔德社会权势集团的尖锐冲突。诗人被迫离开祖国流落国外度过余生。他移居伊斯坦布尔，在那里同贝迪尔汗家族保持密切联系，贝迪尔汗曾是最杰出的库尔德文化活动家之一，著名的进步和教育事业捍卫者。诗人在那里接触了当时传播于进步土耳其知识分子当中的法国革命思想和启

蒙主义思想，这些思想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谈及贝迪尔汗本人在形成哈吉·卡迪尔·科伊创作中的作用时，他的传记作者吉夫·穆克里阿尼写道：“科伊接过贝迪尔汗热爱人民的美酒一饮而尽。”对哈吉·卡迪尔·科伊世界观形成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他在伊斯坦布尔结识的一群坦吉马特作家的作品。

哈吉·卡迪尔·科伊在他本国同胞的诗人中感到很孤单，因为他的作家同行主要写自己的切身感受，很少反映当代社会问题。落在哈吉·卡迪尔·科伊肩上的是一项艰巨使命——单枪匹马地为库尔德新文学开路。他的巨大诗歌才华和对人民的忘我关爱，使他得以完成这项任务。

哈吉·卡迪尔·科伊在后来的创作中，公开反对祖国的经济和社会的落后，号召部族联合起来，为反对暴力、压迫和无权地位而斗争，所有这些都如同一股生机勃勃的清爽气息流进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库尔德启蒙主义文学。

第六章 波斯文学

封建族长制关系的统治，没完没了的破坏性战争，以及内讧、沙阿君主制政权的专横、贫穷与落后——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十八世纪末伊朗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衰退。关于敲诈勒索、经济崩溃、人民难以承受的艰苦生活，都可以由文学家提供的材料，如著名伊朗诗人谢赫·阿里·哈金的旅行日记而作出判断。

十八世纪末伊朗新卡扎尔王室掌权，采取了一系列中央集权和稳定国内情势的措施，但封建独裁秩序依然如故。

可是，不惜重金发展后宫，举行盛大宴会，豢养为国王唱赞歌的宫廷诗人，却使新沙阿宫廷变得繁华起来。那些极力在国王和朝廷显贵面前，或在地方省长总督面前歌功颂德的人，其数量日益增长。十九世纪上半叶，宫廷出现了不少首先以喀西达诗扬名的诗人。喀西达是一种专门歌颂国王、亲王或达官显贵的颂诗，它推动着诗人以写作来捞取功名利禄。每个诗人都想在荣华富贵方面超过自己的同行，与他人在精湛诗艺方面竞争，以表现自己在模仿古波斯诗歌和运用写诗技巧方面的非凡才能。他们当中最大的诗人是法萨里汗·萨巴（1770—1822）。他是卡尚人，因写赞美诗而获得禄超所值的重赏，并当上了库姆和卡尚两地的省长和库姆陵区的护陵人，这在当时是个很受尊敬的肥缺。他由于为法萨里国王登基写了一首喀西达而荣膺了最高封号——诗王。他写过二百多首喀西达，大量嘎泽拉、马斯纳维、塔尔吉邦德、鲁拜和凯特。不过这位宫廷诗人的创作高峰，还是他

模仿菲尔多西《王书》而以同一韵律写出的叙事长诗《大王书》。萨巴在《大王书》里千方百计抬高法萨里王的统帅才能，把战胜俄罗斯军队归功于他，虽然尽人皆知，由伊朗方面挑起的两次俄伊战争，都以伊朗的失败而告终。国王喜欢诗人毫无节制的吹捧，而且当四万节诗的大王书呈递到国王手里的时候，国王立即赐予诗人四万佐洛特尼克（每佐合 4.26 克）黄金，每两行诗（一节）一佐洛特尼克。萨巴同代人曾十分赞赏这部叙事诗，但后来它作为菲尔多西《王书》的拙劣仿作，而受到指摘并被人所遗忘。

萨巴在他一些诗篇里讲到善恶斗争、金钱势力和一些凡人琐事："如果你有头脑而无金钱，/人们会把你轰走。/哪怕你劣迹斑斑，/只要有钱，你也将无可替代。"

萨巴写过不少抒情诗，使人明显感到模仿哈菲兹的意图。诗人的语言照例很传统，词句常常显得复杂，文绉绉的，不过意思的表达要比前几世纪的诗人都明白。

另一位宫廷诗人赛义德·阿卜杜勒瓦哈特·涅沙特·伊斯法哈尼（1761—1829），也是颂诗文作者，不过他同萨巴有区别，是个善于交往，谦逊朴实的人。他的魅力与才华吸引了很多诗人。在其周围自发形成了一个"文学协会"，每周朗读一次优秀诗篇，诗人很快在德黑兰出了名。他一首歌颂国王英明的喀西达引起君主的注意，君主命人发给他五千图曼（金银币）请他进宫，于是他得到了表现自己修辞能力的机会，给国王编写了各种各样的国家文献。涅沙特和萨巴一样，通过嘎泽拉、鲁拜和喀西达吹捧国王，不过以诗歌天赋而论，他是个抒情诗人。他的嘎泽拉以其优美雅致和对大自然及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见长。他的文学偶像是他在很多方面刻意模仿的萨阿迪和哈菲兹。涅沙特还遵照萨阿迪散文词藻华丽的传统，写过一些短篇小说。他虽然没创建起自己的学派，但以自己的创作对波斯文学作出了一定贡献。

当时的波斯诗歌不限于这两位大诗人的创作，同时进行创作的有十几位宫廷诗人，像赛义德·侯赛因·塔巴塔巴依·梅兹马尔·阿尔德斯坦·伊斯法哈尼（1776—1810）、米尔扎·穆罕默德·沙菲·维萨里·设拉子（1779—1846）及其他一些人，都在文学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十九世纪欧洲列强开始向伊朗扩张，伊朗扩大了同俄国、英国、法国，甚至同土耳其的经济文化联系。一方面，这个过程使保守知识分子更加信赖传统和以对抗整个欧洲事物为目的的宗教；另一方面也加速了西方文明向伊朗的渗透。封建制度的危机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那些到过境外的宫廷人士开始坚决要求进行某些改革，不过这改革不要触动国家制度的基本原则。

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引进书籍出版。随着十九世纪初印刷事业的发展，开始先在大不里士(1825)，后在德黑兰出版宗教书籍和官方世俗出版物：历史年鉴和波斯文报纸先后在德黑兰(1837)，过一段时间也在其他城市出版，到十九世纪中叶报纸已定期出刊。某些半官方报纸表态支持在国内进行社会改革。

十九世纪最初十年，开始了教育领域的改革。伊朗政府开始选派青年人到西方国家留学，并邀请那里的工程、军事专家和医生教师来伊朗工作。1851 年在德黑兰，后来在其他城市开设了一批工科学校，取名"科学馆"。科学馆培养了一批各门学科的专家，翻译了一批教材，编出了若干有创意的历史年鉴、地理记述和词典。那里先出现了西欧和俄国文学作品的首批译作(《彼得大帝的故事》、《查理十二》、《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等)，稍后科学馆的学生们便亲自动手创作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型启蒙题材文学作品。

简化文体成了至关重要的工作。这方面的拓荒者是诗人兼作家米尔扎·阿布利卡塞·卡恩-马卡姆·法拉哈尼(1779—1836)。他是新散文风格的创造者，以漂亮的文笔久负盛名。他的创举又被同代诗人穆罕默德·法泽利汗·加鲁西(1783—1852)所掌握。法泽利汗很早就开始写诗，入宫后几年间，他掌握了文学原理、遣词造句、阿拉伯语语法及其他几门学科。他的诗歌大多具有抒情性。他像许多同辈诗人一样，爱写传统的嘎泽拉体诗，赞美意中人，为其伤心流泪，求其怜悯宽恕。但他也写诗抱怨命途多舛、伤心委屈的作品，他宣传科学、知识和正义。

与法泽利汗有深交的著名俄国东方学家 H. B. 哈内科夫曾这样描述，诗人在对社会罪恶进行斗争时的坚决果断和原则精神："为某种不义或人间恶德所震惊的他，以铁一般的猛烈诗句痛斥那些东西。他的诗句自始至终充满主子棍下的某种激烈讽刺，某种病态的含泪的笑，某种伊索式的佯装恭顺。"法泽利汗加入了因格里鲍耶陀夫被害而到俄国去赔罪的伊朗使团，并在高加索遇见了普希金。

阿米尔·卡比尔(1805—1852)的启蒙活动，在十九世纪上半期的伊朗具有很大意义。他是多项改革的倡导者。启蒙主义思想(期待限制王权建立法治国家，同城乡专横残暴行为作斗争，要求改善生活条件，进行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在伊拉克先进知识界进一步成熟，并对开始显出变化的书面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世纪初首次出版发行了矛头指向法官臆断的尖锐讽刺作品。作品按著名古代寓言故事原则编写；又比如讲到，一个城市的商人犯了罪，遭到处决的却是另一个城市的木匠。

波斯诗歌的变化特点十分明显。十八世纪已经开始了简化诗体的运

动，主张把中世纪诗歌的繁难复杂文体变成简洁优美文体，就是被称之为呼罗珊或土耳其斯坦的文体，这一运动的影响波及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

本质性的变化还表现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诗歌内容中。举例说，这些变化也表现在颂文作者哈比布拉·卡尼(1808—1854)的创作中，人们都认为他是伊朗的最后一位宫廷大诗人。他除了大量喀西达诗外，还发表过一部讽刺作品《慌乱者书》，以散文体写成，加以韵文装饰，类似萨阿迪的《古利斯坦》或者贾米的《拜哈里斯坦》。在这本书里，他写到贪赃的教长和枉法的法官，抢劫穷人的小偷，压迫无辜者的行为，也谴责了酗酒和淫荡。在一组训诫诗里，诗人还对统治者教训了一番，奉劝他们不要欺人太甚，要顾及国库收入，鼓励学艺，发展贸易等等。卡尼的《慌乱者书》，是一部批评当代现实的早期小作品。那时的这种言论是公民勇气的表现，同时也是世纪中叶社会思想和文学发生变化的标志。颇有意思的是，如此勇敢之举竟是宫廷诗人所为。



波斯启蒙主义者、诗人兼国务活动家
列扎·库利-汗·赫达亚特 传统小型油画肖像
十九世纪 德黑兰 原沙赫图书馆馆藏

卡尼的同辈诗人阿布哈桑·亚格马·占达基(1782—1860)更为勇敢地揭露了封建秩序。他出身于一个不太富裕的家庭。一个地主收养了他并给他提供了学习机会，后来让他当了自己的私人文书。由于传统科学知识渊博，文学天赋出众，占达基不只一次荣获高级职位和荣誉头衔。但也由于刚直不阿，爱说逆耳之言，不只一次被贬，失去达官显贵的宠爱。比如，他在第一部叙事诗《盛气凌人》里，讽刺了自己的保护人之一，一个刚愎自用嘲弄属下的封建主，险些赔上自己的性命。占达基的另一部叙事诗《耻辱荟萃》，嘲笑一个殷实外省家庭的野蛮道德，作者又差点儿为它送命，虽然占达基的讽刺对象是具体人物，读

者还是很容易看出实际批评的是整个生活方式,整个社会制度。

亚格马·占达基写过各种各样体裁的作品。他在伊朗出版的抒情诗集(1866)收集了差不多二百件书信,一批优美的嘎泽拉、塔尔吉邦德、马斯纳维、鲁拜、哀歌和五部叙事诗。但在一生漫长的岁月里,他没有写过一首歌功颂德的喀西达。他以自己的诗篇揭露那些利用权力欺压折磨毫无过失的人们,一心只想发财致富的家伙。他毫无畏惧地谴责统治者的卑鄙残酷行为,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

上面提到的那些诗人,尤其是亚格马·占达基所写的反专制枉法诗篇,是那个时代的稀有现象。十九世纪中叶的伊朗,歌功颂德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独裁政权恣意横行,不能容忍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对于伊朗来说,亚格马一类诗人的言论,是极其重要的。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为新文学的顺利发展准备了条件,这种新文学形成于下一时期,就其本质而言,属启蒙主义文学。 ·702

第七章 阿富汗文学

十九世纪初,阿富汗还保持着1747年以后由于历代阿富汗国王的征战而形成的强国地位。但这期间爆发的封建上层自相残杀的斗争和加强大采邑土地所有制,却造成了中央国家集权制解体的后果。1818年阿富汗国分裂为若干独立的封建领地,阿富汗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统一过程又一次遭到破坏,形成了一种对阿富汗文学极为不利的条件,阿富汗文学正经历着一定程度的衰退。明显表现出来的封建贵族方向和艺术上的墨守成规,以及作品情节、题材、形象的局限性和因袭先前文学的艺术方式,所有这些都决定了十九世纪头几十年阿富汗文学的面貌。

像前几个时期一样,文学仍保留着双语,这是因为国内许多城市和部分地区法尔斯语占优势,并用它处理官方公文和发展源于古波斯—塔吉克语及印度—波斯语文学的地方文学。但从另一方面讲,普什图语又像以前一样坚守自己的阵地,特别是东南方和东方地区居民中,人们用这种语言创作了阿富汗人独特的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

十九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的封建贵族倾向,是通过一批阿富汗封建主机械地模仿古代范本的创作而表现出来的。有一本在印度多次再版的法尔斯文诗集,其作者是舒贾·阿里-穆尔克王。他的其他作品还有1826年完成的法尔斯文散文体自传《舒贾王日记》,更为著名的是1854年的喀布尔版,它名为《舒贾王大事年谱》。模仿舒贾诗歌体裁创作的有他的侄子,扎曼王的儿子阿卜杜拉扎克王子。用法尔斯文写诗的还有自诩为伟大哈菲

兹继承人的埃米尔多斯特·穆罕默德汗之子古拉姆·海达尔酋长。宫廷诗歌和历史文献不仅要歌颂国王、埃米尔及酋长们的"优点"和"美德",还要积极巩固封建社会的等级立场和特权制度。由于宫廷诗人瓦斯菲·卡布里、谢哈比·塔尔希齐、拉尔·穆罕默德·阿齐兹、迈里·卡布里及其他许多人的努力,喀西达体颂诗成了十九世纪初书面文学的盛行体裁,这种诗体以诗歌语言优美雅致、富于多彩喻义、风格矫揉造作为特色。

穆斯林神职人员对国家政治文化生活的积极参与,正统宗教经院文学的存在,以及苏菲派文学对抽象道德与虔诚标准的鼓吹,对周围物质世界虚幻性("现实存在的只有神的实体")的肯定,在实际上都加强了这一时期官方文学的统治地位。

列入当时的广泛神学文学的,有下面一些从阿拉伯语译成普什图语的诗体译作:神学著作《知识的本质》(坎大哈,1809 年,译者瓦利达德·卡卡尔毛拉)、加扎利伊玛目[1]的著作《君子之路》(坎大哈,1820 年,译者哈比布拉·坎大哈拉亚)、神学书《极乐园》(坎大哈,1820 年,译者扎巴尔达斯特·卡卡尔毛拉)等,还有一些是阿富汗神学家自己的著作。

伊斯兰教思想体系继续全面地影响着十九世纪上半叶阿富汗文学中世俗派代表者的创作,这表现在诗人们对待古兰经情节和主题的态度上。十六至十七世纪阿富汗文学中,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反对正统伊斯兰和反对封建制度的立场,而在十九世纪表现得就不那么公开。

703·

在封建割据条件下,早就是宗教中心的坎大哈,已成为独特的文学策源地。坎大哈公国的统治者与其他阿富汗采邑汗不同,他们保护了那些在先前传统轨道上用法尔斯文和普什图语作诗的本地诗人。普尔迪里汗(1785—1829),尤其是米尔迪里汗马什里基(1797—1854)统治者本人,都被看作是不错的诗人。与定期举行赛诗会的同时,坎大哈还开办了国内第一所教授学生诗艺技巧和手法的文学学校——阿达布东。

坎大哈公国的宫廷诗人米尔扎·哈南、西迪克·阿洪扎德、米亚·纳伊姆·马提扎伊、米尔扎·艾哈迈德等,都迎合传统写了不少颂文,但他们创作中流传下来的,则主要是抒情作品,当然,其中大部分取材于波斯—塔吉克语和普什图语的经典作家。

一些分封的独立公国建立后,国内爆发的封建诸侯内讧在英国殖民者煽动下越演越烈。此前英国人已使印度的大部分归属自己,并企图占领阿富汗土地,但遭到了坚决抵抗。1838—1842 年英国阿富汗第一次交战过程

---

① 伊玛目,Имам,对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注

中，战争转变为全民反对占领者的战争，使英国人遭受重大损失，并被迫不光彩地离开阿富汗的疆界。

这是一场阿富汗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者的解放斗争，斗争中的某些事件在口头创作，尤其是在一些流传很广的历史歌曲中得到了反映。这些年创作的诗篇和歌曲，可能在训练有素的听众听来距离诗歌的完美性还很远，书面文学固有的许多富于表现力的手法，如词藻华丽的象征，复杂化的形象，生动的比较，按照古典标准编排的优美韵脚，在诗里都没有。同普什图民间文学传统所特有的诗歌的自由韵律结构一样，这些年的叙事诗具有朴实、简洁和一定程度的形式严格规整的特点。在普什图语的历史歌曲中，特别广泛运用的形式是恰尔巴依塔及其变体。同时还曾流传过几组描写阿富汗人同英国占领者斗争的地区一部族口头诗歌（如《卡卡尔部落歌》）。

这一时期的阿富汗书面文学尽管墨守成规，它也不可能永远停留于时代风雨之外。第一次英国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几乎同时创作出两部叙事诗，它们在阿富汗文学史上占有适当地位。1843年，由来自古利斯坦的作者古拉姆·穆罕默德·阿洪扎达（卒于1888年）完成了一部法尔斯文的《战争纪实》。它对第一次英阿战争中发生在喀布尔北部库希达曼和库希斯坦地区的那场浴血战斗作了鼓舞人心的描写。叙事诗的中心形象是抗英行动杰出领袖之一，来自恰里卡尔的塔吉克人米尔·马斯吉迪，他后来被英国人雇佣杀手残忍地杀害了。这部叙事诗的作者是米尔·马斯吉迪的亲密战友，是这一事件的直接参加者。



·704

骑士木制小塑像
十九世纪末　喀布尔博物馆馆藏

另一部法尔斯文的叙事诗作品，是哈米德·卡什米里（卒于1847年）写的《阿克巴尔书》，于1844年完成。它模仿菲尔多西的《王书》，以带有双行诗节的穆塔卡利布格律书写，叙述从1838年占领者入侵阿富汗开始的英阿战争全过程。诗里详尽地再现了1841年喀布尔城乡全体居民参加起义的画面。吸引作者注意的人物是阿富汗民族英雄穆罕默德·阿克巴尔王子。《阿克巴尔书》流传极广，它被人抄来抄去，并以多种手抄本形式保存下来。这部作品的社会反响极大，以至于英国人决定以一部形式相仿、思想内容却截然

不同的作品，与卡什米里的叙事诗相抗衡。以此目的为英国人效劳的诗人卡塞姆·阿里，创作了一部关于第一次英阿战争的法尔斯文叙事诗，不过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已经为英国人所篡改。1856年，卡塞姆·阿里的叙事诗以标题《喀布尔战役》在阿格拉出版。但是，这部亲殖民主义的艺术赝本，却引起了阿富汗人的一致鄙视，而《阿克巴尔书》却比从前更为普及。

古拉姆·穆罕默德和哈米德·卡什米里努力歌颂人民及其勇敢领导者的丰功伟绩，他们的爱国热情把他们的作品连在了一起。他们的叙事诗都以叙述情节简洁、作诗手法朴实、语言贴近民间口语见长。

战后时期未能给国家文化生活带来任何新的重大变化。不过随着中央政权的巩固，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开始慢慢消失，经济渐渐好转，出现了某些阿富汗文化与文学向美好前景转化的征兆，只是在二十年之后，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这些变化才得以公开表现出来。

第十编　非洲大陆文学

本编序言

十九世纪上半叶，在非洲大陆上中世纪类型的文学创作几乎独占鳌头。非洲南部欧洲移民的纪实文学基本上是个例外，这一时期创作出了为数不少的纪实作品，它们证实了1834年开始的“大迁徙”中的事件，由于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排挤，大批非洲人离开适宜居住的地方，潮水般地向大陆纵深处的新地区转移（描写“大迁徙”的短篇小说的出现，要晚得多）。

然而，这一时期大陆各个区域的文学，远不是划一的。早在十一至十五世纪曾经历过中世纪世俗文学辉煌繁荣的北非诸阿拉伯国家（埃及、马格里布等国），其艺术传统日益衰退，新的传统却开始为自己开辟道路，它们与用方言（埃及）所写的文学，以及用介于方言和古阿拉伯语之间的语言所写的文学之发展相关，而后一种语言称马勒洪（马格里布），其文学离阿拉伯中世纪经典文学的传统体裁很远，却日益接近日常生活之需求。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开辟了阿拉伯国家接触西方文明的纪元，为改变这些国家的社会意识打下了基础，那里的人们逐渐相信，社会基础必须坚决现代化，以便使阿拉伯东部资产阶级关系的自发发展得以加强。

在基督教国家的埃塞俄比亚，具有几世纪传统的书面文学仍然主要与教会活动发生关系。世俗文学分量不大。然而在封建君主制继续存在，皇权与教权威望下降的条件下，正是这里埃塞俄比亚文学的一个分支，提供了一些新的、富有生命力的嫩芽，尤其是在年代记（绍阿省）的体裁中，在这种年代纪体裁里，表现出了脱离若干世纪以来的标准，使书面语言艺术大众化的倾向。

热带非洲的伊斯兰化地区呈现出了文学发展的另一幅景象，在那里，这一时期的封建社会正在形成，而不像北非和东北非的国家那样处于解体之中。西苏丹诸年轻封建国家的文学，呈现出中世纪文学繁荣时代的典型景

象,即文学体裁与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民间口头文学体裁同时并存,相互补充,彼此充实。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强大的阿拉伯文学传统,对这一时期热带非洲文学的影响,并不是非洲文学接受最新阿拉伯文学范本的经验,而是接受阿拉伯各民族国家形成时代的早期阿拉伯文学经典经验。

东部热带非洲文学(斯瓦希里语)与西非地区文学一样,这一时期出现了明显的高涨,特别因为前不久东非各族人民取得了对葡萄牙占领者的胜利。文学反映了较为发达的封建社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可与阿拉伯古典文学繁荣时代相类比,由此也带动了宫廷诗歌的发展,并在斯瓦希里诗歌中出现了多少能反映下层城市居民情绪的大众化倾向(穆亚卡·宾·哈吉·阿勒加萨尼的创作)。

刚刚在十九世纪上半叶热带非洲国家文学中显露出的这种精神和美学倾向的多样性,很快就在欧洲殖民者的同化下销声匿迹了。后来开始在另一种社会基础上形成的文学传统,其产生则与非洲国家一种新力量——民主知识分子的出现相连。

第一章 豪萨语文学

豪萨人是西非人数最多的族群之一,主要居住在现今尼日利亚的北部各州,人数在一千五百万以上。豪萨是由当地尼格罗人同北方和东方迁徙过来的各苏丹民族混合而成的民族共同体。

豪萨族群形成于十六世纪,那时一些苏丹编年史里首次出现豪萨人这一称呼,其语言也得到普及。当时的豪萨人居住很分散,分布在经常相互竞争的一些独立国家的组织里。作为政治、贸易和文化中心的大城市,推动豪萨人联合成一个统一整体,并促进了整个族群的经济文化发展。氏族部落制的迅速瓦解和阶级社会的形成,都在大城市及其近郊。豪萨人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农民和豪萨城市贫民,以及富尔贝族牧民共同举行的一次反对封建豪萨王朝的起义。起义领导者是豪萨人近邻之一——富尔贝人首领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谢赫(1744—1817)。他宣布同豪萨埃米尔们进行圣战,指责他们破坏伊斯兰教教规。1808年前后,起义以驱逐或处死豪萨城邦国的埃米尔王朝大部分人结束,被逐与被杀者的领地收归西非最大国家之一、新成立的索科托苏丹国所有,索科托政权转到富尔贝一些名门望族手里。统一国家的建立,促进了豪萨人日后的团结和民族文化的形成。

豪萨城邦国家出现于十世纪。伊斯兰教向西非该地区渗透是在十一世纪。到十四至十五世纪才或多或少地得到了广泛普及。那里渐渐出现神职

阶层和成群的职业马拉姆。他们的任务是以伊斯兰教教规和要求来教育青年，同多神教残余作斗争，解决宗教道德争端。最后，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了埃米尔的谋士，积极参加政务、谈判、外交公文往来等要务的讨论与决策。这项职业享有多高荣誉和尊敬，由下述情况可以判断一二，没有马拉姆的城市称之为“空城”，久而久之豪萨语中的马拉姆一词本身就成了礼貌待人的一种形式。

豪萨人拥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其中研究最透的部分是童话。像非洲其他各民族一样，豪萨人中流传最广的是动物童话。其中最古老的童话建立在图腾观念基础上，所以常用的主题是把人变作动物。对早期豪萨历史来说，这类童话很有代表性，因为那个时期就叫“猎人文化”时期。

后来的童话类型可以称之为“市民童话”，它证明了社会生活的发展。这些童话里同自然力一起越来越起作用的是社会因素。在童话的动物主人公里，已经出现了自己的埃米尔和领班——狮子、老雕、鬣狗、老鹰。他们向自己的臣民征收赋税，残酷地惩罚不听招呼的人。

豪萨语文学同民间文学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比如，以传统童话为基础，慢慢开始创作历史小说。许多民间文学中有表现力的手法和形象，都进入了豪萨作家和诗人的作品。

豪萨文字叫“阿贾米”，是以阿拉伯字母表为基础编就的，不过有些字母为传达豪萨语音而作了适当改动。这种文字产生的时间地点，以及豪萨语早期书面文献的性质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毋庸置疑的是，西苏丹国土地上的中世纪国家建立后，公文往来和以文件作经济报表的需要大大增加，外贸增长和伊斯兰教传播的结果，是对近东阿拉伯语文学的熟悉。所有这一切都刺激了非洲各本地语文字的出现与发展。

确切可信的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阿贾米文字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起义期间的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谢赫，就曾用豪萨文书写并发给他的追随者大量专门赠言，还在一些颂文里阐释过新政权的政策。在做古代编年史补遗工作时，也添写了一些新材料，就是以谢赫支持者的观点来阐述起义过程和起义前的各种事件。没收和销毁敌方手稿的大量事实同样证明，当时文字普及的程度，那都是些足以说明政治斗争实力的手稿。

豪萨语文学的原本体裁是编年史，无疑，口头历史传说在其创作中起了很大作用。编年史讲述了豪萨人诞生的传奇故事，历数了执过政的埃米尔，记录了他们在位期间发生过的重大事件，如打仗、政变、建立通商关系、建设新城市、建筑新房屋等等。最有趣的是对埃米尔和达官贵人性格的描写。这时常会用上基拉里，即由于某件事情而给某人取个恰如其分的别号。

如果说编年史讲的是国家大事，那么为数众多的历史故事——拉巴

《富尔贝人同戈比抗王交战》
豪萨文本(阿贾米文字)
十九世纪

里——更多关注的,则是历史上的某些时刻以及这些事件参加者的命运。历史故事的目的不仅在讲往事,还在使人开心,而且要给人以教诲。直到不久前这些故事还以口头形式存在。其中现在一些为人所知的东西,都是二十世纪才记载下来予以出版的。

拉巴里最常见的主人公是埃米尔、军事将领、马拉姆们。但有的故事里也能见到豪萨城邦国里的普通人——工匠、商人、农夫。故事这种形式简洁明白,能写出强有力的性格和戏剧性的情境,而且叙述风格平和持重。

比如,在一组关于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谢赫的故事里,千方百计突出他的强壮、明智、仁爱和对普通人的关心。谢赫被赋予许多超自然的本事。有一段故事写道,一个商人在过尼日尔河的时候掉进了水里,于是向谢赫呼救。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这时正在离尼日尔河很远的索科托城布道,他听到呼救立刻跑到河岸边把商人救起来。这一切都进行得神速,听众还什么都没反应过来就惊奇地看见谢赫从衣袖里往外拧水。其他一些故事也写到谢赫神奇地摆脱戈比尔埃米尔的奸计,飞到遥远国度去旅行等等。

关于有大师之称的建筑师穆罕默德·杜鲁古命运的悲剧故事家喻户晓。他盖的房子(有些保存至今)备受同代人赞赏。瓜拉城埃米尔建议大师迁到自己身边永久定居,但只完成他一个人的选定。在遭到拒绝后,狂怒的埃米尔下令砍了大师的头。还有一个故事写到埃米尔的儿子常年耍弄自己的同乡,城里有一个叫巴金瓦克的染色工,付出了生命代价才使家乡父老摆脱王子的欺负。

708·

豪萨歌手和说唱艺人创作了各式各样的节庆歌和庆功歌,有写打猎成功的,有写五谷丰登的,有写作战胜利的,还有写人丁兴旺的。宗教训诫诗只是豪萨诗里的一部分,但只要谈起它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这些诗的创作时间是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些诗的作者人所共知。

从最新资料获悉,尼日利亚各图书馆藏有数十件豪萨文、阿拉伯文和富尔文(富尔贝族语言)叙事诗的手抄副本,大部分尚未付印出版。这些叙事诗里大约五十部是由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谢赫补遗的。其他作者中有阿卜杜拉希·达恩·法迪奥(谢赫之兄弟)、穆罕默德·贝洛(谢赫之子)、穆罕默德·布卡里等。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为夺取权力同历代老豪萨王朝所作的斗

争和新封建国家索科托的巩固。这些在穆斯林训诫传统影响下写出的作品，都有宣传禁欲主义和逆来顺受的内容，它号召人们对当局的规定和教会的教规俯首听命、奉公守法，并以严惩来威胁离经叛道的人和怀疑主义者。

由此可见，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曾经是豪萨语文学创作的高涨时期。

第二章　富尔贝文学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是富尔贝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作转折时期，其突出特点是，神权型富尔贝封建国家的产生，城市的发展，文化的昌盛，同其他非洲国家贸易、政治和文化交往的扩大。

十八世纪前后，富尔贝族成了西非最强盛的民族之一。它的起源是非洲学中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不过所有研究家却在一点上取得了共识，即富尔贝人不是西非土著居民，而是从东北方迁徙过来的。

富尔贝人是除游牧于沙哈拉沙漠的图尔烈格人之外，西苏丹地区唯一的游牧民族。他们的主要财产普洛是奶牛绵羊和山羊。传说里常称普洛为“奶牛之子”，从这里不难发现图腾信仰的痕迹。

富尔贝人在西苏丹的迁徙进行了几个世纪，起初是小股的转移，多半以家族为单位。后来伊斯兰化的富尔贝反对“异教徒”的掠夺性远征，加速了这个过程，结果富尔贝人就遍布了从塞内加尔河口到东苏丹的广大地区。

十八世纪富尔贝人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的首要起因是社会经济的过度分化。社会领导作用逐渐转移到有钱有势的名门显贵手里，他们做梦都想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力。

名门显贵追求功名利禄，与伊斯兰教的教义和社会伦理规范一拍即合。十七至十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富尔贝人中间广泛传播。十八世纪二十年代开始了伊斯兰化富尔贝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吉哈德。战争发起人是富塔贾隆地区富尔贝几家名门望族的代表。战争的结果是伊斯兰神权国家富塔贾隆（今几内亚境内）的建立。

十九世纪初，居住在豪萨城邦国家的富尔贝人，经历了宗教和政治的高涨时期。富尔贝人以纯洁伊斯兰争取全体穆斯林平等的斗争方法，争夺政治自决权，这一运动的灵魂和组织者是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谢赫，他是传教士改革家和苏丹地区大政治活动家之一。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富尔贝人大国——索科托、阿达马瓦、马西纳，较小一些的富尔贝人公国，都承认自己是这些大国的附庸。

十八至十九世纪富尔贝人社会的突出事件，是由中世纪苏丹国家的劳动分工而产生的工匠帮会。工匠的基本人群由异族人组成，他们来自被征服民族或战俘。工匠中还有些富尔贝混血儿。一般说，各帮会人员都是由非穆斯林或表面上接受伊斯兰教的人所组成。富尔贝人国家的主要帮会有铁匠、织工、伐木工、陶工和皮匠等。职业歌手、说书人和琴师则组成一个特殊群体，称作格里奥。

709·

在某些富尔贝人的国家里，比如马西纳，七岁以上的孩子都得上学读书。女孩也要进学校。一般说来，女孩由女人照管。知名人士的孩子可以到非洲和近东其他国家的著名穆斯林教师那里深造。

富尔贝人的文化教育用语是阿拉伯语。在富尔贝的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穆斯林学者，文献中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称呼：乌列玛、卡拉莫科、马拉布特等等，其中很多是诗人。

阿里玛米是富尔贝人对头领埃米尔的称呼。阿里玛米都很赏识学界代表人物，总要把他们拉到自己这方面来。可是有些有学问的读书人——这种人还不少——过的是独立自主的生活，有时甚至敢顶撞当局。几乎所有富尔贝优秀统治者本人，都出自学者阶层，而且起初都是穆斯林的布道士。

与艺术等同的录事劳动，在富尔贝人那里备受尊重。富塔贾隆曾有过两个著名的手抄件中心。拉贝-杰佩列学校享有文字优美和文章润色趣味高雅的盛名。另一所学校——科拉杰——在富尔贝虔诚教徒中备受景仰，人们认为它特别忠于早已确立的文字书写传统。科拉杰的副本都是最有学问最有威望的录事抄写的，以其书写严谨朴实著称。

十八世纪出现了第一批借助阿贾米（一种以阿拉伯字母表为基础研制出的书写体系）的富尔文手抄作品，其中包括文学作品。富尔贝人的语言——富尔语，渐渐成为文化创作的一种工具。从阿拉伯语过渡到母语使富尔贝人有了一个重要收获，那就是它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富尔贝人民族自觉意识的增长。

不久前，一些法国研究家同富尔贝人马里学者兼作家阿马杜·汉帕帙·巴协作，一起记录下了四篇神话羌吉，这是一套统一的富尔贝圣礼文。《库蒙》[①]是写给牧人封号仪式的；《凯达拉》[②]与成年仪式，一种部落秘密的圣餐礼有关；第三篇《莱泰列科达里》或者叫《大星光》（大星又名牧人星，指行星金星），是举行仪式时朗诵给统治者的献词（是前一篇的续篇）。最后一篇圣礼文是《拉托利》或者叫《神圣的洗脚礼》，反映了新年牧人节的一种仪式。

---

① 库门，一种神，牲畜的主魂。——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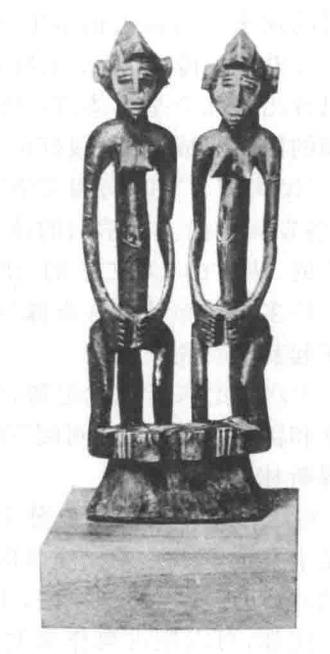
② 凯达拉，黄金知识神。——译注

写在板块上的有魔力的咒语（摩洛切），也归在圣礼文里，朗读咒语的时候要不时往地上吐唾沫（正像有些研究家所推测的，咒语是富尔文字最古老的书写范本）。经销写有咒语的板块，能挣到不少钱。

·710

神话作品有用散文写的，也有用韵文写的，总的来说，富尔贝文学以诗体形式占上风。富尔贝民间诗人都有了不起的即兴作诗吟唱的能力。

歌（吉摩里或伊姆列）是民间诗人发挥的主要形式。它更像一种歌—诗，有时由人朗诵，有时由作者在乐器伴奏下歌唱。歌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开头部分叫当杰（岸），主要部分叫马伊奥（河），把它的发展比作水的流动。



一对小雕像 塞努弗人
木雕 科特-迪乌阿尔作
莫斯科 普希金国立美术博物馆藏

民间诗歌中最富表现力的是牧人诗。用来赞美奶牛的牧歌，可以说，把诗意观察周围世界时的清新、爽朗和鲜明形象性，发挥到了极致。

其他富尔贝口头创作体裁中，应该提到的是仪式歌、抒情诗、安魂曲和叙事歌。

散文体裁中值得一提的是童话（动物童话，其中包括寓言童话和英雄传奇童话，还有梦幻童话和风貌童话）。短小精悍的形式有谚语、俗语、谜语、绕口令、含意笑话（指对冒犯性笑谈迅速机智地作出反映）。最后是短篇小说甚至中篇小说等现代文学体裁的早期形式，有醒世警句、闲话、方言土语（常是劝谕性的）。不同国家的富尔贝人对这些体裁的叫法也不同。

在富尔贝民间文学中，格里奥们的创作具有特殊意义。他们分为三类人：颂文作者、编年史作者和抒情叙事作品作者。格里奥们常把自己的命运同所住宫殿的当权者或某个有权势的人连在一起。许多格里奥是浪漫歌手，靠他们颂扬的人慷慨解囊以维持生计。

赞美歌和颂文虽然有具体收受对象，但还是含有理想的行为模式，因为受夸奖的人是作为理想品质的负载者而出现的。而且赞美诗的重要社会道德功能，也包含在这里。颂文作者还熟练掌握了以诗歌辱骂人的本事，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唱赞歌转到损害人的名誉。甚至最有威力的阿里玛米（富

尔贝的埃米尔),也害怕格里奥们尖酸刻薄的语言。

历史口头传统,是富尔贝文学中极为丰富却尚未充分研究的部分,其中可以分出好几个基本体裁:历史传说、编年史和宗谱。这些作品通常用带韵脚的散文写成,所以很好记。

"民间文学"和"阏阅文学"是两条文化传统,十八世纪以前井水不犯河水,各发展各的。有学问的读书人以散文体或韵文体写各种题材的论文,神学的、法学的、天文学的、语法学的、演说术的等等,他们的作品都很抽象。许多马拉布特在考查探讨穆斯林基本状况的时候,用过富尔语,不过只在起初偶然用一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富尔贝人国家的建立和伊斯兰教变成"阏阅"的正式宗教,出现了一项新的任务——积极宣传穆斯林教义。

可以把富尔贝文学史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古典"大师"时期(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末)、殖民主义时期(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中期)和现当代。当然,分期还可以再细一些,不过那样一来,就看不出各支富尔贝人的共同性。比如,可以把古典作家时期再细分为吉哈德(护教战争)期、富尔贝国繁荣期和富尔贝国衰退(或灭亡)期等等,这种分期的时段界限对各国富尔贝人来说就会参差不齐。

东富尔贝人领袖们(改革家乌斯曼·达恩·法迪奥、其子穆罕默德·贝洛,其兄弟阿卜杜拉希·达恩·法迪奥)的部分创作,都属于第一时期。他们几人的作品题材大同小异,以宗教内容居多。不过作品的文学成色不能同日而语。众所周知,三人都创作了大量散文和诗歌作品。仅乌斯曼·达恩·法迪奥记录在册的抒情诗就有七百余首。总的看来,流传至今的只是他们作品的一小部分,而且主要是阿拉伯文作品,而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们,是用富尔和豪萨两种语言写作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乌斯曼·达恩·法迪奥也是豪萨语诗歌的鼻祖,因为他的两首豪萨文布道诗,成了这种书面诗歌的首批公认范本。

乌斯曼·达恩·法迪奥是热情的布道者兼杰出的讲演家,他的作品充满号召、规劝、赞美和揭露。准确鲜明的语言,反复对照与重复之类的演说手法,赋予他的作品以极大的鼓动性。

乌斯曼·达恩·法迪奥用阿拉伯文写的许多著作,不论原版还是欧洲文的阿文译作,当今都尽人皆知,这些作品是《心之光》、《给弟兄们的教诲》、《论穆斯林政权与异教徒政权的区别》、《致苏丹人民》。这些著作的基本内容是批评豪萨埃米尔们的宗教政治活动,在漫长的岁月里,富尔贝人都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索科托国苏丹穆罕默德·贝洛是位大国务活动家和知名学者。据传，他能在打过一天仗后坐下来创作一整夜。他还是记录吉哈德的史学家。他的著作中含有大量有关乌斯曼·达恩·法迪奥的活动，他的宗教主张，以及富尔贝人运动实际情况的重要材料。

依富尔贝文化研究家之见，三位吉哈德领袖中最有天赋的是阿卜杜拉希·达恩·法迪奥，他是形式完美、风格优雅的喀西达诗作者。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吉哈德期间写的喀西达诗集，名为《以我几首诗装点书页》。

以活动性质而论，最接近索科托几位穆斯林领袖的是阿达马瓦国奠基人阿达马。他那为北喀麦隆当代富尔贝人所熟悉的作品中，最值一提的是纪念乌斯曼·达恩·法迪奥的一部叙事诗，诗作已由喀麦隆研究家穆罕默杜出版。

迁居富塔贾隆山顶的富尔贝人，也有他们的诗歌奠基人，有权做这一奠基人的是来自蒙贝亚的梯耶尔诺·穆罕默杜·桑巴（1755—1852）。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宗教训诫叙事诗《永恒幸福的源泉》，它使富塔贾隆地区富尔语成为文学语言发展的基础。诗人最著名的弟子之一是梯耶尔诺·萨杜·达伦，他是大量宗教内容作品的作者，作品有用阿拉伯文写的，也有很多叙事诗是用富尔文写的。

由于富尔贝人国家广泛传播阿拉伯穆斯林文化，一些人熟悉了文字，他们当中出现了众多口头传统的创作家，其中不少人开始用富尔文和阿拉伯文记录自己的作品。他们的创作很少受阿拉伯框框的影响，以感受新鲜敏锐为特色。从十八世纪开始，而且整个十九世纪期间，都可以看到民间文学同有文化的上层文学逐渐接近的过程。冷冰冰的训诫诗歌为新体裁新主题所丰富。另一方面，民间诗人创作中也使人感受到一些新倾向。比如说，可以把牧人歌看作两条文化传统汇合的结果，歌里的牧人把自己的羊群比作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财源或者“笔端飞奔而泄的诗行”。

这样，就渐渐形成了非洲最具代表性的各族语言文学之一的富尔贝文学。

第三章　斯瓦希里语文学

· 712

葡萄牙曾占领东非海岸城市（基卢瓦、蒙巴萨、拉穆、帕泰等）两个世纪之久（十六至十七世纪）。十九世纪上半叶斯瓦希里语文化文学经历的明显高涨，与驱逐占领者出境很有关系。最强烈抵抗葡萄牙人，而成为海岸城市反葡萄牙人斗争中心的，是斯瓦希里人城市蒙巴萨。1740 年在阿曼苏丹支援下，葡萄牙人被从北莫桑比克斯瓦希里人各城市彻底赶走，这些城

市便落入了阿曼苏丹国的影响范围。可是几年以后,蒙巴萨总督宣布脱离阿曼而独立。除基卢瓦和桑给巴尔外,其他城市也都相继效法。在几乎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海岸地区内战连绵。蒙巴萨继续在地区经济政治生活中起主导作用。阿曼统治者不只一次往东非派遣军事考察团,以便恢复在那里的影响。直到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一个阿曼苏丹谢伊德·赛义德在桑给巴尔岛站稳脚跟,阿曼才征服了沿海各城市。桑给巴尔从此时起成为东非经济政治领导中心(桑给巴尔1856年又脱离阿曼彻底独立)。

如果说斯瓦希里语文学形成初期(十八世纪以前)发展的是北方城市拉穆方言——基阿穆语——文学的话,那么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头几十年增强作用的就是蒙巴萨方言(基穆维塔语)文学(穆维塔是蒙巴萨另一叫法)。不过这时的诗歌用语还是基阿穆语。后来随着桑给巴尔地位的提高,它的方言才提到首位,成为现代斯瓦希里文学语言的基础。

显然,从十四世纪东非城市多数居民接受伊斯兰教时起,斯瓦希里文学就以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传统并存为特色。口头文学是江湖说唱艺人的传统,面向广大居民阶层;书面文学是宫廷诗人和学者阶层的传统,他们在寂静的清真寺里以伊斯兰教教义教规精神,思索人生真谛。

第一个"把诗歌从清真寺搬到市场上来"的是穆亚卡·宾·哈吉·阿勒加萨尼,他以蒙巴萨的穆亚卡闻名于世(生卒年月大约是1776—1837年或1840年)。他的诗歌于上个世纪末,由传教士У.泰洛尔在当时大诗人希库朱阿·宾·阿卜杜拉赫·巴塔维的协助下记载下来。半个世纪以后,У.希钦斯在蒙巴萨谢赫穆巴拉克·阿勒希纳维积极推动下,给这些诗歌作了注释,并同诗人一百四十三首诗的诗集一起出版了斯瓦希里文的诗人传记。他完全有可能把其他作者创作的东西加在了穆亚卡身上。在这种情况下,穆亚卡就成了集许多诗人和歌手创作特点于一身的整个一个诗歌时代的独特标志。

穆亚卡(古斯瓦希里语的意思是"漂亮的"、"标致的")出身于斯瓦希里名门望族,并且是历代蒙巴萨统治者的宫廷诗人。他那些带有基姆维塔语成分的基阿穆语诗歌(玛沙伊利)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情况:斯瓦希里各城市间的内讧和相互残杀的战争,以及蒙巴萨向阿曼苏丹争取独立的斗争。穆亚卡号召乡亲防御敌人入侵,保卫自己的城市(玛沙伊利《昔日厮杀》、《信使,当你到达桑给巴尔的时候……》)。穆亚卡首先是一个蒙巴萨的爱国主义者,他歌颂自己的城市(《蒙巴萨,你像一注拍岸的激浪》),生动地描写城市的日常生活,反映历史上的戏剧性时刻:敌人入侵的威胁,天花的流行(抒情诗《蒙巴萨瘟疫》)。

穆亚卡的诗歌包括了他去印度、波斯、阿曼、桑给巴尔和科摩洛群岛作海上

旅行的材料(《海上出游》、《海轮》、《一个蒙巴萨人》、《如果想要……》等)。

爱情抒情诗在他创作中占有显著地位(《致亲爱的》、《当见到你的时候》、《面对你的心灵》以及其他许多),还有一些纯粹以穆斯林教义精神进行道德说教的诗歌。

穆亚卡把斯瓦希里诗歌的传统格律玛沙伊利,推向了完美的极致。它的基础是四行诗,每行诗十六个音节,八个音节后有一个停顿,前半行诗和后半行诗的韵脚排列一样,贯穿整首诗的始终。玛沙伊利语调铿锵,吟唱的时候用宣叙调(有拖长音)。

穆亚卡在诗歌形式里,广泛利用了独特的谚语和俗语注释手法,斯瓦希里语口头创作中的谚语和俗语本来就是短小精悍的诗歌作品,现成的诗行,很容易安排在玛沙伊利形式当中。比如,他的抒情诗《许诺》、《儿子,我们该分手了》就是这样写的。这种方法在现代诗歌中也极为普遍。在穆亚卡的诗里,还会看到另一种与民间文学传统有关的手法,就是诗辩、对话(《喂,蒙巴萨人……》、《来自蒙巴萨的急件信使》、《债主与债户》)。

十九世纪中叶起,随着桑给巴尔苏丹国的建立,斯瓦希里人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影响得以加强,这种影响从培养教育年轻一代的体制上反映出来。虽然利用民间创作传统进行教育教学的方式方法,在社会上仍起重要作用,但富裕阶层却已转向了以书面教育为基础的新方式。这时产生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学者阶层——伊斯兰教布道士,发展了一种可能在十七世纪早已诞生的宗教道德教谕文学(它的传统诗歌格律是滕恩迪),其作品的手抄本流传极广(关于这点请见本书第四第五卷)。出现了一些新思想,与穆斯林题材有关的新形象。而且道德教谕作品、整篇整篇的哲学论文之类的东西,都是以韵文方法创作的,用的是伊斯兰教传入以前对社会生活施加意识形态影响所采取的传统形式。与此同时,仪式歌艺术伊格马也像从前一样渗透了斯瓦希里人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训导歌伴随着(青年男女的)成人仪式和结婚典礼。总的说,整个口头创作都在继续做培养人的工作。一方面是口头传统,如上面说的训导歌之类;另一方面是书面传统,如穆斯林的教义训诫等等,两种传统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范作品,是远近闻名的劝善性叙事诗——《姆瓦那·库蓬纳歌集》。叙事诗创作于十九世纪中叶(有些手抄副本标出的确切年头是 1858 年)。古斯瓦希里文的叙事诗手稿连同译成英文的拉丁语改写本和注释一起,由斯瓦希里文学和民间文学著名女研究家 A. 维尔涅尔于 1917 年出版。通常认为,叙事诗本文是姆瓦那·库蓬纳(生于帕泰,住在拉穆)辞世前对她女儿宾蒂·谢亚(或者姆瓦那·哈希玛·宾蒂谢赫)口授的。

穆亚卡一首诗的古斯瓦希里文手稿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 M. 希库朱阿誊写
伦敦大学图书馆藏

714 ·

姆瓦那·库蓬纳出身于斯瓦希里名门望族。她丈夫布瓦纳[①]·马塔卡曾当过苏苏市执政官。应当指出的是，斯瓦希里社会富裕人家的妇女文化修养相当高。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人们开始把豪门女孩送到穆斯林布道士的妻子或遗孀那里去学习，那些人除了教授传统知识，还教女孩们认字，读《古兰经》。A. 维尔涅尔和其他研究家都曾说过："有些女人读《古兰经》比男人读得还好"，"她们当中不少人熟练地掌握了作诗技巧"。

《姆瓦那·库蓬纳歌集》在斯瓦希里人当中非常流行，存在大量手抄本，许多人凭记忆来表演。直至今天人们还记得它，熟悉它。叙事诗共一百零二节，以滕恩迪格律写成，就是说，格律基础是八音节一个诗行。叙事诗的大部分是训诫，其中传统观念与穆斯林道德准则相互交织在一起。这是一种已婚女人的特殊《法典》：怎样整理房间，怎样检点自己，在外人面前和自己家里如何表现，主要的是怎样"恭恭敬敬，无微不至"地对待夫婿（引入很多个人经验）。决定基本道德价值的，是"虔诚、诚实可信、谦虚、谨慎、孝敬老人"等概念。社会的相互关系的界限，被规定得相当清楚："见富人要回避，因他们蔑视穷人"，"有人需要帮忙，立即欣然前往"，"没有正事免同仆人交往"。对人要"和蔼可亲，切忌恶语伤人"，"要躲开胡搅蛮缠和目空一切的人"，"但有人对你不好时，要以德报冤"。

叙事诗的内容、结构、古代史诗所用的典型语言以及其他一些细节，都使人觉得，这类训诫叙事诗出现的时间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早，也有可能是把很早以前不只一代说唱人创作的东西，算在了一个具体人姆瓦那·库蓬纳的身上。

如此看来，十九世纪初斯瓦希里语文学的特点，是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两种传统共存并相得益彰。书面传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面语言功

① Бвана，系俄文，布瓦纳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先生"之意。——译注

能的扩大，这一传统往后发展的结果，便导致本来意义上的"作者"文学的产生。

第四章 埃塞俄比亚文学

从十九世纪起，埃塞俄比亚国变得暗淡无光。1800年，号称"埃塞俄比亚的王中之王"，而实为强将手中的玩偶、获得倒霉"国尾"绰号的塔克拉·乔治，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被人推翻。首都贡德尔市那些永远不和的封建主，又纷纷把自己软弱的傀儡推上宝座，可是，这些傀儡已经完全丧失威信和权力，只能依靠将他们推上宝座的人士有无军事好运而发生变化。贡德尔仍然是一个拥有众多教堂和修道院的最大城市，但已永远失去了它以往那种国家政治中心的意义。埃塞俄比亚教会的状况也好不了多少。教会内部的基督教学之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以至形成了事实上的分裂。而反叛的封建主对那些轮流坐庄的挂名皇帝的传统忠诚，已看作无关紧要，并责骂他们信奉"邪教"。

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反映到埃塞俄比亚文学中来，而文学，就其性质而论，则是典型的中世纪文学。文学创作用的是僵死的教会语言格埃兹，首先同皇权和教会的利益紧密相连。所以，十九世纪上半叶被看作埃塞俄比亚文学史上收效甚微的时期。这样看确实不无道理。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皇帝的官方史科研究和使徒行传，备受教会分裂之苦，处于完全的萧条状态。当年埃塞俄比亚读书人能够从中了解基督教东方优秀作品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已经中断。文学和整个埃塞俄比亚社会一样，经历着深刻的危机。

不管看起来有多荒唐，埃塞俄比亚文学史上的这个时期，使人发生兴趣正是由于这一社会危机。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绵延不断的内讧伴随着相互残杀和掠夺，把人民推向绝望的边缘。所有这一切都迫使埃塞俄比亚人回到自己的历史中去寻找出路和希望。一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即这一时期唯一受重视的原版作品，是史学文献体裁，这种体裁的作品就其叙述性质而论最接近政论，至于这种政论体裁，乃是此前埃塞俄比亚文学从未有过的。它之所以发生是极其自然的，非自觉的。随着皇权和宫廷的衰退，皇室史学编纂家的先前职位和写作班底全数丧失殆尽。所以继续编纂皇帝的年鉴就不那么容易。一位编年史家请求读者原谅说："那时我被俘了，在别国受罪，不在皇帝阵营里。如果没有那件事，就会有人告诉我皇帝阵营和所有国家发生了什么，您也就用不着悲哀了。我的老爷，我的父老兄弟们，因为我写作不是出于无礼，而是为了皇史不至于消失！"

这段话在许多方面引起了关注。首先,它表现了对这类历史的兴趣。其次,从此以后编年史家的定位已经不在宫廷圈子里(皇帝本人除外),而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我的父老兄弟")。这使先前的官方史科研究大大接近了政论。埃塞俄比亚文学中直接面对读者(不是在跋中而是在作品正文中)说话的,主要是写圣徒生活的体裁,因为圣徒传是圣者纪念日在教堂里诵读的东西。在历史编纂学中类似对读者说话的东西,只出现在长篇年代记里,而且带有修辞和做作性质,它并不是编年史作品固有的特点。这里的编年史家不仅慷慨激昂地对自己的读者讲话,而且把自己对国家前景的悲观看法也告诉他们:"而如果我为皇帝受压伤心,那是因为老爷成了奴隶,而奴隶当了老爷。但我们不会担忧,因为我从前就听圣人说过:'有一天金子会受委屈,银子会翘尾巴。'金子表示皇帝,而银子则指奴隶。"

在这骚动不安的年代里,埃塞俄比亚只有一个省能幸免于内讧的惨痛结果,那就是由军事部族加拉人从中央地区分离出来的绍阿省。接近十九世纪的时候,那里牢牢地建起了一个地方王朝,才保住了绍阿省的稳定。这个王朝的代表人物也夸口说他出身于埃塞俄比亚皇族。十九世纪初,绍阿执政者萨赫勒·塞拉西(1813—1847)称帝,不过他很明智,并没有去参与争夺贡德尔皇位的斗争,而是满足于逐渐扩大自己的地盘。贡德尔人不承认他的奢求,但也无法以武力斩断他的手脚。绍阿的这些奢求以最直接的方式,影响了埃塞俄比亚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事情是这样的,早在十八世纪埃塞俄比亚文学中,就出现了一种称作"编年简史"的体裁,其实,这种体裁与其说是编年史,不如说是从中世纪基督教观点,对"亚当开始"的世界史进行改编性简短叙述的历史资料汇编。在埃塞俄比亚读书人中,"编年简史"没有统一的称呼,编者对它的叫法也五花八门:《历代皇帝史》、《历代皇帝家谱》、《历史书》等等。可以作为同类文献举出的,是《历代皇帝史》,从篇幅看它紧凑简单,以结构而论却相当典型,它的手稿现在保存在列宁格勒的苏联科学院东方学院手稿部。作品正文仅占一百零四页,却分成了五章:第一章为族长史(四页);第二章为犹太皇帝史(五页);第三章为撒玛利特皇帝史(四页);第四章为罗马皇帝史、即拜占庭皇帝史(六页)和第五章的埃塞俄比亚皇帝史(八十九页)。前四章是马金《历史》极其简短的一个纲要,马金是阿拉伯家喻户晓的基督教作家,他在埃塞俄比亚以阿米多夫之子乔治而闻名。最后一章占手稿的大部分,包含埃塞俄比亚本身的历史,是编者主要叙述兴趣之所在。不过,叙述是在"世界"史背景下进行的。

这类《世界史》的改编性质,世界史编写者对神祇史和教会史的高度重视,对优素福·弗拉维、马金、巴特里克和一般阿拉伯基督教文学材料的广

泛采用，以及主要的，对埃塞俄比亚史作为各基督教民族历史之继续与完善的意识（俄国读者很熟悉“第三罗马”思想，这一思想反映在埃塞俄比亚一篇特殊论文《皇帝赞》里，论文又常以浓缩形式收入同类资料汇编），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所探讨的这些文献增添了年代记性质。恰好，这些作品的编者给作品取的平常书名中，就有一个是《历史书》，其字面意义正是《年代记》。在把埃塞俄比亚历史从埃塞俄比亚编年史中区分开的过程中，这些文献的依存关系虽非一般，却显而易见，这些文献值得注意的生命力（这类著名作品中的最后一部一直叙述到 1917 年），使它们接近于年代记，十九世纪上半期绍阿省注定要有新发展的正是这种体裁。 ·716

正在贡德尔的埃塞俄比亚文学走向衰落的时候，绍阿省的年代记体裁却发展得很快，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绍阿省的统治者对皇帝封号的觊觎，需要历史加以证实，这是一项艰苦任务，特别对永远被首都贡德尔人看作偏僻地区的绍阿省的编书人来说。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对整个埃塞俄比亚历史重新审查、反思和改写。

绍阿的编年史家主要通过有倾向性地校订全部历史文献遗产，来完成自己的任务。于是出现了一些“编年史”，在学术刊物中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是因其常被许多乍看起来与叙述主线毫无关系的传说轶闻等增补词句所中断。因此这些作品往往只被看成贡德尔《编年简史》的一种修辞变体。然而，正如前不久 B. M. 普拉东诺夫所言：“无论是内容，还是惹人注目的插入编年史的倾向性，都使人确信，简史与插入史之间的差别，较之仅仅是修辞性的东西，要深刻有条理得多。”

的确，在这些插入内容的挑选中，可以发现不少新奇有趣的东西。这些插入内容与历史地叙述某个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统治并无直接关系，而讲述皇帝的那些材料也是明显靠不住的，可是它们却承担着重要的思想负载。在这些插入的内容里，抬高了古代皇帝，却连续地败坏了另一些皇帝的名声（从十六世纪起）。于是，勒布纳·登格尔（1508—1540）在位的时候，穆斯林进犯的毁灭性浪潮席卷了全埃塞俄比亚，而他倒是个异教仪式的崇拜者。下一任埃塞俄比亚皇帝（1540—1559）是克拉夫迪，他的儿子之死，也被补遗者解释为由倾向于“罗马异教”所造成。把插入“编年史”同十九世纪初在绍阿省出现的，并非常流行的所谓《拉古伊尔论文》加以比较，就可以说明是怎样败坏名声的。这篇“论文”是一个混乱不堪的预言，是拉古尔这位天使长对以倒运而闻名的勒布纳·登格尔所讲的，无论是绍阿还是贡德尔和提格雷的，各个王朝分支，都认为自己的出身源于登格尔，这一预言的内容涉及到登格尔后裔未来的命运。这些后裔的命运是以隐晦曲折的预言表达出来的，但其实质却十分简单，除绍阿以外所有的分支

都未能保持信仰的纯洁，因而它们都将遭受种种不幸。最后只会从绍阿分支中一个氏族冒出一个皇帝。他将征服“异教徒”，恢复国家的和平与安宁。

不过，绍阿的编年史家并不是自己《世界史》的独立作者。绝大部分埃塞俄比亚的材料（这就是研究家所称的“叙述主线”），都是从贡德尔的《简史》里逐字逐句抄来的。材料的汇总和增补由绍阿主编所合成，而且需要指出，这些增补或加添最常用的语言不是书面语格埃兹，而是阿姆哈拉口语。这未必能简单证明绍阿人的传统文化水平不够高，因为他们和贡德尔人同样到著名修道中心去学过首都文化。况且，不能自由运用格埃兹语，也就无法做那么艰巨的编辑工作，这种编辑工作使插入编年史同简史有了天壤之别。面向口语只是更好地证明了作者的意图，即让自己的思想越出精通古语的纂书人这个小圈子，而为更多人所知。这是埃塞俄比亚文学的一个全新特点，后来这种倾向就更加扩大更加深化。

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和整个社会经历危机的条件下，反思本国历史的意图不能不反映在埃塞俄比亚文学中。为祖国担忧和不相信未来的情绪，使编年史作家打断叙述而直接面向读者，向他们倾诉衷肠。这样，产生的如果说不是政论，至少也是对类似政论的需求。离真正的政论还很远，它既没有自己的作家队伍也没有读者群——识字的城市人口。无论是教会论文还是修道院编年史的读者，暂时还都严格局限于少数古书面语鉴赏家的圈子里；也就是说，未能超出神职人员中那些具有文化教养人的界限。这样717・一来，我们与之打交道的与其说是政论，就不如说是带有政论性质的某些传统体裁作品。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影响到这些文学作品的形式。其结果是，神学论文和编年史这两种传统体裁，就在插入编年史中奇妙地结合在一起。这里以古代语言格埃兹进行的历史陈述，是作品的基本轮廓，以阿姆哈拉口语作的屡屡增补（秘而不宣的预言也好，传说和轶闻也好），则赋予整部作品以硬塞进去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使一种新的现代的“历史阐释”有了保障。绍阿省的编书人就是这样，哪怕是在旧体裁体系框架内也运用生动的口语，而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知道又向创作新文学的道路跨进了一步。

可见，十九世纪上半期表现出的不仅是埃塞俄比亚中世纪文学的衰退。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稀有而又不大明显的特点，后来却由这些特点形成了阿姆哈拉语的埃塞俄比亚文学，不过为此还需要整整一百年。

第五章 南非荷兰语文学

十七世纪落户南非的欧洲移民，起初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们用当时的荷兰语创立了文学。从宗主国迁来的不大识字的移民，操着各种方言，有“走了样的”荷兰语，还有其他外侨的母语：法语、德语，特别是英语（从十八世纪末开始）。南非荷兰语在这种种方言影响下渐渐演化，变成了现代南非荷兰语。从十八世纪上半期起，南非荷兰语开始作为口语语言出现在移民的日记、书信里。保持规范语威望的荷兰语，仍然是官场、教会和报刊的用语。1824 年创办了第一份《荷兰人南非报》，其积极作者之一是“布尔的比尔德狄克”，弗里斯人门特·博雷尔茨，他专写训诫性抒情诗。

不过，从十八世纪末，尤其从 1814 年起，当荷兰人的许多居民点被大不列颠人占领，将英语变为唯一国语的残酷斗争开始（1825 年法令）后，人们便尝试把南非荷兰语变为文学语言。如今，人所周知的最古老南非荷兰语文献——讽刺歌《纪念 1795 年 8 月 7 日迈森堡血战中的斯韦棱达姆及其他地区的英雄》，可能是一位无人知道的作者，在事件过后不久所写。南非荷兰语还作为驳杂成分出现在一些荷兰人的作品里——弗里斯人特恩斯特尔的自传体作品《我忠心效劳的成果》（1825），《荷兰人南非报》首任编辑、法国人沙尔利·埃蒂安·博尼法斯的讽刺剧本《新骑士勋章或温和派》（1832）中的对话就是二例。博尼法斯的剧本里说这种话的是喜剧人物霍屯督人。南非荷兰语以相似的方法用在恩德鲁·别因和卓尔治·雷克斯的喜剧《爱吵架的凯茜，或生活在霍屯督人当中》（1839）里，剧本以南非荷兰语和英语混合写成的韵文插笔，与南非荷兰语的散文插笔交替出现。在上述两部具有种族主义情绪，反对同情黑人的“白人知识分子”代表人物的剧本中，南非荷兰语是作为否定黑人的补充手段出现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官方文学范围内对南非荷兰语的嘲讽态度，便让位于承认其存在的权利，不过还是把它看作官方英语无法流通的，没文化的下等人的语言。上面提到的博尼法斯 1844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在分析荷兰语与南非荷兰语之间的差别时，用乡下人的对话来图解后者。1848 年，英国《好望角文学杂志》发表了札记《德班的一天》，生动描写了马的奔腾，在赛马期间，一些观众在用南非荷兰语交换观感。1844—1850 年间，出版家卢伊-安里·梅兰在他的荷兰文报纸《开普边境专页》上，发表了一组南非荷兰语随笔，描写一天的生活和使人开心的情景。但所有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南非荷兰语语言本身决定了文体的低调。十九世纪下半叶六十年代的时候，南非荷兰语才积极向政论、诗歌和儿童文学渗透。

·718

这一时期的文学另类是称为“大迁徙”的参加者所写的日记、旅途随笔和回忆录。“大迁徙”大约开始于1834年，是布尔人为寻找“生活空间”和建立脱离英国王权而独立的德兰士瓦与奥兰治共和国，向开普敦以北进行的扩张。“迁徙”编年史家当中的突出人物，是路易斯·特里哈尔茨(《日记》，1836—1838年)和埃拉兹姆斯·斯米特(《日记》，1836—1839年)。像十七至十八世纪首批移民的日记一样(见本书第四、五卷)，这些纪事，尤其是特里哈尔茨的《日记》，都以人类文献的真实可靠，开天辟地同严峻美丽的大自然进行斗争的浪漫主义精神，观察的敏锐细密，细节描写的生动具体见长。

“迁徙”的波折和参加者的名字，后来成了许多阿非利加涅尔散文家和诗人欣喜注视的对象，尽管他们当中有个别人，能够识别“迁徙”给整个阿非利加涅尔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所投下的种族主义阴影。“迁徙”带给当地霍屯督人、布须曼人和其他部族的命运，就跟年轻而精明强干的美国民族征服遥远(野蛮)的西部以后，带给本地印第安人的命运一样，其差别仅在于布尔人的进逼更加残酷，因为他们自身也受过英国人的排挤。

编年史《大迁徙》，是以“走了样”的荷兰语和南非荷兰语的混合语写成的。体裁上同它接近的是《指挥官谢泼尔斯的日记》(1938)，由一个青年军官用荷兰文写成。通篇讲的都是作者道德如何高尚，意志如何坚强。

如此看来，十九世纪上半期还没有创作出成形的南非荷兰语文学作品，虽说那时它已得到了广泛应用。

结　束　语

本卷阐述的时代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丰富的时代之一，而且留下了巨大而不朽的遗产。有多少人们从童年便很熟悉，使地球上任何一个人都会感到亲切的形象，又有多少至今仍迫使我们谈论、争辩和思索的深刻思想啊。

当然，每个时代都向未来的人类馈赠着它最有价值的珍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十九世纪上半叶也不例外。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如果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拥有广阔前景的时代。它像一个孕育着未来萌芽的子房，推出了至今还在发展的许多民族新文学：中南欧的、俄罗斯本土的、拉丁美洲的、大洋洲的、非洲的、加拿大的和亚洲的。

十九世纪下半叶被推到世界艺术中心的俄罗斯文学，从这一时期开始腾飞。

早年出现的多种艺术现象，这时已经奠定了基础，或者说，它们的最完整和最准确的形式已表现出来。古典现实主义时代的来临，革命民主主义文学的形成，浪漫主义文学的继续发展，以至于超出了本卷所研究的时代界限，而且它的许多倾向至今还有其生命力。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浪漫主义方法的内部矛盾以全新方式被揭示出来，显示出浪漫主义者的远见卓识及其幻想的勃勃生机。西欧编的引言和本卷的许多章节谈及的浪漫主义的整个乌托邦性质，为二十世纪众多文学流派所继承，只是这些乌托邦（民族统一的乌托邦、个人独善其身的乌托邦、人与自然相一致的乌托邦等等）在表示出自己与资产阶级进步的势不两立之后，都更迅速、更无可挽回地遭到了毁灭性的失败。继承了浪漫主义矛盾的种种流派（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命运，较之浪漫主义本身的命运更加悲惨。一个更加敌视艺术的毁灭性的时代降临了。但浪漫主义也把另一种艺术轻轻推向了生活，这种艺术能够克服现实矛盾使人训练有素地参加到世界的革命性改造中去。

至于说到批判现实主义，它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迅速发展，通过一些

伟大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创作达到了文学顶峰，并以许多崭新的特点丰富了本世纪的文学（对人的内心世界及其精神和道德问题的浓厚兴趣，常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对社会生活的注意力受到损害）。

“世界文学”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产生的，它是作为总结语言艺术漫长发展道路的一种思想、一种理论前提而出现的，但是这种思想同历史发展的方向完全符合。问题不仅仅在于以后文学的相互联系，通过翻译、作家间的私人交往和相互影响的加强而无限地增加，而且还在于产生了文学发展中的平衡和多样化过程。本卷诸章就探讨了一些民族是怎样开始形成现代文学，或者说“欧化型”文学如何取代中世纪文学（往往与之并行）的问题。东方和南欧的这个过程特别明显，而这反过来又使交往和相互影响变得更加容易。

本卷所研究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是开端的时代，对于直至二十世纪末的各个时期的文学过程来说，都至为关键。

人名索引*

* 本索引包括作者、研究者、历史人物的名称,神话和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并未列入。

参 考 书 目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ОСНОВОПОЛОЖНИКОВ 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

Маркс К. Англий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0. — С. 648.

Маркс К. Классовая борьба во Франции с 1848 по 1850 г.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7. — С. 5—110.

К. Маркс — Ф. Энгельсу, 26 окт. 1854 г.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28. — С. 338—343.

К. Маркс — Ф. Энгельсу, 25 февр. 1867 г.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31. — С. 234.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Великие мужи эмиграции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8. — С. 247—352.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Готфрид Кинкаль // 2-е изд. — Т. 7. — С. 315—317.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Манифест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4. — С. 419—459.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Немецкая идеология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3. — С. 7—544.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вятое семейство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2. — С. 3—230.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Томас Карлейль.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амфлеты» // Соч. — 2-е изд. — Т. 7. — С. 268—279.

Энгельс Ф. Александр Юнг. «Лекции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емцев»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 — С. 473—486.

Энгельс Ф. Быстрые успехи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Германии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2. — С. 521—522.

Ф. Энгельс. [Письма В. Греберу]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41. — С. 398—402, 415—419, 421—424, 431—437.

Энгельс Ф. Движение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 — С. 542—543.

Энгельс Ф. «Истинные социалисты»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3. — С. 545—586.

Ф. Энгельс — Л. Лафарг, 13 дек. 1883 г.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36. — С. 66—67.

Энгельс Ф. Людвиг Фейербах и конец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немец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21. — С. 273—317.

Энгельс Ф. Манифест г-на Ламартина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4. — С. 346—348.

Энгельс Ф. Немец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в стихах и в проз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4. — С. 208—248.

Энгельс Ф. 《Песня подмастерья》 Георга Веерта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Т. 21 — С. 3—6.

Энгельс Ф. Положение Англии: Томас Карлейль.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 — С. 572—597.

Энгельс Ф. По и Рейн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3 — С. 233—281.

Энгельс Ф.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семьи, частной соб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21. — С. 23—178.

Энгельс Ф. Развитие социализма от утопии к науке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19. — С. 185—230.

Энгельс Ф. Революция и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в Германии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8. — С. 3—113.

Энгельс Ф. Эрнст Мориц Арндт // Маркс К., Энгельс Ф. Соч. — 2-е изд. — Т. 41. — С. 117—131.

Ленин В. И. Евгений Потье: (К 25-летию его смерт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2. — С. 273—274.

Ленин В. И. Из прошлого рабочей печати в России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5. — С. 93—101.

Ленин В. И. Карл Маркс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6. — С. 43—93.

Ленин В. И. К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 — С. 119—262.

Ленин В. И.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гордости великороссов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6. — С. 106—110.

Ленин В. И. Памяти Герцен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1 — С. 255—262.

Ленин В. И. Три источника и три составных части марксизма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23. — С. 40—48.

Ленин В. И. Что делать? // Полн. собр. соч. — Т. 6. — С. 1—192.

ОБЩИЕ РАБОТЫ

Encyclopédie du romantisme: Peinture, sculpture, architecture, littérature, musique. — P.,

1980.

The Romantic movement bibliography, 1936—1970: In 7 vol. — Ann Arbor, 1973.

Le romantisme fantastique: Bibliographie sélective réalisée par J. Bellanger et al. — P., 1983.

Аникст А. А. История учений о драме: История драмы на Западе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 Эпоха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80.

Анисимов И. И. Классическ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1960.

Ванслов В. В. Эстетика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66.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русской и зарубеж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83.

Вопросы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го миропонимания, метода, жанра и стиля. — Калинин, 1986.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 Отв. ред. И. Неупокоева, И. Шетер. — М., 1973.

Елизарова М. Е. и др.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М., 1964.

Елистратова А. А. Гоголь и проблемы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 М., 1972.

Из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XIX века / Редкол.: У. А. Гуральник и др. — М., 1962.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63.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 / Под общ. ред. С. С. Мокульского и др. — М., 1963—1964. — Т. 3—4.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800—1900 гг.): В 3 т. / Под ред. Ф. Д. Батюшкова, при участии Ф. А. Брауна. — М., 1912—1914.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фило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ей ун-тов. Ч. 1 / Под ред. А. С. Дмитриева. — М., 1979.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пед. ин-тов / Под ред. Я. Н. Засурского, С. В. Тураева. — М., 1982.

Кулешов 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в XIX веке: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77.

Ладыгин М. Б.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 М., 1981.

Найденова-Стоилова Г.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ят образ на творческата личност. — С., 1968.

Неизучен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Редкол.: Ю. А. Кожевников и др. — М., 1975.

Неупокоева И. Г.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поэм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Опыт типологии жанра. — М., 1971.

От классицизма к романтизму: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 связей рус. лит.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70.

От романтизма к реализму: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 связей рус. лит.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78.

Петров С. М. Критический реализм: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филол.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ей ун-тов и пед. ин-тов. — 2-е изд. — М., 1980.

Польско-рус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 Редкол.: Н. И. Балашов и др. — М., 1970.
Проблемы романтизма: Сб. ст.: В 2 т. — М., 1967—1971.
Проблемы эстетик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романтиков: Межвуз. темат. сб. — Калинин, 1982.
Ранние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е веяния: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 связей рус. лит.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72.
Романтизм и реализм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х / Науч. ред. И. З. Нуруллин. — Казань, 1982.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метод и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русской и зарубеж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б. ст. / Ред. Л. Г. Юдкевич. — Казань, 1975.
Сиповский И. И. Пушкин, Байрон и Шатобриан. — СПб., 1899.
Шахов А. А. Очерк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первую половину XIX века. — 4-е изд. — СПб., 1913.
Шиллер Ф.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В 3 т. — М., 1935—1936. — Т. 1—2.
Эпоха романтизма: Из истории междунар. связей рус. лит.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Л., 1975.
Abercrombie L. Romanticism. — N. Y., 1927.
Alexander M. The poetic self: Towards a phenomenology of romanticism. — New Delhi, 1979.
Barzun J. Classic, Romantic and modern. — Chicago; L., 1975.
Begriffsbestimmung der Romantik / Hrsg. von H. Prang. — Darmstadt, 1968.
Brandes G. Hovedstronninger i det, nittende aarhundredes litteratur. — København, 1872—1890. Bd. 1—6. Рус. пер.: *Брандес Г.* Собр. соч.: В 20 т. / Пер. М. В. Лучицкой.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Пб., 1906—1914. — Т. 2—13, 20.
Brie F. Exotismus der Sinne: Eine Studie zur Psychologie der Romantik. — Heidelberg, 1920.
Călin V. Romantismul. — Buc., 1975.
Dédéyan Ch. Le drame romantique en Europe: France, Angleterre, Allemagne, Italie, Espagne, Russie. — P., 1982.
De Keyser E. L' Occident romantique, 1789—1850. — Genève, 1965.
Fairchild H. N. The Romantic quest. — N. Y., 1931.
Farinelli A. Il romanticismo nel mondo latino: In 3 vol. — Torino, 1927.
Jones H. M. Revolution and Romanticism. — Cambridge (Mass.), 1974.
Meeüs A. de. Le romantisme. — 7ᵉ éd. — P., 1948.
The modern world. / Ed. by D. Daiches, A. Thorlby. — L., 1975. — Vol. 1: Hopes.
Popa M. Călătoriile epocii romantice. — Buc., 1972.
Reed W. L. Meditations on the hero: A study of the Romantic hero in nineteenth-century fiction. — New Haven; L., 1974.

Romanticism: A coll. of documents / Ed. by J. B. Halsted. — N. Y., 1969.
Romanticism: Vistas, instances, continuities / Ed. by D. Thorburn, G. Hartman. — Ithaca; L., 1973.
Romantismul românesc şi romantismul european / Sub îngr.: A. Balaci et al. — Buc., 1970.
Schenk H. G. The mind of the European romantics: An essay in cultural history / With a pref. by I. Berlin. — L., 1966.
Sötér I. Werthertol Szilveszterig: Irodalomtörténeti tanulmányok. — Bp., 1976.
Tacciu E. Mitologie romantică. — Buc., 1973.
Vaughan W. Romantic art. — L., 1978.
Wellek R.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 L., 1955. — Vol. 2: The romantic age.

I.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ПАДНОЙ ЕВРОПЫ

Боборыкин П. Д. Роман на Западе за две трети века. — СПб., 1900.
Гинзбург Л. Я. О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й прозе. — Л., 1971.
Де Ла-Барт Ф.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на Западе в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столетия: 1. Люди сумеречной поры; 2.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й синтез (1780—1830): Лекции. — М., 1914.
Затонский Д. В. Европейский реализм XIX в.: Линии и лики. — Киев, 1984.
Ивашева В. В. История зарубеж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 XIX века. — М., 1955. — Т. 1.
Игнатов С. 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 М.; Л., 1940.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 Мировая скорбь в конце XVIII и в начале XIX века: Ее основные этические и социальные мотивы и их отражение в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м творчестве. — 2 изд., испр. — СПб., 1910.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манифесты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их романтиков / Отв. ред. А. С. Дмитриев. — М., 1980.
Митов Д. Б., Пешев А. Г.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т Великата френска буржоазна революция до Парижката комуна. — 3-то изд. — С., 1975.
Реизов Б. Г. Между классицизмом и романтизмом: Спор о драме в период Первой империи. — Л., 1962.
Тураев С. В. От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к романтизму: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героя и изменение жанровых структур в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конца XVIII — начала XIX в.). — М., 1983.
Abrams M. H. 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 — N. Y., 1953.
Abrams M. H. Natural supernaturalism: Tradition and revolution in Romantic literature. — L., 1971.
Béguin A. L'âme romantique et le rêve. — P., 1946.
Bottacchiari R. La rivoluzione romantica. — Roma, 1943.

Bottoni L. Drammaturgia romantica: I paradigmi culturali. — Pisa, 1981.

Bowra C. M. The Romantic imagination. — L., 1961.

Bourke T. Stilbruch als Stilmittel: Studien zur Lit. der Spät-u. Nachromantik. — Frankfurt a. M. etc., 1980.

Bousquet J. Les thèmes du rêve dans la littérature romantique (France, Angleterre, Allemagne): Essai sur la naissance et l'évolution des images: Thèse. — P., 1964.

Bremond H. Pour le romantisme. — P., 1923.

Černý V. Essai sur le titanisme dans la poésie romantique occidentale entre 1815 et 1850. — Pr., 1935.

Dietrich M. Europäische Dramaturgie im 19. Jahrhundert. — Graz; Köln, 1961.

Die europäische Romantik / Mit Beitr. von E. Behler et al. — Frankfurt a. M., 1972.

Europäische Romantik: In 2 Bd. — Wiesbaden, 1982.

Furst L. R. The contours of European Romanticism. — L., 1979.

Furst L. R. Romanticism in perspectiv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spects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s in England, France and Germany. — L. etc., 1969.

Guichard L. La musique et les lettres au temps du romantisme. — P., 1955.

Hoffmeister G. Deutsche und europäische Romantik. — Stuttgart, 1978.

Immerwahr R. Romantisch: Genese und Tradition einer Denkform. — Frankfurt a. M., 1972.

Kroeber K. The artifice of reality: Poetic style in Wordsworth, Foscolo, Keats and Leopardi. — Madison; Milwaukee, 1964.

La Guardia A. de. Poesía dramática del romanticismo. — Buenos Aires, 1973.

Laini G. Il romanticismo europeo: In 2 vol. — Firenze, 1959.

Locker M. Les romantismes: Allemagne; Angleterre; France. — P., 1964.

McGann J. J. The romantic ideology: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 Chicago; L., 1983.

Maigron L. Le Romantisme et les moeurs: Essai d'étude historique et sociale d'après des documents inédits. — P., 1910. Рус. пер.: *Мегрон Л*. Романтизм и нравы / Пер. Т. Х; Предисл. И. Игнатова. — М., 1914.

Mastellone S. Storia ideologica d'Europa da Sieyès a Marx (1789—1848). — 2-a ed. — Firenze, 1984.

Miller D. A. Narrative and its discontents: Problems of closure in the traditional novel. — Princeton, 1981.

Nemoianu V. The taming of romanticism: Europ. lit. a. the age of Biedermeier. — Cambridge (Mass.); L., 1984.

Olteanu T. Morfologia romanului european în secolul al XIX-lea. — Buc., 1977.

Parallelen und Kontraste: Studien zu lit. Wechselbeziehungen in Europa zwischen 1750 u. 1850. — B.; Weimar, 1983.

Praz M. La carne, la morte e il diavolo nella letteratura romantica. — 3-a ed. — Firenze,

1966.

Propyläen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 B., 1983. — Bd. 4: Aufklärung und Romantik, 1700—1830.

Propyläen Geschichte der Literatur. — B., 1984. — Bd. 5: Das bürgerliche Zeitalter, 1830—1914.

Puppo M. Il romanticismo. — 6-a ed., riv. e ampl. — Roma, 1979.

Raynaud L. Le romantisme: Les origines anglo-germaniqu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et traditions nationales. Le réveil du génie français. — P., 1926.

《Romantic》 and its cognates: The European history of a word / Ed. by H. Eichner. — Toronto, 1972.

Talmon J. L. Romanticism and revolt: Europe, 1815—1848. — L., 1967.

Van Tieghem P. Le romantisme dans la littérature européenne. — P., 1969.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НЕМ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Fetzer G. Die Klassiker der deutscher Literatur. — Düsseldorf, 1983.

Goedeke K. Grundriss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Dichtung. — Dresden, 1906—1959. — Bd. 7—14.

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zur deutschen Klassik, 1750—1850. — B.; Weimar, 1959—1985. — F. 1—26. —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Internationale Bibliographie zur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 Hrsg. unter der Leitung von G. Albrecht, G. Dahlke. — B., 1971. — Bd. 2, H. 1.

Meyer R. M. Grundriss der neueren deutschen Literaturgeschichte. — B., 1907.

*

Берковский Н. Я. Романтизм в Германии. — Л., 1973.

Гайм Р.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школа. — М., 1891.

Дейч А. Судьбы поэтов: Гельдерлин, Клейст, Гейне, — 2-е изд. — М., 1974.

История неме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5 т. — М., 1966. — Т. 3.

Рейман П. Основные течения в неме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1750—1848: Пер. с нем. — М., 1959.

Arbeiten mit der Romantik heute / Hrsg. von H. Hess, P. Liebers. — B., 1978.

Benz R. Die deutsche Romantik: Geschichte einer geistigen Bewegung. — 5. Aufl. — Stuttgart, 1956.

Brion M. L'allemagne romantique: In 2 vol. — P., 1962. Deutsche Dichter der Romantik / Hrsg. von B. von Wiese. — B. (West), 1983.

Die deutsche Romantik/Hrsg. von H. Steffen. — Göttingen, 1967.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1789 bis 1830. — B., 1978.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Bd. 7).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m 18.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 / Hrsg. von V. Žmegač. — Königstein/Ts., 1978. — Bd. 1, T. 2.

Heise W. Realistik und Utopie: Aufsätze zur dt. Lit. zwischen Lessing und Heine. — B., 1982.

Hillman H. Bildlichkeit der deutschen Romantik. — Frankfurt a. M., 1971.

Huch R. Die Romantik. — Leipzig, 1924.

Kluckhohn P. Deutsche Romantik. — Leipzig, 1924.

Koch F. Idee und Wirklichkeit: Deutsche Dichtung zwischen Romantik und Naturalismus: In 2 Bd. — Düsseldorf, 1956.

Lahnstein P. Adalbert von Chamisso: Der Preusse aus Frankreich. — München, 1984.

Mehring F. Aufsätze zu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Klopstock bis Weerth. — B., 1975. — (Ges. Schriften; Bd. 10).

Meixner H. Romantischer Figuralismus. — Frankfurt a. M., 1971.

Menhennet A. The Romantic Movement. — L., 1981.

Mittner L.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tedesca: In 2 vol. — Torino, 1971. — Vol. 1.

Romantik in Deutschland / Hrsg. von R. Brinkmann. — Stuttgart, 1978.

Romantikforschung seit 1945 / Hrsg. von K. Peter. — Königstein/Ts., 1980.

Der romantische Rückfall in der Kritik der Zeit. — B., 1963.

Sengle F. Biedermeierzeit: Deutsche Literatur im Spannungsfeld zwischen Restauration und Revolution, 1815—1848. — Stuttgart, 1971.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ЧАЛА XIX в.

Габитова Р. М. Философия немец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78.

Дмитриев А. С. Проблемы иен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75.

Дмитриев А. С.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Августа Вильгельма Шлегеля. — М., 1974.

Achim von Arnim und die ihm nahe standen: In 3 Bd. / Hrsg. von R. Steig, H. Grimm. — Bern, 1970.

Arnim-Bibliographie / Hrsg. von O. Mallon. — B., 1925.

Berger K. Theodor Körner. — Bielefeld; Leipzig, 1912.

Brentano-Bibliographie / Hrsg. von O. Mallon. — Hildesheim, 1965.

Clemens Brentano: Beiträge des Kolloquiums / Hrsg. von D. Lüders. — Tübingen, 1980.

Enzensberger H. M. Brentanos Poetik. — München, 1961.

Gajek B. Homo poeta: (Brentano). — Frankfurt a. M., 1971.

Körner-Bibliographie / Zusgest. von E. Peschel. — Leipzig, 1891.

Pepperle I. Junghegelianische Geschichtsphilosophie und Kunsttheorie. — B., 1978.

Sternberg T. H. Die Lyrik Achim von Arnims. — Bonn, 1983.

Walzel O. Deutsche Romantik: In 2 Bd. — 4. Aufl. — Leipzig; B., 1918.

НОВАЛИС

Birven H. Novalis: Magus der Romantik. — Büdingen, 1959.

Haywood B. Novalis: The veil of imagery: A study of the poetic works of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 (1772—1801). — 's-Gravenhage, 1959.

Novalis: Beiträge zu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 Friedrich von Hardenbergs. — Darmstadt, 1970.

ТИК

Kern J. P. Ludwig Tieck: Dichter einer Krise. — Heidelberg, 1977.

Ludwig Tieck / Hrsg. von W. Segebrecht. — Darmstadt, 1976.

Minder R. Un poète romantique allemand: Ludwig Tieck. — P., 1936.

Ribbat E. Ludwig Tieck. — B., 1978.

ГЕЛЬДЕРЛИН

Beissner F. Hölderlin. — Weimar, 1961.

Bertaux P. Hölderlin-Variationen. — Frankfurt a. M., 1984.

Binder W. Hölderlin-Aufsätze. — Frankfurt a. M., 1970.

Delorme M. Hölderlin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Monaco, 1959.

Hölderlin / Hrsg. von A. Kelletat. — Tübingen, 1961.

Michel W. Das Leben von Friedrich Hölderlin. — Frankfurt a. M., 1967.

Mieth G. Friedrich Hölderlin: Dichter der bürgerlich-demokratischen Revolution. — B., 1978.

Peacock R. Hölderlin. — L.; N. Y., 1973.

КЛЕЙСТ

Birkenhauer K. Kleist. — Tübingen, 1977.

Gerlach K. Heinrich von Kleist. — Dortmund, 1971.

Heinrich von Kleist / Hrsg. von W. Müller-Seidel. — Darmstadt, 1967.

Kanzog K. Edition und Engagement: 150 Jahre Editiongeschichte der Werke und Briefe Heinrich von Kleists: In 2 Bd. — B.; N. Y., 1979.

Kleist: Ein Lesebild in Briefen und zeitgenössischen Berichten. — B., 1984.

Minde-Pouet G. Heinrich von Kleist: Seine Sprache und sein Stil. — Weimar, 1897.

Sembdner H. In Sachen von Kleist. — München, 1974.

Streller S. Das dramatische Werk von Heinrich von Kleist. — B., 1966.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ГОДЫ 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ОЙ РЕАКЦИИ

Schwarz G. Ludwig Uhland. — Mühlacher, 1964.

Selbmann R. Der deutsche Bildungs-roman. — Stuttgart, 1984.

ГОФМАН

Ботникова А.Б. Э. Т. А. Гофман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 Воронеж, 1977.

Житомирская З.В. Э. Т. А. Гофман: Библиогр.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 М., 1964.

Йгнатов С.С. Э. Т. А. Гофман: Личност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14.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Э. Т. А. Гофмана. — М., 1982.

Auhuber F. In einem fernen dunklen Spiegel: E. T. A. Hoffmanns Poetisirung der Medizen. — Opladen, 1986.

Beardsley C. M. E. T. A. Hoffmann: Die Gestalt des Meisters in seinen Märchen. — Bonn, 1975.

Gramer T. Das Groteske bei E. T. A. Hoffmann. — München, 1966.

E. T. A. Hoffmann. -Darmstadt, 1976.

E. T. A. Hoffmann: Leben und Werk in Briefen, Selbstzeugnissen und Zeitdokumenten. — B., 1976.

Eilert H. Theater in der Erzählkunst: Eine Studie zum Werk E. T. A. Hoffmanng. — Tübingen, 1977.

ЭЙХЕНДОРФ

Eichendorff heute / Hrsg. von P. Stöcklein. — München, 1960.

Krabiel K.-D. Joseph von Eichendorff. — Frankfurt a. M., 1971.

Schwarz E. Joseph von Eichendorff. — N. Y., 1972.

ШАМИССО

Feudel W. Adalbert von Chamisso. — Leipzig, 1971.

ГРАББЕ

Böttger F. Grabbe. — B., 1963.

Ehrlich L. 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 — B., 1983.

ГЁТЕ

Кессель Л.М. Гёте и《Западно-восточный диван》. — М., 1973.

Эккерман И.П. Разговоры с Гёте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его жизни / Пер. Н. Н. Манн; Вступ. ст. Н. Н. Вильмонта. — М., 1981.

Alt C. Studien zur Entstehungsgeschichte von Goethes 《Dichtung und Wahrheit》. — München, 1898.

Blessin S. Die Romane Goethes. — Königstein/Ts., 1979.

Gidion M. Zur Darstellungsweise von Goethes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 Göttingen, 1969.

Klingenberg A. Goethes Roman 《Wilhelm Meisters Wanderjahre oder die Entsagenden》. — B.; Weimar, 1972.

Schödlbauer U. Kunsterfahrung als Weltverstehen: Die esthetische Form von 《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 Heidelberg, 1984.

Träger C. Novellistisches Erzählen bei Goethe. — B., 1984.

ЛИТЕРАТУРА 1830—1849 гг.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 Ю. 《Молодая Германия》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Л., 1969.

Дымшиц А. К. Маркс и Ф. Энгельс и нем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2-е изд. — М., 1977.

Матузова Н. М. Проза Г. Веерта в 《Новой Рейнской газете》. — Киев, 1957.

Николаева Т. С. Поэзия немец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848 г. — Саратов, 1961.

Тураев С. В. Георг Веерт и нем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еволюции 1848 года. —М., 1963.

Шиллер Ф. П. Георг Веерт: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нем. соц. поэзии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 М.; Л., 1932.

Шиллер Ф.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немецко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оэзии XIX века. — М., 1933.

Шиллер Ф. П. Поэзия герма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1848 года. — М., 1938.

Эйдук Я. Фердинанд Фрейлиграт и Карл Маркс. — М.; Л., 1936.

Betz A. Ästhetik und Politik. — München, 1971.

Buchner W. Ferdinand Freiligrath: Ein Dichterleben in Briefen: In 2 Bd. — Lahr, 1882.

Büttner W. Georg Herwegh — ein Sänger des Proletariats. — B., 1976.

Demokratisch revolutionäre Literatur im Deutschland des Vormärz / Hrsg. von G. Mattenklott, K. R. Scherpe. — Kronberg/Ts., 1974.

Dietze W. Junges Deutschland und deutsche Klassik: Zur Ästhetik und Literaturtheorie des Vormärz. — B., 1962.

Dobert E. W. Karl Gutzkow und seine Zeit. — Bern; München, 1968.

Drewitz I. Bettine von Arnim. — Düsseldorf; Köln, 1969.

Edward Mörike / Hrsg. von V. G. Doerksen. — Darmstadt, 1975.

Eulenberg H. Ferdinand Freiligrath. — B., 1948.

Finger W. Adolf Glassbrenner: Ein Vorkämpfer die Demokratie. — B., 1952.

Fleury V. Le poète George Herwegh. — P., 1911.

Georg Büchner / Hrsg. von W. Martens. — Darmstadt, 1965.

Das Georg Büchner-Schrifttum bis 1965: Eine internt. Bibliogr. / Zusgest. von W. Schlick. — Hildesheim, 1968.

Georg Weerth: Werk und Wirkung. — B., 1974.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1830 bis zum Ausgang des 19. Jahrhunderts. — B., 1975 —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von den Anfängen bis zur Gegenwart; Bd. 8).

Helps A., *Howard* E. J. Bettina. — N. Y., S. 1.

Hensold K. G. Herwegh und seine deutsche Vorbilder. — Nürnberg, 1916.

Heselhaus C. Annette von Droste-Hülshoff. — Düsseldorf, 1971.

Hinderer W. Büchner-Kommentar zum dichterischen Werk. — München, 1977.

Högel R. Der Held im Drama Georg Büchners, der Jungdeutschen und Friedrich Hebbels. — Bonn, 1969.

Herwegh M. Le Centenaire de Georges Herwegh. — P., 1917.

Kobel E. Georg Büchner. — B.; N. Y., 1974.

Koopmann H. Das Junge Deutschland. — Stuttgart, 1970.

Mayer H. Georg Büchner und seine Zeit. — B., 1960.

Politische Avantgarde, 1830—1840: In 2 Bd. — Frankfurt a. M., 1972.

Rosenberg R. Literaturverhältnisse im deutschen Vormärz. — B., 1976.

Schink R. Hoffmanns von Fallersleben vaterländische und gesellschaft-skritische Lyrik. — Stuttgart, 1981.

Storz G. Eduard Mörike. — Stuttgart, 1967.

Slessarev H. Eduard Mörike. — N. Y., 1970.

Streitpunkt Vormärz: Beiträge zur Kritik bürgerlicher und revisionistischer Erbe-Auffassungen. — B., 1977.

Weerth K. G. Weerth, der Dichter des Proletariats. — Leipzig, 1930.

Wiese B. *von* Karl Immermann: Sein Werk und sein Leben. — B.; Zürich, 1969.

Windfuhr M. Immermans erzählerisches Werk. — Giessen, 1957.

ГЕЙНЕ

Гиждеу С. П. Лирика Генриха Гейне. — М., 1983.

Гордон Я. И. Гейне в России: В 3 т. — Душанбе, 1973—1983.

Дейч А. Поэтический мир Генриха Гейне. — М., 1963.

Левинтон А. Г. Генрих Гейне: Библиогр.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 М., 1958.

Шиллер Ф. П. Генрих Гейне. — М., 1962.

Berendsohn W. A. Die künstlerische Entwicklung Heines im Buch der Lieder. — Stockholm, 1970.

Brod M. Heinrich Heine. — Amsterdam, 1934.

Grab W. Heinrich Heine als politischer Dichter. — Heidelberg, 1982.

Grubačić S. Heines Erzählprosa. — Stuttgart, 1975.

Heinrich Heine: Artistik und Engagement. — Stuttgart, 1977.

Heinrich Heine, 1797—1856: Inter. Veranstaltungszyklus zum 125. Todesjahr. — Trier, 1981.

Heinrich Heine: Streitbarer Humanist und volksverbundener Dichter. — Weimar, 1973.

Heinrich Heine und die Zeitgenossen. — B. ; Weimar, 1979.

Houben H. H. Gespräche mit Heine. — Potsdam, 1948.

Kaufmann H. Politisches Gedicht und klassische Dichtung: Heinrich Heine《Deutschland. Ein Wintermärchen》. — B. , 1958.

Krüger E. Heine und Hegel: Dichtung, Philosophie und Politik bei Heinrich Heine. — Kronberg, 1977.

Kruse I. A. Heine und Düsseldorf. — Düsseldorf, 1984.

Seifert S. Heine-Bibliographie, 1954—1964. — B. ; Weimar, 1968.

Wadepuhl W. Heinrich Heine. — Köln; Wien, 1974.

Wiese B. Signaturen: Zu Heinrich Heine und seinem Werk. — B. , 1976.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АВСТР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лободкин Г. С. Ве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комедия XIX века. — М. , 1985.

Adel K. Geist und Wirklichkeit. — Wien, 1967.

Bauer R. La réalité, royaune, de dieu: Etudes sur l'originalité du théâtre viennois dans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 siecle. — München, 1965.

Börner W. Ferdinand Raimund. — Leipzig, 1905.

Conrad G. Johann Nepomuk Nestroy, 1801—1862: Bibliogr. — [West] Berlin, 1980.

Deutsch-öterreich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 Hrsg. von I. W. Nagl, J. Zeidler. — Wien; Leipzig, S. a. — Bd. 2.

Forst de Battaglia O. Johann Nestroy. — München, 1962.

Das Grillparzer-Bild des 20. Jahrhunderts / Hrsg. von H. Kindermann. — Wien, 1972.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275).

Harding L. V. The dramatic art of Ferdinand Raimund and Johann Nestroy. — The Hague; Paris, 1974.

Hein Y. Das Wiener Volkstheater: Raimund und Nestroy. — Darms-tadt, 1978.

Kahl K. Johann Nestroy. — Wien etc. , 1970.

Kainz F. Grillparzer als Denker. — Wien, 1975. — (Ö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d. 280, T. 2).

Kaiser J. Grillparzers dramatischer Stil. — München, 1961.

Literatur und Literaturgeschichte in Österreich / Hrsg. von I. T. Erdélyi. — Budapest; Wien, 1979. — (Sondernummer der Zeitschrift Helikon).

Lux J. A. Ein Jahrtausend österreichischer Dichtung. — Wien, 1948.
Mautner F. H. Nestroy. — Heidelberg, 1974.
Michalski J. Ferdinand Raimund. — N. Y., 1968.
Mühlher R. Osterreichische Dichter seit Grillparzer. — Wien, 1973.
Naumann W. Franz Grillparzer: Das dichterische Werk. — Stuttgart etc., 1967.
Politzer H. Franz Grillparzer. — Wien etc., 1972.
Preisner R. Johann Nepomuk Nestroy. — München, 1968.
Reynaud L. N. Lenau, poète lyrique. — P., 1905.
Roustan L. Lenau et son temps. — P., 1898.
Statkov D. Nikolaus Lenaus poetische Welt. — Bonn, 1971.
Stock K., *Heilinger R.*, *Stock M.* Personalbibliographien österreichischer Dichter und Schriftsteller. — Pullach bei München, 1972.
Turóczi-Trostler J. Lenau/Übers. von B. Heilig. — B., 1961.
Wachsmann M. Spielleben als Stilleben in Ferdinand Raimunds Zauberspielen. — Augsburg, 1975.
Wells G. A. The plays of Grillparzer. — L. etc., 1969.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лексеев М. П. Из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Этюды. Очерк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Л., 1960.
История англ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Л., 1953—1955. Т. 2, вып. 1/2.
Клименко Е. И.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 Л., 1971.
Chew S. C.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1789—1939). — N. Y., 1948. — (A literary history of England; Vol. 4).
Garnett R. A., *Gosse E.* English Literature. — N. Y., 1935. — Vol. 3.
Legois E. A., *Cazamian L.* 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 L., 1927. — Vol. 2.
Taine H.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anglaise: En 2 vol. — P., 1863—1865. Рус. пер.: *Тэн И.* Новейшая англ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ее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х. — СПб., 1876.

РОМАНТИЗМ

Дьяконова Н. Я. Англий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Проблемы эстетики. — М., 1978.
Елистратова А. А. Наследие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1960.
Розанов М. Н.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англ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М., 1922. — Ч. 1: Эпоха Байрона.
Beers H. A. A histor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in the XIX century. — L., 1926.

Cobbau A. Edmund Burke and the revolt against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inking of Burke, Wordsworth, Coleridge and Southey. — L., 1960.

De Quincey T. Reminiscences of the English lake poets / Introd. and notes by J. E. Jordan. — L., 1961.

Donahue F. W. Dramatic character in the English Romantic age. — Princeton (N. J.), 1970.

The English Romantic poets and essayist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 — N. Y., 1957.

Farrell J. P. Revolution as tragedy: The dilemma of the moderate from Scott to Arnold. — Ithaca, 1980.

Frye N. A study of English romanticism. — N. Y., 1968.

Glen H. Vision and disenchantment: Blake's songs and Wordsworth's lyrical ballads. — Cambridge, 1983.

Hancock A. 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English poets: A study in historical criticism. — Port Washington, 1967.

Harris R. W. Romanticism and the social order, 1780—1830. — L., 1969.

Literature of the romantic period, 1750—1850 / Ed. by R. T. Davies, B. G. Beathy. — Liverpool, 1976.

McFarland T. Romanticism and the forms of ruin: Wordsworth, Coleridge, and modalities of fragmentation. — Princeton (N. J.), 1981.

McGann J. J. The romantic ideology: A critical investigation. — Chicago; L., 1983.

Mellor A. K. English romantic irony. — Cambridge (Mass.), 1980.

Newlyn L. Coleridge, Wordsworth, and the Language of allusion. — Oxford, 1986.

Parrish S. M. The art of the lyrical ballads. — Cambridge (Mass.), 1973.

Rajan T. Dark interpreter: The discource of Romanticism. — Ithaca; L., 1980.

Rekowski P.-F. Die Erzählhaltung in den historischen Romanen von Walter Scott und Charles Dickens. — Bern, 1975.

Romantic perspectives: The work of Crabbe, Blake, 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as seen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by their contemporaries and by themselves. — L., 1964.

The Romantics / Ed. by S. Prickett. — L., 1981.

Simpson D. Irony and authority in Romantic poetry. — L., 1979.

Simpson D. Wordsworth and the figurings of the real. — L., 1981.

Symons A. The romantic movements in English poetry. — N. Y., 1969.

Wain J. Contemporary review of romantic poetry. — L., 1953.

Watson J. K. English poetry of the romantic period, 1789—1830. — L., 1985.

БЛЕЙК

Некрасова Е. А. Творчество Уильяма Блейка. — М., 1962.

Beer F. Blake's humanism. — Manchester, 1968.
Bindman D. Blake as an artist. — Oxford, 1977.
Bronowski F. William Blake and the age of revolution. — N. Y., 1965.
Damon S. F. William Blake: his philosophy and symbols. — L., 1969.
Frye N. Fearful symmetry: A study of William Blake. — Princeton, 1947.
Gardner S. Blake. — L., 1976.
James L. D. William Blake: The finger on the furnace. — N. Y., 1956.
Lindsay J. William Blake: his life and work. — L., 1978.
Murry J. M. William Blake. — N. Y., 1964.
Raine K. William Blake. — L., 1977.
Schorer M. William Blake: The politics of vision. — N. Y., 1946.

ВОРДСВОРТ

Coe C. N. Wordsworth and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 N. Y., 1979.
Darbishire H. The poet Wordsworth. — Cambridge, 1950.
Drabble M. Wordsworth. — L., 1966.
Harper G. M. William Wordsworth: His life, works, and influence: In 2 vol. — N. Y. 1960.
Jacobus M. Tradition and experiment in Wordsworth's lyrical ballads. — Oxford, 1976.
McCracken D. Wordsworth and the Lake District: A guide to the poems and their places. — Oxford; N. Y., 1985.
Pirle D. B. William Wordsworth: The poetry of grandeur and of tenderness. — L.; N. Y., 1982.
Rehder R. M. Wordsworth and the beginnings of modern poetry. — L., 1981.
Sheats P. D. The making of Wordsworth's poetry. — Cambridge (Mass.), 1973.
Smith J. C. A study of Wordsworth. — Edinburgh; L., 1944.

КОЛЬРИДЖ

Жерлицын М. Кольридж и англий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 Одесса, 1914.
Appleyard J. A. Coleridges philosophy of literatur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 of poetry. — Cambridge (Mass.), 1965.
Barth J. R. The symbolic imagination: Coleridge and the romantic tradition. — Princeton (N. J.), 1977.
Bate W. J. Coleridge. — N. Y.; L., 1968.
Beer F. B. Coleridge's poetic intelligence. — L., 1977.
Cornwell J. Coleridge: Poet and revolutionary. — L., 1973.
Deschamps P. La formation de la pensée de Coleridge: Thèse... — P., 1964.
Haven P. Patterns of consciousness: An essay on Coleridge. — Amherst (Mass.), 1969.

Holmes R. Coleridge. — Oxford, 1982.

Lockridge L. S. Coleridge the moralist. — Itaca, 1977.

McKusick J. C. Coleridg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 New Haven, 1986.

Walsh W. Coleridge: The work and the relevance. — L., 1967.

САУТИ

Bernhardt-Kabisch S. Robert Southey. — Boston, 1977.

Carnall G. Robert Southey and his 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conservative mind. — Oxford, 1960.

Curry K. Southey. — L.; Boston, 1975.

Dowden E. Southey. — L., 1879.

Raimond J. Robert Southey: L'homme et son temps; L'oeuvre; Le rôle: Thèse... — P., 1968.

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

Орлов С.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Вальтера Скотта. — Горький, 1960.

Реизов Б. Г.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альтера Скотта. — М.; Л., 1965.

Brown D. Walter Scott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 L., 1979.

Carlyle T. Walter Scott. — L., 1838.

Clark A. M. Sir Walter Scott. — L. 1970.

Clark A. M. Sir Walter Scott: Formative Years. — N. Y., 1970.

Crawford T. Scott. — L., 1965.

Hartveit L. Dream within a dream: A thematic approach to Scott's vision of fictional reality. — Bergen, 1974.

Johnson E. Sir Walter Scott. The great unknown: In 2 vol. — L., 1970.

Lauber J. Sir Walter Scott. — N. Y., 1966.

Lockhart J. G.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 L., 1893.

Pearson H. Walter Scott, his life and person. — L., 1954. Рус. пер.: *Пирсон Х.* Вальтер Скотт / Пер., послесл. и коммент. В. Скороденко. — М., 1978.

Pope-Hennesy U. Sir Walter Scott. — L., 1948.

Welsh A. The hero of the Waverley novels. — New Haven; L., 1963.

БАЙРО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Н. Н. Лорд Байрон: Его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СПб., 1892.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Байрон. — М., 1902.

Дьяконова Н. Байрон в годы изгнания. — Л., 1974.

Дьяконова Н. Я. Лирическая поэзия Байрона. — М., 1975.

Елистратова А. А. Байрон. — М., 1956.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Байрон и Пушкин. — Л. , 1924.
Ромм А. С. Джордж Ноэл Гордон Байрон. — Л. ; М. , 1961.
Eberty F. Lord Byron: Eine Biographie. — Leipzig, 1862. — Th. 1—2.
Ehrstine J. W. The metaphysics of Byron: A reading of the plays. — The Hague; Paris, 1976.
Escarpit R. Lord Byron un tempérament littéraire: In 2 vol. — P. , 1956—1957.
Gleckner R. F. Byron and the ruins of paradox. — Baltimore, 1967.
Goode C. T. Byron as critic. — N. Y. , 1964.
Kushawa M. S. Byron and the dramatic form. — Salzburg, 1980.
Marchand L. A. Byron: A portrait. — N. Y. , 1970.
Nichol F. *Byron.* — L. , 1909.
Rutherford A. Byron: A critical study. — Edinburgh, 1961.
Tandom B. G. The imagery of Lord Byron's plays. — Salzburg, 1976.
Thorslev P. L. The Byronic hero: Types and prototypes. — Minneapolis, 1962.

ШЕЛЛИ

Неупокоева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омантизм Шелли. — М. , 1959.
Cronin R. Shelley's poetic thoughts. — L. , 1981.
Dawson P. M. S. The unacknowledged legislator: Shelly and politics. — Oxford, 1980.
Guinn J. P. Shelley's political thought. — The Hague; Paris, 1969.
Hall J. The transforming image: a study of Shelley; major poetry. — Urbana, 1980.
Hildebrand W. H. Shelley's polar paradise: a reading of Prometheus unbound. — Salzburg, 1974.
McNiece G. Shelley and the revolutionary idea. — Cambridge (Mass.), 1969.
Peacock T. L. Memoirs of Shelley and other essays and reviews / Ed. by H. Mills. — L. , 1970.
Reiman D. H. Percy Bysshe Shelley. — N. Y. , 1969.
Salama A. Shelley's major poems. — Salzburg, 1973.
Schulze E. J. Shelley's theory of poetry. — The Hague; Paris, 1966.
Wilson M. Shelley's later poetry: A study of his prophetic imagination. — N. Y. , 1959.

КИТС

Дьяконова Н. Я. Китс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 М. , 1973.
Bate W. J. John Keats. — Cambridge (Mass.), 1978.
Colvin S. Keats. — N. Y. , s. a.
Evert W. H. Aesthetic and myth in the poetry of Keats. — Princeton (N. J.), 1965.
Gittings R. John Keats: the living year. — N. Y. , 1968.
Jones J. John Keats's dream of truth. — L. , 1969.

Murry J. M. Studies in Keats new and old. — L., 1939.

Perkins D. The quest for permanence: The symbolism of Wordsworth, Shelley and Keats. — Cambridge (Mass.), 1959.

Sperry S. M. Keats the poet. — Princeton, 1974.

Ward A. John Keats: The making of a poet. — N. Y., 1963.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ПРОЗА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Ч. Р. Метьюрин и его《Мельмот Скиталец》// Метьюрин Ч. Р. Мельмот Скиталец. — Л., 1976. — С. 563—674.

Дьяконова Н. Я. Лондонские романтики и проблема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Л., 1970.

Ainger A. Charles Lamb. — N. Y., s. a.

Blunden E. Charles Lamb and his contemporaries. — Hamden (Conn.), 1967.

Colvin S. Landor. — N. Y.; L., 1902.

Dilworth E. Walter Savage Landor. — N. Y., 1971.

Devlin D. D. De Quincey, Wordsworth and the art of prose. — L., 1983.

Fierobe C. Charles Robert Maturin: L'homme et l'oeuvre: Thèse... — Lille, 1975.

Forster J. Walter Savage Landor: A biography: In 2 vol. — L., 1869.

Kiely R. The Romantic novel in England. — Cambridge (Mass.), 1972.

Kramer D. Charles Robert Maturin. — N. Y., 1973.

Lucas E. V. The life of Charles Lamb: In 2 vol. — L., 1905.

McKenna W. Charles Lamb and the theatre. — Gerrards Cross, 1978.

Masson D. Carlyle's personality and his writings. — L., 1885.

Masson D. De Quincey. — L., 1888.

Moreux J. Thomas de Quincey: La vie; L'homme; L'oeuvre: Thèse... — 1964.

Poovey M. 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 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Mary Shelley and Jane Austen. — Chicago, 1984.

Proctor S. K. Thomas De Quincey's theory of literature. — N. Y., 1966.

Vitoux P. L'oeuvre de Walter Savage Landor. — Montpellier, 1964.

ПОЭЗИЯ И ПРОЗА ЧАРТИСТОВ

Из истории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Англии XVIII—XX вв.: Сб. ст. / Под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а. — Л., 1955.

Николюкин А. Н. Массовая поэзия в Англии конца XVIII — начала XIX в. — М., 1961.

Шиллер Ф. П.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чартистской поэзии. — М.; Л., 1933.

РАЗВИТИЕ КРИТИЧЕ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Гениева Е. Ю. Джейн Остен: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Отв. ред. М. В. Чечетко. — М., 1986.

Ивашева В. Английский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XIX века в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звучании. — М., 1974.

Ремизов Б. Б. Элизабет Гаскелл: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Киев, 1974.

Тугушева М. Шарлотта Бронте: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82.

Allen W. The English novel. — L., 1958.

Baker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novel. — L., 1936. — Vol. 6.

Bentley P. The Brontës a. their world. — L., 1949.

Blake R. Disraeli. — L., 1966.

Bloomfield P. Disraeli. — L., 1961.

Bradbrook J. W. Jane Austen and her predecessors. — L., 1966.

Butler M. Jane Austen and the war of ideas. — Oxford, 1975.

Butler M. Peacock displayed: A satirist in his context. — L., 1979.

Cecil D. Early Victorian novelists: Essays in revaluation. — L., 1943.

Chapman R. W. Jane Austen: Facts and problems. — Oxford, 1948.

Chapman R. The Victorian debate. — L., 1968.

Craik W. A. Elizabeth Gaskell and the English provincial novel. — L., 1975.

Dawson C. His fine wit: A study of Thomas Love Peacock. — Berkeley; Los Angeles, 1970.

Duthie E. L. The themes of Elizabeth Gaskell. — L., 1980.

Duthie E. L. The Brontës and nature. — L., 1986.

Eagleton T. Myths of power: A Marxist study of the Brontës. — L., 1975.

Easson A. Elizabeth Gaskell. — L., 1979.

Elliot Binns L. E. English thought, 1860—1900. — L., 1956.

Evans J. The Victorians. — Cambridge, 1966.

Felton J. Thomas Love Peacock. — L., 1973.

Foster J. Victorian women's fiction: marriage, freedom and the individual. — L., 1986.

Gaskell E.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 Ed. by A. Shelston. — Harmondsworth (Midd'x), 1977.

Gerin W. Ch. Brontë: Evolution of a genius. — Oxford, 1967.

Gerin W. The Brontës: In 2 vol. — L., 1973—1974.

Gerin W. Elizabeth Gaskell. — Oxford, 1976.

Gilson D. A bibliography of Jane Austen. — L., 1982.

Halperin J. The life of Jane Austen. — Baltimore, 1984.

Hardy B. A reading of Jane Austen. — L., 1975.

Havish J. Emily Bronte: A critical and biographical study. — L., 1969.

Himmelfarb G. Victorian minds. — L., 1968.

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 Ed. by A. Pollard. — L., 1970. — Vol. 6: The Victorians.

Jane Austen in a social context / Ed. by D. Monaghan. — L. , 1981.
Kjellin H. Talkative banquets: A study in the Peacockian novels of talk. — Stockholm, 1974.
Knies A. The art of Ch. Brontë. — Athens (Ohio), 1970.
Lansbury C. Elizabeth Gaskell: The novel of social crisis. — L. , 1975.
Lascelles M. Jane Austen and her art. — L. , 1963.
Leavis J.R. The great tradition. — L. , 1948.
Litz A.W. Jane Austen: a study of her artistic development. — N. Y. , 1965.
Lucas J. The literature of change: Stud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ovincial novel. — N. Y. , 1977.
Maître R. Disraeli: Homme de Lettres. — P. , 1963.
Marshall W. H. The world of the Victorian novel. — L. , 1968.
Monypenny W. J. The life of B. Disraeli: In 2 vol. — Rev. ed. — L. , 1926.
Page N. The language of Jane Austen. — Oxford, 1972.
Pollard A. Mrs. Gaskell: Novelist and Biographer. — Cambridge (Mass.), 1966.
Quitter-Couch A. Charles Dickens and other Victorians. — Cambri-dge, 1927.
Sanders A. The Victorian historical novels, 1840—1880. — L. , 1978.
Sherry N. Charlotte and Emily Brontë, — L. , 1969.
Shrivastava K.C. Mrs. Gaskell as a novelist Salzburg, 1977.
Spark M. , *Stanford D.* Emily Brontë: her life and work. — L. , 1960.
Tanner T. Jane Austen. — L. , 1986.
Tillotson K. Novels of the eighteen-forties. — Oxford, 1954.
Tillotson G. A view of Victorian literature. — Oxford, 1978.
Williams I. The realist novel in England: A study in development. — L. , 1974.
Wise T. J. , *Symington J. A.* The Brontës: Their lives, friendships and correspondence: In 4 vol. — Oxford, 1932.
Wright E. Mrs. Gaskell: The basis for reassessment. — L. , 1965.

ДИККЕНС

Ивашева В. 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Диккенса. — М. , 1954.
Катарский И. М. Диккенс: (Крит. -биогр. очерк). — М. , 1960.
Катарский И. М. , *Фридлендер Ю. В.* Чарльз Диккенс: Библиогр. —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 1838—1960 / Отв. ред. М. П. Алексеев. — М. , 1962.
Катарский И. М. Диккенс в России: Середина XIX века. — М. , 1966.
Михальская Н. П. Чарльз Диккенс: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 1959.
Сильман Т. И. Диккенс: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 Л. , 1948.
Brook G. L. The language of Dickens. — L. , 1970.
Chesterton G. Dickens. — L. , 1906. Рус. пер. : *Честертон Дж. К.* Диккенс / Пер. Н.

Трауберг. — М. , 1982.

Coolidge A. C. Charles Dickens as serial novelist. — Ames, 1967.

De Vries D. Dickens's apprentice years: The making of a novelist. — Hassocks, 1976.

Dickens: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In 2 vol. / Ed. by P. Collins. — L. , 1986.

Dyson A. E. The inimitalle Dickens: A reading of the novels. — L. , 1970.

Der englische soziale Roman in 19. Jahrhundert / Hrsg. von K. Gross. — Darmstadt, 1977.

Fawkner H. W. Animation and reification in Dickens's vision of the life-denying society. — Uppsala, 1977.

Forster J.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In 3 vol. — L. , 1872—1874.

Gissing G. Charles Dickens. — N. Y. , 1924.

Gold J. Charles Dickens radical moralist. — Minneapolis, 1972.

Grillo V. F. Charles Dickens's Sketches by Boz: End in the beginning. — Boulder, 1974.

Hardwick M. The Charles Dickens encyclopedia. — N. Y. , 1973.

Hayward A. L. The Dickens encyclopedia. — L. , 1971.

Kincaid J. R. Dickens and the rhetoric of laughter. — Oxford, 1971.

Johnson E. Ch. Dickens: His tragedy a. his triumph: In 2 vol. — N. Y. , 1952.

Kotzin M. C. Dickens and the fairy tale. — Bowling Green, 1972.

Leavis F. R. , *Leavis Q. D.* Dickens the novelist. — L. , 1970.

Marcus S. Dickens: from Pickwick to Dombey. — L. , 1965.

Stewart G. Dickens and the trials of imagination. — Cambridge (Mass.), 1974.

Pearson H. Dickens: His character, comedy and career. — L. , 1949. Рус. пер. : *Пирсон Х.* Диккенс / Пер. М. Кан. — М. , 1963.

Sucksmith H. P. The narrative art of Charles Dickens: The rhetoric of sympathy and irony in his novels. — L. , 1970.

Thurley G. J. The Dickens myth: Its genesis and structure. — St. Lucia (Queensland), 1976.

Tillotson K. Dickens at work. — L. , 1957.

Vogel J. Allegory in Dickens. — Montgomery (Alabama), 1977.

Ward A. W. Dickens. — L. , 1882.

Westburg B. The confessional fictions of Charles Dickens. — Dekalb (Ill.), 1977.

Wilson A. The world of Charles Dickens. — L. , 1970. Рус. пер. : *Уилсон Э.* Мир Чарльза Диккенса / Вступ. ст. В. Ивашевой; Пер. и коммент. Р. Померанцевой, В. Харитонова. — М. , 1975.

ТЕККЕ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Н. Н. В. Теккерей, его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СПб. , 1891.

Вахрушев В. Творчество Теккерея. — Саратов, 1984.

Ивашева В. В. Теккерей-сатирик. — М. , 1958.

McMaster J. Thackeray: the major novels. — Toronto; Buffalo, 1976.

Mudge J. A. , *Sears M.* A Thackeray dictionary. — N. Y. , 1962.

Olmsted J. C. Thackeray and his twentieth-century critics: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1900—1975. — N. Y. , 1977.

Pantuèkova L. W. M. Thackeray as a critic of literature. — Brno, 1972.

Ray G. N. The buried life: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ackeray's fiction and his personal history. — Cambridge (Mass.), 1952.

Ray G. N. Thackeray: The uses of adversity, 1811—1846. — N. Y. , 1955.

Saintsbury G. A consideration of Thackeray. — L. , 1936.

Thackeray: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A. Welsh. — Englewood Cliffs, 1968.

Thackeray: Interviews and recollections / Ed. by P. Collins: In 2 vol. — L. , 1983.

Tillotson G. Thackeray the novelist. — L. , 1954.

Trollope A. Thackeray. — L. , 1880.

Wheatley J. H. Patterns in Thackeray's fiction. — Cambridge (Mass.), 1969.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ИР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one A. Willian Carleton (1794—1859) romancier irlandais. — Lille, 1973.

Butler M. Maria Edgeworth: A literary biography. — Oxford, 1972.

Chesnutt M. Studies in the short stories of William Carleton. — Göteborg, 1976.

De Ford M. O. Thomas Moore. — N. Y. , 1967.

Flanagan T. The Irish novelists, 1800—1850. — N. Y. , 1959.

Gwynn S. Thomas Moore. — L. , 1904.

Hurst M. Maria Edgeworth and the public scene. — L. , 1970.

Hawthorne M. D. John and Michael Banim: a study i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nglo-Irish novel. — Salzburg, 1975.

McKenna B. Irish literature, 1800—1875: a 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 Detroit (Mich.), 1978.

McWhorter H. Maria Edgeworth's art of prose fiction. — The Hague; Paris, 1971.

Newcomer J. Maria Edgeworth — the novelist, 1767—1849. — Fort Worth, 1967.

Rafroidi P. Irish literature in English: the Romantic period (1789—1850): In 2 vol. — Gerrards Cross, 1980.

Sullivan E. A. Thomas Davis. — Lewisburg, 1978.

Tessier T. La poésie lyrique de Thomas Moore (1779—1852). — P. , 1976.

Welsh R. Irish poetry from Moore to Yeats. — Gerrards Cross, 1980.

White T. de Vere. Tom Moore: The Irish poet. — L. , 1977.

Yeats W. B., *Kinsella T.* Davis, Mangan, Fergusson: Tradition a. the Irish writer. — Dublin, 1970.

Глава пятая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sselineau Ch. Bibliographie romantique: Catalogue anecdotique et pittoresque des éditions originales des oeuvres de Victor Hugo, Alfred de Vigny, Prosper Mérimée etc. — 2e éd. revue et très augmentée. — P., 1872.

Dictionnaire des lettres françaises: Le Dix-neuvième siècle En 2. vol. / Publ. sous la dir. de G. Grente et al. — P., 1971—1973.

Talvart H., *Place J.* Bibliographie des auteurs modernes de langue française (1801—1974). — P., 1928—1975. — T. 1—21. —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Thieme H.-P. Bibliographi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àaise de 1800 à 1930. — P., 1933. — T. 1—3.

Drevet M. L. Bibliographi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1930—1939 / Compl. à la Bibliographie de H. P. Thieme. — Lille: Genève, 1948.

Drevet M. L. Bibliographi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1940—1949 / Compl. à la Bibliographie de H. P. Thieme. — Genève: Lille, 1954.

*

Де Ла-Барт Ф. Разыскания в области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поэтики и стиля. — Киев, 1908. — Т. 1: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поэтика во Франции.

История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 — М.; Л., 1956. — Т. 2.

Обломиевский Д.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 М., 1947.

Реизов Б. Г. Французская роман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 Л., 1956.

Реизов Б. Г. Француз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в эпоху романтизма. — Л., 1958.

Соколова Т. В. Июль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и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830—1831 годы). — Л., 1973.

Шрейдер Н. С. Француз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иода Консульства и Империи. — 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 1972.

Affron Ch. A stage for poets: Studies in the theatre of Hugo and Musset. — Princeton (N. Y.), 1971.

Albert M.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sous la Révolution, l'Empire et la Restauration, 1789—1830. — P., 1891.

Bérence F. Grandeur spirituelle du XIX siècle français. P., 1958—1959. — Vol. 1—2.

Bertaut J. L'époque romantique. — P., 1947.

Biermann K. Literarisch-politische Avantgarde in Frankreich, 1830—1870; Hugo, Sand u.

a. — Stuttgart, 1982.

Bourgeois R. L'ironie romantique: Spectacle et jeu de m-me de Staël à Gérard de Nerval. — Grenoble, 1974.

Castex P.-G. Le conte fantastique en France de Nodier à Maupassant. — P., 1951.

Cellier L. L'épopée romantique. — P., 1954.

Charlier G. Le sentiment de la nature chez les romantiques français. — P., 1912.

Descotes M. Le drame romantique et ses grands créateurs (1827—1839). — P., 1955.

Duhamel R. Aux sources du romantisme français. — Ottawa, 1964.

Evans D. O. Social romanticism in France, 1830—1848. — N. Y., 1969.

Giraud J. L'école romantique française: Les doctrines et les hommes. — P., 1927.

Houston J. P. The demonic imagination: Style and theme in French romantic poetry. — Baton Rouge, 1969.

Howarth W. D. Sublime and grotesque: A study of French Romantic drama. — L., 1975.

Maigron L. Le roman historique à l'époque romantique: Essai sur l'influence de Walter Scott. — P., 1912.

Martino P. L'époque romantique en France, 1815—1830. — P., 1966.

Monglond A. Le préromantisme français. — Nouv. éd. — P., 1965.

Moreau P. Ames et thèmes romantiques. — P., 1965.

Moreau P. Le classicisme des romantiques. — P., 1932.

Moreau P. Le romantisme. — P., 1968.

Morsan J. La bataille romantique. — P., 1962.

Peyre H. Qu'est-ce que le romantisme? — P., 1971.

Picard R. Le romantisme social. — N. Y., 1944.

Pommier J. Les écrivains devant la révolution de 1848: Lamartine, Hugo, Lamennais, George Sand, Michelet, Béranger. — P., 1948.

Raymond M. Romantisme et rêverie. — P., 1978.

Retinger J. Le conte fantastique dans le romantisme français. — P., 1909.

Richard J. P. Etudes sur le Romantisme. — P., 1970.

Roy C. Les soleils du romantisme. — P., 1974.

Salomon P. Le roman et la nouvelle romantiques. — P., 1970.

Simches S. O. Le romantisme et le goût esthétique du XVIII siècle. — P., 1964.

Souriau M. Histoire du romantisme en France: In 3 vol. — P., 1927.

Thibaudet A.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Chateaubriand à Valéry. — Verviers, 1981.

Tiersot J. La chanson populaire et les écrivains romantiques. — P., 1931.

Van Tieghem Ph. L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 sur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 P., 1961.

Van Tieghem Ph. Le romantisme français. — P., 1972.

Ж. де СТАЛЬ

Balayé S. Madame de Staël: Lumières et liberté. — P., 1979.

Cordey P. Madame de Staël ou le deuil éclatant du bonheur. — Lausanne, 1967.

Gutwirth M. Madame de Staël, novelist: The emergence of the artist as woman. — Urbana, 1978.

Gwynne G. E. Madame de Staël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 P., 1969.

Luppé R. Les idées littéraires de madame de Staël et l'héritage des Lumières (1795—1800). — P., 1969.

Madame de Staël et l'Europe: Colloque de Coppet (18—24 juillet 1966) organisé pour la célébration du 2e centenaire de la naissance de madame de Staël (1766—1966). — P., 1970.

ШАТОБРИАН

Де Ла-Барт Ф. Шатобриан и поэтика мировой скорби во Франции. — Киев, 1905.

Barbéris P. Chateaubriand: Une réaction au monde moderne. — P., 1976.

Barbéris P. 《René》 de Chateaubriand: Un nouveau roman. — P., 1973.

Chateaubriand: Actes du Congrès de Wisconsin pour le 200e anniversaire de la naissance de Chateaubriand. — Genève, 1970.

Dièquez M. Chateaubriand ou le poète face à l'histoire. — P., 1963.

Guillemin H. L'homme des 《Mémoires d'outre-tombe》. — P., 1965.

Lebègue R. Aspects de Chateaubriand: Vie — Voyage en Amériques — Oeuvres. — P., 1979.

Lemaitre J. Chateaubriand. — P., 1912.

Maurois A. Chateaubriand. — P., 1939.

Moreau P. Chateaubriand, l'homme et l'oeuvre. — P., 1967.

Sainte-Beuve C. A. 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 sous l'Empire: In 2 vol. — P., 1848—1849.

СЕНАНКУР

Le Gall B. L'imaginaire chez Senancour. — P., 1966.

Levy Z. Senancour, dernier disciple de Rousseau. — P., 1979.

Monglond A. Le journal intime d'Oberman. — Grenoble; P., 1947.

КОНСТАН

Bastid P. Benjamin Constant et sa doctrine: In 2 vol. — P., 1966.

Delbouille P. Genèse, structure et destin d'Adolphe. — P., 1971.

Du Bos Ch. Grandeur et misère de Benjamin Constant. — P., 1946.

Fabre-Luce A. Benjamin Constant. — P., 1939.

Nicolzon H. Benjamin Constant. — L., 1949.

ЛАМАРТИН

Bertrand L. Lamartine. — P., 1940.
Charlier G. Aspects de Lamartine. — P., 1937.
Citoleux M. La poésie philosophique au XIX siècle: Lamartine. — P., 1906.
Doumic R. Lamartine. — P., 1912.
Guillemin H. Lamartine et la question sociale. — P., 1946.
Guyard M.-F. Alphonse de Lamartine. — P., 1956.
Lamartine: Le livre de centenaire; Etudes recueillies et prés. par P. Viallaneix. — P., 1971.
Séché L. Lamartine de 1816 à 1830: Elvire et les《Méditations》. — P., 1905.

ВИНЬИ

Соколова Т. В.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поэзия А. де Виньи. — Л., 1981.
Castex P.-G.《Les Destinées》d'Alfred de Vigny. — P., 1968.
Citoleux M. Alfred de Vigny: Persistances classiques et affinités étrangères. — P., 1924.
Dupuy E. Alfred de Vigny, ses amitiés, son rôle littéraire. — P., 1910.
Estève E. Alfred de Vigny: Sa pensée et son art. — P., 1923.
Flottes P. La pensée politique et sociale d'Alfred de Vigny. — P., 1927.
La Salle B. Alfred de Vigny. — P., 1963.
Lauvrière E. Alfred de Vigny: Sa vie et son oeuvre: In 2 vol. — P., 1945.
Relire《Les Destinées》d'Alfred de Vigny: Actes du colloque de la société des études romantiques. — P., 1980.
Sèché L. Alfred de Vigny: In 2 vol. — P., 1913.
Toesca M. Alfred de Vigny ou la passion de l'honneur. — P., 1972.

НОДЬЕ

Bender E. J. Bibliographie: Charles Nodier. — Lafayette (Ind.), 1969.
Hamenachem M. S. Charles Nodier: Essai sur l'imagination mythique. — P., 1972.
Larat J. La tradition et l'exotisme dans l'oeuvre de Charles Nodier. — P., 1923.
Lund H. P. La critique du siècle chez Nodier. — Copenhague, 1978.
Setron R. Libertés d'une écriture critique, Charles Nodier. — Genève, 1979.

ГЮГО

Алексеев М. П. Виктор Гюго 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знакомства: Встречи, письма,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М., 1937. — Т. 31/32. — С. 777—932.
Мешкова 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 Саратов, 1971. — Кн. 1 (1815—1824).
Муравьева Н. И. Гюго. — М., 1961.

Трескунов М. С. Виктор Гюго: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61.

Фемелиди А. М. В. Гюго, 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поха, жизнь, труды и мысли. — СПб.; М., 1912.

Albouy P. La création mythologique chez Victor Hugo. — P., 1963.

Aragon L. Hugo, poète réaliste. — P., 1952.

Aref M. La pensée sociale et humaine de Victor Hugo dans son oeuvre romanesque: Etude critique et littéraire. — Genève, 1979.

Barbou A. Victor Hugo et son temps. — P., 1881.

Barrère J.-B. La fantaisie de Victor Hugo. — P., 1949—1960. — T. 1—2.

Barrère J.-B. Victor Hugo à l'oeuvre: Le poète en exil et en voyage. — P., 1966.

Brombert V. Victor Hugo and the visionary novel. — Cambridge (Mass.); L., 1984.

Chanine S. La dramaturgie de Victor Hugo (1816—1843). — P., 1971.

Dupuy E. Victor Hugo l'homme et le poète. — P., 1886.

Escholier R. Hugo, roi de son siècle. — P., 1970.

Gamarra P. Victor Hugo. — P., 1972.

Gaudon J. Le temps de la contemplation: L'oeuvre poétique de Victor Hugo: Des misères au seuil du gouffre (1845—1856). — P., 1969.

Gély C. L. Hugo et la fortune littéraire. — Bordeaux, 1970.

Gregh F. Victor Hugo: Sa vie, son oeuvre. — P., 1954.

Juin H. Victor Hugo. — P., 1980.

Maurois A. Olympio ou la Vie de Victor Hugo. — P., 1954. Рус. пер.: *Моруа А.* Олимпио, или Жизнь Виктора Гюго / Пер. Н. Немчиновой, М. Трескунова. — М., 1971.

Péguy Ch. Victor Marie, comte Hugo. — P., 1934.

Peyre H. Hugo. — P., 1972.

Renouvier Ch. Victor Hugo le philosophe. — P., 1900.

Renouvier Ch. Victor Hugo le poète. — P., 1900.

Rousselot J. Le roman de Victor Hugo. — P., 1961.

Souchon P. Victor Hugo. — P., 1949.

Ubersfeld A. Le roi et le bouffon: Etude sur le théâtre de Hugo de 1830 à 1835. — P., 1974.

Van Tieghem Ph. Dictionnaire de Victor Hugo. — P., 1970.

ЖОРЖ САНД

Каренин В. [*Стасова-Комарова В. Д.*]. Жорж Санд, ее жизнь 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 Пг., 1916.

Трапезникова Н. С. Романтизм Жорж Санд: (Проблема взаимосвязи романтизма и реализма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 Казань, 1976.

Трескунов М. С. Жорж Санд: Крит.-биогр. очерк. — Л., 1976.
Dolléans E. Féminisme et mouvement ouvrier: George Sand. — P., 1951.
Doumic R. George Sand. — P., 1922.
Galzy J. George Sand. — P., 1950.
Karénine W. George Sand, sa vie et ses oeuvres: In 4 vol. — P., 1899—1926.
Larnac J. George Sand révolutionnaire. — P., 1948.
Mallet F. George Sand. — P., 1976.
Maurois A. Lélia ou la Vie de George Sand. — P., 1952. Рус. пер.: *Моруа А.* Жорж Санд. — М., 1967.
Salomon P. George Sand. — P., 1962.
Thomas E. George Sand. — P., 1959.
Toesca M. Une autre George Sand: D'après de nombreux documents inédits. — P., 1945.

МЮССЕ

Allem M. Alfred de Musset. — P., 1947.
Castex P. G. Alfred de Musset: Les caprices de Marianne. — P., 1978.
Gans E. L. Musset et le《Drame tragique》: Essai d'analyse paradoxale. — P., 1974.
Lainey Y. Musset ou la difficulté d'aimer. — P., 1978.
Lebois A. Vues sur le Théâtre de Musset. —Avignon, 1966.
Lefebvre H. Musset. — P., 1970.
Masson B. Musset et le théâtre intérieur: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Lorenzaccio》. — P., 1974.
Pommier J. Variétés sur Alfred de Musset et son théâtre. — P., 1966.
Soupault Ph. Alfred de Musset. — P., 1959.

ГОТЬЕ

Book-Senninger C. Théophile Gautier, auteur dramatique. — P., 1972.
Du Camp M. Théophile Gautier. — P., 1907.
Larguier L. Théophile Gautier. — P., 1948.
Richer J. Etudes et recherches sur Théophile Gautier prosateur. — P., 1981.
Voisin M. Le soleil et la nuit: L'imaginaire dans l'oeuvre de Théophile Gautier. — Bruxelles, 1981.

НЕРВАЛЬ

Bailbé J.-M. Nerval. — P., 1976.
Cellier L. Gérard de Nerval. — P., 1974.
Constans F. Gérard de Nerval devant le destin: Etudes nervaliennes. — P., 1979.
Durry M.-J. Gérard de Nerval et le mythe. — P., 1956.

Humphrey G. R. L'esthétique de la poésie de Gérard de Nerval. — P. , 1969.
Jeanneret M. La lettre perdue: Ecriture et folie dans l'oeuvre de Nerval. — P. , 1978.
Tailleux D. L'espace nervalien. — P. , 1975.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И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ПОЭЗИЯ

Великовский С. И. Поэты французских революций, 1789—1848. — М. , 1963.
Данилин Ю. И. Очерк француз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жизни XIX в. — М. , 1974.
Данилин Ю. И. Поэты Ию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 , 1935.
Якимович Т. К. 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пресса францу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анск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1830—1835. — Киев, 1961.
Flottes P. Histoire de la poésie politique et sociale en France de 1815 à 1939 — P. , 1976.

БЕРАНЖЕ

Барро М. П. Ж. Беранже, его жизнь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СПб. , 1892.
Горбов Д.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еранже. — М. , 1925.
Данилин Ю. И. Беранже и его песни. — М. , 1973.
Муравьева Н. И. Беранже. — М. , 1965.
Старицына З. А. Беранже в России: XIX век. — М. , 1969.
Boiteau P. Philosophie et politique de Béranger. — P. , 1859.
Causeret Ch. Béranger. — P. , 1895.
Fischer J. O. Pierre Jean de Béranger. — Berlin, 1960.
Lucas-Dubreton J. Béranger: La Chanson; La Politique; La Société. — P. , 1934.
Touchard J. La gloire de Béranger: In 2 vol. — P. , 1968.

БАРБЬЕ. МОРО. ДЮПОН. ЛАШАМБОДИ

Данилин Ю. И. Поэт Ию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Жизнь Эжезиппа Моро. — М. , 1978.
Шапеллон А. А.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сатирик Огюст Барбье, Одесса, 1884.
Balagny H. Hégésippe Moreau. — P. , 1911.
Clouzet G. Pierre Dupont. — P. , 1909.
Lhuillier Th. Hégésippe Moreau et son Diogène. — P. , 1881.
Mirecourt E. Lachambeaudie. — P. , 1857.
Mirecourt E. Pierre Dupont. — P. , 1854.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РЕАЛИЗМ

Реизов Б. Г.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роман XIX века. — М. , 1977.
Якимович Т. К. Французский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1830—1848 гг. — М. , 1963.
Dumesnil R. L'époque réaliste et naturaliste. — P. , 1945.

Fischer J. O. 《Epoque romantique》 et réalisme: Problèmes méthodologiques. — Praha, 1977.

Gilbert E. Le roman en France pendant le XIX siècle. — P., 1909.

Naumann M. Prosa in Frankreich. — B., 1978.

КУРЬЕ

Graschet R. Les aventures d'un écrivain: Paul-Louis Courier. — P., 1928.

Graschet R. P.-L. Courier et la Restauration. — P., 1913.

Graschet R. La vie et la mort tragique de Paul-Louis Courier. — P., 1914.

СТЕНДАЛЬ

Виноградов А. К. Стендаль и его время / Ред., предисл. и коммент. А. Д. Михайлова. — М., 1960.

Забабурова Н. В. Стендаль и проблемы 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анализа. — Ростов н/Д, 1982.

Кочеткова Т. В. Стендаль: Библиогр.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 М., 1961.

Реизов В. Г. Стендаль: Годы ученья. — Л., 1968.

Реизов В. Г. Стендаль: Философия истории; Политика; Эстетика. — Л., 1974.

Реизов Б. Г. Стендаль: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творчество. — Л., 1978.

Фрид Я. В. Стендаль: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2-е изд. — М., 1967.

Albérès F. M. Le naturel chez Stendhal. — P., 1956.

Andrieu R. Stendhal ou le bal masqué. — P., 1983. Рус. пер.:

Андрие Р. Стендаль, или Бал-маскарад. — М., 1985.

Arbelet P. La jeunesse de Stendhal: In 2 vol. — P., 1919.

Arbelet P. Stendhal au pays des comédiennes. — Grenoble, 1934.

Bardèche M. Stendhal romancier. — P., 1947.

Blin R. Stendhal et les problèmes de la personnalité. — P., 1958.

Blin R. Stendhal et les problèmes du roman. — P., 1954.

Blum L. Stendhal et le beylisme. — P., 1947.

Bosselaers R. Stendhal: Pèlerin du bonheur. — Lille, 1975.

Brombert V. Stendhal: Fiction and the themes of freedom. — N. Y., 1968.

Chabrun E. Stendhal écrivain du XX siècle. — P., 1973.

Chuquet A. Stendhal-Beyle. — P., 1902.

Claudon F. L'idée et l'influence de la musique chez quelques romantiques français et notamment Stendhal. — Lille; P., 1979.

Cordier H. Bibliographie stendhalienne. — P., 1914.

Crouzet M. Le héros fourbe chez Stendhal ou Hypocrisie, politique, séduction, amour dans le beylisme. — P., 1985.

Crouzet M. La poétique de Stendhal: Forme et société; Le sublime. — P., 1983.

Crouzet M. Stendhal et l'italianité: Essai de mythologie romantique. — P., 1982.

Crouzet M. Stendhal: Quatre études sur Lucien Leuwen. — P., 1985.

Dédéyan Ch. L'Italie dans l'oeuvre romanesque de Stendhal: In 2 vol. — P., 1963.

Dédéyan Ch. Stendhal chroniqueur. — P., 1962.

Del Litto V. La vie de Stendhal. — P., 1965.

Del Litto V. La vie intellectuelle de Stendhal: Genèse et évolution de ses idées (1802—1821). — P., 1962.

Imbert H.-F. Les métamorphoses de la liberté ou Stendhal devant la Restauration et le Risorgimento. — P., 1967.

Landry F. L'imaginaire chez Stendhal: Formation et expression. — Lausanne, 1982.

Martineau H. Le calendrier de Stendhal. — P., 1950.

Martineau H. Le coeur de Stendhal: Histoire de sa vie et de ses sentiments: In 2 vol. — P., 1952.

Martineau H. L'oeuvre de Stendhal: Histoire de ses livres et de sa pensée. — P., 1945.

Martineau H. Petit dictionnaire stendhalien. — P., 1948.

Martino P. Stendhal. — P., 1914.

Mélia J. Les idées de Stendhal. — P., 1910.

Mélia J. Stendhal et ses commentateurs. — P., 1911.

Paupe A. La vie littéraire de Stendhal. — P., 1914.

Prévost J. La création chez Stendhal. — P., 1944. Рус. пер.: *Прево Ж.* Стендаль: Опыт исслед. лит. мастерства и психологии писателя / Вступ. ст. Г. В. Рубцовой. — М.; Л., 1960.

Rude F. Stendhal et la pensée sociale de son temps. — P., 1967.

Stryienski C. Soirées du Stendhal Club. — P., 1905.

Trout P. La vocation romanesque de Stendhal. — P., 1970.

Weber J.-P. Stendhal: Les structures thématiques de l'oeuvre et du destin. — P., 1969.

БАЛЬЗАК

Бальзак в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х современников / Сост., вступ. ст. И. Лилеевой; Коммент. И. Лилеевой, В. Мильчиной. — М., 1986.

Гербстман А. Театр Бальзака. — Л.; М., 1938.

Грифцов Б. Как работал Бальзак. — М., 1958.

Гроссман Л. Бальзак в России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М., 1937. — Т. 31/32. — С. 149—372.

Кучборская Е. П.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альзака. — М., 1970.

Обломиевский Д. Д. Бальзак: Этапы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пути. — М., 1961.

Паевская А. В., *Данченко В. Т.* Оноре де Бальзак: Библиогр.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1830—1964 / Вступ. ст. И. А. Лилеевой. — М., 1965.

Резник Р. А.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этюды》 Бальзака. — Саратов，1983.

Реизов Б. Г.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альзака. — Л.，1939.

Реизов Б. Г. Бальзак：Сб. ст. — Л.，1960.

Сухотин Л. Бальзак. — М.，1934.

Allemand A. Honoré de Balzac：Création et passion. — P.，1965.

Allemand A. Unité et structure de l'univers balzacien. — P.，1965.

Amblard M.-C. L'oeuvre fantastique de Balzac：Sources et philosophie. — P.，1972.

Année balzacienne... P.，1960—. —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Avec Balzac：Pour le centenaire de sa mort，1850—1950. — P.，1950.

Baldensperger F. Orientations étrangères chez Balzac. — P.，1927.

Barbéris P. Aux sources de Balzac. — P.，1965.

Barbéris P. Balzac et le mal du siècle：Contribution à une physiologie du monde moderne：In 2 vol. — P.，1970.

Barbéris P. Le monde de Balzac. — P.，1973.

Barbéris P. Mythes balzaciens. — P.，1972.

Bardèche M. Balzac romancier. — P.，1947.

Bardèche M. Le monde de Balzac. — P.，1973.

Béguin A. Balzac lu et relu. — P.，1965.

Borel J. Personnages et destins balzaciens：La création littéraire et ses sources anecdotiques. — P.，1959.

Bouteron M. Etudes Balzaciennes. — P.，1954.

Butler R. Balzac and the French Révolution. — L.；Canberra，1983.

Chollet R. Balzac journaliste：Le tournant de 1830. — P.，1983.

Citron P. Dans Balzac. — P.，1986.

Delattre G. Les opinions littéraires de Balzac. — P.，1961.

Descaves P. Balzac dramatiste. — P.，1960.

Donnard J.-H. Balzac：Les réalités économiques et sociales dans《La Comédie humaine》. — P.，1961.

Fargeaud M. Balzac et la Recherche de l'Absolu. — P.，1968.

Fernandez R. Balzac ou l'envers de la création romanesque. — P.，1980.

Fortassier R. Les Mondains de《La Comédie humaine》：Etude historique et psychologique. — P.，1974.

Gauthier H. L'homme intérieur dans la vision de Balzac. — Lille，1973.

Guyon B. La pensée politique et sociale de Balzac. — P.，1947.

Laubriet P. L'intelligence de l'art chez Balzac：D'une esthétique balzacienne. — P.，1961.

Lecour Ch. Généalogie des personnages de《La Comédie humaine》. — P.，1966.

Longaud F. Dictionnaire de Balzac. — P.，1969.

Lotte F. Dictionnaire biographique des personnage de《La Comédie humaine》. — P.，1952.

McCormick D. F. Les nouvelles de Balzac. — P. , 1973.

Marceau F. Balzac et son monde. — P. , 1971.

Maurois A. Prométhée ou la Vie de Balzac. — P. , 1965. Рус. пер. :

Моруа А. Прометей, или Жизнь Бальзака / Пер. Н. Немчиновой, Я. Лесюка; Предисл. Ф. Наркирьера. — М. , 1968.

Ménard M. Balzac et le comique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 P. , 1983.

Nykrog P. La pensée de Balzac dans 《La Comédie humaine》: Essai de quelques concepts clés. — Copenhague, 1965.

Tritter J. L. Le langage philosophique dans les oeuvres de Balzac. — P. , 1976.

Wurmser A. La Comédie inhumaine. — P. , 1964. Рус. пер. : *Вюрмсер А.* Бесчеловечная комедия / Пер. Н. Е. Барабановой и др. ; Предисл. И. А. Лилеевой. — М. , 1967.

Zweig S. Balzac: Der Roman seines Lebens / Hrsg. von R. Friedenthal. — Düsseldorf, 1946. Рус. пер. : *Цвейг С.* Бальзак / Пер. А. Голембы; Предисл. Н. Муравьевой. — М. , 1961.

МЕРИМЕ

Виноградов А. К. Мериме в письмах к Соболевскому. — М. , 1928.

Мартьянова Е. П. Об отражении русско-французских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во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лит. трудов и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ции П. Мериме). — Харьков, 1960.

Паевская А. В. , *Данченко В. Т.* Проспер Мериме: Библиогр. рус. пер. и крит. лит. на рус. яз. , 1828—1967 / Вступ. ст. А. Д. Михайлова. — М. , 1968.

Baschet R. Du romantisme au Second Empire: Mérimée (1803—1870). — P. , 1958.

Billy A. Mérimée. — P. , 1959.

Filon Au. Mérimée et ses amis. — P. , 1894.

Freustier J. Prosper Mérimée. — P. , 1982. Рус. пер. : *Фресмье Ж.* Проспер Мериме / Вступ. ст. А. Д. Михайлова. — М. , 1987.

Léon P. Mérimée et son temps. — P. , 1962.

Malherbe H. Carmen. — P. , 1951.

Raitt A. W. Prosper Mérimée. — L. , 1970.

Trahard P. La jeunesse de Prosper Mérimée (1803—1834): In 2 vol. — P. , 1925.

Trahard P. Prosper Mérimée de 1834 à 1853. — P. , 1928.

Trahard P. P. Mérimée et l'art de la nouvelle. — P. , 1923.

Trahard P. La vieillesse de Prosper Mérimée (1854—1870). — P. , 1930.

Trahard P. , *Josserand P.* Bibliographie des oeuvres de P. Mérimée. — P. , 1929.

Yovanovitch V. -M. 《La Guzla》 de P. Mérimée: Etude d'histoire romantique. — P. , 1910.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ИТАЛЬЯ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е Санктис Ф.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Т. 2. / Пер. с ит. ; под ред. Д. Е. Михальчи; Послесл. Д. Е. Михальчи, М. Ф. Овсянникова. — М. , 1964.

Полуяхтова И. К. История италья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Эпоха Рисорджименто).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филол. фак. ун-тов и пед. ин-тов. — М. , 1970.

Романтизм глазами итальян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Сост. и пер. Н. Томашевского. — М. , 1984.

Сапрыкина Е. Ю. Итальянская 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поэзия XIX в. / Отв. ред. З. М. Потапова. — М. , 1986.

Apollonio M. Fondazioni della cultura italiana moderna. — Firenze, 1948—1952. — Vol. 1—2.

Battaglia S. Introduzione al romanticismo italiano. — Napoli, 1965.

Bosco U. Aspetti del romanticismo italiano. — Roma, 1942.

Bosco U. Realismo romantico. — 2-a ed. , riv. e accr. — Caltanissetta; Roma, 1967.

Garetti L. , *Luti G.*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per saggi storicamente disposti. — Milano, 1973. — Vol. 4: L'Ottocento.

Croce B. La letteratura della nuova Italia: Saggi critici: In 2 vol. — 7-a ed. — Bari, 1967—1968.

Derla L. Letteratura e politica tra la Restaurazione e l'Unità. — Milano, 1977.

De Sanctis F. La letteratura italiana nel secolo decimonono // Opere / A cura di C. Muscetta. — Torino, 1951—1953. — Vol. 10—12.

Flora F.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 Milano, 1957. — Vol. 4.

Fubini M. Romanticismo italiano: Saggi di storia della critica e della letteratura. — 2-a ed. — Bari, 1973.

Gramsci A. Letteratura e vita nazionale. — Nuova ed. , riv. e integr. — Roma, 1979.

Gramsci A. Il Risorgimento. — Torino, 1954.

Letteratura italiana: I minori. — Milano, 1969. — Vol. 3—4.

Marcazzan M. Le origini lombarde del romanticismo italiano. — Milano, 1967.

Mariani G. Ottocento romantico e verista. — Napoli, 1972.

Mazzoni G. L'Ottocento: In 2 vol. — 2-a ed. — Milano, 1973.

Muscetta C. Letteratura militante. — Novara, 1953.

Pullini G. Le poetiche dell'Ottocento. — Padova, 1959.

Il romanticismo / A cura di V. Branca, T. Kardos. — Budapest, 1968.

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 A cura di E. Cecchi, N. Sapegno. — Milano, 1969. — Vol. 7: L'Ottocento.

Timpanaro S. Classicismo e Illuminismo nell'Ottocento italiano. — Pisa, 1973.

Vitale M. La questione della lingua. — Palermo, 1962.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ТЕНДЕНЦИ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НАЧАЛА ВЕКА

Allevi F. Vincenzo Monti. — Firenze, 1954.
Binni W. Ugo Foscolo: Storia e poesia. — Torino, 1982.
Cambon C. Ugo Foscolo: Poet of exile. — Princeton (N. Y.), 1980.
Clerici E. Il《Conciliatore》, periodico milanese (1818—1819). — Pisa, 1903.
Donadoni E. Ugo Foscolo pensatore, critico, poeta. — 3-a ed. — Firenze, 1964.
Fontana L. Vincenzo Monti prosatore e retore. — Roma, 1943.
Fontana L. Vincenzo Monti verseggiatore e poeta. — Roma, 1947.
Frattarolo R. Studi foscoliani: Bibliografia della critica (1921—1952): In 2 vol. — Firenze, 1954—1956.
Frattini A. Il Neoclassicismo e Ugo Foscolo. — [Bologna], 1965.
Fubini M. Ugo Foscolo: Saggi, studi, note. — Firenze, 1978.
Gustarelli A. Il《Conciliatore》. — Milano, 1918.
I manifesti romantici del 1816 e gli scritti principali del《Conciliatore》sul romanticismo / A cura di C. Calcaterra. — Torino, 1968.
Mineo M., *Marinari A.* Da Foscolo all'età della Restaurazione. — Bari, 1977.
Natali G. Ugo Foscolo. — Firenze, 1967.
Scotti F. Foscolo tra erudizione e poesia. — Roma, 1973.
Varese C. Vita interiore di Ugo Foscolo. — Bologna, 1966.
Vincent E. R. Ugo Foscolo esule fra gli inglesi. — Firenze, 1954.

МАНДЗОНИ

Alberti G. Alessandro Manzoni: Introduzione allo studio della sua vita e delle sue opere. — Milano, 1973.
Angelini C. Manzoni. — 2-a ed. — Torino, 1953.
Bàrberi Squarotti G. Il romanzo contro la storia: Studi sui《Promessi Sposi》. — Milano, 1980.
Battaglia S. Il realismo nei《Promessi Sposi》. — Napoli, 1963.
Bonora E. Appunti sul realismo dei《Promessi Sposi》. — Torino, 1960.
Bonora E. Manzoni: Conclusioni e proposte. — Torino, 1976.
Garetti L. Manzoni: Ideologia e stile — Torino, 1972.
Croce B. Alessandro Manzoni: Saggi e discussioni. — 6-a ed. — Bari, 1969.
Derla L. Il realismo storico di Alessandro Manzoni. — Milano, 1965.
De Sanctis F. Manzoni / A cura di C. Muscetta, D. Puccini. — 2-a ed. — Torino, 1965.
Getto G. Manzoni europeo. — Milano, 1971.

Goffis C. F. La lirica di Alessandro Manzoni. — Firenze, 1964.
Gorra M. Manzoni. — 2-a ed. — Palermo, 1968.
Leone De Castris A. L'impegno del Manzoni. — Firenze, 1965.
Lonardi G. L'esperienza stilistica del Manzoni tragico. — Firenze, 1965.
Momigliano A. Alessandro Manzoni. 《I Promessi Sposi》. — 5-a ed. — Milano; Messina, 1958.
Nicolini F. Arte e storia nei《Promessi Sposi》. — Milano, 1958.
Nigro S. S. Manzoni. — Bari, 1978.
Paratore E. Studi sui《Promessi Sposi》. — Firenze, 1972.
Petrocchi G. Manzoni e il romanzo storico. — Roma, 1967.
Petrocchi G. Manzoni, letteratura e vita. — Milano, 1971.
Portier L. Alessandro Manzoni. — Paris, 1956.
Ragonese G. Illuminismo manzoniano: Saggi e rassegne. — Palermo, 1967.
Raimondi E. Il romanzo senza idillio: Saggio sui《Promessi Sposi》. — Torino, 1974.
Russo L. Personaggi dei《Promessi Sposi》. — 8-a ed. — Bari, 1974.
Sapegno N. Ritratto di Manzoni e altri saggi. — Bari, 1966.
Ulivi F. Il romanticismo e Alessandro Manzoni. — Bologna, 1965.
Varese C. L'originale e il ritratto: Manzoni secondo Manzoni. — Firenze, 1975.

ПРОЗА И ДРАМА 30—40-х ГОДОВ

Agnoli G. Gli albori del romanzo storico in Italia e i primi imitatori di Walter Scott. — Piacenza, 1906.
Alfieri L. Giambattista Niccolini trageda d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 Milano, 1939.
Bellorini E. Silvio Pellico. — Messina, 1916.
Bocelli A. Aspetti del romanzo italiano dell'Ottocento. — Torino, 1956.
Borgomaneri T. Il romanticismo nel teatro di G. B. Niccolini. — Milano, 1926.
Debenedetti G. Niccolò Tommaseo. — Milano, 1973.
Francesco Domenico Guerrazzi nella storia politica e culturale del Risorgimento: Convegno di studi. — Firenze, 1975.
Iliescu N. Da Manzoni a Nievo: Considerazioni sul romanzo storico italiano. — Roma, 1959.
Kauchtschischwili N. Silvio Pellico e la Russia. — Milano, 1963.
Leone de Castris A. La polemica sul romanzo storico. — Bari, 1959.
Pirjevec J. Niccolò Tommaseo tra Italia e Slavia. — Venezia, 1977.
Puppo M. Poetica e poesia di Niccolò Tommaseo. — Roma, 1980.
Puppo M. Tommaseo prosatore. — 2-a ed., riv. e ampl. — Roma, 1975.
Romanò A. Silvio Pellico. — Brescia, 1948.

ОСНОВНЫЕ ЛИНИИ В РАЗВИТИИ ПОЭЗИИ

Ватсон М. Джузеппе Джусти: Крит.-биогр. очерк. — СПб., 1900.
Auréas H. Carlo Porta. — P., 1959.
Bellorini E. Giuseppe Giusti. — Roma, 1923.
Bezzola G. Vita di Carlo Porta nella Milano del suo tempo. — Milano, 1980.
Citanna G. Il romanticismo e la poesia italiana dal Parini al Carducci. — 2-a ed. — Bari, 1949.
De'Giovanni P. Giusti. — Milano, 1947.
Dell'Arco M. Gioacchino Belli: Ritratto mancato. — Roma, 1970.
De Lollis C. Saggi sulla forma poetica italiana dell' Ottocento. — Bari, 1929.
De Michelis E. Approcci al Belli. — Firenze, 1969.
Gallardo P. La poesia in dialetto nell'età romantica. — Milano, 1969.
G. G. Belli romano, italiano ed europeo. — Roma, 1985.
Gibellini P. Il coltello e la corona. — Roma, 1979.
Giuseppe Giusti e la Toscana del suo tempo // Atti dei Convegni Lincei /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 Roma, 1974. — Vol. 2.
Grillandi M. Belli. — Milano, 1979.
Lanza M. T. Porta e Belli. — Bari, 1976.
Letture belliane: In 2 vol. — Roma, 1981.
Martini F. Giuseppe Giusti: Studi e discorsi. — Milano, 1929.
Momigliano A. L'opera di Carlo Porta. — Città di Castello, 1909.
Muscetta C. Cultura e poesia di Giuseppe Gioacchino Belli. — Milano, 1961.
Nappo F., *Sabarini R.* Belli epico e popolare. — Roma, 1980.
La poesia di Carlo Porta e la tradizione milanese. — Milano, 1976.
Samonà G. P. G. G. Belli: La commedia romana e la commedia celeste. — Firenze, 1969.
Studi belliani nel centenario di G. G. Belli. — Roma, 1965.
Studi sul Berchet. — Milano, 1951.
Vighi R. Metrica e arte nei sonetti del Belli. — Roma, 1975.
Vigolo G. Il genio del Belli: In 2 vol. — Milano, 1963.

ЛЕОПАРДИ

Bibliografia leopardiana: In 3 vol. — Firenze, 1931—1953.
Tortoreto A. Bibliografia analitica leopardiana (1952—1960). — Firenze, 1963.

*

Арсеньев Н. С. Пессимизм Джакомо Леопарди (1798—1837 гг.). — СПб., 1914.
Ватсон М. Джакомо Леопарди: Крит.-биогр. очерк.-СПб., 1908.

Bacchelli R. Leopardi e Manzoni. — Milano, 1960.
Battaglia S. L'ideologia letteraria di Giacomo Leopardi. — Napoli, 1968.
Binni W. La nuova poetica leopardiana. — Nuova ed. — Firenze, 1979.
Binni W. La protesta di Leopardi. — 2-a ed. — Firenze, 1974.
Biral B. La posizione storica di Giacomo Leopardi. — Torino, 1974.
Botti F. P. La nobiltà del poeta: Saggio su Leopardi. — Napoli, 1979.
Brioschi F. La poesia senza nome: Saggio su Leopardi. — Milano, 1980.
Carpi U. Il poeta e la politica: Leopardi, Belli, Montale. — Napoli, 1978.
Caserta E. G. L'ultimo Leopardi: pensiero e poesia. — Roma, 1980.
Consoli D. Leopardi: Natura e società. — Roma, 1977.
De Feo I. Leopardi: L'uomo e l'opera. — Milano, 1972.
De Robertis G. Saggio sul Leopardi. — 5-a ed. — Firenze, 1973.
De Sanctis F. Giacomo Leopardi / A cura di E. Ghidetti. — Roma, 1983.
Getto G. Saggi leopardiani. — Firenze, 1966.
Leopardi e il Settecento: Atti del I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di studi leopardiani. — Firenze, 1964.
Leopardi e l'Ottocento: Atti del 2 Convegno intern. di studi leopardiani. — Firenze, 1970.
Lonardi G. Classicismo e utopia nella lirica leopardiana. — Firenze, 1969.
Macchioni Jodi R. Poetica e stile della lirica leopardiana: Dal tirocinio giovanile alla 《Ginestra》. — Roma, 1981.
Marzot G. Storia del riso leopardiano. — Messina; Firenze, 1966.
Negri R. Leopardi nella poesia italiana. — Firenze, 1970.
Singh G. Leopardi and the theory of poetry. — Lexington, 1964.
Solmi S. Scritti leopardiani. — Milano, 1969.
Tartaro A. Leopardi. — Bari, 1978.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ИСП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ПЕРВЫЕ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XIX в.

Плавскин З. И. Исп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I — середины XIX в. — М., 1978.
Alborg J. L.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 Madrid, 1980. — T. 4: El Romanticismo.
Baria C. Libros y autores modernos: Siglos XVIII y XIX. — Los Angeles, 1933.
Carnero G. Los orìgenes del romanticismo reaccionario español: el matrimonio Böhl de Faber. — Valencia, 1978.
Derozier A. Manuel Josef Quintana et la naissance du libéralisme en Espagne. — P., 1968.

Ferreras J. I. Los orìgenes de la novela decimonònica (1800—1830). — Madrid, 1973.
Garcia S. Las ideas literarias en España entre 1840 y 1850. — Berkeley etc. 1971.
Historia general de las literaturas hispánicas. — 2-a p. — Barcelona, 1957. — T. 4: Siglos XVIII y XIX.
Krömer W. Zur Weltanschauung, Ästhetik und Poetik des Neoklassizismus und Romantik in Spanien. — Münster, 1968.
Llorens Castillo V. Liberales y románticos: Una emigraciòn española en Inglaterra (1823—1834). — México, 1954.
Menéndez Pelayo M. El abate Marchena. — Buenos Aires; México, 1946.
Pedraza Jiménez F. B., *Rodriguez Cáceres M.* Manual de literatura española. — Pamplona, 1983. — 6: Epoca romántica.
Romero Mendoza P. Siete ensayos sobre 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 Cáceros, 1963. — T. 1.
Seco Serrano C. Sociedad, literatura y polìtica en la España del siglo XIX. — Madrid; Barcelona, 1973.
Shaw D. L.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l siglo XIX. — Barcelona, 1973.
Vila Selma J. Ideario de Manuel José Quintana. — Madrid, 1961.

ИСПАН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Adams N. B. The romantic dramas of Garcìa Gutiérrez. — N. Y., 1922.
Alonso Cortés N. Zorrilla: Su vida y sus obras: In 3 vol. — Valladolid, 1917—1920.
Bullerfield M. E. Two dramatic versions of 《Los amantes. de Teruel》. — Oklahoma-City, 1931.
Caldera E. Primi manifesti del romanticismo spagnolo. — Pisa, 1962.
Castro A. Les grands romantiques espagnoles. — P., 1923.
Corbière A. S. Juan Eugenio Hartzenbusch and the french theatre. — Philadelphia, 1927.
Díaz-Plaja G. Introducciòn al estudio d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 Buenos Aires, 1953.
Estudios románticos. — Valladolid, 1975.
Garcìa Barrón C. La obra crìtica y literaria de don Antonio Alcalá Galiano. — Madrid, 1970.
Garcìa Mercadal J. Historia del romanticismo en España. — Barcelona; Madrid etc., 1943.
Guarner L. 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Monografìa bibliográfica. — Madrid, 1954.
Gullòn R. Cisne sin lago: Vida y obra de Enrique Gil y Carrasco. — Madrid, 1951.
Iranzo C. Juan Eugenio Hartzenbusch. — Boston, 1978.
Juretschke H. Origen doctrinal y génesis d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 Madrid, 1954.
Lloréns V. 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 Madrid, 1980.
McClelland I. L. The origins of the romantic movement in Spain. — Liverpool, 1937.
Lomba y Pedraja J. R. Teatro romántico. — Madrid, 1926.

Miscellanea di studi ispanici. — Pisa, 1964.

Montaner J. El teatro romántico español. — Barcelona, 1928.

Navas-Ruiz R. El romanticismo español: Historia y crìtica. — Salamanca, 1970.

Peers E. A. Historia del movimiento romántico español: In 2 t. — 2-a ed. — Madrid, 1967.

Picoche J. -L. Un romántico español: Enrique Gil y Carrasco (1815—1846). — Madrid, 1978.

Piñeyro E. El romanticismo en España. — Paris, 1936.

Samuels D. G. Enrique Gil y Carrasco: A study in spanish romanticism. — N. Y., 1939.

Schearer J. F. The《Poética》and《Apéndices》of Martìnez de la Rosa. — Princeton, 1941.

Sosa L. de. Martìnez de la Rosa, polìtico y poeta. — Madrid, 1930.

Tarr F. C. Romanticism in Spain and spanish romanticism. — Liverpool, 1939.

САВЕДРА

Boussagol G. Angel de Saavedra, Duc de Rivas: Sa vie, son oeuvre poétique. — Toulouse, 1926.

Casalduero J. Estudios sobre el teatro español: Duque de Rivas. — Madrid, 1967.

González Ruiz N. El Duque de Rivas o la fuerza del sino: (El hombre y su época). — Madrid, 1943.

Peers E. A. Rivas and romanticism in Spain. — L., 1923.

ЭСПРОНСЕДА

Carnero G. Espronceda. — Madrid, 1974.

Casalduero J. Espronceda. — Madrid, 1961.

Casalduero J. Forma y visiòn de《El diablo mundo》de Espronceda. — Madrid, 1951.

Marrast R. José de Espronceda et son temps: Littérature. Société, politique au temps du romantisme. — Lille, 1974.

Pujals E. Espronceda y Lord Byron. — Madrid, 1951.

КОСТУМБРИЗМ

Berkowitz H. Ch. Ramón de Mesonero Romanos: A study of his costumbrista essays. — Cornell university, 1925.

Cotarelo Mori E. Bosquejo bibliográfico de don Ramòn de Mesonero Romanos. — Madrid, 1925.

Garcìa Gómez E. La Andalucìa de El Solitario. — Madrid, 1948.

Herrero J. Fernán Caballero: un nuevo planteamiento. — Madrid, 1963.

Klibbe L. H. Fernán Caballero. — N. Y., 1973.

Lomba y Pedraja J. R. Costumbristas españoles del siglo XIX. — Oviedo, 1932.

Montesinos J. F. Costumbrismo y novela: Ensayo sobre el redescubrimiento de la realidad

española. — Valencia, 1960.

Montesinos J. F. Fernán Caballero: Ensayo de justificación. — México etc., 1961.

Montgomery C. Early costumbristas writers in Spain 1750—1830. — Philadelphia, 1931.

Revilla M. de la. Don Ramón de Mesonero Romanos. — Madrid, 1883.

Ucelay da Cal M. Los españoles pintados por si mismos (1843—1844): (Estudio de un género costumbrista). — México, 1951.

ЛАРРА

Плавскин З. И. Мариано Хосе де Ларра и его время: (Сатирическая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ранних буржуазных революций в Испании). — Л., 1977.

Bellini G. Larra e il suo tempo: Appunti dalle lezioni. — Milano, 1967.

Bellini G. L'opera di Larra e la Spagna del primo ottocento. — Milano, 1962.

Escobar J. I. Los orígenes de la obra de Larra. — Madrid, 1973.

Lomba y Pedraja J. R. Mariano José de Larra: Cuatro estudios que le abordan o le bordean. — Madrid, 1936.

Mariano José de Larra / Ed. de R. Benítez. — Madrid, 1979.

Ullman P. L. Mariano José de Larra. — Madison; Milwaukee; London, 1971.

Várela J. L. Larra y España. — Madrid, 1983.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ПОРТУ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aptista J. Alexandre Herculano, jornalista. — Lisboa, 1977.

Braga T. Historia do romantismo em Portugal. — Lisboa, 1984.

Chaves Branco C. O romance histórico no romantismo português. — 2-a ed. — Lisboa, 1980.

Cidade H. Século XIX: A revolução cultural em Portugal e alguns dos seus mestres. — Lisboa, 1985.

Ferreira A. Perspectiva do romantismo português (1834—1865). — Lisboa 1971.

França J.-A. Romantismo em Portugal: Estudo de factos socioculturais. — Lisboa, 1974. — Vol. 1—2.

Lawton A. Almeida Garrett: L'intime contrainte. — Coimbra, 1966.

Le Gentil G. Alexandre Herculano, l'homme, l'artiste, l'historien, le sociologue. — Bruxelles, 1939.

Paiva Monteiro O. A formação de Almeida Garrett: experiência e criação: In 2 vol. — Coimbra, 1971.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ШВЕЙЦА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лгина А. А. Готфрид Келлер: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65.

Данилевский Р. Ю. Россия и Швейцария: Лит. связи XVIII—XIX вв. — Л., 1984.

Литература Швейцарии. — М., 1969.

Ackerknecht E. Gottfried Keller: Geschichte seines Lebens. — Leipzig, 1948.

Bächtold J. Geschichte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in der Schweiz. — Frauenfeld, 1892.

Bauer W. Jeremias Gotthelf: Ein Vertreter der geistlichen Restauration der Biedermeierzeit. — Stuttgart. 1975.

Buhne R. Jeremias Gotthelf und das Problem der Armut. — Basel, 1968.

Hildt F. Gottfried Keller: Literarische Verheissung und Kritik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im Romanwerk. — Bonn, 1978.

Hillebrand A. Mensch und Raum im Roman: Studien zu Keller, Stifter, Fontane. — München, 1971.

Jenny E., *Rossel V.*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 Literatur: In 2 Bd. — Bern, 1910.

Korrodi E. Aufzätze zur schweizer Literatur. — Bern; Stuttgart, 1962.

Muschg A. Gottfried Keller. — B., 1980.

Schwengler A. Vom Geist und Wesen der schweizer Dichtung. — St. Gallen, 1964.

Straumann R. Literarischer Konservatismus in Schweiz um 1848. — Bern, 1984.

Zäch A. Die Dichtung der deutschen Schweiz. — Zürich, 1951.

Zu Gottfried Keller / Hrsg. von H. Steinecke. — Stuttgart, 1984.

Глава десятая
БЕЛЬГ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дреев Л. Г. Сто лет бельги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67.

Alvin L. André van Hasselt, sa vie et ses travaux. — Bruxelles, 1877.

Bock E. de. Conscience en de opkomst van de Vlaamsche romantick. — 2. dr. — Antwerpen, 1943.

Bock E. de. Verkenningen in de eerste helft van de negentiende eeuw. — Antwerpen, 1965.

Champagne P. La poésie sociale en Belgique avant Verhaeren: Théodore Weustenraad, André Van Hasselt, Edouard Wacken, Charles Potvin, Antoine Clesse. — Bruxelles, 1936.

Charlier G. Le mouvement romantique en Belgique (1815—1850): In 2 vol. — Bruxelles, 1948—1959.

Coremans E. La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en Belgique depuis 1830. — Rotterdam; Bruxelles,

1905.

Eekhoud G. Henri Conscience. — Bruxelles, 1881.

Gauchez M. Histoire des lettres françaises de Belgique des origines à nos jours. — Bruxelles, 1922.

Hamélius P. Histoire politique et littéraire du mouvement flamand au XIX siècle. — Bruxelles, 1925.

Hamélius P. Introduction à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et flamande de Belgique. — Bruxelles, 1921.

Hermanowski G. Die Stimme des schwarzen Löwen: Geschichte des flämischen Romans. — Starnberg, 1961.

Histoire illustrée der lettres françaises de Belgique / Publ. sous la dir. de G. Charlier, J. Hanse. — Bruxelles, 1958.

Liebrecht H.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belge d'expression française. — Bruxelles, 1909.

Liebrecht H., *Rency G.* Histoire illustrée de la littérature belge de lang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 à 1925). — Bruxelles, 1926.

Lissens R. F. Flämische Literatur — Geschichte des 19. und 20. Jahrhunderts. — Köln; Wien, 1970.

Mont P. de. Hendrik Conscience. — Brussel, 1912.

Pillecyn Ph. H. de. Sociaal probleem en verhalend proza, 1830—1886: Een sociografische literatuurstudie. — Antwerpen, 1967.

Simons L. Vlaamse en Nederduitse literatur in de 19-de eeuw. 1. — Gent, 1982.

Smits F. Henri Conscience et le romantisme flamand. — Bruxelles, 1943.

Stecher J.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en Belgique. — Bruxelles, [1886].

Van de Voorde U. Panorama d'un siècle de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en Belgique. — P.; Bruxelles, 1930.

Vermeylen A. Les lettres néerlandaises en Belgique depuis 1830. — Bruxelles, 1907.

Vlierden B.-F. van. Van in't wonderjaer tot de verwondering: Een poëtica van de vlaamse roman. — 2. dr. — Antwerpen, 1974.

Willekens E. Hendrik Conscience, 1812—1883. — Brüssel, 1961.

Глава одиннадцатая
НИДЕР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шис В. В. История нидерлан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83.

Berg W. van den. De ontwikkeling van de term《romantiek》en zijn varianten in Nederland tot 1840. — Assen, 1973.

Brachin P. La littérature néerlandaise. — P., 1962.

Brandt Corstius J. C. Geschiedenis ven de Nederlandse literatuur. — Utrecht; Antwerpen,

1959.

Brom G. Romantiek en katolicisme in Nederland. — Groningen; Den Haag, 1926. D. 1—2.

Colmjon G. De Nederlandse letteren in de negentiende eeuw. — Amsterdam; Antwerpen, 1953.

Delfos L. Kulturgeschichte von Nederland und Belgiën. — Bremen, 1962.

Dichterschap en werkelijkheid. — 3-de dr. — Utrecht, 1951.

Drop W. Verschijningsvormen van de Nederlandse historische roman in de XIX-e eeuw. — Assen, 1958.

Grinten H. van der. Nederlandse aesthetica in de negentiende eeuw. — Heimond, 1947.

Hellwald F. Geschichte des holländischen Theaters. — Rotterdam, 1874.

Jong M. de. Van Bilderdijk tot Lucebert. — Leiden, 1967.

Jongejan E. De Humor-《cultus》 der romantiek in Nederland. — Zutphen, 1933.

Polak H. J. Tweërlei letterkundige kritiek: Potgieter en Huet. — Zwolle, 1956.

Reinsma R. Van hoop naar waarschuwing. — Amsterdam, [1970].

Russel J. A. Dutch romantic poetry. — Bradford, 1961.

Smit J. De kosmische zelfvergroting van de dichter bij Bilderdijk... — Amsterdam, 1957.

Vooys C. G. N. de, Bosch J. H. van den, Tinbergen D. C. Letterkundig leesboek. — Groningen; Den Haag, 1923. — Deel 2.

Глава двенадца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СТРАН И ФИНЛЯНДИИ

Брауде Л. Ю. Сказочники Скандинавии. — М., 1974.

Брауде Л. Ю. Скандин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сказка. — М., 1979.

Грот Я. К. Из скандинавского и финского мира (1839—1881): Очерки и переводы / Под ред. К. Я. Грота. — СПб., 1898. — Т. 1.

Шарыпкин Д. М. Скандин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 Л., 1980.

Mjöberg J. Drömmen om sagatiden. — Stockholm, 1967. — Del. 1: Återblick på den nordiska romantiken från 1700-talets mitt till nygöticismen (omkr. 1865).

Nordens litteratur / Red. af M. Brønstedt. — Københavu, 1972. — Bd. 1.

Д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редсдорф Э. Л.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Скандинавии / Сост., пер. и вступ. ст. В. В. Похлебкина. — М., 1971.

Муравьева И. И. Андерсен. — М., 1959.

Переслегина Э. В. Ханс Кристиан Андерсен: Био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М., 1979.

Albeck G., Friis O., Rohde P. P. Fra Oehlenschläger til Kierkegaard. — København, 1971. — (Dansk litteratur historie) / Red. P. H. Traustedt. — 3 udg. — Bd. 2.

Andersen J. Kr. Aladdin-Noureddin traditionen i det 19 århundrede: Bidrag til en strukturel litteraturhistorie. — København, 1975.

Andersen V. Adam Oehlenschlaeger. — København, 1964.

Anderseniana / Udg. af H. C. Andersen samfundet. — København; Odense, 1939—1982. — Bd. 1—23.

Anderson B. C. Kierkegaard. — Syracuse (N. Y.), 1974.

Baggesen S. Den Blicherske novelle. — 2 opl. — København, 1967.

Billeskov Jansen F. J. Danmarks digtekunst. — København, 1958. — Bog. 3.

A book on the Danish writer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His life and work: Publ. on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 Copenhagen, 1955.

Borup M. Johan Ludvig Heiberg: I 3 bd. — København, 1947—1949.

Bredsdorff E.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L., 1975.

Brix H. Blicher-studier. — 2 udg. — København, 1967.

Brix H. Emil Aarestrup: I 2 bd. — København, 1952.

Brønstedt M. Danmarks litteratur. — 2 udg. — København, 1975. — Bd. 1: Fra oldtiden til 1870.

Brønstedt M. Meir Goldschmidt. — København, 1965.

Christensen V. Kierkegaard Dramaet — København, 1967.

Friis O. Hjortens flugt: Bidrag til studiet af Christian Winthers digtning. — København, 1961.

Gjesing K. B. Den romantiske bevaegelse: Skitse til generel karakteristik. — Odense, 1974.

Grønbech B.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Levnedsløb. Digtning. Personlighed. — København, 1971. Рус. пер.: *Грёнбек Б.* Ханс Кристиан Андерсен: Жизнь, творчество, личность / Пер. М. С. Николаевой; Предисл. и коммент. Д. Б.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 М., 1979.

Hansen C. K. Den kontrollerede virkelighed: Virkeligheds problemet i den litteraere kritik og den nye danske roman i perioden 1830—1840. — København, 1976.

Hay M. N. F. S. Grundtvig: Danmarks store seer og skjald. — København, 1960.

Henriksen A., Nielsen E. A., Wentzel K. Organismetaenkning i dansk litteratur, 1770—1870. — København, 1975. — (Ideologihistorie; Bd 1).

Hofe G. von. Die Romantikkritik Sören Kierkegaards. — Frankfurt a. M., 1972.

Jensen A. B. Penge og kaerlighed: Religion og socialitet i Thomasine Gyllembourgs forfatterskab. — Odense, 1983.

Jørgensen A. H. C. Andersen: Litteraturen 1875—1968. — Aarhus, 1970.

Jørgensen A. Søren Kierkegaard-Litteratur, 1961—1970: En forelobig bibliografi. — Aarhus, 1971.

Jørgensen A. Supplement til Oehlenschläger-litteraturen, 1850—1966; En bibliografi. — Aarhus, 1971.

Jørgensen M. Kierkegaard som kritiker. — København, 1978.

Kastholm H. C. Den kontrollerede virkelighed: Virkelighedsproblemet i den litteraere kritik og den nye danske roman i perioden 1830—1840. — København, 1976.

Kierkegaardiana / Udg. af Søren Kierkegaard selskabet. — København, 1955—1982. — Bd. 1—12.

Kofoed N. Studier i H. C. Andersens fortaellekunst. — København, 1967.

Kristensen S. M. Digteren og samfundet i Danmark i det 19 århundrede. — 2 udg. — København, 1965. — Bd. 1: Gulaldertiden.

Kristensen S. M. Den dobbelte eros: Studier i den danske romantik. — København, 1967.

Lundgreen-Nielsen F. Det handlende ord: N. F. S. Grundtvigs digtning, litteraturkritik og poetik, 1798—1819: I 2 del. — København, 1980.

Mackey L. Kierkegaard: A kind of a poet. — Philadelphia, 1972.

Mylius J. E. de. Myte og roman: H. C. Andersens romaner mellem romantik og realisme: En traditionshistorisk undersøgelse. — København, 1981.

Ober K. H. Meïr Goldschmidt. — Boston, 1976.

Omkring Blicher / Red. av F. Nørgaard et al. — København, 1974.

Østergaard V. Illustreret dansk literaturhistorie: Danske digtere i det 19 de aarhundrede. — København; Kristiania, 1907.

Povlsen H. Steen Steensen Blicher. — København, 1952.

Rubow P. V. Heiberg og hans skole i kritiken. — København, 1953.

Sørensen P. E. H. C. Andersen og herskabet: Studier i borgerlig krisebevidsthed. — Grena, 1973.

Stirling M The wild swan: The life and times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L., 1965.

Thaning K. For menneskelivets skyld: Grundtvigs opgør med sig selv. — København, 1971.

Toksvig S. The life of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 N. Y., 1969.

Topsøe-Jensen H. Vintergrønt: Nye H. C. Andersen studier. — København, 1976.

Undset S. Steen Steensen Blicher. — Oslo, 1957.

Vedel V. Studier over Guldalderen i dansk digtning. — København, 1967.

Zeruneith K. Den frigjorte: Emil Aarestrup i digtning og samtid: En biografi. — København, 1981.

ИС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 М. И. Исла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Л., 1947.

Стеблин-Каменский М. И. Культура Исландии. — Л., 1967.

Beck R. History of Icelandic poets, 1800—1940. — Ithaca; N. Y., 1950.

Einarsson S. A history of Icelandic literature. — N. Y., 1957.

Einarsson S. History of Icelandic prose writers, 1800—1940. — N. Y., 1948.

Gislason B. M. Islands litteratur efter sagatiden, ca 1400—1948. — København, 1949.

Grøn J. U. Fra Islands daemringstid: Bidrag til belysning af de videnskabelige og kulturelle forudsaetninger for Islands nationale genrejsning i det 19 århundrede. — Odense, 1976.

НОРВЕЖ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ndersen-Naess R. J. S. Welhaven: Mennesket og dikteren. — Oslo, 1959.

Beyer E., *Hauge I.*, *Bø O.* Norges litteratur historie: Fra Wergeland til Vinje. — Oslo, 1974. — (Norges litteratur historie; Bd 2).

Dahl W. Norges litteratur. — Oslo, 1981 — Bd. 1: Tid og tekst, 1814—1884.

Falnes O. J. National romanticism in Norway. — N. Y., 1968.

Forfatternes litteraturhistorie / Red. av K. Heppelund et al. — Oslo, 1980. — Bd. 1: Fra M. C. Hansen til A. Garborg.

Handagard I. Ivar Aasen. — Oslo, 1956.

Hauge I. Tanker og tro i Welhavens poesi. — Oslo, 1955.

Heiberg H. Så stort et hjerte: Henrik Wergeland. — Oslo, 1972.

Kabell Å. Wergeland: I 2 bd. — Oslo, 1957.

Liestøl K. P. Chr. Asbjørnsen: Mannen og livsverket. — Oslo, 1947.

Michaelsen A. G. Den gyldne lenke: Norsk literatur utvikling og det harmoniske imperativ. — Oslo, 1977. — Del. 1: Romantikken.

Nygaard K. Henrik Anker Bjerregaard: Dikteren og hans tid. — Oslo, 1966.

Paasche F. Norges litteratur. Fra 1814 til 1850-årene. — Oslo, 1959. — (Norsk litteratur historie; Bd 3).

Saugstad P. J. S. Welhaven: En idealenes vokter. — Oslo, 1967.

Ustvedt Y. Det levende univers: En studie i Henrik Wergelands natur-lyrikk. — Oslo 1964.

ШВЕ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Г. Тегнер и его время // Тегнер Э. Сага о Фритьофе; Аксель. — М.; Л., 1935. С. 7—66.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кандинавских стран в русской печати: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Вып. 1. Шве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Сост. Б. А. Ерхов. — М., 1986.

Andreae D. Johan Olof Wallin. — Stockholm, 1956.

Aspelin K. Poesi och verklighet: Några huvudlinjer i 1830-talets svenska kritikerdebatt. — Göteborg, 1967.

Balgård G. Carl Jonas Love Almqvist — samhällsvisionären. — Stockholm, 1973.

Bergsten S. En Stagnelius-bibliografi. — Uppsala, 1965.

Böök F. Analys og porträtt: Litteraturhistoriska studier. — Stockholm, 1962.

Böök F. Esaias Tegnér: En biografi. — Stockholm, 1963.

Ehnmark E. Fredrika Bremer. — Stockholm, 1955.

Frykenstedt H. Atterboms livs — och världsåskådning i belysning av den trancendentala idealismen: I 2 bd. — Lund, 1951—1952.

Geijerstudier: I 3 bd. — Uppsala, 1958.

Gustafson A. Den svenska litteraturens historia. — Stockholm, 1963; — Bd. 1: Före 1900.

Hellsten-Wallin E., *Wallin I.* Den unge Atterbom och romantiken: Genombrottsåren. — Stockholm, 1954.

Holmberg O. Kärlek, ensamhet och dödens trädgård: Tre sentimentala kapitel från svensk romantik. — Stockholm, 1972.

Jägerskiöld S. Från Jaktslottet till landsflykten: Nytt ljus över C. J. L. Almqvists värld och diktning. — Helsingfors, 1970.

Janzén A. Emilie Flygare-Carlén: En studie i 1800-talets romandialog. — Göteborg, 1946.

Malmström S. Studier över stilen i Stagnelius lyrik. — Stockholm, 1961.

Nilsson A. Svensk romantik. — Lund, 1964.

Ny illustrerad svensk litteraturhistoria / Red. av E. N. Tigerstedt. — Stockholm, 1956. — Del. 3: Romantiken. Liberalismen.

Romberg B. Carl Jonas Love Almqvist. — Boston, 1977.

Schück H., *Warburg K.* Illustrerad svensk litteraturhistoria. — Stockholm, 1936. — Del. 5: Romantiken.

Stenroth I. Göthiska forbundet. — Göteborg, 1972.

Stolpe S. Sven Stolpe berättar: Den svenska romantiken: Från Atterbom til Runeberg. — Stockholm, 1977.

Svanberg V. Medelklassrealism. — Stockholm, 1980.

Svanberg V. Romantikens samhälle. — Stockholm, 1980.

Sylwan N. Svensk realistisk roman, 1795—1830. — Stockholm, 1942.

Vinge L. Morgonrodnadens stridsmän: Epokbildningen som motiv i svensk romantik, 1807—1821. — Lund, 1978.

Wallen N.E. Sophie von Knorring och samhället. — Helsingfors, 1962.

Werin A. Tegner: I 2 del. — Lund; Stockholm, 1974—1976.

Wieselgren A.M. Carl-Johanstidens prosa. — Lund, 1971.

Wieselgren G. Fredrika Bremer och verkligheten: Romanen Herthas tillblivelse. — Stockholm, 1978.

Ф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рху Э. Г.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Финляндии. — Л., 1979.

Карху Э. Г. Финлян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Россия (1800—1850). — Таллин, 1962.

Antilla A. Elias Lönnrot. Elämä ja toiminta: In 2 vol. — Helsinki, 1931—1935.

Castren G. Runeberg. — Stockholm, 1950.

Castren G. A. I. Arwidsson isänmaallisena herättänä. — Helsinki, 1951.

Castren G. Nuori Arwidsson ja hänen ympäristönsä. — Helsinki, 1944.

Comparetti C. Traditional Poetry of the Finns. — L., 1892.

Finlands svenska litteratur: In 2 vol. — Helsingfors, 1968—1969.

Forsman R. Fredrik Cygnaeus: In 2 vol. — Porvoo, 1923—1925.

Hirn Y. Runebergskulten. — Helsingsfors, 1935.

Karkama P. Vapauden muunnelmat: J. L. Runebergin maailmankatsomus hänen epiikkansa pohjalta. — Helsinki, 1982.

Kaukonen V. Elias Lönnrotin Kalevalan toinen painos. — Helsinki, 1956.

Kaukonen V. Lönnrot ja Kalevala. — Pieksämäki, 1979.

Kaukonen V. E. Lönnrotin《Kanteletar》. — Helsinki, 1984.

Kaukonen V. Vanhan Kalevalan kokoonpano: In 2 vol. — Helsinki, 1939—1945.

Krohn K. Kalevala-studien: In 6 vol. — Helsingfors, 1924—1928.

Krohn K. Kalevalan kysymyksiä: In 2 vol. — Helsinki, 1918.

Nyberg P. Z. Topelius: En biografisk skildring; In 2 vol. — Helsingfors; Helsinki, 1949—1950.

Palmgren R. Suuri linja: Arwidssonista vallankumouksellissiin sosialisteihin: Kansallisia tutkielmia. — Helsinki, 1948.

Rhein Th. J. V. Snellman: In 2 vol. — Helsingfors, 1895—1901.

Salmoaa J. E. J. V. Snellman: Elämä ja filosofia. — Helsinki, 1944.

Söderhjelm W. Åboromantiken och dess samband med utländska ideströmningar. — Borgå, 1915.

Söderhjelm W. J. L. Runeberg, hans lif och hans diktning: In 2 vol. — Helsingfors, 1904—1906.

Suomen kirjallisuus. — Helsinki, 1964. — T. 3.

Tarkiainen V. Aino ja muut Kalevalan naiset. — Helsinki, 1911.

Tarkiainen V. Fredric Cygnaeus runoilijana. — Helsinki, 1911.

Tarkiainen V. Suomalaisen kirjallisuuden historia. — Helsinki, 1934.

Tideström G. Runeberg som estetiker. — Helsingfors, 1941.

Vasenius V. Z. Topelius, hans liv och skaldegärning: In 6 vol. — Stockholm, 1912—1930. Suom: S. Topelius inmisenä ja runoilijana: In 6 vol. — Helsinki, 1912—1933.

Vest E. Zacharias Topelius: En biografisk studie. — Helsingfors, 1905. Suom.: Sakari Topelius. — Helsinki, 1906.

Viljanen L. Runeberg ja hänen runoutensa: In 2 vol. — Porvoo; Helsinki, 1944—1948.

Wilson W. A. Folklore and nationalism in modern Finland. — Bloomington; L., 1976.

II.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ладиславлев И. В.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пыт библиогр. пособия по рус. лит. XIX—XX столетий — 4-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М.; Л., 1924.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Под ред. К. Д. Муратовой. — М.; Л., 1962.

*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10 т.]. — М.; Л., 1941—1955. — Т. 5—7.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3 т. — М.; Л., 1963. — Т.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4 т. — Л., 1981—1982. — Т. 2—3.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 Под ред. Д. Н.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ого. — М., 1908—1909. — Т. 1—3.

Булич Н. Н.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с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 2-е изд. — СПб., 1912.

Венгеров С.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 эпохи Белинского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 2-е изд. — СПб., 1907.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 А.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ой эпохи. — 3-е изд. — Пг., 1917.

Поспелов Г.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1840—1860-е годы). — 3-е изд., доп. — М., 1981.

Сакулин П. Н.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циолого-синтет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лит. стилей. — М., 1929. — Ч. 2: Но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околов А. Н.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1-я половина). — 5-е изд., испр. — М., 1985.

Соловьев [Андреевич] Е.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 — 4-е изд, испр. — М., 1923.

Цейтлин А. Г.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ека. — М., 1940.

Вулетић В. Руска књижевност XIX века: (Од Жуковского до Гогольа). — Београд, 1971.

Гижицкий А.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 Cluj, 1977.

Berg 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russe au XIX siècle. — 3 e éd. — P., 1978. Текст на рус. яз.

Čiževskij D. Russische Literaturgeschichte 19. Jahrhunderts. — München, 1964—1967. —

Bd. 1—2.

Geschichte der klassischen russischen Literatur. — B.; Weimar, 1965.

Mirskij D. Geschichte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 München, 1964.

*

Бочкарев В. 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1800—1815). — Куйбышев, 1959.

Бочкарев В. А. Русская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периода подготовки восстания декабристов (1816—1825 гг.). — Куйбышев, 1968.

Вацуро В. Э. 《Северные цветы》: История альманаха Дельвига — Пушкина. — М., 1978.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Избранные труды: Поэтика рус. лит. — М., 1976.

Гиллельсон М. И. От арзамас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 к пушкинскому кругу писателей. — Л., 1977.

Евгеньев-Максимов В. Е. 《Современник》 в 40—50-е годы: От Белинского до 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 — Л., 1934.

Консиинов В. В. Книга о русской лирической поэзии XIX века: Развитие стиля и жанра. — М., 1978.

Кошелев В. 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и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оззрения русских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40—1850-е годы). — Л., 1984.

Кулешов В. 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4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М., 1959.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взгляды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1830—1850 годы. — М., 1978.

Майков В. Н. Сочинения: В 2 т. — Киев, 1901 — Т. 1: Критические статьи.

Манн Ю. В.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эстетика (1820—1830-е гг.). — М., 1969.

Мордовченко Н. И. Рус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первой четверти XIX века. — М.; Л., 1959.

Петров С. М. Русски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XIX века. — 2-е изд. — М., 1984.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зма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 М.; Л., 1961.

Проблемы типолог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 М., 1969.

Развит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 3 т. — М., 1972—1973.

Русская повесть XIX века: История и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жанра. — Л., 1973.

Русские драматурги XVIII—XIX вв.: Моногр. очерки в 3 т. — Л.; М., 1961. — Т. 2: Перв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в.

Скатов Н. Н.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черки. — М., 1985.

Сквозников В. Д. Реализм лирический поэзи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рике. — М., 1975.

Усакина Т. И. Петрашевцы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общественное движение сороковы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Саратов, 1965.

Фохт У. Р. Пути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 М., 1963.

Фридлендер Г. М.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реализма: Очерки о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 — Л., 1971.

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Творческая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 писателя и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 4-е изд. — М., 1977.

Цимбаев Н. И.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 обществ.-полит. мысли XIX в. — М., 1986.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О поэзии. — Л., 1969.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О прозе: Сб. ст. — Л., 1969.

Янковский Ю. З. Патриархально-дворянская утопия: Страница рус. обществ.-лит. мысли 1840—1850-х годов. — М., 1981.

Andrew J. Writers and society during the rise of Russian realism. — L., 1980.

Christoff P. K. The third heart: Some intellectual ideological currents and cross currents in Russia, 1800—1830. — The Hague; Paris, 1970.

Kjellberg L. Den klassiska romanens Ryssland. — Stockholm, 1964.

Kucharska E. Rosyjska powieść historyczna pierwszego trzydziestolecia XIX wieku. — Opole, 1976.

Mersereau J. Baron Delwig's《Northern flowers》, 1825—1832: Literary almanac of the Pushkin pleiad. — L.; Amsterdam, 1967.

Nedeljković D. D. La conception de l'esprit national et populaire dans la littérature russe du XIX siècle. — The Hague; P., 1966.

O'Toole L. M. Structure, style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Russian short story. — New Haven; L., 1982.

Scholle C. Das Duell in der russischen Literatur. — München, 1977.

Simpson M. S. The offic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 Wash., 1981.

Skrunda W. Na marginesach wielkiej literatury: Ewolucja ros. almanachów literackich lat 1794—1852. — Wrocław, 1974.

Städtke K. Die Entwicklung der russischen Erzählung (1800—1825): Eine gattungsgeschichtliche Untersuchung. — B., 1971.

Städtke K. Studien zum russischen Realismus des 19. Jahrhunderts: Zum Verhältnis von Weltbild und epischer Struktur. — B., 1973.

*

Айхенвальд Ю. Силуэты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 3-е изд. — М., 1911. — Вып. 1.

Бабаев Э. Г.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а XIX века: Пушкин, Герцен, Толстой. — М., 1984.

Белозерская Н. Васил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Нарежный: Ист.-лит. очерк.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Пб., 1896. — Ч. 1—2.

Бессараб М. Я. Жуковский.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83.

Библиотека В. А. Жуковского в Томске. — Томск, 1978—1984. — Ч. 1—2.

Бухштаб Б. Я. Русские поэты: Тютчев, Фет, Козьма Прутков, Добролюбов. — Л., 1970.

Веселовский А. Н. В. А. Жуковский: Поэзия чувства и《сердечного воображения》. — Пг., 1918.

Воронин И. Д. А. И. Полежае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2-е изд., доп. и перераб. — Саранск, 1979.

Гершензон М. О. П. Я. Чаадаев: Жизнь и мышление. — СПб., 1908.

Гиллельсон М. И. П. А. Вязем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Л., 1969.

Гиппиус В. В. От Пушкина до Блока. — М.; Л., 1966.

Горелов А. Е. Очерки о русских писателях: Избранное. — Л., 1984.

Грот Я. К.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поэзии Жуковского. — СПб., 1883.

Каверин В. А. Барон Брамбеус: История Осипа Сенковского, журналиста, редактора《Библиотеки для чтения》. — М., 1966.

Каменский З. А. Н. И. Надеждин: Очерк филос. и эстет. взглядов (1828—1836). — М., 1984.

Карпец В. И. Федор Глинка: Ист.-лит. очерк. — М., 1983.

Козмин Н. К. Н. И. Надеждин: Жизнь и науч.-ли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1804—1836. — СПб., 1912.

Лебедев А. А. Чаадаев. —М., 1965.

Лотман Ю. М. 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Кайсар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о-общественная борьб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 Тарту, 1958.

Майков Л. Н. Батюшков, его жизнь и сочинения. — 2-е изд., пересмотр. — СПб., 1896.

Маймин Е. А. Русская философская поэзия: Поэты-любомудры, А. С. Пушкин, Ф. И. Тютчев. — М., 1976.

Машинский С. И. С. Т. Аксак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73.

Михайлова Н. И.《Парнасский мой отец》: [О В. Л. Пушкине]. — М., 1983.

Оксман Ю. Г. От《Капитанской дочки》к《Запискам охотника》: Пушкин — Рылеев — Кольцов — Белинский — Тургенев: Исслед.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Саратов, 1959.

Орлов В. Н. Пути и судьбы: Лит. очерки. — 2-е изд. — Л., 1971.

Переверзев В. Ф. Гоголь.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 М., 1982.

Плетнев П. А. О жизни и сочинениях В. А. Жуковского. — СПб., 1853.

Пухов В. В. 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 — М., 1984.

Пушкин. Лермонтов. Гоголь. — М., 1952.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АН СССР.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Т. 58).

Рассадин С. Б. Спутники: Дельвиг. Языков. Давыдов. Бенедиктов. Вяземский. — М., 1983.

Резанов В. И. Из разысканий о сочинениях В. А. Жуковского. — СПб., 1906—1916. — Вып. 1—2.

Семенко И. М. Жизнь и поэзия Жуковского. — М., 1975.

Семенко И. М. Поэты пушкинской поры: Батюшков, Жуковский. 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

Вяземский. Кюхельбекер. Языков. Баратынский. — М. , 1970.

Серебряков Г. В. Денис Давыдов. — М. , 1985.

Тартаковская Л. А. Дмитрий Веневитинов: (Личнос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Творчество). — Ташкент, 1974.

Турбин В. Н. Пушкин. Гоголь. Лермонтов: О изуч. лит. жанров. — М. , 1978.

Утков В. Г. Гражданин Тобольска: О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е П. П. Ершова, автора сказки 《Конек-Горбунок》. — 2-е изд. , доп. — Свердловск, 1979.

Фридман Н. В. Поэзия Батюшкова. — М. , 1971.

Фридман Н. В. Проза Батюшкова. — М. , 1965.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Заметки о прозе русских классиков: 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х Пушкина, Гоголя, Лермонтова, Тургенева, Гончарова, Толстого, Чехова. — 2-е изд. , испр. и доп. — М. , 1955.

Шкуринов П. С. П. Я. Чаадаев: Жизнь,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 М. , 1960.

Янушкевич А. С. Этапы и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кой эволюции В. А. Жуковского. — Томск, 1985.

Berwiński A. Twórczość poetycka Aleksego Chomiakowa. —Wrocław, 1976.

Chmielewski E. Tribune of the Slavophiles: Konstantin Aksakov. — Gainesville, 1962.

Christoff P. K. An introduction to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n slavophilism: A study in ideas. — 's-Gravenhage, 1961—1972. — Vol. 1—2.

Eichstädt H. Zukovskij als Übersetzer: Drei Studien zu Übers. V. A. Zukovskijs aus dem Dt. u. Fr. — München, 1970.

Falk H. Das Weltbild P. J. Tschaadajews nach seinen acht philosophischen Briefen. — München, 1954.

Holzheid S. Die Nominalkomposita in der Iliasübersetzung von N. I. Gnedi č. — München, 1969.

Koehler L. Anton Antonovič Del'vig: A classicist in the time of romanticism. — The Hague; Paris, 1970.

Mazurek-Wita H. Powieści Wasyla Narieżnego na tle prozy satyryczno-obyczajowej XVIII i początku XIX wieku. — Wrocław, 1978.

Nineteenth century Russian literature: Studies of ten russian writers. — Berkeley; Los Angeles, 1976.

Pedrotti L. Józef-Julian Sękowski: The genesis of a literary alien. — Berkeley; Los Angeles, 1965.

Rossi Varese M. F. Batjuškov: Un poeta tra Russia e Italia. — Padova, 1970.

Wytrzens G. Dmitrij Vladimirovič Venevitinov als Dichter der russischen Romantik. — Graz; Köln, 1962.

Wytrzens G. Pjotr Andreevič Vjazemskij: Studie zur russischen Literatur- und Kulturgeschichte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 — Wien, 1961.

КРЫЛОВ

Гордин М. А. Жизнь Ивана Крылова. — М., 1985.

Иван Андреевич Крылов: Проблемы творчества. — Л., 1975.

Кеневич 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примечания к басням Крылова. — 2-е изд. — СПб., 1878.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Крылов.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69.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И. А. Крыл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958.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ДЕКАБРИС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азанов В. Г. Очерки декабр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оэзия. — М.; Л., 1961.

Базанов В. Г. Очерки декабрис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Проза Критика. — М., 1953.

Декабристы и их время: Материал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 М.; Л., 1951.

Декабристы-литераторы. — М., 1954—1956.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АН СССР.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Т. 59, 60)

Замотин И. И. Романтизм двадцатых годов XIX столетия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2-е изд., просмотр. и доп. — СПб.; М., 1911—1913. — Т. 1—2.

История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с. лит. (1790—1825). — М., 1979.

История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Романтизм в рус. лит. 20—30-х годов XIX в. (1825—1840). — М., 1979.

К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73.

Каганович С. Л.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Восток: Специфика межнац.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 Ташкент, 1984.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декабристов. — Л., 1975.

Маймин Е. А. О русском романтизме. — М., 1975.

Манн Ю. В. Поэтика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 М., 1976.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 Л., 1978.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Сб. ст. — Л., 1927.

Сахаров В. И. Под сенью дружных муз: О рус. писателях-романтиках. — М., 1984.

Троицкий В. Ю.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е открытия русско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прозы 20—30-х годов XIX в. — М., 1985.

Юсуфов Р. Ф. Рус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начала XIX века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культуры. — М., 1970.

Russian romanticism: Studies in the poetic codes. — Stockholm, 1979.

Suchanek L. Rosyjska ballada romantyczna. — Wrocław, 1974.

Zelinsky B. Russische Romantik. — Köln; Wien, 1975.

*

Афанасьев В. В. Рылеев: Жизнеописание. — М., 1982.

Голубов С. Н.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 М., 1960.

Илюшин А. А. Поэзия декабриста Г. С. Батенькова. — М., 1978.

Канунова Ф. З. Эстетика русско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А. А.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и романтики-беллетристы 20—30-х годов XIX в.). — Томск, 1973.

Кирилюк З. В. О. Сомов — критик та балетрист пушкинської епохи. — Київ, 1965.

Козмин Н. К.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романтизма: Н. А. Полевой как выразитель лит. направле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ему эпохи. — СПб., 1903.

Колесников А. Г. В. Ф. Раевский: Полит. и ли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Ростов н/Д, 1977.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 А. Декабристы: Кн. А. И. Одоевский и А. А. Бестужев-Марлинский: (Их жизнь и ли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СПб., 1907.

Маслов 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 Ф. Рылеева. — Киев, 1912.

Пигарев К. В. Жизнь Рылеева. — М., 1947.

Цейтлин А. Г. Творчество Рылеева. — М., 1955.

Шарупич А. П. Декабрист Александр Бестужев: Вопросы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я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инск, 1962.

Ягунин В. П. Александр Одоевский. — М., 1980.

Chmielewski H. Aleksandr Bestužev-Marlinskij. — München, 1966.

Dzlechciaruk Z. Estetyka i literatura romantyczna w czasopismie Mikolaja Polewoja 《Moskowskij tielegraf》(1825—1834). — Wrocław, 1975.

Galster B. Twórczość Rylejewa na tłe prądów epoki. — Wrocław, 1962.

Chijitchi A. Rîleev. — Buc., 1966.

Henzèl J. Proza Aleksandra Biestużewa-Marlinskiego w okresie petersburskim. — Wrocław, 1967.

Leighton L. G. Alexander Bestuzhev-Marlinsky. — Boston, 1975.

ГРИБОЕДОВ

Гершензон М. О. Грибоедовская Москва. — 3-е изд. — М., 1928.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 М., 1946.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АН СССР. Ин-т лит. (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 Т. 47/48).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Творчество. Биография. Традиции. — Л., 1977.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1795—1829: Сб. ст. — М., 1946.

Лебедев А. А. Грибоедов: Факты и гипотезы. — М., 1980.

Медведева И. Н. 《Горе от ума》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а. — 2-е изд. — М., 1974.

Мещеряков В. П.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Лит. окружение и восприятие (XIX — нач. XX в.). — Л., 1983.

Нечкина М. В. Грибоедов и декабристы. — 3-е изд. — М., 1977.

Орлов В. Н. Грибоедов. — Л., 1967.

Петров С. М.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Крит.-биогр. очерк. —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 М., 1954.

Пиксанов Н. К. Грибоедов: Исслед. и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 Л., 1934.

Пиксанов Н. К. Твор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Горя от ума》. — 2-е изд. — М., 1971.

Фомичев С. А. Комедия А. С. Грибоедова《Горе от ума》: Комментарий. — М., 1983.

Bonamour J. A. S. Griboedov et la vie littéraire de son temps. — P., 1965.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еев М. П. Пушкин: Сравн.-ист. исслед. — 2-е изд. — Л., 1984.

Алексеев М. П.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е Пушкина《Я памятник себе воздвиг...》: Проблемы его изучения. — Л., 1967.

Анненков П. В. А. С. Пушкин: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его биографии и оценки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 2-е изд. — СПб., 1873.

Анненков П. В. А. С. Пушкин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ую эпоху, 1799—1826 гг. — СПб., 1874.

Ахматова А. А. О Пушкине: Ст. и заметки. — Л., 1977.

Благой Д. Д. Душа в заветной лире: Очерки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Пушкина. — 2-е изд., доп. — М., 1979.

Благой Д. Д.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Пушкина (1813—1826). — М.; Л., 1950.

Благой Д. Д.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Пушкина (1826—1830). — М., 1967.

Бонди С. М. О Пушкине: Ст. и исслед. — 2-е изд. — М., 1983.

Бонди С. М. Черновики Пушкина: Ст., 1930—1970 гг. — 2-е изд. — М., 1978.

Бочаров С. Г. Поэтика Пушкина: Очерки. — М., 1974.

Бродский Н. Л.《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Роман А. С. Пушкина. — 5-е изд. — М., 1964.

Бродский Н. Л. А. С. Пушкин: Биография. — М., 1937.

Брюсов В. Я. Мой Пушкин: Ст., исслед., наблюдения. М.; Л., 1929.

Бурсов Б. И. Судьба Пушкина. — Л., 1985.

В мире Пушкина: Сб. ст. — М., 1974;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Стиль Пушкина. — М., 1941.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В. Язык Пушкина: Пушкин и история рус. лит. яз. — М.; Л., 1935.

Временник Пушки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 М.; Л. 1963—1985. — Вып. 1—19 —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Гершензон М. О. Мудрость Пушкина. — М., 1919.

Гершензон М. О. Статьи о Пушкине. — М., 1926.

Гиллельсон М. И. Молодой Пушкин и арзамасское братство. — Л., 1974.

Городецкий Б. П. Лирика Пушкина. — М.; Л., 1962.

Грехнев В. А. Лирика Пушкина: О поэтике жанров. — Горький, 1985.

Григорьева А. Д., Иванова Н. Н. Поэтическая фразеология Пушкина. — М., 1969.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Пушкин. — 3-е изд. — М., 1960.

Гуковский Г. А. Пушкин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стиля. — М., 1957.

Гуковский Г. А. Пушкин и русские романтики. — М., 1965.

Еремин М. П. Пушкин-публицист. —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М., 1976.

Жирмунский В. М. Байрон и Пушкин. Пушкин и западные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1978.

Измайлов Н. В. Очерк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Пушкина. — Л., 1975.

Лежнев А. З. Проза Пушкина: Опыт стилевого исслед. — 2-е изд. — М., 1966.

Лернер Н. О. Рассказы о Пушкине. — Л., 1929.

Лернер Н. О. Труды и дни Пушкина.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СПб., 1910.

Лотман Ю. М.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ателя. — 2-е изд. — Л., 1983.

Лотман Ю. М. Роман А. С. Пушкина《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Комментарий — 2-е изд. — Л., 1983.

Майков Л. Н. Пушкин: Биогр.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т.-лит. очерки. — СПб., 1899.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Роман Пушкина《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 — М., 1963.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в 1830-е годы (1830—1833). — Л., 1974.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в 1830-е годы (1833—1836). — Л., 1982.

Мейлах Б. С. Пушкин и его эпоха. — М., 1958.

Мейлах Б. С. Талисман: Кн. о Пушкине. — 2-е изд. — М., 1984.

Мейлах Б. С. Творчество А. С. Пушкина: Развитие худож. системы. — М., 1984.

Мейлах Б. С.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мышление Пушкина как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 М.; Л., 1962.

Модзалевский Б. Л. Пушкин. — Л., 1929.

Непомнящий В. С. Поэзия и судьба: Ст. и заметки о Пушкине. — М., 1983.

Осповат А. Л., *Тименчик Р. Д.*《Печальну повесть сохранить...》: Об авторе и читателях《Медного всадника》. — М., 1985.

Петрунина Н. Н., *Фридлендер Г. М.* Над страницами Пушкина. — Л., 1974.

А. С. Пушкин — М., 1934.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Т. 16/18).

Пушкин: Временник Пушкинской комиссии. — М.; Л., 1936—1941. — Т. 1—6.

Пушкин: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 материалы. — М.; Л., 1956—1986. — Т. 1—12. — Изд. продолжается.

Пушкин: Итоги и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 — М.; Л., 1966.

Пушкин: Сб. ст. — М., 1941.

Пушкин в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б. ст. — Л., 1926.

Пушкин и его время. — Л., 1962. — Вып. 1.

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 — СПб. (Л.), 1903—1930. — Вып. 1—39.

Пушкин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Ереван, 1975.

Пушкин — родоначальник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б. науч.-исслед. работ. — М.; Л., 1941.

Пушкинист: Ист.-лит. сб. — СПб (Пг.), 1914—1918. — Т. 1—3.

Пушк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амяти проф. С. А. Венгерова: Пушкинист IV. — М.; Пг., 1922.

Рассадин С. Б. Драматург Пушкин: Поэтика, идеи, эволюция. — М., 1977.

Слонимский А. Л. Мастерство Пушкина. — 2-е изд., испр. — М., 1963.

Смирнов-Сокольский Н. П. Рассказы о прижизненных изданиях Пушкина, о книгах других авторов, им изданных, о его журнале《Современник》, о первом посмертном собрании сочинений, а также о всех газетах, журналах, альманахах, сборниках, хрестоматиях и песенниках, в которых печатались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оэта в 1814—1837 годах. — М., 1962.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Лирика Пушкина Очерки и этюды. — 2-е изд. — М., 1974.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Проза Пушкина. — М., 1962.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Пушкина 1820—1830-х годов: История создания и идейно-худож. 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 Л., 1974.

Сто лет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А. С. Пушкина: Тр. Пушкинской сессии АН СССР, 1837—1937. — М.; Л., 1938.

Тойбин И. М. Пушкин: Творчество 1830-х годов 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зма. — Воронеж, 1976.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Пушкин. — М.; Л., 1956. — Кн. 1 (1813—1824).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Пушкин. — М.; Л., 1961. Кн. 2; Материалы к моногр. (1824—1837).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Пушкин: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лит. изучения. — Л., 1925.

Томашевский Б. В. Пушкин и Франция. — Л., 1960.

Тынянов Ю. Н. Пушкин и его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 — М., 1969.

Фейнберг И. Л. Читая тетради Пушкина. — [3-е изд.], — М., 1985.

Фельдман О. М. Судьба драматургии Пушкина:《Борис Годунов》. Маленькие трагедии. — М., 1975.

Фомичев С. А. Поэзия Пушкина: Творческая эволюция. — Л., 1986.

Ходасевич В. Поэ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Пушкина. — Л., 1924.

Цветаева М. И. Мой Пушкин. — 3-е изд., доп. — М., 1981.

Цявловская Т. Г. Рисунки Пушкина. — 3-е изд. — М., 1983.

Цявловский М. А.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А. С. Пушкина. — М., 1951. — Т. 1 (1799—1826).

Цявловский М. А. Статьи о Пушкине. — М., 1962.

Черейский Л. А. Пушкин и его окружение. — Л., 1975.

Чумаков Ю. Н.《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и русский стихотворный роман. —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3.

Шервинский С. В. Ритм и смысл: К изучению поэтики Пушкина. — М., 1961.

Щеголев П. Е. Дуэль и смерть Пушкина: Исслед. и материалы. — 3-е изд., просмотр. и доп. — М.; Л., 1928.

Щеголев П. Е. Из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Пушкина. — 3-е изд., исп. и доп. — М.; Л., 1931.

Эйдельман Н. Я. Пушкин: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 худож. сознании поэта. — М., 1984.

Эйдельман Н. Я. Пушкин и декабристы: Из истори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й. — М., 1979.

Эфрос А. Рисунки поэта. — [2-е изд., расшир. и перераб.]. — М., 1933.

Alexander Puškin: A symposium on the 175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 N. Y., 1976.

Backès J. L. Pouchkine par lui même. — P., 1966.

Beyley J. Pushkin: A comparative commentary. — L., 1971.

Eng J. The tales of Belkin by A. S. Puškin. — The Hague; Paris, 1968.

Herdmann U. Die südlichen Poeme A. S. Puškins. Ihr Verhältnis zu Lord Byrons oriental Tales. — Olms, 1982.

Isserlis H. Alexandre Pouchkine: Gloire de la poésie russe: La vie du grand écrivain racontée à la jeunesse. — P., 1969.

Jakobson R. Puškin and his sculptural myth. — The Hague; Paris, 1975.

Lindvad C. Pusjkin i profil: Ill med Pusjkins pennetegninger samt gamle stik. — København, 1975.

Meynieux A. Pouchkine homme de lettres et la littérature professionnelle en Russie. — P., 1966.

Nabokov V. Eugene Onegin: A novel in verse by Aleksander Pushkin. — N. Y., 1964. — Vol. 1—4.

O poetyce Aleksandra Puszkina: Materiały z sesji naukowej. — Poznań, 1975.

O'Bell L. Pushkin's Egyptian nights: The biography of a work. — Ann Arbor, 1984.

Setschkareff W. Alexander Pusckin: Sein Leben und sein Werk. — Wiesbaden, 1963.

Simmons E. J. Pushkin. — N. Y., 1964.

Troyat H. Pouchkine: Biographie. — P., 1965.

Vickery W. N. Pushkin: Death of a poet. — Bloomington; L., 1968.

Ziegler G. Alexander S. Puschkin: In Selbstzeugnissen u. Bilddok. — Reinbek bei Hamburg, 1979.

БАРАТЫНСКИЙ

Гофман М. Л. Поэзия Баратынского: Ист.-лит. этюд. — Пг., 1915.

Лебедев Е. Н. Тризна: Кн. о Е. А. Боратынском. — М., 1985.

Мазепа Н. Р. Е. А. Баратынский: Эстет. и лит.-крит. взгляды. — Киев, 1960.

Фризман Л. Г.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Баратынского. — М., 1966.

Хетсо Г. Евгений Баратын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Oslo, 1973.

Pratt S. Russian metaphysical romanticism: The poetry of Tiytchef and Boratynski. — Stanford, 1984.

ТЮТЧЕВ

Аксаков И. С. Биография Ф. И. Тютчева. — М., 1886.

Григорьева А. Д. Слово в поэзии Тютчева. — М., 1980.

Зунделович Я. О. Этюды о лирике Тютчева. — Самарканд, 1971.

Королева И. А., Николаев А. А. Ф. И. Тютчев: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и лит.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1818—1973. — М., 1978.

Осповат А. Л. 《Как слово наше отзовется...》: О первом сб. Ф. И. Тютчева. — М., 1980.

Пигарев К. 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Тютчева. — М., 1962.

Пигарев К. В. Ф. И. Тютчев и его время. — М., 1978.

Тютче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1873—1923). — Пг., 1923.

Урания: Тютчев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 1803—1928. — Л., 1928.

Чулков Г. И.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Ф. И. Тютчева. — М.; Л., 1933.

Бочева М. Лириката на Тютчев. — С., 1980.

Bilokur B. A concordance to the Russian poetry of Fedor I. Tiutchev. — Providence, 1975.

Cornillot F. Tiouttchev Poète-philosophe. — Lille, 1974.

Gregg R. A. Fedor Tiutchev: The evolution of a poet. — N. Y.; L., 1965.

Kempf R. F. I. Tjutčev: Persönlichkeit und Dichtung. — Göttingen, 1956.

Stremooukhoff D. La poésie et l'idéologie de Tiouttchev. — P., 1937.

ПРОЗА И ДРАМАТУРГИЯ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20—30-х ГОДОВ

Вильчинский В. П. Николай Филиппович Павл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Л., 1970.

Сакулин П.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идеализма: Князь В. Ф. Одоевс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Писатель. — М., 1913. — Т. 1, ч. 1/2.

Baumann W. Die Zukunftsperspektiven des Fürsten V. F. Odoevskij: Lit., Futurologie u. Utopie. — Frankfurt a. M., 1980.

Goldgart S. Późna proza Aleksandra Weltmana: Cykl powieściowy《Przygody zaczerpnięte z morzażycia》. — Wrocław, 1971.

Mejszutowicz Z. Powieść obyczajowa Tadeusza Bułharyna. — Wrocław, 1978.

Smada J. Antoni Pogorielski: Życie i twórczość na tle epoki. — Wrocław, 1970.

КОЛЬЦОВ

А. В. Кольцов: Страницы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К 17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 Воронеж, 1984.

Кузнецов В. И. Нетленные строки: Этюды об А. Кольцове и И. Никитине. — Воронеж, 1984.

Ласунский О. Г. А. В. Кольцов: Указат. лит. (1951—1971). — Воронеж, 1972.

Скатов Н. Н. Кольцов. — М., 1983.

Скатов Н. Н. Поэзия Алексея Кольцова. — Л., 1977.

Тонков В. А. А. В. Кольц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Воронеж, 1958.

ЛЕРМОНТОВ

Андреев-Кривич С. А. Лермонтов: Вопр. творчества и биографии. — М., 1954.

Андроников И. Л. Лермонтов: Исслед. и находки. — 4-е изд. — М., 1977.

Бродский Н. Л. Лермонтов: Биография. — М., 1945. — Т. 1: 1814—1832.

Венок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у: Юбил. сб. — М.; Пг., 1914.

Висковатый П. А.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1891.

Герштейн Э. Г.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76.

Герштейн Э. Г. Судьба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64.

Гинзбург Л. Я.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Лермонтова. — Л., 1940.

Григорьян К. Н. Лермонтов и его роман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 Л., 1975.

Дурылин С. Н. Как работал Лермонтов. — М., 1934.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М., 1941.

Коровин В. И.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73.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 А.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Личность поэта и е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 5-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Пг., 1915.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 М., 1941—1948.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АН СССР. Ин-т лит. (Пушкинский дом); Т. 43/44, 45/46).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Исслед. и материалы. — Л., 1979.

Лермонт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Ереван, 1974.

Лермонтов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 М., 1981.

Лермонтовский сборник. — Л., 1985.

Ломинадзе С. В. Поэтический мир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85.

Максимов Д. Е. Поэзия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Л., 1964.

Мануйлов В. А.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Л., 1964.

Мануйлов В. А.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Лермонтов: Биография писателя. — 2-е изд. - Л., 1976.

Мануйлов В. А. Роман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Герой нашего времен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 2-е изд., доп. — Л., 1975.

Миллер О. 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о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е (1917—1977 гг.). — Л., 1980.

Михайлова Е. Н. Проза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57.

Обручев С. В. Над тетрадями Лермонтова. — М., 1965.

Розанов И. Н. Лермонтов мастер стиха. — М., 1942.

Творчество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а: 150 лет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1814—1964. — М., 1964.

Удодов Б. Т. М. Ю. Лермонтов: Худож.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сть и творч. процессы. — Воронеж, 1973.

Федоров А. В. Лермонто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 Л., 1967.

Фохт У. Р. Лермонтов: Логика творчества. — М., 1975.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Лермонтов: Опыт ист.-лит. оценки. — Л., 1924.

Эйхенбаум Б. М. Статьи о Лермонтове. — М.; Л., 1961.

Gane T. Lermontov. — Buc., 1963.

Garrard J. G. Mikhail Lermontov. — Boston, 1982.

Gerlinghoff P. Frauengestalten und Liebesproblematik bei M. J. Lermontov. — Meisenheim am Glan, 1968.

Giusti W. Il demone e l'angele Lermontov e la Russia del suo tempo. — Messina; Firenze, 1968.

Guski A. M. Ju. Lermontovs Konzeption des literarischen Helden. — München, 1970.

Mersereau J. Mikhail Lermontov. — Carbondale, 1962.

Turner C. J. G. Pechorin: An essay on Lermontov's "A hero of our time". — Birmingham, 1978.

ГОГОЛЬ

Белый А. Мастерство Гоголя. — М., Л., 1934.

Гиппиус В. В. Гоголь. — Л., 1924.

Гоголь: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К 17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 М., 1985.

Н. В. Гоголь: Материалы и исслед. — М.; Л., 1936. — Т. 1, 2.

Гуковский Г. А. Реализм Гоголя. — М.; Л., 1959.

Данилов С. С. Гоголь и театр. — Л., 1936.

Золотусский И. П. Гоголь.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84.

Иофанов Д. Н. В. Гоголь: Детские и юношеские годы. — Киев, 1951.

Карташова И. В. Гоголь и романтизм. — Калинин, 1975.

Котляревский Н. А. Н. В. Гоголь, 1829—1842: Очерк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повести и драмы. — 4-е изд., испр. — Пг., 1915.

Кривонос В. Ш.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Гоголя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русской прозы. — Воронеж, 1985.

Макогоненко Г. П. Гоголь и Пушкин. — Л., 1985.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И. О характере гоголевского стиля: Глава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 лит. яз. — СПб.; Гельсингфорс, 1902.

Манн Ю. В. В поисках живой души: 《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писатель — критика — читатель. — М., 1984.

Манн Ю. В. Поэтика Гоголя. — М., 1978.

Машинский С. И.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повесть Гоголя. — М., 1940.

Машинский С. И.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мир Гоголя. — 2-изд. — М., 1979.

Мочульский К. В. Духовный путь Гоголя. — Paris, 1934.

Николаев Д. П. Сатира Гоголя. — М., 1984.

Николай М. [*Кулиш П. А.*] Записки о жизни Н. В. Гоголя: В 2 т. — СПб., 1856.

Николай М. [*Кулиш П. А.*] Опыт биографии Н. В. Гоголя. — СПб., 1854.

Овсянико-Куликовский Д. Н. Гоголь. — 2-е изд., доп. — СПб., 1907.

Поспелов Г. Н. Творчество Н. В. Гоголя. — М., 1953.

Слонимский А. Л. Техника комического у Гоголя. — Пг., 1923.

Смирнова-Чикина Е. С. Поэма Н. В. Гоголя《Мертвые души》: Комментарий. — 2-е изд., испр — Л., 1974.

Степанов Н. Л. Н. В. Гоголь: Творческий путь. — 2-е изд. — М., 1959.

Храпченко М. Б. Николай Гоголь: Лит. путь. Величие писателя. — М., 1984.

Шенрок В. И.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биографии Н. В. Гоголя. — М., 1892—1897. — Т. 1—4.

Bock I. Die Analyse der Handlungsstrukturen von Erzählwerken am Biespiel von N. V. Gogol's《Die Nase》und《Der Mantel》. — München, 1982.

Braun M. N. W. Gogol: Eine literarische Biographie. — München, 1973.

Daniel J. Gogol et le théâtre. — Troyes, 1982.

Driessen F. G. Gogol as a chort-story writer: A study of his technique of composition. — The Hague, 1965.

Erlich V. Gogol. — New Haven; L., 1969.

Fanger D. The creation of Nikolai Gogol. — Cambridge (Mass.), 1979.

Galster B. Mikołaj Gogol. — W-wa, 1967.

Günther H. Das Groteske bei N. V. Gogol': Formen und Funktionen. — München, 1968.

Kasack W. Die Technik der Personendarstellung bei N. V. Gogol. — Wiesbaden, 1957.

Magarshack D. Gogol: A life. — L., 1957.

Nabokov V. Nikolai Gogol. — Norfolk, 1944.

Peace R. The enigma of Gogol: An examination in writings of N. V. Gogol and their place in the Russian literature tradition. — Cambridge, 1981.

Proffer C. R. The simile and Gogol's Dead souls. — The Hague; Paris, 1967.

Schreier H. Gogol's religiöses Weltbild und sein literarisches Werk: Zur Antagonie zwischen Kunst und Tendenz. — München, 1977.

Sobel R. Gogol's forgotten book:《Selected passages》and its contemporary readers. — Wash., 1981.

Steffensen E. Idé og virkelighed i Gogol's kunst: En analyse af forfatterskabets centrale problematik. — København, 1967.

Troyat H. Gogol. — P., 1971.

Worrall N. Nikolai Gogol and Ivan Turgenev. — L., 1982.

НАТУР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Жук А. А. Сатира натуральной школы. — Саратов, 1979.

Кулешов В. И. Натуральная школ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 2-е изд. — М., 1982.

Цейтлин А.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реал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Рус. физ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5.

*

Бессараб М. Я. Владимир Даль: Книга о доблестном гражданине России и великом борце за рус. яз. — 2-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М., 1972.

Мещеряков В. П. Григорович — писатель и искусствовед. —Л., 1985.

Порудоминский В. И. Даль — М., 1971

Baer J. T. Vladimir Ivanovč Dal' as a belletrist. — The Hague; Paris, 1972.

Hodgson P. From Gogol to Dostoevsky: Jakov Butkov, a reluctant naturalist in the 1804's. — München, 1976.

Literaturwissenschaftliches Seminar zur Analyse dreier Erzählungen von Vl. I. Dal'. — München, 1975.

БЕЛИНСКИЙ И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ТЕОРИИ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 М., 1948—1951. — (Лит. наследство / АН СССР. Ин-т мировой лит. им. А. М. Горького; Т. 55—57).

Белинский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1964.

Гуляев Н. А.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и зарубеж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 Казань, 1961.

Егоров Б. Ф. Литературно-кр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В. Г. Белинского. — М., 1982.

Кийко Е. И.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Очерк лит.-кри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 М., 1972.

Лаврецкий А. Эсте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 М., 1959.

Мордовченко Н. И. Белинский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его времени. — М.; Л., 1950.

Нечаева В.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Начало жизненного пути и лит.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1811—1830. — М., 1949.

Нечаева В.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Учение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е и работа в《Телескопе》и《Молве》, 1829—1836. — М., 1954.

Нечаева В.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836—1841. — М., 1961.

Нечаева В. С. В. Г. Белинский: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1842—1848. — М., 1967.

Оксман Ю. Г. Летопись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В. Г. Белинского. — М., 1958.

Пехтелев И. Г. Белинский — историк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2-е изд. — М., 1961.

Поляков М. Я. Виссарион Белинский: Личность — идеи — эпоха. — М., 1960.

Пыпин А. Н. Белинский, его жизнь и переписка. — 2-е изд. — СПб., 1908.

Соболев П. В. Эсте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 М., 1978.

Тальников Д. Л. Театральная эстетика Белинского. — М., 1962.

Щербина В. Р.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крити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Белинский,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Добролюбов. — М., 1980.

Наслеђе естетичке и књижевно-критичке мисли Белинског. — Београд, 1975.

Ambrogio I. Belinskij e la teoria del realismo. — Roma, 1963.

Borsukiewicz J. Wissarion Bieliński i romantyzm rosyjski. — W-wa, 1975.

Fasting S. V. G. Belinskij: Die Entwicklung seiner Literaturtheorie. — Bergen, 1969. — Bd. 1: Die Wirklichkeit ein Ideal.

Friedleander K. Belinskij och den ryska litteraturens guldålder. — Stockholm; Norstedt, 1966.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УКРА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Українські письменники: Біобібліогр. словник. — Київ, 1963. — Т. 2/3: Дожовтневий період (XIX — початок XX ст.).

Королевич Н. Ф., *Сарана Ф. К.* Слов'янська філологія на Україні (1958—1962 рр.): Бібліографія. — Київ, 1963.

Слов'янська філологія на Україні (1963—1967 рр.): Бібліографія. — Київ, 1968. — Ч. 2: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о, вип. 1: Загальні пита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ого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Слов'янська філологія на Україні (1968—1976 рр.): Біблиогр. покажчик. — Київ, 1979. — Ч. 2: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о, вип. 1: Загальні питання словянського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Вип. 2: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окремих українських письменників.

Слов'янська філологія на Україні (1977—1981 рр.): Біблиогр. покажчик. — Київ, 1983. — Ч. 2: Літературознавство.

Бойко І. З. Українські літературні альманахи і збірники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 Біблиогр. покажчик. — Київ, 1967.

Білецький О. Зібрання праць: У 5 т. — Київ, 1965. — Т. 2: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

Вервес Г. Д. В інтернаціональних літературних зв'язках: Питання контексту. — 2-е вид., доп. і перероб. — Київ, 1983.

Волинський П. К. Теоретична боротьба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літературі: (Перша половина XIX ст.). — Київ, 1959.

Гнатюк М. П. Українська поема першої половини XIX ст. : Проблеми розвитку жанру. — Київ, 1975.

Гончар О. І. Григорій Квітка-Основ'яненко: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 Київ, 1969.

Деркач Б. А. Євген Гребінка: Літ. портрет. — Київ, 1974.

Дмитрук В. Т. Сторінки віковічної дружби: З історії українсько-болгарських зв'язків XIX — початку XX ст. — Львів, 1958.

З историї чехословацько-українських зв'язків. — Братіслава, 1959.

Зубков С. Д. Григорій Квітка-Основ'яненко: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 Київ, 1978.

Иваньо И. В.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Украины. — М. , 1981.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У 8 т. — Київ, 1967—1968. — Т. 2: Становлення нов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Друга половина XVIII — тридцяті роки XIX ст. ; Т. 3: Література 40—60-х років в XIX ст.

Калениченко Н. Л.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XIX ст. : Напрями, течії. — Київ, 1977.

Кирилю Є. П. Іван Котляревський: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 Київ 1981.

Кирилю ЄП. Українсь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у типологічному зіставленні з літературами західно- і південнословянських народів: Перша половина XIX ст. — Київ, 1973.

Крутікова Е. Є. Гоголь та україн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30—80 рр. XIX ст.). — Київ, 1957.

Федченко П. М. Літературна критика на Україні першої половини XIX ст. — Київ, 1982.

Шпильова О. В. Головні етапи українсько-болгарських літературних зв'язків XIX—XX ст. — Київ, 1963.

Шубравський В. Є. Від Котляревського до Шевченка: Проблема народності українсь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 Київ, 1976.

Яценко М. Т. На рубежі літературних епох:《Енеїда》Котляревського і художній прогрес в українській літературі. — Київ, 1977.

ШЕВЧЕНКО

Т. Г. Шевченко: Бібліогр. літератури про життя і творчість, 1839—1959: В 2 т. — Кіив, 1963.

Сарана Ф. К. Т. Г. Шевченко: Бібліогр. ювілейн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1960—1964. — Київ, 1968.

Вервес Г. Д.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і Польща. — Київ, 1964.

Івакін Ю. О. Коментар до《Кобзаря》Шевченка: Поезії до заслання. — Київ, 1964.

Івакін Ю. О. Коментар до《Кобзаря》Шевченка: Поезії, 1847—1861, рр. — Київ, 1968.

Мольнар М.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у чехів та словаків. — Пряшево, 1961.

Прийма Ф. Я. Шевченко и 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ека. — М. ; Л. , 1961.

Русакієв С.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і болгарська література. — Київ, 1968.

Світова велич Шевченка: Зб. матеріалів про творчість Т. Г. Шевченка: В 3 т. — Київ, 1964.

Творчий метод і поетика Т. Г. Шевченка. — Київ, 1980.

Хинкулов Л. Ф.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Биогр. — М., 1960.

Шиблиовский Е. С. Т. Г. Шевченко и русские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демократы. — 2-е изд., перераб. и доп. — Киев, 1975.

Шагинян М. С. Тарас Шевченко. — 4-е изд. — М., 1964.

Шевченкознавство: Підсумки і проблеми. — Київ, 1975.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БЕЛОРУС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У́ 2 т. — Мінск, 1969. — Т. 2: Літаратура XIX — пачатку XX ст.

Грынчык М. М. Фальклорныя традыцы 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ай паэзіі. — Мінск, 1969.

Каваленка В. А. Вытокі. Уплывы. Паскоранасць: Развіццё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XIX—XX ст. — Мінск, 1975.

Каваленка В. А. Міфа-паэтычныя матывы ў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 Мінск, 1981.

Кісялёў Г. В. Героі і музы: Гіст. -літ. нарысы. — Мінск, 1982.

Кісялёў Г. В. Загадка беларускай《Энеіды》. — Мінск, 1971.

Кісялёў Г. В. Пошукі імя. — Мінск, 1978.

Лазарук М. А. Станаўленне беларускай паэмы: (Жанр паэмы і некаторыя асаблівасці развіцц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 ўпершай палавіне XIX ст.). — Мінск, 1968.

Ларчанка М. Г. На шляхах да рэалізма. — Мінск, 1958.

Лойка А. А. Адам Міцкевіч і беларуская літаратура. — Мінск, 1959.

Лойка А. А. Гісторыя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аратуры: Дакастрычніцкі перыяд. — Мінск, 1977. — Ч. 1.

Мальдзіс А. І. Падарожжа ў XIX стагоддзе: З гісторыі беларускай літ., мастацтва і культуры. — Мінск, 1969.

Мальдзіс А. І. Творчае пабрацімства: Беларуска-польскія літ. ўзаемасувязі ў XIX ст. — Мінск, 1966.

Пачынальнікі: З гіст. -лит. матэрыяла ў XIX ст. — Мінск, 1977.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ЕВР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ейзен З. Лексикон фун дер йидишер литератур пресе ун филологие. — 2-е изд. — Вильно,

1926—1929. — Т. 1—4.

Винер М. Цу дер гешихте фун дер литератур фун XIX йоргундерт. — Киев, 1940.

Марек П.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евреев в России. — М., 1909.

Эрик М. Этюдн цу дер гешихте фун дер гашколе (1789—1881). — Минск, 1934.

Эрик М., *Розенцвайг А*. Ди йидише литератур ин XIX йоргундерт. — Киев; Харьков, 1935. — Кн. 1: 1800—1881.

Глава пятая
МОЛДА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Ын 3 вол. — Кишинэу, 1986, — Вол. 1.

Корбу Х. Г.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новой молдав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проблема творческого метода (1840—1860). — Кишинев, 1976.

Левит Е. Филе векь, некуноскуте: Контрибуций штиинцифико-документаре ла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ий ши култур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 Кишинэу, 1981.

Осадченко И. 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Молдавии и России в XIX веке. — Кишинев, 1983.

Очерки молдавско-рус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до середины XIX в.). — Кишинев, 1978.

Пажинь дин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ий ши културий молдовенешть. — Кишинэу, 1979.

Поезия молдовеняскэ модернэ ла ынчепутуриле ей (1770—1840). — Кишинэу, 1977.

Студий ши материале деспре Александру ши Болеслав Хыждеу. — Кишинэу, 1984.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ИБАЛТИКИ

ЛИТОВ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Jovaisas A. Liudvikas Rėza. — Vilnius, 1969.

Laurynaitis V. Dionizas Poška. — Vilnius, 1959.

Lebedys J. Simonas Stanevičius. — Vilnius, 1955.

Merkys V. Simonas Daukantas. — Vilnius, 1972.

Mikšytė R. Antano Baranausko kūryba. — Vilnius, 1964.

Mikšytė R. Silvestras Valiūnas. — Vilnius, 1978.

Vanagas V. Antanas Strazdas. — Vilnius, 1968.

ЛАТЫШ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Latviešu literatūras darbinieki: Biogrāfiska vārdnīca. — Rīga, 1965.

Latviešu literatūras vēsture: 6. sēj. — Rīga, 1959. — 1. sēj.

Валескалн П. И.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Латвии. — Рига, 1967.

Apīnis A. Latviešu grāmatniecība: No pirmsākumiem līgz 19. gs. beigām. — Rīga, 1977.

Valeinis V. Latviešu lirikas vēsture. — Rīga, 1976.

ЭСТ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nvelt L. O. W. Masing ja kaasaegsed: Lisandusi nende tundmiseks. — Tallinn, 1979.

Fr. R. Faehlmann'i album. — Tartu, 1929.

Laidvee H. Fr. R. Kreutzwaldi bibliograafia, 1833—1969. — Tallinn, 1978.

Lisandusi K. J. Petersoni tundmaõppimiseks. — Tartu, 1927.

Nirk E. Kreutzwald ja eesti rahvusliku kirjanduse algus. — Tallinn, 1968.

Vinkel A. Eesti rahvaraamat: Ülevaade XVIII ja XIX sajandi lugemisvarast. — Tallinn, 1966.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ЕВЕРНОГО КАВКАЗА И ДАГЕСТАНА

Абакарова Ф. О. Очерки даргинск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ахачкала, 1963.

Абдуллаев М. А. Мыслители народов Дагестана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в. — Махачкала, 1963.

Алиев С. М. Дорог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зма в кумыкской лит. XIX 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ов. — Махачкала, 1977.

Ардасенов Х. Н. Очерк развития осет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До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иод. —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1959.

Вагабова Ф.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лезги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ахачкала, 1970.

Вагидов А. 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даргинской поэзии. — Махачкала, 1979.

Гамзатов Г. Г.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родов Дагестана до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Типология и своеобразие худож. опыта. — М., 1982.

Гашаров Г. Г. Лезгинская ашугская поэз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ахачкала, 1975.

Джусойты Н. Г. История осет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Тбилиси, 1980. — Кн. 1 (XIX в.).

Кассиев Э. Ю. Очерки лакск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ахачкала, 1959.

Кумыков Т. Х. Казы-Гирей: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Нальчик, 1978.

Кумыков Т. Х. Хан-Гирей: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Нальчик, 1968.

Магомедов Б. М. Очерки аварск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ахачкала, 1961.

Мусаханова Г. Б. Очерки кумыкск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ахачкала, 1959.

Султанов К. Д.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дагеста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 XIX —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 — Махачкала, 1978.

Тресков И. В. Этюды о Шоре Ногмове. — 2-е изд., доп. — Нальчик, 1974.

Хайбуллаев С. М. О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ав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ахачкала, 1974.

Хакуашев А. Х. Адыгские просветители. — Нальчик, 1978.

III. ЛИТЕРАТУРЫ ЗАКАВКАЗЬЯ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ГРУЗ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ашидзе К. Г. Этиудеби мецхрамете саукунис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шесахеб. — 2-е изд. — Тбилиси, 1970.

Абзианидзе Г. Н. Нарквевеби мецхрамете саукунис картули сазогадоебриви азровнебидан. — Тбилиси, 1959.

Асатиани Г. Л. Сатавеебтан. — Тбилиси, 1982.

Асатиани Л. Н. Рчеули ткзулебани. — Тбилиси, 1958. — Т. 1.

Ахали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 Тбилиси, 1972. — Т. 1.

Гамезардашвили Д. М. Александр Чавчавадзе да картули романтизми. — Тбилиси, 1948.

Гацерелия А. Рчеули нацереби. — Тбилиси, 1965. — Т. 2: Монограпиеби.

Джибладзе Г. Н. Романтики и реалисты в груз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XIX века. — Тбилиси, 1963.

Евгенидзе Ю. Картули романтизмис сакитхеби. — Тбилиси, 1982.

Зандукели М. З. Ахали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а. — 4-е изд., испр. и доп. — Тбилиси, 1956. — Т. 1.

Ингороква П. И. Николоз Бараташвили. — Тбилиси, 1969. — На груз. яз.

Какабадзе М. Картули романтизмис эровнули сацкисеби. — Тбилиси, 1983.

Каландадзе А. П. Литературули нарквевеби. — Тбилиси, 1972.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еквс томад. — Тбилиси, 1969. — Т. 3: XIX саукунис пирвели нахевари.

Кенчошвили А. Д. Александре Чавчавадзе: (Цховреба да шемокмедеба). — Тбилиси, 1953.

Кикодзе Г. XIX саукунис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 Тбилиси, 1947.

Котетишвили В.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ис историа: (XIX саукуне). — Тбилиси, 1959.

Махарадзе А. Картули романтизми. — Тбилиси, 1982.

Радиани Ш. Ахали картули литература. — Тбилиси, 1954.

Хаханов А. С.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грузинск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 М., 1906. — Вып. 4: Литература XIX в.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гаян Ц. П. А. Бакиханов. — Баку, 1948.

Азәчрбанчан әдәбијјаты тарихи. — Бакы, 1960. — ч. 2: XIX әсрин әввәлләриндән 1917-чи иләгәдәр.

Бајрамов А. Мирзә Шәфи Вазеһин әдәби ирси. — Бакы, 1980.

Гасымзадә Ф. Аббасгулу аға Бакыханов Г үдси. — Бакы, 1956.

Гасымзадә Ф. XIX әср Азәрбајчан әдәбијјаты тарихи. — Бакы, 1974.

Ениколопов И. К. Поэт Мирза-Шафи. — Баку, 1938.

Кочарлинский Ф.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их татар. — Тифлис, 1903.

Мәммәдов К. Гасымбәј Закир. — Бакы, 1957.

Рафили М. Мирза Шафи в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Баку, 1958.

Садыхов М. Писатели-декабристы и Азербайджан. — Баку, 1967.

Садыхов М. Русские писатели об Азербайджане: Рус.-азерб. лит. связи первой трети XIX в. — Баку, 1970.

Сеид-заде А. А. Мирза-Шафи или Боденштедт? — Баку, 1940.

Сеид-заде А. А. Мирза-Шафи Садык-оглы Вазех. — Баку, 1969.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АРМЯ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егян М. Еркер. — Ереван, 1975. — Т. 7.

Абов Г. А. Хачатур Абовян: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Ереван, 1948.

Ай нор граканутян патмутюн. — Ереван, 1962. — Т. 1.

Акопян П. Хачатур Абовян: Кянкы, горцы, жаманакы, — Ереван, 1967.

Григорьян К. Н. Из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арм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ных и культур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X — начало XX вв.) — Ереван, 1974.

Даниелян К. Ай мемуараин граканутян патмутюниц. — Ереван, 1961.

Каринян А. Акнаркнер ай парберакан мамули патмутян. — Ереван, 1956—1960. — Т. 1—2.

Мкрян О. Тагиадян Ереванцу кенсагрутюны. — Тифлис, 1896.

Нанумян Р. Месроп Тагиадян. — Ереван. 1947. — На арм. яз.

Ошакан А. Амапаткернер аревмтаай граканутян. — Иерусалим, 1945. — Т. 1.

Саринян С. Айкакан романтизм. — Ереван, 1966.

Татевосян М. Айкакан класицизми тес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77.

Терзибашян В. Ай драматургиан патмутюн. — Ереван, 1959. — Т. 1.

Тертерян А. Абовяни стехцагорц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41.

Шахазиз Е. Хачатур Абовяни кенсагрутюны. — Ереван, 1945.

IV. ЛИТЕРАТУРЫ СРЕДНЕЙ АЗИИ И ҚАЗАХСТАНА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ҚАЗАХСҚ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Әдеби мұра және оны зерттеу. — Алматы, 1961.

Дүйсенбаев Ы. Гасырлар сыры: Қазак әдебиеті тарихынан очерктер. — Алматы, 1970.

Жұмалиев К. Қазакэпосы мен әдебиет тарихының, мәселелері. — Алматы, 1958. — Т. 1.

Жұмалиев Қ. XVIII—XIX гасырлардакы казак эдебиеті. — Алматы, 1967.

Фетисов М. И. Русско-казах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 Алма-Ата-1959.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УЗБЕҚСҚ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хмедов Т. Мунис. : — Тошкент, 1980.

Гафуржонова Т. Нодир ва унинг《Хафт гулшан》достони. — Тошкент, 1982.

Захидов В. Ю. Огни истории. — М. , 1977.

Иброхимова Э. Увайсий. — Тошкент, 1963.

Қадырова М. Надира: Очерк жизни и творчества. — Ташкент, 1967.

Қаюмов А. Гозий. — Тошкент, 1959.

Қаюмов А. Махмур. — Тошкент, 1959.

Қодирова М. Дилшод: (Хаёти ва ижоди). — Тошкент, 1971.

Қодирова М. XIX аср ўзбек шоиралари ижодида инсон ва халк такдири. — Тошкент, 1977.

Мажидий Р. Огахий лирикаси. — Тошкент, 1963.

Муниров Қ. Мунис, Огахий ва Баёнийнинг тарихий асар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60.

Муниров Қ. Огахий: Илмий ва адабий фаолияти. — Тошкент, 1959.

Ӱзбек адабиёти масала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59.

Хаккулов И. Увайсий шеърияти. — Тошкент, 1982.

Юсупов Ю. Хоразм шоирлари. — Тошкент, 1967.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ТУРҚМЕНСҚ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лыев Р. Қеминәниң өмри ве дөредилилиги. — Ашгабат, 1956.

Аннамухаммедов М. Шүкүри ве XIX асыр туркмен поэзиясында романтики стиль. —

Ашгабат, 1978.

Ватанчы шахыр Сейди: Макалалар йыгындысы. — Ашгабат, 1976.

Гелдиев Г. Гурбандурды Зелили: (өмри, дөври ве шыгры). — Ашгабат, 1982.

Кекилов А. Великий лирик. — Ашхабад, 1963.

Кемине: Шахырын, өмр ү не ве дөредижилигине дегишли макалалар йыгындысы. — Ашгабат, 1971.

Мәмметвели Кемине: Шахыр хакында ылмы докладлар, макалалар ве хабарлар. — Ашгабат, 1975.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философской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 Ашхабад, 1970.

Сейитназар Сейди: (Шахыр хакында ылмы докладлар, макалалар ве хабарлар). — Ашгабат, 1979.

Сосонкин И. Л. Из истории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в Туркменистане: (Махтумкули, Кемине, Молланепес). — Ашхабад, 1969.

Түркмен эдебиятының тарыхы. — Ашгабат, 1977. — Т. 3, кит. 1: XIX асыр эдебияты.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ТАДЖИ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огоутдинов А. М.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таджик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 Сталинабад, 1961.

Каримов У. Адабиёти точик дар нимаи дуввуми асри XVIII ва аввали асри XIX. — Душанбе, 1974.

Маъсуми Н. Адабиёти точик дар асри XVIII ва нимаи аввали асри XIX. — Душанбе, 1962.

V. ЛИТЕРАТУР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Концеп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XVIII—XIX веков. — М., 1985.

Культура и общество в эпоху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наций: (Центр. и Юго-Вост. Европа в конце XVIII — 70-х годов XIX в.) / Ред. кол.: И. А. Богданова и др. — М., 1974.

Литература эпох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Просвещ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Возрождение. — М., 1982.

Никольский С. В., Соколов А. Н., Стахеев Б. Ф. Некоторы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ах. — М., 1958.

Пыпин А. Н., Спасович В. Д. История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 — СПб., 1881. — Т. 1—2.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эпоху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наций в странах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ы: Романтизм / Отв. ред. Б. Ф. Стахеев. — М., 1983.

Романтизм в славян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ах. — М. , 1973.
Niederhauser E. A nemzeti megújulási mozgalmak Kelet-Európában. — Bud. , 1977.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П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в русской печати, 1825—1955: Библиогр. материалы / Сост. Б. М. Богатырь и др. — М. ; Л. , 1957.
Польская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XVI — начала XX вв. в русской и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 Wrocław etc. , 1982. — T. I, 1986. — T. 2.
Юлиуш Словацкий: Библиогр. указ. / Сост. В. Н. Стефанович. — М. , 1959.
Adam Mickiewicz: Zarys bibliogr. / Oprac. I Śliwińska et al. , — W-wa, 1957.
Józef Ignacy Kraszewski: Zarys bibliogr. / Oprac. S. Stupkiewicz et al. — Kraków, 1966. — (Bibliogr. lit. polskiej《Nowy Korbut》; T. 12).
Literatura polska: Przewodnik encyklopedyczny. — W-wa, 1984—1985. — T. I—II.
Romantyzm / Oprac. zespół pod kier. I. Ślivińskiej, S. Stupkiewicza. — W-wa, 1969—1972. — (Bibliogr. lit. polskiej《Nowy Korbut》; T. 7—9).
Semkowicz A. Bibliografia utworów Adama Mickiewicza. — W-wa, 1958.

*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 Ред. В. В. Витт, Б. Ф. Стахеев. — М. , 1956.
Горский И. К.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 М. , 1955.
Живов М. С.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Жизнь и творчество. — М. , 1956.
Поль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 Ред. М. Жмигродская и др. — М. , 1973.
Ростоцкий Б. И. Адам Мицкевич и театр. — М. , 1976.
Цыбенко Е. З.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ольской и русской романтической прозы 30—4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М. , 1973.
Borowy W. O poezji Mickiewicza: In 2 t. — Lublin, 1958.
Górski K. Mickiewicz: Artyzm i ęzyk. — W-wa, 1977.
Janion M. Czas formy otwartej: Tematy i media romantyczne. — W-wa, 1984.
Janion M. Romantyzm: Studia o ideach i stylu. — W-wa, 1969.
Janion M. , żmigrodzka M. Romantyzm i historia. — W-wa, 1978.
Janion M. Zygmunt Krasiński: Debiut i dojrzałość. — W-wa, 1962.
Juliusz Słowacki: W stopięćdziesięciolecie urodzin. — W-wa, 1959.
Kalendarzż ycia i twórczoś ci Juliusza Słowackiego / Oprac. E. Sawrymowicz et al. —

Wrocław, 1960.

Kamionkowa J. Życie literackie w Polsce w pierwszej połowie XIX w. — W-wa, 1970.

Kleiner J. Juliusz Słowacki: Dzieje twórczości: In 4 t. — Lwów; W-wa, 1925—1928.

Kleiner J. Mickiewicz: In 2 t. — Lublin, 1948.

Kleiner J. Słowacki. — Wrocław, 1972.

Kleiner J. Zygmunt Krasiński: Dzieje myśli: In 2 t. — Lwów, 1912.

Kronikażycia i twórczości Mickiewicza: In 6 t. / Red. S. Pigoń. — W-wa, 1957—1978.

Krzyż anowski J. Historia literatury polskiej: Alegoryzm — preromantyzm. — W-wa, 1964.

Kubacki W. Pierwiosnki polskiego romantyzmu. — Kraków, 1949.

Literatura krajowa w okresie romantyzmu, 1831—1863. — Kraków, 1975. — T. 1. — (Obraz literatury polskiej XIX i XX wieku; Ser. 3).

Ludowośću Mickiewicza / Praca zbior. pod red. J. Krzyżanowskiego et al. — W-wa, 1958.

Maciejewski M. Narodziny powieści poetyckiej w Polsce. — Wrocław etc., 1970.

Pigoń S. Zawsze o Nim. — W-wa, 1960.

Problemy polskiego romantyzmu. — Wrocław etc, 1971—1981. — Ser. 1—3.

Sawrymowicz E. Juliusz Słowacki. — W-wa, 1973.

Skwarczyńska S. W kręgu wielkich romantyków polskich. — W-wa, 1966.

Słownik języka Adama Mickiewicza. — W-wa, 1962—1983. — T. 1—11.

Stefanowska Z. Historia i profecja. — W-wa, 1962.

Treugutt S. 《Bieniowski》: Kryzys indywidualizmu romantycznego. — W-wa, 1964.

Witkowska A. Literatura romantyzmu. — Warszawa, 1986.

Witkowska A. Mickiewicz: Słowo i czyn. — W-wa, 1983.

Witkowska A. Rówieśnicy Mickiewicza. — W-wa, 1962.

Wyka K. Aleksander Fredro. — W-wa, 1968.

Wyka K. 《Pan Tadeusz》: In 2 t. — W-wa, 1963.

Zaleski J. Język Aleksandra Fredry: In 2 t. — W-wa, 1969—1975.

Zgorzelski C. O sztuce poetyckiej Mickiewicza. — W-wa, 1976.

Zygmunt Krasiński: W stulecie śmierci. — W-wa, 1960.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ЧЕШ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Čeští spisovatelé 19. století. — Pr., 1971.

Čeští spisovatelé 19. a počátku 20. století: Slovníková příručka / Naps. autor. kol. za red. K. Homolové et al. — Pr., 1982.

Slowník českych spisovatlů. — Pr., 1964.

*

История че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XX веков. — М., 1963.

Мыльников А. С. Йозеф Юнгман и его время. — М., 1973.

Мыльников А. С. Культура чешск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Л., 1982.

Никольский С. В. Две эпохи чеш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81.

Титова Л. Н. Чешский театр эпох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М., 1980.

Францев В. А. 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чешского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Варшава, 1902.

Dějiny české literatury. — Pr., 1960. — D. 2: Literatura národniho obrození.

Dějiny českého divadla. — Pr., 1969. — D. 2.

Dolanský J. F. L. Čelakovský, 1852—1952. — Pr., 1952.

Dolanský J. Jungmannův odkaz. — Pr., 1948.

Dolansky J. Neznámý jihoslovanský pramen Rukopisů královédvorského a zelenohorského. — Pr., 1968.

Dolanský J. Ohlas dvou ruských básníkův Rukopisech královédvorském a zelenohorském. — Pr., 1969.

Dolanský J. Záhada Ossiana v Rukopisech královédvorském a zelenohorském. — Pr., 1975.

Horálek K. Po Čátky novoèeského verše. — Pr., 1956.

Jakubec J. Dějiny literatury české. — Pr., 1934. — D. 2: Od osvícenství po družinu Máje.

Janský K. Karel Hynek Mácha: Život uchvatitele krásy. — Pr., 1953.

Koči J. České národní obrození. — Pr., 1978.

Křivánek V. Karel Hynek Mácha. — Pr., 1986.

Literární pout' Karla Hynka Máchy: Ohlas Máchova díla v letech 1836—1858. — Pr., 1981.

Literatura česká devatenáctého století. — Pr. 1902—1905. — D. 1—3.

Máchal J. O Českém románu novodobém. — 2 vyd. — Pr., 1930.

Macura V. Znamení zrodu: České obrození jako kulturní typ. - Pr., 1983.

Mukařovský J. Kapitoly zčeské poetiky. — Pr., 1948. — D. 3: Máchovské studie.

Otruba M., *Kačer M.* Tvůrčí cesta Josefa Kajetána Tyla. — Pr., 1961.

Petrmichl J. Karel Hynek Mácha — velký básnik českého revolu čního romantismu. — Pr. 1953.

Řepková M. Satira Karla Havlíčka. — Pr., 1971.

Rukopisy Kralovédvorský a Zelenohorsky: Dnešní stav poznáni. — Pr., 1969.

Šalda F. X. Mácha sníves a buřič. — Pr., 1936.

Št'epánek V. K historickému vykladu obrozenské literatury. — Pr., 1976.

Št'epánek V. Karel Hynek Mácha. — Pr., 1984.

Vasák P. Metody určování autorstva. — Pr., 1980.

Vodička F. Cesty a cíle obrozenské literatury. — Pr., 1958.

Vodička F. Počátky krásné prózy novo české. — Pr., 1948.

Závodsky A. František Ladislav Čelakovský. — Pr., 1982.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СЛОВА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Encyklopédia slovenských spisovatel'ov: Sv. 1—2 / Nápis. kol. autorov pod ved. K. Rosenbauma. — Br., 1984.

*

Волчек Я. История слова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Пер. А. Опфермана; Предисл. Т. Флоринского. — Киев, 1889.

История слова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70.

Опферман А. Ян Голый и е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 Киев, 1886.

Францев В. Чешско-словенский раскол и его отголоски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40-х годов: Памяти Л. Штура. — Варшава, 1915.

Brtáň R. Bohuslav Tablic: Život a dielo (1769—1832). — Br., 1974.

Brtáň R. Postavy slovenskej literatúry. — Br., 1971.

Juríček J. L'udovít Štúr. — Br., 1971.

Kochol V. Poéziaštúrovcov. — Br., 1955.

Kochal V. Problémy a postavy slovenskej obrodeneckej literatúry. — Br., 1965.

Kotvan I. Ján Hollý (1785—1849). — Br., 1965.

Kraus C. Andrej Sládkovič. — Banská Bystrica, 1962.

Kraus C. Generácia v pohybe: Vyvinové problémy štúrovskej literatúry. — Br., 1973.

Kraus C. Impulzy a inšpirácia slovenského romantizmu. — Br., 1979.

L'udovít Štúr: Život a dielo (1815—1856): [Zborník]. — Br., 1956.

Maťok V. Počiatky slovenskej novodobej prózy. — Br., 1968.

Mináč V. Zobrané spory J. M. Hurbana. — Br., 1974.

Mráz A. Ján Kalinčiak. — Martin, 1936.

Noge J. Slovenská romantická próza. — Br., 1969.

Noskovič A. Ján Chalupka — tvorca slovenskej veselohry. — Br., 1955.

Pišút M. Básnik Janko Král' a jeho Dráma sveta. — Martin, 1948.

Pisút M. Počiatky básnickej školy Štúrovej. — Br., 1938.

Pišút M. Romantizmus v slovenskej literatúre. — Br., 1974.

Pišút M., Rosenbaum K., Kochol V. Literatúra národného obrodenia. — Br., 1960. — (Dejiny slovenskej literatúry; D. 2).

Rampák Z. K charakteru štúrovskej drámy. — Martin, 1947.

Rosenbaum K. Pavel Jozef Šafárik. — Br., 1961.
Rosenbaum K. Poézia národného obrodenia. — Br., 1970.
Šmatlák S. Dva storočia slovenskej lyriky. — Br., 1979.
Tibenský J. Chvály a obrany slovenského národa. — Br., 1965.
Vongrej P. Janko Král' — básnik-búrlivák. — Br., 1966.
Vongrej P. Zlomky z romantizmu. — Br., 1982.
Vyvíjalová M. Mlady Ján Holly. — Br., 1975.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БОЛГА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ндреев В. Д. История болг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Учеб. для студентов. — М., 1978.
Бычваров М., Бычварова Н. Петр Берон. — М., 1981.
Гачев Г. Д. Ускоренное развит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 материале болгар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XIX в.). — М., 1964.
Арнаудов М. Творци на българското Възраждане. — С., 1969. — Т. 1: Първи възрожденци.
Динеков П. Възрожденски писатели. — С., 1962. История на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литература. — Т. 2.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Възраждането / Под ред. на С. Божков (отгов. ред.) и др. — С., 1966.
Коне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ни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 и литературен процес: (Българската възрожден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ъв взаимоотношенията си с балканските литератури). — С., 1974.
Леков Д. Литература — общество — култура: Лит.-социол. и лит.-ист. проблеми на българското Възраждане. — С., 1982.
Пенев Б. История на новата българс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2-о изд. — С., 1976—1977. — Т. 1—4.
Радкова Р. Неофит Рилски и ново-българската култура: Първата половина на XIX в. — 2-о изд. — С., 1983.
Шишманов И. Избрани съчинения Т. 1: Българско Възраждане: Студии / Под ред. на Г. Димов. — С., 1965.

Глава пятая
СЕРБСКАЯ И ЧЕРНОГО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Вулетич В. Проблемы типологии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сской и сер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ах: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ь. Искусство. Традиции: Лит.-худож. критика в СФРЮ. — М., 1980.
Ђукић Т. Преглед књижевног рада Црне Горе. Од владике Василије до 1918 године. — Цетиње, 1951.

Кулаковский П. А. Вук Караджич: Ег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и значение в сер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 1882.

Лавров П. А. Петр II Петрович Негош. — М., 1887.

Деретић Ј.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е књижевности. — Београд, 1983.

Живковић Д. Европски оквири српске књижевности. — Београд, 1970.

Књига о Бранку: Успомене и огледи. — Београд, 1953.

Латковић В. Петар Петровић Његош. — Београд, 1963.

Летопис Матице Српске. — Нови Сад, 1963. — Књ. 392, св. 5.

Павић М.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е књижевности класицизма и предромантизма. Класицизам. — Београд, 1979.

Поповић М. Вук Стефановић Караџић. — Београд, 1987.

Поповић М. Историја српске књижевности. — Београд, 1968—1972. — Књ. 1/3: Романтизам.

Прилози проучавању српско-руских књижевних веза: Прва половина XIX века. — Нови Сад, 1980.

Селимовић М. За и против Вука. — Нови Сад, 1967.

Српска књижевност у књижевној критици. — Београд, 1966. — Књ. 4: Епоха романтизма.

Јован Стерија Поповић. — Београд, 1956.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ХОРВА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улаковский П. А. Иллиризм: Исслед. по ист. хорватской лит. периода Возрождения. — Варшава, 1894.

Лещиловская И. И. Иллиризм. — М., 1968.

Badalíc J. Rusko-hrvatske studije. — Zagreb, 1972.

Barac A. Hrvatska novela do Šenoine smrti // Rad JAZU. — Zagreb, 1952. — Knj. 290.

Barac A. Književnost ilirizma. — Zagreb, 1954.

Drechsler [Vodnik] B. Petar Preradović. — Zagreb, 1903.

Drechsler [Vodnik] B. Stanko Vraz. — Zagreb, 1907.

Georgijevic K. Romantizam kod Hrvata. — Novi Sad, 1958.

Horvat J. Ljudevit Gaj: Njegovživot, njegovo doba — Zagreb, 1975.

Poviest hrvatske knjževnosti и 7-m knjiga. kn. 4. Jlirizam. Realizam. — Zagreb, 1975.

Radovi Instituta za hrvatsku povijest, posvećeni Gaju. — Zagreb, 1972.

Šurmin D. Hrvatski preporod. I—II. — Zagreb, 1903—1904. — Sv. 1—2.

živančević M. Ivan Mačuranić. — Novi Sad, 1964.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СЛОВЕ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тепович А. И. К столетию словинского поэта Ф. К. Прешерна. — Киев, 1902.
Kidrič F. Prežeren, 1800—1838. — Ljubljana, 1938.
Kos J. Prešernov pesniški razvoj. — Ljubljana, 1966.
Legiša L. Romantika // Zgodovina slovenskega slovstva. — Ljubljana, 1959. — T. 2: Romantika in realizem.
Paternu B. France Prešeren in niegovo pesniško delo. — Ljubljana, 1976.
Pogačnik J. Zgodovina slovenskega slovstva. — Maribor, 1969. — T. 3: Klasika in romantika.
Prijatelj I. Duševni profili slovenskih preporoditeljev. — Ljubljana, 1935.
Vidmar J. Dr. France Prešeren. — Ljubljana, 1954.
Žigon A. France Prešeren, poet in umetnik. Celovec. — Prevalje, 1925.
Ziherl B. France Prešeren-pesnik in mislec. — Ljubljana, 1949.

Глава восьмая
СЕРБОЛУЖИ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рофимович К. К., *Моторный В. А.* Нариси з історії серболужицкої літератури. — Львів, 1970.
Jenč R. Stawizny serbskeho pismowstwa. — I. dźěl. — Budyšin, 1954.
Serbska čitanka = Sorbisches Lesebuch / Hrsg. von K. Lorenc. — Leipzig, 1981.
Serbski biografiski słownik. — Budyšin, 1970.
Stawizny Serbow. Zw. 2 / J. Šołta, H. Zwahr. — Budyšin, 1975.

Глава девятая
ВЕНГЕ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 history of Hungarian literature / Written by I. Nemeskürty et al.; Ed. by T. Klanicay. — Bud., 1983.
A magyar irodalom története: In 6 k. — 3 k. A magyar irodalom története 1772 — töl 1849-ig // Szerk. P. Pándi. — Bp., 1978.
A magyar irodalom története 1849-ig / Szerk. Szauder J. — Bp., 1968.

*

Гидаш А. Петефи. — М., 1961.

Ййеш Д. Шандор Петефи. — М. , 1984.

Петефи в мировой культуре: 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 — М. , 1975

Шахова К. Венге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20—40-х годов XIX века. — Киев, 1973.

Шахова К. О. Шандор Петефi: Життя i творчiсть. — Київ, 1972.

Fekete S. Mezitláb a szentegyházban: Cikkek Petöfiröl és kortársairól. — Bp. , 1972.

Fekete S. Petöfi romantikájának forrásai. — Bp. , 1972.

Horváth J. A magyar irodalom fejlödéstörtenete. — Bp. , 1980.

Pándi P. , *Pálmai K.* Petöfi Sándor. — Bp. , 1973.

Petöfi tüze: Tanulmányok Petöfi Sándorról / Szerk. A. Tamás, A. Wéber. — Bp. , 1972.

Riedl F. Vörösmarty Mihály élete és müvei. — Bp. , 1937.

Sötér I. Az ember és müve. — Bp. , 1971.

Sötér I. Romantika és realizmus. — Bp. , 1956.

Sötér I. Werthertöl Szilveszterig. — Bp. , 1976.

Szauder J. A romantika útján. — Bp. , 1961.

Tóth D. Vörösmarty Mihály. — Bp. , 1957.

Waldapfel J. Irodalmi tanulmányok. — Bp. , 1957.

Глава деся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ДУНАЙСКИХ КНЯЖЕСТВ

Двойченко-Маркова Е. М. Русско-румын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в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е 19-го в. — М. , 1966.

Кожевников Ю. Эпоха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румы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М. , 1979.

Călinescu G. Gr. M. Alecsandrescu. — Buc. , 1962.

Cornea P. Oamenii începutului de drum: Studii şi cercetări asupra epocii paşoptiste. — Buc. , 1974.

Dima A. Alecu Russo. — Buc. , 1957.

Iorga N. Istoria literaturii romaneşti în veacul al XIX-lea de la 1821 înainte: In 2 vol. — Buc. , 1983.

Istoria literaturii române. — Buc. , 1968. — Vol. 2: De la şcoala ardeleană la junimea.

Macovei A. Meditaţia lirica românească, 1800—1850. — Ia şi, 1982.

Mancaş M. Limbajul artistic românesc în secolul al ЧЙЧ-lea. — Buc. , 1983.

Manole I. Anton Pann. — Buc. , 1954.

Nicolescu G. C. Viaţa lui Vasile Alecsandri. — Buc. , 1965.

Ollănescu D. C. Teatrul la Romani, — Buc. , 1981.

Păcurariu D. Clasicism şi tendinţe clasice în literatura română. — Buc. , 1979.

Păcurariu D. Bolintineanu. — Buc. , 1969.

Păcurariu D. Scriitori şi direcţii literare: Iluminism. Clasicism. Romantism. Realism. — Buc., 1981.

Sorescu G. Structuri erotice în poezia română (1745—1870). — Buc., 1982.

Tacciu E. Romantismul românesc. — Buc., 1982.

Глава одиннадцатая
ГРЕЧЕ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Mirambel A. La littérature grecque moderne. — P., 1953.

ΔημαραζΚ. Θ. Ιστορια τηζ νεοελληνικηζ λογοτεχνιαζ. — Αθηνα, 1975.

Πολιτησ Λ. Ιστορια τηζ νεοελληνικηζ λογοτεχνιαζ. — Αθηνα, 1979.

Глава двенадцатая
АЛБ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Histori e letërsisë shqipe. I—II / Nën redaktimin e Dh. S. Shutëriqit et al. — Tiranë, 1959—1960. — т. 1—2.

Petrotta G. Popolo, lingua e letteratura Albanese. — Palermo, 1931.

VI. ЛИТЕРАТУРЫ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КОНТИНЕНТА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ША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Америки: В 3-х т. / Под. ред. Р. Спиллера, У. Торпа, Т. Н. Джонсона, Г. С. Кэнби: Пер. с англ. — М., 1978. — Т. 2.

ЛИТЕРАТУРА США
НА РУБЕЖЕ XVIII—XIX вв.

Истоки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VI—XVIII вв. — М., 1985.

Brown H.R. The sentimental novel in America, 1789—1860. — N. Y., 1959.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America: contemporary essays on puritanism, the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ism / Ed. by C. Strout. — N. Y., 1968

Petter H. The early American novel. — Athens (Ohio), 1971.

Yellin J. F. The intricate knot: black figures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776—1863. — N. Y., 1972.

ЭПОХА РОМАНТИЗМА. ОБЩ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Николюкин А. Н.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 1968.
Романтические традици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века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 М. , 1982.
Brodhead R. H. Hawthorne, Melville and the novel. — Chicago; L. , 1977.
Brooks V. W. The flowering of New England, 1815—1865. — N. Y. , 1952. Рус. пер. : *Брукс В. -В.* Расцвет Новой Англии. — М. , 1971.
Literary romanticism in America / Ed. by W. L. Andrews. — Baton Rouge; L. , 1981.
Matthiessen F. O.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 N. Y. , 1941.
Parrington V. L. Main currents in American Thought: In 3 vol. — N. Y. , 1958. — Vol. 2: The romantic revolution in America. Рус. пер. : *Паррингтон В. Л.* Основные тече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мысли: В 3 т. — М. , 1962. — Т. 2: Революция романтизма в Америке.
Studies in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 Ed. by J. Myerson. — Boston, 1978.

ВАШИНГТОН ИРВИНГ

A century of commentary on the works of Washington Irving / Ed. by A. B. Myers. — Tarrytown; N. Y. , 1976.
Brooks V. W. The world of Washington Irving. — N. Y. , 1950.
Hedges W. L. Washington Irving: an American study, 1802—1832. — Baltimore, 1965.
Leary L. Washington Irving. — Minneapolis, 1963.
Lydenberg H. M. Irving's Knickerbocker and some of its sources. — N. Y. , 1953.
McFarland Ph. J. Sojourners. — N. Y. , 1979.
Reichart W. A. Washington Irving and Germany. — Ann Arbor, 1957.
Wagenknecht E. Washington Irving: moderation displayed. — N. Y. , 1962.
Warner Ch. D. Washington Irving. — Port Washington (N. Y.), 1968.
Williams S. T. The life of Washington Irving: In 2 vol. — N. Y. , 1935.

КУПЕР

Boynton H. W. James Fenimore Cooper. — N. Y. , 1966.
Dekker G. James Fenimore Cooper, the American Scott. — N. Y. , 1967.
Fenimore Cooper: The critical heritage / Ed. by G. Dekker, L. P. McWilliams. — L. ; Boston, 1973.
Franklin W. The new world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 Chicago; L. , 1982.
Grossman J. James Fenimore Cooper. — N. Y. , 1949.
House K. S. Cooper's Americans. — Athens (Ohio), 1965.
McWilliams J. P. Political justice in a republic: James Fenimore Cooper's America. — Berkeley, 1972.
Philbrick Th. James Fenimore Coop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sea fiction. —

Cambridge (Mass.), 1961.
Plots and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 Ed. W. S. Walker. — Hamden (Conn.), 1978.
Ross J. F. The social criticism of Fenimore Cooper. — Berkeley, 1933.
Schulenberger A. Cooper's theory of fiction: His prefaces and their relation to his novels. — N. Y., 1972.
Spiller R. E. Fenimore Cooper, critic of his times. — N. Y., 1931.
Walker W. S. James Fenimore Cooper: 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 N. Y., 1962.
Waples D. The whig myth of James Fenimore Cooper. — New Haven (Conn.), 1938.

ЗРЕЛЫЙ РОМАНТИЗМ

Ковалев Ю. В. «Молодая Америка». — Л., 1971.
Осипова Э. Ф. Генри Торо: Очерк творчества. — Л., 1985.
American transcendentalism: An anthology of criticism / Ed. by B. M. Barbour. — Notre Dame; L., 1973.
Bell M. D.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romance: The sacrifice of relation. — Chicago; L., 1980.
Bell M. D. Hawthorne and the historical romance of New England. — Princeton (N. Y.), 1971.
Borst R. R. Henry David Thoreau: A descriptive bibliography. — Pittsburgh (Pa.), 1982.
Brooks V. W. The times of Melville and Whitman. — N. Y., 1947.
Buell L. Literary transcendentalism: Style and vision in the Amer. Renaissance. — /2nd print/. — Ithaca; L., 1974.
Cameron K. W. Emerson the essayist: In 2 vol. — N. Y., 1945.
Ellison J. K. Emerson's romantic style. — Princeton (N. J.), 1984.
Emerson: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M. K. Konvitz, S. E. Whicher.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2.
Hutch R. A. Emerson's optics: Biogr. process and the dawn of religious leadership. — Wash., 1983.
Levin H. The power of blackness: Hawthorne, Poe, Melville. — N. Y., 1958.
Miller P. The raven and the whale: The war of words and wits in the era of Poe and Melville. — N. Y., 1956.
Neufeldt L. The house of Emerson. — Lincoln; L., 1982.
Porte J. Representative man: Ralph Waldo Emerson in his time. — N. Y., 1979.
Ruined Eden of the present: Hawthorne, Melville, and Poe: Critical essays in honor of Darrel Abel / Ed. by G. R. Thompson, V. L. Lokke. — West Lafayette (Ind.), 1981.
Thoreau: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Sh. Paul.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2.
The Thoreau centenneal / Ed. by W. Harding. — N. Y., 1964.

Transcendentalism and its legacy / Ed. by M. Simon, Th. H. Parsons. — Ann Arbor, 1966.

The Transcendentalists: A review of research and criticism / Ed. by J. Myerson. — N. Y., 1984.

ГОТОРН

Bell M. Hawthorne's view of the artist. — N. Y., 1962.

Cohen B. B. ed. The recognition of Nathaniel Hawthorne: Sel. criticism since 1828. — Ann Arbor, 1969.

Crews F. C. The sins of the fathers: Hawthorne's psychological themes. — N. Y., 1966.

Donohus A. M. Hawthorne: Calvin's ironic stepchild. — Kent (Oregon), 1985.

Fogle R. H. Hawthorne's fiction: the light and the dark. — Norman, 1952.

Gollin R. K. Nathaniel Hawthorne and the truth of dreams. — Baton Rouge; L., 1979.

Hawthorn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A. N. Kaul.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6.

Hawthorne: The critical heritage / Ed. by J. D. Crowley. — L., 1970.

Hoeltje H. H. Inward sky: The mind and heart of Nathaniel Hawthorne. — Durham (N. C), 1962.

James H. Hawthorne. — Garden City (N. Y.), 1966.

Johnson C. D. The productive tension of Hawthorne's art. — Montgomery (Alabama), 1981.

Male R. R. Hawthorne's tragic vision. — N. Y., 1964.

Martin T. Nathaniel Hawthorne. — N. Y., 1965.

Mellow J. R. Nathaniel Hawthorne in his times. — Boston, 1980.

Normand J. Nathaniel Hawthorne: Esquisse d'une analyse de la creation artistique. — Rennes, 1964.

Turner A. Nathaniel Hawthorne. — N. Y., 1961.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carlet letter: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J. C. Gerber.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8.

Van Doren M. Nathaniel Hawthorne. — N. Y., 1957.

Wagenknecht Ed. Nathaniel Hawthorne: Man and writer. — N. Y., 1961.

Waggoner H. H. Hawthorne: A critical study. — Cambridge (Mass.), 1955.

ЭДГАР ПО

Ковалев Ю. В. Эдгар Аллан По: новеллист и поэт. — Л., 1984.

Allen H. I. The life and times of E. A. Poe. — N. Y.; Toronto, 1949. Рус. пер.: *Аллен Г.* Эдгар По / Сокр. пер. с англ. С. Силищева; Послесл. М. Урнова. — М., 1984.

Alterton M. Origins of Poe's critical theory. — N. Y., 1965.

Bittner W. Poe: A biography. — Boston; Toronto, 1962.

Buranelli V. Edgar Allan Poe. — N. Y., 1965.

Gale R. L. Plots and characters in the fiction and poetry of Edgar Allan Poe / With a forew. by F. Stovall. — Hamden (Conn.), 1970.

Hoffman D. G. Poe. — Garden City (N. Y.), 1972.

Krutch J. W. Edgar Allan Poe: A study in genius. — N. Y., 1965.

Link F. H. Edgar Allan Poe: Ein Dichter zwischen Romantik und Moderne. — Frankfurt a. M.; Bonn, 1968.

Moss S. Poe's literary battles: The critic in the context of his literary milieu. — Durham, 1963.

Parks E. W. Edgar Allan Poe as literary critic. — Athens (Ga), 1964.

Poe: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R. Regan.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7.

Porges I. Edgar Allan Poe. — Philadelphia; N. Y., — 1963.

Quinn A. H. Edgar Allan Poe: A critical biography. — N. Y., 1963.

The recognition of Edgar Allan Poe: Selected criticism since 1829 / Ed. by E. W. Carlson. — Ann Arbor (Mich.), 1966.

Stovall F. Edgar Poe the poet: Essays new and old on the man and his work. — Charlottesville, 1969.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Poe's tales: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W. L. Howarth. — Englewood Cliffs (N. J.), 1971.

Wagenknecht Ed. Edgar Allan Poe: the man behind the legend. — N. Y., 1963.

Whitman S. H. Edgar Poe and his critics / With an introd. and notes by O. S. Coad. — N. Y., 1972.

Woodberry G. E. The life of Edgar Allan Poe: Personal and literary with his chief correspondence with men of letters: In 2 vol. — N. Y., 1965. — Reprint.

МЕЛВИЛЛ

Ковалев Ю. В. Герман Мелвилл 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романтизм. — Л., 1972.

Anderson Ch. R. Melville in the South seas. — N. Y., 1939.

Arwin N. Herman Melville. — N. Y., 1957.

Boswell J. Herman Melville and the critics: A checklist of criticism, 1900—1978. — Metuchen (N. J.); L., 1981.

Bowen M. The long encounter: Self and experience in the writings of Herman Melville. — Chicago; L., 1963.

Chase R. Herman Melville: A critical study. — N. Y., 1949.

Melville: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R. Chase. — Englewood Cliffs (N. Y.), 1962.

Melville: The critical heritage / Ed. by W. G. Branch. — L.; Boston, 1974.

Moby-Dick as doubloon: Essays and extracts (1851—1970) / Ed. by H. Parker, H.

Hayford. — N. Y., 1970.
Mumford L. Herman Melville: A study of his life and vision. — L., 1963.
Phelps L. R. Herman Melville's foreign reputation: A research guide / With the ass. of K. McCullough. — Boston (Mass.), 1983.
Sedgwick W. E. Herman Melville: The tragedy of mind. — Cambridge (Mass.), 1945.
Stern M. R. The fine hammered steel of Herman Melville. — Urbana (Ill.), 1957.
Twentieth century interpretations of Moby-Dick: A coll. of critical essays / Ed. by M. T. Gilmore. — Englewood Cliffs (N. Y.), 1977.
Vincent H. P. The trying — out of Moby-Dick. — Kent (Oregon), 1980.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КАНА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Dictionnaire des oeuvres littéraires du Quebéc. — Montréal, 1978. — T. 1: Des originesà 1900.
Grandpré P. de.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u Québec. — Montréal, 1967. — T. 1: (1534—1900).
Mailhot L. La littérature québécoise. — P., 1974.
Marion S. Les lettres canadiennes d'autrefois. — Ottawa, 1942. — Vol. 3.
Marion S. Origines littéraires du Canada français. — Ottawa, 1951.
Tougas G.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canadienne-française. — 5e éd. — P., 1974. — 1-me éd. 1960.
Viatte A. Histoire littéraire de l'Amérique française des originesà 1950. — Québec; P., 1954.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А АНГЛИЙСКОМ ЯЗЫКЕ

Baker R. P. A history of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 to the Confederation: Its relation to the literature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 N. Y., 1920.
The Canadian novel. — Vol. 2. Beginnings: A critical anthology / Ed. with an introd. essay by J. Moss. — Toronto, 1980.
Eggleston W. The frontier and Canadian letters. — Toronto, 1957.
Matthews J. P. Tradition in exil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al influenc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ustralian and Canadian poet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 Toronto, 1962.
Morris A. Y. Gentle pioneers: five nineteen-century Canadians. — Toronto; L., 1968.
Moyles R. C. English-Canadian literature to 1900: a guide to information sources. — Detroit, 1976.

On 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 / Ed. and with an introd. by R. A. Davies. — Ottawa, 1979.

Rashley R. E. Poetry in Canada: the first three steps. — Ottawa, 1979.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ЛИТЕРАТУРЫ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История литератур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 М., 1985. — Т1.

Концепции историко-культурной 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 Отв. ред. В. Н. Кутейщикова. — М., 1978.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 Отв. ред. В. Н. Кутейщикова. — М., 1970.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литератур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 Отв. ред. И. А. Тертерян. — М., 1976.

ЛИТЕРАТУРЫ ИСПА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В ПЕРИОД ВОЙНЫ ЗА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Ь

Barnola P. P. Estudios sobre Bello. — Caracas, 1970.

Carilla E. La literatura de la independencia hispanoamericana: (Neoclasicísmo y prerromanticísmo). — Buenos Aires, 1964.

Caro M. A. Escritos sobre don Andrés Bello / Introd. y notas de C. Valderrama Andrade. — Bogota, 1981.

Espinosa Polit A. S. Olmedo en la historia y en las letras. — Quito, 1980.

Grases P. Andrés Bello, el primer humanista de América. — Buenos Aires, 1946.

Literatura de la emancipación hispanoamericana y otros ensayos. — Lima, 1972.

Mariscal de Guevara M. L. José Joaquín de Olmedo: poeta y luchador. — Guayaquil, 1981.

Martínez J. L. La expresión nacional: Letras mexicanas del siglo XIX. — México, 1955.

Millares Cario A. Bibliografía de Andrés Bello. — Madrid, 1977.

Portuondo J. A. La emancipación literaria de hispanoamérica. — La Habana, 1975.

Rodrìguez Monegal E. El otro Andrés Bello. — Caracas, 1969.

Yáñez A. Estudio preliminar // J. Joaquín Fernandez de Lizardi, el pensador mexicano. — México, 1954.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ИСПАНСКОЙ АМЕРИКИ

Carilla E. El Romanticismo en la América Hispánica. — Madrid, 1958. Рус. пер.: *Карилья Э.* Романтизм в Испа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 Пер. М. Деева. — М., 1965.

García Mérou M. Alberdi: ensayo crítico. — Buenos Aires, 1916.

Jiménes Rueda J. Letras mexicanas en el siglo XIX. — México, 1944.
Lazo R.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hispanoamericana: El siglo XIX (1780—1914). — México, 1970.
Recopilación de textos sobre la novela romántica latinoamericana. — La Habana, 1978.
Sánchez L. A. La literatura peruana: Derrotero para una historia cult. del Peru. — Lima, 1965. — Vol. 3.
Warner R. E. Historia de la novela mexicana en el siglo XIX. — México, 1953.
Watson-Espener M. I. El cuadro de costumbres en el Perú decimonónico. — Lima, 1979.

КУБ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Acerca de Cirilo Villaverde / Sel., pról. y notas de I. Alvarez. — La Habana, 1982.
Arias S. Tres poetas en la mirilla: Placido, Milanes, La Avellaneda. — La Habana, 1981.
Augier A. Reencuentro y afirmación del poeta Heredia. — La Habana, 1940.
Bravo Villasante C. Una vida romántica: La Avellaneda. — Barcelona, 1967.
Bravo-Villasante C., Baquero G., Escarpanter J. A.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Conferencias pronunciadas en la Fundación Universitaria española en nov. de 1973. — Madrid, 1974.
Bueno S. Las ideas literarias de Domingo del Monte. — La Habana, 1954.
Chacón y Calvo J. M. Estudios heredianos / Sel. y pról. de S. Arias. — La Habana, 1980.
Gonzáles M. J. M. Heredia, primogénito del romanticísmo hispanoamericano: Ensayo de rectificacion histórica. — México, 1955.
Homenaje a Cirilo Villaverde. — La Habana, 1964.
Horrego Estuch L. Plácido, el poeta infortunado. — Ed. definit., aument. y corr. — La Habana, 1960.
Lazo R. Gertrudis Gómez de Avellaneda: la mujer y la poetisa lírica. — México, 1972.
Mitjans A. Historia de la literatura cubana / Prol. de R. Montoro. — Madrid, 1918.
Portuondo J. A. Bosquejo histórico de las letras cubanas. — La Habana, 1962. Рус. пер.: *Портуондо Х. 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кубин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Пер. Р. С. Гиляревского. — М., 1961.

АРГЕНТИ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Земсков В. Б. Аргентинская поэзия гаучо: К проблеме отношени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фольклора в Латинской Америке. — М., 1977.
Agosti H. Echeverría. — Buenos Aires, 1951.
Artesano E. R. 《Martín Fierro》 y la justicia social: Primer manifiesto revolucionario del movimiento obrero argentino. — Buenos Aires, 1963.
Borello R. A. Hernández: Poesía y política. — Buenos Aires, 1973.
Carsuzan M. E. Sarmiento el escritor. — Buenos Aires, 1949.

Días Araujo E. La política de 《Fierro》. José Hernández: Ida y Vuelta. — Buenos Aires, 1972.
García Puertas M. El romanticismo de Esteban Echeverría. — Montevideo, 1957.
Ghiano J. C. 《El matadero》 de Echeverría y el costumbrísmo. — Buenos Aires, 1968.
Giannangeli L. Contribución a la bibliografía de José Mármol/Pról. de J. C. Ghiano. — La Plata, 1972.
Guerrero C. H. Sarmiento: historiador y biógrafo. — Buenos Aires, 1950.
Kisnerman N. Contribución a la bibliografía sobre E. Echeverría. — Buenos Aires, 1971.
Losada Guido A. Martín Fierro: gaucho — héroe — mito. — Buenos Aires, 1967.
Martínes Estrada E. Meditaciónes sarmientinas. — Santiago, 1968.
Martínez Estrada E. Sarmiento. — Buenos Aires, 1956.
Pagés Larraya A. Prosas del Martín Fierro. — Buenos Aires, 1972.
Rojas R. El pensamiento vivo de Sarmiento. — Buenos Aires, 1944.

БРАЗИ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Bandeira M. Poesia e vida de Gonçalves Dias. — São Paulo, 1962.
Barros R. S. M. de. A significação educativa do romantismo brasileiro; Gonçalves de Magalhães. — São Paulo, 1973.
Garcia Moacyr O. Luz e fogo no lirismo de Gonçalves Dias. — Rio de Janeiro, 1956.
Haberly D. T. Three sad races: Racial identity and nacional consciousness in brazilian literature. — Cambridge, 1983.
Mendes Garcia M. A personagem negra no teatro brasileiro: Ensayos. — São Paulo, 1982.
Veríssimo J. Estudos de literatura brasileira. — 2-a ser. — Sao Paulo, 1977.

VII—IX.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ЧНОЙ,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ЮЖНОЙ АЗИИ, БЛИЖ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Учеб. для вузов. — М., 1975.
Тр. межвуз.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 зарубеж. Востока. — М., 1970.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проблемы восточных литератур. — М., 1969.

VII. ЛИТЕРАТУРЫ ВОСТОЧНОЙ,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олыгина К. И. Теория изящной словес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 М., 1971.

Избранны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нового времени (1840—1898). — М., 1961.

Литера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 М., 1975.

Петров В. В. К вопросу о периодизац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 начала XX в.: Теорет. проблемы изуче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 М., 1977. — С. 170—187.

Семанов В. И. Кита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ериода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 Новая история Китая. — М., 1972. — С. 585—597.

Семанов В. И. Эволюц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романа: Конец XVIII — начало XX в. — М., 1970.

Товаров В. К. О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и и стихах Гун Цзы-чжэня (1792—1841) // Вопросы эстетики, поэтики и текстологии литератур Востока. — М., 1977. — С. 133—149.

Фишман О. Л. Китайский сатирический роман: (Эпох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 М., 1966.

Chén, Jerome. China and West: Society and Culture, 1815—1937. — 1980.

Wong S. S. Kung Tzu-chen. — Boston, 1975.

Eberhard W. Die chinesische Novelle des 17. — 19. Jahrhundert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 Ascona, 1948.

А-ин. Япянь чжаньчжэн вэньсюэ цзи. — Пекин, 1957. — Т. 1—2.

Аоки Масару. Синдай бунгаку х ё— Токио, 1950.

Ван Цзя-цзянь. Вэй Юань няньпу. — Тайбэй, 1967.

Вэй Ин-ци. Линь Вэньчжунгун няньпу. — Шанхай, 1935.

Вэй Ин-ци. Линь Цзэ-сюй. — Чунцин, 1945.

Гун Цзы-чжэнь ды шивэнь. — Пекин, 1979.

Курата Садаёси. Симмацу минсё-о тю с ин тосита Тю г оку киндай си-но кэнк ю. — Токио, 1969.

Лин Ти-ань. Чжэн Цзы-инь няньпу. — Чанша, 1941.

Лай Синь-ся. Линь Цзэ-сюй няньпу. — Шанхай, 1981.

Лю Шэн-му. Тунчэн вэньсюэ юаньюань као: Тунчэн вэньсюэ чжуаньшу као. — Тайбэй, 1974.

Лян Кунь.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лунь. — Чанша, 1940.

Сунь Вэнь-гуан. Гун Цзы-чжэнь. — Шанхай, 1985.

Сунь Сюн. Сянь-Тун Дао Гуан сычао ши ши. — Тайбэй, 1971.

Тунчэнпай яньцзю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 Хэфэй, 1963.

Хорикава Тэцуо. Рин Соку-дзё. — Токио, 1966.

Цзян Ши-ди. Линь Цзэ-сюй. — Шанхай, 1981.

Цзян Шу-гэ.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пиншу. — Шанхай, 1930.

Чжан Цзун-сян. Циндай вэньсюэ. — Шанхай, 1930.

Чжу Сюань. Яо Си-бао сюэ цзи. — Тайбэй, 1974.

Чжу Цза-цинь. Гун Дин-ань яньцзю. — Чанша, 1940.

Чжу Чжун-юй. Вэй Юань. — Пекин, 1962.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лунь сюань. Пекин, 1959. — Т. 1—2.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Гайлунь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1.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Сицзюй миньцзянь вэньсюэ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2.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луньвэнь цзи (1949—1979): Сяошо цзюань. — Пекин, 1983.
Чжунго цзиньдай вэньсюэ шигао. — Шанхай, 1960.
Чжэн Вэнь, Сюэ Цзюнь. Цзиньдай айгочжуи сысянцзя — Вэй Юань. — Пекин, 1976.
Ю Синь-сюн. Тунчэн Вэньпай сюэшу. — Тайбэй, 1975.
Ян Го-чжэнь. Линь Цзэ-сюй чжуань. — Пекин, 1981.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КОР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Тэн А. Н. Традиции реализма в корейской класс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 Алма-Ата, 1980.
Ким Ха Мён. Ури нара кочон мунхак. — Пхеньян, 1959.
Кочон чаккарон. — Пхеньян, 1958. — Т. 1—2.
Чосон мунхак тхонса. — Пхеньян, 1959. — Т. 1—2.
Чосон мунхакса. — Пхеньян, 1977—1980. — Т. 1—2.
Юн Се Пхён. Хэбанчон чосон мунхак. — Пхеньян, 1958.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ЯПО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ундзи Масакацу. Кабуки: ёсики то дэнсё. — Токио, 1954.
Исида Гэнки. Гэки: Кинсэй бунгаку ронко. — Токио, 1973.
Кинсэй бунгаку: сакка то сакухин. — Токио, 1973.
Кинсэй Нихон сисо си кэнкю / Нарамото Тацуя хэн. — Токио, 1965.
Мидзутани Футо. Содзоси то ёмихон но кэнкю. — Токио, 1934.
Накамура Юкихико. Кинсэй сакка кэнкю. — Токио, 1971.
Сугиура Мимпэй. Исин дзэнъя но бунгаку. — Токио, 1967.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ТИБ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Snellgrove D. L., *Richardson H. E.* 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 — L., 1968.
Stein R. A. Tibetan civilization. — Stanford (Cal.), 1972.

Глава пятая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стория калмыц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2 т. — Элиста, 1981. — Т. 1: Дооктябрьс-кий период.

Калмыцкие историко-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памятники в рус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 Элиста, 1969.

Литературные связи Монголии. — М., 1981.

Михайлов Г. И., *Яцковская К. Н.*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9.

Позднее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Эрдэнийн эрихэ》: Подлинный текст с пер. и пояснениями, заключающий в себ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стории Халхи с 1636 по 1736 г. — СПб., 1883.

Ёндон Д. Тевд монголын уран зохиол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асуудалд.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0.

Монголын уран зохилын тойм.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8. — Т. 3.

Равжаа Д. Зохиолын эмхэтгэл / Эрхэлсэн академич Ц. Дамдинсурэн, эмхэтгэж хэвлэлд бэлтгэсэн. Д. Цагаан.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2.

Равжаа Д. Саран хөхөөний намтар: Омнөх өгүүлэл.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62.

Хуульч Сандагийн зохиолуудын түүвэр / Хэвлэлд бэлтгэсэн. Ө. Чимэд; Ред. Ц. Дамдинсүрэн. — Улаанбаатар, 1981.

Heissig W. Geschichte der mongolischen Literatur. — Wiesbaden, 1972. — Bd. 1.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Никулин Н. И. Вьетн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От средних веков к новому времени. — М., 1977.

Hguen Loc. Van hoc Viet Nam: Nua cuoi the ky XVIII-nua dau the ky XIX. — Ha noi, 1978. — T. 2.

Vu Dinh Lien va cac tac gia khac: Luoc thao lich su van hoc Viet Nam. — Ha noi, 1957. — T. 2.

Van Tan va cac tac gia khac: So thao lich su van hoc Viet Nam. — Ha noi, 1959. — T. 4.

《Lich su van hoc Viet Nam》. — Ha noi, 1980. — T. 1.

Nguyen Khan Vien. Aperçu sur la littérature vietnamienne. — Hanoi, 1976.

VIII. ЛИТЕРАТУРЫ ЮЖНОЙ И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ИНДИЙСКИЕ ЛИТЕРАТУРЫ

Баруа Б. К. Асс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8.

Глебов Н. И.，*Сухочев А. С.* Литература урду. — М.，1965.

Гуров Я.，*Петруничева З.* Литература телугу. — М.，1967.

Джордж К. М. Литература малаялам. — М.，1972. История индийских литератур / Под ред. Нагендры. — М.，1964.

Калинникова Е. Я. Англоязы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дии. — М.，1974.

Ламшуков В. К. Маратх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70.

Серебряков И. Д. Литера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Индии. — М.，1985.

Серебряков И. Д. Пенджаб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63.

Товстых И. Бе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65.

Челышев Е. П. Литература хинди. — М.，1968.

Челышев 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инд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81.

Варадараджан М. Тамиж илаккиям. — Мадрас，1972.

Contemporary indian literature. — New Delhi，1959.

Frazer R. W. Literary history of India. — Delhi，1898.

Indian drama. — Delhi，1956.

Karkala J. A.，*Karkala L.* Bibliography of Indo-English literature：a checklist of works by Indian authors in English，1800—1966. — Bombay，1974.

The novel in India：its birth and development / Ed. and with an introd. by T. W. Clark. — L.，1970.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СИ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Выхухолев В. В. Синг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1970.

Краснодембская Н. 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е мировоззрение сингалов. — М.，1982.

Талмуд Э. Д. 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мысль Шри Ланки в новое время. — М.，1982.

Вималакирти-стхавира М.，*Сумангала-бхикшу К.* Синхала бхашаве итихасая. — Коломбо，1965.

Godakumbura C. E. Sinhalese literature. — Colombo，1955.

Lambrick S. Grammar of the Sinhalese language，as it is now written and spoken by men of learning and others. — Ceylon (Cotta)，1834.

Pinto N. A short history of Sinhalese literature. — Colombo，1954.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НЕП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ганина Л. А. Непаль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1964.

Аганина Л. А. Человек, общество, религия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епальской поэзии. — М., 1985.
Бабурам Ачарья. Пурана каби ра кабита. — Қатманду, 1961.
Шарма Балчандра. Непалко айтихасик руп-рекка. — Бенарес, 1951.
Шарма Балчандра. Бханубхакта. — Қатманду, 1963.
Шарма Джанаклал. Джосмани санта парампара. — Қатманду, 1967.
Хридай, Читтадхар. Джигу сахитья. — Қантипур, 1954.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ИНДОНЕЗИЙСҚОГО АРХИПЕЛАГА И МАЛАҚҚИ

Брагинский В. И. История мал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VII—XIX веков. — М., 1983.
Парникель Б. Б. Введение в литературную историю Нусантары, IX—XIX вв. — М., 1980.
Смурова Н. М. Просветительские идеи в творчестве Абдуллаха бин Абдулкадира аль Мунши // Тр. межвуз. науч. конф. по истории литератур зарубежного Востока. — М., 1970.
Hamidy U. U. Raja Hamzah Yunus dan Tengku Bin Abulbakar, Pengarang Melayu dalam Kerajaan Riau dan Abdullah bin Abdulkadir Munsyi dalam Sastra Melayu. — Jakarta, 1981.
Hooykaas Ch. Introductionà la littérature balinaise... — P., 1979.
Li Chuan Siu. Ikhtisar Sa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Baharu, 1830—1945. — Kuala Lumpur, 1966.
Pelras Ch. Introductionà la littérature bugis // Archipel. — 1975. — T. 10. — P. 235—268.
Poerbatjaraka R. M. Hg., Hadidjaja T. Kepustakaan Djawa. — Djakarta, 1957.
Snouck Hurgronje Ch. The Achehnese. — Leiden, 1906. — Vol. 1—2.
Usman Z. Kesusateraan Baru Indonesia: dari Abdullah bin Abdulkadir Munsji sampai kepada Chairil Anwar. — Djakarta, 1961.
Voorhoeve P. Codices Batacici. — Leiden, 1977.

Глава пятая
ФИЛИППИНСҚ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Левтонова Ю. О. Очерки новой истории Филиппин (60 гг. XVIII — 60 гг. XIX в.). — М., 1965.
Левтонова Ю. О. Исто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на Филиппинах. — М., 1973.
David-Maramba A. Early Philippine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1940. — Manila, 1971.
Marinas Otero, Luis. La literatura filipina en castellano. — Madrid, 1974.
Medina, Buenaventura S. Confrontations past and present in Philippine literature. —

Manila, 1974.
Yabes L. Y. A brief survey of Iloko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 Manila, 1936.
Brown heritage: essays on Philippin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terature / Ed. by A. G. Manund. — Quezon City, 1967.
Lumbera B., *Lumbera C. N.* Philippine literature: a history and anthology. — Manila, 1982.
Del Castilloy Tuazon, *Teofilo and Medine*, *Buenaventura S.* Philippine literature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 Quezon City, 1966.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БИРМ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Попов Г. П. Бирман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67.
Пхей Маун Тин У. Мьянма сабей тамайн. — Рангун, Б. г.

Глава седьмая
ТАИЛАНДСКАЯ (СИАМ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рнев В.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Таиланда: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 М., 1971.
Плыанг Нанакхон Н. Прават ваннакхади тхай. — Бангкок, 1957.
Schweisguth P. Etude sur la littérature siamoise. — P., 1951.

IX. ЛИТЕРАТУРЫ БЛИЖНЕ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Крымский А. Е.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й ара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XIX — начало XX в. — М., 1971.
ал-Фахури Х. История араб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61.
Фильштинский И. М. Араб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1964.
Авад Л. ал-Муассират ал-аджинабийа фи-л-адаб ал-арабий ал-хадис. — Каир, 1963, — Т. 2.
Карни И. ал-Адала ва-л-хуррийа фи фаджр ан-нахда ал-арабийа ал-хадиса. — Эль-Кувейт, 1980.
Bielawski J. et al. Nowa i wspólezesna literatura arabska 19 i 20 w. — W-wa, 1978.
Brockelmann C. 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eratur. — Leiden, 1942. — Suppl. 3
Haywood J. A. Modern Arabic literature, 1800—1970. — L., 1971.
Huart C. A history of Arabic literature. — Beirut, 1966.
Monteil V. L'arabe moderne. — P., 1960.
Moreh S. Modern arabic poetry, 1800—1970. — Leiden, 1976.

Nicholson R. A. A literary history of the Arabs. — Cambridge, 1956.

Глава первая
ТУР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арбузова В. С. Поэты Турции XIX века. — Л., 1970.

Маштакова Е. И. Турец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онца XVII — начала XIX в.: К типологии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 — М., 1984.

Коджатюрк В. М. Тюрк эдебияты тарихи: Башлаигычтан бугюне кадар Тюрк эдебиятынын таризи, тахлили в тенкиди. — Анкара, 1964.

Płaskowicka-Rymkiewicz S., Borzecka M., Labecka-Kocher M. Historia literatury tureckiej: Zarys. — Wrocław, 1971.

Tatarli I. Les méthodes et les courants de la littérature turque moderne au stade initial de sa formation // Etudes balkaniques. — Sofia, 1966. T. 5. P. 129—153.

Глава вторая
ЕГИП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Кахарова Наим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Париж Рифа'а ат-Тахтави. — Душанбе, 1968.

аш-Шаййал Мухаммад Джамал ад-Дин. Рифа'а Рафи ат-Тахтави, 1801—1873. — Каир, 1958.

Зайид Саид. Али Мубарак ва амалуху. — Каир, 1958.

Бадави Ахмад Ахмад. Рифа'а Рафи ат-Тахтави. — Каир, 1959.

ал-Аккад Аббас Махмуд. Шуара Миср ва биатухери фи-л-лджил ал-мади. — Каир, 1950.

Ашиа ат-Таймурийа. Хилйат ат-тираз. — Каир, 1952.

аш-Шаркави М., ал-Мишадд А. Али Мубарак: Хайатуху ва даватуху ва асаруху. — Каир, 1962.

Шаукат Махмуд Хамид. Мукаввамат ал-кисса ал-арабийа ал-хадиса фи Миср. — Каир, 1974.

Авад Луис. Тарих аль-фикр аль-мысрий аль-харис. — Каир, 1969.

Айад Шукри Мухаммед. Аль-Кысса аль-каскра фи мыср: Мухадарат. — Каир, 1968.

Глава третья
СИР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ббуд Марун. Сакр Лубнан. — Бейрут, 1950.

Аббуд Марун. Адаб ал-араб. — Бейрут, 1960.

Амир Атийа. Лугат ал-масрах ал-араби. — Стокгольм, 1967. — Т. 1.
ал-Бустани Бутрус. Китаб мурай ал-мухай. В 2 т. — Бейрут, 1867—1870.
ал-Бустани Фуад. аш-Шайх Насиф ал-Язиджи. — Бейрут, 1929.
Зейдан Джурджи. Тарих адаб ал-луга ал-арабийа. — Каир, 1957. — Т. 4.
Ибрахим Амили Фарис. Адибат лубнанийат. — Бейрут, 1960.
ал-Йазиджи Камал. Руввад ан-нахда ал-адабийа фи Лубнан ал-Хадис 1800—1900. — Бейрут, 1962.
Малуф Рийад. Шуара ал-Маалифа. —Бейрут, 1962.
Мустафа Шакир. Мухадарат ан сл-кисса фи Сурийа хатта-л-харб ал-аламийа ас-санийа. — Каир, 1958.
Саба Иса Михаил. аш-Шайх Насиф ал-Язиджи. — Каир, 1954.
Саваййа Михаил. Ахмад Фарис аш-Шидйак: Хайату-ху-асаруху. — Бейрут, 1962.
Хаддад Фуад. Мухадарат Фуад Хаддад фи-н-надва ал-лубнанийа. — Бейрут, 1960.
Ал-Язиджи Насиф. Муджма ал-бахрайм ли-ш-шайх Насиф ал-Язиджи. — Бейрут, 1958.

Глава четвертая
ИРАК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Аввад К. Му'джам ал-му'аллифин ал-'иракийин — Багдад, 1969—1970. — Т. 1—3.
ал-Аззави Аббас. Тарих ал-адаб ал-араби фи-л-Ирак. — Багдад, 1961.
ал-Басир Мухаммад Махди. Нахда ал-Ирак ал-адабийа фи-л-карн ат-таси ашара. — Багдад, 1946.
ал-Ва'или Ибрахим. аш-Шир ас-сийаси ал-ираки фи-л-карн ат-таси ашар. — Багдад, 1961.
Изу ад-Дин Йусуф. аш-Шир ал-Ираки, ахдафуху ва хасаисуху фи-л-карн ат-таси ашара. — Багдад, 1958.

Глава пятая
КУР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Хазнадар М.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кур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М., 1967.
Mokri M. Contribution scientifique aux études iraniennes: Etudes d'éthnographie, de dialectologie, d'histoire et de religion. — P., 1970.

Глава шестая
ПЕРСИ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Бертельс Е. Э.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персид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 Л., 1928.

Брагинский И. С. , *Комиссаров Д. С.* Персид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 М. , 1963.
Ариаппур Яхья. Аз Саба та Нима. — Тегеран, 1972. — Т. 1.
Наем-Макам Фарахани Абулкасем. Моншаа